

第一篇

肥大的裙子

我住在疗养与护理院。我的护理员几乎时时刻刻都监视般的在观察我，即使门上有个窥视孔，我的棕色眼睛的护理员也不可能看透蓝眼睛的我。

我已经喜欢上我的护理员了。因此，他根本不可能是我的敌人。每次他一跨进我的房间，我就向他讲述我一生中的事件。即使通过窥视孔的阻隔他仍然可以了解我。每当我给他编造了点故事时，他就给我看他最新编结的形象，以表示感激。由此可见这个好人欣赏我所讲述的故事。我们可以暂且不去讨论，他是否是一个艺术家，但要用他的创作办一个展览的话，在媒体给予一定好评的同时，也会吸引来一些买主。是在探望时间过后在他所护理的病人房间里收集并经过整理的普通的包扎用的线绳编结制作出多层次的软骨鬼怪，随后把它们浸在石膏里僵化后，插上针，固定在木头底座上。

他常常想创造出各种不同颜色的作品来。我指着我的白漆金属床劝阻他，请他想象这张最完善的床如果被涂上各种颜色，变成什么样子。我刚说完，他便惊恐地把双手伸到脑袋上方猛地击掌，恐惧地放弃了涂彩色。

所以，我那张白漆金属架病床是作为一种准则存在的。对于我来说，还不止如此：我的床是我最终达到的目的地、我的安慰和信仰，我想作一些改变，如果疗养院管理处允许的话，使任何人都不得过于接近我，我会把床栏升高。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每周的探望日全都来了，我被那些要救我的人打断了在白漆金属床栏杆之间围起来的宁静。他们想通过我来珍视、尊重和认识他自己，以爱我来自娱，并且，他们是多么盲目，神经质，和没有教养：用手指甲刮我的床栏杆上面的白漆，用圆珠笔和铅笔在白漆上乱画作风极差的小人。我的律师每次大叫着“哈啰”闯进病房来后，便把他的尼龙帽挂在我左脚跟的床柱子上。然后在整个来访时间内用他特殊的方式剥夺了我精神上的平衡和欢畅：一直滔滔不绝地说话。

礼物被来探望我的人们放在有银莲花水彩画并铺着蜡布的小白桌上，告诉我他们正在实行的或者已经盘算好的搭救计划，并且说服我这个他们不倦地设法搭救的人，几乎完全相信他们的仁爱之心。然后，在重新发现了自己的生存的乐趣后，便离我而去。他们刚走，我的护理员便来开窗换空气并且收集捆扎礼物的线绳。在余下的时间里，在我的床边坐下，解开并且整理好线绳的结，让寂静散开来，直到我把寂静称为布鲁诺，把布鲁诺称为寂静。

我的护理员名叫布鲁诺·明斯特贝格，籍贯绍尔兰，未婚，无子女。他用我的钱给我买过五百张打字纸，但还不止这些，便又让布鲁诺再到兼卖儿童玩具的小文具店去一趟买没有横格的纸，给我施展我的记忆力，提供必要的场地。但愿我的记忆力是准确无误的！这件事我从来不托律师或克勒普去办，仁爱之心使朋友们为我担忧，给我定下种种规定，禁止他们干诸如此类的危险事情，比如给我带白纸，以便我录下我头脑里流露出来的不连贯的字符。

我对布鲁诺说：“给我买五百张干净的纸来，好吗？”他抬头望着天花板，食指也指着同一个方向，要找出一个譬喻来，然后回答说：“奥斯卡先生，您是想要白纸。”

我让布鲁诺对店里的人说时也一定像我一样用“清白”这个

字眼。傍晚时，他买回来一包纸，想使我觉得他是若有所思的。他仰着头，久久地凝视天花板，从那里汲取了他所需要的全部灵感后说：“您让我用那个恰当的字眼。我向女售货员要清白的纸，她羞得满脸通红地去给我取。”

我怕他不停地谈论文具店里的女售货员们，我保持着沉默，同时深深自责不该把纸称为清白，直等到布鲁诺离开才把装有五百张打字纸的纸包打开。

我拿起这些柔韧的纸掂了掂，我取出十页，把其余的保存在床头柜里，又在抽屉里的照相簿旁边取出灌满了墨水的钢笔，那么，我由何时开始写呢？

讲故事，可以用正叙、插叙或倒叙来制造悬念。或时髦一些，彻底撇开时间与空间，最后再宣布，或者让人宣布，时间和空间的问题在最后一刻已经被解决了。也可以开门见山地声称，现在写长篇小说已是不可能的了，然后，在自己背后添上一个把他当作最后一个有可能写出长篇小说的作者的声嘶力竭的呐喊者。也曾有人说过若要给人谦虚的好印象，便可以开宗明义地说：因为有个性的人已没有了，现在不再有长篇小说里的英雄人物，个性已经丧失，因为人人都同样孤独，没有要求一个人孤独的权利，因此组成了孤独的无名英雄、无名英雄的群体，可能事情都是有它正确可信的地方。可是，就我和我的护理员而言，我们两人都是英雄，但却完全不同。他在窥视孔后面，而我在前面；如果他打开房门，由于既有友谊又很孤独，因此我们两个仍然构不成无名英雄、无名的群体。如果一个人没有耐心，在写下自己存在的日期之前，连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中的任何一方都不想去回忆的话，他就不配写自传，我将从自己出世以前很远的时候写起。所以，我要向不得不在我所居留的疗养与护理院外面生活的诸君，向每周来探望我一次的、根本想不到我会储存纸张的诸位朋友介绍一下我外祖母。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的外祖母名叫安娜·布朗斯基。在十月的一个傍晚，她会穿着她的几条裙子，在一块土豆地的地边上坐着。要是上午，你就可以看见我的外祖母熟练地把枯萎的土豆秧整整齐齐地归成堆。到了中午，她便吃涂糖汁的猪油面包，接着，最后掘一遍地，末了，穿着她的几条裙子，在两只几乎装满土豆的篮子当中坐着。她的鞋底同地面构成一个直角，靴尖差一点碰到一起，靴底前闷烧着一堆土豆秧，它像哮喘似的不时冒出一阵阵火苗，送出的浓烟，跟倾斜度极小的地壳平行，局促不安地飘去。那是一八九九年。她坐在离比绍不远的卡舒贝地区的心脏，更靠近拉姆考和菲尔埃克之间的砖窑，面对着迪尔绍和卡特豪斯中间通往布伦陶的公路，背向着戈尔德克鲁格的黑森林。她坐着，用一根烧焦了的榛木棍的一端，将土豆捅到热灰底下。

我在上文着重提到了我外祖母的裙子，说她穿着几条裙子坐在那里，我但愿这已经点得够清楚的了。我甚至把这一章的标准题定为《肥大的裙子》，之所以如此，是由于我深知自己应当如何感激这种衣裳。我的外祖母不只穿一条裙子，她四条裙子套穿着。你不要以为她穿了一条裙子和三条衬裙；她穿着四条裙子，一条套一条，并且每天按照一定的顺序里外倒换一次。昨天穿在最外面的，今天变成第二层，昨天在第二层的，今天到了第三层。昨天的第三层，就是今天贴身穿着的。昨天贴着皮肤的那一条，今天就展现在最外面了。其实它根本没有式样，她的裙子都偏向和她相称的土豆色。除去颜色以外，我外祖母的裙子的特点是非常浪费衣料尺寸宽大，它们像水桶一样圆，有风的时候一会儿以波浪翻滚，一会儿倒向一边，要不就发出响声，有时还在她身前飘动。在她坐下的同时，四条裙子便也安静了下来。

除去这四条挂在她床头的经常下垂、起皱褶、蓬松一团，或者硬撅撅、空荡荡地裙子而外，我的外祖母还有同另外四条土豆色裙子毫无区别的第五条裙子。它非永远排行老五。和其它四条

一样，它也得服从轮换的需要，并且同它们一样，如果在第五天星期五轮到它的话，就把它扔进洗衣桶里，星期六晚上被挂在厨房窗前晾衣服的亚麻绳子上晾干后，被放到熨衣服的木板上。

我的外祖母每逢星期六便打扫屋子，洗衣服，熨衣服，烤面包，挤牛奶，喂母牛。这些事都做完了，她便整个泡进洗澡桶里，从肥皂水里稍稍探起身子后让桶里的水回到原来的高度。她坐在床沿上裹上一条似盛开的大花朵的毛巾，把四条穿过的裙子和一条刚洗干净的裙子放在她面前的地板上，她用右手的食指撑着右眼的下眼皮，不向包括她哥哥文岑特在内的任何人征求意见，就下定了决心。她光着脚站起来，用脚趾把那条没有土豆色柔和光泽的裙子踢到一边。用那条新洗干净的裙子顶替它。

星期日的早晨，她在出发去拉姆考上教堂，朝拜在她心中有固定想象的主耶稣之前。新洗干净的裙子穿在第几层呢？我的外祖母爱干净也爱虚荣，她把最好的一条外露在晴朗天气里的阳光底下好让别人都能看见。

那天是星期一下午，我的外祖母穿着她按顺序调换好的裙子，坐在闷烧着的土豆秧堆旁。用榛木棍把第一个闷熟了的土豆从灰堆里扒出来，吹着脑子里并没有想着什么曲子的口哨。她把它扒到离闷烧着的土豆秧堆较远的地方，让风把它吹凉。她把把这个表皮烧焦并裂开的块茎用一根尖树枝插住，举到嘴边。她停止吹口哨，从两片被风吹得焦燥干裂的嘴唇间送出气来，吹掉土豆表皮的灰和土。

她眼睛闭着吹着土。当她先睁开一只眼睛，再睁开另一只时，她便认为吹得差不多了，用除了牙缝颇宽别无缺陷的门牙咬了一口，咬下的半个粉状的、还太烫的土豆留在张开的嘴里冒着热气，随即把咬剩的土豆挪开。她的鼻孔鼓着，吸着烟和十月的空气，睁圆了眼睛顺着田地望去，直盯着被砖窑烟囱上端三分之一处和电线杆分割开的地平线。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的外祖母闭上嘴巴，抿紧嘴唇，咀嚼土豆，眯缝着眼睛，看到有什么东西在电线杆之间移动。有东西在电线杆之间跳动着。三个男人在电线杆之间跳动，向烟囱跳去，接着在烟囱前面转着圈儿；一个看来又矮又宽的回到原处，重新起跳，他跳着过了砖窑；另外又细又高的两个，紧跟在他背后过了砖窑，又回到电线杆之间；那个矮而宽的，显得比细而高的两个更焦急匆忙拐来拐去；因为矮而宽的那个已经跳了过去；那两个不得不又向烟囱跳去，他们刚起跳的时候，已经有一个拇指宽的距离了；他们消失了，看样子像是失去了兴趣；而那个矮的，也从烟囱跳到地平线后面去了。

现在他们消失了，这可能是在换戏装或者是幕间休息，再不然就是他们去打砖坯，领报酬了。

我的外祖母本想利用这个间歇去叉第二个土豆，却没叉到。因为那个看去又矮又宽的人，又穿着原来的衣服爬上了地平线。他似乎把这两个跟在他背后跳跃的人甩在一道栅栏后面，留在通往布伦陶的公路上或者留在砖堆间。即使如此，他仍想要跳得比电线杆更快。他以很慢的动作跳越过烂泥般的田地，鞋底上甩出泥块；像在烂泥地里爬行。有时他好像粘在泥里，随后又在不高但距离颇远的跳跃过程中在空中停留一会儿，擦一下额头上的汗，接着又把两条腿粘在那片新犁过的地里。这片在五摩尔根土豆地旁边的地，一直延续到田间窄窗道。

这个矮而宽的好不容易到了窄道上，还没有在那里隐没，另外两个高而细的也出现在地平线上了。他们可能在刚才去了砖窑一趟，现在深一脚浅一脚地踩着烂泥走过来。他们又高又细，却不显瘦。我外祖母瞧着这样并不常见的东西，所以土豆又没有叉中；因为三个身材不同的成年人，都在电线杆周围相互间隔一段距离跳动，差一点把砖窑的烟囱折断了，那个矮而宽的和那两个高而细的，都同样费劲但同样顽强地在文岑特两天前刚犁过的烂

泥地里跳动，越粘越厚鞋底甩掉又粘上的泥团。最后都消失在窄道上。

我的外祖母在他们三个都走了以后放心去叉那个快凉了的土豆。把土豆上的土吹掉后整个地塞进嘴里，一边想着他们可能是砖窑上的人，一边口腔做着圆周运动咀嚼着，此时，一个黑色小胡子上的眼睛发狂地四下窥探的人从窄道上跳了出来，两下子就跳到火堆旁，同时站到了火堆四周，战战兢兢的咒骂着，走投无路，那两个高而细的跟着在窄道上追来了，所以他退回去已经不行。他拍打自己的膝盖大胆地爬近，气喘吁吁的，额上冒出了汗珠，头上的眼睛像要瞪出来似的，小胡子颤动着，爬到我外祖母的靴底前面，像一头看着我的外祖母的矮胖的小动物，看得她不能再嚼嘴里的土豆，只能叹着气，脚尖翘起，靴底与地面成了斜角。她不再去想砖窑、砖堆、烧砖的、打砖坯的，而是同时把四条裙子都高高地撩起，让这个不是砖窑上的矮而宽的人连同他的黑色小胡子一齐能够钻到底下去。他看上去不再像从拉姆考或从菲尔埃克来的一头小动物，他忘掉了喘息、颤抖和拍后膝盖的手，怀着恐惧钻到了裙子底下把那儿当作好的藏身之地，不再拍打膝盖，既不矮也不宽了，这时，万籁俱寂，微风在火堆里盘旋，电线杆矗立在路边，砖窑的烟囱立正，好似创世的第一天，也像世界末日，我的外祖母，把最外面一条裙子抚平，让它遮住第二条，她几乎感觉不到第四条裙子下面的他，也不让第三条裙子知道有人藏在第四条裙子里面。上面一条裙子被明智地抚平了，第二和第三条裙子也都蒙在鼓里。这难道不新奇吗？她把两三个土豆从热灰里扒出，从各胳膊肘边上的篮子里拿出四个生的，一个接一个地捅进热灰里去，用更多的灰把它们埋上，拨弄着，直到冒出了浓烟，除此以外，她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

闷烧着的土豆秧堆不停地冒出来浓烟，我的外祖母刚把裙子抚平，由于刚刚拼命拍膝盖、换地方和拨弄而乱了方向，现在顺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着风向形成一股贴着地面向西南飘去的黄色的烟。那两个高而细的跟在现在裙子底下藏着的矮而宽的家伙后面紧追不舍，从窄道上像幽灵似的飘来。他们高而细，穿着职业装——农村保安警察的制服。

他们几乎从我的外祖母身边贴着跑过去。其中一个甚至跳过了火堆。可是他们一下子想起自己是有鞋跟的，便用鞋跟煞住了身子后把脸转过来，脚登皮靴，穿制服的身子从浓烟里拔出，浓烟也被带了出来。他们总在咳嗽，问我的外祖母是否看见那个科尔雅切克，还说她肯定看见了的，原因是她坐在窄道边上，而科尔雅切克，正是从这里逃过来的。

我的外祖母说她不认识科尔雅切克这么个人。她没有见到过，她想了解，他是否是她所认识的砖窑上的人，因为她只认识砖窑上的。两个保安把科尔雅切克向她描述了一番，说他是一个又矮又宽的家伙，不是同砖头打交道的。我的外祖母想了一会儿，说她见到这么一个人跑了过去，并用叉着冒热气的土豆的尖树枝指着比绍的某处方向，延着树枝上的土豆看过去，是从砖窑的烟囱开始右数第六和第七根电线杆之间。我的外祖母指着靴底前那堆火请他们原谅，还说她不知道那个奔跑的人是不是科尔雅切克，并说她讲得模糊的原因，是这堆火把她折腾苦了；这堆火阴不阴，阳不阳，弄得她顾不上其他的事情，凡她不认识的人的事情，她是向来都不过问的，不管是从这里跑过去的人，还是站在浓烟里的人，她只认识比绍的、拉姆考的、菲尔埃克的以及砖窑上的人，对她来说，这已经够多的了。

我的外祖母说完这些，大声地叹息了几声，那两个穿制服的听了便问她有什么好叹息的。她对着那堆火点点头，意思是说，她叹息是因为这一小堆火半死不活，也多少是因为好几个人在浓烟里呆着。说完，她用带有很宽牙缝的门牙咬下半个土豆，两个眼珠子转到左上角，专注地咀嚼。

那两个穿农村保安警察服的人，不能从我外祖母心不在焉的目光里瞧出什么名堂来，犹豫着是否应当到电线杆后面的比绍去寻找，于是，便用挂在身边的刺刀去捅土豆秧堆。他们两个人突然灵机一动，同时踢翻了我外祖母胳膊肘旁两只几乎装满了土豆的篮子，半天也想不明白，为什么没有科尔雅切克，只有土豆向他们的靴子滚去，他们满腹狐疑，小心翼翼地围着土豆堆转，好像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科尔雅切克竟能藏到土豆堆里去；他们还是对准了用刺刀扎进去，但没有被刺中的人发出号叫声。他们怀疑枝叶凋零的每一丛灌木，每一个耗子洞，甚至某一个鼯鼠窝集中的地方，并且自始至终怀疑我的外祖母。她坐在那里像扎了根似的，不停地叹着气，把瞳孔转到了眼睑底下，只让人看见白眼珠。她伤心地加重语调，声音越来越响地挨个儿地念着一切圣者的卡舒贝姓名——因为这堆火半死不活，因为把两篮子土豆踢翻了。

整整半个小时，两个穿制服的人时而远离，时而靠近火堆，目测砖窑烟囱的位置，想要去占领比绍，却又拖延进攻，把紫色的手伸到火堆上方，直到我的外祖母给了他们每人一个用树枝叉着表皮烤裂的土豆，但她并没有因此停止大声叹气。那两个穿制服的人刚吃了一半，又想起自己身上还有公务，便沿着窄道旁的荆豆丛，跳出去一石之遥，还惊起一只不叫科尔雅切克的野兔，他们又发现有热气腾腾的粉白色土豆在火堆旁，还因为这一通追打筋疲力尽，便打定主意，和和气气地把生土豆重新拾到那两只篮子里去；至于刚才把篮子一脚踢翻，那是必须这么干，因为公务在身。

十月天空的傍晚挤压出一阵微风细雨和黛色的暮霭。这时，他们还在没精打采而迅速地进攻远处一块黝黑的界石，这个敌人被消灭后，他们觉得折腾够了。他们像祈祷似的把手伸到被细雨打湿、冒着长而宽的浓烟的小火堆上方，还踢了踢腿，再次在绿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烟中咳嗽一通，在黄烟中熏出了眼泪，然后边咳嗽流泪边抬起靴子，向比绍方向走去。农村保安警察只知道要是科尔雅切克不在此地，那他肯定在比绍。

慢慢熄灭的火堆里冒出了烟，蒙住了我的外祖母，把她同她的四条裙子以及她的叹息声和圣者名字的呼唤声，同科尔雅切克像第五条同样肥大的裙子一样地罩在烟裙底下。等到两个穿制服的人像两个摇摇晃晃的圆点，在电线杆之间的暮色中慢慢消失，我的外祖母似乎已经生了根，而现在正把这刚开始生长的植物连同泥土和纤维一齐拔出来似的费劲地站起身来。

科尔雅切克突然失去了遮盖，又矮又宽地躺在雨里觉得身上发冷。他赶紧把待在裙子底下时由于害怕，急需寻找避难所时解开的裤子扣上——只要有地方可躺，无论在哪儿。他生怕他的活塞着凉，用手快速地系上钮扣，因为在这秋天的天气里，很容易患感冒。

我的外祖母还在热灰里找出四个熟土豆。给了三个于科尔雅切克，一个留给自己。她在张嘴吃土豆之前，尽管她明明知道科尔雅切克是从别处来的，偏偏不是砖窑上的人，还是先问他是不是砖窑上的。她没等他回答，就自己弯腰提起较重的那一只请他帮忙拿较轻的一只篮子，用空着的那只手，拿起她的耙子和锄头。于是，她四条裙子像风帆似的鼓起，拿着篮子、土豆、耙子、锄头，向比绍采石场走去。

采石场更靠近拉姆考，不是在比绍。他们自己向黑森林走去，让砖窑留在左边，戈尔德克鲁格就位于黑森林里，再后面才是布伦陶。采石场在黑森林前的一个坑里。矮而宽的约瑟夫·科尔雅切克再也离不开这四条裙子，便跟随着我的外祖母一起走了。

木筏底下

在这里，在背后贴着布鲁诺眼睛的玻璃窥视孔的视野之内，躺在疗养与护理院里被肥皂水洗刷干净的金属床上，回忆并描绘卡舒贝闷烧着的土豆秧堆里冒出的烟柱和十月的阴雨，真是件很难的事。如果没有这面只要熟练而有耐心的敲打，便能回忆起所有必需的细节，供我去芜存菁，把主要内容记录到纸上的鼓，如果我没有得到疗养院管理处的同意，让这面鼓每天同我聊上三四个小时，那么，我就会成为一个可怜的连有据可考的外祖母都不知道的人。

无论怎样，我的鼓告诉我：一八九九年十月的那天下午，正值南非的奥姆·克吕格尔擦他的反英浓眉的时候，比绍的砖窑附近，在迪尔绍与卡特豪斯之间，在浓烟、斜雨、畏惧、叹息和圣者名字的痛苦呼唤声中，在两名农村保安警察非常缺乏想象力的盘问以及他们被烟熏迷糊了的目光底下，在四条同样颜色的裙子底下，矮而宽的约瑟夫·科尔雅切克使我外祖母受孕，怀了我的妈妈阿格内斯。

安娜·布朗斯基，我的外祖母，在一位施圣礼向来慷慨大度的神甫帮助下，在那天夜里，改了她的姓：她改称安娜·科尔雅切克，并跟随约瑟夫到了莫特劳河畔的省城。约瑟夫在那里当上了一名筏夫，获得摆脱警方的暂时的安宁。

我为了增强悬念先不讲莫特劳河河口那座我母亲的诞生地城市的名称，一九〇〇年七月底，当人家下定决心把帝国战舰建造计划加倍的时候，我的妈妈在太阳位于狮子宫时来到了这个世界。自信而放荡，慷慨而虚荣。星相图上的第一宫是命宫，待在那里的是易受影响的双鱼座。太阳的位置与海王星形成冲。海王星住在第七宫或室女宫，这是麻烦与混乱的前兆，金星与土星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冲，众所周知，土星又叫晦气星兆肝脾不调，它入主摩羯宫，被狮子宫毁灭；海王星向土星献鳗鱼，并得到鼯鼠作为回赠；土星喜欢吃葱头、颠茄和甜菜，它吐出熔岩并使葡萄酒变酸；土星和金星一同住在亦称死宫的第八宫，这预兆意外死亡；反之，在土豆地里受孕的事实，保证了土星在亲人命宫里的水星保护下得到极大冒风险的幸福。写到这里，我必须插进一段我母亲提出关于我外祖母是在土豆地里受孕的抗议，她最多承认她父亲在土豆地里尝试干过这样的事，但是无论他的位置或者她母亲的位置都没有选择好，未能创造使科尔雅切克成为胎儿之父的有利条件。

“这肯定是发生在那天夜里逃跑的路上，或者在文岑特伯伯的棚车里，甚至可能在我们到了特罗伊尔，在筏夫们那里安家之后。”

我妈妈来确定她的生命起源的日期时，总喜欢用诸如此类的话作理由，于是，实际上了解实情的我的外祖母，却一个劲儿地点头赞同，并说：“不错，孩子，这必定是在棚车上，或是到了特罗伊尔以后才发生的，因为那天又刮风，又下雨，所以不可能在地里。”文岑特是我外祖母的哥哥。他妻子早逝之后，他在琴斯托霍瓦朝圣时，得到琴斯托霍瓦的圣母的神谕，要把她当作未来的波兰女王看待。从此以后，他为了发现每一句句子都证实圣母有权要求得到波兰王国的王位，成天埋头在离奇古怪的书籍里搜寻，他让他的妹妹去做家务事和种地的事。他有个四岁儿子名字叫扬，身体瘦弱，非常爱哭。扬既要放鹅，又要收集彩色小画片以及邮票；一个四岁的小孩集邮总是让人感到不祥。

我的外祖母带着科尔雅切克拿着土豆篮，回到受天国的波兰女王保佑的农舍。文岑特听完她的讲述，拔腿跑到拉姆考，敲了半天的门，让神甫带上施圣礼的一应杂物，去给安娜和约瑟夫证婚。神甫睡意正浓，打着连连的呵欠致完拖长了的祝福辞。拿着作为酬劳的一大块肥肉，离开了被祝福者。他刚转身走开，文岑

特便让新郎新娘登上铺上干草和空麻袋的马车，让冻得发抖低声抽咽的扬坐在自己身边——马车夫台上，再让牲口明白，新婚夫妇要求快马加鞭，它现在得笔直地冲进茫茫黑夜。

马车在黑沉沉但行将消逝的夜里，到达省城的木材港。同科尔雅切克一样都是当筏夫为生的朋友们收留了这对逃亡的夫妇；文岑特必须走了，因为一头母牛，一只山羊，一只母猪和几只小猪，八只鹅，看门狗，都等着他去喂食，他驾着小马返回比绍。他还要让已经有点低烧了的儿子扬上床睡觉。

我外公在躲藏的三个星期之内，蓄起头发，理了一个分头，刮掉了小胡子，给自己留下了证件以证明自己清白的历史，并用筏夫约瑟夫·符兰卡的名字找到了工作。这个筏夫符兰卡，在一次打架的时候被人从木筏上推下水去，在莫德林往南的布格河里淹死了，不过警察局一点也不知道这件事。科尔雅切克口袋里揣着他的证件去找木材商和伐木场谈工作是有原因的，曾经有一段时期他不当筏夫，而在施韦茨的一家锯木厂工作。因为他，科尔雅切克，把一道栅栏漆为刺激性的红白两色油漆。他便和老板吵了起来。老板以他故意挑衅为借口，从栅栏里拔出红色和白色板条各一根，用这些波兰板条打科尔雅切克的卡舒贝人的脊背，板条被打个粉碎，成了一堆红白两色的劈柴。这使挨揍的那个有了充分的理由。就在那天，毫无疑问是在满天星斗的夜里，他一把火烧了这家新建的、油漆一新的锯木厂，冲向天际的红光向虽被瓜分却因此而统一的波兰致敬。

就这样，科尔雅切克成了一名纵火惯犯，因为从那以后，在整个西普鲁士，锯木厂和林场都为强烈的红白两色的民族感情提供引火物。每逢发生关于波兰前途的事的时候，即使在发生那几场火灾的时候，童贞女玛利亚总要参与，据其中可能还有活到今天的目击者称，他们见到一位头戴波兰王冠的圣母，站在许多正在倒塌的锯木厂屋顶上。据说，每回大火起时总让当场的民众同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声高唱圣母颂，并且还宣誓赌咒。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科尔雅切克几次纵火的场面，庄严肃穆。

纵火犯科尔雅切克被人控告，成了通缉犯，而筏夫约瑟夫·符兰卡则历史清白。他父母双亡，与人为善，孤僻褊狭，不但没有人找他麻烦，而且几乎都不认识他。他把自己的嚼烟分成每天一份，直到布格河收容了他。一件短上衣、口袋里的证件以及三天的烟草便是他留下的遗物。由于溺水而亡的符兰卡再也不会来报到，也无人问起淹死的符兰卡而让有关的人为难。于是，与这个落水鬼同样有一颗圆脑袋，体格相似的科尔雅切克胆战心惊地钻进他的短上衣里，然后摇身一变，成了这个有官方文件证明历史清白的人。他以嚼烟草代替了抽烟斗，以至于继承了符兰卡的讲话的缺陷和性格特征。然后扮演了一个干活卖力、勤俭朴素、说话有点结巴的筏夫的角色，驾着木筏，跑遍了涅曼河、布布尔河、布格河和魏克塞尔河的林区和河谷。符兰卡没有服过兵役。而他在马肯森指挥下的王储轻骑兵团里当上了一名下士，可是，比这个落水鬼大四岁的科尔雅切克在托恩留下过一份因当炮兵而造成的糟糕的档案记录。

在抢劫、杀人、放火的时候，强盗、杀人凶手和纵火犯中间最危险的分子，就等待着机会，找一份体面而稳定的职业去做。当中的一些人，或者煞费苦心，或者碰巧走运，遇到了这样的机会。冒充符兰卡的科尔雅切克是一个好丈夫。他改掉了自己的纵火的坏习惯，甚至一见火柴就发抖。只要被这个可能制造过的火柴的人看到，摆在厨房桌子上安然自得的火柴盒，就一定得遭殃。他随手就把这种诱惑犯罪的东西扔到窗外去。所以，对于我的外祖母来说，按时做出热饭热菜，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全家人经常因为没有引火物点燃汽油灯而坐在黑暗无光的屋子里。

但是，符兰卡并不霸道。星期天，他带着他的安娜·符兰卡，并同意她像当年在土豆地里那样套穿四条裙子到下城的教堂去；

她已经办了正式的结婚手续嫁给了他，冬天，筏夫们都因河流冰封，闲着的时候，他就老老实实在特罗伊尔，照管他的女儿阿格内斯。那里居住的只有筏夫、舵工和造船工人。阿格内斯的性格看来像符兰卡，因为她不是躲到床底下就是藏在衣橱里。每到家里有客人时，她就抱着她的破布娃娃坐在桌子底下。

对于他的女儿来说，最要紧的便是在藏身处找到类似于约瑟夫躲在安娜的裙子底下时所找到的那种安全，同时也找到与她父亲所找到的不一样的乐趣。纵火犯科尔雅切克心有余悸，过够了被人追捕的苦日子，非常能够理解他女儿需要庇护的心理。所以，有一天需要在这一间像阳台似的半住房的突出部盖兔舍时，他就替阿格内斯用木板隔出了一个，完全与她身材大小相适的房间。我妈妈小时候就坐在这样一间小棚里，玩她的娃娃，慢慢长大。后来，她上小学的时候扔掉了娃娃，第一次表现她对于易破碎的美有感受力。玩起玻璃珠和彩色羽毛来了。

我急于讲出我自己生命的起源，希望读者能允许我将一九一三年即“哥伦布”号在席哈乌船坞下水那一年以前的事情省略，因为符兰卡一家平平安安地像随波逐流的木筏，度过了这一段时间，直到那一年，一直没忘记追捕假符兰卡的警察局才找上门来。

事情是这样的：一九一三年八月，同每年夏天一样，科尔雅切克出发去基辅。他将大木筏从那里放下来，取道普里皮亚特河、运河和布格河，到莫德林再入魏克塞尔河回来。他们总共十二名筏夫一起，先从威斯特利希新航道乘锯木厂雇的拖轮“拉道纳”号溯着死魏克塞尔河上航至艾因拉格，随后入魏克塞尔河，逆流而上，经凯泽马克、莱茨考、查特考、迪尔绍和皮埃克尔，到托恩停泊过夜。锯木厂新老板在这里登船，他要去基辅监督这次木材购买事宜。也就是说，清晨四点“拉道纳”号解缆开航时，他早已在船上了。科尔雅切克第一次在船上看到他是在厨房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吃早饭的时候。他们啃面包，饶有兴致地面对面地坐着喝着麦茶。科尔雅切克一下子就把他认出了。这个宽肩膀的秃顶让人取来伏特加，斟满大家喝空的茶杯。坐在另一头的人吃到一半，还在斟酒时，他开了腔作自我介绍：“我姓迪克尔霍夫，是新老板。我是讲究秩序的，这么一来，你们就知道了。”

筏夫们按照他的吩咐，一个挨一个地顺着座位的秩序自报姓名然后干杯，伏特加咕嘟一口灌下时，辣得喉结难受。科尔雅切克先干了酒，随后眼睛死盯着迪克尔霍夫。报了自己的姓——“符兰卡”，迪尔克霍夫像前几次重复别人的姓那样点着头，重复了一声：“符兰卡”。虽然这样，科尔雅切克仍觉得，迪克尔霍夫加重了语调重复这个已淹死了的筏夫的姓，而且是尖锐地带着沉思的味道加以突出。

在领水员们轮流帮助下，“拉道纳”号，逆着浑浊的潮水，灵巧地避开沙洲，顺着惟一条可辨认的航道隆隆向前驶去。四周不是一望平川便是丘陵起伏，都是收割过的农田。树篱，田间小路，开遍金雀花的盆地，零散的农舍之间像是天然的骑兵冲锋的战场，专为左边在沙盘变换队形的波兰长枪骑兵师、为跳过树篱的轻骑兵、为年轻骑兵军官的梦想、为已在这里进行过并将重复上演的战役而设，同时也为这样一幅油画而设：鞑靼人伏在鞍上驰骋，龙骑兵的马前腿悬空而立，长剑骑士倒下，骑士团团长血溅长袍，胸甲上则无一处创伤，马索维恩公爵砍倒一人；还有那些马，马戏团都找不到的良种白马，满身流苏，烦躁不安，肌腱画得如此逼真，鼻孔鼓着，往外喷着气，呈洋红色，穿透这鼻息的是系着三角旗、矛尖向下的长枪；高擎的马刀，将天空和晚霞切成条块；那里，在背景上，在黑马的后腿之间，紧贴地平线的是一座平静的小村落，矮墩墩的农舍，袅袅炊烟，屋顶长满干草，墙上布满苔藓；在农舍里，贮存着漂亮的、准备将来大显身手的坦克，到那时，它们也将进入画面，在魏克塞尔河堤坝后

面的平原上长驱直入，好像夹在重甲骑兵当中的小马驹。

迪克尔霍夫在快到符沃茨瓦维克时，用手指敲了敲科尔雅切克的上衣说：“请告诉我，符兰卡，在很久前，您是不是烧过在施韦茨一家您干过活的锯木厂？”科尔雅切克很困难地摇了摇头，仿佛得了硬脖症，同时使自己的眼睛流露出哀愁和疲惫。迪克尔霍夫见了这样的目光就不再盘问下去了。

科尔雅切克同全体筏夫在布格河在莫德林与魏克塞尔河汇合。处“拉道纳”号向布格河拐进时，靠在船栏杆上，朝河里吐了三口唾沫。迪克尔霍夫拿着一根雪茄站在他身旁，向他借了个火。火柴这个词儿，从科尔雅切克背脊上像一个寒噤似的直流下去。“伙计，用不着像大姑娘一样脸红嘛，我只是问您借个火。”

有船过了莫德林后科尔雅切克脸上的绯红才消失。这并非羞惭的红晕，是他在锯木厂点的那场大火映照在他脸上久未逝去的余晖。

“拉道纳”号在布格河逆水而上，穿过布格河与普里皮亚特河之间的运河，经普里皮亚特河进入第聂伯河。从莫德林到基辅的一路上，科尔雅切克—符兰卡和迪克尔霍夫之间没有再进行过我谈。在拖轮上，筏夫之间，烧火工和筏之间，舵工、烧火工与船长之间，工人与更换频繁的领水员之间，自然发生过那些据说是男子汉之间通常发生的事情，或许真的如此。我可以想象出卡舒贝筏夫同那个什切青的舵工之间的争吵，而且由于他而酿成了一次反叛：在船上厨房里举行的会议上，抽签选举出他们的首领，下了口令，还磨快了短剑。

还是不谈这些了吧。那里既无德国人与波兰人之间的械斗又没有进行政治性的争论，也没有由于社会不平酿成严重的耸人听闻的暴动。“拉道纳”号添足了煤，继续向前航行，有一次（我想，那是刚过了普沃茨克），船撞到了沙洲上，但是它靠自己的动力摆脱了。船长巴布施，航道新人，和一名乌克兰领水员激烈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地争吵了几句。就是这些，航行日志上再也没有记载的内容了。

假如非得让我写一本科尔雅切克的思想记录，或者锯木厂老板迪克尔霍夫的内心世界日记的话，倒是可以有好几种惊险动人的写法，嫌疑，证实，和差不多同时迅速地消除了犹豫，他们两个心惊胆战。由于现在是在俄国境内，迪克尔霍夫比科尔雅切克害怕得更厉害，迪克尔霍夫可能被人从甲板上推落河里，与当年可怜的符兰卡年纪差不多，或者，到了基辅以后，在面积特别大，一望无边的木材堆积场上，一个人很容易在这样的迷宫失去他的护卫天使，迪克尔霍夫也许是由于巨木堆的突然崩塌，被压倒而丧生。也可以写成他被一个名叫科尔雅切克的人搭救而脱险。此人先把锯木厂老板从普里皮亚特河或布格河里捞起来，然后在基辅那个没有护卫天使的木材堆积场上，在巨木像雪崩似的倒塌时的千钧一发之际，把迪克尔霍夫救了出来，他才幸免于难。我现在可以这样向你叙述那动人的一幕的话：那个被淹得半死的或者险些被碾成齑粉的迪克尔霍夫眼睛里还存留着死神的阴影，呼吸还非常困难，但马上凑到假符兰卡的耳边悄悄地说：“非常感谢你，科尔雅切克，谢谢！”随后，停顿了一下，又说：“过去的事就不要去计较了！我们恩怨相抵了。”

他们客客气气的，有些尴尬地，干巴巴微笑着，彼此注视着对方泪珠闪闪的男子汉的眼睛，畏畏缩缩地握了握彼此长有老茧的手。

如果导演不乏才思的话，这种场面，可以在仇家解怨的影片上看到，又让两个仇人结成伙伴，历尽千辛万苦，干出千百桩冒险事来，再加上精湛的演技，上乘的摄影，就使观众更加为之陶醉了。

但是，科尔雅切克既没有机会淹死迪克尔霍夫，也没有从滚落的巨木这死神的魔爪下把他营救出来。迪克尔霍夫在基辅买下了木材盘算着自家公司的利润，监督工人把木材扎成九个木筏，

同往常一样，用俄国货币预支給筏夫们定钱，随后坐着火车，经华沙、莫德林、德意志艾拉乌、马林堡、迪尔绍，回到他的公司。公司的锯木厂位于克拉维特尔船坞和席哈乌船坞之间的木材港内。

我要在筏夫们辛苦几个星期从基辅顺流而下，经过大小河流、运河，最后进入魏克塞尔河以前考虑，迪克尔霍夫是否可以确定他认出了符兰卡就是纵火犯科尔雅切克。可以这样说，只要这位锯木厂老板与这个与人为善、尽管孤僻褊狭却仍受大家喜爱的符兰卡身边坐着，他就不希望这个旅伴是那个胆大妄为的科尔雅切克。直到他坐上了火车车厢的软席，才放弃了这一希望。火车到达他的目的地，但泽车站时，迪克尔霍夫打定主意。他让人把行李用马车拉回去，精神抖擞地一个人到设在维本瓦尔附近的警察局去。他跳上石阶，走进大门，仔细地寻找，那间房间很快就被他找到了，室内的布置显出客观公正之貌的办公室。迪克尔霍夫作了一个扼要报告内容，仅限于陈述事实的。锯木厂老板不是控告，只是请求警察局调查一下是否符兰卡就是科尔雅切克，警察局应允了。

许多有关的官厅在木筏载着芦苇棚和筏夫们沿河而下的几星期内，填写了许多份证明材料。这个品行不良的炮兵在西普鲁士第某某野战炮兵团列兵约瑟夫·科尔雅切克的服役档案。曾两次被关过禁闭，因为他醉着大喊半是德文半是波兰文的无政府主义口号。相反，在下士符兰卡的档案里并没有发现这种污点，他曾在朗富尔的第二轻骑兵团近卫团服务，作为营部传令兵的他表现十分出色，在演习时给不但给王储留下了良好印象，并得到一枚经常被王储带在口袋里的铸有王储头像的塔勒作为赏赐。可是，在下士符兰卡的服役档案里却没有提到这件事，而我的外祖母当她和她的哥哥文岑特被传去审问的时候，却哭闹着说确有其事。

她除了用这一塔勒的赏赐来证明纵火犯的罪名是诬陷不实之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词外。还可以拿出文件来证明，约瑟夫·符兰卡早在一九〇四年就已经加入了但泽下城的志愿消防队，在筏夫们暂时歇业的冬天的几个月内，他作为消防队员，曾参加过几次大大小小的火灾的抢救。另外一份材料证明而且，被请来作证的消防队队长黑希特也谈到特洛伊尔的铁路主要工程段在一九〇九年发生大火，消防队员符兰卡不仅扑灭了火灾，而且救了两名机修徒工。据黑希特的审讯记录所载说：“救火的人不可能是纵火犯！他一直在救火梯上，霍伊布德的火的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从灰烬和火焰里升起一只不仅扑灭这场人世间的大火，而且还给我主耶稣解渴的长生鸟。请原谅我的直言不讳，谁要把这个有优先通行权并受保险公司宠爱的头戴消防队员防护帽，口袋里总是有救火时掉进口袋的，或者是专门拿来作为辟邪物的劫后余灰的美丽的长生鸟，说成是大红公鸡的话，谁就该用磨石挂在这种人的脖子上不得好报，……”

志愿消防队队长黑希特是一个能言善辩的神甫。每逢星期日在对科尔雅切克—符兰卡一案调查期间，他一定会站在朗加尔滕的圣巴巴拉教区教堂的布道坛上，喋喋不休地把他对该下地狱的纵火犯和该进天堂的消防队员所作的比喻，灌到他的教区信徒的耳朵里去。可惜，负责该案的警察局刑事官员并不到圣巴巴拉教堂去，而且，在他们耳朵里长生鸟这个比喻，在当今来说是一个大不敬的词，无法证明符兰卡无罪了，因此，符兰卡当志愿消防队员反而使他露出了蛛丝马迹。

很多锯木厂和这两个人出生地的证明，都相继取到。而科尔雅切克是在托恩生的，符兰卡诞生在图赫尔。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调查已经有了进展。老筏夫和两家远亲的证词中，有细微不一致。这时，大木筏正巧到了帝国境内，一过托恩，便被暗中监视，就连筏夫们上岸，也被人暗中盯梢。

我的外祖父过了迪尔绍，才注意到有人盯梢。这在他计划之

中。这当口，可能他由于一种近乎消沉的懒散怠惰，并未在莱茨考和凯泽马克之间设法脱逃；这个地段，他很了解，加上器重他的筏夫们的帮助，他还有可能逃脱。一过艾因拉格，木筏相互碰撞，缓慢地漂入死魏克塞尔河。一艘甲板上站满了人的单桅渔船，贴着木筏驶来，它越是不想引人注目，人越势得其反。刚过普莱能村，两艘海港警察局的摩托艇从岸边芦苇丛中钻出，划破死魏克塞尔河越来越咸的、宣告港口将河到的河水来回穿梭。在两岸之间穿蓝制服的警察在通往霍伊布德的桥那边布置了警戒线。极目远望，克拉维特尔船坞对面的木材堆积场，几个小一点的船坞，各家锯木厂的装卸码头越来越宽、向莫特劳河突出的木材港，有本厂职工在等候的码头，到处都有穿蓝制服的警察。只有河对岸席哈乌那边旌旗林立，没有警察。那边人头挤挤，海鸥乱飞，好像是有什么船下水，或别的什么事情，是在为我外祖父举行庆祝会吗？我的外祖父看到两艘汽艇越发不祥地驶来，把恶浪掀上木筏，看到木材堆周围散布着许多穿蓝制服的警察，他才明白了花费偌大的费用，布下天罗地网，是专为逮捕他的。直至此此时，昔日的纵火犯科尔雅切克的心才彻底清醒了。脱下温和的志愿消防队员符兰卡这张人皮，大声而毫不结巴地宣布同口吃的符兰卡一刀两断，并开始逃跑。他光着脚在由许多木筏组成的宽阔而摇晃粗糙的平面上奔跑，从巨木到巨木，在木筏上向旌旗迎风招展的席哈乌跑去。那里，一条龙骨已浸在水里的船停在船台上，那里，正在做精彩的演讲，没有人在喊符兰克或科尔雅切克，我把你命名为陛下的轮船“哥伦布”号，直航美国，三万马车，四万吨以上的排水量，陛下的轮船，稳定器，散步甲板，“天佑汝，头戴胜利花冠”，船首的本土海港旗帜，海因里希亲王站在舵轮旁，陛下的轮船，一流的休息厅，二流的大餐厅，大理石体育馆，图书阅览室，直航美国。而我的外祖父却光着脚，几乎脚不沾圆木地向铜管乐队奔去。有这等君主的国民啊，他从一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个木筏跑到另一个木筏，国民向他欢呼，“天佑汝，头戴胜利花冠”，所有船坞的汽笛齐鸣，包括停泊在港内的轮船、拖轮和游艇的汽笛，“哥伦布”号，美国，自由，还有两艘汽艇，其乐无穷、像发了疯一样在他耳边飞驰，驶过一张又一张木筏，陛下的木筏败人兴致地截断了他的去路，他刚要姿势优美地一跃而过，却又只能停下来，孤独地站在一张木筏上。在他已经看到了美国时，两艘汽艇横了过来，他除了跳水别无去路——有人看到我外祖父向一张朝莫特劳河漂浮的木筏游去。因为有那两艘汽艇，他只能钻到水里，而且永远待在水下。许多张木筏在他头顶上漂浮。

一双双严酷无情的眼睛在停了发动机的两艘汽艇上搜索着水面。可是，科尔雅切克告别了汽笛，铜管乐，船上的钟，陛下的船，王储海因里希的命名演说，陛下的发疯般乱舞的海鸥，告别了“天佑汝，头戴胜利花冠”以及为陛下的轮船从船台下水时润滑用的陛下的软肥皂，告别了美国和“哥伦布”号，钻到了再生不竭的木筏底下，摆脱了警察局的追捕查究，再也没回来了。

我外祖父的尸体一直没有找到，我深信他是死在木筏底下的。然而，正是因为深信不疑，我还得把有关他奇迹般地获救的各种传说再说一遍。

第一种说法，他找到了木筏底下两根木头间的一个窟窿；从下面看，大小恰好使他的口、鼻露在水面上。从上面看，这个窟窿却很小，使得警察尽管检查木筏，甚至搜遍了木筏上的芦苇棚，一直折腾到深夜，它还是没有被发现。传说后来，他借着黑夜沉沉随波漂去，虽然筋疲力尽，但仍有几分运气，漂到了莫特劳河另一岸，上了席哈乌船坞的码头，躲在废铁堆存场上，后来，也许得到希腊水手的帮助，上了那几艘被传为逃亡者的避难所的满是污垢的油船里的某一艘。

第二种说法：科尔雅切克有超常的肺活量，游泳非常棒，他

不但在木筏底下潜泳，而且潜过特别宽的莫特劳河，幸运地抵达对岸席哈乌船坞的码头，混到造船工人中间而且丝毫没有引起别人的注意，最后混到狂热高唱“天佑汝，头戴胜利花冠”的群众中间，还听了王储为陛下的轮船“哥伦布”号命名的讲演，拼命鼓掌。下水典礼结束，他穿着略带潮气的衣裳，随着人群，挤下码头。第二天和许多偷渡客一起，上了一艘臭名昭彰的希腊油轮。

还有较为荒诞的第三种说法。据说，我的外祖父像一块漂浮的木头，河水把他送进了公海，几名博恩扎克渔夫见到后，马上把他打捞上来，在三海里区域外，把他交给了一艘瑞典深海渔轮。他在瑞典船上像奇迹一般慢慢复元，而且还到了马尔默。

这些乃渔夫们编造的虚妄故事全是无稽之谈。还有那些遍布全世界海港城市让人难以置信的目击者的叙述，我也同样一笑置之。他们说，第一次世界大战过后不久，在美国布法罗见到过我的外祖父还说他改名为乔·科尔奇克，做从加拿大进口木材的生意，是火灾保险公司的创始人，几家火柴厂的大股东。他们把我的外祖父描绘成坐在摩天大楼里一张巨大的写字台后面的一个孤独的亿万富翁，每个手指都戴有一枚光闪闪的宝石戒指，正在训练他的身穿消防队员制服的保镖。以唱波兰文歌曲的长生鸟卫队而远近皆知。

飞蛾与灯泡

关于我的外祖父，一个男人，离弃一切，漂洋过海，到了美国，发财致富的传说。也就够了。至于他现在用的名字是波兰名字戈尔雅切克，还是卡舒贝名字科尔雅切克，或是美国名字乔·科尔奇克，那就无所谓了。

一边敲着一面简易的、随便在任何一个玩具店或商店都可以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买到的铁皮鼓，一边询问那条被一直排到天边的一张接一张的木筏布满了的河流，真是困难重重。然而，我还是敲着鼓，问遍了所有的木材港，和被芦苇缠住、在河湾里颠簸的浮木，不费吹灰之力地询问了席哈乌船坞、克拉维特尔船坞、一些只修不造的小船坞的船台、车辆厂的废铁堆存场、人造黄油厂散发腐臭味的椰子果堆栈以及凡我所知的在这类地方的所有阴暗角落。他一定死了。他对皇帝的轮船的下水典礼，对船只从下水起大都历时数十年的兴衰过程一点不感兴趣。我这里指的一度被称为船队的骄傲的“哥伦布”号的兴衰史，当然是航行美国的，但后来沉没了，也许是自行凿沉的，或者又被打捞起来，翻修一新，重新命名，也许已成了一堆废铁。它，“哥伦布”号，也许只是潜入了水中，仿照我的外祖父，至到今天，这艘四万吨的巨轮，连同它的餐厅、大理石体育馆、游戏池和按摩室，还在菲律宾海域或埃姆登港海底六千米深处游荡；所有的这些，可以在《韦尔》或《船舶年鉴》中读到——在我看来，第一艘或第二艘“哥伦布”号是因为船长不愿忍受某种与战争有关的耻辱而苟活下去而自己凿沉的。

我把木筏的故事给布鲁诺念了一段听，然后说出了我的疑问，请他客观的答复。“死得太妙了！”布鲁诺如痴如醉地说，并马上动手用线绳编织出了我那淹死的外祖父的形象。我放弃了去美国捞一份遗产的轻率念头，情不自禁地对他的回答感到满意。

我的朋友克勒普和维特拉来探望我。克勒普带来了一张唱片，两面都是金·奥利弗演唱的爵士乐，维特拉害羞地递给我一个拴在桃红色缎带上的巧克力鸡心。他们拙劣地学着我的习作中的场面做出各种丑态，我为了使他们高兴就像每逢探望日那样，显出一副心情愉快的面孔，甚至对于无耻的笑话也报以微笑。过了一会儿之后，我在克勒普开始他那套老生常谈，讲什么爵士乐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之前，抢先讲述了我的故事。即一九一三年

的，一个男人在别人开枪射击之前永远躲到一张再生不竭的木筏底下，甚至也没有找到他的尸体的事情。

我装出厌烦的样子随便地问他们。克勒普一听解开钮扣，复又扣上，失望地转动他那肥胖的脖子上的脑袋，做起游泳动作，好像他自己正待在木筏底下。他推说现在刚过中午，时间还太早，来不及考虑。摇摇头不予回答我的问题。维特拉翘起大腿，坐得笔直，小心翼翼地不使裤子的折缝变皱。他像身上那条细条纹裤一样，露出那种只有他和天堂里的天使才有的傲慢的古怪神情说：“我待在木筏上面会感到很惬意。但蚊子叮我真讨厌。而我待在木筏底下也很惬意。因为没有蚊子叮我真舒服。我思量着，假如不打算待在木筏上面让蚊子咬的话，生活在木筏底下也很好。”

维特拉停顿片刻同时打量着我，——这是他经过多次试验证明作用显著的一招，和往常，扬起天生就很高的眉毛要扮出一副猫头鹰的相貌时那样，用尖厉刺耳的声调像演戏似的说：“我设想，如果这个淹死的人，这个木筏底下的人，不是你的外祖父，也是你的舅公。他死去，是因为他觉得身为你的舅公，对你负有义务；如果他是你的外祖父，他就更加觉得对你负有义务；因为再没有比一个活着的外祖父更使你感到他是个累赘了的事了。所以，你是你舅公和你外祖父的谋害者，可是，你的外祖父就像所有真正的外祖父所爱干的那样，也要稍微惩罚你一下，不让你这个外孙心满意足地高傲地指着一具肿胀的淹死者尸体说出这样的话来：看哪，我淹死的外祖父多英雄。他们在他们追捕之下宁肯跳水，也不肯落进敌手。——你的外祖父把尸体隐藏起来，不留给人世和他的外孙。这样一来，后世的人和他的外孙就得一直替他担忧，为他伤脑筋。”接着，他从怜悯这一方忽而转向同情另一方，微微向前俯身，耍弄调解花招装出一副狡猾的面孔说：“美国！振作起来，奥斯卡！人家会因为你有人的目的和做人的使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命宣判你无罪，把你开释的。除了美国你还能上哪儿去呢？你可以在美国重新寻获自己失去的一切，甚而至于重新找到自己失踪的外祖父！”

比起我的朋友克勒普和护理员布鲁诺来，尽管维特拉的回答带有嘲讽挖苦的意味，而且让人伤心并留下持久的伤痕，但他的回答要肯定得多。克勒普满脸愁容，拒不回答那个男人到底是活是死；布鲁诺则仅仅因为他刚死，陛下的轮船“哥伦布”号就下水破浪前进了，说我的外祖父死得绝妙。愿上帝保佑保存外祖父们还有我能够赖以复元的假想目标与理想的维特拉所讲的美国，如果我厌倦了欧洲，想要停下我的鼓和笔的话。“为你的外祖父而工作下去吧，奥斯卡！继续写吧！为这个他如今富贵荣华，但已厌倦了活在这个世界上，正在自己的摩天大楼里玩火柴的，在美国布法罗做木材生意的科尔雅切克。”

克勒普和维特拉刚离开，布鲁诺便进来通风，把朋友们扰乱性的气味用强烈的气流统统赶出室外。然后，我再次拿起我的鼓，但不再击鼓，敲击出那种不是召来遮掩死尸的木筏的圆木，而是急速的、不稳定的节奏。自一九一四年八月起，每个人都得按这种节奏运动。因此，我只能对关于被我外祖父遗弃在欧洲痛哭哀悼的那一家人，到我出世为止的生活道路，简单地作一下叙述。

我的外祖母和她的女儿阿格内斯、文岑特·布朗斯基以及他的十七岁的儿子扬，当科尔雅切克消失在木筏底下的时候，都站在锯木厂码头上筏夫们的家属中间，悲痛地几乎要死去。稍靠边上一点，站着被人传到城里来讯问的约瑟夫的哥哥格雷戈尔·科尔雅切克。那个格雷戈尔一直只用相同的话来回答警察局：“我几乎认不出我的弟弟。我只知道他叫约瑟夫。我和他最后一次见面时，他才十或十二岁。他给我擦皮鞋，派他去买啤酒，如果母亲和我要喝啤酒的话。”

从格雷戈尔·科尔雅切克的回答中可以看出，我的外曾祖母是喝啤酒的，但这对警察局却没有用处。科尔雅切克家还有一个长子，反倒对我的外祖母安娜帮了大忙。格雷戈尔先在什切青、柏林，后在施奈德米尔混了几年，最后在但泽长期居住下来，在卡宁欣棱堡附近一家火药厂找到了工作。在诸如同假符兰卡结婚等等麻烦事全部了结或者搁置不论之后，一年以后他娶了我的外祖母，而她则决意跟定科尔雅切克家的人了。假使格雷戈尔不姓科尔雅切克，她可能不会同他结婚，至少不会这么快就成亲。

由于格雷戈尔在火药厂工作，所以他无论在和平时期还是在频繁战争时期，都不用去当兵。他们三人仍旧住在曾是那个纵火犯避难所的那套一间半的房子里。这个科尔雅切克显然不必再同前一个那样老老实实过日子。因此，我的外祖母婚后才一年不得不在特罗伊尔一所公寓租下一片刚出空的地窖小铺，卖大头针等杂货和蔬菜，赚钱贴补家用，因为格雷戈尔虽说在火药厂挣钱不少，带回家的钱不够日常必需的开支因为都花在喝酒上。格雷戈尔可和我的外祖父不一样，我的外祖父约瑟夫只是偶尔喝上一杯烧酒，他是一个嗜酒如命的人，也许是受我的曾外祖母遗传。格雷戈尔天性忧郁并非借酒浇愁，很少露出高兴的样子，不过，他也并不是由于开怀而狂饮而高兴。因为他是一个对任何事情都要追根问底的人，所以，杯中的酒，他当然也要到瓶底朝天方才罢休。在格雷戈尔·科尔雅切克的一生当中，他没有喝剩过半杯杜松子酒。

我妈妈十五岁时，是个非常能干，除去干家务，还在店里帮忙的非常丰满的姑娘。她虽不老练，想象力极强，把食品印花贴在分类账本上，星期六给人送货，写催账信，提醒赊账的顾客前来还钱。非常遗憾，这些信我连一封也没有保存下来。在这里，如果能够从一个格雷戈尔·科尔雅切克根本没有尽到做继父的责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任的半孤儿的信里，摘引几句半带少女特征、半是稚气的叹苦经的话，那一定很美好。我外祖母和她女儿的现款盒是用两个马口铁盘子合成的，里面一般是银角子少于铜子。她们两人总是怕被那个始终口渴的火药厂工人忧郁的目光发现而煞费苦心把这个现款盒藏起来。到了一九一七年，格雷戈尔·科尔雅切克患流行性感冒去世。杂货铺的赚头从此以后才有所增加，不过也还是非常有限；因为在一九一七年，没有些什么货色可卖。

火药厂工人去世后，我妈妈因为怕鬼，不愿住进去，那套一间半的房子便空在那里，后来，扬·布朗斯基迁去居住。当时我妈妈的这位表兄他离开了比绍和他父亲文岑特，在卡特豪斯中学取得成绩优良的毕业证书，又圆满完成了在那个县城邮局的见习时期，此时到但泽邮政总局来干中级管理人员的工作却只有二十岁左右。除去箱子外，扬还带着他的洋洋大观的集邮册来到他姑姑家里。他对于邮局不仅怀有职业上的兴趣，而且还小心翼翼地维护着一种私人关系，因为他从幼年起就开始集邮。这个体质羸弱、走路有点驼背的年轻人，凭一张鹅蛋脸，相貌漂亮，也许太甜了一点，一双碧蓝的眼睛，足以使当时年方十七的我母亲爱上了他。扬已经三次应召去做体格检查，每次检查都缓服兵役，因他身体太差；因为在那个时候，凡是多少能够挺直的男子，都被送到凡尔登去，让他们在法国的土地上永远地离开这个世界，这已经清楚地说明了扬·布朗斯基的体格状况。

按理来说他们两人相互调情，应当是从脑袋贴着脑袋一起看集邮册，检查特别珍贵的邮票四边孔眼完整与否时开始的。但是，实际上，是扬第四次被叫去作体格检查的那天开始或者说爆发的。我妈妈本来就有事要进城，便陪同他到军区司令部去，站在有民军站岗的岗亭旁边等他。她和扬都认为他可以借那里含铁和铅的空气，治疗一下自己发育不健全的胸腔。所以这一回扬是非去法国不可了，我妈妈不断地数着民军的钮扣，每遍的结果都

不一样。所有制服的扣子都是按那种尺寸钉的，我可以想象，无论你最后数到哪一颗，不是意味着凡尔登，就是无数哈特曼斯魏勒科普夫中的一座，再者就是意味着：索姆河或玛恩河中的某一条小河。

这个作第四次体验的小伙子刚过一个小时，便蹒跚着挤出了军区司令部大门，下了台阶，扑到阿格内斯——我的妈妈身上，抱住她的脖子，贴在她耳朵上，用当时的流行话小声说：“缓役一年他们不要我的脖子和屁股！”我母亲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这么幸福地拥抱扬·布朗斯基。

我不知道这一对年轻人在大战期间热恋的细节，我妈妈好打扮，爱漂亮，讲究穿戴，喜欢昂贵物品。扬为满足她的奢求，把自己收集的一部分邮票卖掉了。据说他后来遗失了当时写过一本日记，看来我的外祖母容忍了超出了表亲之间的关系，这两个青年之间的关系因为扬·布朗斯基一直在特罗伊尔那套一间半的房子里住到战争结束以后，直到一位姓马策拉特的先生的存在已得到承认的时候，扬才搬出那套房子。我妈妈肯定是在一九一八年夏天在奥利瓦附近银锤陆军医院当助理护士时认识那位先生的，莱茵兰的阿尔弗雷德·马策拉特的大腿被子弹打穿，正在医院养伤，他由于那种莱茵兰人的乐天性格，不久就成了包括阿格内斯在内的全体女护士的宠儿。他刚把伤养好一些，就由这个或那个护士搀扶着在过道里一瘸一拐地走动，还到厨房里给同戴着与她那张小圆脸非常协调戴的护士帽的护士阿格内斯帮忙，因为他是一个懂得把感情转化为浓汤的诀窍的富有热情的厨师。

阿尔弗雷德·马策拉特腿伤痊愈后便留在但泽，并且很快找到了工作。如今成为战前他在莱茵兰纸张加工业一家较大的公司驻但泽的代理人。战争已接近尾声。人们含糊其辞地签订了替日后的战争制造了新的起因的和约，魏克塞尔河入海口周围地区被宣布为由国际联盟管辖的自由邦。这个地区大致从海岬上的福格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尔桑起，顺诺加特河到皮埃克尔，再沿魏克塞尔河到查特考，向左到舍恩弗利斯垂直转弯，随后绕萨斯科申森林抵奥托明湖形成一个凸出部，把马特恩、拉姆考和我外祖母的比绍划在界外。这条界线到克莱茵—卡茨附近的波罗的海结束。波兰在原来的市区内得到一个自由港设在黑维利乌斯广场的波兰邮局和包括军火库在内的韦斯特普拉特、铁路管理局。

这个自由邦的邮票，上印着汉萨同盟红金色的纹章徽记；波兰邮票则是些丧气的画着卡西米尔和巴托里的史实的紫色图案。

扬·布朗斯基入了波兰籍，一时心血来潮地改换了工作机构，进了波兰邮政局。他之所以选择波兰国籍，许多人认为，在于我母亲对他的不忠。马尔察莱克·毕尔苏德斯基在一九二〇年在华沙城下击退红军。到了像文岑特·布朗斯基这样的人嘴里，魏克塞尔河畔的这次奇迹，都说是因为有了圣母玛利亚的保佑，军事专家们则不是称颂于西考尔斯基将军，便是归功魏刚将军。就是在这个波兰年里我母亲同德意志帝国的公民马策拉特订了婚。我外祖母安娜同扬一样反对他们订婚。她自己搬回比绍波兰境内她哥哥文岑特那里，像未嫁给科尔雅切克以前那样，接管了庄院、萝卜地和土豆地，让她那个日益着魔于神恩的哥哥去同圣母兼波兰女王打交道和对话，把这段时期内生意略有起色的特罗伊尔地窖小铺留给她的女儿去经营。秋天里，她自己穿着四条裙子，蹲在土豆秧火堆后面，远远地望着一直被电线杆分割成条块状的地平线，倒也悠然自得。

扬·布朗斯基，找到了他的黑德维希并同她结婚以后同我妈妈之间言归于好。黑德维希是卡舒贝人，住在城里，但在拉姆考还有农田。他们在伏依克咖啡馆的一次舞会上，偶然相遇，我妈妈向马策拉特介绍了扬。他们性格各异，却又一见如故，非常投机的两位先生对我妈妈的感情是一致的，尽管马策拉特用莱茵腔直言不讳地大声说，扬转到波兰邮局去工作的想法荒唐。马策拉

特同骨骼大、个子高的黑德维希做伴，扬和我妈妈跳舞。周围的人见了目光像母牛般难以猜测的黑德维希都一直以为我妈妈是个孕妇。大家还经常你请我，我邀他，混跳一场舞未结束，念头已转到下一场，跳波尔卡舞时捷足先登，跳英国华尔兹时落了后，终于在跳查尔斯顿舞时自信心十足，跳慢狐步舞时起了近似宗教信仰的欲念。一九二三年，裱糊一间卧室几乎等于不花钱，和一盒火柴的价钱差不多。在这一年，由扬和姓米伦的一位殖民地商品店老板证婚，阿尔弗雷德·马策拉特娶了我母亲，那位米伦之所以值得一提，只是因为我妈妈和马策拉特在采用地产抵押马克的当口，盘下了他的开设在朗富尔郊区，因顾客赊欠而破产的殖民地商品店。我妈妈在经营特罗伊尔的地窖小铺时，学会了同各种各样赊账顾客周旋的巧妙手腕。此外，她头脑灵活，能言善辩，巧舌如簧，天生是个做生意的料子。所以，短时间内她又把这凋敝的买卖做得兴隆起来。纸张市场在当时也是供过于求。连马策拉特也辞掉了代理人的职务，到店里来帮忙。

能够取长补短，相得益彰的夫妇两人，可谓妙极。我妈妈有坐在柜台后面应酬顾客的窍门，马策拉特则有同零售商、批发商周旋的本领。此外，马策拉特喜欢穿上厨娘的围裙到厨房去干包括洗涤在内的活，恰好减轻了不会烹调的我妈妈的负担。

与店铺相连的住房盖得非常糟而且狭小，但是同特罗伊尔的居住条件相比，完全够小资产阶级气派的了。因此，我妈妈至少在婚后头几年，在拉贝斯路住得挺幸福美满。

虽然有一间宽敞的厨房，但除去往往堆放着成包的贝西尔洗衣粉、拐着弯的长过道外，超过一半的地方，也堆着货物，如罐头、面粉口袋、燕麦片小包等。在底层起居室是最好的一间，有两扇窗，可以看到夏天铺波罗的海贝壳的小花园和大街。葡萄红的糊墙纸，近于紫色的长沙发套，一张四个圆角的、可以拉开的餐桌，四把皮面黑色椅子，一张放烟灰缸的小圆桌，地上铺着经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常要挪动的蓝色地毯。一个黑、金两色的钟悬挂在两扇窗户之间。紫色沙发榻旁是一架先是租借的，后来慢慢偿付，买了下来的黑色钢琴，还有一张下面铺一块黄白色的长毛兽皮的旋转琴凳。钢琴的对面是餐具柜。黑色的餐具柜围以黑色蛋形纹饰，磨光玻璃拉门，下面的门里锁着餐具和桌布，门上有深黑色的果实浮雕，黑色的柜腿呈爪状，黑色的雕花柜顶上有一次中彩得来的绿色奖杯和盛假水果的水晶碗。一台浅咖啡色的收音机填补了这两件物品中间的空档，这应归功于我妈妈懂得生财之道，做生意精明能干。

卧室可俯视四层楼公寓的院子，是黄色的。那张结婚喜床的华盖是天蓝色的。床头镶在玻璃镜框里一幅呈肉色的正在忏悔的从良妓女的画。沐浴在天蓝色的光线下。她躺在岩洞里，眼望右上方连声叹息。她胸前的手指多得让人看了总以为不止十个，于是禁不住一遍又一遍地去数。喜床对面是柜门镶有镜子白漆衣柜，衣柜左边是梳妆台，右边是大理石面小屉柜，一盏卧室用灯从天花板上吊下。它并非用缎子罩蒙着，而是挂在两根黄铜吊杆上一个浅玫瑰色的圆形瓷罩下，同起居室里的不同。两个灯泡突出在外，光线非常强。

今天上午，我一直在敲鼓，向我的鼓提出各种问题，而且还想知道，我家卧室里的灯泡是四十瓦还是六十瓦。我并不是第一次对自己和我的鼓提出这个非同小可的问题。因为我出入过许多住宅，开过关过数以千计的电灯，所以首先必须把它们忘得干干净净，必须不带任何杂念地敲着我的鼓，穿过这片规格统一的照明体的森林，才能用几个小时重新回忆起拉贝斯路我家卧室的两只灯泡。

临产的阵痛袭来时，我妈妈还在店铺里，把糖盛到一磅和半磅装的蓝色口袋里，结果耽误了时间，来不及送她进妇产医院，我便将要在自己家里出生了。于是，从赫尔塔街请来一位上了年

岁、几乎不提着小箱子干她这行当的助产士给我妈妈接生。

两只六十瓦灯泡放射出来了我最初见到的这个世界的光。因此，时至今日《圣经》上的那句话“要有光，就有了光”，我还觉得分娩过程像奥斯拉姆公司最成功的广告用语。直到正常的会阴破裂为止都非常顺利。我毫不费力地以正常的位置从头部朝下的位置中解放出来，无论对母亲们、胎儿们以及助产士们都有利，所以没人反对。

我属于那种听力超人的婴儿，他们的智力在娘胎里已经完全发育，仅仅有待于日后证实。我在娘胎里只注意我自己在羊水里玩耍，只听到我自己的动静，不受任何外来的干扰。所以我一出生，就以批判的态度仔细听我的父母亲在电灯泡下讲他们出自本能的意见。这是一对黏黏糊糊往下搭拉很尖的小耳朵，但不管怎样还是讨人喜欢的。然而，他们讲的每句话我都听得清清楚楚，这些话对我来说至为重要说出了他们最初的印象，我的小脑子，同我的耳朵一样灵。我把听到的一切细细考虑了一通，然后决定干哪些事情，以及把哪些事情坚决弃之不顾。

“这个男孩，”那位自以为是没有一点根据地我的父亲的马策拉特先生说，“长大后将继承这爿店铺。现在我们终于明白为什么要辛辛苦苦工作了。”

妈妈想的是她儿子的装备，而不是店铺：“嘿，尽管有那么几次，我讲过可能生个女儿，但我早知道是个儿子。”

所以，我过早地懂得了女人的逻辑，然后，又听她说：“等小奥斯卡到了三岁，就给他买个铁皮鼓。”

我观察并倾听着一只误入室内的飞蛾，久久地权衡比较我母亲和父亲的诺言。这只毛状飞蛾中等大小，正在追逐那两只六十瓦的灯泡，投下了比它张开的两翅大很多倍的阴影，一颤一颤地移动着，遮住了房间和室内的家具。令我难忘的是飞蛾同灯泡之间对话时发出的噪音而不是忽明忽暗的投影游戏。飞蛾仿佛它要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快些把自己知道的事情统统从肚里倒出来，仿佛飞蛾与灯泡之间的这场对话是飞蛾最后的忏悔，仿佛它今后不会再有时间同光源交谈，喋喋不休，而根据灯泡赦罪的方式来看，是禁止它再放荡和作孽了。

今天，我可以言简意赅地讲，飞蛾在击鼓。我听到过兔子、狐狸和睡鼠击鼓。青蛙们的击鼓声能召来一场暴风骤雨。别人说啄木鸟击鼓把虫子从洞里敲出来。人则敲铁锅、盘子、小鼓和定音鼓。我们说，鼓形弹仓左轮手枪像擂鼓似的连续轰击，人们擂鼓起床、集合、进入坟墓。这是鼓手和鼓手长。还有为弦乐队和打击乐器谱写协奏曲的作曲家的行当。我甚至联想起长和短的归营号，可能在最黑暗的非洲的黑人中间，在美洲的还没有忘却非洲的黑人中间，会有这样一些人，能够相同地或类似地以他们天赋的节奏感模仿我的飞蛾或者比东欧的飞蛾更大，也更花哨非洲的飞蛾，既一本正经又放荡不羁地擂鼓；但我要遵循我的东欧的标准，我也要向我出世时飞来的那只棕色的中等大小的粉蛾讨教，并拜他为师。

太阳在九月初位处室女宫。一场夏末的暴风雨在夜间由远而近，阵阵狂风刮得箱笼家具挪动了位置。天王星使我富于奇想，水星使我具有批判精神，火星要我相信自己的抱负与雄心，金星让我相信自己有小小的福分。在命宫里升起天秤星，它决定我好夸张天性敏感，海王星进入代表中年命运的第十宫将我置于介乎坚信奇迹与受骗上当之间。土星位居第三宫，与木星冲，我的出身问题由此而成为疑案。但是，是谁派来的，允许它同那好像中学校长大发雷霆的夏末雷雨声一道，使我心中升起了对母亲许诺的铁皮鼓与日剧增的浓厚的兴趣的飞蛾，使我越来越急于想得到这一件乐器呢？

我表面上装成一个肉色鲜嫩大哭大叫的婴儿，内心里则下定决心，拒绝我父亲对于管理殖民地商品店有关的一切的建议，同

时也从善意出发考验我妈妈到了我三岁生日时，她的愿望是否将被实现。

除去上述各种有关我未来的推测以外，我了解到，妈妈和父亲都不具备这样能够了解我反对什么和赞成什么，从而尽可能地尊重我的决定的器官。我躺在电灯泡下，既没有人理解又孤独。他猜测事情将这样继续下去，直到六七十年以后，一次一劳永逸的短路使全部的光源断了电。所以，我开始在电灯泡下过这种生活之前，就已经失掉了对这种生活的乐趣；那时，只有那面遥遥在望的铁皮鼓才使我没有更强烈地表达出重返娘胎头朝下的位置的愿望。而且，我的脐带已经被助产士剪断了；没有办法了。

照相簿

我守护着一件经过了糟糕的、只是由日历上的日子组成的漫长岁月，有时藏起来，有时取出来；在我乘着货运列车旅行期间珍藏在胸口睡觉时，枕着他的宝贝：一本照相簿。

这是一座使一切往事变得一目了然的露天家庭坟墓，我如果没有它，真不知该如何是好。这本总共一百二十页的照相簿的每一页上下左右方方正正地贴着四张或六张，有时只有两张照片，照片的地位安排得很精细，有的对称，有的不对称。封面越是年深月久，气味越大。有的照片由于有时我的照相簿还受风吹雨淋可怜巴巴的脱落下来，于是，我只得寻找安静的时候和机会，用胶水将几乎遗失的照片重新粘回原处。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部长篇小说或别的什么，能具有一本照相簿的那种叙事诗般的宽广度。作为勤奋的业余爱好者的我们亲爱的上帝，每个星期日，都居高临下地把我们缩得非常渺小拍摄下来，也不管曝光好坏，把照片全部贴到他的照相簿上去。这位上帝也许可以引领我漫游这本，不让我由于饶有兴味而在某一处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不适当地逗留过久，也不鼓励我偏爱迷宫一般曲折离奇的事情的照相簿；可是，我很希望能给这些照片提供真实的原型！在这本照相簿上可以看到不同的制服，看到发型与时装的更换，看到扬越来越萎靡不振，我的妈妈越来越胖，还可以看到一些我根本不认识的人，甚至可以猜出照片谁拍摄的，而且看到摄影术越来越没水平，从一九〇〇年左右的艺术摄影退化成为我们当代的实用照相。以我的外祖父科尔雅切克的那座纪念碑和我的朋友克勒普的护照照片为例。只需把那张染成棕色的我的外祖父肖像照片同克勒普那张大喊大叫的、光滑的、让人加盖公章的护照照片并排放在一起，我就能清楚地看到，摄影术领域里的进步已经把我们带到了什么地方。仅仅是与快速摄影术有关的所有设备就已经说明了问题。因为我是这本照相簿的所有者，在这件事上，我应该更多地自责而非责备克勒普，我有义务保持照片的摄影水平。假如有朝一日地狱也繁荣发达了，那么，精选出来的折磨办法之一可能是：把赤裸裸的灵魂同他活着时拍的照片配上镜框一起关在一个房间里。啊，夹在快照、特写快照和护照照片之间的人哪，闪光灯下的人哪，笔直地站在比萨斜塔前的人哪，坐在摄影房里让人照亮右耳朵才配上护照的人哪！快些添上一点宗教激情吧！如果没有激情的话，我会说：这样的地狱还可以忍受，因为最糟糕的照片并不是拍摄的而是梦见的，因为即使拍摄也无法显影。

我和克勒普在吃面条时认识，交了朋友，并且发展了友谊。我们住在于利希街的最初那段日子里，常去拍照。我当时特别伤心，只好去计划几个旅行，所以想申请护照。我想去罗马、那不勒斯，还有巴黎，但我当时的钱不够去作这样一次像样的旅行。所以，我特别高兴，缺少现钱，因为再没有别的事情能比在没钱的情况下出外旅行更使人伤心的了。但是，在那段时间里，我们两个还有足够的钱去看电影，于是，克勒普和我，有时根据克勒普的口味去看美国西部片，有时按照我的需要去看这样一类影

片，例如玛丽亚·谢尔扮演痛哭流涕女护士，博尔舍扮演主任医师，他在完成一次难度特别大的手术之后，打开阳台门，奏贝多芬的奏鸣曲给她听，向她表白自己的责任心。影片一般只有两个小时，这使我们两个非常头疼。我们经常散场以后又到售票处去买同一影片的票子想再看一遍。但是，我们一离开放映厅，看见卖当天票的售票处前排着或长或短的队伍，就丧失了勇气。我们很害羞，不但怕见女售票员，还怕见那些素未谋面的、但却厚着脸皮从头到脚打量我们的外貌的人，便悄悄地走了。

就这样，我们几乎每看完一场电影总要到阿道夫伯爵广场附近的早已认识我们了的一片照相馆去，让人给我们拍摄护照用的照片。一进门，他们便客气地堆着笑脸尊敬地请我们坐下；摄影房里的顾客刚出来，一位很可爱的小姐，把我们一前一后地推了进去，先把我，后把克勒普，拉拉扯扯地摆布端正，吩咐我们看着一个固定的点，直到听到同闪光一起响的铃声，直到见了闪光，我们才知道早已连续照了六次。

刚照完，咧开的嘴角还有点合不上的当儿，这位连衣着都很可爱的小姐就把我们按到舒适的藤椅上，请我们耐心等待五分钟。我们终于有所期待了，甘心情愿地等着。那就是我们的护照用相片，我们是多么好奇地想看个究竟啊！短短七分钟之后我们付了钱。那位除可爱以外别无形容的小姐递给我们两个纸口袋。

克勒普稍稍鼓出的眼睛里流露出得意洋洋的神情！因为没有人愿意在光天化日之下，站在嘈杂喧闹、尘土飞扬的大街上看自己的护照相片，那样一定会成了绊脚石，妨碍忙碌的行人。我们一拿到口袋，便有理由去就近的啤酒馆了。就像我们是那片照相馆的常客一样，我们也是弗里德里希大街上那家小酒店的老主顾。我们要了啤酒、血肠加洋葱和黑面包。我们在酒菜还没端上来，已经把略微有点潮湿的照片拿了出来，把它们摆成一圈放在木头圆桌面上。很快啤酒和血肠送来了。我们一边审视自己努力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半天才摆出来的面部表情，一边吃喝。

我们一直在身上装着上次看电影那天拍摄的照片。所以，我们就有可能进行比较；我们也就可以因为有机会进行比较而再要第二杯、第三杯、第四杯啤酒，这样一来，像莱茵兰人所说的，我们的情绪就上来了。

然而，绝对不可臆断，因为真正的悲伤本身就是不具体的，一个悲伤的人不可能借助他本人的一张护照照片使他自己的悲伤变得不具体，并且正好由于我们的悲伤不具体到了近乎随意的地步，所以我的悲伤和克勒普的悲伤就是找不到任何缘由的，才证明它强烈得不需要任何理由来引发。假使现在有某种途径可以接近我们的悲伤，那么，只有通过照片，因为我们在一次连拍六张的快照上，所看到的自己虽然并不清晰，但重要的是，照片上的自己是被动的、被中立化了的。我们两个人可以随心所欲地一边喝啤酒，大嚼香肠同自己打交道，增加情绪和做游戏。我们用剪刀把折叠起来的照片剪成碎片；我们为了这种用途，身上经常带着剪刀。我们把剪碎的新老照片碎片重新组合，把鼻子放在耳朵的位置上，把右耳朵放在嘴巴的部位，使我们变成独眼龙或三只眼，还把下巴换成额头让它说话或沉默。我们不仅用各自的头像作这种剪辑，而且还互换器官地拼接。就这样，我们创造了新的正如我们所希望的更幸福的创造物。有时，我们互赠一帧照片以作纪念。

我和克勒普每周至少去啤酒馆喝一回，每次都要习惯性的送给我们被叫作鲁迪的酒馆侍者一张照片，了解我们的苦恼的鲁迪是本来该有十二个孩子另外还收养八个的那种类型的人。他已经有了十二张我们的侧面照和比之更多的正面小照。即使这样，每当我们经过半天的商量，好不容易才挑出一张照片递给他时，他总满口称谢，露出一副深表同情的面孔。至于站酒柜的女招待和端香烟盘的红头发姑娘，我从来不把照片送给她们，因为只会滥

用照片。心广体胖的克勒普则不然，在女人面前总是没完没了，爱同她们攀谈，而且笨到了把心里话统统掏给她们的地步。他有一天，瞒着我送给了卖香烟的姑娘一张照片，因为他想把自己的那张照片要回来，所以他同这个年轻莽撞的姑娘订了婚，后来又和她结了婚。

我的话讲得太多了，我把日后才发生的事情提前讲了出来，而且有关我的照相簿的最后一页，本来就不值得多谈，这些傻头傻脑的快照，要谈也只是拿它们作为一种用以说明照相簿第一页上我外祖父科尔雅切克的肖像照是那么有艺术性、那么伟大和无与伦比，直到今天还使我产生这种感觉的对照。

照片上的他又矮又宽，但不是纵火犯，而是志愿消防队员符兰卡站在一张精致的小桌子旁。他没有留小胡子。但是，消防队制服紧绷在身上，胸前的营救奖章和使小桌子变成祭坛的消防队防护帽，几乎可以代替纵火犯的小胡子。他严肃地注视着，了解两个世纪交替的岁月里的所有苦恼啊。看来在第二帝国时代他那种尽管悲观但却高傲的目光是受人喜爱的和流行的，因为格雷戈尔·科尔雅切克这个在照片上倒是非常清醒的，醉醺醺的火药厂工人也是这样的目光，文岑特·布朗斯基手执一支献祭的蜡烛，神秘得很，他的相片是在琴斯托霍瓦照的。瘦弱多病的扬·布朗斯基少年时的照片，是早期摄影术记录下来的一个刻意显得忧郁伤感的男性。

即使我的外祖母安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拍摄的照片上，一点也没有暗示出她那四条套穿着的却又守口如瓶的裙子底下有着可以提供避难所的大空间，而是抿着嘴做作地傻笑，所以说，那个时代的妇女中，能摆出与她们的个性相应的神态姿势来的人几乎没有几个。

在战争年代里她仍然微笑对着蒙在黑布下面、弹着指头、一边跳着舞的摄影师。我有一张两枚邮票那么大，贴在硬纸片上的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这个时期的照片，上面有二十三个护士，其中包括在银锤陆军医院当助理护士的我的妈妈，怯生生地在一个像根支柱似的军医四周挤着。还有一张照片，照的是一次陆军医院化装舞会的场面，即将痊愈的伤兵也参加了，护士们显得比较轻松自如，不那么拘谨腼腆。妈妈大胆地眨眼睛，尽管她身上饰有天使的翅膀，头发上有金银丝条，她还是嘴巴做出接吻的姿势想说：天使也有欲念的。跑在她面前的马策拉特扮成一个厨师，戴一顶僵硬的厨师帽子，挥舞着长把勺子，这大概是他特别愿意天天穿的服装：与此相反，当他身穿制服直视前方、佩戴着二级铁十字勋章时，目光同科尔雅切克兄弟和布朗斯基父子一样故意显得悲观。他在每张的相片上，都显得比妇女们更强。

人们在战后都换了一副面孔。妇女在男人们露出复员后轻松的目光后，懂得了在照片上占据特殊地位，即使她们在微笑时，也不想去否认，她们有严肃地凝视前方的理由，作为底色的是她们已经领教到的痛苦。二十年代的妇女的悒郁，和她们的脸太配了。她们，不论坐着、站着还是半躺着，蛾眉月般的一缕黑发贴在额旁，已经成功地在圣母和娼妓之间结起了一条和解修好的纽带。

我妈妈二十三岁时怀孕前不久拍摄的照片，让人看到的是一个微斜着皮肉结实的脖子上那颗平稳线条的圆脑袋，可是目光却直视看照片的人，肉感的轮廓被上面提到过的悒郁的微笑和一双眼睛冲淡了的年轻妇女。这双说它是蓝色，倒不如说是灰色的眼睛，已经惯于像观察诸如咖啡杯和香烟嘴之类不变的物体那样去观察周围人们的灵魂以及她自己的灵魂。我用“深情的”这个词作为我妈妈的目光的形容词显然是不能表达清楚的。

那个时期的合影，除了易于评论，富有启发作用之外没有多大意思。结婚礼服在签订拉巴洛条约的年代里，竟这般美丽，如此有婚礼气派，真令人惊讶。马策拉特在结婚照上，还系着硬

领。他的外表看来挺好，时髦，几乎可以说有知识分子风度。他右脚前伸，可能想模仿当时的电影明星哈里·利特克。我妈妈的婚礼服是一条白色百褶裙，那个时候的服装尺寸都短。刚刚过膝，露出了匀称的小腿，穿一双有扣白色鞋的小脚跳起舞来十分轻盈。出现在另外几张照片上的是参加婚礼的全体宾客。我的外祖母安娜和她那个得到神的恩宠的哥哥文岑特，在穿着城里人服装、摆出城里人姿势的来宾当中，始终惹人注目的是他们土得掉渣却又假装正经，非常自卑却把信心灌输给别人。扬·布朗斯基同他的姑妈安娜和献身给天国圣母的父亲一样，是在同一块土豆地里长大的，但他和我母亲一样，也善于用波兰邮政局秘书的讲究礼服来掩盖自己卡舒贝乡下佬的出身。虽然他在照片上那些健康的人们中间显得瘦小而虚弱，而且他是在照片的角上，然而他那双使他的面孔像女性一样匀称的、与众不同的眼睛，却总是使他成为照片的灵魂人物。

我已经观看良久在举行婚礼后不久拍摄的这一张合影了。我只得在这无光泽的棕色四边形前拿起我的鼓和鼓棒，试着在我的上漆的铁皮上重现那硬纸片上尚可辨认的三星座。

这张合影的拍摄场地是扬·布朗斯基的寓所。因为照片上的背景是阳光照耀下一半爬满了扁豆藤的阳台，这种阳台只有波兰人聚居区的住宅才有。它坐落在波兰大学生宿舍附近的陆军操场一侧的马格德堡街拐角上。妈妈坐着，马策拉特和扬·布朗斯基站着。有一段时间，我傻得用一个想必是布鲁诺替我买来的学生圆规以及一把直尺和一块三角板，想要测量出这罗马三执政的位置。先画出一个不等边三角形作为脖子的倾斜角，再进行平行移位，硬性得出三个全等三角形，又画三个圆，意义重大的是，它们在外面的扁豆藤的绿叶丛中相交，产生我正在寻找的一个信仰点，渴望点，要得到一个支撑点，一个出发点，而不是一个立足点。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这种业余爱好者的测量自然，除了在这张珍贵的照片上的几个最重要的地方，被我用圆规尖扎出了几个小洞外，不会弄出什么结果来，虽然是一个小小的洞，但却起了扰乱作用。在这张照片上有什么特殊的東西呢？是什么让我到这个四边形上去寻找，如果可能的话，甚至真能找出数学关系以及宇宙关系来呢？三个人：一个烫过黑发的坐着的女人，两个站着男人，马策拉特是鬈曲的金发，扬的栗色头发是平平地往后梳着的。三个人都微笑着：马策拉特笑得比扬·布朗斯基更灿烂，两人都露出了上排门牙，他们两个的微笑加在一起要比我妈妈只在嘴角露出一丝笑痕，眼睛里则毫无笑意的笑强五倍。马策拉特的左手垂在我妈妈的右肩上；扬则把右手轻轻地放在椅子背上。她的膝盖向左，髋部以下的其余部位都往前冲，膝上放着一个本子。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以为这是布朗斯基的一本集邮册，后来又以为是一本时装杂志，最后，我认定这是一本收集香烟盒里著名电影明星照片的册子。在我妈妈的双手好像恰好要去翻它的一瞬间，底片曝光，照片拍成。看来这三个人都因互相祝贺避免了意想不到的事情而感到幸福，这样一类事情只有当三人团中的某一个伙伴需要过保险的私生活，或者从一开始就偷偷摸摸时才有可能发生。他们三人息息相关，但还是依赖于第四个人，即扬的妻子，黑德维希·布朗斯基。她娘家姓莱姆克，当时正怀着可能日后出世的斯特凡。他们有赖于她的只是让她拿着照相机，借助摄影工具对准他们三个以及这三人团的幸福把这三重幸福固定下来。我把从照相簿上撕下的另外几张四边形，贴到这张照片旁。这些画面上的妈妈，或者是同马策拉特在一起，或者是同扬·布朗斯基在一起。这些照片中间没有一张能像那帧阳台照片那样清清楚楚地让人看到那种不可变更的事实，那种最后的可行的解决方法。其中一张，照的是扬和妈妈，它散发着悲剧、淘金狂和失常，失常变成厌烦，失常的厌烦的气味。还有一张，马策拉特待在妈妈身边：

正下着周末夫妻生活前的毛毛雨，饭前挑刺儿发牢骚，维也纳煎肉排滋滋有声，饭后连打几个呵欠，上床前开个玩笑或者把纳税账目记到墙上，使得夫妻生活有了一个精神背景。我总觉得这些镜头虽然无聊，但比往后几年有伤风化的快照要好。妈妈以欢乐谷附近的奥利瓦森林为背景躺在扬·布朗斯基的怀里。妈妈的衣裳底下放着扬的一只手。这种卑俗举动只能证明：从跟马策拉特结婚的第一天起就通奸的这不幸的一对的激情已经到了狂躁的地步，而马策拉特就是在这里给这一对人充当麻木不仁的摄影师。那张阳台照片上那种不动声色的表情，和还懂得应当放谨慎些的姿势已经荡然无存。这种表情和姿势只有在别的一些场合，例如在霍伊布德海滨浴场沙滩上那一张，也就是当两个男人同时站在妈妈身后或身边，或同时在她脚下躺着时，才能让人看到。

这里还有一张显示出我幼年时那三个最重要的人物，他们构成了一个三角形的照片。它虽然不像那张阳台照片上那么集中，但仍然播送出同样的剑拔弩张的和平，这种和平条约只能在三个人之间才能缔结乃至签署的相同信息。读者可以破口大骂剧院里受人欢迎的；舞台上只有两个人，他们不是没完没了的讨论，就是暗恋着第三者，此外就做不出什么戏来了的三角主题戏。可是，他们三人在我的照片上，在一起玩施卡特牌。这就是说看着照相机，他们各自手里捏着一把牌，展开呈扇形，正要叫牌，但都没看自己手里的王牌。扬把手平放在一堆铜板旁边，翘起食指；马策拉特用指甲掐桌布；妈妈开了一个小小的、我认为是成功的玩笑：她抽出一张牌给照相机的镜头看，而不是给她的两个牌友看，只用亮出了一张红心皇后的一个手势，就轻松地变出了一个偏偏不算令人讨厌的象征来，因为人们都愿对红心皇后起誓。

对于妈妈以及那两个男人来说的施卡特牌戏，不仅是最合适的游戏，而且是他们的避难所，和避风港，每当生活想要引诱他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们以某种搭配构成两人生存，玩两人玩的六十六点或下连珠棋这类愚蠢游戏时，他们就躲到那里去。

关于这三个人把我弄到这个世界上来的就谈到这里吧！在谈我自己之前，先要对妈妈的女友格蕾欣·舍夫勒提几笔，还有她的面包师丈夫，亚历山大·舍夫勒。他，秃顶，短腿，坐在椅子上从来够不着地毯的她，露出一副一多半镶着金牙的马牙哈哈大笑。她身穿自己编结的衣裳，花样没完没了翻新。后来，我的照相簿里又加上了舍夫勒夫妇：在“力量来自欢乐”的游艇“威廉·古斯特洛夫”号的救生艇前或躺椅上，在东普鲁士航运公司的“坦能贝格”号的散步甲板上的照片。每年去旅游几乎成了他们的习惯，从皮拉乌、瑞典、亚速尔群岛和意大利把完好无损的纪念品带回小锤路他们的家里。到了家，女的给枕头套加耗子牙齿花边，男的烤小圆面包。亚历山大·舍夫勒总会在不说话时用舌尖舔湿他的小嘴唇，而住在我家斜对面的马策拉特的朋友蔬菜商格雷夫，说这是不体面的庸人习惯厌烦他。

格雷夫不像是个已结婚的有妇之夫，倒颇像是个童子军指导。有一张他的照片：肩宽，强壮，健康，短裤制服，童子军绳，童子军帽。我不认识他身边站着的一个大约十三岁一样的装束金发少年，眼睛大得有点夸张，格雷夫左手疼爱地按住他的肩膀，让他紧挨着自己，但日后通过认识格雷夫的妻子莉娜认识了格雷夫后他有所了解。

我迷失了方向，在“力量来自欢乐”旅游者的快照与童子军温柔性爱的物证之间。我立刻一连翻过几页，翻到了我的第一张被摄下俊美的婴孩的肖像那一页。照片是一九三五年圣灵降临节我才八个月时拍摄的。比斯特凡·布朗斯基小两个月。接下来的一页便是他同我的那张尺寸一样，但相貌丑陋，不是笔墨所能形容的照片。一张专为家庭用的四边切成波浪形的明信片，美观大方，背面有横格可写地址，印数较大，我的照片贴在这张长方形

的明信片上，剪成对称得有点过分的蛋形。我，象征着蛋黄的裸体，肚皮向下，趴在必然是某一头北极熊捐赠给东欧某位专拍儿童照的职业摄影师的一张白毛皮上。人家也为我的第一张照片选择了那时的许多照片一样的那种暖色，不易混淆，我认为称之为合乎人性的棕色，因为它跟当代违背人性的、光滑的黑白照片完全不同。也许是画好的黯淡模糊的枝叶，构成了被若干光斑冲淡了的昏黑背景。我的光滑、健康的躯体稳稳当当地呈对角线卧在毛皮上，体验着北极熊家乡特产的效果。同时，我用力高高抬起圆滚滚的婴儿脑袋，用明亮的眼睛注视着来看我的裸体的人们。

也许有人会说，这不过是同所有的婴儿照片一样的一张婴儿照片罢了。诸君看了那双手后就绝对会承认，我的第一张照片同样式繁多的照相簿上始终表明为低级生命、多不胜数的花朵的区别很明显。能够看到我的拳头捏着。没有一个香肠手指忘了自己，服从某种模糊的、由触觉反应造成的冲动，去玩弄北极熊皮上的毛。认真地握紧的小拳头在脑袋一侧晃动，时时刻刻准备落下去，发出鼓或其他音响。

当我在电灯泡下诞生时还没有鼓，曾有人允诺我三岁生日时给我鼓；相应地加上一面缩小尺寸的儿童鼓对于一个老练的照片剪辑师来说，本来是件非常容易的事，而且只需要把那头极蠢的剥制动物的皮拿走就行了，不必为了改动我身体的位置而修版，它本来就不能引起我的注意。如果把这个毫不相干的躯壳从这张照片上拿走，头一批乳齿正要长出来时感觉灵敏、目光锐利的年岁，便是他成功创作的主题。后来，我大约一岁半时，他们不再把我放在北极熊毛皮上了。坐在一辆高轮子儿童车里。他们推着我走在一道木板，尖齿和横档被一层和雪清楚地勾勒出来的栅栏前，由此可知，这张照片是在一九二六年拍摄的。栅栏式样笨拙，木板散发着沥青味。这使我在较长时间观察时联想到了那里的营房占地面积很大，曾经驻扎着马肯森轻骑兵，到了我的时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代，成了自由邦保安警察的驻地的郊区霍赫施特里斯。但我不记得有哪个熟人住在这个郊区，照片也许是我的父母去那里拜访后来再没有见过面，也许只是匆匆露过面的什么人时拍摄的。

尽管在寒冷的冬季，他们却没有穿冬季大衣，妈妈和马策拉特把儿童车夹在中间。妈妈穿一件俄罗斯式刺着冬景图的长袖短上装，它让人想到：在俄罗斯腹地，沙皇的全家在照全家福，拉斯普庭拿着照相机，我是小沙皇，栅栏后面藏着，制造了炸弹，决心消灭我这个专制君主家庭的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但是，马策拉特所穿的地道的、中欧式的、日后将会看到孕育着未来的小资产阶级服饰，减弱了隐伏在这张照片里的惨案的腾腾杀气。我们只是暂时离开主人的寓所，没有穿大衣，在太平无事的霍赫施特里斯区，让主人给他们两个和按照他们的愿望做出瞧着的滑稽样子我拍一张照，然后马上回到屋里享用有又热又甜的咖啡、蛋糕和奶油。

我还有十几张，有在一岁的、两岁的、两岁半的躺着的、坐着的、爬着的、跑着的快照。照片良莠不齐，组合成了人家给我拍摄的我三岁生日的那张全身照的预备阶段。

在这张全身照上我得到了我的鼓。崭新的，红白两色锯齿图案的它刚刚挂到我的肚皮前头，我便身穿条纹毛线衣，脚蹬锃亮漆皮鞋，面部表情严肃、坚定，自信地把两根木头鼓棒交叉在铁皮上。头发像一把蠢蠢欲动的刷子直立在脑袋上。我的蓝眼睛反映不出需要追随者才能夺得权力的意志。那时候我已经成功地处在一种我没有理由放弃的地位之上。我打定了主意，不管怎样不当政客，不当殖民地商品店老板，而是做个终结，就这样保持现有的身高和这副装束，就这样不管多少年都不再发生变化。

大人和小孩，大贝尔特海峡和小贝尔特海峡，大写字母和小写字母，卡尔大帝和小汉斯，歌利亚和大卫，能把强手击败的小人和巨人；而我是三岁孩子，童话里的大拇指，神话里的小矮

人，永远不会再长个儿的大人气的小孩，如此这般，就没有必要读完小孩的教义问答手册再去读成年人的了。我那个对着镜子刮胡子的父亲，也就没有到一个所谓的身高一米七二的成年人去继续经营他的店铺了。按照我父亲的愿望，这处殖民地商品店，对于年满二十一岁的我来说将意味着成年人的世界。我抱住了这面鼓，为的是不去摆弄现金收入记录器，我从三岁生日那天起，就一直保持三岁孩子的状态连一指宽的高度都不再长，但又是个比别人聪明三倍的人。他在智慧方面却远胜过所有比他身材高的成年人。他不想去和他们比谁的影子长。那些人直到老态龙钟时还在胡思乱想什么发育成长而他从内到外均已完善。他已经证明在那些人历尽艰辛，常常还要饱尝辛酸痛苦方能取得经验时，自己已经完完全全地掌握。他无须仅仅为了证实自己长了那么一点儿每年更换大一号的鞋子和裤子。

在这里，我必须承认有那么一种发展，有什么不总是对我有利的东西在成长，并且最终得到了救世主式的伟大意义；但是，有哪个成年人在我那个时代有眼力和听力认得出总是保持三岁孩子模样的鼓手奥斯卡呢？

玻璃，玻璃，小酒杯

我刚刚把我身背铁皮鼓、手执小鼓棒的全身照片描述了一番，同时又透露了我经过三年的深思熟虑，当着前来祝寿、围着插有三支蜡烛的生日蛋糕的客人们的面，在拍照时作出了什么打算。已经合上的照相簿默默地躺在我的身旁。现在，我要谈谈那些虽然不能说明我为什么到了三岁就不再长个儿、但终究已经发生的由我一手造成的事情。

成年人是不会了解你的，如果他们的肉眼再也看不见你在长个儿，这些我一开始就清楚地知道，他们就会说你停滞发育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还会花很多钱，领你去拜访几十上百个医生，即使没有医治的办法，也得让他们说明病因。因此，我必须在他们说明病因以前，自己先编造出一个似乎还可以解释我为什么不再长个儿的原因来，这样做的目的是使医生们不会乱作没边际的诊断。阳光明媚的一个秋日，我的三岁生日。催人遐想的晚夏的气氛，甚至格蕾欣·舍夫勒也压低了她的笑声。我妈妈哼着《吉普赛男爵》里的一支歌坐在钢琴旁，扬的手在她肩头按摩着，站在她和琴凳背后，像是在认真看乐谱。马策拉特在厨房里准备晚餐。因为格雷夫总有证明童子军既忠诚又勇敢的故事可讲，外祖母安娜以及黑德维希·布朗斯基和亚历山大·舍夫勒都把椅子挪到蔬菜商格雷夫身边。还有一个每隔十五分钟报时一次的落地钟，使这九月的日子就像一根细纺的线。由于大家都各忙各的事情像那口钟似的，又因为有一根线，从吉普赛男爵的匈牙利，经过格雷夫的童子军攀登的孚日山，绕道马策拉特，卡舒贝鸡油菌加煎鸡蛋和肚子肉在平底锅里劈啪爆响的厨房，穿过走廊，直伸到店铺，我便信手敲着我的鼓，走到店铺里柜台后面溜之大吉，远离了钢琴、童子军和孚日山，发现通往地窖的活板门由于方才马策拉特下去拿一个什锦水果罐头当餐后小吃后，忘记关上了。

我用了一分钟思考，才想明白通往地窖的活板门要我干什么。上帝知道，不是要我自杀，这要求很简单。可是，要我干的事是要我作出牺牲，并且还难且痛苦，我额头已经像每当我作出牺牲的时候那样，冒汗了。最要紧的是必须把我的鼓妥善保护起来，所以我背着它走下十六级台阶，为了不使它受损坏，把它放在面粉口袋中间。然后我又上去，走到第五级。不过，从这样的高度摔下来，不能既摔不死，又受到可以让人相信的伤害。于是我又往上爬，走到比较高的第十级，最后，我从第九级台阶摔下去，头朝下撞在我家地窖的水泥地上，带倒了一个放满覆盆子果汁瓶子的木架。

我在我的知觉拉上帷幕之前就向自己肯定这次试验肯定会成功：被我故意拽倒的乒乓乱响的覆盆子果汁瓶，足以引诱我妈妈从钢琴旁，马策拉特从厨房里，别的客人从孚日山上直奔店铺的活板门，冲下台阶来。

我在他们到来之前闻到了四溅的覆盆子果汁的味道，也看到了我头上在流血，还想到这时，他们已经走到台阶上了，也许是我的血，也许是覆盆子果汁这么甜的味道，催人入睡。我非常高兴，因为不仅万事顺利，而且由于我的细心周到，我那面鼓没有受到任何损坏。

也许是格雷夫把我抱上去的，我想。我到了起居室里，才从覆盆子果汁和他那幼儿鲜血掺半组成的云彩里露出脸来。医生还没来，妈妈厉声惨叫，马策拉特想去安慰她，却被她用手掌、手背一连打了几个嘴巴，并骂他是凶手。

我这一跤摔下去，虽然比较严重，但是，严重的程度是我事先计算好了的。这么一来，我不仅使成年人有了一个医生们也一再证实的重要的理由来说明我为什么不长个儿，而且并非我的本意的使没有善良的、害人之心的马策拉特成了罪人，不过，这是意料之外的，他没关上活板门，我妈妈便把所有的责任都加在他身上，很多年他一直背负着这一罪责，虽说我妈妈不常责怪他，但是一骂起来，便冷酷无情。这一摔使我在医院里躺了一个月，出院后，很少去麻烦医生，过了一段时期，才每逢星期三去霍拉茨博士那里诊断一次。我在自己成为鼓手的第一天，就成功地给了世界一个信号，我在成年人依据我一手制造的所谓事实真相去作说明之前，自己先把病因讲清楚了。他们从那以后便这么说：我们的小奥斯卡在他三岁生日那天，从地窖的台阶上摔了下去，使得他虽然没有折断骨头，可是不再长高一厘米了。

我开始敲鼓。我从我们的五层公寓的底层一直敲到屋顶室，再沿着楼梯敲下来。从拉贝斯路敲到马克斯·哈尔贝广场，又从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那里敲到新苏格兰、安东·默勒路、玛利亚街、小锤公园、股份啤酒厂、股份池塘、弗勒贝尔草场、佩斯塔洛齐学校、新市场，再敲回到拉贝斯路。我就这样一直敲着，成年人受不了，我的鼓经受得住，他们想要不让我敲打断我的鼓声，还想把我的鼓棒掰断——但是，多谢老天爷的关照，他们没有得逞。

我从地窖的台阶上摔了那一跤以后不久，便获得了一种敲击儿童玩的铁皮鼓的本领，使我与成年人之间保持一段必要的距离。几乎同时，我还获得了一副使我可以保持在非常高的音域上，用颤音歌唱、尖叫，或者像尖叫似的歌唱的嗓子。这样，尽管鼓声使他们震耳欲聋也没人敢抢走我的鼓；因为他们只要拿走我的鼓，我就哭闹，而我一哭，值钱的东西便被震碎：我能够用叫声打破花瓶，用歌声震碎玻璃；我的歌声能够使窗玻璃碎裂，让房间里灌满过堂风；我的声音就像一颗纯净的、而又无情的却又不丧失自身的清白的钻石，割破玻璃橱窗，进而划破橱窗里匀称的、高雅的、由人亲手斟上的、蒙上一层薄薄灰尘的玻璃酒杯。

不久，我们从布勒森路到挨着飞机场的住宅区的整条街，谁都知道我这种本事了。我对邻家孩子玩的游戏，譬如“酸鲱鱼，一二三”或“黑厨娘，你在吗？”或“我看见的你看不见”，都不感兴趣。可是他们一看到我，就一齐操着奇怪的腔调唱起合唱来：

玻璃，玻璃，小酒杯，
有白糖，没啤酒，
霍勒太太推开窗，
弹钢琴，叮咚当。

这只是一首没有内容的、无聊的童谣罢了。我听了一点也不

在乎，依然背着鼓，踏着有力的脚步从他们中间，从“小酒杯”和“霍勒太太”的歌声中间穿过去，在鼓上用对我不无吸引力的单纯节奏；玻璃，玻璃，小酒杯，敲出来，可是并不去充当引诱孩子们跟我走的捕鼠者。时至今日，每当布鲁诺在我房间里擦玻璃窗的时候，我会用鼓敲出这首童谣的节奏。

使我尤其是我的父母更加感到麻烦和恼火的不是邻居孩子们唱的讽刺歌，而是我们这个住宅区里凡没有教养的小无赖故意打碎了玻璃，都算在我的账上，甚至归咎于我的声音，并要我们出钱赔偿。开始，别人家厨房的窗玻璃被人用弹弓打碎了，我妈妈就老老实实在地赔钱，后来，她终于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她每当人家来要求赔偿时，就瞪着她的冷灰色的、讲究实际的眼睛，要别人拿出证据来。确实，我被邻居们冤枉了。当时，最大的错误莫过于认为我有一种儿童的破坏狂，认为我毫无缘由地憎恨玻璃和玻璃制品，就像儿童在胡作非为时所表现出来的莫名其妙的憎恶心理那样。只有贪玩的孩子，才会由于调皮捣蛋，干出恶作剧来。我除了在我的鼓上干我的事，从来不玩耍，至于我的声音，只是在需要自卫时，才会运用。我只有在持续击鼓的权利受到威胁时，才有的放矢地把我的声带作为武器。假若有可能的话，我倒想用同样的手段和声音把格蕾欣·舍夫勒妄想般设计的、有各种各样的图案、无聊的桌布剪个粉碎，或者把钢琴上那层黯淡颜色的油漆刮下来，而不去震碎任何玻璃制品。可是，我的声音既不能刮掉油漆，也不能剪碎桌布。我既不能用不知疲惫的叫声揭下糊墙纸，也不能像石器时代的人，用两种拖长的、一鼓一凹的声音使劲摩擦打燧石那样，放出热来，最后爆出火花，点着起居室两扇窗前被烟草熏出味儿来、干燥得像火绒的窗帘，燃成装饰性的火焰，更不能使马策拉特或亚历山大·舍夫勒坐的椅子的腿折断。我宁肯要一种不太神秘又不起破坏作用的自卫武器，但是，没有一种没有破坏作用的武器愿意为我服务；而且，又只能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随意使用玻璃，这样就只能为它赔钱。

我第一次成功地作了如下的表演在三岁生日过后不久。因为在这段时间内，我实在太勤奋了，这面鼓在我手里也许刚到四个星期就被敲坏了。鼓面中央的窟窿已经很醒目了。即使红白相间的火焰形图案的边框仍旧把鼓面和鼓底连在一起，由于我不屑把鼓翻过面来，窟窿便越敲越大，撕开了好几道口子，留下锋利的锯齿，溅出一些因为敲打而变薄了的碎铁皮，掉进鼓身里去。我每敲一下，这些碎片就像是满腹怨气地在发牢骚在里面劈啪作响。而且，在卧室里红棕色的地板上，起居室的地毯上，到处是不再愿意在被我敲苦了的铁皮鼓上呆下去了的闪闪烁烁的白漆皮。

他们担心我的手会被锋利异常的裂开的铁皮割破，尤其是马策拉特。自我从地窖台阶上摔了那一跤以后，他总是拿出十万分的小心，现在又劝我敲鼓的时候千万要小心。我的动脉在我两手快速敲击时，确实同锯齿形的窟窿擦边，所以，我只得承认，马策拉特表示的担心尽管有些夸大，但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的。他们本来只要买一面新的鼓，就可以排除任何危险；可是，他们想把我这面旧鼓拿走，而根本没想到要买新的。它跟我一同摔跤，一起出入医院，陪着我上下楼梯，走上鹅卵石路面和人行道，从那些玩“酸鲱鱼，一二三”、“我看到的你看不见”和“黑厨娘，你在吗？”等游戏的孩子们身旁走过。可是他们却不打算买一面新的来代替，想从我手里夺走这面鼓。他们用破巧克力糖来引诱我。妈妈撅起了嘴巴，手里拿着它。马策拉特装做严厉地抓住我的残破的乐器。他拉着我紧抱着的这面破鼓。我的本来只够敲鼓的气力，现在渐渐支持不住了。一条接一条红火舌从我手里缓缓地滑出去，整个圆柱形的鼓身快要被从我手里拽走了。这当口，直到那天为止，一直是个文静的孩子，以至于有点太乖了的我第一次发出了那种破坏性的、有效的尖叫声。罩在我家蜂蜜黄的落

地钟钟面外防死苍蝇和灰尘的磨光圆玻璃碎了，掉在红棕色的由于地毯不够长，离钟座还有一段距离的地板上摔了个粉碎。可是，这台贵重的机械的钟摆依然平稳地在摆动，内部构造并没有损坏，时针也安然地在走着。里面那口，平常很敏感得有点歇斯底里，稍稍碰撞一下，或者屋外驶过一辆运啤酒的卡车，它就会有所反应的，报时钟一点没有受到我的尖叫声的影响，惟有玻璃破了，粉碎了。马策拉特喊道，“钟坏了！”同时松开了鼓。我瞥了一眼，确信我的叫声仅仅是使玻璃没有了并没有损坏钟本身。可是，马策拉特，我妈妈，还有恰巧在那个星期下午来访的表舅扬·布朗斯基都以为坏了的不仅是钟面外的玻璃。他们脸色苍白，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分头走到瓷砖火炉、钢琴和碗橱旁，呆呆地站在那里，一动不敢动。扬·布朗斯基启动干燥的嘴唇像哀求似的眯着眼睛。直到现在我还认为，他是在默念祷词，祈求怜悯与援助。他念的可能是：“啊，上帝的羔羊，你除去世人罪孽——怜悯我们吧！”念了三遍这段经文以后，他又念另一段：“主啊，我不敢当，你到我舍下，只要你说一句话……”

主自然无话可说。钟只是玻璃碎了也没有坏。成年人和钟之间有非常奇特非常幼稚的关系，我从这个意义上讲，从来就不是一个孩子。时钟也许是成年人所能制造的最了不起的东西，它证明成年人可以成为创造者。他们胸怀大志，勤奋努力，再加上一点运气，是可以成为创造者的。但是，他们不久就会成为自己划时代的发明物的奴隶。

没有成年人，时钟就什么也不是。成年人给它上发条，调快慢，送到钟表匠那里去检验、拆洗，修理。还有别的什么，要是没有成年人乱猜瞎想，也同样毫无意义的现象，譬如盐罐倒放，布谷鸟过早地停止鸣叫，黑猫待在左边，大清早见到蜘蛛，他们都认为是不吉利的征兆。正如他们见到表舅的油画从墙上掉下来就觉得是什么预兆，事实上那只是因为钉在灰泥里的钩子松动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了。成年人总会在镜子里见到比时钟本身能显示的多点什么的时钟的背面和内部。

尽管我妈妈有时也难免要瞎猜乱想，但毕竟像她平日做人那样，有冷静务实的眼光，轻率地把任何可疑的征兆都往好的方面去解释。当时，她想起了使大家听后都顿感宽慰的一句话。“碎片带来好运气！”她咬着手指喊道，拿来了畚箕和扫把，把带来好运气的碎片扫在一起。

如果按字面去理解妈妈的这句话的话，那么，我已经给我的父母、亲戚、朋友以及不相识的人们，带来了很多好运气；他们当中有谁要想抢走我的鼓，我就用歌声和叫声震碎他们的窗玻璃、盛满啤酒的杯子、空啤酒瓶、发散出春天气息的香水瓶、放假水果的水晶碗，总之，把一切在市场上按原料或按人工议价出售的、在玻璃厂里由玻璃工人吹制成的玻璃制品震个七零八落。

我始终爱好造型很美的玻璃制品，所以我总是尽量避免造成太大的破坏。晚上，如果他们想要拿走我的鼓，不让我把它带到小床上去的话，我就把卧室里吊灯上的四只灯泡最少震碎一只。我的父母亲、布朗斯基夫妇、外祖母安娜·科尔雅切克、舍夫勒夫妇以及格雷夫夫妇在一九二八年九月初我四岁生日那天，送给我铁皮鼓外各种各样的礼物：锡士兵，一艘帆船，一辆救火车，他们想让我玩锡士兵，玩球火车，他们讨厌我最心爱的被我敲破了的鼓，他们想从我手里把它拿走，硬把那艘船帆安得不是地方的笨头笨脑的帆船塞到我手里。他们眼睛惟一的用途，就是无视我和我的愿望。于是，我大叫一声，把我家吊灯上的四只灯泡都震碎，把那些给我祝寿的人们全部置于创世以前的黑暗之中。

那些成年人先是惊呼狂叫，极其渴望回到光明中去，然后又习惯了黑暗。除去斯特凡·布朗斯基以外我的外祖母安娜·科尔雅切克是惟一没能从黑暗中捞一把的人。她到店铺里去拿蜡烛，尖声怪气的斯特凡跟在她后面并拉着她的裙子。她拿着点燃的蜡烛

回来，照亮了房间，只见其他喝寿酒喝得醉醺醺的人们成双成对，结成了叫人叹奇的对偶。

果然不出我所料，我妈妈坐在扬·布朗斯基膝上，上衣散乱。看到短腿面包师亚历山大·舍夫勒差不多淹没在格雷夫太太怀里，实在让人倒胃口。马策拉特在舔格蕾欣·舍夫勒的大金牙和马齿。只有黑德维希·布朗斯基双手搁在怀里坐着，她的母牛眼睛在烛光下非常虔诚。她离蔬菜商格雷夫不远不近。格雷夫没有喝酒，但是他却在用特别甜，却又忧郁感伤的歌声唱歌。他用歌声邀请黑德维希。布朗斯基同他合唱。他们唱起一支二声部的歌词大意是某个名叫吕贝察尔的山神在巨人山脉游荡的童子军歌曲。

外祖母进来时，被他们丢在脑后的我背着鼓的残骸坐在桌子底下，还从铁皮上敲出一些节奏来。那些神魂颠倒、配错了对、在房间里或躺或坐的男女们，好像是听到了我那像一屋清漆，蒙住了他们在狂热而紧张地证明自己是多么卖力时所发出的咂嘴声和吮吸声。感到微弱而均匀的鼓声很悦耳。

她举着蜡烛，像是一位天使长，借着烛光，见到了索多玛，看到了葛莫拉。她全身抖动，勃然大怒，连蜡烛也跟着抖动。她说，这是一场下流的恶作剧，从而结束了这出田园戏以及吕贝察尔在巨人山脉的漫游。她把蜡烛粘在碟子上，一边从碗橱里取出施卡特牌，扔到桌上，宣布现在开始第二部分的祝寿活动，一边安慰着始终还在哭哭啼啼的斯特凡。紧接着，马策拉特在吊灯的旧灯头上换上了新灯泡，摆好椅子，呼呼地开啤酒瓶。他们在我头顶上开始玩十分之一芬尼一点的输赢的施卡特。我妈妈一上来就建议，输赢一点为四分之一芬尼；可是，表舅扬认为风险太大，除非在加倍或偶然打成大满贯时，才提高赌注。因此依然按十分之一芬尼一点来碰运气。

我很安逸地呆在桌子下面，下垂的桌布的阴影里。我的心不在焉的鼓声跟随着牌局的进行，合着头顶上出牌的声音，在他们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整整玩了一小时施卡特以后，宣布扬·布朗斯基输了。他的牌尽管很好，还是输了。这一点儿也不奇怪，因为他漫不经心。他脑子里想的是别的事情而不是他该拿够的二十七点的牌。牌局一开始，他一边告诉他的姑妈，对刚才黑暗里秘密的小小宗教仪式不要一惊一乍，一边脱下左脚的黑便鞋，把这只穿新换上黑短袜的脚从我脑袋边上伸过去探坐在他对面的我妈妈的膝头。他刚一碰到，我妈妈就往桌子靠拢，这样，听马策拉特叫完牌后，就随便说了声“不要”的扬先用脚尖撩起她的裙边，随后，整只脚伸到她的两腿中间去。我妈妈真让我惊叹不已。虽然在桌子底下受到穿羊毛袜的脚的挑衅，但在结实的桌布上面，她却在进行特别冒险的赌博。她叫到六十点，谈笑风生，把握十足，终于获胜。相反，在桌子底下那么果断的扬，在桌面上则一输再输，这样好的牌，如果让我来打，即使在半梦半醒之间的时候，也肯定会赢的。

后来，困得要命的小斯特凡也爬到桌子底下来了，他不明白他爸爸那条穿着袜子的腿在我妈妈的裙子底下找什么，不久，也睡着了。

午后晴转多云，下了几场小阵雨。第二天，扬·布朗斯基就来了，取走了他作为生日礼物送我的那艘讨厌的帆船，到西吉斯蒙德·马库斯的玩具店里换了一面铁皮鼓。下午稍晚的时候，他回到我家，被雨淋了，衣服有些湿，他带来了有我熟悉的图案，白底红火焰的那面鼓。他把鼓递给我，一手抓住我那面残破的上面红白两色的油漆只剩下斑斑点点的旧鼓。扬抓住旧鼓，我抓住新鼓的时刻，扬、妈妈和马策拉特的眼睛都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他们难道以为我会坚持什么原则而不弃旧就新么？想到这，我禁不住要笑。

出乎他们所料，我交出已成废铁的旧鼓，并没有大声叫喊，没有喊出震碎玻璃的歌声，马上双手捧住了新乐器。我心无旁骛

地敲了两个小时，掌握了击鼓的诀窍。

可是，我身边的成年人并不是每个都像扬·布朗斯基那般见识广博。在大家谈论最多的是纽约股票市场的崩溃，而我也在考虑，远在布法罗做木材生意的外祖父科尔雅切克，是不是也亏了本的一九二九年，我五岁生日过后不久，妈妈因见我明显地不再长高，非常不安，每逢星期三，便带我到布鲁恩斯赫弗尔路的霍拉茨博士的诊所去。没完没了的检查，叫人心烦，但我还是忍过去了，因为当时我已经喜欢上了站在霍拉茨边上帮忙的护士英格的服装；这种白色的护士服，叫人看了眼睛舒服，还让我联想起妈妈在战争期间当护士时拍的照片。我根本听不见医生时而叫喊、时而用令人讨厌的长辈口吻、时而使劲加强语调讲的话。只是聚精会神地观看不断改变形状的护士服的褶裥。

霍拉茨在做完检查后，一边翻阅我的病历，一边思考着什么问题似的摇头，诊室里的全部家当：许多镀铬、镀镍和光滑的搪瓷制品；还有架子和玻璃橱，里面放着玻璃瓶，贴有字迹工整的标签，酒精里泡着蛇、蝾螈、蟾蜍以及猪胎、人胎、猴胎从眼镜片上反射出来。他一遍又一遍地让我妈妈讲我是怎样从地窖台阶上摔下去的，但当她破口大骂没把活板门关上，这一辈子都要担当罪责的马策拉特时，霍拉茨却又转而抚慰她。

几个月以后的一个星期三，他可能为了给护士英格，或许也给自己证明他这一段时间治疗的成果，想把我的鼓拿走。于是，我一声大叫，使得他收集起来的大部分蛇和蟾蜍以及各种胚胎全部被毁了。

我除了过去震碎过未开盖的啤酒瓶和妈妈的香水瓶以外，还是第一次破坏这么多小心保存、盛满东西、锁在橱里的玻璃瓶。效果非同一般，不仅使所有在场的人慑服，而且使了解我同玻璃之间秘密关系的妈妈也大为震惊。霍拉茨存放他的全部令人恶心的古怪东西的玻璃橱，被我用棱角不分明的第一声就切开了，几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乎整块玻璃摔到漆布地板上，仍保持原来的正方形裂成万千碎片。接着，我用绝对富有穿透力的立体声震碎了许多个试管。瓶瓶罐罐像放鞭炮似的破裂了。部分已经凝结的绿色的酒精带着经过特别处理的、苍白的、目光忧郁的蛇、蝾螈、人胎等等四下飞进，流到诊室红漆布地板上，满屋子弥漫着刺鼻的弄得我妈妈恶心要吐的气味，护士英格只好打开正对布鲁恩斯赫弗尔路的窗子。霍拉茨博士很有办法，擅长消灾为福，逢凶化吉。他在我干了这次暴行以后没有几个星期，在专业杂志《医生与世界》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专论我，奥斯卡·马，一个能唱碎玻璃的不一般的人。据说，在国内外专业圈子内霍拉茨博士在这篇二十多页的文章里所提出的理论，引起了重视，不少专家撰写文章，或抑或扬。她竟因他送的好几本杂志中的这篇文章而感到骄傲，这就引起了我的深思。她很有耐心地把文中一些段落读给格雷夫夫妇、舍夫勒夫妇以及她的扬听，而且每天饭后，总要读给她的丈夫马策拉特甚而至于殖民地商品店的顾客听，并恰到好处地赞赏我的妈妈。而文内的专业名词她即使读错了重音，也能表现出她有丰富的想象力。我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报刊上，对于我本人是毫无意义的。这篇文章，篇幅不小，行文老练，但细细品味，便知是一个沽名钓誉、想要捞个教授职位的医生讲的不得要领的离题话，这便是我当时的警觉的怀疑态度对他这篇文章的评价。

今天，声音已经连刷牙玻璃杯都震不碎了的我，躺在疗养与护理院里。像霍拉茨的那些医生们，却在我的病房里出来进去，给我做所谓的罗尔沙赫测验、联想测验以及其他测验，妄图给我的强制送入找出一个适合的理由。今天，我依然乐于回忆起他的声音发展史上的太古时代，他最初获得那种声音的岁月。那时，我只有在必要的时候才把玻璃用声音彻底弄碎。在我的艺术繁荣和没落时期，在没有外界压力的情况下就运用那些能力。我纯粹出于游戏的欲望，醉心于为艺术而艺术；沉溺于个人后期的惯用

作风；我在把唱碎玻璃作为自我表现手段的同时也渐渐长大了。

课程表

有时，克勒普打发时间的方法就是安排时间表。他经常一边排表，一边大嚼香肠和闷扁豆。这一事实证明了我的梦想家都是贪食者的论点。克勒普经常要花很多功夫来填他的时间表。这一事实又证明我另外一个关于纯粹的懒骨头才能做出省力的发明来的论点。

克勒普在这一年里，也花了半个多月的功夫来排他一天的时间表。在他昨天来找我之前一直在神秘地活动着。他从贴胸的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叠了九次的纸来递给我。他为自己又一次做出了省力的发明而容光焕发，得意非凡。

我把这张上面并没有什么新鲜的内容的纸条粗略看了一遍：十点吃早饭；午饭前沉思默想；饭后午睡一小时；醒后尽可能在床上喝咖啡；坐在床上练一小时长笛；在屋里吹着风笛徘徊了一小时；在院子里露天吹风笛半小时；接下来的两小时，或喝啤酒、吃香肠，或上电影院，隔一天一换；在进影院前或喝啤酒时，避人耳目且不夸张地替非法的德国共产党做半小时宣传。一周三个晚上在“独角兽”饭店奏乐伴舞；星期六下午，预定到格林街洗澡与按摩而将喝啤酒及为德共宣传挪到晚上；之后到“U-9”去同某个姑娘搞四十五分钟卫生术，再带着这个姑娘和她的女友到施瓦布的店里去喝咖啡和吃点心；在理发店打烊前去刮脸，如果需要的话，还理个发；到照相馆拍快照；最后去吃香肠，喝啤酒。

我请克勒普复写一份给我，赞扬他精心画在表格四周的曲线花纹并问他，准备怎样填补空白时间。克勒普想了一下回答说：“想德共的事，或者睡觉。”我是不是要告诉他，我同自己的第一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份课程表打交道的故事呢？事情是在考尔阿姨的幼儿园里开始的，没有危险。黑德维希·布朗斯基每天早上来接我，带我和她的斯特凡到波萨道夫斯基路考尔阿姨那里。我们总共六到十个幼儿，有几个总在生病，都得在那里玩耍，到呕吐为止。幸好我可以把鼓当玩具，他们不能强迫我去玩积木，只是在他们需要一个头戴纸盔的擂鼓骑士的时候让我坐摇木马。考尔阿姨有上千个扣子的黑绸裙是我的鼓谱。我可以心安理得地说，我每天多次成功地在我的鼓上给这位由皱纹构成的、单薄的小姐解开又系上扣子，给她脱去又穿上衣裳，却一点也不会想到她的肉体。

每天下午我们穿过栗树林荫道，到耶施肯山谷的森林，登上埃尔布斯山去散步，经过古滕贝格纪念碑让人感到令人愉快的无聊，使人轻松的无聊，所以至今我还希望挽着考尔阿姨薄纸般的手在图画书上散步。

我们这八个、十个或十二个幼儿，必须被套上一根当车轡用的、用毛线编织成的浅蓝色带子的挽具。毛线车轡左右共有十二个毛线织的轡头，每个幼儿身上套一个。每隔十厘米挂一个铃铛。我们在前面似马儿奔驰，铃声叮当，嘴里咿咿呀呀，考尔阿姨手执缰绳，我则敲击黏稠的鼓声，穿过秋天里郊区的街道。有时考尔阿姨起个音让我们唱《海上的星，我向你致意》或者《耶稣，我为你而生，耶稣，我为你而死》；当我们唱起《玛利亚，救助啊》和《甜蜜的圣母，甜甜甜》，向秋天清朗的空气倾诉时，路过的行人全部为之感动。交通因我们横穿过主干大街时，而中断，电车、汽车、马车在我们唱着《海上的星》过马路时，全都停下来了。每次考尔阿姨都要向让我们过马路、指挥交通的警察挥动她那只像薄纸似的沙沙响的手表示感谢。

她许诺道，“我主耶稣会奖赏您的。”绸裙子瑟瑟地飘拂。

我在过了六岁生日以后的那个春天，因为斯特凡的缘故，只得同他一起离开了可解可结衣服扣子的考尔小姐，对于我来说，

这绝对是件遗憾的事情。这又同有强暴行为的政治有关。那一天，我们又登上埃布斯山，考尔阿姨把我们从毛线挽具上解下来。树梢间到处是新枝嫩叶，开始出现了新的生机。考尔阿姨坐在一块标明好几个地点的方向，由此步行向前，需要一至两个小时不等的布满苔藓的路标石上。她不知道春天在自己身上唤起了哪些感情，像一个年轻姑娘特啦啦啦啦地唱着，脑袋瓜像雌珍珠鸡抽搐似的晃动。她正在替我们编织鲜红的新挽具，这时，灌木丛中传来一声喊叫，考尔小姐慌忙拿着编织物站起身来，红毛线拖在身后，踏着高跟鞋往喊声和树丛处走去。我跟在她身后看到，斯特凡的鼻子在淌很多很多的血，顿时她的毛线显得不那么红了。一个卷发，太阳穴上暴着青筋，名叫洛塔尔的男孩，骑在这个弱不禁风、正在吃苦头的斯特凡的胸口上，好像要把他的鼻子打瘪似的。这决定了我不能再套上考尔小姐编织的新玩具。

他打一拳骂一声，“波兰佬！”考尔阿姨五分钟以后再次用浅蓝色的挽具把我们都套上了除了正在替她缠红毛线的我，她当我们大家的面念了一段，一般是在祭献和化体之间念的祈祷词：“羞愧呵！心里充满悔恨与痛苦……”

然后，我们下了埃布斯山，停留在古滕贝格纪念碑前。她用细长的手指指着正在暗暗饮泣、用一块手绢堵住鼻子的斯特凡，温柔地说：“他对他是个波兰小孩不能负责。”斯特凡按照考尔阿姨的建议，不再上她的幼儿园。我虽说不是波兰人，也不很喜欢斯特凡，但却表明同他团结一致。复活节时，他们打算让我们上小学去试试。戴着宽边角质框眼镜的霍拉茨博士，鉴定说这样做会有好处，而且表示这对于我会有益。

扬·布朗斯基拿定主意在复活节后，送他的斯特凡去波兰公立小学。他反复对我妈妈和马策拉特说，他是在波兰邮局工作，干得很好的波兰公务员，波兰国给他的报酬挺好。总之，他是波兰人；等到申请批下来，黑德维希也就入了波兰籍。而且，像斯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特凡这样聪明伶俐、天资高的孩子，可以在家里学习德语。至于他一讲到总要叹几声气的我，同斯特凡一样，已经满六周岁了，虽说讲话还结结巴巴，智力和身材也远远不及同龄儿童，也应当尝试一下。只要校方不提出异议就可以享受义务教育。

疑虑的校方要求有医生证明。霍拉茨说我是个健康的孩子，尽管从个子看，好像只有三岁，而且说话还有点结巴，但是智力决不比五六岁的孩子差。他还谈到了我的甲状腺等等。

因为没人要拿走我的鼓，我已经习惯于各种检查和试验，尽管那些给我做检查和试验的人还清楚地记得被破坏的霍拉茨收集的蛇、蟾蜍及各种胚胎。

第一天上学，在家里我被迫让我声音里的金刚钻显威力，因为马策拉特明知故犯，偏不让我背着鼓走到弗勒贝尔草场对面的佩斯塔洛齐学校去，而不让我把鼓带去。

他终于动手来夺这件不属于他的他不会摆弄的东西，我大吼一声，把一只据别人说是件真古董的空花瓶裂成两半，这只马策拉非常心爱的真花瓶摔在地毯上，成了真正的碎片。他看到后，举手要揍我时，妈妈跳了起来，扬刚好带着斯特凡，拿着纸口袋走过我家时看到了的，一步跨到他们两个中间。

“算了吧，阿尔弗雷德。”他心平气和地说。一见扬的蓝色目光和我妈妈的灰色目光，马策拉特便压下心头的怒火，把手插到裤兜里去了。

佩斯塔洛齐学校是一座新盖的，红砖、平顶的长方形箱子，有彩色拉毛粉刷和壁画等现代化装饰的四层楼房。它是由幼儿众多的近郊区区政府在当时还相当活跃的社会民主党人大声疾呼之下兴建的。这口箱子我还算满意，除去它那股气味以及彩色拉毛粉刷和壁画上那些做体育运动的青春派儿童以外。

大门外铺砾石的空场上，种着树梢上正发绿芽的不像天然的小树。小树都由像主教的曲柄权杖、一头弯曲的铁棍支撑着。母

亲们有的乱喊乱叫，有的规规矩矩，从四面八方拥来，一手拿着五彩圆锥形纸口袋，一手拉着孩子。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多的母亲仿佛在赶集市，到那里去卖掉自己所生的第一胎或第二胎的孩子似的向一个方向拥来。

刚进前厅，就闻到这股经常被人描写而成为比世界上任何一种名牌香水更为人们所熟悉学校的气味。四五个花岗岩石缸在厅里的大理石地面上，不拘一格地竖立着，缸底有许多同时喷出很高的水柱来的泉眼。周围挤着一群与我同龄的孩子，他们使我联想起我比绍舅公文岑特家养的有时侧身躺着，忍受着它那些同样口渴的、穷凶极恶地拥上来的猪仔们的母猪。

孩子们头发从前面垂下，身子俯在水缸上，张着嘴去接垂直喷上去又落下来的细水柱。他们是在玩还是在喝水呢？有时，两个孩子同时站直身子，很不礼貌地，鼓着嘴把含在嘴里温温的、而且掺进唾沫和面包屑的水，喷到对方的脸上去。我走进前厅时，随便从敞开的门里看了一眼左邻的体育馆里面皮面鞍马、爬竿、爬绳以及令人生畏的、总像是强求别人在上面做大旋转动作的单杠，就不由得真正无法抑制的口渴起来，特别想像他们一样地去喝一口水。我可不愿意让牵着我的手的妈妈把同三岁小孩一般高的我抱到水缸上去？但即使把我的鼓垫在脚下，我也够不到那些水柱。我纵身轻盈一跳，超过一只水缸的边缘，朝里面瞅了一眼，只见沾油脂的面包的碎渣把排水口严重地堵住了，在缸底聚成一层很脏的淤积物。我再也没有口渴的感觉了。虽然我思想上曾经觉得自己口干舌燥，但是，那只是在我的肉体好像亲身经历似的在体育馆这个沙漠里的运动器械之间走失的时候。

妈妈领我走上纪念碑似的、为巨人而设的楼梯，穿过回声四起的走廊，进入一个房间门上挂着一块写着：一年级甲班的牌子的房间。屋子里坐满了同我一样年龄，母亲一字儿排开，在正对窗户的墙下站着，手里都拿着五彩圆锥形纸口袋，上端系着绢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纸，口袋的长度超过了我的个子的孩子。第一天上学都要拿着它，我妈妈也不例外这是一种传统。

这帮小赤佬以及他们的母亲在我拉着她的手进屋时一齐放声大笑。一个胖男孩想要碰我的鼓。我为了不唱碎玻璃，只得朝他的胫骨连踢几脚，这个顽童被踢倒在地，头发梳得亮亮的脑袋撞在课桌上。因此在后脑勺上我挨了我妈妈的一巴掌。那个顽童嚷了起来。我当然不会叫喊，因为我只有在别人要夺走我的鼓时才叫喊。我妈妈在这么多母亲们面前，这样出场亮相，确实觉得很尴尬。她把我拉到第一排靠窗户的高大的课桌旁。可是，越往后，课桌越高大，小赤佬们也越粗野，脸上的雀斑也越多。

我非常满意，安静地坐着。我妈妈一直都很尴尬，使劲挤到那些母亲们中间去。她在同她一样做母亲的人面前，可能由于我所谓的发育不全而感到羞惭。她们摆出一副为自己的野小子们而骄傲的面孔，好像蛮有理由似的，但我觉得，他们长得也太迅速了。

我不能从窗口眺望弗勒贝尔草场，因为窗台比我高，就像课桌对我来说显得过于高大一样。我很想看一眼童子军在蔬菜商格雷夫领导下，在那里安营扎寨，在玩纸牌戏以及做童子军应当做的好事的弗勒贝尔草场。我不会同他们一样夸张地去美化营地生活。使我感兴趣的只是身穿短裤的格雷夫的形象。他让他们穿上童子军创始人巴登-鲍威尔的制服，是因为他太喜欢那些眼睛大大、又瘦又高、脸色苍白的男孩了。

这非常值得一看，但是，该死的建筑结构叫我偏偏看不成，我只好从仰首观天中得到满足。总有新的云从西北向东南移动，就像在那个方向上有什么特别的吸引力。我把鼓夹在膝头和课桌的屈板之间，尽管它不存一丝念头想要跟着云彩去飘游。本来是靠背用的椅子背，支撑着我的后脑勺。我背后那些所谓的同学们，大声嚷嚷着，叽里呱啦，撒野的，笑的，哭的，都有。他们

往我背后扔纸团，但是我并不理会；我认为，那些有明确目标的浮云是值得观赏的，而那一群扮着鬼脸、歇斯底里至极的蠢货，则根本不屑一顾。

一个后来自称是施波伦豪威尔小姐的女人走进教室，班里顿时安静下来。我安静地沉浸在自我之中，期待着即将来临的事物。说老实话，我向来认为没必要去分散注意力，期待即将来临的事物。我不在期待，而是坐在课桌旁，一边凭感觉知道我的鼓仍在原处，一边陶醉于静观复活节刚擦过的玻璃窗前面的云彩。

施波伦豪威尔小姐的服装就像一个干瘪的男人很不雅观。她的模样儿被她那窄而硬的衬衫领子弄得更难看了，我认为，可以把它拆下来浆洗的，它紧勒住她的喉头，使得脖子上都起了皱纹。她刚踏着平底轻便鞋走进教室，便马上想要讨好别人，于是问道：“亲爱的孩子们，我们一起唱一支小曲好吗？”回答她的是一阵被她却看做是表示赞同的乱嚷，因为她马上装腔作势地起了个音定得很高的头。她唱的是春之歌《五月已到人间》，尽管现在刚到四月中旬。我身后这伙人，既对歌词一窍不通，又对这首小曲的简单节奏缺乏起码的感受力，没等她打手势，就胡乱地连唱带吼，使得墙上的灰泥也被震落下来。

虽然施波伦豪威尔小姐剪短了头发，面色蜡黄，领子底下隐约显出男式领结，她仍使我感到遗憾。我把头扭过来，不再去看那些今天显然不上课的云彩，从吊裤带下一下子抽出鼓棒，明显而响亮地在鼓上敲出了这首歌的拍子。但是，我背后那帮家伙缺乏这种听觉能力而毫无节奏感。只有施波伦豪威尔小姐向我表示鼓励地点点头，并向着贴墙站立的母亲们微微一笑，尤其对我妈妈眨了几下眼睛。我把这做为一个信号，便放心地继续敲下去，先简单后复杂，直到把我的所有技巧一一施展了出来。我背后那帮家伙早就停止了他们狂吼乱叫。我设想现在把我的同学变成了我的学生，是我的鼓在教这帮学生，在讲课，因为这时施波伦豪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威尔站到了我的课桌前，聚精会神地瞧着我的手和鼓棒。她那样子看得出神而达到忘我的境界并不笨拙。她跟着我的节拍用手敲桌子，微笑着。她在一分钟这么短的时间里，忘记了自己的教师职业，变成了一个有同情心的老姑娘，从规定她平时必须笨拙地模仿的形象中脱颖而出，变得孩子气、好奇、心理复杂和无道德观念，变得孩子气。

但是，当施波伦豪威尔小姐不能马上正确地模仿我敲鼓的节拍时，她又故态复萌了。一个笨手笨脚的拿低工资的角色，马上又镇定下来说道：“你肯定就是小奥斯卡。你的事情，我们已经听到非常多了。你敲鼓敲得多好啊！我们的奥斯卡真是个好鼓手呀！”

母亲们挤得更拢，孩子们一阵乱嚷，施波伦豪威尔小姐又依然如故。“不过，”她用假嗓子说道，“现在我们要把累了，要睡觉了的鼓保存到教室的柜子里去。下课以后，你再把鼓拿回去。”

她还没有唧唧喳喳地把这些虚伪的话讲完，就向我伸出修得很短的女教师的手指甲，要用十只短指甲的手指来抓我的既不疲倦，也不想睡觉的鼓。我用穿在厚套头衫袖子里的双臂紧紧围住红白相间的鼓身，两眼盯着她，由于她执著地射出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历史悠久的公立小学女教师的目光，所以，我也把目光穿透到施波伦豪威尔小姐的内心深处，找到了许多有趣的满满写三章不道德的轶事的材料。但是，因为我的鼓正受着威胁，我逼迫自己不再去窥视她的内心生活。我把有穿透力的目光射向她的肩胛骨之间，发现在她保养得非常好的皮肤上有一颗长着长毛的、古尔登那样大小的痣。

也许她已感觉到被我的目光发现了她的内心世界，或者由于我的声音划了一下她右边的眼镜片，虽然它没有被我弄碎，但还是给了她一个小小的警告，总而言之，她不再赤裸裸地使用暴力，可能她受不了刮镜片时发出使她浑身起了鸡皮疙瘩的刺耳声。

她颤抖着松开了我的鼓，并说道：“你真调皮，奥斯卡！”并向我妈妈投去了责怪的目光，弄得我妈妈不知该把目光投向哪里。她转过身，放弃了我那面始终清醒的鼓，用平底鞋跟走到她的书桌旁，从皮包里掏出另一副可能是她读书时戴的眼镜来，用一个坚决的动作，把那副被我就像用手指甲刮玻璃窗那样的声音刮过眼镜从鼻子上取下来，好像她的眼镜是我弄碎的，然后用撇开的小指把另一副架到鼻子上，挺直身子，弄得骨头直响。她又把手伸进皮包里对大家说：“现在我给大家念念课程表。”

她从猪皮皮包里掏出一摞纸条，自己取了一张，其余的传递给包括我妈妈在内的母亲们。最后，她把课程表上印的念给那些已经坐不住的六岁孩子们听：“星期一：宗教，写字，算术，游戏；星期二：算术，书法，唱歌，自然；星期三：算术，写字，图画，图画；星期四：乡土课，算术，写字，宗教；星期五：算术，写字，游戏，书法；星期六：算术，唱歌，游戏，游戏。”

施波伦豪威尔小姐就像宣读一份不容更改的命运判决书一样，用刻板的声音无一遗漏地宣读了作为公立学校教师代表大会产物的课程表。之后，又想到了自己在师范学校所受的教育，就变得温柔了。她身为教育工作者的乐趣突然爆发，于是欢呼道：“亲爱的孩子们，现在让我们一起再读一遍。请吧——星期一？”

小赤佬们狂叫道：“星期一。”

然后这帮受过洗礼的野蛮家伙跟着她吼叫着“宗教”这个词儿。我用鼓代替嗓子敲响了“宗教”这个词儿的音节。我后面那一帮随着施波伦豪威尔念一声就吼一声。“写字！”我敲两下鼓。“算术！”又是两下。

我前面的施波伦豪威尔念一声，我后面那一伙就像做应答连祷似的吼一声。对这种无聊可笑的游戏，我还得摆出一副正经的面孔，适当地根据音节敲响我的鼓，直到施波伦豪威尔怒不可遏地跳了起来。使她激动得涨红了脸的是我，我的无辜的鼓对她来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说是块绊脚石，她很难让我这个有节奏感的鼓手拉进来做祈祷。

“奥斯卡，你要认真听我念！星期四：乡土课？”我撇开“星期四”这个词儿，只合着“乡土课”这个词儿的音节敲了四下，“算术”和“写字”各敲两下，“宗教”这个词儿我是根据三位一体、一人获救的神学原则而不是合着它的音节敲四下，敲了三个三连音。

但是，缺乏敏锐的辨别力的施波伦豪威尔厌恶鼓声，不管你怎么敲都不行。和上次一样她伸出十只剪秃了指甲的十个手指，要来抓鼓。

但是，在她碰到我的鼓之前，我已经用两声毁玻璃的叫声，把教室里三扇特大的窗子最上一格的玻璃和中间一格的玻璃震落下来。让和煦的春风毫无阻挡地吹进教室。我用纯属多余的第三声叫喊，消灭了下面一格的玻璃；这确是由于我兴致太高了，因为施波伦豪威尔见到上、中两格的玻璃已经粉碎后，就收回了她的手。上帝明鉴，要是我注意看到了施波伦豪威尔在仓皇溃退，我就会不再逞起性子来干得聪明一点，不会喊掉最后一排玻璃。她出其不意地变出了一根藤条来。在洋溢着春天气息的教室的空气里抖动着。她手执被她赋予回弹力的藤条在这种混合的空气里飏飏地挥舞，使它极其渴望绽开别人的皮肤，一来一回，发出呼啸声，形成了许多道瑟瑟作响的帷幕，想使被打的和打人的双方都得到满足。她一下子打在我的桌角上，小瓶里的墨水变成一股紫色的喷泉冒了出来。我拒绝伸出手去给她打，她便抽我的铁皮鼓。她有什么理由要打我的鼓？我背后让人讨厌的野小子不是很多吗？为什么偏要找我的鼓？根本对擂鼓艺术一窍不通，她有什么理由要加害于我的鼓？准备打人的是什么目露凶光的野兽？它是从哪个动物园里逃出来的要寻找什么食物的？接下来又要攫食什么？——兽性也从深渊里爬上来钻进了我体内，钻过鞋后跟、脚后跟，越爬越高，控制了我的声带，使我发出一声野兽发春时

的叫喊声，足以把一座哥特式教堂所有折光的彩色玻璃震碎。

换句话说，我发出一声双响的吼叫，把施波伦豪威尔的一副眼镜片变成了粉末。她的眉毛下边渗出了一点血丝，光秃秃的镜框后面，两只眼睛眯成了缝，摸瞎着向后退去，最后开始没有自制力的号啕大哭，丑态百出。这时，我背后那一帮小子吓得连气都不敢出，有的牙齿发颤，有的爬到了课桌底下。有几个偷偷朝母亲们身边靠拢从一张课桌溜到另一张。她们很明白这是一场灾祸，要打肇事者，准备要不是我抱着我的鼓离开了课桌，她们非扑过去抓住我妈妈，揍她一顿不可。

我从半盲的施波伦豪威尔身边经过，到了被复仇女神团团围住的我妈妈身边，拉住她的一只手，将她一把从一年级甲班灌满过堂风的教室里拉出来。我们穿过有回声的走廊，下了为巨人的孩子建造的石楼梯，经过喷水的积有面包渣儿的花岗岩石缸以及大门敞开的体育馆里单杠下正在哆嗦的男孩。出了佩斯塔洛齐学校的大门，我把她手里一直捏着的课程表团成了一个没有一丝意义的小纸球。

摄影师站在门口的柱子中间，等待拿纸口袋的一年级学生和母亲们出来。我答应让他给我和那只经过一场混战却还健在的纸口袋照一张相。摄影师让我卡站到一块写着“我入学第一天”的黑板前，用它当做背景。

拉斯普庭与字母

刚刚，我给我的朋友克勒普和只用一半注意力听着的护理员布鲁诺讲我第一次同课程表打交道的故事。我谈到：摄影师给身背书包、手执纸袋的六岁孩子在历来都用作背景写有“我入学第一天”的黑板前拍摄明信片大小的照片。

不用说大家也明白，只有母亲们读得懂这个句子，她们比自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己的孩子更加激动的站在摄影师背后，在写着这个短句的黑板前站着的孩子，要到一年以后，或者在翌年复活节过后一年级新生入学那天，或者从留给他们自己的照片上，才能明白这些字的意思，才了解原来那些像画片一样美的照相，是入学第一天他们拍摄的。

这句铭文标志着生活里新阶段的开始，它是用粉笔写在黑板上的，带棱角、恶狠狠地爬行着，凡是圆笔道都没写对了，鼓鼓囊囊的那种聚特林字体。实际上，聚特林字体正是如日常标语之类用来写引人注目、简明扼要的话，我虽然没见过，但是据我猜想，还有一些文件证书也是用聚特林字体写的。我想到的有体育证书、牛痘卡和手写的死刑判决书。聚特林字体我能凭直观去猜想。不会念，我当时就觉得黑板上那句话开头的字母 M 像一个散发着麻绳味儿的双套结，不怀好意地提醒我注意绞刑架。我倒是愿意不这样去胡乱猜测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念，请不要以为我一见施波伦豪威尔小姐就以高屋建瓴之势大造其反并不是我已经学会了字母，击鼓抗议，唱碎玻璃。我深知自己缺乏学校里最基础的知识，只凭直观去猜测聚特林字体是远远不够的。只可惜我讨厌施波伦豪威尔小姐那套灌输知识的方法。

所以，在我离开佩斯塔洛齐学校时并没有打定主意要让我的入学第一天成为我在校的末日。学校不能去了，我们只得回家去，我一点没有这类念头。我在摄影师把我永远拍进底版里去的当口就想：你站在写着或许有意义、可能预兆不祥的句子下面的黑板前面。你可以根据字形笔体来猜测，唤起许多例如单人囚禁、监护、看守长以及用一根绳子绞死所有的人等等的联想，但是，你最终也解释不出这个句子的意思。由于你的愚昧无知对着半被浮云遮蔽的天空大喊大叫，你就再也不可能踏进这所用课程表安排时间的学校学大写和小写字母了。

对于我来说，有小写字母足够了。但是，那些自称为成年人

的大人的生存虽说无法一眼望尽，但也不能想象为无边无涯的事实使我推断出，小写字母与大写字母都应存在。他们乐此不疲地用大字和小字的一乘一，用大字本和小字本的《教义问答手册》，证明大写字母和小写字母存在的理由，甚至国宾来访，也要依据佩戴勋章的达官贵人和外交使节到场的人数来确定大小车站。

马策拉特和妈妈在以后的几个月内，都不再为我受教育的问题操心。我妈妈费了很多周折试过一次，最后丢脸出丑，不再想受第二次罪了。他们也像表舅扬那样，每当低头看我时，就连声叹气，搬出我三岁生日那桩旧事来：“是你在去厨房之前下地窖取什锦水果罐头准备饭后小吃时，没关地窖的活板门的，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妈妈对马策拉特的指责可对可错，上文已就此做过交待。但是，他承担了责任，有时还要哭几声，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心肠也不那么狠毒了。然后，妈妈和扬·布朗斯基就安慰他，说我是他们必须背负的十字架，是不明原因但是必须经受的考验，是无法改变的命运。

所以，我不指望这几个受着严重考验、命里注定要背负十字架的人能帮助我。我的脾气非常好，但是笨头笨脑的表舅妈黑德维希·布朗斯基虽然经常带着我以及她两岁的女儿玛尔加一同到斯特芬公园去玩沙箱，可她也当不了我的教师。我也不能指望头脑聪明，脾气暴躁的霍拉茨博士的护士英格，因为无人能顶替她的职位，所以她不会有时间。

白天，我要敲着鼓上下几次五层楼公寓的一百多级楼梯，一级一级地询问有什么办法可想，闻一闻，十九家房客中午吃什么。不过，无论是老海兰德、钟表匠劳布沙德、肥胖的卡特太太，还是我很喜欢的特鲁钦斯基大娘家的门我都不去敲，因为他们都不会成为我未来的教师。

屋顶室住着的养着四只猫，并且老是酗酒的音乐师和小号手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迈恩。他在“青格勒屋顶花园”伴舞，圣诞夜他同另外五名醉鬼高唱众赞曲同严寒搏斗，在积雪的街道上徘徊。有一次，我在屋顶室碰上穿着白衬衣，黑裤子，仰面躺着，没穿鞋的脚在拨弄一只喝空了的杜松子酒瓶，吹着美妙至极的他的小号。他只是转动眼珠，仍吹着他的铜管乐器，向站在他身边的我溜了一眼。他承认我是可以给他击鼓伴奏的人。我的铁皮鼓对于我比他的乐器对于他珍贵得多。我们的二重奏把他的两对猫都赶到屋顶上去了，并且使瓦片也轻微地震动起来。

我在我们奏乐结束，放下乐器后从套头毛线衫下面掏出一张过期的《最新消息报》打开来，蹲在小号手迈恩身边，把这份读物递到他面前，请他教我认大写和小写字母。

可是，迈恩先生一放下小号便迷迷糊糊睡着了。对于他说，只有三件东西是精神寄托：小号、杜松子酒和睡眠。虽然我们在他进堂卫军骑兵乐队当乐师并从此戒了几年酒之前经常事先不用彩排就在屋顶室给瓦片、烟囱、猫和鸽子演二重奏，但是他终究不能成为我的教师。

我也曾多次走访斜对面的地窖菜铺，试着找过蔬菜商格雷夫。我因为他不喜欢听鼓声，也就没带着我的鼓。看来进行基础学习的条件是有的：在一套两间的住房里，在柜台上下，在店铺里，甚至在比较干燥的土豆窖里，遍布着书，冒险故事书，歌本，《天使似的漫游者》，维歇特的《简朴的生活》，《达夫尼斯和赫洛亚》，关于艺术家的专论，瓦尔特·弗莱克斯的著作，一打打的体育杂志，还有上面满是半裸的男孩的图片集，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大多数是在沙丘之间，显示出抹油的、发亮的肌肉追球。

当时，计量局的检查员查出格雷夫的砝码和磅秤有点问题。被人议论为他搞欺骗活动的。格雷夫只得付了一笔罚金，买了新的砝码。他忧心重重，极其烦恼，只有他的书本还有和童子军一起开晚会或者周末远足他才能感到一点快乐。

我走进店铺，他没有注意到，仍继续低头写价格牌。我趁他写价格牌这个好机会，拿起三四张空白卡片和一支红铅笔，摆出热心好学的样子，想用他写好的价格牌当字帖，学写聚特林字体，而且通过这种方法让他来注意我。

我在他眼里，个子显然太小了，眼睛不够大，还缺少那种煞白的脸色。于是，我放下红铅笔，挑出一本里面都是能引格雷夫注目的男孩裸体照片的旧书。我敢断定对格雷夫来说，这些弯曲着或者伸展着肢体的男孩，他是绝对需要的。因此，我斜端着书，让他也能看到这些照片，再次引起他的注意。这个蔬菜商在没有顾客登门来买红菜头时总是聚精会神地涂写他的价格牌，以至于我得飞快地翻页或者敲打书的硬封面，弄出一些声音来，让他抬起埋在价格牌堆里的脑袋，留意一下我这个文盲。

简言之，格雷夫不理解我的意思。如果下午总有两三个小队长在他店里，他根本也不会注意到我。要是他独自一人在那里，他就会发神经似的跳起来，由于被打扰而气愤，板起面孔下令道：“把书放下，奥斯卡！你会把书弄坏的。你又看不懂。你真笨，人又太小。这本书值六个多盾呢！这儿有的是土豆和卷心菜让你玩！”

他边说边把书从我手里拿走，脸上毫无表情，翻了一通，让我单独站在抱子甘蓝、皱叶甘蓝、卷心菜和红甘蓝中间，真是形影相吊，因为我没有把鼓带在身边。

我在遭到蔬菜商拒斥之后，总要到他们夫妻的卧室里去，虽然还有格雷夫太太在，不过莉娜·格雷夫太太那时候像生病的样子卧床不起已有好几个星期，身上发出穿烂了的睡衣的恶臭。她有什么就拿什么，就是不碰可以教给我点东西的书本。

我在此后一段时间里，看到与我同龄的孩子身上挎着旁边晃荡着的、神气活现的擦石板用的海绵和小抹布的书包时，心里总有一些嫉妒。即使这样，我回想不起来自己当时曾有过这些念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头，例如：奥斯卡，这可是你自己酿成的后果啊！学校的那一套应该你逆来顺受才是啊！你不该结下施波伦豪威尔小姐这么一个死冤家啊！野小子们都已经学会了在大写字母和小写字母，可是看看你？手里拿着《最新消息报》还不知道哪一头该朝上哩！

嫉妒是有那么一点儿，仅此而已。闻学校的那股气味，一回就够我恶心一辈子了。您可曾闻过用来擦那种漆皮已经剥落的黄框石板的、一半被啃碎了的、没有洗干净的海绵或小抹布的味道？它含有学生所用最便宜的皮书包里练字本，算术本的臭味，还有写起来吱吱响、有时打滑、有时夹住、沾过唾沫的石笔上的手汗味。放学回家的学生有时候把书包搭在我的近旁，去踢足球或者玩掷球游戏，我便弯腰闻一闻正在阳光下蒸发的这种海绵。我不禁想到，如果确实存在着魔鬼撒旦的话，他的胳肢窝底下肯定是这么一股酸臭味。

所以，使用海绵和石板的学校根本不合我的口味。但是，我并不想说，不久就要教育我的那个格蕾欣·舍夫勒，是适合我的胃口的。

我见了小锤路舍夫勒面包房后面的寓所里的一切，就要发火。绣有盾形纹章的垫子，装饰性的小台布，潜伏在沙发角上的克特-克鲁泽设计的玩偶，到处都是的长毛绒做的动物，呼喊大象的瓷器，举目便是的旅行纪念品，刚开了头的编织物：用毛线针打的、用钩针织的、结扣的、用手编的、花边、刺绣、像耗子牙似的镶边，真是各种各样。这个地方温馨典雅，惹人喜爱，但空间太小，令人透不过气来。冬天炉火太旺，室温过高，夏天开出许多毒气熏人的花来。我左思右想，只有一个解释：格蕾欣·舍夫勒没有儿女，她多么想要孩子好替他们编织啊！谁知道该责备舍夫勒还是责备她自己。她如果有那么一个孩子的话，一定会把他包裹起来，包上用钩针编织的毯子，镶上花边、珠子，而且用十字针绣上一个小小的亲吻。

我到这里来学习大写和小写字母。我把毁玻璃的嗓子留在家里了。费了好大的周折才避免损坏瓷器和旅行纪念品。当格雷欣认为我敲鼓已经敲够了，微笑着露出马齿和大金牙把我的鼓从膝上拿走，放到玩具狗熊中间去时，我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忍了。

我把两个克特－克鲁泽设计两个小乖乖搂在怀里交朋友，拨弄着这两位始终露出吃惊目光的贵夫人的睫毛，同她们俩相爱。我假装对玩偶钟情想以此来讨好格蕾欣两针平针、两针倒针编织成的心。

我的办法非常好。格蕾欣第二次登门，就把她的心打开了，或者说，像拆长筒袜一样，把整根极长的、髻曲的、好几处已经打上结的线拆开了给我看。她打开了全部的柜子、箱子和小盒子，把所有钉珠子的废物展示给我看，整摞的儿童围嘴，儿童上装，儿童裤子，正好够五岁大小的孩子穿戴，她全拿出来举在我眼前，给我穿上，又脱下来。接着，她给我看舍夫勒在军人协会荣获的神枪手奖章；之后，她给我看其中有一部分同我家的完全一样的照片；最后，她又去拿小孩衣服和一些逗孩子的小玩意儿，结果找出几本书来。我已算计到她会从小孩衣服底下找出书来，我听见她同妈妈谈论书籍，她们两人还在订婚前以及后来差不多同时年纪轻轻就结婚的时候，便怎样倾心于交换书籍，从电影院旁边的流通出借图书馆借书，家里的读物五花八门，使面包房和殖民地商品店的婚姻增添光彩，让这两对夫妇大饱眼福。

格蕾欣能向我提供的书非常少。自从她埋头编织以来，就不再读书，并同由于扬·布朗斯基的缘故，也不再读书的妈妈一样，把她们两个加入已有年头的读书俱乐部的很多精装本集子转给还在读书的人，因为那些人既不编织，也不是扬·布朗斯基。

破旧的书因其破旧而显得神圣。我在这里找到的书，内容芜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杂，大部分无疑是格蕾欣的哥哥已死在一艘荷兰出海渔船上的水手泰奥书籍里的货色。他的遗物有七八卷克勒的《船队年鉴》，所载船舶都是早已沉没了的，《帝国海军军阶》，《保罗·贝内克，海上英雄》——这些当然都不是格蕾欣的所渴求的心灵食粮。埃里希·凯泽的《但泽城历史》和那本记录那几场大战是一个名叫费利克斯·达恩的人，在托蒂拉和贝利萨、泰雅和纳赛斯的帮助下打的罗马之战，在常常出海的泰奥手里，已被磨得没有了光泽，掉了书脊。据我判断，属于格蕾欣的藏书的是本关于借方与贷方的书，一本歌德的谈关于亲合力的书，以及篇幅极大、有丰富插图的《拉斯普庭和女人们》。

因为可供我选择的书太少，无法立刻决定，犹豫好长时间，才先抓了写拉斯普庭的那本，后抓了歌德的那本。我不明确自己抓的是什，只是听从我所熟悉的内心的声音。

这两个人一下子被我选中了，这件事确定和影响了最起码是我妄自抛开了我的鼓时所过的生活。直到今天我由于对知识的渴求，已经逐步地把疗养院图书室的书籍都浏览了一遍，我对席勒之流嗤之以鼻，而摇摆在拉斯普庭与歌德之间，在万事通与祈祷治病术士之间，在愿意被女人迷惑的、光明的诗国王侯与黑暗的、用符咒迷惑女人的术士之间。我曾经把自己看作是拉斯普庭那一党的，并且害怕歌德的不容异见，那是因为我几分不解：如果我的生活和擂鼓在歌德那个时代，他或许会认为你是违反自然的，会宣判你是违反自然的体现者。他会用甜得发腻的蜜饯喂他的自然和他的顺应自然的东西，却拿起他的《浮士德》，要不然就拿起《颜色学》这本厚书来，把你这个可怜的糊涂虫置之死地而后生。

再来谈拉斯普庭吧！他在格蕾欣·舍夫勒的协助下，教我对女人要温柔体贴，教给了我大写和小写字母，并且，每当歌德使我受委屈时，他就安慰我。

一边装成无知愚人，一边学习读书，这还有些难度。我觉得这比我长期以来模仿小孩尿床要难得多。尿床无非是天天早晨证明我生理上的本来完全不需要这样的一种失调。装傻充愣，要我掩藏自己飞速的进步，不断地同正在露头的智力上的自负作斗争。大人们说我是尿床的孩子，我可以忍受，心里若无其事，可是，我只能年复一年地在他们面前装傻充愣，这却使我和我的女教师感到委屈。

格蕾欣一见我从小孩衣服堆里把书籍翻出来，就兴奋得大声欢呼，并马上意识到自己负有当教师的天职。我成功地使这个没有孩子的女人从被毛线缠住了身的毛线中解脱出来，还使她几乎感到幸福。假如我选择《贷方与借方》当作课本，她会更加高兴的；但是我坚持要选拉斯普庭。她买了一本规矩的《识字入门》来给我上第二课，我却还是要拉斯普庭。在她反复带诸如《长鼻子矮人》、《大拇指》之类的神话和童话故事给我时，我最后必须决定出声讲话了。“拉普平！”我嚷道，或者换成“拉舒兴！”有时我让他们听到我装得非常愚笨，咿呀学语，“拉苏！拉苏！”地说个没完，这样一来，格蕾欣一方面懂得我喜欢那一种课本，另一方面又蒙在鼓里，我选择字母的天才还没被她发现。

我按部就班，学得很快。一年以后，我觉得自己仿佛置身于彼得堡，住在所有俄国人的专制君主的私寓里，往来于教区牧师和阴谋家之间进出，体弱多病的皇太子的保育室，尤其是成为拉斯普庭的神秘仪式的目击者。因为这里有一个人物作为中心。这种情调非常合我心意。散见书中的、当时的人所作的铜版画也说明了这一点。画的正中是拉斯普庭，煤炭般乌黑的眼珠，络腮胡子，四周是夫人们，只穿黑色长统袜，余下一丝不挂。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的，是拉斯普庭之死。人家给他吃已下了毒药的大蛋糕，而且给他喝下了有毒的葡萄酒，他吃完，却还要蛋糕，于是人家便向他射击，射入他胸膛里的铅弹却使他有了跳舞的欲望，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于是人家又把他捆起来，扔进涅瓦河的一个冰窟窿里。所有这一切，都是男性军官们一手操办的。大都会圣彼得堡的夫人们，对他有求必应。从来不可能给她们的小父亲拉斯普庭有毒的蛋糕吃，女人们信任他，而军官们除掉他是为了能重新相信他们自己。

很奇怪的是对这个身体健壮的祈祷治病术士的生平和死亡竟然不止我一个人感兴趣。格蕾欣又在重温她结婚之初读书时的欢乐。她这时会浑身无力地高声朗读；她一读到“神秘仪式”，就会颤抖着异常的叹息声吐出这个具有魔力的词来；她在念“神秘仪式”这个词时，简直准备去参加了，但是她仍想象不出神秘仪式到底是什么。

事情就变糟在我妈妈一同到小锤路面包房楼上的住房来旁听我上课时。有几回，给我上课的事都被她抛到九霄云外了，上课竟变成了像是专为自己举行神秘仪式。每念三句，便响起一阵二声部笑得嘴唇干裂的格格傻笑，这两个已婚妇女在拉斯普庭的魔力驱使下，越凑越近，在沙发垫上再也坐不安稳，腿压着腿，开始的傻笑最后变成叹息。读了十二页关于拉斯普庭的书，所产生的效果可能是她们在日落之前根本没有想象和期待过、但又愿意此时就接受的，对此，拉斯普庭绝对不会提出异议，而且他甚至永远会免费供给的。

最后，这两个女人一边窘迫万状，理着乱蓬蓬的头发一边“主啊，主啊”地念着。这时，妈妈说出了她的担心：“小奥斯卡当真一点也不明白吗？”“别傻了，”格蕾欣解除她的疑虑说，“我费了那么大的劲，也不知他学没学，我看，读书他是永远也学不会了。”

她为了证明我的无知状态已无法变更，还补充说：“阿格内斯，你想想，他把我们的拉斯普庭撕了那么多页，攒成纸团，后来就不知道他弄到哪里去了。有时我真不愿教他了。可是，当我

看到他一见书本就那么高兴，我就彻底放弃了这些念头。我已经同阿列克斯说了，让他在圣诞夜送一本新的拉斯普庭给我们。”就这样，我逐渐成功地在比格蕾欣·舍夫勒教我读书的年头比这要短一些的三四年之内把拉斯普庭这本书撕下了一半以上，装出任性的样子，事实上却是小心翼翼地把书页揉成团，藏在毛衣里，把它带回家。到家后，在我藏身的角落里不受任何女人的干扰取出纸团，铺平，理成一摞，自己偷偷地阅读。对歌德那本书，我用类似的办法。每隔三课，我就叫嚷着“多特”，要求格蕾欣给我念。我不久就明白，每一个拉斯普庭在这个世界上都有一个歌德作为对立面，每个拉斯普庭后面拽着一个歌德，或者说，每个歌德后面拽着一个拉斯普庭，如果有必要，还要创造一个拉斯普庭来，以便接着可以对他进行谴责。所以，我不愿只信赖拉斯普庭一个人。

我拿着没有装订的书，蹲在自行车驾后面海兰德老先生的货棚里或者屋顶室，把《亲合力》和《拉斯普庭》的散页像洗牌似的混在一起，合成了一本新书。我微笑着读着，越读越吃惊，奥蒂莉端庄地挽着拉斯普庭的胳膊在中部德国的花园里散步，而歌德则在寒冬的彼得堡市内同某个名叫奥尔加的放荡的女贵族坐在雪橇上，参加完一个神秘仪式，又驶去参加另一个。

让我们回到小锤路我的教室里来。虽然我表面上看来停止不前，我却让格蕾欣得到了少女般的欢乐。她在我身旁，在那个俄国祈祷治病术士看不见的、多毛的、做着祝福手势的手底下，她把她新获得的洋溢着青春的生命力分给了室内盆栽菩提和仙人掌。如果舍夫勒在这几年里，有时把手指从面团里抽出来，把面包房的小圆面包换成另一种小圆面包，如果格蕾欣愿意被他揉、捏并抹上鸡蛋清，再加烘烤的话，最后也许有一个婴儿会被烤出来。要是给格蕾欣这种乐趣，那该多好啊！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她在万分冲动地读了《拉斯普庭》之后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头发略微有点蓬乱，两眼炯炯有神，启动马齿和金牙，但又没有东西可咬。心里想的是陈年的发酵剂。口里念着“主啊，主啊”，因为妈妈有她的扬，无法给予格蕾欣什么帮助，因此，要不是格蕾欣有一颗如此快活的心在我的课上完这一部分之后的几分钟，可能会不欢而散的。

她马上跳起来走进厨房去，像是捧着一个情人似的，拿着咖啡豆磨具回来，歌唱着把咖啡磨成粉末。在我妈妈的伴唱下，她忧郁而充满感情地唱着《黑眼睛》或《红衣裳》，她带着黑眼睛走进厨房烧水，水在煤气上烧着的时候，她又跑到楼下的面包房去，常常不管舍夫勒的反对，取来刚出炉的和早已烤好的糕点，把奶油罐、描花杯子、蛋糕叉和糖钵摆到小桌子上，当中还散放着几朵蝴蝶花，随后倒咖啡，接着唱起《皇太子》里的曲调，端上小蛋糕和圆蛋糕，“伏尔加岸边一士兵”，伴着撒杏仁粒的法兰克福圆蛋糕，“多少小天使在你身边”，酥皮甜饼加搅结奶油，“多甜蜜，多甜蜜”，她们咀嚼着谈起拉斯普庭来了，不过现在保持必要的距离谈得比较正经，然后，在尝遍了蛋糕之后，便接着大骂沙皇时代怎样腐化堕落到了极点，义愤填膺之情毫不掺假，发自内心。

在那段时间里，蛋糕我可是吃得不少。从照片上可以看到，虽然我没有因此而长高，却吃胖了，身材不匀称了。在小锤路上完课，吃腻了甜食以后，回到我家那间拉贝斯路的店铺，我经常没有别的什么办法可想，只好乘马策拉特不注意时，便溜到柜台后边，用线拴一块干面包，吊到腌鲱鱼的挪威小桶中，等面包吸足了盐卤才吊出来。您绝对想像不到，蛋糕吃过头以后，这样的一块点心能够发挥催吐剂的功效。奥斯卡经常把舍夫勒面包房的蛋糕吐在我家的马桶里，少说每次吐出的蛋糕也值一个多但泽盾，在当时，这可值好多钱呢！

我用另外一种方法来支付格蕾欣教课的报酬。她是那么喜欢

缝制和编织儿童衣物，我就给她裁缝试衣用的假人，试穿试戴各种式样、各种颜色、各种质料的小罩衫、小帽子、小裤子和带兜帽或不带兜帽的小大衣。

我不知道是妈妈还是格蕾欣，在我八岁生日那天，将我打扮成了该枪毙的沙皇的小太子。当时，这两个女人对拉斯普庭的崇拜到了五体投地的地步。在那天拍的一张照片上，一个生日蛋糕上插着八支不滴油的蜡烛，穿着编织的俄罗斯罩衫，我歪戴着哥萨克帽站在一旁，两条子弹带交叉在胸前，下面穿着白色灯笼裤，脚穿低统皮靴。首先庆幸的事是我的鼓照进了相片。再一件幸运事是格蕾欣·舍夫勒——也许是在我的强烈要求下——给我剪裁、缝制了一套衣服，十足的毕德迈耶尔和极富亲合力风格。今天，在我的影集上，这套衣服还召来歌德的亡灵，证实我有两个灵魂，让我有可能身背一面鼓，同时出现在彼得堡和魏玛的尘世的作为贵夫人的母亲们中间，加入她们一起参加神秘仪式。

塔楼歌声的远程效果

几乎每天女医生霍恩施泰特博士都到我的病房中来，并待上一支烟的时间。本该是她给我治疗的，但每次她经我治疗之后离去时，就不再像来时那样神经兮兮了。她羞怯，原本只习惯于和她的香烟打交道。她老是说：我年轻时同别人接触太少，同别的孩子玩得太少。

的确，讲到别的孩子，她也许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当时我忙于跟格蕾欣·舍夫勒上课，被人在歌德和拉斯普庭之间拽来拽去，所以，即使我有这个雅兴，也没有时间去跳圆圈舞和玩“数数歌谣”的游戏。每当我像某位学者那样读厌了群书，甚至咒骂书本是埋葬语言的坟墓，于是走出书斋，去接近普通人时，我便和我们这幢公寓的顽童们遭遇，在如果同那些食人者稍有接触之后，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能够毫发无损、完完整整地回来读书，我就拍手称快了。

要离开父母的住处我可以有几种走法：一是从店铺出门到拉贝斯路；二是从房子的门出去到楼梯井，如果上街便是向左一拐；如果上楼，爬四道楼梯，便到了音乐家迈恩吹小号的屋顶室；再就是从楼梯井到公寓的院子里去。街道是石子铺成的。在院子里夯实的沙土地上，家兔在繁殖，或者有人在拍地毯。在屋顶室，除了和醉醺醺的迈恩先生演二重奏之外，还能近眺远望，给人以心旷神怡却又是虚假欺人的自由感。这也正是每个登上塔楼的人所追寻的，并且让每个住阁楼的人都沉湎于其中。

院子对于奥斯卡来说是个十分危险的地方，但屋顶室却使他感到安全，直到阿克塞尔·米施克和那一伙小赤佬把他从那里赶走为止。院子横里和公寓一样宽，再往里七步远就到了尽头，隔一道上架铁丝网、涂柏油的木栅栏与其他三个院子相接。从屋顶室俯视，这个迷宫能够尽收眼底：拉贝斯路，左右两条横街——赫尔塔街和路易森街，还有马利街，与拉贝斯路遥遥相对，围成一个大四方形，当中有房屋和院子，还有一片咳嗽糖厂和很多失修倒塌的修配车间。在这家或那家院子里，冒出几棵树或几丛灌木，通过它们人们知道了季节的变换。院子大小不一，但都养着兔子，放着用来拍地毯的架子。兔子一年到头都在那里的，拍地毯则依据住房章程的规定，只能在星期二和星期五。在这两天里，可以看清这个大四方块到底有多大。我从屋顶室听着，看着：普通地毯、甬道地毯和床前地毯超过一百条，先用泡菜擦，再刷和拍打，使它们显现出原来编织的图案。一百多个家庭主妇，从屋里把尸首似的地毯拖出来，举起赤裸的、滚圆的胳膊，为了保护头发和发型扎上头巾，再把地毯扔到专为拍地毯用的木架子上，抓起编织好的地毯拍子，干干巴巴的拍打声炸响了狭小院子。

我憎恶这种单调的清洁赞歌，使用鼓声来同这种噪声抗衡。

可是，尽管他站在屋顶室同这噪声隔开一段距离，但仍不敌这些家庭主妇，只好甘拜下风。一百多个拍地毯的妇女，可以攻占天空，能够折断乳燕的翅膀，并且几下子就能震塌我在四月的天空中用鼓声建造的小小神殿。

我们公寓的孩子们要是不拍地毯就把拍地毯的木架子当杠子玩，我很少到院子中去。只有海兰德老先生搭在院子里的货棚，我还感觉比较安全，因为这个老头儿只允许我一个人走进他堆破烂的棚屋，那里面有残缺不全的自行车、生锈的缝纫机、螺旋式虎钳、一排排的瓶子和装在雪茄烟盒子里的、弄弯又敲直的钉子，甚至都不让其他孩子看一眼。他的工作是这样的：倘若他上午不从板条箱上起钉子就把已经起出来的钉子在铁砧上敲直。他除了收废钉子外，还帮人搬家，在节前替人宰兔，院子里、屋顶室、楼梯井，遍地都是他吐的嚼烟汁。

有一次，孩子们在他的棚屋不远的地方煮汤，这是孩子们的游戏，努希·艾克请老海兰德往汤汁中吐三口。老头儿从嗓子眼里清出三口痰吐去，立刻又钻进他的棚屋，接着敲他的钉子。这时，阿克塞尔·米施克又在汤里加了一种配料，一块敲碎的砖头。我远远地站在一边，好奇地瞧着这种烹调法。阿克塞尔·米施克和哈里·施拉格尔为了不让大人们看到他们的汤用毯子和破布搭了一个帐篷似的东西。把砖头粉煮开以后，小汉斯·科林从口袋里掏出两只股份池塘旁边抓到的活青蛙，现在捐献出来做汤。苏西·卡特是帐篷里惟一的女孩子。她看到这两只青蛙，既不唱也不叫，甚至来不及做最后地挣扎便在汤里一命呜呼了，于是她嘬起嘴，表示又失望又辛酸。努希·艾克领头，一点也不顾忌旁边的苏西，解开裤子就往这大锅菜里撒尿。阿克塞尔、哈里和小汉斯·科林也跟着撒。小矮个儿要给这些十岁的孩子点厉害，可是撒不出来。于是，他们都看着苏西，阿克塞尔·米施克递给她一个天蓝色的搪瓷罐，罐口已经磕坏。我本来想立刻走开的。但是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他还等在那里，直至苏西蹲下来——她裙子下面什么也没穿，抱住膝盖，把罐子挪到底下，面无表情地望着前方，随后皱了皱鼻子，此时，罐子发出声响，苏西为这锅汤作出了一点贡献。

我不该在这时跑开的，如果悄悄地走掉就好了。他们原本都盯着那只罐子，我这一跑，他们都抬起头来看我。我听见苏西·卡特在我背后说道：“他为什么要跑？他准是要去揭发我们！”当我跌跌撞撞地爬上四道楼梯，到了屋顶室刚缓过气来的时候，我还感觉这声音在刺我。

当时我七岁半。小矮个儿刚满八岁，苏西大概九岁。阿克塞尔、小汉斯、努希和哈里十岁或者十一岁。还有比我大一点的，但是从来不在院子里玩，而是在特鲁钦斯基大娘的厨房里玩布娃娃，或者跟着她那在新教幼儿园帮忙的大姐姐古丝特的玛丽亚·特鲁钦斯基。

今天如果我还不能听这种声音，听女人往盆里尿尿的声音，难道这有什么奇怪吗？当时，我到了屋顶室，轻敲着鼓来平息自己耳朵里的余音。他刚刚感到自己远离了楼下滚开的汤，却不料这一伙为这一锅汤贡献过佐料的家伙，有的穿着系带鞋，有的光着脚，竟都上楼来了，努希还端着那锅汤。他们把我团团围住。最后上来的是小矮个儿。他们互相碰碰，喁喁地说：“动手！”最后，阿克塞尔把我从背后一把抱住，用胳膊夹紧，让他乖乖顺从。别人动手时，苏西不说话，只是笑，露出了湿的、整齐的牙齿和齿间的舌头。她接过努希手里的匙子，把这铁皮东西在她的大腿上擦得锃锃发亮，随后伸进冒热气的汤里，顶着糊状物慢慢搅拌，就像一个能干的主妇。她舀了一匙，把它吹凉，然后来喂我，硬灌进我的嘴里。这滋味我以后再也没有尝过，因此那滋味永远留在我嘴里。

努希已感到锅里的东西非常恶心，在那几个对我的身体健康过分操心的家伙走了以后，我这才爬到晾衣间的一个角落里（当

时那里只挂着几条床单)，吐出了几匙淡红色的浑汤，在吐出的东西里没有发现青蛙的残骸。我爬到打开着的屋顶窗户下的一只箱子上，望着远处的院子，用牙齿将碎砖头碴咬得嘎嘎响，觉得自己急切需要行动，瞧着远处玛利亚街上房屋的窗户，玻璃在闪闪发光，然后冲着那个方向歌唱、喊叫，虽然看不到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但是我确信我的歌声有可能产生远程效果。因此从那时起，我觉得这家公寓的院子和其他的院子都过于狭窄，饥渴地向往距离、空间和全景，利用所有机会，独自一人或者挽着妈妈的手走出拉贝斯路，走出近郊，以免我们这个狭小院子里做汤的厨子们再来跟我纠缠不清。

每到星期四，妈妈都进城买东西。多半她带我一起去。遇到需要去煤市旁军火库巷西吉斯蒙德·马库斯那儿买一面新鼓的时候，她总会带着我。在我七周岁到十周岁那段时间，我两个星期就敲坏一面鼓。到了十到十四周岁，我用不了一个星期就敲坏一面鼓。后来就难说了，我可以在一天之内把一面新买的鼓变成一堆废铁，而当我心情稳定的时候，我可以敲上三四个月，鼓面连一个小窟窿也没有，最多掉下几块漆皮，因为虽然我也很使劲，但却小心谨慎。

现在先谈谈那段日子：每隔两星期我离开我们那个院子——有敲钉子的老海兰德，那里有拍地毯的木架，还有那帮发明熬浑汤的小赤佬——和我妈妈到西吉斯蒙德·马库斯的玩具店去，从儿童玩的铁皮鼓存货中挑出一面新鼓来。有时，即使我的鼓还勉强可以用，妈妈也带我去。因此，我就整个下午都欣赏这古老城市的五彩缤纷，在那里，有点东西迟早会进博物馆，而且有从这座或那座教堂里不断传来的钟声。

我们要去的地方，通常很有规律，又让人愉快。我们先到莱泽尔、施特恩菲尔德或马赫维茨那里买东西，然后去找马库斯。他一看到我妈妈就给挑选，点头哈腰地说些恭维话，这些已经成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为他的习惯了。无可厚非，他总是对我妈妈献殷勤，不过，就我所知，他只是热烈地捏住我妈妈的手，说它像黄金那样珍贵，再不出声地吻它一下，从没一时冲动做出什么狂热的事情来。只有一次我们去他店里时，他双膝跪地。下面我就要谈这件事。

妈妈遗传了丰满的身躯和强健的体格，还有讨人喜欢的虚荣心和善良的心地。她听任西吉斯蒙德·马库斯的殷勤厚待或多或少是因为他卖给她、实际上是白送给她一些女用丝袜，这类丝织品是他用极低廉的价格批发进来的。至于每隔十四天从柜台上递给我的铁皮鼓，那极低的价格就更不在话下了。

每回去西吉斯蒙德那里，一到四点半，妈妈就会把我留在他的店铺里，请他照顾一下，声称她有件重要的事得赶紧去办。马库斯听后，深深鞠一躬，叫人看了又奇怪又想笑，并满口答应，夸大其词地说，他会保护我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奥斯卡。她尽可以放心去办自己的要事，他的话稍含嘲讽意味，虽不伤人，却让对方听得真切，有时，我妈妈羞红了双颊，让她揣测到马库斯已经摸透了她心底的秘密。

不过，我也知道妈妈所谓急切地去办的重要事情到底是什么。有一段时间，她让我陪她去木匠胡同一处收费低廉的膳宿公寓，把我放在女房东那，自己就上楼去了，一去就是四十五分钟。女房东总是在喝混合酒，一声不响，给我一瓶倒胃口的果汁汽水。我坐着，直到妈妈回来。看不出她有什么异样，朝女房东打一声招呼，女房东只顾喝她的混合酒，头也不抬。妈妈过来搀我的手，却忘了自己热乎乎的手泄露了她的秘密。我们热乎乎地手牵着手来到羊毛织工胡同的魏茨克咖啡馆，妈妈要了一杯穆哈，给我要了一份柠檬冰淇淋，坐着等。没多久，扬·布朗斯基来了，像是碰巧经过这里。他坐在我们的桌旁，也要一杯穆哈，放在冰凉的起镇定作用的大理石桌面上。

在我面前他们讲话毫无顾忌，他们的谈话证实了我早就知道

的事情：妈妈和表舅扬几乎每星期四都在木匠胡同那家膳宿公寓里幽会四十五分钟，扬出钱租了房间。大概是扬表示不要再带我到木匠胡同和魏茨克咖啡馆来。有时他十分害羞，比我妈妈害羞得多，我妈妈认为让我参与他们幽会之后的收场戏也不是不可以的。看来不论当时或是以后，对于这种幽会的合法性她是深信不疑的。

因为扬要求，每星期四下午从四点半到六点我便待在西吉斯蒙德·马库斯那儿。他准许我一个个地瞧他店里的鼓，使用它们，同时敲响很多面鼓——在别处我绝没有这种机会呢——并且默默地观察马库斯那悲伤的狗脸。虽然我不知道他的念头从何而生，却能揣测到他神游何方，他的思想到了木匠胡同，抓那有号码的房间门，像可怜的拉撒路那样，蹲在魏茨克咖啡馆大理石桌面的小桌底下。期待着什么？期待面包屑吗？

妈妈和扬·布朗斯基可是一点面包屑都不剩。每样东西都被他们吃个精光。他们的胃口特别大，从不减弱，甚至大到要咬自己的尾巴。他们忙着呢，最多把钻在桌子下面的马库斯的思想当成一股温柔多情的、纠缠不清的穿堂风。

九月里的一天下午，由于妈妈离开马库斯的店铺时穿一身锈棕色的秋装，我看到马库斯在柜台后面埋头沉思，想入非非，便背着我刚得到的新鼓走出店铺，进了军火库巷。这通道两侧又凉又暗，橱窗林立，都是高级店铺：精美食品铺、珠宝店和书坊。可是，这些肯定值得购买、但我又买不起的陈列品并不能使我乐不思蜀，我穿过这条通道，走到煤市。我走进尘埃蒙蒙的阳光底下，面对军火库的正面。它那灰色的玄武岩墙里镶嵌着大小各异的炮弹头，都是每次围攻但泽时期的产物，这些铁疙瘩能使每一个路人回忆起但泽城的历史。对我而言，这些炮弹头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而且因为我知道，它们不是自愿留在那里的。我知道，但泽城里一位由城建局和文物保护局联合出钱雇用的石工，将过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去几百年间的炮弹头镶到各种式样的教堂、市议会的正面墙里，镶到军火库正面及背面的墙中。

我想到右边的同军火库只隔一条昏暗的窄胡同的市剧院去。我发现圆柱门廊的剧院大门紧锁，七点卖夜场票的票房才开门。这一点我也已经想到了，就考虑往回走，却又敲着鼓，犹豫不决地向左走去，来到塔楼和长巷城门当中。穿过城门，进入长巷，再向左一拐，就是大羊毛织工胡同，但我不敢去那里，因为妈妈和扬·布朗斯基还坐在那儿的咖啡馆中，如果他们还没有坐在那儿的话，那么大概他们在木匠胡同的幽会刚刚结束，或者正在去咖啡馆的路上，正要去喝一杯穆哈提提精神。

电车川流不息，或向城门驶去，或铃声叮当地从城门洞里驶来，吱吱嘎嘎地拐弯进入煤市、木材市场，向火车站那边开去。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越过煤市的电车轨道的。可能是某个成年人，可能是一个警察，搀着我的手，小心谨慎地穿过危险的来往车辆，将我领了过去。

我站在高耸云天、砖墙陡峭的塔楼前，纯属偶然地或者由于一阵无聊，把我的鼓棒插在墙壁和大门的铁框之间。因为不断地有鸽子从墙的凹处和窗户里飞出来，在水落管和凹肚窗上作短暂的停留，旋即俯冲下来，将我的目光吸引开。要沿着正面的墙望到顶是不容易的。

鸽子纷飞，令我恼怒。我收回了让我感到遗憾的目光。为了摆脱恼怒，我认真地将两根鼓棒当成撬棍，门被打开了，我还没有把门完全撞开，就已经进入塔内；已经上了回形楼梯，已经在攀登，总是右脚先迈一级，再把左腿跟上去。到了第一层装有格栅的牢房，他接着绕梯而上，经过刑讯室和里面小心保存、并贴有说明的刑具。这时，他改用左脚先登，右脚随后。他往上继续攀登时，从一个装有格栅的窄窗户里往外瞧了一眼，估计一下墙的厚度，估摸出离地已有多高，惊飞了几只鸽子。在回形楼梯上

又往上爬了一圈后，又看到了那几只鸽子。这时，他又改用先迈右脚，再跟左脚。我换了几次脚之后，终于到了顶上，尽管觉得右脚与左腿一样沉重，但是看来还可以继续作长时间的攀登。可已经到了楼梯的尽头。他顿时领悟到建造塔楼是荒唐的、无用的。

我不知道塔楼过去有多高，现在还有多高，因为经过战争它幸存下来了。也无需请我的护理员布鲁诺找一本关于东德意志哥特式砖头建筑物的参考书来。我想，这个塔楼从底到尖有四十五米以外。

回形楼梯过早地到了尽头，因此我不得不在沿塔顶的环形走廊里站住了。我坐下将腿伸到栏杆柱中间，左手抱住我的鼓，目光贴着右臂抱住的一根柱子向下面的煤市望去，在整个攀登过程中，它与我形影不离。

塔顶林立，钟声四起，古色古香，还始终弥漫着中世纪的气息，这样一幅市容全景，您能够在很多出色的版画上见到，我不想描绘但泽市的鸟瞰图来使您感到厌烦。我也不想浪费时间去写鸽子，尽管总是有人说，鸽子是最值得写的。“和平鸽”这个名称，我听了只觉得荒谬背理。我宁愿把传递和平信息的差使委托给一只苍鹰或是食腐尸的秃鹫，也不愿委托给一只鸽子，因为它是天底下最爱寻衅拌嘴的女房客。我觉得鸽子没有一点意义，海鸥倒还有些意思。总之，塔楼上有鸽子。但只要像样的塔楼上都有鸽子，都是靠那些文物保管员喂养的。

我不是在看鸽子，而是别的，是我走出军火库巷时大门紧闭的市剧院的建筑。这座带圆顶的方箱，活像一个拟古典主义的放大到荒唐程度的咖啡磨具，尽管在那圆顶上只缺一个用来把天天晚上客满的诗神和教育神庙里上演的五幕戏剧，连同演员、提词员、布景、道具和所有的帷幕，统统碾成惨不忍睹的粉末的曲柄。我看了这种建筑十分生气，特别是前厅里两侧为圆柱的窗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户，被抹上越来越多红色的逐渐西沉午后太阳缠住不放。

那时，在散发出甜香味的马库斯的次货店上空，在煤市、电车轨道和从办公室下班回家的职员头顶上大约三十米的高处，高踞于冰凉的妈妈和扬·布朗斯基大理石桌子、两杯穆哈之上，远离我们的公寓、院子、许许多多的院子、弯曲的和敲直的钉子、邻居的孩子和他们的砖头浑汤，迄今为止只有在被人逼得无可奈何时才高喊的我，在不受胁迫的情况下无缘无故地大吼了一声。如果说在我攀登塔楼之前，只有当我的鼓被人抢走时，我那具有渗透力的声音才用来粉碎电灯泡、玻璃和啤酒瓶，那么现在我从塔顶上大声叫喊，则跟我的鼓完全无关。

尽管没有人要夺走奥斯卡的鼓，他却叫喊了。并不是由于哪只鸽子把屎拉在他的鼓上，惹得他高声叫喊。我附近虽有铜片上的绿锈，但不是玻璃；尽管如此，奥斯卡叫喊了。鸽子的眼睛红光闪闪，然而瞅着他并非玻璃的眼珠；尽管如此，他叫喊了。他朝哪儿叫喊？朝着多远的距离？上一回在屋顶室，他尝了砖头粉汤以后，曾漫无目的地朝远处院子的上空大喊过一声。这次，难道他想证明一下嗓子的威力？奥斯卡这次实验的对象——是什么玻璃呢？——因为除了玻璃不能有别的。

不是别的，是那只戏剧性的咖啡磨具的市剧院，它那被落日映照着的窗玻璃吸引了我的新式声音，我在我们的屋顶室首先试验此种声音，并已形成了我个人的惯用手法。我喊了几分钟，发出装有不同弹药的声音，但没有任何效果。接着，我发出了一声近乎无声的声音，这样，我可以怀着喜悦和流露内心情感的骄傲口吻报道：左边门廊的窗户上，有两块玻璃留下了两个黑洞洞的四方形，不再能反射落日的余晖，需要立刻配玻璃。

好像一个现代派画家，效果已被证实，我画了一系列自己那种个人惯用手法的习作，它们同样大胆，同样了不起，同样的有价值，通常是同一模式的。我将它们拿出来敬献给惊骇不已的世

人，最后豁然贯通，找到了探索多年的风格，并臻于完美，我就是如此地进入了自己创造性的时期。

我把门廊的全部窗户和一部分门上的玻璃在一刻钟内全都干掉了。剧院前面聚集了很多，他们显得燥动不安。何时何地都有看热闹的人。所以，对于我的艺术的观赏者们，我并不十分在意。他们最多使我在从事自己的艺术工作时更加严格，更讲究形式上的炉火纯青。我打算通过没有了玻璃的门廊，穿过一扇包厢门的钥匙孔，往现在还漆黑一团的剧场里送入一声特殊的叫喊，给订长票的看客们的傲气以猛烈的一击，即剧场里那盏枝形吊灯和所有反光的、磨光的、折光的碎细物儿。这时，我见到剧院前人群中有一套锈棕色服装：妈妈品尝完了穆哈，离开了扬·布朗斯基。从魏茨克咖啡馆回来了。

我仍然朝枝形吊灯送去了一声叫喊。但是，看来这一声并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因为第二天的报纸只报道剧院门廊和门上的玻璃因为谜一般的原因震碎了。一连几个星期，日报小品栏里连篇累牍地刊登科学和半科学的调查报告，众说纷纭，荒谬绝伦，想入非非。《最新消息报》解释是宇宙射线，而天文台的人，即那些高水平的脑力劳动者，则谈到了太阳黑子。

那时，我尽最大努力屏住呼吸下了塔楼的回形楼梯向剧院门口的人群中挤过去。妈妈的锈棕色秋装已不知哪里去了，她准是到马库斯的店里去了，也许把我的声音所造成的灾祸告诉了他。在我想来，马库斯听我母亲讲了我的所谓不长个以及我的钻石声音后，一定是搓着他那双白里泛黄的手，摇晃着吐出的舌尖，把这些当作理所当然的事全盘接受了。

我进店门后看到了一幅使我立即将刚刚远程摧毁玻璃取得的成功全部忘却的景象。西吉斯蒙德·马库斯跪在我妈妈面前，而狗熊、狗、猴子、眼睛会合上又张开的布娃娃、救火车、摇动木马以及全体守卫他的店铺的木偶，好像正要随他一齐跪倒在地。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他哭泣着，用他手背上有毛茸茸的浅棕色斑点的双手握紧我妈妈的双手。

我妈妈严肃地看着他，由于这种场面，注意力也很集中。“别这样，马库斯。”她说，“马库斯，求求你，不要在店里这么干！”

但马库斯并不管这些，他死缠住我母亲，语调夸张地发誓，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说：“您同布朗斯基断了关系吧，他在波兰邮政局里工作，我觉得，这样下去不好，因为他同波兰人搞在一起。您可别押宝押在波兰人身上，您要押宝的话，就押在德国人身上，因为德国人元气正在恢复，迟早要上来的。要是他们始终还没有恢复元气，还没有上来，阿格内斯太太，您就还靠着布朗斯基也不晚呀。您已经靠上马策拉特了，如果您愿意的话。但我新近受了洗礼，我建议您还是选择靠我，跟着我走。阿格内斯太太，要是您肯的话，我们就到伦敦去，我在那儿有朋友，有很多股票债券。我这是真心实意地哀求您跟我走，不要瞧不起我，还有，千万不要再把宝押在波兰人布朗斯基身上了。他疯了，到波兰邮政局去做事。德国人一到，波兰人马上就全完蛋了！”

我妈妈被马库斯讲的那一大堆不该做的和可能发生的事弄得糊里糊涂，马上要哭了。正在这时，马库斯看到了站在门口的我，便伸出了刚刚握着妈妈的手，对我说：“请进来，我们把他也带到伦敦去。他会像一个小王子那样幸福快乐地生活！”

这时妈妈也瞧见了，脸上挂着一些笑容。她开心也许是因为她想起了被我毁掉的市剧院门廊的全部窗户玻璃，或者是要去大都会伦敦的美好前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的是她摇了摇头，就像谢绝别人请她跳舞似的轻描淡写地说：“谢谢您，马库斯，不过，那是不可能的，真的不可能——由于布朗斯基的缘故。”

马库斯像听到了舞台上的提示，一听到我表舅的姓名，一下

子站了起来，一弯腰一鞠躬简直就如一把大折刀，接着说：“请您原谅我马库斯。我一直就是这么想的。由于他的原因，您是不肯答应的。”

军火库巷的店铺的店主提前打烊，把店门从外面关上，陪我们离开向五路车站走去。刚刚由于摧毁玻璃的胜利带来的喜悦，我差不多已经忘了，所以当我看到市剧院门前还站着警察和路人时，一点也不害怕。马库斯弯下身子凑近我，与其说是自言自语，不如说是悄声对我们说：“你真是样样都行，不但能敲鼓，还能使市剧院出足洋相。”

马库斯见到妈妈看到碎玻璃后很慌张，马上摇摇手安慰她。电车来了，我们上了拖车。他生怕被别人听见似的小声重复：“好吧，那您最好还是跟着马策拉特吧，您已经把他弄到手了，不管怎样别把赌注押在那个波兰人身上！”

现在，我无论是在金属床上或坐或躺还是其它姿势仍然会继续敲鼓，探访军火库巷，塔楼本身还有加了油的刑具，塔楼地窖墙上乱涂的字迹，市剧院圆柱后面三扇门廊窗户，再返回到军火库巷，走访西吉斯蒙德·马库斯的店铺，想要追述那个发生在秋日的事情时，他还在寻找波兰。他用他的鼓棒寻找波兰，用全身的器官和灵魂去寻找波兰。

波兰丢失没有，我不清楚，我还在寻找。另一些人说，它不久就要丢失，它又丢失了。它已经丢失了。今天，德国人又在波兰，他们用信贷、莱卡照相机、雷达、罗盘、魔杖、代表团、人文主义、反对党领袖以及蛀坏了的地方团体的服装来寻找波兰。当这里的人们用一半是肖邦，一半是心中的复仇情绪的灵魂寻找波兰的时候，当他们谴责第一次至第四次瓜分波兰，并策划第五次瓜分波兰的时候，当他们搭乘法国航空公司的飞机飞往华沙，并深表遗憾地在过去是隔离区的地方，放上一个小花圈的时候，当他们从这里用导弹寻找波兰的时候，我则用自己的鼓敲出了这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样的声音：寻找波兰，丢失了，还没有丢失，已经又丢失了，丢失给了谁，很快就丢失了，已经丢失了，波兰丢失了，一切都丢失了，波兰还没有丢失。

演讲台

我把市剧院门廊的窗玻璃唱碎后，第一次寻找到了与舞台艺术的联系。尽管那个下午玩具商马库斯大献殷勤，我和剧院间的直接关系还是被妈妈发现了，于是她在接下来的圣诞节期间买了四张戏票：她自己一张，两张给斯特凡·布朗斯基和玛尔加·布朗斯基，另外一张给了我，在基督降临节最后一个星期日，带着我们去看圣诞夜童话剧。我们坐在二楼边上的第一排。我高兴地看到在正厅前座上空吊着枝形的吊灯，喜欢得不得了，暗自庆幸没有把塔楼上把它唱碎。

当时已经有很多孩子。孩子在楼座上是多于母亲的，而在正厅的前座，坐的都是注意节制生育的有钱人，所以孩子和母亲是差不多一样的。那些孩子，一个也不安静地坐在那儿的！玛尔加坐在我和比较守规矩的斯特凡中间。她在座位上滑下爬上，又饶有趣味地跑到楼座的栏杆前做体操，结果被软椅垫和靠背夹得大喊起来，幸好妈妈往她那张傻嘴里填了几块糖，使她的叫声和周围吵闹不堪的孩子相比还让人能忍受，而且时间较短。她一边嚼糖块，同时又反复在软垫上爬上滑下，演一开始，她就因疲倦而睡着了，每一幕演完时，掌声又把她惊醒，接着使劲地鼓掌。

演的是大拇指的童话，从第一幕开始我就被这出非常迎合我的口味的戏深深地吸引了。主角虽然是大拇指，但在舞台上却只闻其声，不见其人，戏里的大人们都和这个不见真形的活跃的主角转，这正是这出戏编排巧妙的地方。大拇指一会儿坐在马的耳朵里，一会儿被他父亲用高价卖给了两个流氓，一会儿在流氓的

草帽檐上一边散步，一边从那上面向下讲话，之后又爬进了一个老鼠洞，钻进一个蜗牛窝，同小偷们一起偷东西，掉进干草堆里，连同干草一起被母牛吞进胃里。他在母牛的肚子里说话，被人听到，结果母牛被人宰了。母牛的胃连同困在里面的它被扔在垃圾堆里，给一只狼吃了。大拇指花言巧语说服了那只狼，把它引到他父亲家的贮藏室里，狼正要开始攫取食物，他便大声喊叫。结尾和童话一样，父亲打死了恶狼，母亲用剪刀绞开这个饭桶的腹腔和胃，把大拇指从里面放了出来。高兴地叫道：“爸爸啊，我在老鼠洞里呆过，在母牛肚皮里、在狼的胃里待过，现在，我回来了。”

我和妈妈都把这出戏里的情节当作自己的经历了，因此我们两个都非常感动，当我抬头时，看到妈妈用手绢捂住了鼻子。在此后的几星期内，妈妈多愁善感，首先是在圣诞节这段日子里，她多次搂着我，叫我大拇指，时而开玩笑地叫着：我的小大拇指哟！时而伤心地叫着：我的可怜、可怜的大拇指啊！

直到一九三三年夏天，我才有机会重新去看戏。事情最后由于我的误解而弄糟了，但直到今天，那雷鸣般的声音还回荡在我耳边，给我的印象十分难忘。事情发生在索波特的林中歌剧院。从此，每个夏夜，瓦格纳的音乐向着大自然倾注。

只有妈妈对歌剧还略感兴趣。马策拉特连轻歌剧都欣赏不了。扬摆出爱好音乐的样子，学着妈妈的样子醉心地大谈其咏叹调，其实他对音乐也一窍不通。不过，他认识掌管湖边小路和疗养院及游乐场门口喷泉的照明设备，又在林中歌剧院演出季节负责舞台灯光的福梅拉兄弟，他们同他一起在卡特豪斯中学读过书，住在索波特。

我们向索波特方向前进，在路过奥利瓦的宫殿花园里度过了一个上午。那里有金鱼和天鹅，妈妈和扬·布朗斯基手挽手待在著名的“窃窃私语”假山洞中，让一位摄影师照相。在拍照时，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马策拉特让我骑在他的肩膀上。我把鼓放在他的头顶上，大家被逗得哈哈大笑。后来这张小照片贴到了照相簿上，看到的人也无不捧腹。再见，金鱼和天鹅，再见，“窃窃私语”假山洞。不仅在宫殿花园里，而且在花园铁栅栏门外，在去格莱特考的电车上，在格莱特考疗养院里，到处是度周末的人群。我们在那里吃午饭。在接下来我们沿着海滨散步林荫道向索波特走去时，又见到许多度周末的游客迎面走来。马策拉特为大家掏钱买了疗养地的入场券，因为看起来波罗的海除了邀请大家去洗澡外实在别无他用。

我们选择了比北浴场人少的南浴场洗澡。男人到男更衣室换衣服，我被妈妈领着到女更衣室一个小间里。她要我光着身子到家庭浴场去亮相，她自己则用干草黄的游泳衣把她像溢过岸的河水般丰满的肉体裹住。我不能这样赤身裸体，让家庭浴场里成千只眼睛都盯着我，便把鼓挡住下身，随后又肚皮朝下趴在海滨沙滩上，尽管海水在招手邀请我，我还是不愿下海，而是像鸵鸟一般用沙土来遮羞。马策拉特，还有扬·布朗斯基，他们的肚皮刚开始积脂肪，那样子很可笑，又很可怜，差不多到了令人同情的程度，因此，到了傍晚之前，又要去更衣室时，我特别高兴。每个人都回到更衣室里往身上被太阳灼伤的地方涂上油膏，然后换回周日的文明服装。

我们在“海星”喝咖啡，吃点心。妈妈在马策拉特反对，扬即同意又反对的情况下要了第三份五层蛋糕，喂了他们两个一人一口，到他们都感到满足，然后自己一口一口地把整块楔形蛋糕吞下去。

啊，神奇的奶油，撒上白糖的由晴转阴的星期日下午！波兰贵族老爷戴着蓝色太阳镜正襟危坐，面前摆着他们碰都不碰的浓果汁汽水，海风把贵族太太们专为休假季节租来的毛皮披肩的防蛀粉吹到我们身边，那些太太们摆弄着染成紫色指甲的手指。马

策拉特认为租毛皮披肩虚荣透顶。妈妈却很想租一件，即使租一个下午也好。扬认为，现在波兰贵族已经无聊透顶，虽然债台高筑，但却说地道的波兰话，而不讲法语，由此可见他们的势利。

我们不可能一直在“海星”咖啡馆看波兰贵族的紫指甲和蓝色太阳镜，而且妈妈吃了很多蛋糕也想活动一下。我们站起来，到疗养地的公园去。他们让我骑在毛驴上，又给我照了一张相。金鱼和天鹅，使淡水显得珍贵。

我们在修剪过的不会沙沙作响的紫杉林中，遇到了掌管游乐场照明和林中歌剧院舞台灯光的福梅拉兄弟。小福梅拉一见面就滔滔不绝地讲他干照明员工作时听来的笑话。大福梅拉对于这些笑话全部知晓，但由于他对小福梅拉的友爱，使得他在必要的时候不失时机地很有诱惑力地咧嘴一笑，露出比他弟弟多一颗的金牙。妈妈宁可喝矿泉水也不和我们一起到喷泉边喝杜松子酒。之后，还不停地从肚子里把笑话往外搬的小福梅拉慷慨地请大家到“鸚鵡”饭店进晚餐。在那里遇见拥有半个索波特和林中歌剧院的一部分地皮和五个电影院的图舍尔。他也是福梅拉兄弟的老板。我们对于彼此的相识都感到很高兴。图舍尔一直在转动着他手指上的一枚戒指，不过，看来这并非神仙戒指或魔法戒指，因为他转了半天也转不出什么名堂来，他用那两三颗金牙把刚刚福梅拉讲过的那些笑话更琐细地重复了一遍。即使这样，全桌的人都露出了笑容，因为这是图舍尔在讲笑话。惟独我一个人板着面孔，在他大卖噱头的时候，我却做出呆板的脸部表情来煞他的风景。唉，听这阵阵突然爆发的都是装出来的笑声，像我们进餐的那个角落里窗上的牛眼形玻璃一样，气氛越来越愉快。图舍尔表示感谢，接着又讲了一则笑话，让人端来“金水”酒，被笑声和“金水”酒弄得飘飘然，然后忽然变换了戒指转动的方向，同时改变了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事。图舍尔请我们大家去林中歌剧院，因为林中歌剧院有一小块地皮是属于他的，遗憾的是他本人因为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有约会而去不了了。不过，我们却喜欢坐他的座位，那是装上软垫的包厢，小孩眼皮开始打架时，还可以睡觉。他掏出银的自动铅笔，用图舍尔的笔迹写了几行字在图舍尔的名片上。因为有了他就等于有了通行证。

只言片语就可以把后来发生的那些事讲完：那是一个温热的夏满，外国人坐满了林中的歌剧院。蚊子在开演前就已经到场了，直到最后一只姗姗来迟自命潇洒的蚊子嗡嗡叫着到来，才真正启幕。演的是《漂泊的荷兰人》。从和这个林中歌剧院同名的森林里驶出一艘船来，说它是海盗的，还不如说是绿林好汉的。水手们开始对着树林歌唱。我睡在了图舍尔的软垫椅上。当我醒来时，水手们还在唱，也许换了一批水手在唱：舵工呀，留神哪……但是，我又睡着了，在昏昏沉沉中为他妈妈而高兴，因为她对荷兰人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好似自己也在海上航行，一呼一吸都符合瓦格纳的真正精神。我妈妈没有发现她的扬和马策拉特都在捂着脸以像锯粗细不同的树干般的声音捂着脸打呼噜，我也是一次又一次地睡去又醒来。末了，我终于醒来，因为这时在林地正中央，一个黄发女人孤单单的站在那里，因为一个照明员喊叫，可能是那个小福梅拉用一架聚光灯照着她，调戏她。“不！”她喊道，“我痛苦哟！”接着又是一声，“谁使我痛苦？”可是，那个使她痛苦的福梅拉却不把聚光灯转向别处。这个孤单单的后来被妈妈称为女高音的女人，由喊叫变为呜咽，时而喷出银光闪闪的唾沫。这声声呜咽虽然使得索波特森林中树上的叶子过早地枯萎，但对福梅拉的聚光灯却什么作用也不起。她的有天赋的声音并没有产生什么实际效果，所以我不得不对准那没有教养的光源挺身而出，发出一声有远程效果的，音高比蚊子的嗡嗡声还低的叫声，把那盏灯毁掉在瞬间。

这造成的短路使林中顿时把火扑灭了，而爆出的火花又点燃了森林，虽然火被扑灭，却让大家一阵混乱。我在乱作一团的人

群中丢了我的鼓。那两个男人被人粗暴地摇醒后也不知和我妈妈去了哪里。这一切都并非我的本意。

这是我第三次同剧院打交道。回家后，妈妈便把瓦格纳歌剧里的歌配上简单的伴奏，在钢琴上弹奏。而且她还产生了带我去见识一下马戏团气氛的念头。到了一九三四年春，这件事确实实现了。

我不想谈那些像道道破空而过银光的荡高秋千的女人、马戏团丛林里的老虎以及灵巧的海豹。没有人从帐篷圆顶上摔下来，也没有驯兽者被咬坏。海豹耍的无非是它们学到的那些玩艺儿：顶彩球，接住别人作为犒赏扔过来的活鲱鱼。在马戏团我度过了非常开心的几个小时，尤其要感谢的，是我认识了站在瓶子上演奏《老虎吉米》并指挥一队矮子的音乐小丑贝布拉，并且同他结交，这是我一生中的一件大事。

我们是在马戏团囚野兽的笼子前相遇的。当时，妈妈和她的两位先生正被身边笼子里的猴子胡闹取笑，而破例同来的黑德维希布朗斯基则和她的两个孩子看矮种马。看完狮子后，我有些困，轻率地与一只猫头鹰起了冲突。我和它互相盯着看，本以为我肯定赢，没想到被它盯得抬不起眼，我耳朵红得发烫，内心受到了伤害，只得垂头丧气地走到可用汽车拖动的蓝白色活动房屋间，在那里，只有几头被拴住的矮种羊。

他当时穿着背带裤和拖鞋，提着一桶水，走过我身旁。我们的目光刚一接触，便都认出了对方。他放下水桶，歪着大脑袋，朝我走来。我目测，我比他矮约九厘米。

“看啊，看啊！刚刚到三岁，这孩子就不愿再长个了。”他怀着妒意用粗粗的声音对我说，但我没有搭理他。“我叫贝布拉，是欧仁亲王的嫡系子孙，路易十四的儿子，可不是他们说的那个萨沃耶人。”我还是保持缄默，他接着说：“我不长个的时候在十岁生日那天，有些晚，但总算是不再长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他的坦诚使我必须自我介绍了，我只告诉他我叫奥斯卡，而并没有把家谱世系告诉他。“请告诉我，亲爱的奥斯卡，您有十四岁或者十五岁了吧！也许十六岁了。什么，才九岁半？这不可能吧！”现在轮到我来猜他的年纪。我故意说得很小。“您真会奉承人，我年轻的朋友。三十五岁，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今年八月，我就要过五十八岁生日了。我可以当您的爷爷！”

我恭维了几句他的小丑技艺，说他音乐才能出众，接着，在虚荣心的驱使下，稍稍露了一手。把马戏场上三个电灯泡弄碎了。贝布拉先生大叫：“太棒了！”他立刻表示要聘请我加入他们的团体。

直至今今天我还有时遗憾的是我拒绝了他。我心中劝自己不要干，并说：“贝布拉先生，不瞒您说，我宁愿私下里磨练我这点微不足道的技艺当观众，而不喜欢去博得别人的掌声，但我总是要为您的表演喝彩的。”贝布拉先生竖起皱皮的食指，劝我说：“亲爱的奥斯卡，请您相信一个有经验的同行。像我们这样的人，必须登台上场表演，必须主持演出，否则就逃脱不了被人摆布的命运，而且我们在观众中是没有容身之地的，那些主演绝对会让我们难堪。”

他的眼睛一下子变得十分苍老，差不多贴到了我的耳边，小声说道：“他们来了！他们将占据节庆场所！他们将举行火炬游行！他们将建造演讲台，坐满演讲台，从演讲台上说教，宣扬我们的毁灭。一定要小心呀，年轻朋友，留神演讲台上将要发生的事情，您千万不要站在演讲台前面，要想尽一切办法坐到演讲台上去！”

这时，有人在喊我的名字，贝布拉先生便拎起水桶。“他们在找您，亲爱的朋友。后会有期。我们矮小的个子不会让我们失之交臂的。我有一句老话：即使在挤得没有插足之地的演讲台上，像我们这样的小人物也会有立足之地的。假如不成，在演讲

台底下也能找到，只是万万不要在演讲台前面，请记住，这是欧仁亲王的嫡系后裔贝布拉的话。”

妈妈喊着我的名字，从一座活动房屋后面转出来，恰好看见贝布拉先生吻完我的额头，后提着水桶，肩膀一扭一歪地走向一座活动房屋。

妈妈事后非常生气地对马策拉特和布朗斯基一家嚷道：“你们想没想过，他跑到矮人堆里去了。一个侏儒吻了他的前额。但愿不会是有什么含意的。”

对我来说，贝布拉亲我的额头，含意非常多。此后几年的政治事件使他的话成为了事实：在演讲台前举行火炬游行和阅兵式的时期开始了。

我采纳了贝布拉先生的劝告，由于西吉斯蒙德·马库斯不仅那天在军火巷向我妈妈进言，而且后来每逢周四又多次向我妈妈提出劝告，我妈妈便部分地采纳了他的劝告。虽说她没有跟马库斯一同赴伦敦，即使迁居，我也不会有特别强烈的反对。然而她仍同马策拉特待在一起，和扬·布朗斯基见面的次数则较少，她只是有时去木匠胡同扬租的房间，或者在我家玩施卡特牌，而扬总是输牌，所以他付出了更高的代价。

妈妈采纳了马库斯的劝告，在马策拉特身上押了与上次同样的赌注。马策拉特呢，他认识到秩序的力量比较早，一九三四年就入了纳粹党，不过并没有因此而扶摇直上，只混上了一个支部领导人。这次提升，同其他不寻常的事情一样，又使他们三人聚在我家玩施卡特牌。马策拉特对于扬·布朗斯基在波兰邮局任职一事再次而且是用较为严厉和忧虑的语调提出劝告。

除了这些，惟一的变化就是钢琴上方格雷夫送的贝多芬像被马策拉特用希特勒像换掉了。对于严肃音乐毫无兴趣的马策拉特，要把这个几乎聋了的音乐家的画像彻底烧掉。可是妈妈却非常喜欢贝多芬钢琴奏鸣曲里的慢乐章，她练过那么两三个，有时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也在琴上拨弄，但速度比规定的要慢得多。她偏要把贝多芬的像挂在碗橱或长沙发上方，使得他与希特勒相对而视，仿佛他们可以彼此看透对方用心，不能相处地很愉快，这种场面让人感到极其阴森可怕。

马策拉特慢慢地把制服挨个地买齐全了。假如我没记错的话，他最先戴上了“党帽”，他总把冲锋帽带勒在下巴底下，哪怕在晴朗的日子里也是一样。有一段时间，他身穿白衬衫，系着黑领带，来配这顶帽子，或者戴着臂章，穿一件皮茄克。再后来，他买了一件褐色衬衫，一星期以后，他又要添置褐色的马裤和皮靴。

虽然在一周之内穿这种制服的机会很多次，但马策拉特只在周日去体育馆旁边的五月草场参加体会时穿一次就非常满意了。他参加这一聚会一向风雨无阻，而且不肯带雨伞。“任务是任务，喝酒是喝酒！”马策拉特说。这句话很快就成了他的口头禅。每星期天早晨，他准备好午餐烤肉，就离开我妈妈，这使我感到特别尴尬，因为扬·布朗斯基可以利用这种新局势，把握住星期天这个马策拉特在队伍里的好时机，挨上平民服装来我家看被遗弃的妈妈。

三十六计走为上。我不想打扰和观察沙发榻上的这两个人。只好悄悄溜走。所以，我穿制服的父亲一出门，在我当时已感到可能是我生父，穿平民制服的扬踏进门之前，我便敲起鼓，离开家门，朝五月草场走去。

莫非一定要去五月草场？这是因为星期天港口码头歇工，我也不会下定决心去森林里散步，而圣心教堂的内景当时对我还没有吸引力。当然还有格雷夫先生的童子军，但是，在童子军集会上那种受压抑的性爱和五月草场上那种喧闹的场面这两者之间，即使您把我当作他们政治上的同路人，我也会选择后者。

在那里讲话的，不是太温和从未引起过我的注意，后来区长

职位被一个巴伐利亚菲尔特名叫福斯特尔的大胆泼赖的人取代的格赖泽尔就是驼背的勒布扎克。勒布扎克的驼背里蕴藏着高度的聪明才智，纳粹党发现了他的这一点，因此量材录用，任命他为区训导主任。在福斯特尔用他仅能掌握的让人作呕的巴伐利亚语大声叫嚣“回归帝国”时，精通专业的勒布扎克则能运用各种但泽方言详加发挥，谈关于博勒曼和武尔苏茨基的笑话，懂得如何同席哈乌的码头工人，奥拉的市民，埃马乌斯、席德利茨、比格尔维森和普劳斯特的市民讲话。他的驼背在他褐色制服的衬托下显得更加突出。在当时，每当这个小矮子对付过分认真的共产党人和答复几个社会党人有气无力的诘问时，都被认为是一种乐趣。

勒布扎克特别聪明，又幽默。每当他从驼背里信手拈来自称驼背勒布扎克时，群众就被他逗乐。他说，他宁肯失去驼背，也不能让共产党上台。显然，他不可能不驼背，因此，假如驼背是正确的，纳粹就没错。因此，“一种思想的理想就是隆肉”这一结论是成立的。

无论格赖泽尔和勒布扎克还是后来的福斯特尔，都是站在小贝布拉先生倍加赞扬的那些演讲台的那个演讲台上向大家讲话的。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把身穿褐色制服、显得非常有天才的站在演讲台上捍卫贝布拉的（也就是我的）事业的驼背勒布扎克看成了贝布拉派来的使者。

演讲台的功能是什么呢？建造演讲台的时候，登台和站在台前的人是不被考虑的。但不管怎样，像体育馆旁五月草场上的演讲台一样，一定要以对称为显著特点。自上而下，六面“ ”字旗一字儿排开。下面是大旗、小旗、锦旗。台底下是一排党卫军，黑制服、冲锋帽，帽带在下巴底下勒着。接着是一排在唱歌和讲演时，用手捏着腰带扣的冲锋队。随后坐着几排一身制服的党员同志。在小讲坛后面，坐着的又是党员同志，一位慈祥的妇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女同盟领袖，穿平民服的市参议院代表，来自德国的宾客，警察局长或他的副手。

演讲台台基前，站着确切地说是使前台显得青春焕发的本地少年队的军号队和本地希特勒青年团的军鼓队的希特勒青年团。在某几次集会时，还有队伍左右对称的混声合唱队，或者喊口号，或者唱深受欢迎的《东风之歌》，据歌词中说，旗帜招展，需借东风，至于其他风向，均不及东风能使旗帜充分展开。

吻过我额头的贝布拉还说过：“奥斯卡，千万不要站在演讲台前。像我们这样的人，应当站在演讲台上！”

我一般能在妇女同盟领袖中间找到一个座位。遗憾的是，这些太太在集会期间出于宣传的目的，总是抚摩我。因为军鼓队不要我的鼓，我只能加入到台基前定音鼓、小鼓和军号的队伍里去。我本想同区训导主任勒布扎克攀谈，但失败了。我发现我彻头彻尾地看错了他。虽然他的隆肉很有增长的趋势，他也还是并非如我所愿地是贝布拉的使者，对我的真正身材大小也一点不了解。

一次星期天集会时，我在演讲台上走到台前，对勒布扎克行了纳粹党的举手礼，先是双眼炯炯有神地望着他，随后眨着眼睛低声向他说：“贝布拉是我们的元首！”勒布扎克并没有恍然大悟，而是像纳粹党妇女同盟的领袖们一样地抚摩我，最后，我被他让人从演讲台上领走，因为他得继续演讲。我被德国女青年团的两个领导人夹在中间。我被追问我父母的情况直至集会结束。

这并没有什么希奇的，我对党的失望早在一九三四年夏天还没有受到勒姆改变影响前就开始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怀疑那有勒布扎克驼背衬托的演讲台正面是不是对称。我先批评那些鼓手和军号手是因为一九三五年八月一个闷热的星期天，我在集会时同演讲台台基前的青年鼓手和军号手进行了一番较量。

为了让马策拉特准时在九点离家出门，我帮他把褐色的皮绑

腿擦亮，即使很早，他在到户外前就已经由于难以忍受的热天气出汗把党衫袖子外面渍成了越来越大的深褐色。九点半正，扬·布朗斯基头戴草帽，身穿透风的浅色夏装，脚登穿孔的浅口便鞋，跨进门来。扬虽然有一会儿在和我玩，但目光却一直落在昨晚刚洗过头发的妈妈身上。我马上发现，待在此地有碍他们两人谈话，不仅妈妈举止僵硬，扬的动作也受拘束。他明显觉得身上那条夏天穿的轻薄裤子太紧了。于是，我跟着并不被我当作榜样的马策拉特的足迹溜走了。我不在大街上走，因为那里挤满了向五月草场蜂拥而去的穿制服的人群。我第一次穿过体育馆旁边的网球场到集会地点去。这样一来，我把演讲台背面的全貌都看见了。

不知您可曾从背面看过演讲台？我想提议让所有的人在他们聚集于演讲台正面之前，先了解一下演讲台背面是什么模样。不论是谁，只要从背面仔细看过演讲台或教堂的祭坛。就会像被护身符保佑一样，永远不会再被演讲台上任何形式的魔术诱惑。

我早已具备了寻根问底的性格，所以并不满足于只看到没有修饰包装，只露出的丑陋的支架，老师贝布拉的话浮现出来。演讲台本来只是供人从正面看的，他却抱着出门必带的鼓，朝它的背面走去，穿过立柱，脑袋被一根凸出的横木撞了一下，膝盖被一枚恶狠狠地穿透木头的钉子划破，头顶上先是党员同志的皮靴咯咯声，随后是妇女同盟成员小皮鞋的擦地声，最后来到了被八月的天气搞得使人闷热难耐的地方。他在台基内部一块胶合板后找到一个既能安稳地享受一次政治集会的音响魅力，又不会被旗帜惹得分心，或者被制服刺伤眼睛的隐身之处。

我蹲在演讲台底下。在我的左、右、上方，双腿叉开站着，眼睛被阳光射得睁不开的少年队年纪较小的鼓手和希特勒青年团年纪较大的鼓手。我还从演讲台木板缝里闻到了摩肩接踵，身穿假日盛装；或步行而来，或搭乘电车的群众的气味；虽然这一来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整个上午就泡汤了，还是有部分人望完早弥撒，感到在那里不再合心意；有的挽着未婚妻，带她来见见世面；有的想在创造历史的时刻亲临现场。

我对自己说，他们绝不能白跑。我把眼睛贴在木板节孔上，发现从兴登堡林阴大道传来了喧闹声。他们来了！乐队队长高喊口令，挥动指挥棒，队员们把军号高高举起，嘴唇对准吹口，用极为糟糕的军乐吹奏技法，吹响了他们擦得锃亮的铜管乐器，使我听了悲痛得自言自语地说道：“可怜的冲锋队员布兰德和希特勒青年团员克韦克斯啊！你们的倒下没有意义啊！”

马上，他们好像要用于小牛皮蒙的鼓上敲出的密集的咚咚的声音来证实我为运动牺牲者发出的这道讣告。我从人群中央留出的通道望出，隐隐约约见到穿制服的人们向演讲台走来。于是，我大声喊道：“现在，注意了，我的人民！”

我把鼓放端正，两手放松，他拿着鼓棒，柔软的手腕，灵巧地敲出了让人联想起维也纳和多瑙河的欢快的圆舞曲节奏。我越敲越响的鼓声，先把第一和第二小鼓手吸引到我的圆舞曲上来，又让年纪大一点的定音鼓手也灵巧程度不一地跟着我给的节奏敲起来。其中当然也有死脑筋的，他们没有一点审音力，继续“砰砰”地敲着，而我心中想的却是普通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四三拍子。正在我已经绝望了的时候，军号手们开了点窍，横笛手们吹出了：“啊，多瑙河，蓝色的河。”只有军号队队长以及军鼓队队长高喊讨厌的口令，不肯向圆舞曲之王低头。但是，我已经把他们两个给除名了。现在奏我的音乐，老百姓感谢我。演讲台前响起了笑声，一些人跟着唱了起来：“啊，多瑙河，蓝色的河。”歌声飞过整个广场，传到兴登堡林阴大道，传到斯特芬公园。“啊，多瑙河，蓝色的河。”我的节奏跳跃着被我头顶上的麦克风用最大的音量传出去。我一边使劲地击鼓，一边从木板的节孔向外张望，群众正被我的圆舞曲所吸引，尽兴地跳着，圆舞曲之王已经

撮合了九对，不，十对，男女在那儿跳舞。勒布扎克带着县长和冲锋队旗官以及格赖泽尔、福斯特尔和劳施尔还有像一条褐色长尾巴的市党部人员来了。通往演讲台的通道被群众堵住了。气愤不已的勒布扎克站在人群中，他只习惯于被人前呼后拥着，和着有板有眼的进行曲笔直地向演讲台走去。但令人费解的是轻快的圆舞曲节拍并不适合他，只能让他失去对人民的信任。我由木板上的节孔看到了他的烦恼。一股气流穿过节孔，虽然几乎使我的眼睛发炎，然而我仍盯着他看，替他惋惜。接着，我改奏一首查尔斯顿舞曲《老虎吉米》，敲出了小丑贝布拉在马戏场里站在喝空了的塞尔查矿泉水瓶上敲击的那种节奏。可是，演讲台前的另一代年轻人压根儿不了解什么是查尔斯顿舞。他们自然对查尔斯顿舞和《老虎吉米》一窍不通。啊，好友贝布拉，他们敲响的不是吉米和老虎的节奏，而是乱砸一气，军号也吹不出个调子。横笛手则认为怎么吹都一样。军号队队长大声骂娘，暴跳如雷。可是，军号队和军鼓队的孩子们依然拼命地擂鼓，吹横笛，吹军号。在秋老虎的炎热下，演奏吉米其乐无穷。在演讲台前，数以千计的人民同志你推我挤，他们终于听明白了：这是《老虎吉米》，它召唤人民，跳起查尔斯顿舞来吧！

顷刻间，那些在五月草场上还没有跳舞的男人都争先恐后地去抢还能找到的女性舞伴。只有勒布扎克，他的身边都是有了舞伴的穿男上装的人，所以他只好驮着他的隆肉跳舞。那些原本可以帮助勒布扎克摆脱困境的妇女同盟的太太们，纷纷从演讲台硬邦邦的木板凳上下来，远远地跑开，扔下形单影孤的一个勒布扎克。尽管吉米音乐很可恶，他为了尽力挽回面子，还是强装欢喜的样子在隆肉的提示下跳起舞来。

但是已经没有挽回的余地了。人民跳着舞离开了，虽然被踩得乱七八糟，但依然葱绿一片的五月草场撤空了。人民连同老虎吉米进入邻近的斯特芬公园，逐渐在这个广阔的园林里消失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那里有吉米曾经许诺过的热带丛林，天鹅绒爪子的老虎在爬进，还有人造原始森林，可供刚刚在草场上你拥我挤的人民藏身。法律与秩序的观念烟消云散。比较崇尚文明的人，可以到兴登堡林阴大道的街心公园去，那些树木是在十八世纪首次栽种的，一八〇七年拿破仑的大军围城期间被砍伐了，一八一〇年为向拿破仑表示敬意又重新栽上。由于我头顶上的麦克风还开着，我的鼓声一直被传到了奥利瓦城门，而演讲台下勇敢正直的我毫不懈怠，在吉米那只解脱了锁链的老虎的帮助下，使五月草场上除了丛丛雏菊外空无一人，因此在这片有历史意义的土地上，跳舞的人可以听到我的音乐。那些年轻鼓手在我给予自己的鼓早该得到的安宁之后还敲个不停。我的音乐对他们所产生的影响，要过一段时间才能消失。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冲锋队和党卫队人员还在台上停留了一个多小时，木板被皮靴踩得咯咯响。我并没有马上从演讲台底下离开。他们钻到一个个角落里，刮破了身上的褐色和黑色制服。他们好像在台上寻找某个社会党人或者某个共产党破坏小组。我不想赘述我用来迷惑他们的妙计，总之，他们不是我的对手他们找不到我。

终于，这个木板塔的迷宫安静下来。这个迷宫同先知约拿在它腹内待过并弄了一身油脂的鲸鱼一般大。不，我可没有先知先觉，我觉得肚子饿了。此地没有上帝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这里也没有上帝为我安排一棵蓖麻，使其生长得高过我，尔后，却又安排一条虫子，咬这蓖麻，以致枯槁。我既不为《圣经》上的蓖麻，也不为尼尼微大城伤心流泪。我将自己那面不是《圣经》上所载的鼓藏在毛衣里，全神贯注，既没把脑袋弄破，也没被钉子划破，从台底钻出去，离开了这个大小和吞过先知的那条鲸鱼差不多的为举行各种集会而搭建的舞台。

没有人会注意到这个吹着口哨，顺着五月草场的边缘，慢慢地向体育馆方向走去的少年。在网球场背后，我的孩儿们背着军鼓和定音鼓，拿着横笛和军号，在那里蹦跳着。我敢断定，他们在进行惩罚性操练。对于这些按着地区领导人的哨声蹦蹦跳的人们，我只感到有那么点儿歉意。勒布扎克离开了他的大批党部人员，自己驮着那块隆肉踱来踱去。走到足够远，他使用靴子后跟着地向后转，那儿的雏菊和草便全死在了他的脚下。

当我回到家时，午餐已经端上桌子：烤肉饼、盐水土豆、红甘蓝，餐后小吃有巧克力布丁加香草调味汁。马策拉特一声不吭。我妈妈吃着饭却走了神。下午，因为嫉妒和波兰邮局，家里人吵闹得不可开交。黄昏时分，凉爽的阵风，突如其来的暴雨，擂鼓似的冰雹，出色地表演了好一阵子。我全身疲惫的在鼓边休息，边欣赏。

橱 窗

在好长的一段时间内，确切地说，直到一九三八年十一月，我总是蹲在演讲台底下，带着我的鼓，观看较为成功或有些失败的游行，驱散集会，演讲人被弄得结结巴巴，不知所云，把进行曲和颂歌变成圆舞曲和狐步舞曲。

虽然我一直热衷于重温旧梦，但一切已成往事，难再回首。现在，我是一家疗养与护理院的自费病人，能够正确看待当年在演讲台下擂鼓的行为。我从此再也不因为自己破坏过六七次集会，使三四次列队行进的队伍乱了阵，而要把自己看做一名反抗战士。今天，“反抗”这个词已经变得非常时髦。您到处能够听到人家在讲什么“反抗精神”啦，什么“反抗集团”啦。人家甚至可以把反抗变为“内”，美其名曰：“内心流亡”。更不必提及那些在战争期间因一时马虎而没有用防空窗帘挡上卧室窗户被防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空值班员发现而罚了一次钱，当今自称“反抗战士”、“反抗人士”等等的可以名列《圣经》的所谓的正人君子了。来回顾一下我在演讲台下的经历吧。我曾经用鼓声向人民预言过什么没有？我可曾听从他老师贝布拉的劝告，自己掌握行动的过程，并让演讲台前的人民跳舞？我可曾把那么能说会道、晓于世故的区训导主任勒布扎克搞得个头晕脑胀，一筹莫展？我又可曾在一九三五年八月某个吃一锅熬食物的星期天，第一次——以后又有若干次——急速敲击他那面红白两色相间、却又不是波兰造的铁皮鼓，驱散穿褐色制服者的集会？

各位必须承认，这些我都干过了，难道如今我这个疗养与护理院的病人因此就成了反抗战士吗？没有。请不是疗养与护理院病人的各位，仅仅将我看作一个出于私人及美学上的原因把教师贝布拉的谆谆教导铭记于心，一概拒绝制服的款式以及演讲台上流行音乐的响亮度和节拍，只是在一面儿童的玩具鼓上弄出一些抗议的声音来的有点固执古怪的人吧！

在那时，还能用一面微不足道的铁皮鼓来对付演讲台上面和前面的人们，在此我要说，我的舞台功夫同我远距离唱碎玻璃的技艺一样，已经到了无以伦比的境界。除了褐色分子的集会外，当赤色分子和黑色分子、童子军和穿菠菜色衬衣的天主教青年会，耶和華目击者和基夫霍伊泽团，素食者和纯清空气运动青年集会时，我也蹲在演讲台上击鼓以示反对。我的鼓更明确他们应该唱什么、吹奏什么、祈求什么、宣布什么。

如果我用鼓无法摧毁的，我使用我破坏性事业的另一个武器——声音，将它置于死地。于是，在一九三六年和一九三七年之间的冬季，除去白天破坏演讲台的对称之外，我又开始了夜间活动：扮演诱惑者，诱惑同类的本领，我最初是从我的外祖母科尔雅切克那儿学来的。那个冬天特别冷，她穿着四条裙子，在朗富尔每周四的星期集市上摆了一个固定的售货摊，在摊子后面蹲

着，用叹苦经似的声音叫卖：“新鲜鸡蛋，金灿灿的黄油，小鹅，不肥也不瘦！”她从菲尔埃克搭乘窄轨小火车，临朗富尔时，她脱下火车上穿的毡靴，换上没有式样的橡皮套鞋下火车，挎着两只篮子，朝车站街她的固定售货摊走去。货摊上挂着一块小牌子：“安娜·科尔雅切克，比绍”。当时的鸡蛋很便宜！一个盾能买十五六个。卡舒贝产的黄油比人造黄油便宜。我的外祖母蹲在两个渔妇之间，她们喊着：“新鲜的比目鱼！”“美味的鳕鱼嘛！”黄油被严寒冻成石块，使鸡蛋保持新鲜，把鱼鳞磨成极薄的刀片；严寒也使一个叫施韦特费格尔的独眼男人有钱可赚。他生了一堆炭火，把砖头架在火上烤热，用报纸包上，租给赶集的女人。

在我外祖母的吩咐下，施韦特费格尔每小时准时用铁耙推一块热砖头到她的四条裙子底下去。她把裙子撩起，施韦特费格尔把一块冒热气的纸包砖头塞进去，两下动作，一装一卸，接着，他的铁耙把几乎冷却了的砖头从我外祖母的裙子底下拖了出来。

我多么羡慕贮存和散发热量的纸包砖头！直至今日，我还希望把我当做烤热的砖头放到我外祖母的裙子底下去，而且永远由我来替换我自己。是我要像外祖父科尔雅切克那样，到外祖母的裙子底下肆无忌惮，还是想寻找忘却、故乡和最终的涅槃境界？

我要到裙子底下去寻找非洲，如果可能，还要寻找那不勒斯：谁都说不游此地，岂不白过这一辈子。这里是分水岭，江河的汇合处；这里的风也特别，或者根本没有风；这里细雨绵绵，不湿衣；这里船只有的拴着，有的起锚；这里，慈爱的上帝坐在喜欢温暖的我的身边；这里，魔鬼在擦他的望远镜，安琪儿在玩捉迷藏；在我外祖母的四条裙子底下，不论是圣诞树点燃的时候，还是奥斯卡寻找复活节彩蛋或者礼拜万圣的时候，永远是夏天。我可以在外祖母的四条裙子下面按日历宁静度日，任何地方都无法和他比拟。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她很少让我钻到她的裙子底下去，在星期集市上，她压根儿就不让我这样干。我在她身边的小木箱上一蹲，她用胳膊搂着我，使我得到温暖。我一边看着冷热砖的交替，一边向外祖母学习诱惑术。她用一根只有我们俩能看到的线拴住文岑特：布朗斯基那个肮脏至极的旧钱袋当作诱饵。

尽管各种商品的价格都很低，走来走去的家庭主妇还是什么也不买，等着人白送，甚至捞点儿外块。一位太太，在这种想法的指使下，弯腰去捡扔在地上的文岑特的钱袋，手指头刚刚靠近，我外祖母就把钓饵连同这位穿着讲究、多少有点尴尬相的太太一起钓了上来，把这条活鱼引诱到箱子边上，非常客气地对她说：“噢，太太，买点黄油吧，金灿灿的，要么来点鸡蛋，一个盾十五六个，您看行吗？”凭借这种办法，外祖母卖光了她的土产。我学会了这种但不是我们楼里十四岁的男孩把苏西·卡特骗到地窖去玩医生和病人游戏的那种诱惑术。那种事情我一见就躲，因为有一次，我们公寓里的顽皮孩子阿克塞尔·米施克和努希·艾克当献血的，苏西·卡特当女大夫，我被他们拉去当病人，逼着我吃虽然不像上回的砖头汤那样尽是沙子，但是留在我嘴里的是一股烂鱼的臭腥味的药。我的诱惑术几乎是不触及肉体的，而且同受骗者保持一定的距离。

天早就黑了，店铺关门也有一两个钟头了。我从妈妈和马策拉特身边溜走，站到隆冬的黑夜里，街上特别寂静，几乎没有行人。我从门口挡风的墙壁凹入处，望着街对面有些还亮着灯的店铺的橱窗，有熟食店、缝纫用品店、鞋店、钟表店、珠宝店，陈列的东西既使人垂涎欲滴，又便于顺手牵羊。我甚至宁愿让店铺前侧的街灯使陈列物处在半明半暗之中，即使最普通的人也能用灯光把他们吸引过来，但是，半明半暗却能使出类拔萃的人在那里停留。

我所感兴趣的，并非那些或是朝琳琅满目的橱窗里扫一眼价

目牌，或是将橱窗当做镜子，看看自己头上的帽子是否端正的过路行人。在无风而干冷的天气里，在无声地飘落的鹅毛大雪中，或在寒意越浓越显得圆的明月下，我等待的是那些并非毫无目的地浏览，而是扫视一周或直接盯住某件陈列品的如应召而来般站在橱窗前的顾客。

我的计划是需要耐心、冷酷无情和可靠的洞察力，用声音这种无痛无血的方式杀死野兽，引诱别人的猎人的狩猎计划。我要做的是用悄无声息的叫喊把橱窗切个圆洞，尽量在最下一层正对着别人可看到陈列物的地方用扬起的尾声把切下的圆玻璃弄到橱窗内发出一声迅速消失的声响这一方式去引诱别人偷窃。这和玻璃撞碎的声音不同，因为离得太远，我自己都听不到。可是，那个身穿兔毛领子褐色冬大衣的年轻女人听到了，大衣面肯定已经翻过一次了。她吓了一跳，连衣领上的兔毛也颤抖了。她本要走开，却又让人感到没有禁忌的漫天大雪而站住了。然而，她还是四下张望，不信任纷飞的雪片，似乎雪片背后不是雪片而是别的什么。她回头四下瞧着的同时，右手却已经从兔毛暖手筒里溜了出来！她再也不回头看，而是把手伸进了切开的圆孔，先把跌落而压在她垂涎的东西上的玻璃推到一边，然后把那双浅黑色的高跟鞋一只接一只地从圆孔里取出来，既没把后跟碰坏，也没被锋利的切口划破她的手。这双鞋一左一右进了大衣口袋。我在飘落五片雪花的一瞬间，伴着脑内闪过的她也许是施特恩菲尔德商店的时装模特的念头，看到了她美丽而不带任何表情的侧脸。她就不可思议地走远了，消失在稠密的飞雪中，又重现在下一个街灯的昏黄灯光下。随后，她不论是新婚的少妇也罢，还是从橱窗里解放出来的时装模特儿也罢，总之又走出了圆锥形的光柱，飘然离去。

守候、窥伺、不许擂鼓、歌唱和切割坚冰似的玻璃，这些艰辛的工作都大功告成了。我同那个女贼一样，怀着一颗一半炽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热、一半冰凉的心，回到家中，所不同的是没有赃物。

我想把一对情侣变成一双窃贼，但一直没有成功。不是两个都不干，便是女的不让男的伸手，或者男方苦苦哀求女方不要那样做，这使我的诱惑术不能像上次那样大获全胜。在一个飘雪的夜晚，我诱惑化妆品商店前一对非常年轻的情侣。男的抵不住诱惑，取了一瓶科隆香水，而女的死活不要，即使男的要她散发香味。到了第一盏路灯下，那个丫头像成心惹恼我，在灯下踮起脚，拥吻他，一直到他跑开，将香水物归原处。

有时，在年岁较大的绅士身上我也碰到了类似情况。我本来期待他们的并不仅只是在冬夜里疾步而行。他们凝神站在雪茄店的橱窗前，心里想的却是哈瓦那、巴西和布里萨戈岛。而当我的声音按一定的尺寸作了动作，并让切下的玻璃落在“黑色智慧”牌的小盒上时，那些绅士的心也像猛地合上一把折刀一样怦然一跳。没被发现的我看到这些老绅士一个个面无血色，惊慌失措，像遇鬼般地转过身子，摇动手杖，穿上马路，从我和我家大门前慌张地走过，便忍俊不已。而我又为这些到了风烛残年抽雪茄的老烟鬼们忧虑，他们出完一身冷汗，又出一身热汗，尤其在变化不定的天气里，大有得感冒的危险。

那个冬天，保险公司不得不赔偿市郊那些遭受了惨痛损失的保过偷盗险的店铺。虽然我在切割橱窗时下意识地控制尺寸，只让人取走一两件陈列品，从未造成大规模偷盗，但这些破门偷盗案却与日俱增，使刑事警察不得安宁的同时还被媒体骂作饭桶。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至一九三七年三月，即在科克上校在华沙组成一届国民阵线政府的时期内，在这类破门窗偷盗案中，预谋作案的有六十四起，已成事实的有二十八起。当然，在这些中年妇女、穿着过分讲究的年轻店员、女佣人以及已退休的中学教员中，并不是全都想偷东西的，因此，刑事警察很快就把案子破了并把赃物没收了。还有一些外行小偷，在搞到自己梦寐以求的东

西之后，紧张得每晚都睡不安稳，结果第二天就到警察局去自首说：“唉，请您千万原谅。昨夜我站在橱窗前，玻璃上突然破了一个窟窿。当我在半路上终于镇定下来后发现离开那个橱窗已有三个十字路口。这时我才意识到，我把一副上好的、承担得起但应该舍不得买的鞣皮男手套非法地塞进了大衣左口袋里。我保证不会再重犯了。”

警察局不相信有什么奇迹。因此，不管是被抓以还是投案自首的人都得蹲一至二个月的班房。

我本人有时也被关在家里，虽然妈妈没说，但她很自然地想到这些事件一定与我尖利的声音不无干系，而且她很明智没去向警察说。

马策拉特则板起面孔，装出遵纪守法的样子，要审问我。我一概拒不招认，并手腕越来越高明地用我永远像三岁小孩似的个子作挡箭牌，用我的铁皮鼓作护身符。每逢马策拉特审问完了，妈妈总是这样大声嚷道：“都是那个吻了我儿子前额的矮小子的错。我当时就预感到，这件事不对劲，因为奥斯卡原本不是这样的。”

是的，贝布拉先生给了我一些持续时间较短的小的影响。甚至家庭禁闭也管不住我，我总能遇到一些好机会，溜出去个把钟头，而且没有人来盘问我。我于是又用歌声把缝纫用品店的橱窗割开一个臭名远扬的圆窟窿，使一位看中了橱窗里某件陈列品的有为青年捞到一条真丝的紫红色领带。要是您问我，我把擦得锃亮的橱窗割开一个巴掌大的圆孔，这种诱惑力已经特别大了，还有别的什么增加这种诱惑力吗？我想，是邪恶。因为我站在邪恶最爱在的黑洞洞的大门口受邪恶左右。另一方面，我也不想缩小这种诱惑术的邪恶的性质。所以，在我不愿出没有机会去诱惑别人的今天，我必须对自己和我的护理员布鲁诺说：我不仅满足了你所有默默无闻但对自己的目的物情有独钟的那些冬季行人微不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足道的或大的愿望，而且还使站立在橱窗前的人们认识了自己。如果那些体面的、穿着时髦的太太，规矩的老绅士，笃信宗教以保持青春的老小姐没有受到我的声音的诱惑而去偷窃的话，他们是无论如何也不会认识到自己身上还会有窃贼的稟性的，更不用说那些在受我诱惑之前，将一个本领不到家的小小扒手都看做是罪该万死的危险家伙的正人君子的转变了。

我每晚都伺伏着窥视一个直到第四次才没抵住诱惑行窃，且警方从未发现的一个窃贼。此人便是埃尔温·朔尔蒂斯博士，检察官，州高级法院里令人畏惧的起诉人。他变成了一个温柔、宽容、几乎在判决时最讲情面的司法人员，因为他已经在我的诱惑下抢了一个真獾毛的修面刷并献身于我这个窃贼崇拜的小半仙。

一九三七年一月间，有一次我忍着寒冷长时间地站在一块地点偏僻但招牌很响的开在市郊一条种满槭树的林荫道上的珠宝店对面。在摆放首饰和手表的橱窗前，有那么一些可以诱惑的对象，要是他们站在别家店铺的陈列品前，如女用长统袜啦、兔绒皮帽啦、利口酒啦等等，我早已迫不及待地施展我的法力了。

人一见到珠宝，就会受到珠宝的影响而变得爱挑剔，像看珍珠项链似的，可以无止境地转着圈看下去。我也不再用分秒来计时，而是改用“珍珠年”，因为我考虑到，珍珠比脖子耐久，腐烂的不是手镯而是手腕，在坟墓里挖掘到的是戒指而不是手指；因此，我也在为橱窗前充阔佬充得过份的人物色最合他口味的物品，他既不适合太小家子气的首饰，也配不上珠宝首饰。

珠宝商班泽默尔的橱窗里陈列品只有几块精选的瑞士优质手表，天蓝色丝绒上几枚同一种式样的结婚戒指，橱窗中央，有七件精选出来的陈列品：一条用不同色泽的黄金打成盘了三圈显得非常贵重的蛇，细工镂刻的蛇头上镶有一块黄色玉石，还有两颗金刚钻以及两颗作为眼睛的蓝宝石。本来不喜欢黑丝绒的我觉得在珠宝商班泽默尔这条蛇下面衬上黑丝绒特别合适。同样，在

因朴素而迷人、以匀称而夺目的银制物品下面衬上灰色丝绒，会让观赏者感到宁静并被吊足胃口。一枚戒指，镶着一颗非常可爱的宝石，使人一看便知道这枚戒指将磨坏同样可爱的妇女们的手指，而它自身则变得越来越可爱，直至达到珠宝所独享的不朽的程度。谁戴了脖子都免不了遭受磨损之罪。还有一种轻巧的项链，挂在基本仿照颈根肤色的浅黄色丝绒软垫上。一张编织得很精巧的网，织成又破，破了又织。什么样的蜘蛛能使六颗小一颗一大的红宝石网住的金丝呢？它在哪里潜伏着呢？守候什么呢？它守候的是目光被网里似凝结成颗粒状鲜血的红宝石勾住的某个人而不是更多的红宝石，或者说，按吐金丝的蜘蛛或我的意思，它该送给谁呢？

一九三七年一月十八日，在被踩硬了的雪地上，在一个比平日雪的味道更重的夜里，在一个可以让人把一切责任都归功于雪的黑夜里。我看见扬·布朗斯基从我埋伏处右边横过马路，低着头走过珠宝店，然后又犹豫不定地好像被谁招呼了一样停了下来。他像是被什么力量控制了似的把身子转了过去，站在橱窗前几棵白雪覆盖的默默无闻的槭树间。

这个清秀的、总有点唉声叹气的、在工作上惟惟诺诺、在爱情上劲头十足、又钟情于美又有些傻的靠我妈妈的肉体活着，并用马策拉特的名义生了我，这时，身穿时髦的、也许是某个华沙裁缝做的冬大衣的扬·布朗斯基，站在橱窗前，像一座石雕像似的一动不动。他的目光像站在雪地里的帕西伐尔，紧盯着地上的血迹似的死盯着金项链上的红宝石。

我本来可以把他唤走，或者用随身带的铁皮鼓的鼓声把他唤走。我只要解开一个扣子就可以把鼓从大衣里拿出来，鼓棒也在大衣口袋里。猎人胡贝图斯见到一只特别奇特的鹿在他的射程内，他不也没有射箭吗？扫罗归依成为保罗。罗马教皇莱奥伸出戴戒指的手指，阿蒂拉一见，便掉转马头撤兵。但我要达到我的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目的，不能像他们一样，因此我没有解开大衣扣子，不让铁皮鼓跳到寒夜里，不用鼓棒敲击冬天似洁白的铁皮，不让一月之夜变成鼓手之夜，而是像一颗星星，或者像海底的鱼似的喊了一声，先把寒夜的结构破坏，使它终于落下新的雪来，随后把声音传到厚玻璃上，便宜的玻璃上，贵重的玻璃上，透明的玻璃上，把世界分隔为两个的玻璃上，圣母的、神秘的玻璃上，夹在扬·布朗斯基和红宝石项链之间的橱窗玻璃上，割开一个恰好像我所熟悉的扬的手套那样大小的洞，让割开的玻璃既像天堂的门，又似地狱的门似的倒下。这时，扬没有畏缩，而是将戴着鞣皮手套的手从大衣口袋里伸出来，伸进天国，手套离开了地狱，从天国或者地狱里取走了一串上面的红宝石能使所有的天使，包括已故的在内，喜笑颜开的项链。他将捏着红宝石和黄金的手又插进口袋里，却一直还站在开口的尽管危险的橱窗前，尽管已没有鲜血似的红宝石硬要把他或帕西代尔的目光吸引向那个方向。

圣父、圣子、圣灵啊！现在圣灵该显神通了，否则圣父，扬，就得遭殃。圣子，我，赶紧解开大衣纽扣，拿出鼓棒，在铁皮上敲出了呼唤声：父亲，父亲！直至扬·布朗斯基转过身来，很慢很慢地横穿过马路，在家门口才把我找到。

依然呆若木鸡但快要清醒的扬望着我时，天又开始飘雪花了，这一刻真美！他伸出没有戴那只接触过红宝石的手套的手，搀着我默默地但满心欢喜地回家去。在家里，妈妈正在为我担忧，马策拉特还是那副德性，铁板着脸孔，并不认真地吓唬我要去叫警察。扬没作解释，尽管马策拉特已经把啤酒摆上桌子并请他玩施卡特，他还是很快便告辞了。他在临走时抚摩我的头，使我疑惑不解，他是想让我对这件事守口如瓶呢？还是想和我作朋友？

没过几日，扬·布朗斯基把项链送给了我妈妈。因为她猜到了这件首饰的来历，所以只在马策拉特不在家的时候戴着它独自

欣赏，或者戴给扬·布朗斯基或我看。

战后不久，我把这串项链在杜塞尔多夫的黑市上换了十二条“吉祥”牌的美国香烟和一只公文包。

没有出现奇迹

今天，躺在疗养院的病床上，我还念念不忘将我的声音送进寒夜，将冰花融化，把橱窗割开，给小偷打开方便之门的运用自如的能力。比如，我现在特别想把病房房门上方三分之一处那个窥视孔的玻璃除掉，好让我的护理员布鲁诺直接观察我。

在我被强制送入疗养院前的那一年里，我十分苦恼地发现我的声音失灵了。夜间在街上，我喊出一声，急切地期待它产生效果，但却没有效果。这时，一向反对武力的我，竟捡起一块石头，扔向杜塞尔多夫市郊一条寒伧的街上某家厨房的窗子，这种事情发生在当时毫不奇怪。尤其在午夜时分见到那个装饰师维特拉的时候，我多么想做点示范动作给他看看呀！他站在国王林荫道上一家男用时髦物品店或者以前的音乐厅附近一片化妆品店的橱窗玻璃后面。虽然上身遮着帷帘，脚套红绿相间的短统袜的他有可能是我的信徒，但由于我一直不知该称其犹太还是约翰，我依然想唱碎一块玻璃给他看。维特拉出身贵族，他的名字叫戈特弗里德。我唱了几声，没产生任何效果，除了轻敲了那扇没有丝毫破损的橱窗玻璃让他注意我外就没别的什么了，好不丢脸。于是，他便走到街上，同我闲聊大约十五分钟，并嘲笑他自己的装饰艺术。这时，因为我的声音已经无法产生奇迹，而我也就没有资格叫他约翰或者犹太了，因此我只能叫他戈特弗里德。

我在珠宝店前那次歌唱，使扬·布朗斯基成了窃贼，使妈妈拥有了红宝石项链。此后，我便暂告一个段落，不再在陈列令人垂涎的物品的橱窗前耍弄歌唱术了。同扬·布朗斯基的关系，偷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来的项链，过私通生活的女人甜蜜中也有痛苦，使妈妈变虔诚了，使她在圣礼之后变得欲念更旺。要背一本所犯罪孽的流水账是极容易的。星期四，在城里会面，把我留在马库斯处，到木匠胡同幽会，多半曲尽其趣，再去魏茨克咖啡馆喝穆哈，吃糕点，到那个犹太人那里去接小儿子，领受马库斯献的一番殷勤，用很少的钱买走一小袋丝线。回到五路电车站，我妈妈微笑着享受兜风之乐，脑子却不知想到哪里去了。她乘着电车经过奥利瓦门，穿过兴登堡林阴大道，一眼都不看体育馆旁边马策拉特每星期日在那里度过午前时光的五月草场。电车绕体育馆拐弯时，刚刚享受过一场欢喜的他，咬牙忍受着见到这方箱形建筑的恶心。电车又拐向左边，沾满尘土的树木背后，显现出康拉德学校以及戴红帽子的小学生——如果我也能戴着一顶绣金色“C”字的小红帽站在那里，那会是多么可爱啊！如果十二岁半的我上小学的话，已经高小三年级开始学拉丁文了，而且一定是个名副其实的康拉德学校的小学生，勤奋用功，还有一些狂妄自大的劲儿。

阿格内斯·马策拉特太太在电车过了铁路旱桥下的通道，朝帝国殖民区和海伦·朗格学校的方向驶去时，仍一个劲儿想着康拉德学校，和我错失的良机。电车又往左拐，经过尖顶像葱头一样的基督教堂和马克斯·哈尔贝广场，我们在皇帝食品杂货店门口下车。妈妈扫了一眼她的对手的橱窗，举步维艰地向拉贝斯路前进，就如同向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地方走去：又开始冒头的坏脾气，手里搀着的畸形孩子，内疚，恢复疲劳的要求，既不满足又觉厌烦，对马策拉特既厌恶又喜爱。妈妈受着这种复杂感情的折磨，手挽背着新鼓的我，拿着几乎是白送的一小包丝线，艰难地穿过拉贝斯路，朝店铺走去，走向麦片，鲱鱼小桶旁的煤油，无核小葡萄干，葡萄干，杏仁，姜味烘饼香料，厄特克尔博士发明的发酵粉，直至今天仍叫贝西尔牌和乌尔宾牌洗衣粉，马吉牌和克瑙尔牌浓汤料，卡特赖纳牌和哈格牌咖啡，维特洛牌和

帕尔明牌人造黄油，屈内牌醋以及什锦果酱，走向那两条我妈妈挂在柜台上方的，夏天每两日换一回的蜜甜的粘蝇纸，粘在上面的苍蝇发出音区不同的嗡嗡声。而她自己也怀着一颗同样甜蜜的心，一年三百六十天，无冬例夏，诱发出或高或低的嗡嗡声的罪孽，每礼拜六去一次圣心教堂，向维恩克圣下忏悔。

妈妈每周六都像周四一样带我进城，使我成为共犯一样带我走进教堂大门，踩到天主教冰凉的方砖地上。因为不带鼓我绝对不同意，肚皮前要是没有铁皮，我坚决不用手触前额、前胸和两肩，画天主教的十字，并像穿鞋似的单膝跪地，我绝不安稳地坐在磨得锃亮的教堂木板凳上，让鼻梁上的圣水慢慢地干掉，因此她一定要预先把鼓塞在我的套头毛衣或小大衣里。

因为圣心教堂在我受洗礼那天给我起了个招麻烦的非基督教的名字，因此我还一直记得。在教堂大门口，我的父母坚持用奥斯卡这个名字，我的教父扬也同意。于是，维恩克圣下便朝我的脸上吹了三口气，据说这样可以把我心中的魔鬼赶走，随后画了十字，用手抚顶，撒了盐，又采取了若干对付魔鬼的措施。进了教堂，我们又站定在真正的洗礼唱诗班前。在向我念信经和主祷文时，我一直非常安静。之后，维恩克圣下又念了一遍“魔鬼离去”。他抚摸了我的鼻子和耳朵，以为这样我就开窍了，其实我是一生下来就懂事的。接着，他想听我清楚而大声地说话，于是问道：“你抛弃魔鬼和它的一切行为以及它所炫耀的一切吗？”

扬代表我说了三声“我抛弃”，尽管当时我没摇头是因为我不想抛弃。我并没有讲任何同魔鬼断绝来往的话，维恩克圣下便在我的胸口和两肩之间涂了圣油。到了施洗池前，他们又念了一遍信经，终于将我在水里浸了三次，在我的头皮上抹了圣油，我被套上了一件白袍，准备将来在那上面沾上污点，又给了一支准备在黑暗的日子里点的蜡烛，最后仪式结束。马策拉特付了钱。扬抱着我走出圣心教堂大门时，一辆出租汽车在晴转多云的天气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下等候着。我问附在体内的魔鬼说：“你们还都在吗？”

魔鬼蹦了几下，低声说道：“你看见教堂全是玻璃的窗户了吗，奥斯卡？”

风格上属于新哥特式的圣心教堂是在公司滥设时期建造的。由于它是用很易褪色的砖头砌的，尖顶上包的铜也很快长了一层铜绿，显得年代很悠久。因此，在哥特式和晚近的哥特式砖砌教堂之间的区别，只有行家才能辨别并因此而感到不高兴。但是，不管新老教堂，听忏悔的方式是相同的。同维恩克圣下一样，千千万万的圣人们，在星期六机关下班、商店打烊之后，便坐在忏悔室里，把毛茸茸的神甫耳朵贴在一个因磨损而发亮的、微黑的栅格上，教区信徒们便想办法把那条罪孽像廉价珍珠般的一个接一个穿起来的罪孽线穿过铁丝网送到神父耳中。

我妈妈依据《告解箴言》上开列的问题，通过维恩克圣下的收听渠道，向这个惟一能救世的教会的主事报告她做了的和只想而没有做的事，还有她的想法、言论和行为。我则从过于光滑的教堂木凳上滑下来，站到方砖铺成的地上，因为我并没有什么可忏悔的。

我承认，直到今天天主教堂里的方砖地和气味，还有整个天主教教义还像一个使我着魔的红发姑娘一样莫名其妙地诱惑着我，虽然我很想将她的红头发染成别种颜色；我也承认，天主教教义一直向我灌输亵渎神明的灵感，这些亵渎神的灵感一再表明，尽管没有一点儿别的用处，我无可变更地已经受了天主教的洗礼。我经常在诸如刷牙甚至大便等一些毫无意义的过程中突然发现在编弥撒的解说词：在大弥撒时，基督再一次流血，于是流出的血就把你洗涤了，这是盛他的血的圣杯，基督的血一流出，葡萄酒就变成真正的血，基督的真正的血就在眼前，见到这神圣的血，灵魂也就洒上了基督珍贵的血用血清洗，在化体时血流淌出来，血迹斑斑的圣巾，基督的血的声音渗透到诸天，在上帝

面前，散发出芬芳。

我至今还或多或少地保留着天主教的腔调，我必须承认这些。我以前从来没有耐心等待有轨电车，除非心中想着被我称作深情的、有福的、受祝福的、童贞女中的童贞女，大慈大悲的母亲，童贞女玛利亚。受称颂的，应受一切尊敬的，生育了他的你，甜蜜的母亲，童贞女母亲，光荣的童贞女，就像你在你这位母亲的心里尝到过的那样让我尝一下耶稣这个名字的甜蜜，这是真正值得的和正当的，应得的和有益的，女王啊，有福的，受祝福的

.....

“受祝福”这个词在妈妈带着我每星期六去圣心教堂的时候，使我心中感到万分甜蜜，却又使我中了毒。所以，我要对经过洗礼后尚附在我体内的魔鬼给我提供了一种抗毒剂，使我一边亵渎神明，一边挺直身子走过圣心教堂的方砖地表示感谢。心被命名为教堂名的耶稣不仅在圣礼上现身，而且多次在十字形回廊的彩色小画上现身，另有三次是以姿势各不相同的五彩塑像的形式。其中有一尊耶稣的染色石膏像。他站在金色基座上，梳着披肩的长发，身穿普鲁士蓝的长袍，脚踏便鞋。他解开长袍，袒露前胸，违反自然地从胸腔中央掏出一颗西红柿那样红的、美化了的、滴着鲜血的心。由此，可以知道这所教堂名字的来历。

我第一次见到这位剖胸掏心的救世主耶稣，就觉得他极像我的表舅，教父与假想之父扬·布朗斯基。瞧这双流露出天真的自信和想入非非神情的蓝眼睛！这张随时准备号啕痛哭、似盛开玫瑰的接吻的嘴！这种使双眉紧蹙的男性的痛苦！等着挨揍的丰满而通红的面颊！他们两个都有那种引诱女人抚魔的挨耳光的嘴以及一双疲倦的，不做手工，精心保养女人似的娇嫩的手，它像展示为亲王宫廷做活的珠宝匠的杰作一般展示基督的创伤。这一切都是多么相似啊！布朗斯基的眼睛使我把他误认为是我的父亲，现在这双使我见后伤透脑筋的眼睛又画到了基督脸上。因为我也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有那么一对只能产生鼓舞人的热情的目光，但不能使人产生信心的蓝眼睛。我转身离开中堂右侧的耶稣的心，从作为十字回廊的第一站的耶稣背起十字架这一站起，快步走到第七站即他不堪重负第二次摔倒在地的那一站，然后走到主祭坛前，那上面挂着另一尊耶稣全身塑像。这个耶稣可能因为太疲惫了或者是用尽了力气，才把眼睛闭上。瞧这个人的一身肌肉！一见这个十项运动员的身材，我一下子把圣心布朗斯基忘了个一干二净。每当妈妈向维恩克圣下忏悔时，我便站在祭坛前，像祈祷一样凝神观看这个可亲的运动员，是被人用规定尺寸的钉子钉在十字架上的这项运动的世界冠军。他除了永恒的光尚且抖动外既不抽搐也不抖动，但他却以最高分完成了这个项目。跑表滴答作响地计算他的时间。在圣器室里，辅弥撒者肮脏的手已经在擦那面准备奖给他的金牌。但是耶稣搞体育运动不是为了争荣誉。我顿时想到了信仰。只要我的膝盖同意，我就屈膝跪下，在我的鼓上画十字，并设法把“受祝福的”或“痛苦万分的”这类词同杰西·欧文斯和鲁道夫·哈比希联系在一起，同前一年举行在柏林的奥林匹克运动会联系在一起；可是，这一点我并不能每次都做得到，我必须指出，耶稣被取消比赛资格是因为他同那两个盗贼的比赛并不是正大光明的。我向左边转过脸去，在见到圣心教堂内堂里这位天国运动员的第三个塑像时产生了新的希望。

“我第三次见到你时，我就先祈祷。”我结结巴巴地说，用鞋底找到了棋盘般的方砖地，并按这个方格向左侧祭坛走去。我每走一步都感觉到，他和圣徒们的目光在为你送行。有彼得，人家把他头冲下钉在十字架上；还有安得烈，他被人钉在歪斜的十字架上，它由此得名，称圣安得烈十字架。此外，在拉丁十字架或称受难十字架旁有一个希腊十字架。描摹在衣料、图画和书籍上的，有条顿十字架、双十字架、基督受难地十字架。我在浮雕上见到苜蓿叶十字架、锚形十字架和爪形十字架。格雷芬十字架美

妙绝伦，马耳他十字架使人垂涎，带钩十字架已被禁止，还有戴高乐十字架，“T”字形十字架，洛林十字架，在海战上则叫做圣安东尼十字架，挂在链条上的刽子手十字架，教皇气派的教皇十字架，不堪入目的盗贼十字架，又名拉撒路十字架的俄国十字架。此外还有红十字。蓝十字不掺酒精标志。黄十字毒气毒死你，巡洋舰自己凿沉，十字军使我改宗，十字纹蜘蛛互相吞食，在十字路口我与你接踵而过，诉讼双方对证人发问，纵横交叉，纵横填字字谜在说：把我解开吧！我累得浑身酸痛，转身，背对十字架，也背对十字架上的运动，冒着他被踢腰背的危险，因为我是向一手扶着童子耶稣坐在她的右大腿上的童贞女玛利亚走去。

我站在左耳堂左侧祭坛前。玛利亚的脸部表情，妈妈过去十七岁在特罗伊尔当店员的时候肯定有过，因为买不起电影票，只好对着阿斯塔·尼尔森演的电影的招贴画望梅止渴，感同身受。

妈妈盯着右膝前的一个同我一样高矮的施洗者约翰，而对耶稣并没有兴趣。可是耶稣看上去要高两公分，尽管根据《圣经》所载，施洗者要比他大一些。把这个三岁的救世主塑造成一个赤裸裸、粉红色的形象，想必使雕塑匠感到十分有趣的。约翰由于后来要进沙漠，所以他身披一块褐色的蓬乱的毛皮，盖住了半个胸脯、肚皮和“洒水壶”。

我真该站在主祭坛前或者自由自在地待在忏悔室旁边而不去接近这两个孩子。这两个孩子早熟的目光同我的目光相像得吓人。他们也是蓝色的眼睛，和与我一样的栗色的头发。所缺的就是雕塑匠没把他们蠢乎乎的打着卷的头发剪掉；让他们同我一样留一个平头。

我不想同那个用左手的食指指着童子耶稣的施洗童子多纠缠，他仿佛正要开口念点数游戏的急口令：“我和你，繆勒的牛……”我不理这一套，只是认真地观察被我断定为孪生兄弟的耶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稣。他不仅体态与我相仿，就连当时只用来撒尿的“洒水壶”也同我的一模一样。他用来看世界的也是我那双钴蓝色的布朗斯基的眼睛，而最让我气愤的是他打着我的手势语。

我的写照耶稣将他的双臂举起，两手握成松松的拳，刚好可以把我的鼓棒塞进去。如果雕塑匠在他粉红色的大腿上也用石膏塑造一面红白相间的鼓，那就变成是完美无瑕的我坐在童贞女的膝上，击鼓召集教会的会众。在这个世界上，虽然有些事情非常神圣，人家却非不让它随心所欲地发展！

顺着铺着一条地毯的三级阶梯走上去就会看到穿银绿色衣服的童贞女、披巧克力毛皮的约翰以及肤色似煮熟的火腿的童子耶稣。那里有一个圣母祭坛，上面插着瘦瘦的白蜡烛和价格不等的鲜花。绿色童贞女、棕色约翰的粉红色耶稣的后脑勺上都粘着盘子大小的贴着金箔的昂贵的灵光圈。

要是祭坛前没有阶梯，我就肯定上不去。直至今天，在我除了病房之外别无所求的时候，门把阶梯和橱窗仍像当时一样对我极具诱惑力。我被一级一级地引诱上去，脚下始终踩着同一条地毯。我走近圣母小祭坛上这尊三人像，半是蔑视、半是尊敬地用指关节敲了敲他们，用手指甲刮了一道，露出了石膏像的本色。童贞女的衣服褶裥合着她的形体，曲曲弯弯地一直延伸到踩着云带的脚趾上。若隐若现的显出的童贞女胫骨的线条，使人推测到，雕塑匠是先塑肉身，然后再按形体的线条，加出衣服的褶裥来。童子耶稣的“洒水壶”没有割除包皮，这可是天大的错误。我伸手去摸了摸，蹑手蹑脚地按了按，想使它动弹，却感到自己的“洒水壶”有一种半是舒适半是新奇的骚扰感，于是我就缩回手不再摸他的，也希望耶稣再也别沾我的边。

我也不再深究，耶稣到底有没有割除包皮。我从套头毛线衫下陶出鼓，从脖子上取下，挂到耶稣的脖子上，同时又注意不把他的灵光圈碰坏。由于我个头太矮，我不得不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爬上塑像，踩在作为基座的云带上，让耶稣有鼓可敲。

我干这件事，不是在一九三六年一月受洗礼后第一次上教堂的日子，而是在那一年复活节前的一星期。整整一个冬天，我妈妈一直借忏悔来维持同扬·布朗斯基的关系。所以，我有足够的时间把我的计划肯定又否定，定为无理又申辩为有理，制定新的计划，从多个角度阐明它，如此这般反复推敲，最后全盘推翻，改在复活节前的星期一，借在十四幅耶稣受难像前默默祈祷之机，实行我的预谋。由于妈妈在复活节的生意达到高峰之前就急于要去忏悔，她便在复活节前的星期一晚上拉着我的手出了门，沿拉贝斯路拐过新市场入埃尔森街，再到玛利亚街，经过沃尔格穆特肉店，沿小锤公园向左拐弯，穿过恶心的黄汤不停滴下来的铁路旱桥桥洞，到了铁路路堤对面的圣心教堂，走进大门。

我们由于迟到而只看到两位老太太和一个受了惊吓的小伙子等在忏悔室前。当妈妈把大拇指舔湿了，像翻账本似的翻阅《告解箴言》，仿佛在编造税收申报书似的检查良心的时候我溜下橡木凳子，避而不看耶稣的心和那个运动员，径直朝左侧祭坛走去。

尽管事情刻不容缓，必须快速进行，但我还得按照弥撒仪式先唱登坛经，走上三个阶梯，“登上主的祭坛”向从小就给我欢乐的主走去。我把鼓从脖子上取下来，一边拖长声调唱着“求主怜悯”，一边登上云带的基座，不再去摸“洒水壶”省得耽误时间，而是在唱“荣耀归在天之主”前，把鼓挂到耶稣的脖子上，谨慎地不碰坏灵光圈，下了云带，唱“减罪、赦罪和宽恕”。但在此之前，我把鼓棒插入耶稣大小正合适的拳头缝里，走下阶梯，“我仰望群山”，再走过一段地毯，踏上有一张为我祈祷用的小矮凳的方砖地。他跪在小软垫上，将鼓手的双手举到面前，合十礼拜——“荣耀归在天之主”——目光从合掌的双手旁投向耶稣和他的鼓，期待着他敲鼓的奇迹出现：他不敲鼓是因为他不会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呢还是有人不允许呢？他如果不敲鼓就是假的，不是真耶稣，那么，我就是真耶稣了。

善于等待的人才能看到奇迹。我一开始还很耐心地等待，后来就耐心不足了，因为我越是长久地重复“众人的眼睛（或耳朵）都期待着你，主啊”这句经文跪在小软垫上的我就越发感到失望。虽然我给主提供了种种机会，闭上了眼睛，这样，耶稣就不必害怕自己开始时手法不熟练，而是在没有人看的情况下，下定决心敲起来，到最后，唱完第三遍信经，天父，造物主，现身的和没现身的，出自天父的独生子，真正的父的真正的子，他与父为一体，由父所生而非父所造，通过他，为我们世人和我们的拯救从天而降，被接纳，化为肉身，排出，他为我们生活在我们之中，被埋葬，升天，复活，坐在天父右边，归于天父，死者，不死，我信，天父通过他讲话，他与天父同在，我信神圣的、惟一的、天主教的……

天主教信条对我再也谈不上是什么信仰了，即使它那股味道我也没有一点儿兴趣了，只留存于我们的味觉中。我需要点别的东西。我需要听我的铁皮作响。耶稣应当敲出点名堂来给我听。即使声音很小，怎么说也是个小奇迹。我又不要求他敲出雷鸣般的巨响，吓得副神甫拉斯切亚冲到出事地点，连维恩克圣下也拖着他那一身肥肉费劲地来目睹奇迹，随后将一份份报告送到奥利瓦主教管区，主教又将验证书呈报梵蒂冈。我没有这份野心，并不想叫圣徒，名列《圣经》正经之中。我只要求耶稣私下里显一下小小的奇迹，让我听到或看到点什么，从而一劳永逸地确定我到底是击鼓赞成呢还是击鼓反对，并且就此揭示：这两个身材体形如出一辙又都是蓝眼睛的孩子，在以后到底谁是耶稣。

妈妈已经进了忏悔室，可能背完第六诫了，我担心地坐等着。那个总是在教堂里晃来晃去的老头儿，拖着软而不稳的脚步走过主祭坛，最后经过左侧祭坛，向童贞女和两个男孩敬礼。他

也许看到了鼓，可是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他拖着越走越显老的脚步走了过去。

尽管时间如流水，耶稣却不敲鼓。我听到传来了唱诗班的声音。我不禁担起心来，希望没人奏管风琴。如果他们开始为复活节排练的话，即使耶稣像呵气似的鼓声真的奏响，也会被管风琴的喧闹声盖住。

没人奏管风琴，也没出现耶稣敲鼓的奇迹。我便从软垫上站起来，膝盖咯咯地响，心烦意乱、垂头丧气地踏上地毯，一级一级地走上去，顾不得再念我熟悉的那一套套的祈祷文，爬上石膏制的云带，把一些中等价钱的花扔在地上，一心只想把我的鼓从那个愚蠢的赤臂童子身上取回。

不只今天，我要一直反复讲下去：想要教他点什么，这本身就是一个错误。我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想出这个念头来的。我把鼓棒取下来，鼓还留在他身上，先是轻敲，给这个假耶稣做点示范，随后就像一个不耐烦的老师似的敲了起来，接着，又把鼓棒塞进耶稣手里，给他一个机会来证明他已从我身上学到了一点本领。

我刚要从世界上最顽固头顶灵光圈的学生身上取下铁皮鼓并夺过鼓棒的时候，维恩克圣下、副神甫拉斯切亚、妈妈和那个老头儿都站在我背后。副神甫一把将我拉下来，神甫打了我一巴掌，妈妈对着我放声痛哭。维恩克圣下对我耳语，副神甫先屈膝行礼，随后爬上去，把耶稣手里的鼓棒拿出来。他手拿鼓棒，再次屈膝行礼，又爬上去，把鼓从耶稣身上取下来，折断了灵光圈，撞上了他的“洒水壶”把云带也踩坏了一块，下跪，走下阶梯，又下跪。他不想把鼓还给我，这让我较之刚才更为气愤，气得我用脚踢神甫，又让妈妈丢了脸。她自己羞得脸都没处搁，因为我又踢、又咬、又抓，随后挣脱了神甫、副神甫、老头儿和妈妈的手，奔到主祭坛前。这时，我觉得魔鬼正在我身上蹦跳，听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到它又像在我受洗礼那天低声对我说：“奥斯卡，快瞧啊，周围都是玻璃的窗户，全是！”

我唱出的一声歌声越过十字架上那个既不抽搐又不说话的运动员的头顶，传向教堂半圆形后殿高处的三扇窗户，蓝的底色上用红、黄、绿三种颜色画着十二个使徒。我的目标既不是马可，也不是马太，而是他们头顶上那只头冲下，庆贺圣灵的降临的鸽子。我对准圣灵，发出颤音，用我的金刚钻对付那只鸟。是因为我的失误或那个运动员由于不抽搐而提出抗议还是谁都不理解的奇迹呢？他们看着我浑身颤抖，对着后殿无声地呵气，除了妈妈知道我在干什么，都以为我在祷告，而我却是要唱碎玻璃，但是我失败了，这不是我大显身手的时候。我躺倒在方砖地上，辛酸地哭泣，因为耶稣和我都不灵了，因为圣下和拉斯切亚误解了我，一见我这个样子，就瞎扯什么我后悔了。只有妈妈没有使我失望。她知道我为什么流泪，虽然她暗自庆幸玻璃还完好无损。

妈妈抱我起来，请副神甫归还鼓和鼓棒，答应圣下赔偿损失，并请他补给一份赦免我打断忏悔之罪的文件；虽然我也受到了祝福，但我对此毫无感觉。

妈妈抱着我走出圣心教堂的路上，我扳着指头计算：今天是复活节前的星期一，明天是星期二，星期三，洗足星期四，耶稣受难日，那个敲不响鼓，也不给我享用唱碎玻璃的乐趣的家伙完蛋了。他虽然和我极其相似，但仍是假的，所以他必须进坟墓，而我得以继续敲鼓，但不再要求显示什么奇迹了。

耶稣受难日的菜谱

用两相矛盾来形容我从复活节前的星期一到耶稣受难日之间的心情比较合适。一方面，我为那个石膏做的童子耶稣不愿敲鼓而生气，另一方面，我又为重新得到这面鼓而高兴。一方面，我

的声音失灵了，教堂的玻璃窗并没有被我唱醉，另一方面，鉴于这神圣的彩色玻璃，我保留下了对天主教的还将给我灌输许多令人绝望的亵渎神明的灵感的残存的信仰。

但这并不是全部的。一方面，从圣心教堂回家途中，我试验性地唱碎了一个顶楼上的玻璃，另一方面，我对我的声音只能对世俗的目标奏效而无法破坏教会的东西而感到奇怪。两相矛盾，我自言自语道。这道无法弥合的裂痕，至今犹与我同在，尽管我既不是住在教会范围内，也不是在世俗的地区里居住，而是住这两处之外的一家疗养与护理院里。

妈妈赔偿了左侧祭坛的损失。复活节生意兴隆，虽然新教徒马策拉特坚持在耶稣受难日不营业。平时一贯独断专行的妈妈，每逢耶稣受难日就让步，店铺关门，停止营业。但是，她又反过来根据天主教的理由，要求在基督圣体节殖民地商品店停业一天，并把橱窗里的贝西尔肥皂粉的盒子和哈格牌咖啡的样品，换成电灯照明的彩色小圣母像，还参加在奥利瓦举行的天主教士与教徒的列队游行。

我们有一块两面分别写着“耶稣受难日，停业一天”和“基督圣体节，停业一天”的硬纸板。过了那个既无鼓声也无唱碎玻璃声的星期一，接着就是耶稣受难日，马策拉特把硬纸板挂进橱窗，写着“耶稣受难日，歇业一天”的那一面朝外。早餐一过，我们就乘电车去布勒森。两相矛盾这个字眼也适用于拉贝斯路的景象。新教徒都上教堂去了，天主教徒要在家把玻璃窗擦亮，在后院用很大的劲头回声四起地拍打所有的毯子一类的东西，让人听了真以为在每幢公寓的院子里，都有《圣经》上的兵丁把有分身法的救世主钉到十字架上去。

渐渐地，这些声音远去了，妈妈、马策拉特、扬·布朗斯基和我，这久经考验的一组人乘上九路电车，穿过布勒森路，路过飞机场、旧练兵场、新练兵场，在萨斯佩公墓附近的道岔旁下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车，等候从新航道驶往布勒森的电车。妈妈利用等车的机会，微笑着发表了厌倦生活的观感。她觉得在那个废弃的教会小坟场上，畸形的沙滩矮松下，上世纪的墓碑歪斜着，杂草丛生的景致很美，浪漫而又迷人。

妈妈怀着爱慕之情说：“如果那个公墓还有人管理的话，我真想将来长眠在那里。”但是，马策拉特却坚持那儿的土沙性太大，还挑剔说那儿处长满了飞廉草和野燕麦。扬·布朗斯基的顾虑是那已经从一块乐土变成了连机场的噪声和在公墓附近调头的电车都会使那里的宁静被打破。

我们开来的电车在我们身边调头，售票员按了两次铃后才上车。电车离开萨斯佩和它的公墓，朝浴场所在地布勒森驶去。那时节，将近四月底，景象却十分荒凉。饮食铺钉上板条，疗养院紧闭大门，海滨散步小道上不见三角旗，游泳场上，二百五十个帐篷空荡荡地一字儿排开。写天气预报的黑板上，还标着去年的粉笔字痕迹——气温：二十度；水温：十七度；风向：东北；天气形势：晴转多云。

开始我们是计划走到格莱特考的，可后来也没人说话就反向朝防浪堤走去。辽阔的波罗的海懒洋洋地舔着沙滩。直到夹在白色灯塔和有航标的防浪堤之间的入港航道为止，一路上一直没人。踩掉昨天下的一场雨，在沙土上留下了规则的印痕；换上自己的脚印，让人很高兴。妈妈和我都把鞋袜脱掉了在沙上走着。马策拉特想逗逗能拣起银币大小的砖头碎片，轻投出去，让它在绿色的水面上连续跳跃。扬·布朗斯基手法不灵巧，在扔砖头片的间歇中，寻找琥珀，而且也真的找到了一些小碎片，其中有一块樱桃核那样大小，便拿来送给了我妈妈。这时，妈妈和我，光着脚在奔跑，天边，遥遥可见的是灰带般的赫拉半岛。太阳小心翼翼地发着光。阴凉，无风，清爽；还像爱上了她的脚印似的经常回头望一望。还有两三道逐渐消失的黑烟以及不时地从地平

线上冒出来的一艘商船的上层建筑。

我们四个前后不一间距不等依次来到宽阔的防浪堤基部的花岗岩石上。妈妈和我又穿上鞋袜。她给我系鞋带时，马策拉特和扬已经在高低不平的防浪堤顶上在石头上跳来跳去，向空荡荡的大海蹦去。我非常想用梳子梳理那些在坝基隙缝里散乱地长着的一丛丛蓬乱的海草。但是妈妈牵着我的手，跟在那两个像小学生似的乱蹦乱跳的男人后面走去。虽然每走一步，鼓就撞一下我的膝头，然而我还是宁愿忍受。妈妈穿一件带覆盆子色翻边的天蓝色春大衣。她穿着高跟鞋在凹凸不平的花岗岩上走起来特别费劲。我身穿星期日和节日服装。金锚钮扣的水手大衣。如果有风格蕾欣·舍夫勒的纪念品，绣着“皇家海轮赛德利茨”号字样的水手帽上的飘带会飘舞的。马策拉特解开了棕色长大衣的钮扣。扬一向很讲究，穿一件闪亮的天鹅绒领双排钮扣大衣。我们雀跃着来到防浪堤尽头的航标处。航标下坐着一个年岁较大的男人，头戴装船工帽子，身穿棉上装。他身边有一条装土豆的口袋，里面有什么东西在抽搐，在不停地掀动。这个被我猜作家在布勒森或新航道的男人手捏着缠着海草的晾衣绳的一头，另一头隐没在河水仍然浑浊，虽无公海推波助澜，却不停地冲刷着防浪堤的石块的莫特劳河入海口咸淡相混的水里。

我们都想了解，为什么这个戴装船工帽子的人用普通的没有浮标的晾衣服绳子钓鱼。这位被妈妈亲切地戏称为“大叔”的人咧嘴一笑，露出了被烟草染成褐色的残缺的牙齿，也不作解释，却从嘴里吐出一长条嚼碎了的烟草渣儿，在空中旋了几个转，落在下面涂了沥青和油漆的花岗岩石间的烂泥地上。最后飞来一只海鸥，灵巧地绕过石块，在飞翔中把还在摇晃的吐出的烟草渣儿叼走，招来了另一些海鸥，尖叫追逐。

由于防浪堤上很冷，即使太阳的照射也不能让我们感到暖和，我们都想离开了。这时，那个戴装船工帽子的人开始一把一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把地往回收绳子。尽管如此，妈妈还是想离开。马策拉特反对，就连平时一贯支持妈妈的扬也不愿动弹，而我则无所谓。由于大家都站着不走，我就注意地看着。装船工一下一下均匀地拽着，每拉一把，便把绳上的海草捋掉，并将绳子聚拢在两腿间。也就是那时，我注意到在半小时左右以前上层建筑才露出地平线的商船现在已经改变航向朝港口驶去，我看它吃水很深，猜测这是一艘瑞典运铁矿砂的船。

当装船工懒洋洋地站起身来时，我也将目光从那条瑞典船上转移过来对马策拉特说：“好吧，现在咱们来瞧瞧是怎么回事。”马策拉特点着头，但心里却莫名其妙。“现在咱们来瞧瞧……”装船工一边拉着绳子，一边不断地重复着。这时，他拉绳子的力更大，从石堆上走下去，把双臂探进花岗岩石间咕咕冒泡的小湾子里，摸着，抓到了什么东西（妈妈没有及时地背过脸去）。他使劲抓住，拉上来，大声叫我们闪开，接着把一个滴着水，一团活生生地扭动着的沉重家伙扔在我们中间：一个刚宰的黑鬃马的头。这匹马昨天或前天肯定还在嘶鸣，因为它的头没有腐烂，或发臭，顶多有一些莫特劳河水的气味，但很快防浪堤上到处溢着这股气味。

此刻，帽子已经滑到后脑勺上的戴装船工帽子的人两腿叉开站在马头旁，浅绿色的小鳗鱼像发狂似的从上面游下来。因为那些石块又湿又滑，鳗鱼游动得又快又机灵，因此那个人抓得很费劲。随即飞来了海鸥，在我们头顶上乱叫。它们冲下来，三四只海鸥争抢一条小的或者不大不小的鳗鱼，轰也轰不走，占据着属于它们自己的防沙堤不动。虽然这样，那个装船工一边挥拳轰海鸥，一边抓鳗鱼，大约有二十四五条较小的鳗鱼被他塞进了口袋里；一向乐于助人的马策拉特帮他张着口袋。所以，他也就没有看见脸色苍白的妈妈相继把手和头靠在扬的肩头和天鹅绒大衣领上。

小的和中等个儿头儿的鳗鱼都被塞进口袋里去之后，那个在忙碌中头上的帽子已经掉了的装船工动手从马嘴里抠出了更粗的黑鳗鱼。这时，妈妈站不住了，只好坐下来。扬要她把脸转过去，她非但没有听，而是瞪大了牛眼睛直愣愣地看装船工抠鳗鱼。

“他偶尔哼出这样一句半句，‘现在让咱们来看一下吧！’他用胶靴帮着掰开马嘴，在上下颚之间撑进一根短棍，露出了完整无缺仿佛马在咧嘴发笑的黄马齿。秃脑瓜活像一只鸡蛋的装船工用两只手伸到马的喉咙里，每次都拽出两条至少有像胳膊一样大小的鳗鱼来。这时，张开大嘴，吐出了吃下的全部早饭，结成块的蛋白，夹在泡过牛奶咖啡的白面包团里拉丝的蛋黄，全部喷在防浪堤的石块上。她把早餐吃过的东西吐光后还在呕，虽然什么都吐不出来了。因为她体重超过正常标准，一定要减轻不可，于是试了各式各样节制饮食的方法，不过她总偷着吃点什么，所以难得坚持到底，惟独星期二妇女同盟的体操她是非去不可的。谁也改变不了她的主意，尽管当她提着运动包出门时，扬和马策拉特都讥笑她。她穿着发亮的蓝色运动服，同那些滑稽可笑的女人们一起做棍棒操，但并没有变苗条。

那天，妈妈吐在石头上的东西充其量也不过半磅。她想尽量地呕吐，但再也减轻不了分量了，除绿色的黏液外，别的什么也吐不出来，但在她刚开始吐的时候，就引来了海鸥，它们盘旋着，越飞越低，肥壮而光滑的身躯直冲下来，争食我妈妈的早餐。它们不怕自己变胖，也不怕别人驱赶，也没人驱赶它们。因为扬·布朗斯基害怕海鸥，双手护住了自己那双漂亮的蓝眼睛。

它们也不理会我，虽然我已经敲起鼓来，但却只能让海鸥变得更多。马策拉特则笑着全然不顾我妈妈。他模仿那个装船工，装出一副神经坚强、一点儿也不在乎的样子。装船工快抓完了。最后，他从马耳朵里拽出一条又粗又长的鳗鱼，并把麦糊似的脑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浆也全部带了出来。马策拉特一下子脸色煞白，但还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他用不多的钱向装船工买了两条不大不小的两条粗的鳗鱼。

我从心底称赞扬·布朗斯基。他自己都快哭出来了，还是很滑稽地搀扶起我妈妈，一条胳膊搂着她的腰，另一条胳膊横在她前面，领着她离去。妈妈穿着高跟鞋踉跄地在乱石间一步一屈膝地向海滩走去，但总算把脚踝骨扭伤。

我依然留在马策拉特和装船工身边。装船工重新戴上帽子，指着那个盛土豆的口袋向我们解释为什么要放半口袋的粗盐粒。他说鳗鱼钻进盐里后，仍不停地游动，直到死了为止，这样，就把皮上和体内的黏液都留在盐里了。做熏鳗鱼就是用这种方法。虽然警察局和动物保护协会禁止这样干，但也不起什么作用。要去掉鳗鱼上和体内的黏液，别无他法。去掉了黏液，再用干煤泥细心地把死鳗鱼擦干净，装到熏罐里，挂在山毛榉火堆上熏制。

马策拉特认为既然鳗鱼钻到了马头里，那么它在盐里游动也是有道理的。装船工说，它们还会钻到人的尸体里去。据说，尤其在斯卡格拉克海战以后，鳗鱼变得又肥又粗。几天前，疗养和护理院的一位医生还对我说，有一个已婚妇女用一条活的鳗鱼来搞肉体享乐。结果鳗鱼咬住不放，她被人送进了医院。结果她由此失去了生育能力。

装船工系上装盐和鳗鱼的口袋，动作娴熟地扛上肩，把卷起的晾衣服绳子套在脖子上，迈着沉重的步子朝新航道走去。此时，那般芬兰运木材的约一千八百吨的商船也向那个方向停靠。扛口袋的装船工可能和那条芬兰船上的一些人熟悉，因为他在向那条生锈的船挥手并喊话。芬兰船上的人们也向他挥手并喊话。可我不明白为什么马策拉特也做同样的动作。他是个地地道道的莱茵兰人，对航海一无所知，至于那些芬兰人，他一个也不认识。只能说，这是他的一种陋习，别人挥手，他也挥手，别人大

笑、喊叫、鼓掌，他也大笑、喊叫、鼓掌。正因为这样，他入党比较早，那个时候，根本没有这样做的必要，仅仅浪费了他星期日上午的时光，也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好处。

我跟在马策拉特、那个新航道人和那艘超载的芬兰船后面慢慢走着。我不时地转过身去，因为装船工把那个马头留在了航标下，但现在被一群海鸥遮住已经看不到了，像酒瓶绿的大海中的一个闪闪发光的白窟窿，又像一片新洗干净的云，随时可以整洁地升到空中去。它们尖叫着遮掩了那只不再嘶鸣而在尖叫的马头。

看完这一切，我连蹦带跳地跑着离开了马策拉特和那群海鸥，一边用拳头捶铁皮鼓，把飞在抽短烟斗的装船工超过了，来到防浪堤起点旁扬·布朗斯基和妈妈身边。扬还如刚才那样扶着我妈妈，但另一只手伸到她的大衣领子下面。妈妈的一只手也插在扬的裤兜里。马策拉特此时离我们很远，并且正在用一张在防浪堤乱石间捡到的报纸，包那四条装船工用石头砸晕了的鳗鱼，他什么也没看到。

马策拉特挥着那捆鳗鱼赶上来，夸口说：“他要一个半，我给你一个盾就买下来了。”妈妈的脸色有些好转，两只手放在一起。她说：“你想让我吃你的鳗鱼是做梦。我今后不会吃任何鱼了。”马策拉特笑着说：“算了吧，亲爱的。你可是知道人家怎么抓鳗鱼的，过去你还不是照样吃，还吃新鲜的。等我做好了，加上有花色的配菜，再来点色拉，看你吃不吃。”

默不作声的扬·布朗斯基已经不失时机地把手从我妈妈大衣里抽了出来。为了让他们别再谈鳗鱼，我敲着鼓一直到了布勒森。在电车站上以及上了拖车以后，我继续用敲鼓的方式阻止这三个成年人谈话。鳗鱼很老实。到了萨斯佩，因为电车已经停在站上，我们没有停留。刚过飞机场，我还在敲鼓，马策拉特却说他现在饥饿难耐。妈妈没有答理，她的目光避开我们三人，望着别处。直到后来扬给她一支“雷加塔”牌香烟，她才把头转过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来。扬给她点火，她把金色烟嘴塞进嘴唇中间去时，朝马策拉特莞尔一笑，因为他喜欢她在公共场合吸烟。

我们在马克斯·哈尔贝广场下车，在我意料之中，妈妈挽着马策拉特的胳膊。扬同我并排走，挽着我的手，吸完了妈妈抽剩下的香烟。

信天主教的家庭主妇们还在拉贝斯路那里拍地毯。马策拉特开寓所门时，我见到住在五楼的小号手迈恩隔壁的卡特太太正右肩上扛着一条卷起的浅棕色地毯，用鲜肉色的粗壮胳膊扶着上楼梯。闪光的是她两个胳膊窝里被汗水腌咸并粘结在一起的金色腋毛。地毯的两头，一前一后地搭拉下来。要是她已去世的丈夫活着时喝醉了酒，她也会这样扛他的；她一身肥肉，穿着波纹绸罩衫，走过我们的身边，由于不同日子造成的不同味道：阿摩尼亚味，泡菜味，碳化钙味直刺我的鼻子。

然后，从院子里传来那种均匀的拍打地毯的声音，紧追不舍地把我赶进屋里，最后因为柜子里挂着的冬季大衣能起隔音作用，挡住复活节前那种噪音中最严重的一部分，我只好到卧室的衣柜里去躲藏。

我躺进衣柜里，一方面，是因为卡特太太拍地毯，另一方面，妈妈、扬和马策拉特还没脱掉大衣，就已经为耶稣受难节的菜谱争吵起来。但是争吵的内容已超过了鳗鱼的范围，同以往一样，又把我给搬了出来，当然是我从地窖阶梯上摔下去那个著名事件：全怪你，全怪你！——我现在去做鳗鱼汤，别那样装腔作势的！——你做什么都行，除了鳗鱼。地窖里有很多罐头。去拿个鸡油菌罐头上来！记得关严活板门，省得再出事。——别再念这本经啦！这里有鳗鱼，就是它了，加上牛奶、芥末、香菜和盐土豆，再来一片月桂叶，加点丁香。——算了！——阿尔弗雷德，她不要吃，省了吧！——你别管，鳗鱼买来是吃的，我会收拾干净，洗干净的。——不要，不要！——看着吧！东西端上桌

再看倒底谁吃谁不吃。

马策拉特故意把起居室的门砰的一声关上了，到厨房里收拾去了。他在鳗鱼头部下面交叉划了两刀。妈妈一听这声响就展开了联想，以至于站不住，只得坐到沙发榻上，扬·布朗斯基立刻跟着坐下去。然后，他们两人就手握着手，用卡舒贝话在那里聊开了。

当这三个大人分成两处的时候，我还在起居室里待着。我坐在瓷面砖火炉旁的一张儿童椅子上面摆动两腿，扬凝视着我，虽说他们也搞不出更多的名堂来，但我对他们还是妨碍的。因为马策拉特同他们只有一墙之隔，虽说看不见，但他像挥舞皮鞭一样地挥舞着半死不活的鳗鱼，他们害怕它们。所以，他们只能互相握着对方的手，捏着，逐个地拉那二十个手指头，把它们弄得嘎巴直响，终于使我再也忍受不住了。从院里传来的卡特太太拍地毯的声音，已经够了，这些声音虽没有增加音量，但却透过一层的墙壁愈来愈逼近了。

我不想突然离开而引人注目，从小椅子上滑下来，便在火炉旁边蹲了片刻，接着，一心一意地敲着鼓，跨过门槛，溜进卧室。

我为了不发出声响，半掩了卧室的门，并断定没人会喊我回去，所以十分满意。我还考虑了一下，倒底应该钻到床底下去，还是藏进衣柜里去。因为钻在床底下会弄脏我这件过分讲究的、海军蓝的水手大衣，我还是选择衣柜。柜子的钥匙我刚好能够着，拧了一下，打开镶镜子的门，用木棒把一件件套在衣架上再挂在横木上的大衣和冬装推到一边去。我只有踩到鼓上才能够着衣架，挪动这些沉重的服装。柜子中央终于有了一道可容我蹲在里面的空隙。我费了一点力气，把镶镜子的柜门拉上了，在柜底找到一条女用围巾，用它卡住柜门，留出一指宽的缝，既能透气，又能在必要的时候当瞭望孔用。我坐在那里把鼓放在腿上不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再敲，只能闻到冬大衣的气味。

有这么一个美妙的柜子，又有这些沉重的、使人快要窒息的衣服，让我几乎把所有的念头都集中在一起，扎成一捆，馈赠给想象中的某个十分富有的人物，而且他庄重地接受了我的礼物，却没表现出任何的快活。

每当我全神贯注发挥我的想像力的时候，我就同往常一样神游布鲁恩斯赫弗尔路那位霍拉茨医生的诊所，重温每星期三就诊时对于我最为重要的那部分内容。我所想的，不是那个给我做越来越繁琐检查的医生，而是他的助手，给我脱衣服、穿衣服，量身高、体重以及做试验的和其他一切事情的护士英格。她做得正确无误，但总有点粗暴生硬，每次都讽刺地报告说：失败。但霍拉茨却称之为部分成功。我难得瞧一眼护士英格的脸，我的目光以及那颗时而被挑动的鼓手的心，只能欣赏她那身由于洁净而显得更白的护士服，她当做帽子戴的轻飘飘的织物，以及一枚非常朴素、镶有红十字的胸针。注视她那身护士服一再更新的褶裥可真有意思。使人怀疑里面是否有肉体。她那张脸越来越老，她那双虽然想尽一切办法绞尽脑汁地保养，却还是瘦骨嶙峋的手暗示出她是一个女人。当扬甚至马策拉特掀起我妈妈的衣服时，她身上散发出来的韵味，护士英格是没有的，因此这证明她的体格与我妈妈的有差别。她身上有一股肥皂味和令人困倦的药味。在她给我这小小的、据说是生病的身体听诊的时候，我就常常瞌睡不已。那是从她白衣裳的褶裥里产生出来的轻微的睡意，石碳酸味笼罩下的无梦的睡眠，但有时候，她的胸针远远地变大了，变成了不知是什么的东西：旗帜的海洋，阿尔卑斯山的红光，虞美人盛开的田野，准备起义，反抗印第安人，樱桃，鼻血，公鸡的鸡冠，大量的红血球，直到使我的全部视野变成一片红色，构成一种不管什么时候都是不言而喻且无以名状的热情的背景，因为“红”这个微不足道的字眼不表达任何意思。鼻血同它无关，旗

帜也会褪色，我尽管如此还是称之为“红”，红色便唾弃我，把它的大衣里外翻转：黑色，厨娘来了，黑色，吓得我面无血色，她骗我，说天上的蓝色掉下来了，我不信，也不能使我变成棺材的绿色，我躺在里面吃草，被绿色盖住，不见日光变成白色又染黑，吓得我脸色发黄，黄色骗我说是蓝色，我不相信蓝色是绿色，绿草地里开红花，护士英格的胸针是红色，她在她的护士服的衣领上别着一个红十字；不过，无论在衣柜里还是在别的地方，我的想象几乎不能在这种一切象征中最单纯的颜色上停留。

各种的喧闹声从起居室里传到我藏身之处，把我从刚奉献给护士英格的半睡状态中唤醒过来。我头脑清醒、张口结舌地坐在各式各样的冬大衣中间，铁皮鼓搁在膝上，闻着马策拉特的纳粹党制服和边上皮腰带的气味。带弹簧钩的皮背带。但是，护士服的白褶裥我给忘了，我两旁挂着的是毛料、精纺毛料和灯心绒，头顶上是前四年各种式样的帽子，脚边上是大人鞋，小孩鞋，上蜡的皮靴绑腿，钉和没钉平头钉的鞋后跟。我后悔留下一道缝在镶镜子的门中间，射进的光亮让我将外面看得很清楚。

起居室里的那几个，没什么可让我看的。马策拉特撞见了沙发榻上那两个是很可能的，因为扬一直小心提防，而且不仅是在玩施卡特牌的时候。事实上，马策拉特杀完鳗鱼，剖腹，洗净，煮熟，加佐料，尝过味道，把加盐水土豆的鳗鱼汤盛在大汤碗里，端到起居室的桌上，因为妈妈和扬没有要吃的意思，便自夸鳗鱼汤如何鲜美，像吟诵祈祷文似的背他的烹调法，又把加的佐料从头到尾数了一遍。妈妈用卡舒贝话大叫大嚷。马策拉特虽然听不懂且难以忍受，但还得听着，反正说是鳗鱼；还有就是我从地窖阶梯上摔下去的事，妈妈每次喊叫，都离不开这些内容。马策拉特回敬了几句。他们各自的台词，都背得滚瓜烂熟。扬插进来责备几句。否则，就不是一出好戏了。接着是第二幕：砰地把琴盖打开，没有乐谱，背着弹，两只脚各踩一只踏板，三个人前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后不一地吼起《神弹射手》里的《猎人合唱》来：“世上何物相类似……”唱到半中腰，砰的一声又把琴盖盖上，从踏板上抬起脚，罩上琴罩。妈妈走进卧室，瞧了一眼衣柜镶镜子的门。我从门缝中看见她横躺到蓝色华盖下的结婚床上，放声大哭，十指朝天，就像结婚城堡床头挂的那幅金框彩色画上祈祷的从良妓女。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只会听见妈妈的哭声、床发出的轻微的嘎吱声以及起居室里传来的含糊的嘟哝声。扬安慰马策拉特，马策拉特请扬去安慰我妈妈。慢慢地嘟哝声淡去了，扬进了卧室。第三幕：他站在床前，看看妈妈，又看看祈祷的从良妓女，小心翼翼地坐到床沿上，抚摩脸冲下趴着的妈妈的背部和臀部，用卡舒贝话抚慰她，后来由于这些并不起什么作用，便把手伸到她的裙子下面去，直到她停止啜泣。这时，扬的目光也可以从十指纤纤的从良妓女身上挪开了。接下来是不可不看的：扬干完事后，站起身来，用手帕擦擦手指，用留在起居室或厨房里的马策拉特能听清的话大声对妈妈说：“来吧，阿格内斯，忘了这事吧！阿尔弗雷德早就把鳗鱼端走扔进厕所了。让我们高兴一些去玩施卡特牌如何？你如果愿意，我们赌四分之一芬尼一点怎么样？把这些事情忘了，恢复了和气，阿尔弗雷德会给你做蘑菇炒鸡蛋和油煎土豆吃的。”

妈妈什么也没说，翻身下床，拉平黄床单，对着衣柜门上的镜子梳了梳头发，在扬走后也离开了卧室。我的眼睛从窥视缝前刚挪开便听到他们洗牌的声音和谨慎而轻微的笑声，马策拉特签牌，随后大家叫牌。当时叫牌的是扬，马策拉特是下一家，扬喊到二十三点他就不要了。妈妈接着，一直喊到三十六点，这时扬也不得不让步。妈妈总算打满了三十六点，差一点她就输了。第二盘打红方块，扬稳拿冠军。第三盘，妈妈打红心三十点，侥幸赢了。

这场家庭牌戏除了中间断过一次吃饭外，一直持续到深夜。

可是，接下去的牌局，我几乎没听到。我又重新设法寻到护士英格和她的催人入眠的白色护士服。可是，在霍拉茨医生诊所里的情景却依然很不清楚。不仅绿色、蓝色、黄色和黑色一再来破坏红十字胸针的红色，而且今天上午发生的事情也掺了进来：通往听诊室和护士英格的门刚打开，在我眼前浮现的总不是洁净而轻盈的护士服，而是新航道防浪堤上航标灯下那个装船工正从水淋淋的马头上把爬满的鳗鱼抓下来。我本想把白色同护士英格联系起来，却不料都是海鸥的翅膀，顷刻间，遮盖了马头和马头里的鳗鱼，直到伤口又迸裂，但流出的血是如那匹黑马般的黑色。酒瓶一般绿的大海，给幻景增添一点锈红色的是那艘运木材的芬兰船，那些海鸥像云一样遮盖了那个献祭品，把它们翅膀尖伸进去，拽出鳗鱼来，扔给护士英格。她接住并赞颂它，而且把自己变成了海鸥，像云一样，在肉上降落。庆祝圣灵降临节。

我知道努力也无济于事，怒气冲冲地踢开镶镜子的柜门，爬出柜子，在镜子前照了照，高兴的是卡特太太再也不拍打地毯了。虽然耶稣受难日对于我来说是个完结，但我自己的受难日则开始于复活节过后。

棺材一头小

妈妈和我是一样的。这个马头上爬满鳗鱼的耶稣受难日之后，我们同布朗斯基一家到比绍乡下同外祖母和舅公文岑特一起过完复活节。这时，即使五月的明媚天气也无法挽回她的受难日来了。

又有传闻说妈妈又背着马策拉特吃鱼。复活节过后半个月，她莫名其妙地像中了邪似的，完全不顾自己身体会发胖，自动大吃起来，吃的数量之多使马策拉特只有对她说：“别吃那么多鱼了，好像别人强迫你吃似的。”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但是，她早餐吃橄榄油浸的沙丁鱼。两小时以后，店里没有顾客的话，她便大嚼板条箱里装的博恩扎克的西鲱鱼。午餐时，她准要吃加芥末调味汁的煎比目鱼或鳕鱼。下午时，她又手里又拿着开罐刀，开肉冻鳗鱼、鲱鱼卷和油炸鲱鱼罐头。晚餐时，要是马策拉特不再煎鱼或熬鱼汤，不说也不骂，只是站起身来，离开饭桌，从店里拿回一块熏鳗鱼。她用刀子把鳗鱼皮上和肚子上的肥油刮下来吃。这使我们两个大倒胃口。白天，她连续地呕吐。马策拉特既担忧又没什么办法，只能问她：“你是不是怀孕了？”

“乱说！”如果妈妈愿意说话就会这样答复他。一个星期天，外祖母科尔雅切克来了。她一见端上桌来的是在黄油调味汁里游泳的青鳗鱼和新鲜土豆，便气得拍桌子说：“怎么回事，阿格内斯，你倒是说呀！你不该吃鱼，却吃鱼吃疯了，你也不说明白为什么！”妈妈只是摇头，把土豆推到一边，从黄油调味汁里把鳗鱼捞上来，继续埋头大嚼，像是在完成一项费力的任务。扬·布朗斯基一声不吭。有一次，我又撞见他们两个正在沙发榻上，同往常一样，互握着手，衣服也很凌乱。但是让我在意的是扬哭得眼睛红肿，还有我妈妈对我置之不理的态度也让我明白。她跳起来，一把抓住我，把我抱得紧紧的，给我看一个无法填满的，即使用巨量的煎鱼、熬鱼、罐头鱼和熏鱼也是填不满的深渊。

不久，我见她在厨房里除了大嚼普通的、该死的油浸沙丁鱼外，还把她保存下来的许多吃剩的罐头里的橄榄油倒进一个做调味汁的小钵里，在煤气上煮熟后喝下去。这时站在厨房门口的我吓得把手里的鼓都掉在地上了。那晚，妈妈被送进了市立医院。马策拉特在救护车未到之前，大声哭喊着：“你为什么不要孩子？我并不在乎他是谁的呀！你是不是还因为那个该死的马头？我们真不该去呀！忘了它吧，阿格内斯！我可不是故意的呀！”

妈妈被抬上救护车。在街上聚满的孩子和大人的注视下，车

开走了。实际上，防浪堤和那个码头是妈妈无法忘记的。她带着对那匹不知叫弗里茨还是汉斯的马的记忆去医院了。她身上的每一个器官都记录着对耶稣受难节那次远足的痛苦而清晰的记忆，因为害怕再去那里，她身上的器官已经同我妈妈一样要选择死亡。

霍拉茨医生说是黄疸病和食鱼中毒。并断定，妈妈已怀孕三个月，让她住进我们能去探望她的单人病房。有四天之久，她给我们看到的是一张由于恶心和痉挛而苍白的脸。有时，她费力地想使前来探望的人高兴，一边恶心一边向我微笑。恰如我今天每逢探望日也要费力地显出一副面孔使朋友们都高兴那样，但她还是在周期性的恶心迫使下一再把日渐消瘦的身子探到床外，弯下来，可是却什么也吐不出来了。最后，在那艰苦的死亡过程的第四天，她吐出了那每个人最终都要吐掉后才能去领死亡证书的最后一口气。

当我妈妈体内再也没有恶心来损坏她的美的时候，我们大家都轻松多了。等她被人擦洗干净，换上寿衣，躺在那里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又是她那张亲切的、天真中露出几分狡猾的圆脸。由于马策拉特和扬·布朗斯基哭得什么也看不见了，只有让护士长给妈妈合上眼皮。

那两个男的、外祖母、黑德维希·布朗斯基以及快十四岁的斯特凡都在哭，但我不能哭。妈妈的死我是在意料之中的。每星期四陪她进旧城，每星期六伴她上圣心教堂，我察觉已久，多年以来，她一直费尽心机地在寻找这样一种方式来解决他们的三角关系。一方面能使或许是她所憎恨的马策拉特承担她死的罪责，另一方面又能使扬·布朗斯基在波兰邮局继续干下去，并且永远想着：她是为我而死的，她为了我的前程而自我牺牲了。

妈妈和扬，不仅深谋远虑的找了个不受人干扰的幽会地点，也都具备干风流韵事的天赋，他们可以被看做罗密欧和朱丽叶，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或者看做据传为深海所阻、不能团圆的王子与公主。妈妈及时地领受了临终圣礼。她冷冰冰地躺在神甫的祷告声中任凭怎样她再也不动弹了。这时，我有了时间和空闲去观察那些多半信新教合掌的方式同天主教徒不同的护士。我可以说，她们越来越信赖自己。她们称“我们的父”时，所用字眼也同天主教原版经文不同，并且也不像外祖母科尔雅切克、布朗斯基一家和我那样画十字。有可能生育了我的父亲马策拉特在祷告时却和其他教徒不同。他不是两手十指交叉握紧了放在胸前，而是手指痉挛着放在下面，大约在生殖器附近，把一种宗教换成了另一种宗教，并且害羞地不想让别人看他祈祷。我的外祖母在她哥哥文岑特的身边跪在死者床前。她旁若无人地大声用卡舒贝语做祷告，而文岑特只是可能用波兰话的嘴唇在动，圆睁的眼睛里充满着天神显灵的景象。我真想敲我可怜的妈妈给过我的红白相间的铁皮鼓。与马策拉特的愿望相悖，我在摇篮里得到的慈母的许诺。是给我一面铁皮鼓。不仅如此，我妈妈的美，尤其是在她身材还苗条、不必去做体操的那段岁月里，有时还是我在鼓上敲出的形象的蓝本。我终于控制不住自己到我妈妈去世的房间里，再次在我的铁皮鼓上敲出她灰眼睛的美的理想形象来。令我惊奇的是马策拉特竟会在护士长抗议时站在我这一边，悄声地劝护士长：“护士小姐，您就让他敲吧，他们就是这样互相爱抚依恋的。”

妈妈也许很开心，或很害怕，还可能很快忘掉一切。但是妈妈的记忆力特别强。妈妈可能把我连同洗澡水一起倒走，也可能同我坐在一个浴池里。我也许会把妈妈丢了，但找到她时却在同她一道行走。当我把玻璃唱碎的时候，妈妈便用油灰去粘。即使机会遍地，她也可能失算，不露风声的她对我从没有秘密。妈妈害怕过堂风，却经常喜欢说大话。她靠经销手续费生活，却不情愿纳税。我对她掩盖的事情了如指掌。如果红心是主牌，她打起来准赢。妈妈死时，我的鼓身周围一圈红火舌也褪了一点颜色；

可是白漆却变得白得闪着刺目的光，显得我有时都睁不开眼。

我可怜的妈妈没有像她期望的那样被安葬在萨斯佩公墓，而是葬在布伦陶一处小而幽静的公墓里。那里还睡着她一九一七年患流行性感冒去世的继父、火药厂工人格雷戈尔·科尔雅切克。由于我妈妈是一个受人喜爱的殖民地商品店老板娘，所以送葬的人特别多。老主顾，好几家公司的商务代表，有的竟是买卖上的竞争对手，殖民地产品商魏因赖希以及赫尔塔街上那家食品店的普罗布斯特太太也来了。布伦陶公墓的小小的礼拜堂，那么多人根本容纳不下。那里散发着鲜花的香气和放过防蛀药的黑衣服的气味。我可怜的妈妈在未加盖的棺材里脸色蜡黄，形色枯槁。我在举行冗长繁复的仪式时，无论如何也不能摆脱这种感觉：她还要抬起头来呕吐，她肚子里不只那个同我一样不知谁是生父的三个月的胎儿要出来，并且同我一样也要一面鼓和鱼，不是油浸沙丁鱼，也不是鲈鱼，而是一小段若干绿白相间的鳗鱼肉纤维，耶稣受难日的鳗鱼，斯卡格拉克海战地区的鳗鱼，新航道防浪堤的鳗鱼，马头里跳出来的鳗鱼，也许是她从沉没到木筏下面被鳗鱼吃掉的父亲约瑟夫·科尔雅切克身上钻出来的鳗鱼……

但她把恶心控制住了。显而易见，她决心为得到安息而将鳗鱼带到地下。

几个男人抬起棺材盖，要把我可怜的妈妈坚定而难看的脸盖住。安娜·科尔雅切克扑过来抓住他们的胳膊后，踩过棺材前的鲜花，扑到妈妈身上，扯她昂贵的、洁白的寿衣，大声用卡舒贝语哭叫着。

后来，许多人都说，她是在咒骂那个可能是我父亲的马策拉特，说他害死了她的女儿。他们还说，外祖母还讲到了我从地窖阶梯上摔下去那桩事。她把妈妈编造的这个故事接过去挂在嘴上，让马策拉特永远记住他的所谓的罪过以及我的所谓的不幸。尽管马策拉特把任何政治上的考虑置之度外，甚至违背着他自己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的意志尊敬她，还在战争期间供给她白糖、人造蜂蜜、咖啡和煤油，他对他的怨恨还是终未停止。

蔬菜商格雷夫和哭声哭得像女人一样的扬·布朗斯基搀扶我的外祖母离开棺材。那几个男人盖上棺盖，终于做出了扛棺材的人屈身蹲到棺材下面准备扛起时的那副面孔。这个半乡村式的布伦陶公墓有一条榆树林荫道，两侧是两条墓地，有一座小教堂，像幼儿园里纸糊的劳作，有一口井以及一个活跃的鸟的世界的榆树林荫道。送葬的队伍走在耙干净落叶的公墓林荫道上，马策拉特领头我紧跟在后面，这时我生平第一次爱上了棺材的形状。今后，我还常常有机会溜一眼黑色的、棕色的、用于终极目的的木材。我可怜的妈妈的棺材是黑色的。它一头大，一头慢慢缩小，十分协调。世界上没有任何别的形状能如此巧妙地吻合人的体形。

如果床也一头大，一头慢慢小下去就好了。不论我们平时习惯的或者偶尔摆出来的躺卧的姿势是什么样的，总是上身大并明显地渐渐往脚那头缩小下去的。不管我们怎样伸展肢体，也总是上面大，头、肩膀、躯体，然而逐渐缩小到脚，缩小到那个支撑我们全身的狭小基础的。

马策拉特手里拿着礼帽，尽管一伸膝盖就感到巨大的疼痛，但仍在棺材后面吃力地慢步跟着。每当我看到他的颈项时，我就为他枕骨突出，两条抽搐的血管从衣领里钻出来，一直伸到头发根上的样子感到惋惜。

为什么搀着我的手的是特鲁钦斯基大娘，而不是格蕾欣·舍夫勒或者黑德维希·布朗斯基呢？她住在我们那幢房子的三层楼上，大概她是没有名字的，要不然为什么谁见了她都叫她特鲁钦斯基大娘呢？

维恩克圣下和拿香的辅弥撒者走在棺材前面。我的目光从马策拉特的颈项溜到抬棺材人皱纹纵横的后脖子上。我必须把心头

一种强烈的愿望压抑下去：我要坐到他们扛得摇摆上稳的棺材上面去敲棺材盖，我要为那些走在棺材后面、跟着神甫祈祷的人们敲棺材盖。当他们把棺材抬到架在墓穴上方的木板和绳子上去后，我还坚持要坐在那口木头棺材上。在布道、敲小钟、焚香、洒圣水的时候，我要在木头上敲出拉丁经文来。当他们用绳子把棺材放下去时，我还要坚持坐在上面要同妈妈和胎儿一起进入墓穴。当遗族和亲友用手抓土扔进墓穴时，我还留在那儿不想上来，我要在棺材缩小的那一头坐着，敲棺材，假如可能的话，到了地下还继续敲，一直敲到手里的鼓棒腐烂了，鼓棒下的木头也腐烂了，一直敲到妈妈和我彼此各自为对方腐烂了，把肉交给了土地和土里的栖居者为止；假如可能和允许的话，我还愿意用小骨头敲胎儿细细的软骨。

棺材在布伦陶公墓的榆树和垂柳下独自摇晃着。没人坐在上面，教堂司事的一群杂色母鸡在坟墓中间不劳而获地啄虫子。队伍走到桦树间。我被特鲁钦斯基大娘牵着手走在马策拉特后面，身后是我的由扬和格雷夫搀着的外祖母，文岑特挽着黑德维希的胳膊，小玛尔加和斯特凡手挽手走在舍夫勒夫妇前面。还有钟表匠劳布沙德、海兰德老先生以及没有醉醺地也没带小号的小号手迈恩。

安葬结束后人们开始吊唁。这时，我才发现西吉斯蒙德·马库斯也来了。他穿一身黑，夹在那些人中显得非常窘迫，他们正挨个儿同马策拉特、我、我的外祖母以及布朗斯基一家握手，嘟哝着说上那么几句。我起先不明白亚历山大·舍夫勒为什么找马库斯说话。他们以前几乎没讲过话，彼此并不认识。后来，乐师迈恩也插进去同这个玩具店老板谈话。他们在半人高的树篱后面站着，那种灌木的绿叶子味道是酸的，用手指一搓就会褪色。这时正好轮到卡特太太带着她那个用手帕捂着嘴在冷笑的、个儿长得飞快的女儿，在向马策拉特表示慰问，她还非得抚摩我的脑袋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不可。树篱后那几个听不懂的说话的声音大起来了。小号手迈恩用食指弹着马库斯的黑上装，把他逼得直后退，和舍夫勒一道抓住他的双臂。他们两个还得注意那个被拽着的马库斯别让坟墓周围的界石绊倒，并一直把他拉到林荫道上，给他指出出口的方向。马库斯好像感谢了他们给指路，并走向出口。他不再回顾地戴上礼帽，在迈恩和那个面包师的目送下离去。马策拉特和特鲁钦斯基大娘都没有发现我从他们身边溜走，不再接受慰问。我装着非去不可的样子，转身从掘墓人和他的助手们身边悄悄走过，随后拔腿就跑，也顾不得拦路的常青藤，奔到榆树下，在公墓门口赶上了西吉斯蒙德·马库斯。

“小奥斯卡！”马库斯非常吃惊地说，“你说说看，我干了什么错事，他们为什么这样对待我？”

我也不知道他干过些什么，便拉住他那满是汗水的手，领他走出公墓的敞开着的铸铁大门。我们两人迎面遇上了同我们一样相信天堂的舒格尔·莱奥。

马库斯认识誉满全城的莱奥。我也听人讲过舒格尔·莱奥，当他还在神学院的时候，在天气晴朗的一天，世界、天主教的七件圣事、信仰、天堂和地狱、生与死在他头脑里全部被颠倒。从此，莱奥对世界的看法虽然是癫狂的，但却完美无缺，光芒四射。

舒格尔·莱奥的职业，是穿着过分宽大而晃动的服装，戴着白手套，在无法瞒过他的葬礼之后也等候送葬的人们。马库斯和我都知道，他是由于职业的缘故才站在布伦陶公墓的铸铁大门前，戴着温情脉脉的手套，转动着海水般蓝的眼睛，嘴里一直淌着涎水，对送葬的人们滔滔不绝地讲一些无关紧要的话。

五月中旬阳光明媚的一天。树篱和树林上鸟儿成群。咯咯叫的母鸡通过它们的蛋来象征不朽。空中嗡嗡声。大地回春，清新无尘。受了神恩的舒格尔·莱奥戴着手套，左手拿着破旧的礼帽，

右手伸开五指，踏着轻盈的舞步朝马库斯和我迎面而来。他好似站在无风的风中，身子向我们倾斜，脑袋歪向一边。马库斯先是犹豫了一下，随后把没戴手套的手伸过去，被莱奥戴手套的手握住。这时莱奥流着口水，结结巴巴地说：“多美的日子！现在她已经到了那个什么都便宜的地方。你们见到刚匆忙走过的天主了吗？啊门。”我们也说：“阿门！”马库斯不但随着莱奥关于天气的说法，而且还说天主接见了他们。

送葬人群的声音越来越近地从我们背后的公墓里传来。马库斯从莱奥的手套里挣脱了手，给了他酒钱，如平素般瞥了我一眼，好像有人追他似的急忙向停在布伦陶邮局门口等候的出租汽车走去。

汽车扬起的尘土遮掩了越来越模糊的马库斯。我还在目送他时，特鲁钦斯基大娘已经又一次拉住了我的手。他们结成几个队伍走来。舒格尔·莱奥对所有的人表示慰问，请送葬的人们注意美好的天气，不管见到谁都问是否见到了天主，而且得到了或多或少的酒钱，或者未捞到分文。马策拉特和扬·布朗斯基付钱给抬棺人、掘墓人、教堂司事和维恩克圣下。圣下窘困地叹着气，然后用被舒格尔·莱奥吻过的手向渐渐四下散去的送葬者打起祝福的手势。

我的外祖母、她的哥哥文岑特、布朗斯基夫妇和两个孩子、没带妻子的格雷夫以及格蕾欣·舍夫勒还有我，坐上两辆普通的运货马车，经过戈尔德克鲁格，穿过森林，越过附近的波兰边界，到比绍采石场去赴葬礼晚餐。

文岑特·布朗斯基的农舍建在一个坑洼中间。门前有几棵白杨树据说可避雷电。他们转动铰链，打开了谷仓的门，让门倒在锯木架上，然后铺上桌布。左邻右舍还来了不少人。我们在谷仓门口聚餐。做这顿饭花了很花间。格蕾欣·舍夫勒让我坐在她身上。油腻的，甜的，油腻的，土豆烧酒，啤酒，一只鹅，一头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小猪，香肠蛋糕，糖醋南瓜，酸乳脂拌果汁麦糊。傍晚，凉风习习，吹进敞开门的谷仓，老鼠在里面到处乱跑，布朗斯基家的孩子同邻家的孩子们占领了院子。

他们点着煤油灯，在桌上玩施卡特。土豆烧酒，还有自制的鸡蛋利口酒还摆在那里。大家对这东西很感兴趣。不喝酒的格雷夫和卡舒贝人唱了几支歌。马策拉特第一个发牌，扬第二，砖窑上的领班第三。这使我意识到我已经失去了我可怜的妈妈。他们玩牌一直玩到深夜。可是逢到打红心，三个男的谁也赢不了。有一盘打红心五一点，扬·布朗斯基奇怪地输了。这时，我听见他小声对马策拉特说：“要是阿格内斯，准能赢。”

我从格蕾欣·舍夫勒的膝上滑下来，到外面找到了坐在一根车辕上的外祖母和她的哥哥文岑特。文岑特低声对星星用波兰语说话。外祖母已经哭不出来了，她让我钻进裙子底下。

现在，没人再让我钻进裙子下面，没有人替我挡住日光和灯光，也没人给我闻那种融化着的、易臭的黄油的气味。外祖母把它存放在裙子底下，给我吃，我胖了起来，我也就尝到了甜头。

我在离我可怜的妈妈起源的地方近在咫尺的四条裙子底下睡着了。我虽然不像躺在一口小棺材里的她那样再也不呼吸，但也很安静。

赫伯特·特鲁钦斯基的背脊

俗话说得好，没有什么能取代失去的母亲。可怜的妈妈安葬后不久，我开始挂念她了。星期四不再去拜访西吉斯蒙德·马库斯了，再没有人带我去看护士英格的白护士服了。尤其是到了星期六，我更痛心地意识死去的妈妈不再去忏悔了。

我于是失去了旧城、霍拉茨医生的诊所以及圣心教堂和对集会的兴趣。既然诱惑者的职业对于我已失去了意义和吸引力，我

无法再去引诱橱窗前的行人上钩。从前带我到市剧院去看圣诞童话剧，并且领我去看王冠或丛林马戏团表演的妈妈，已经去了，我孤孤单单，愁眉苦脸地准时去上课，垂头丧气地走过市郊笔直的大街，到小锤路去拜访格蕾欣·舍夫勒呀。她给我讲“力量来自欢乐”组织的夜半太阳国旅行，而我则无动于衷地拿歌德同拉斯普庭做比较。这种比较无休无止，忽明忽暗，循环往复，于是我逃避到历史研究中去。《罗马之战》、凯泽的《但泽城历史》和克勒的《船队年鉴》，这些老一套的标准读物，给予我广博的半瓶醋知识。以至于我至今还能背得出所有参加斯卡格拉克海战被击沉击伤的船只的装甲厚度、装备、完工和下水日期、人员限额的精确数字。

喜欢孤独的我快满十四岁了，经常散步。鼓是我的伴侣，我却难得敲两下，妈妈一去世，便没人给我买新鼓了。

在一九三七年秋季或在一九三八年春季。我沿着兴登堡林阴大道往城里走去，到了离四季咖啡馆不远的地方，落叶纷飞，或者蓓蕾初绽，总而言之，大自然正在变化着；这时，我遇到了我的朋友和师傅，欧仁亲王的嫡系子孙，路易十四的直系后裔贝布拉。

我们虽然只分开了三年，但相距二十步就已彼此认了出来。他并非孑然一身，而是挽着一位娇小可爱的南方美人，差不多比贝布拉矮两厘米，比我高三指。据贝布拉介绍，她叫罗丝维塔·拉古娜，是意大利最有名的梦游女。

贝布拉请我到四季咖啡馆喝穆哈。我们到有观赏鱼可看的咖啡座上坐定下来，爱喝咖啡的女常客们就小声低语道：“莉丝贝你瞧见了这些矮个儿没有？要是王冠马戏团的，咱们也去瞧瞧。”

贝布拉朝我挤出了千百条几乎看不见的细皱纹——他在微笑。给我们端穆哈来的侍者，个子高大无比。罗丝维塔太太向他要一块小蛋糕时，就像抬头望一座塔楼似的望着这个穿燕尾服的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侍者。

贝布拉看着我说：“出了什么毛病，为什么不开心我的朋友？是玻璃不听话了，还是声音不灵了？”

年青气盛的我，当即要小试锋芒，炫耀一下那远未衰退的技艺。我环顾四周，寻找目标，目光对准水族馆里金鱼和水下植物前的大玻璃板。我刚要唱，贝布拉连忙说：“行啦，我的朋友！我们相信你是行的。别搞破坏，水泛滥后鱼会死的！”我尴尬地道歉，尤其对罗丝维塔太太。她坐立不安，拿出一把微型扇子扇着。

“我妈妈去世了，”我试图解释我的心境，“她本来不该死的。都怪她自己。人家常说，做母亲的样样事都看在眼里，都能体贴，做母亲的样样事都会宽恕。这些都是在母亲节拿来骗人的！我在她眼里，只是个只要有可能，就会甩掉的侏儒罢了。她之所以没把我甩掉，是因为哪怕是个侏儒，都登记在她的身份证上的是她的孩子，所以没法随便甩掉。因为我是她生的侏儒，甩掉我就等于甩掉她自己的骨肉，所以甩不成。她问过自己，她和侏儒不能两全，于是就结束了她自己的生命。她什么也不吃，只吃鱼，而且不吃新鲜鱼。她诀别了情人，安息在布伦陶。不管她的情人还是我家店铺的主顾，每个人都说是那个侏儒敲鼓把她敲死的。因为我的缘故，她不想死去。是我把她害死的。”

我是故意夸大其词，想尽可能打动罗丝维塔太太的心。事实上，人们还是把妈妈的死归罪于马策拉特，尤其是扬·布朗斯基。贝布拉把我心思看透了。

“您纯粹出于嫉妒才言过其实地怨恨您死去的妈妈。她去世了并不是因为您，而是因为那些令人厌烦的情人的缘故。因此，您才会有被冷落的感觉。您兼具了天才的虚荣和调皮捣蛋！”

他叹着气，斜视着罗丝维塔太太说：“像我们这样身材的人捱过这一生，可真不容易啊！虽然是个人，身体却不长，这实在

是很难做到的事。多艰巨的使命啊！”

那不勒斯的梦游女，罗丝维塔·拉古娜的皮肤光滑且多皱纹，我料想她只有十八岁，转眼间，她又变成了一个八九十岁的老妇。罗丝维塔太太抚摩着贝布拉先生那身英国裁缝做的时髦服装，她那双樱桃黑的地中海眼睛送我一波秋波，并用像给子女许诺言似的，打动并使我全身酸痛的声音说道：“我最亲爱的小奥斯卡！我非常了解您的痛苦！跟随我们一起走吧：去米兰、巴黎、托莱多、危地马拉。”

我一阵头晕，抓住拉她苍老的手。地中海拍打着我的海岸，橄榄树向我低声耳语：“她会像您的妈妈一样，她会理解的。她，伟大的梦游女，能看透任何人的心思，了解任何人的内心，只是不了解她自己，天哪！”

令人费解的是，她刚开始用梦游女的目光像照 X 光似的透视我，就一下子胆怯地抽回了被我捏住的手。是不是我这颗十四岁少年的饥渴的心把她吓着了？还是她已经明白，不论罗丝维塔是少女还是老太婆，对于我来说，无非是罗丝维塔罢了？她用那不勒斯话低声颤抖着说着，反复地画十字，好像她在我身上所观察到的使她产生了无穷的恐惧，接着，一声不吭地把脸藏到扇子后面去了。我不知如何是好，非常想听个究竟，便请贝布拉先生告诉我怎么回事。可是，尽管贝布拉是欧仁亲王的直系，却也惊慌失措，说起话来语无伦次，我费了好大劲才听懂了他讲的话：“年轻的朋友，您的天才是天赐神授的，但也肯定有魔鬼授予的成份。这使我的善良的罗丝维塔困惑不解，而我也不得不承认，您身上有一种我感到陌生的突然发作的无节制的因素，虽说并非完全不能理解。不过，”贝布拉打起精神说下去，“不论您有怎样的性格，都没关系。您加入到我们中间来参加我的魔术团吧！只要自己多少约束一点，即使在今天的政治条件下，您还是能找到崇拜者的。”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立刻明白了。以前劝过我要永远在台上而不是站在台前的贝布拉已经混到陆军里去了，虽然他还在马戏团里登台表演。所以，他对我客气地表示遗憾并拒绝了他的提议毫无失望感。我能听到罗丝维塔太太在扇子后面的喘息声，看到她对我再次露出了那双地中海眼睛。

我们又聊了一小时。我让侍者拿来一个空水杯，用歌声在玻璃上刻了一颗心，上面加了漩涡形花饰，下面题上——“奥斯卡为罗丝维塔而作”，并把杯子送给她，让她高兴一下。贝布拉付了账，还留下很多小费，我们便离开了。

他们两人一直和我走到体育馆。我用鼓棒指着五月广场另一头光秃秃的演讲台，并且把我在1938年春天在演讲台下那段鼓手生涯讲给我的师傅贝布拉听。

贝布拉不好意思地微笑着，趁这位板着面孔的太太离我们有几步远的时候，贝布拉同我低声话别：“亲爱的朋友，我不行啦，我再也不能当您的老师了，政治太肮脏了！”

接着，像几年前在马戏团活动房子之间和我相遇时那样，他再次吻了我的前额，罗丝维塔太太向我伸出了瓷器般的手，十四岁的我做作地老练地躬身吻了这个梦游女的手指。“我们会再见的，我的儿子！”贝布拉先生挥手说，“不管时局怎样，像我们这样的人是一直会保持联系的。”“要原谅您的父亲们！”这位太太告诫我说，“只要习惯您自己的生活，心灵就得到安宁，魔鬼就不能得逞！”

我觉得，这位太太好像给我施了第二次洗礼，不过还是徒劳。我无法将魔鬼赶走。我心中空虚，悲伤地望着他们两个的背影。当他们完全消失在一辆出租车里面时，我还在挥手；为大人们造的福特牌汽车的马达一响，开走时，看不到他们，却像是开出去寻找主顾似的。

我尽量劝说马策拉特去看王冠马戏团的表演，但他不去。他

完全沉浸在我可怜的妈妈死的悲痛之中，其实他从来也没有完全支配过她。扬·布朗斯基也算不上完全支配了她。如果有那么一个人的话，那就是我，因为妈妈去世后，受苦最多的是我，日常生活被打乱了不算，连生存下去都成问题了。妈妈扔下我不管了。我的父亲们也没有什么可让我指望的。贝布拉师傅已经把宣传部长戈培尔当成了他的师傅。格蕾欣·舍夫勒专心致志地干她据说是为了不让一个人挨饿，不让一个人受冻的冬赈工作。我坚持在原来是白漆的、现在敲薄的了铁皮上，擂出我的孤独来。晚上，马策拉特同我面对面坐着。他看他的烹调书，我则用鼓敲出我的哀思。有时，马策拉特用烹调书挡住他哭泣的脸。扬·布朗斯基也不常来了。鉴于政治局势，这两个男人都认为小心谨慎为好，谁也摸不准风向。和另外一个常换的男人一次比一次少地玩施卡特牌，即使玩的话，也开始得很晚，在我家起居室的吊灯下，并且避而不谈政治。我的外祖母安娜，看来连从比绍到拉贝斯路我家里的路该怎么走都忘了。她怨恨马策拉特，大概还怨恨我，我可听她说过：“我的阿格内斯是因为受不了鼓声才死的。”

虽然我对我可怜的妈妈离去要负一份责任，然而我却更加死抱住受诽谤的鼓不放。妈妈会死，鼓却不会死，鼓可以买新的，也能让老海兰德或者钟表匠劳布沙德修理。鼓和我相依为命、理解我，始终给我正确的答复。

我觉得房间的天地，对于一个十四岁的少年来说未免太狭小，街道也长短不合适，白天没有当橱窗诱惑者的机会，晚上也没有紧急情况要我到黑魆魆的门洞里去扮演十拿九稳的诱惑者角色，这时，我便跺着脚踩出节拍走上四道楼梯，数着这一百十六级楼梯，每到一层停留一会儿，闻一闻各层住家门缝里透出来的同我一样觉得这两间一套的住房太狭窄了的气味。

开始，我有时还能侥幸碰上烂醉如泥，躺在挂着晾干的床单中间未被水滴湿的地板上，以少有的音乐感吹着小号，使我的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鼓获得快感的小号手迈恩。一九三八年五月，他把杜松子酒戒掉了，逢人便说：“我现在开始新生活啦！”他当上了冲锋队骑兵队乐队队员。我看到他脚登皮靴，穿着臀部包着皮子的马裤，上楼时一步跨五级。他还养着那其中一只叫俾斯麦的四只猫，因为，有时杜松子酒占了上风使他乐兴大作的情况是意料之中的。

我几乎不敲那个生活在一百只坏钟中间的沉默的钟表匠劳布沙德的房门。我每月至少能亲眼看一次这样过分地耗费时光的情况。

老海兰德的小作坊还是在公寓的院子里。他也还在干敲直弯钉子的活。没变的是，院子里有兔子和兔子的子子孙孙。但是，院子里的孩子却都系黑领带，穿制服，不再煮砖头粉浑汤。那些正在长个儿并超过我的孩子，我却一个也想不起叫什么名字。这和我不是一代人，我那一代孩子已经从学校毕业，在当学徒了。努希·艾克成了理发师，阿克塞尔·米施克想在席哈乌当焊接工。苏西·卡特在施特恩费尔德百货公司当见习售货员，已经有了关系相当确定的男朋友。不过三四年间的事就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拍打地毯用的旧架子一直还屹立在院子里，住房须知的规定也依旧：星期四、五拍打地毯，每逢这两天，拍打声变少，拍得不敢让人听见似的羞涩，因为自从希特勒掌权以来，更多的人家使用吸尘器；拍地毯架子日渐被人冷落，只供麻雀使用了。

所以，我总是在房顶的波浪形瓦下孤独地一人读我保存的读物。当我需要有人做伴时，便到三楼去敲左边第一个房门。总会开门的。特鲁钦斯基大娘在布伦陶公墓，是她搀着我的手，把我领到可怜的妈妈墓旁去的。后来，我每次去敲门，她都会开门的。

“不要敲这么大声，小奥斯卡，赫伯特昨天夜里又遭罪了，人家用汽车送他回家的，他还要睡一会儿。”说完，她把我拉进屋，给我倒麦芽咖啡和牛奶，还给我一块用线拴着可以浸到咖啡

里去，也可以用舌头舔的褐色冰糖。我喝咖啡，舔冰糖，让鼓闲着。

特鲁钦斯基大娘有一个小而圆的脑袋，稀疏的灰白头发像薄纱似的蒙着，粉红色的头皮透出微光。几乎可以数清数目的头发丝在枕骨最突出的地方扎成一个面包形发卷，尽管还不如台球大，甚至不论她怎样转身，别人都能从任何角度看到。发卷是用织针别住的。每天早晨，特鲁钦斯基大娘都用代用咖啡的红的，退色的包装纸擦她那笑起来就像是粘上去似的像耗子似的圆脸颊。她的四个孩子分别是：赫伯特、古丝特、弗里茨和玛丽亚。

玛丽亚和我同年，刚念完国民小学，住在席德利茨一个职员家里学习料理家务。别人难得见到的弗里茨在铁路车辆厂工作，有两三个姑娘轮流陪他过夜，他带她们到“奥拉跑马场”去跳舞。公寓院子里的那些兔子中，“蓝色维也纳人”是他养的，但其实上因为弗里茨忙着应付女友们，没有一点儿时间，是特鲁钦斯基大娘在喂养，古丝特，三十岁左右，少言寡语，在火车总站附近的埃登饭店当女招待。她一直都没有结婚，同住一流饭店的人物一样，住在埃登大厦最高一层上。赫伯特最大，如果不算装配工弗里茨也偶尔回家过夜的话，是惟一同母亲一起居住的。他在新航道港口区当侍者。这里要谈的就是他。因为赫伯特·特鲁钦斯基成为我努力探究的目标，我到现在还把在我可怜的妈妈去世后给我带来短暂愉快时光的他称作我的朋友。

赫伯特在“瑞典人”酒店的老板施塔布施那里当侍者。酒店在新教的海员教堂对面，来客大多是斯堪的纳维亚人，这点从“瑞典人”这块招牌上就可以猜到。不过，也有从这个自由港来的俄国人和波兰人、霍尔姆的装船工以及刚开进港口停泊的德国军舰上的水兵。在这个真正可谓国际性的酒店里当侍者，是很危险的。赫伯特在去新航道之前，在“奥拉跑马场”当过侍者，只是在那个三流舞场里积累的经验，才使他能够用效区方言掺上一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句半句英语和波兰语，镇住“瑞典人”酒店里各种语言的喧闹声。然而事与愿违的是，每月总有那么一两回，他被人家免费用救护车送回家。

遇到这样的情况，体重一百公斤的赫伯特就只能俯卧在床，呼吸困难，而且还得一连躺上数天。在这样的日子里，特鲁钦斯基大娘总是骂他，却又不顾疲劳地照料他。每逢她重新扎好发卷之后，总要拔出一根织针来，敲他的床对面挂着的一个玻璃镜框里一幅修过的男人照片，这个长着小胡子的男人目光严肃而呆滞，和我照像簿第一页蓄小胡子的那个人有点像。不过，特鲁钦斯基大娘用织针指着的这位先生，不是我家的人，是她丈夫赫伯特、古丝特、弗里茨和玛丽亚的父亲。

“总有一天你会像你父亲一样完蛋。”她挖苦喘气费力、极度痛苦的赫伯特。可是，她从来也不说清楚，黑漆镜框里的那个男人到底在哪儿死的，怎么死的。

“这次是怎么回事？”两臂互抱的灰白头发的耗子脸要知道个究竟。

“和上次一样，瑞典人和挪威人呗！”赫伯特侧转身子，弄得床嘎嘎地响。

“和上次一样，和上次一样！别装得好像什么都和你无关似的。最后一次，不是训练舰上那些家伙干的吗？告诉我他们叫什么！对，‘施拉格特’号的。我不是说了吗，这次是怎么回事？你偏说是瑞典人和挪威人！”

我只能看到的赫伯特的耳朵一直红到耳根：“这些该死的水兵，老是瞎吹牛皮，仗势欺人！”

“你让他们去好了，都是些看样子都很规规矩矩的娃娃。这和你无关。他们下船休假时，我在内城见到过，你肯定又同他们谈自己对列宁的看法了。你准是又插嘴人家谈西班牙内战了，是不是？”

赫伯特沉默下来，特鲁钦斯基大娘拖着脚步走进厨房喝她的麦芽咖啡去了。

赫伯特让我看他愈合后的背脊上的伤。他坐在厨房里的椅子上，背带搭在大腿上的蓝餐巾上，好像有什么难办的想法使他犹豫不决似的，轻轻地脱下羊毛衫。

脊背就像是一片粉红色的田地，圆滚滚的播满了雀斑，肌肉不停地上下移动。肩胛骨以下，埋在肥肉里的脊骨两边，长满红狐色浓毛，髹曲地往下爬，最后消失在他夏天也穿的衬裤里。从衬裤裤腰往上直到脖子的肌肉，布满了伤疤，切断了浓毛，灭除了雀斑，鼓起的、皱皱巴巴的、天气转变时发痒的、各种颜色的伤痕，从蓝黑色直到白中带绿。他允许我摸这些伤疤。今天，我躺在病床上，几个月来，一览无遗地眺望窗外，观察着疗养与护理院的外楼和楼后的奥伯拉特森林，我想知道，在这些日子里，我可以摸的究竟是什么，那种同赫伯特的伤疤一样坚硬、敏感、使人糊涂的究竟是什么？这是某些姑娘和妇女的那个部位，是我自己的那个部位，童子耶稣的石膏“洒水壶”，还有两年前那条狗从黑麦地里叨给我的那截。一年以前，我还保存着，放在一个密封大口玻璃瓶里，虽然摸不到，却完整而清晰可见的无名指。所以，现在我只要拿起鼓棒，这个手指的每一个关节都历历在目，我可以一一数出来。每次当我要回忆赫伯特·特鲁钦斯基背上的伤疤时，面对大口玻璃瓶里的指头坐着，用敲鼓来帮助回忆。每当我偶尔想再现一个女人的形体的时候，因为女人那个像伤疤似的部位不足信，因此我虚构出来的总是赫伯特·特鲁钦斯基的伤疤。换句话说：当我第一次触及到我朋友宽背脊上隆起的那些伤疤时，我就已经被应允去熟悉和暂时占有那种女人准备相爱时短暂地出现的东西。同样，赫伯特背上那些标记在那时就已承诺我日后会摸到那截无名指。而从我三岁生日那天起，在赫伯特的伤疤向我承诺以前，我的鼓棒就已经答应我日后会摸到伤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疤、生殖器官以及无名指。即使这样，我还要继续往上追溯：当我还在母亲的肚子里时，还不叫奥斯卡的时候，我的游戏是玩脐带，就已经答应我将来会摸到鼓棒、赫伯特的伤疤、年轻和中年妇女有时要爆发的火山口以及无名指，还有就是从童子耶稣的“洒水壶”直到我坚定不移地挂在身上的我自己的这件东西，它是我的无能和有限可能的无法预料的纪念碑。

今天，我依照鼓所作的规定，绕了一个大弯之后返回我的鼓棒，回忆伤疤、柔软部、我自己的至今还不过是有时充实的装备。为能再次庆祝我的三岁生日，我必须跨进三十周岁。你们一定会猜到，我的目的是返回脐带；正因为这样，我才浪费笔墨停留在赫伯特·特鲁钦斯基的伤疤上。

下面，我继续描述我的朋友们的背脊，我要说的是，他那强壮的、不需保护因此目标很大的身躯的正面，只有一处由奥拉的某个妓女在左锁骨旁留下的咬伤。他们只能从背后攻击他，干他。芬兰人和波兰人的刀子，仓库岛上装船工的短刀，训练舰上军事学院学生的水手刀，都仅在他的背后有伤疤。

赫伯特吃完每周三次除特鲁钦斯基大娘外没人能做出来的薄且不油腻，又松又脆的土豆煎饼后，把盘子推到一边，我便把《最新消息报》递给他。他把背带解下，撩起衬衣，一边读报，给我解释他背上伤疤的来历。我盘问的时候，特鲁钦斯基大娘多半也坐在桌旁，折旧毛线袜，一边评论几句他说的对错，并且不失时机，见缝插针地提及那个那帧修过的照片镶在玻璃镜框里，悬挂在赫伯特床对面的墙上的男人不难想象的惨死的往事。

当他同意开始询问时，我使用手指或鼓棒弹敲一下他的某一处伤疤。

“再按一遍，小家伙。我不知是哪一道。难道它们今天睡着了么？”于是，我再更使劲一点按一下。

“对了，就是这个！这是乌克兰人留下的。他同个格丁根

人吵架。他们先是像兄弟一样坐在一张桌子旁。那个格丁根人把另一个叫做俄国佬，这下子那个乌克兰人不干了，他除了当俄国人外什么都行，他从魏克塞尔河运木筏下来，先还经过另外几条河，靴统里满是钱，格丁根人叫他俄国佬时，他在施塔布施那儿已经喝掉半靴子。我只得像平时一样小心翼翼地把两个人劝开。当然啰，我两手都端着东西。这时，乌克兰人骂我是波兰水鬼，那个白天在挖泥船上挖污泥的波兰佬也骂了我一句，听起来像是纳粹的骂人话。小奥斯卡，你是知道我的：那个挖泥船上的家伙，那个脸色苍白像司炉一类的东西，当场抱着肚子，缩成一团躺在衣帽间前面了。我正要告诉那个乌克兰人，波兰水鬼同但泽市民有什么不同，他一下子用刀给我后背上留下了这个伤疤。”

每次他确定一道伤疤时，就一定要同时把报纸翻个身来强调他方才那句话，随后喝一口麦芽咖啡，让我把那道伤疤按一到两下。

噢！这一道可没什么。那是两年前，从皮拉乌开来一小队鱼雷艇，在这里抛锚停泊。他们吹牛皮，演《穿蓝制服的小伙子》，姑娘们都疯狂了。到现在我还不明白，德累斯顿人施维梅尔怎么混进海军的！奇怪，这算什么？

赫伯特的念头转到易北河畔美丽的城市德累斯顿上出不来了。于是，为了提醒他言归正传，我又敲了敲那道他认为没什么了不起的伤疤，让他的念头转回到新航道来。

“是的，说到这儿了。他是鱼雷艇上一名二等信号兵。他要充好汉，拿一个不声不响的正在干船坞里的苏格兰人开心，先是谈张伯伦、雨伞等等。我像平时一样平心静气地劝他别再说了，尤其是那个苏格兰人一个字也听不懂，只是用烧酒在桌面上画画儿。我就讲，你在这儿不是家里，你是国际联盟的客人，别跟他闹。没想到这个鱼雷艇上的德国兵竟把我叫做‘不值钱的德国人’，他还用萨克森话说了些什么。我给了他几个耳光后，他就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不作声了。半个小时以后，一个盾滚到桌子底下去了。我蹲到黑漆漆的桌子下面去捡的时候，这个萨克森人乘机拔出刀来，在我后背上猛刺一刀！”

赫伯特翻了一下《最新消息报》，笑着添了一句：“就是这个伤疤！”随后把报纸推到咕哝着的特鲁钦斯基大娘面前，撑着桌角站起来，趁他还没去厕所以前，我从他的脸上看出他想干什么所以赶紧摁了一下一道黑紫色的缝过线的很宽，有一张施卡特牌那么长的伤疤。

“我要上厕所，待会再讲给你听。小家伙。”我又跺着脚摁了一下，用非常灵验的方法——装出三岁孩子的腔调。

行了，不要闹了！我短点讲吧。”赫伯特边说边坐下来。“那是一九三〇年的圣诞夜。在洪口找不到活干。装船工在街角闲逛，看谁啐得远。午夜弥撒完毕，我们刚把混合甜饮料调好，他们全出来了，穿蓝的、白的服装的瑞典人和芬兰人从对面海员教堂出来。我感到不对头，便站在酒店门后望着他们引人注目的虔诚的脸，心中对他们手中拿着粗的锚缆表示疑惑。这时，他们已经打了起来，真是刀长夜短啊！芬兰人和瑞典人相互间一直有矛盾，但这并不关我什么事，我还要插手。我一个箭步窜到门外，只听见施塔布施在后面喊道：‘赫伯特，当心！’但是，赫伯特有他的使命，他要去救那个年轻小个子，刚从马尔默来，神学院新毕业的，还从来没有同瑞典人和芬兰人一起在一个教堂里度过圣诞夜的神甫。我要把他挟在胳膊下，让他毫发无伤地回家去。我刚抓住神甫的衣服，我的背上已挨了一刀了。我还想在圣诞夜说一声：‘新年愉快！’我醒过来时，已经躺在店里柜台上了。我流了好多鲜血到啤酒杯里。施塔布施拿了红十字会的急救药箱，要给我做所谓的紧急救护。”

“你为什么要把自己搅进去呢？”特鲁钦斯基大娘生气地说，并从面包形发卷里拔出一枚织针。“你从小到大进过教堂吗？真

是荒唐。”

赫伯特一挥手，搭拉着背带，拖着衬衫，走进厕所。他气恼地走着说：“就是这个伤疤！”他走路的神态，就像要同教堂以及与教堂有关的械斗永远一刀两断似的，又让人觉得只有厕所才是永远当自由思想者的地方。

没过几个星期，我见到了背上没有绷带但满脸愁云、沉默寡言的赫伯特。他十分正常，仰面躺在起居室的沙发上。他没有受伤，不是俯卧在床，可看起来却像是受了重伤的样子。我听到赫伯特在呼喊上帝，马克思和恩格斯，叹息并且咒骂，还在房间里的空中挥动拳头，一下捶在自己胸口上，另一只手跟着又加上一拳。他像一个天主教徒似的捶打自己，喊道：“我的罪孽无法洗尽啊。”

赫伯特在经常会发生的情况下紧急自卫打死了一个拉脱维亚船长。尽管法院宣判他无罪，可是，那个拉脱维亚人毕竟死了。这位侍者感到心头特别沉重，那个船长是一个矮小瘦弱且有胃病的人，赫伯特辞职了。老板施塔布施经常来，挨着赫伯特坐在沙发上，要不然坐到厨房桌子旁特鲁钦斯基大娘身边。他从皮包里拿出一瓶一九〇〇年的施托布牌杜松子酒给赫伯特，给特鲁钦斯基大娘半磅从自由港弄来的没烤过的咖啡豆。他尽力去劝说赫伯特，又劝特鲁钦斯基大娘去说服她的儿子。但是不管怎样，赫伯特铁了心般打定主意决不到新航道海员教堂对面的酒店里去当侍者了。他不想再当侍者；因为他不想当侍者时为了不让那个拉脱维亚船长近身扎他一刀而打死人，不想让他自己被扎花了脊背上，在芬兰人、瑞典人、波兰人、自由市人和德国人留下的伤疤之外，再添上一个拉脱维亚人扎的伤疤。

他并没有像他承诺的那样，宁可去海关也不去新航道当侍者。

尼俄柏

一九三八年，我的外祖母因为关税越来越高，波兰与自由邦之间的边界暂时封闭。不能再乘窄轨火车到朗富尔来赶星期集市了，现在就像一只坐在蛋上无心孵化的母鸡。自由港内，鲱鱼臭气冲天，货物堆积如山，国家首脑会晤，达成共识。只有我的朋友赫伯特因为没有工作而内心矛盾，像真正遇到麻烦的人似的躺在沙发上挖空心思。

进了海关，管饭还发薪水，而且为了把守那条绿色的边界还会发绿色制服。赫伯特既不去海关，也不想再当侍者，只是躺在沙发上冥思苦想。

许多人和特鲁钦斯基大娘都有同样的想法，那就是人一定要有工作。她虽然不同意按照老板施塔布施的意思劝说她的儿子再去新航道当侍者，但要让他不再整天躺在沙发上。赫伯特自己过不多久也觉得这个两间一套的房间太沉闷，他的冥思苦想也仅仅是装模作样而已。有一天，他动手翻阅《最新消息报》上的招工栏，还打着寒颤十分不情愿地翻起《前哨报》来。

我非常希望自己能给他帮上忙。像他这样的人，没必要放弃适合他干的工作，在这个港口城市的郊区去找辅助性的工作。去当码头装卸工，去当临时工，还是去埋烂鲱鱼？我不想看到赫伯特站在莫特劳河的桥上，对着海鸥啐唾沫，并降低身价，成为一个嚼烟草的。我认为还是我们两个搭挡比较好。每星期，甚至每月，只要全力以赴干它两个小时，我们的生活就有了保障。我在这方面积累了长期经验并因此而更有头脑，可以用我那一直还像金刚钻一样的声音，割开陈列值钱样品的橱窗，站在那里望风的赫伯特就可以马上得手。我们既不需要喷灯、万能钥匙和工具箱，也不需要指节铜套和手枪。窃贼的守护神和掌管商业的神墨

丘利庇护着我们，囚车同我们无缘，因为我是在太阳正处于室女宫时诞生的，我有这个星座可以盖在坚硬的物体上的印章。

下面简单提一下我的成就。在赫伯特失业期间，他和我对熟食店进行过两次规模不小的盗窃，还偷过一次皮货店，收获不小，赃物计有：三张青灰狐皮，一张海豹皮，一个波斯羔羊皮暖手筒，还有一件漂亮的、不是特别昂贵的驹皮大衣，我可怜的妈妈要是活着的话，一定会穿着的。

由于赃物越来越难脱手，我们洗手不干了，其原因并不是由于那种一点也没有必要的却又时时袭来的犯罪感，只有在新航道港口区才有用得着的中间人，为能多卖些钱，赫伯特就非去新航道不可。可是，那总让他回忆起那个瘦弱的、患胃病的拉脱维亚船长。因此，他除了皮货如黄油般容易脱手的新航道外哪儿都去。他宁愿在席哈乌巷，哈克尔工厂旁，比格尔维森兜售。所以，那些赃物一直在我们手里存着。最后，熟食店的东西进了特鲁钦斯基在娘的厨房，那个波斯羔羊皮暖手筒也如赫伯特所愿送给了她。

她见到暖手筒后，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了。熟食店的东西，她想到的是民间的说法，偷点食品不算犯法，她一声不吭地收下了。但是，暖手筒意味着奢侈，轻率，轻率就要坐牢。特鲁钦斯基大娘的想法既简单又正确，眼睛像老鼠一样眯成缝，从发卷上拔出编织针，拿在手里说：“你会像你老子一样完蛋的！”接着把《最新消息报》或《前哨报》推到赫伯特面前，像在说：你去找个规矩的职业吧！否则你就别打算再吃我做的饭。

赫伯特又在沙发上非常难受地胡思乱想了一个星期，他不愿别人问他伤疤的来历，也不愿去可以让他捞一把的橱窗。我能体谅他，听凭他去饱尝自己最后剩下的痛苦，便到钟表匠劳布沙德和他那些挥霍时间的钟表那里去打发日子，还去找了一次音乐家迈恩。他戒了酒，只是服装整洁，精神抖擞，照着党卫军骑兵团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乐队的乐谱吹他的小号，而他在喝得醉醺醺、但却显露出高度音乐才能的时期的遗物的那四只猫由于没喂养好，已经只剩一口气了。另外，我经常发现马策拉特在夜深人静时目光呆滞独自坐着，面对一小盅酒。妈妈活着的时候，只有客人来，他才喝点酒。他就像我今天那样翻看照相簿，想让那些曝光或强或弱的正方形小照片里我可怜的妈妈重生。他哀泣到午夜，后亲切地用“你”同挂在对面墙上、目光越发忧郁的希特勒和贝多芬攀谈，好像那位耳聋的天才反倒回答了他，相反，由于马策拉特这个醉醺醺的小小支站领导人不能享受天意绝对禁酒的，希特勒却对他不屑一顾。

在一个星期二，赫伯特下定决心，盛装打扮，他让特鲁钦斯基大娘用冷咖啡刷干净那条蓝色的、上窄下宽的铃铛裤，两脚穿上他那双轻便鞋，罩上有锚形钮扣的上装，在那条从自由港弄来同样也是自由港垃圾堆里的免税商品的白色绸领带上洒上科隆香水，戴上蓝色大檐帽，笔挺整齐，准备出门。

“我要出去找工作。”赫伯特说着，露出点冒险的劲头，把帽子往左边一推。特鲁钦斯基大娘一撒手，报纸就掉到桌上。

第二天，赫伯特有了不是海关的绿色制服，而是深灰色的制服和工作；他成了航海博物馆的管理员。

航海博物馆和这个本身就值得保存的城市里一切值得保存的东西一样，珍宝陈放在一座古老的、本身就可以成为珍宝的，外有石砌门廊和结实的、有浮雕的、已引不起人们好感的正面装饰，里面有雕花的暗色橡木和回形楼梯的贵族宅第里。这里分门别类，甚是精细地陈列着这个海港城市的历史。该城能引以为豪，就是能一直处在许多实力强大、但大多数是贫穷的邻国之间，使自己更加富有，并且保持下去。这些琐碎的条文，烦琐地规定着从条顿骑士团和波兰国王手里买下的特权，而这些彩色雕刻再现了对魏克塞尔河口海防要塞的历次围困，那城墙里站着的

不走运的与萨克森反王交战，兵败逃回的施坦尼斯劳斯·莱茨钦斯基。从油画上可以真切地看到，他有多么惊魂未定。因为俄军在拉斯西将军率领下包围了该城，大主教波托斯基和法国公使德·蒙蒂也是惊慌失措。这些画面，都附有详细的文字说明，甚至停泊处鸢尾花形纹章旗下的法国船只的名称也清晰可见。箭头所指的是一条八月三日放弃该城后，施坦尼斯劳斯·莱茨钦斯基逃往洛林时所乘的船。可是，大部分陈列品是历次打赢的战争中的战利品，因为为数很少的几次败仗是不会有战利品留下的。

有一艘佛罗伦萨大帆船的船头雕饰，是收藏品中能引以为豪的东西。这艘船是佛罗伦萨商人波蒂纳里和塔尼的，本港在布鲁日。一四七三年四月，但泽市的首领兼海盗保罗·贝内克和马丁·巴德维克在泽兰沿岸斯劳伊斯港外巡航时，把这艘大帆船虏获。船长、军官和为数众多的水手都在抢占以后被他们杀光。船和船上的货物被弄到但泽。出自画家梅姆林之手的一张可折叠的画《最后的审判》和一个受佛罗伦萨人塔尼的委托，为佛罗伦萨某教堂制作的金制洗礼盘成了圣马利亚教堂的陈列品。我了解到，《最后的审判》今天依然能让波兰的天主教徒得以大开眼界。在那时保存在航海博物馆中的船头雕饰在战后就消失无踪了。

一尊绿色的裸体，丰满，举起双臂，懒洋洋地叉起十指，果敢地挺着乳房，凹陷的琥珀色眼睛直视前方的木雕女像带来了不幸。它是商人波蒂纳里委托一个制作船头雕饰出名的雕刻匠依国商人亲近的一个佛兰芒姑娘所制。这件绿色雕像刚挂到大帆船的第一斜桅下面，那个姑娘就因施巫术而经常的受到审讯。在烧死她之前，她在审问下把自己的保护人、那个佛罗伦萨商人牵连了进去，连那个在当地拿她当模特儿的雕刻匠也没逃得过这一劫。据说，波蒂纳里由于害怕火刑，把自己吊死了。那个雕刻匠则被他们砍去了灵巧的双手。如此一来，他就再不能拿女巫做船头雕饰了。当审讯还在布鲁日由于波蒂纳里是个富商而引起轰动进行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的时候，那艘安上船头雕饰的大帆船已经落到了保罗·贝内克为首的海盗手里。二老板塔尼先生被海盗杀死了。下一个受害者轮到了保罗·贝内克。不到几年光景，他失去了故乡显贵们的恩宠，被溺毙在塔楼院子里。贝内克死后，那条船把这件雕饰安在船头，没过多久，船出港前便起火，火势蔓延到别的船上，除了那件不怕火的船头雕饰外。全部烧成灰烬，即使这样，由于它那迷人的造型，在船主中总有爱慕者。可是，这个女人刚被安到船头，本来老实的水手们突然哗变，造成人员大减。一五二二年，但泽舰队在天资甚高的埃贝哈德·费贝尔率领下远征丹麦无果，导致费贝尔倒台和市内爆发流血起义。历史书上虽然谈到一五三二年新教牧师黑格，带领一群圣像破坏者冲击了七所教区教堂的宗教争端，但我们还是要把这场影响深远的灾祸算在那个安在费贝尔所乘船只的船头上的船头雕饰。

半个世纪后，斯特凡·巴托里把但泽围住作无用功，奥利瓦修道院院长卡斯帕尔·耶施克在忏悔布道时，把帐算在这个邪恶的女人身上。这位波兰国王把但泽人作为礼物送给她带回军营，并听取了她所出的坏主意。这个木制女人对于瑞典人远征但泽，以及对于长期监禁埃吉迪乌斯·施特劳赫博士也有很大影响。施特劳赫博士是个宗教狂热分子，他私下勾结瑞典人，并主张焚毁那个不知由来的绿色女人。还有传说称，一个从西里西亚逃亡来名叫奥皮茨的诗人，在但泽避难数年，很年轻就死了，他在一个仓库里找到了这个毁坏了的雕像，便倾其全部心血作诗称颂它。

用武力强占但泽的普鲁士人直到十八世纪末，波兰被瓜分的时候才发布一项普鲁士王国的命令，禁止“木雕像尼俄柏”。这是它第一次在官方文件上被提到名字，并且很快被搬进或者不如说监禁到保罗·贝内克就是被人溺死在这座塔楼的庭院里的那座塔楼里。而我也是在它的走廊里第一次验证了我歌声远程效果的威力。面对人类想像力的高级产品——刑具，它老实地度过

了整个十九世纪。

在我于一九三二年攀登塔楼并用我的声音对市剧院门廊的窗玻璃施行打击时，欲称“绿色小姑娘”或“绿姑娘”的尼俄柏已经被从塔楼的刑讯室里搬走多年了。要不是这样，真不知道我对那座拟古典主义建筑所施的打击能不能成功。

一个外地的对这些事情一无所知的博物馆馆长把尼俄柏从控制她任意发泄怨恨的刑讯室里搬了出来，并在建立自由邦以后，把她再次搬进新设的航海博物馆里。没多久，这位热心得过了头的馆长在钉一块小木牌写着，上方陈列的是一具名叫尼俄柏的船头雕饰时不慎弄破手指，血液中毒，不幸亡故。后来的一位馆长，对但泽的历史非常了解，谨小慎微，又想把尼俄柏弄走。被他定为赠送目标的特拉弗河畔的小城市吕贝克连同它的砖砌教堂因为没有接受这个危险的木刻姑娘而在日后战争的轰炸中损失甚少。

所以，尼俄柏或“绿姑娘”被留在航海博物馆里，在建馆以来的短短十四年间，造成除那位谨小慎微的，已经要求调离的馆长之外的两名馆长和一个年岁较大的神甫倒毙在她的脚下，一名工业大学学生和两名刚刚考完试的圣彼得中学毕业生自杀，还有三个已婚一个未婚的可靠的博物馆管理员死于非命等一系列事件。

包括那个工业大学学生在内的所有死者，在被人发现时都容光焕发，胸口插着诸如水手短刀、夺船铁钩、鱼叉、黄金海岸的细镂矛头、制帆匠用的钢针等只有在航海博物馆里才有的利器；只有最后自杀的一个中学毕业生，是先后用自己口袋里的小刀和圆规的，这是由于在他死前不久，博物馆里的全部利器都用铁链锁放在玻璃柜里。

虽说谋杀案侦缉委员会的刑警们宣称，这些可悲的人都是自杀的，但是但泽市内谣言四起，各家报纸也应声重复，声称这些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都是“绿姑娘亲手干的”。人们真的认为是尼俄柏弄死了这些活生生的成年与未成年男子。流言四起，报纸专辟一栏，供市民就尼俄柏案件自由发表意见。但泽市政当局宣称，迷信已过时；但又讲，在发生的所谓不可思议的事情没被证实前，虽然行动是不可取的。

所以，这块绿木头仍旧珍藏在航海博物馆，而奥利瓦的区博物馆、设在屠夫巷的市博物馆以及阿图斯宫的管理处，都不要这个让男人发疯的雕塑。

对这个少女的关注拒绝造成了博物馆管理人员的短缺，参观者也拒绝看到这个琥珀色眼睛的女人。有很长一段时间，文艺复兴式样的窗户后面安静得只有从窗户里透过来一点光线，从侧面照射在那个完全照真人仿制的雕像身上。清洁女工也不再来打扫积存在上面的尘土。曾经纠缠不休的摄影记者们也一样，在后来，其中一人在给这个船头雕饰拍照后不久自然死亡后，他的同事们把他的死同给尼俄柏摄影联系在一起。于是，他们再也不向自由邦、波兰、德国甚至法国的报刊提供这个杀人雕像的照片，并且把自己档案里的尼俄柏照片销毁。他们只靠照来往但泽的形形色色的总统、总理和流亡国王，飞禽展览、全国党代会、汽车比赛和春天的洪水谋生。

此时，不愿再当侍者或进海关的赫伯特·特鲁钦斯基却穿着博物馆管理员的鼠灰色制服，坐到那个被老百姓称为“绿姑娘闺房”的大厅门口的皮椅子上。

赫伯特第一天上班，我因为担心便跟着他一直走到马克斯·哈尔贝广场的电车站。

虽然他总是对我说“小奥斯卡，我不能带你走，回家吧！”我仍旧背着鼓，拿着鼓棒，往他前面一站，缠住他不放。他只得说：“好吧，你可要听话呀！我带你到高门，你就乘车回去。”到了高门，我还是不愿乘五路电车回去。赫伯特只好带我走进圣灵

巷，他又想到了博物馆的台阶上把我撵走。最后，他无奈地叹着气给十四岁的我买了一张儿童票。

我们过了没人参观和检查的安静而愉快的一天。有时我敲半个钟头鼓，或者赫伯特睡上半个钟头。尼俄柏的琥珀眼睛盯着前方，挺起两个乳房，朝着一个目标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根本不注意她。“我喜欢的不是他这种类型的。”赫伯特对她的一道道的肥肉和双下巴很不屑。

赫伯特歪着脑袋冥想：“她的后背像一个家用小衣柜。我更喜欢像小娃娃似的小巧的苗条的娘儿们。”

赫伯特详细地描述他所喜欢的那种类型的女人，用铁铲似的大手比划出一个窈窕的女性身材来，这些，我都在一边听着、看着。从那时直到今天，就算用护士服掩盖起来，他所描绘的也始终是我理想中的妇女形象。

第三天，我们就大胆地离开了门旁的皮椅子。我们借口给这个脏乱不堪的厅打扫卫生擦去尘土，扫掉天花板橡木镶板上的蜘蛛网，使这个地方焕然一新，成为名副其实的“绿姑娘的闺房”，一边走近那个在阳光照耀下投射阴影的绿色木雕人像。体态丰腴，却不臃肿，只是过分表现自己那种美的尼俄柏也不是完全引不起我们的热情，我们并不用那些贪婪地想把她据为己有者的目光，而是用鉴赏家客观精明、仔细琢磨的眼睛认识她。赫伯特和我好似两个，既为抽象的美所陶醉，又头脑清醒冷静，用目测法研究这个女性身材的比例的美学家。尼俄柏除了去大腿稍短而外完全符合古典的理想尺度标准，身高正好是头的八倍；髋部、肩部、胸腔的宽度，则合乎荷兰的标准而不是希腊的标准。

赫伯特翘着拇指：“她要是躺在床上就显得太过主动。在奥拉和新航道我见识过的角斗非常多了。我要女人可不是为了同她摔跤。”赫伯特可是吃足苦头的。“我倒不反对别人当心一碰就会折断有柳条细腰的姑娘。”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说明白了，我们也不讨厌尼俄柏和她的摔跤运动员的体型。赫伯特十分了解，并非体态苗条优秀的女人才有，而不算苗条也不算胖的和体态丰满的女人就没有在裸体和半裸的女人身上他喜欢或讨厌的被动性和主动性问题，有的很温柔的姑娘，躺下后非常活跃；而像柏油桶那样的女人，倒出乎意料地死气沉沉。我们是故意把全部问题简化为两项，并根据原则越来越不留情地侮辱尼俄柏。于是，赫伯特把我抱了起来，让我用鼓棒敲这个女人的乳房，直到从因为喷了防蛀药水，使蛀虫无法容身，可是蛀虫洞仍然数不胜数的蛀虫洞里落下一团团可笑的木屑云。我敲的时候，我们盯着她那双不眨也不动，没有流泪，更不用说泪水盈眶了的琥珀眼睛。她也没有像威胁似的把眼睛眯成一条缝，流露出仇恨来。那双磨光的、与其说是淡红色不如说是淡黄色的琥珀眼珠，映射着这个展览厅里的全部陈设和部分被阳光照射的窗户，虽然由于是凸面体成像产生了畸形改变。如大家所知，琥珀是骗人的。尽管我们也懂得这种被抬高为装饰品的木胶的骗人手腕。但仍坚持以呆板的男人的方式把女人身上的一切划分为主动的和被动的两种，并以这种有利于我们的方式来解释尼俄柏那显而易见的冷漠无情。安全，是我们最大的感觉。赫伯特不怀好意地笑着把一枚钉子敲进了她的膝盖骨里。他每敲一下，我的膝盖就一阵痛，而她却连眉毛都不动一动。我们在这个丰满的绿色木雕像的眼前，胡闹了半天。赫伯特把一个望远镜挂在脖子上，穿上一个英国海军上将的大衣，戴上了与大衣配套的海军上将帽。我则穿上红背心，头扣披肩假发，装成海军上将的小跟班儿的。我们玩特拉法尔加海战，炮轰哥本哈根，在阿布基尔让拿破仑的舰队全军覆没，绕过某个海角，装扮成历史人物和当代人物。我们在依照一个荷兰女巫的身材制作的船头雕饰尼俄柏的眼前玩着。也许，她赞成我们这样胡闹，或者根本就是视而不见。

至今我才了解，任何事情都有许多东西在看，连壁毯的记忆

力都比人强。那不是敬爱的、无所不见的上帝。一把厨房的椅子，一个挂衣架，一个半满的烟灰缸，以及名叫尼俄柏的女人的木雕像，今天都可以对我们当时的一举一动都记得清清楚楚。我们在航海博物馆里工作了半个月或更长。赫伯特送我一面鼓，并给特鲁钦斯基大娘带回两次周薪以及危险津贴。博物馆星期一休息。第三周的星期二，售票处不卖给我儿童票，拒绝我入内。售票处那个男人虽说愁眉苦脸，但还算友好地在赫伯特的追问下告诉我们说，有个孩子的父亲上了呈文，要求不准幼儿入内。他本人并不反对我留在售票处等候，不过他有公务在身，又没有老婆，没时间照管我。因为没人对我负责。要让我进展览厅，进“绿姑娘的闺房”，是不行的。

已经有些让步的赫伯特在我的推逼下只得一方面强调，售票员讲得有道理，另一方面说我的天真无邪能对他起保护作用。是一个能给他带来好运气的吉祥的人，总之，赫伯特和售票员差不多是朋友了，我也被允许最后一次进博物馆。

赫伯特牵着我的手，登上装饰华丽的、不断刷新油漆的回形楼梯，到了尼俄柏所在的三层楼。整个白天都静悄悄的。她半闭着眼睛，坐在有黄色饰钉的皮面椅子上。我和鼓都悄无声息。我们瞧着纵帆船、三桅炮舰、克尔维特式轻巡航舰、五桅炮舰、西班牙大帆船、单桅小帆船、海岸帆船以及快速帆船都悬挂在天花板橡木镶板下等待着刮起顺风来。我们和这些船只的模型一样，对这绿色闺房里寂静无风感到害怕，一道守候着清风的到来。我们盯着这些船只的模型，盼着有风只是因为想不为尼俄柏而感到害怕。如果我们能听到蛀虫蛀木头的声音就证明蛀虫正慢慢地、但却坚定不移地往这块绿木头里面钻进去并把它蛀空。但是，我们听不到蛀虫蛀木头的声音。博物馆的保管员给这个木头身体上了防虫药，使她永远不会朽坏。我们的愿望也实现不了。因此，我们惟一的摆脱对尼俄柏的恐惧的办法，便是瞧着那些船只的模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型，守候着刮起扬帆的风来。我们尽量不瞧她，尽量忘掉她的存在。要不是午后的太阳光正好照射在她琥珀般的左眼上发出光亮的话，我们确也把她忘了。

由于我们对航海博物馆三层楼每到下午阳光的移动很熟悉，所以对琥珀发光并不感到吃惊。当阳光照射到缘饰或纵帆船上时，我们就可以估计出当时的时间。周围的教堂，右城的、旧城的、普菲费尔城的，都在尽自己的一份力量，用钟声来配合灰尘飞扬的阳光的移动过程，用历史性的钟声同历史性的收藏品做伴。如果我们觉得历史性的太阳的阳光是我们博物馆里的一项陈列品，那么我们对阳光和尼俄柏的琥珀眼睛之间的怀疑便不足为奇了。

那个下午我们并无兴致和胆量去做游戏或者胡闹挑衅，这个本来很迟钝的木头人的目光却以双倍的亮度向我们放着光。我们心情压抑地熬到了五点博物馆闭馆。

第二天，赫伯特一个人去上班。我陪他到博物馆门口，没有在售票处等候，而是到这所贵族宅第对面找了一个地方。我带着鼓坐在一个花岗岩圆球上那背后长着一根成年人当做栏杆用的尾巴的。台阶的另一侧当然也有同样的圆球，拦着同样的铸铁尾巴。我几乎不敲鼓，敲起来便是抗议过路的女人，因为她们都愿意在我身边停留下来，问我的姓名，用出汗的手抚摩我那时已经很美、虽然短但微微髻曲的头发。在圣灵巷的尽头的肥胖、臃肿的钟楼下，圣马利亚教堂像一只绿尖顶、红黑色的砖砌的母鸡在那里孵蛋。鸽子在钟楼的墙缝里挤来挤去，我的近旁经常有鸽子被挤落，咕咕地叫个不停。它们也不知道已过了几百年的孵化的时间还要持续多久，孵化出来的又会是什么，为什么而孵化。

上午就这样溜走了。中午，赫伯特来到小巷里。他从特鲁钦斯基大娘给他装得满到盖不上盖的饭盒里给我拿出一块猪油面包，夹着手指粗的一片血肠。他向我机械地点头，鼓励并不想吃

这些的我。我终于吃了起来，赫伯特却只是抽香烟不吃东西。他回博物馆之前，钻进布罗特本肯巷一家酒店里，喝了两到三杯杜松子酒。我盯着他喝酒的喉结。我厌恶他这样把酒往喉咙里灌。他又上了博物馆的回形楼梯，我则坐到那个花岗岩圆球上去。赫伯特喉结上下活动的情形好久以后还在我眼前浮现。

下午的阳光悄悄从博物馆淡彩色的正面建筑前爬过。它在上楣上移动，骑在宁芙和实心号角上，吞噬了伸手抓鲜花的胖天使，使画上成熟的葡萄串完全熟透，闯入乡村狂欢节玩捉迷藏的人群，跳上饰有玫瑰花的秋千，把穿扎脚灯笼裤、正在做买卖的市民变成贵族，抓住一只被猎犬追逐着的鹿，最后到了三层的那扇始终允许阳光进入，并瞬间照亮一只琥珀眼睛的窗户。

我慢慢地从花岗岩球上滑下来。我的鼓框上的漆由于鼓在顽石上狠狠地撞了一下而碰裂了，从白色的底漆和红色的火焰上掉下的很多碎片，红红白白地落在石台阶上。

一辆救护车好像听到了我的咕哝看到了我的比划，开到了博物馆的大门口。过路人围住了入口处。我想尽办法跟着急救人员一起溜进了博物馆。我比经过几次事故本应对博物馆相当熟悉的他们先找到楼梯。

我一见到赫伯特时，便忍不住不笑，最终还是忍住了。他准是想同那木雕交配。面对面地挂在尼俄柏身上，他的头掩住了她的而胳膊抱住了她那高举的交叉十指的胳膊。他的衬衫后来被发现整整齐齐地叠好了放在门旁的皮椅子上。他的背脊满是伤疤。我数了数，与他以前的疤痕没有变化。

救护人员在我后面进来后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把赫伯特同尼俄柏分开。这个情感冲动的男子把保险锁链拉断了，拿起一把船上用的双刃斧，一面刃砍进尼俄柏的木头身子里。而斧子的另一面刃也在他扑向这个女人时嵌进了他的肉里。因此，他们的上半身完全连在一起了。下半身，在他的裤子解开处，在没有了理性却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保持僵硬地挺出的地方，他的铁锚却没有被找到可以固定的陆地。

赫伯特被他们用印有“市立急救站”字样的布单盖住。这时，我像以前失去什么的时候那样又敲起鼓来。当博物馆里的男人们把我领出“绿姑娘的闺房”，下了楼梯，并用一辆警察局的汽车把他送回家的路上，我一直用拳头擂鼓。

如今，当我在这所疗养院里回忆这番木头和肉体间的爱的尝试时，也不得不用拳头擂鼓，再一次去探索赫伯特·特鲁钦斯基背上伤疤的迷宫。像一个盲人一样读着赫伯特背上的字体。这些隆起的疤痕颜色各异，坚硬而敏感，预示着并预感到比这些伤疤更坚硬、更敏感的一切。

我的护理员布鲁诺在他们把赫伯特从他那无情的雕像上抱下来时，才扛着梨子形脑袋失望地来到我床边。他小心翼翼把我的拳头从鼓上移开，拉平了我身上盖的毯子，把鼓挂到金属床脚横头左边的床柱上。

“小奥斯卡，”他劝告我说，“如果再这样敲下去，其他人就会听见这儿有人敲鼓敲得太响了。您休息一下或小声点吧！”

接下来我要对着我的鼓静静地讲授由饿慌了的咆哮的人组成的乐队演奏的主题的一章。

有信有望有爱

从前有个名叫迈恩，小号吹得美妙绝伦的音乐家。他住在一所五层楼公寓的屋顶室里，喂养四只猫，其中一只叫做俾斯麦。他从早到晚抱着杜松子酒瓶啜饮。直到灾祸降临头他才清醒，他一直如此。

现在的我已不太相信预兆。但当时预兆却非常多，这暗示一场灾祸将临。这场灾祸穿上不断变大的皮靴，还想迈开越来越大

的步伐，把不幸带到四处。这时，我的朋友赫伯特·特鲁钦斯基因为一个木制女人给他的前胸添了一道创伤而死去。据称这个没死的女人是為了修复而被封存在博物馆的地下室里。但人们无法将灾祸关进地下室。灾祸同污水从下水道一起流了出去，同煤气一道从煤气管道里散出去，到了每个住家。每个把汤锅放在蓝色火苗上煮的人都没有料到是灾祸把汤煮开的。

我在朗富尔公墓安葬赫伯特时，第二次见到曾在布伦陶公墓见过的舒格尔·莱奥。舒格尔·莱奥流着口水，伸出戴着闪着光的白手套的颤抖的手，向我们大家表示慰问。他的话疯疯癫癫，不知道是欢乐还是悲哀。那天在场的有特鲁钦斯基大娘和她的女儿古丝特、弗里茨和玛丽亚；有胖太太卡特和每逢节日替特鲁钦斯基大娘宰弗里茨喂养的家兔的老海兰德；有当时做出慷慨大方的样子承担一半丧葬费的我的假想的父亲马策拉特，根本不认识赫伯特，只是为了见我和马策拉特一面的杨·布朗斯基。音乐家穿着半是老百姓的服装，半是冲锋队的制服也来了。当舒格尔·莱奥的手套颤悠悠地向他伸去时，一个暗示未来灾祸的预兆同时出现了。

莱奥突然大惊失色把他的白手套甩上了天。它随风带引莱奥越过坟墓飞跑开去。大家听见他那支离破碎的喊声悬挂在坟地的树木上。

除了舒格尔·莱奥把迈恩同送葬的人区分开来之外，其他人都认为迈恩是音乐家。于是，他孤单窘迫地在赫伯特的坟上吹起他随身必带的小号，吹出美妙的音乐。他吹奏得那样美妙，是因为他在戒酒很长时间后又喝了杜松子酒，因为与他同年的赫伯特之死打动了他的心。而我和我的鼓却因此而保持着沉默。

养了四只猫的小号手迈恩从早到晚拿着杜松子酒瓶往肚里灌，直到他在三十六岁至三十七岁之交加入了冲锋队的骑兵团为止。他在骑兵团的乐队里充当小号手，与别人相比，他的吹奏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确无误，但因为他穿上了皮马裤，戒掉了杜松子酒，只能头脑清醒地、响亮地吹奏，所以再无美妙可言。

当曾和青年时代的冲锋队员迈恩在二十年代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小组又同成为社会主义红鹰团团员的的朋友赫伯特·特鲁钦斯基死后，迈恩在他的朋友的棺木行将入土之时，一手拿起小号，一手拿出一瓶杜松子酒，想要美妙地沉醉地吹奏——在冲锋队的骑兵队里的时候，他一直保护着他那音乐家的耳朵——所以，在公墓他喝了酒。虽说他原先打算穿着褐色制服不戴帽子在坟地上吹奏，然而，他却并未如大家所愿的那样脱去制服外面老百姓穿的大衣吹奏。

当冲锋队员迈恩在自己青年时代朋友的墓前美妙地、像杜松子酒一样明亮地吹奏小号的时候，他还穿着冲锋队骑兵队制服外面的大衣。当每逢有葬礼时，人人都听到了舒格尔·莱奥的吊慰。只有这个冲锋队员不得握舒格尔·莱奥的白手套，因为莱奥大叫一声，抽回了手套，认出了这个冲锋队员。表示哀悼的话也缩了回去。迈恩没听到哀悼的话，带着他冰凉的小号回到在我们那所公寓屋顶下养着四只猫的他的房间里。

冲锋队员迈恩那一天参加了他年轻时的朋友赫伯特·特鲁钦斯基的葬礼回家。他心里因为有人拒绝向他致哀而感到悲伤，但已经又清醒了。他孤零零地同他的四只猫待在屋里。四只猫蹭他的马靴，于是，为了把猫从他的靴子旁引开去，迈恩给它们用一张报纸包着的一大堆青鱼头，那一天，他屋里的猫味儿特别重。这四只雄猫中一只黑色白爪的名叫俾斯麦。由于迈恩屋里没有杜松子酒，公猫的气味越来越重。如果他不住在最高一层的屋顶室的话，他可能会到我家店里来买点什么。但是，他既害怕楼梯，又害怕邻居家的人，他以前常在他们面前发誓，他的嘴唇要离杜松子酒远点，他已经开始过严格而清醒的新生活，从今以后他的座右铭便是：有条不紊，不再当一个放纵堕落的青年，同醉生梦

死的生活一刀两断。但他受不了猫的气味，尤其因为他那天上午经历了一些使他难过的事情，还有就是他家里没有杜松子酒。他心里越是难过，越是想酒喝，猫的气味就更加浓重。于是，曾以吹小号为业、现在是冲锋队骑兵队的乐队队员的迈恩，用从冰凉的连续燃烧炉旁抄起的一柄火钳，狠揍那些猫，直至虽然猫味很重但猫已经不在世上了。

有个名叫劳布沙德的钟表匠，也住在我们那所公寓二层楼一个二居室的套间里，房间的窗户对着院子。他还没有结婚，是纳粹党人民福利和动物保护协会会员。劳布沙德是个好人，他使劳累的人恢复疲劳，使有病的动物恢复健康，使坏了的钟表恢复生机。一天下午，这位钟表匠坐在窗口回想着上午他所参加的一位邻居的葬礼。这时，他看到住在同一公寓屋顶室的音乐家迈恩，把一只装了一半东西的土豆口袋，扛到院子里。口袋底下好像是潮的，湿漉漉的东西在往外滴。两个垃圾箱中都已满了四分之三，迈恩把口袋塞进去后费了好大劲才把盖子盖上。

一天，迈恩用火钳打死了他的四只猫，因为他出于特殊的原因，无法忍受这种气味。死猫被他装进土豆口袋，扛着它下了四道楼梯，慌慌张张地把口袋扔进院子里拍地毯的木架旁的垃圾箱里，因为口袋布已经湿透，在三层楼上就开始往外滴了。垃圾箱已经满了四分之三，这位音乐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用口袋把垃圾压紧，关上了垃圾箱盖。他因为寓所里有猫的气味，所以不想回去，便离开院子往街上走去去找他的朋友。被压紧的垃圾又胀开来，顶起了口袋，又把垃圾箱盖顶起了。

坐在窗口沉思的钟表匠劳布沙德，看着音乐家迈恩把一只半满的口袋塞进垃圾箱里，然后离开院子，迈恩刚走开没多久，垃圾箱盖自己一点一点地掀了起来。

被扔到垃圾箱里的这些猫，其中一只叫做俾斯麦，很坚韧，正如猫都很坚韧一样，还有一口气。它们在口袋里活动，使垃圾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箱盖也动了起来，并使一直还坐在窗口沉思的钟表匠对迈恩扔到垃圾箱的口袋里装的东西产生了疑问。

因此，他再也不能坐着观望垃圾箱里活动的东西。于是，他走出公寓二层楼他的套间，来到公寓的院里，打开了垃圾箱盖和口袋，找出了四只被揍得皮开肉绽、但还有气的雄猫，并把它们带回家救护。但是当天夜里，它们就死掉了。他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到他加盟的动物保护协会去告状，也向地方党组织领导报告了这件使党的声誉受损的虐杀动物的行为。

迈恩因为杀了四只猫而被劳布沙德告发了。法院开庭审理，这位冲锋队员被判罚款。这一事件在冲锋队被公开讨论，因为他的行为不配当冲锋队员，便把他开除了。尽管这个冲锋队员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八日与九日间后来被称作“砸碎玻璃窗之夜”的夜里表现得英勇非凡，他同另外几个队员放火烧了朗富尔米哈埃利斯路的犹太会堂，并在第二天出了很大的力洗劫事先明确了目标的为数众多的商店时也相当卖劲，但还是被开除出了冲锋队的骑兵团。被除名的借口是不人道地虐杀动物。过了一年，他才加入了后来被武装党卫军所接管的民军。

马策拉特在十一月的一天因为城里出了事关了殖民地商品店的门。他牵着我的手，乘五路有轨电车到长巷门，因为在索波特和朗富尔的犹太会堂着了火。犹太会堂将近烧毁，消防队只是阻止火势蔓延到别的房屋上去。穿制服的和穿便服的，把书籍、教堂里的礼拜用具以及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堆积在废墟前。这座堆积起来的小山被人点着了，于是，这个老板便借此机会，靠这堆公众的烈火来温暖他的手和他的感情。我见他如此忙碌和激动，便悄悄奔向军火库，因为那里有我挂念的红白铁皮鼓。

从前有个名叫西吉斯蒙德·马库斯，除去别的商品还卖红白漆的铁皮鼓的玩具商。作为职业铁皮鼓手的我，是买这些铁皮鼓的主要顾客，没有铁皮鼓，我就没法活了，我也不想活。正因如

此，我赶紧离开起火的犹太会堂，奔向军火库巷，因为我的铁皮鼓的守护人住在那里；但是，当我见到他时，他已经永远不能在这个世界上出售铁皮鼓了。

我，本以为离开了那些消防队员，却没想到他们赶在我前面到了马库斯的玩具店，把毛刷蘸了颜料，用聚特林字体在他的橱窗上横写了几个大字：犹太猪猡。后来可能又对自己写的字感到不满意，使用靴子的后跟踢碎了橱窗玻璃，如此，他们给马库斯加上的那个头衔别人只好去乱猜了。他们没有从他们所不屑的门口那里走进店铺，而选择了从砸碎的玻璃橱窗进入的方式。

我来到时，他们正在那儿以他们自己的方式玩玩具。我从橱窗进入店铺后看到有几个已经脱下了裤子，把看起来还没有消化好的豌豆的褐色香肠压在帆船、拉提琴的猴子和我的鼓上。他们都穿着音乐家迈恩的冲锋队制服，不过迈恩并不在其中；正如这些在场的人一样，既然他们在这里，别处就没有他们了。有一个人用匕首给布娃娃开了膛，但从丰满的躯体和四肢里冒出的锯木屑让他特别失望。

我挂念的只是他们不喜欢的鼓。我的鼓顶不住他们这种怒气，只好跪下来，默默不语。马库斯避开了他们的怒火。他在办公室里，尽管门没有锁，他们还是放肆地破门而入。

同往常一样，玩具商坐在他的办公桌后面。穿日常的深灰色上衣套着套袖。肩上的头皮屑暗示他的头发有病。一个冲锋队员手里，拿着木偶卡斯佩勒，用木制的卡斯佩勒祖母去杵马库斯，但是他已不能说话，侮辱他他也感受不到了。在他们叫喊着砸他店铺的橱窗玻璃的瞬间，他由于十分口渴，把他面前写字台上玻璃杯中的液体一饮而尽。

当他们夺去了我的玩具商的性命，砸烂了玩具商的店铺的时候，就预感到，艰难的岁月临到了像我这样的侏儒铁皮鼓手头上。所以，在离开店铺时，我从被砸烂的东西里，挑选出一面完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好的和两面损坏不大的鼓，挂在身上，离开了军火库巷，到煤市去找可能也在找我的父亲，外面，是十一月某一天将近中午的时候。在市剧院旁边，在有轨电车站旁边，站着虔诚信教的妇女和冻坏了的丑姑娘，在那里散发宗教小册子，带着装铁的小罐子，在两根竿子中间是一道写着《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的引文的横幅。“有信——有望——有爱”，这是我会念的；在这三个词周围，另有一些词，就像一个小丑在耍瓶子：轻信，希望人兴奋剂，爱的珍珠，好望钢铁厂，爱之妇女牛奶，信徒大会。明天是否会下雨你相信吗？全体人民轻信圣诞老人。我相信，这是核桃味和杏仁味。但这是煤气味。我们马上要过基督降临节的第一个星期了。基督降临节的第一个、第二个直到第四个星期日都像拧开煤气开关一样被拧开了。这样，就可以让人们信以为真地闻到核桃味和杏仁味了。这样，所有轧碎核桃用的木头大人都可以宽慰地相信：是他来了！是童子耶稣，救世主，还是天国的煤气抄表员来了，臂下夹着个煤气表，的嗒的嗒不停地响着？他于是说：我是这个世界的救星，没有我，你们就煮不熟饭。他特别和气，提出一份优待的收费价目表，拧开刚擦干净的煤气开关，好让人用喷出来的圣灵来煮鸽子。他接着分发核桃和杏仁，让大家立即砸开，从里面也喷出来圣灵和煤气。这样一来，所有轻信的人就很容易地在浓密的淡蓝色气体中间，把商店前面的煤气抄表员们全看成是圣诞老人和各种尺寸、各种价格的童子耶稣。他们就这样全相信了独家赐福用指针上升和跌落的煤气表象征命运的煤气公司，并且以正常的价格举办一次基督降临节。过了那个紧张的节日之后，只有那些因储货不足而没分到杏仁和核桃的相信到了圣诞夜基督会降临的人活了下来。

但在事实证明对圣诞老人的信仰即对煤气抄表员的信仰之后，大家不再顾及《哥林多前书》上那句话“有信——有望——有爱”的顺序，却先尝试起爱来了：我爱你，你爱我吗？还是更

爱你自己？我也爱我。出自纯真的爱，他们互称爱小洋萝卜，互咬，一根小洋萝卜出于爱咬掉另一个的小洋萝卜。他们相互讲述小洋萝卜之间美好的、天国的但也是尘世的爱的实例，振作地、饥饿地、明确地互问谁爱谁是他们张嘴咬前的前奏。

但是，在《哥林多前书》上，在他们因爱相互咬掉对方的小洋萝卜并且在对煤气抄表员的信仰被宣布为国教之后，除了信仰和被提前取走的爱以外，惟独剩下第三种滞销的希望。当他们还在咬小洋萝卜、核桃和杏仁的时候，他们已经希望快些结束以便他们重新开始或继续前进。在终场音乐奏完之后或者在终场音乐还在演奏的时候，他们就在希望这收场戏立刻收场。他们始终还不知道，只是希望马上收场。明天就会结束了，但愿今天还不会结束，因为假如突然结束的话，他们不知该如何是好。后来，结束了，他们很快把结局当作希望葱茏的开端，因为在我们这个国家，结局始终是开端，希望存在于每一个即使是最终的结局之中。即使书上也说，人只要怀有希望就会反复开始充满希望地完结。

我不晓得今天藏身在圣诞老人胡子后面的是谁；我不知道，圣诞老人的口袋里装的是什么；因为基督降临节又一直从煤气管道里喷出来了，我不知道，该怎样关上和调节煤气开关，我不知道，是不是在试验；不知道，为谁试验；我不知道，能不能相信他们如我所愿地充满着爱在擦干净煤气开关，好让它像鸡一样鸣叫；我不知道，在哪天早晨，在哪天晚上；我不知道，是在白天的哪个时间，因为爱不懂得时间，希望没有尽头，信仰无止境，惟独知与无知受时间和界限的制约，多半遇上胡子、口袋和杏仁时就提前结束。因此，我还得说：我不知道他们用什么填满肚肠，有必要被填满的是哪个的肚肠，尽管任何一种填料，或精细或粗糙，都一清二楚地标明价格，可我仍然不知道，价格里面包含的意义，我也不知道，从哪些词典里可以查出填料的名称，不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知道他们用什么填满词典以及肚肠，还有肉和语言：字有意义，屠夫沉默。我切下一片，你翻开词典，我读我觉得有味的，你却不懂你觉得有味的是香肠片还是词典里的引文；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哪个必须静下来，哪个必须沉默。这样，肚肠才能被填满，书本才能出声，塞进去，压紧，写得密密麻麻。我不知道但预感到：用语言填满词典和用碎肉填满肚肠的是同一个奢夫。保罗是不存在的，这是一个叫扫罗的人，他以扫罗的名义向哥林多人讲了一些关于价廉物美的香肠的消息，他把这些香肠称为有信有望有爱，称赞它们容易消化。至今他仍经常变换扫罗的形象去问世人推销这种香肠。

但他们夺走了我的玩具商。想连同玩具商一起让玩具也在世界上永远消灭。

有个音乐家，他名叫迈恩，小号吹得非常美妙，他养了四只猫，其中一只叫做俾斯麦，但他用火钳打死了他养的四只猫。如果他没有死，他现在又在用十分动听的声音在吹小号。

有个名叫劳布沙德的钟表匠，是动物保护协会会员。

有个叫马库斯的玩具商，出售红白漆的铁皮鼓，但他自杀了，所有的玩具也随之没有了。

我是铁皮鼓手，我需要玩具商，但他们夺走了我的玩具商。

第二篇

废 铁

玛丽亚在探望日那天送给我一面新鼓。她把手从床栏杆上伸过来，把铁皮鼓连同发票递给我。我挥手拒绝后去按床头的电铃，直到我的护理员布鲁诺走进病房来干他已同家常便饭般的差事。每次玛丽亚给我送来用蓝色纸包装的新鼓时，布鲁诺就会接过去，解开绳子，把包装纸打开后，近于是庄重地取出鼓来，随后再认真地把包装纸折叠好。然后他便拿着鼓，直奔水池，放出热水，洗掉鼓箍上的价格标签，同时小心翼翼地不伤到那上面的白漆和红漆。

玛丽亚每次都花很少的精力来探望我，而且只待一会儿。她临走时拿起那面我在描述特鲁钦斯基的脊背、那个木制的船头雕饰以及对《哥林多前书》进行或许有点太过于武断的阐释时敲破的那面鼓，把它带回我家地窖里去，同时有一部分是我的职业，一部分为我的私人目的服务过被用坏了的铁皮鼓放在一起。玛丽亚走之前对我说：地窖快没地方了，今年冬天的土豆都无处可放了。”

我对家庭主妇玛丽亚的责备只报以微微的一笑，然后请她按已有的顺序用黑墨水给这面退休的鼓编上一个号码，然后把我写在一张纸条上的这面鼓的使用日期及简历转抄到一个挂在地窖门背后，对我在一九四九年以后的鼓的情况非常了解的日记本上去。

玛丽亚点点头，顺从地被我吻了一下后就离开了。她始终不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理解我的条理感，而且对此感到不安。我非常理解玛丽亚的这种疑虑，他也不清楚自己为什么这样书生气四溢地去收藏敲坏了的铁皮鼓。更令人想不明白的是，他这永远也不想再看到别尔克公寓土豆窖里存放的那一堆废铁。经验告诉他，父辈的收藏物儿女是不屑一顾的。因此，我的儿子库尔特有朝一日继承遗产时，要是瞧不上这些不幸的鼓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每隔三个星期都要这样吩咐玛丽亚一次。如果她每次都照办不误，那么，我们存放东西的地窖总有一天会满的，就没地方放冬天的土豆了。

在地窖里已经存放了许多鼓以后，我曾固执地认为总有一天我的这些鼓会引起某个博物馆的兴趣。但是，这个念头在我脑子里闪过的次数逐渐减少了。所以，我的收藏热的真正原因并不在此。我越是深入探究，便越是觉得这种收藏热源于一种简单的变态心理：我担心有朝一日铁皮鼓会越来越稀少而脱销，会被禁止和销毁。有朝一日，我只得请哪位白铁匠助我一臂之力把若干面损坏得不太厉害的鼓修补好，这样，我便可以凑合着用几面修补过的旧鼓，度过没有鼓的可怕时代。

疗养院的医生们用不同的言语表述了和我的意见一致的对我这种收藏热的原因的分析。霍恩施泰特博士小姐甚至想知道我这种变态心理产生的确切日期。我可以肯定地告诉她，那是我失去了我的铁皮鼓仓库管理员西吉斯蒙德·马库斯的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九日。我可怜的妈妈死后，星期四不再去军火库巷，马策拉特又总是很拖拉，不会及时给我买新鼓，而扬·布朗斯基，也越来越少上我家的门了，要想及时弄到一面新鼓已经非常困难了。而如今，玩具店又被捣毁了，我真是面临绝境。我一见到马库斯坐在什么也没有的写字台旁，就立刻明白了：马库斯永远断绝了同那家公司之间的业务关系，他不会再送我铁皮鼓了，也不再卖玩具，那家公司一直生产和给我供应漆漂亮红白相间的铁皮鼓。

但当时我并没有把玩具商的死作为以前那种比较快活的游戏时代告终的标志。我从已成废墟的玩具店里，选出了一面完好的和两面铁皮边缘撞了两道凹痕的鼓，带回家中，自以为已经有充足的准备去应付艰难的时世了。

我倍加珍爱这些鼓，从不轻易敲。我自行规定，整个下午不再敲鼓，还无奈地取消了在早餐时敲鼓，而到现在为止，这样做能使我熬过这一天的时间。我苦修苦行，逐日消瘦，被带到霍拉茨医生和他那位越发显得皮包骨头的女助手护士英格那儿去就诊。他们给我各种有味儿没味儿药，据霍拉茨医生讲，我是由于腺功能不稳，忽而亢进，忽而衰减，感到不适。我不想去听霍拉茨胡扯，便对苦行进行了节制，于是体重复又增加。到了一九三九年夏天，又恢复到十三岁时的那个老样子，我的面颊又圆胖了，那是彻底把从马库斯那儿弄来的最后几面鼓敲坏才换得的。铁皮裂得满是窟窿，红白油漆脱落了，长锈了，垂头丧气地挂在我的肚皮前面。

虽然马策拉特天性助人为乐而且很友好，但还是别想让他帮忙，因为自从我可怜的妈妈死后，他一心只想他那个党的事情。他想散心时，就和另外一些党支部领导人开会，或者在午夜，喝饱了老酒以后，一个人坐在我家起居室里，大声而又亲切地同墙上黑框里的希特勒和贝多芬像聊天，让那位天才给他解释命运，让那位元首给他解释天意。等醒过味来，就像是受了上天安排似的去搞冬赈募捐。

我讨厌让这些外出募捐的星期天在我脑海中重现。有一天，我做了弄一面新的鼓的一次尝试，可是白费心机。那天上午，马策拉特在大马路上艺术片电影院门前和施特恩费尔德百货公司门前募捐，中午回家，替他自己和我热柯尼斯贝格肉丸子。他虽然死了老婆，但依旧很喜欢烹调，而且手艺的确很棒。我今天还记得这顿饭美味可口。饭后，这个困倦的募捐者躺到沙发榻上去打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盹。我在他的呼吸声刚表明他睡着了的时候，马上提起了钢琴旁边那只募捐箱，溜进店铺，钻到柜台底下。那个募捐箱的形状酷似一个罐头箱，我聚精会神地瞧着这个一切铁皮罐头中最可笑的家伙。想的不是去偷里面的铜板来发财。我脑子里冒出了一个荒唐的念头，要把这个募捐箱当做铁皮鼓来试试。但无论我怎么敲，怎么耍弄鼓棒，它始终只答到：为冬赈捐点吧！别让任何人挨饿受冻！

我在三十分钟后放弃了这次尝试然后在钱柜里拿出五芬尼捐献给冬赈工作，再把增加了五芬尼的募捐箱放回到钢琴旁边，好让马策拉特敲着它去继续在周日募捐。

我在这次荒唐的尝试失败后断了那不切实际的念头。我不再认真地尝试把罐头盒、翻过个的桶、底朝天的洗澡盆当做鼓来敲打。有时我仍不免要这样试试，那也是为了努力忘却这些丢人的插曲，为了在这页稿纸上不给或者给予尽可能小的地位。罐头不是铁皮鼓，桶就是桶，洗澡盆是人家用来洗澡和洗长袜子的。铁皮鼓在今天和当时都是没有代用品的。一面白底红火焰的铁皮鼓是不需要别人替它说话的，只有靠它自己。

被人生卖，被判孤立无助的我真不知道在这紧急时刻，离开了鼓该如何保持自己三岁时的面孔经久不变。我多年来始终在做各种骗人的假象，如有时夜里尿床，每天晚上像孩子一样咿咿呀呀地做晚祷，害怕其实叫格雷夫的圣诞老人，不厌其烦如典型的一些三岁小孩问诸如汽车轮里哪里来的一类的问题。所有这些硬做出来的假象，大人们已经司空见惯，见不着时会觉得不寻常，而我只有在没有鼓的条件下来做这一切。在我绝望得要放弃不干了的时候，我到了环行路波兰居民区找可能是我父亲的扬·布朗斯基。

马策拉特和我那位已提升为邮局秘书的表舅可为关系尽管曾经很好，有着非常美好的共同的回忆，但在妈妈去世后，他们也

不再像以前一样了。这种关系不是一下子说消失就消失的，而是逐渐变化的，政治局势越激化，他们的关系破裂得越彻底。当我妈妈苗条的灵魂和丰满的肉体死灭时，这两个男人之间的友谊也就崩溃了。他们两个都曾在她的灵魂中得到反映，都曾以她的肉体为食，但如今，他们失去了这件食物，这面凸透镜，没有什么可用来替代，只能去参加政治上对立的所抽的烟叶却相同的男人们的集会。但是，无论是波兰邮局还是同只穿衬衫的支部领导人开会，无法替代一个美丽的、尽管通奸但仍感情丰富的女人。两个都有可能是我父亲的男人马策拉特和扬在我妈妈去世后到马库斯死这段短时间内分别防着马策拉特的顾客和他的党以及扬的邮政局领导小心谨慎地会过几次面。

一个月中每隔十天左右就会在午夜时分看到马策拉特掀开窗帘把窗户打开一条缝，因为他听到了扬用指关节敲我家起居室的玻璃。这时，窘迫不已的二人中会有一个人找到一句摆脱窘境的话，建议在夜深人静时玩施卡特牌。蔬菜店的格雷夫也被他们请来了，如果他因为扬的缘故，和他是前童子军指导员（在此期间，他已将自己那个队解散了），要小心点，加之，他不太喜欢玩施卡特牌，也打不好而拒绝参加的话，往往由面包师亚历山大·舍夫勒来当第三家。这位面包师虽然不愿同我的表舅扬同桌而坐，但是，由于像遗产一样由马策拉特继承下来了的对我的可怜的妈妈的爱慕以及由于舍夫勒坚持零售商必须同心协力的原则，所以，这个短腿的面包师还是让马策拉特给叫来了，由小锤路匆匆来我家，到起居室桌旁坐下，用他那像被蛀虫蛀过的、没有血色的、粘着面粉的手指像将小圆面包分发给饿慌了的老百姓似的洗牌，发牌。

这些半夜才开始的被禁止的牌局一般都由于舍夫勒要回面包房，而在凌晨三点结束。我很少能够穿着睡衣，没有声音，从小床上下来，不带着鼓悄悄地钻进桌下阴暗的角落。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在桌子下面我获得了很简便的进行比较的观察方法。但在我可怜的妈妈去世以后，一切都不同了！扬·布朗斯基不再像过去那样，在桌面上谨小慎微，然而还是一直输，可是在桌子下面却胆大包天地用他脱了鞋子只穿袜子的脚去占据我妈妈两腿间的地盘。在那时的施卡特牌桌底下已不再有色情甚至爱情了。六条被裤子绷紧着，呈不同的鱼骨状，有时赤裸着，宁可只穿衬裤，汗毛或多或少的男人的腿。在桌子底下都尽量避免哪怕是偶然的接触。腿以上延长的躯干、脑袋、胳膊则全神贯注地在玩牌，出于政治上的原因，本来是禁止他们在一起打牌的，因为每输一盘或者每赢一盘，都会引起诸如波兰输掉了无主牌的一局，而自由市但泽则为大德意志帝国赢了红方块为主牌的一局，一般都是垂头丧气或者得意洋洋的反应。

这种耍手腕的牌戏结束的日子犹如所有的军事演习总有一天都会停止，并因为某种所谓的紧急情况，在更广大的范围之内真枪实弹地打起仗来一样容易预见。

在一九三九年夏初的时候，事情变得越来越透明了，他们不会再像波兰邮局职员和前童子军指导员那般危险，因为马策拉特在每周一次的党支部领导人会上寻到了新的牌友。扬·布朗斯基也必须考虑命运规定他所属的阵营，而且要和邮局的人搞在一起，譬如说，同曾在马尔察莱克·毕尔苏德斯基的传奇般的军团里服役造成一条腿就比另一条腿短了几厘米的。尽管瘸了一条腿，仍是一个不错的看房人，此外又是一个手艺很巧的人，科比埃拉我希望他会行善替我修理我那些残破的鼓。只有通过扬·布朗斯基才能找到科比埃拉，所以我不顾八月天异常的闷热，每天下午六点左右，站在波兰居民区附近，等候下班后多数时间准时回家的扬。我也不考虑那位假想的父亲下班后会去干什么，只是站在那里，等到七点钟到七点半，但他没来。我本来是可以找表舅妈黑德维希的。扬也许病了，发烧了，或者腿断了，上了石

膏。可我却站在原地不动，只满足于间或凝视一下那位邮局秘书寓所的窗户和窗帘。一种奇怪的羞怯心理阻止我去走访有着那双慈母般的温柔的牛眼睛的表舅妈黑德维希，她的目光使我感到悲哀。我也讨厌布朗斯基夫妇的孩子，尽管他们可能是我同父异母的兄妹。他们对待我就像对待玩偶一样，他们愿意把我当做玩具来玩。同我几乎同年的、十五岁的斯特凡，没有权利那样傲慢地对待我，像老子对待儿子似的老是教训我。还有那个扎着小辫，胖胖的脸蛋像初升的圆月的玛尔加，她没有把我当做没有意志的时装木偶的权利，一连几个小时地替我梳头、刷衣服，摆布我，教我这个那个。他们两个自然把我看做一个畸形的、令人同情的侏儒孩子，觉得他们自己很健康，有光明的前途，还是我外祖母科尔雅切克的宠儿，而因为我总是使她感到很难对付，她是不会把我当做心肝宝贝的。用几本童话和连环画是无法笼络我的。我所期待外祖母的在今天想象起来也是非常简单的，也是很难获得的莫大的享受。我一见到她，就要极力仿效自己的外祖父，钻到她的裙子底下去避难，要是可能，就永远也不再从这个避风港里探出头来和外面的空气接触。

我挖空心思要钻到外祖母的裙子底下去。我不相信她真的讨厌我坐在她的裙子底下。她总是犹豫，多半拒绝我。我想，任何只要有一半像科尔雅切克的一个人，她都会让他去避难的。而既没外祖父的身材也没有他那一划就着的火柴的我要想进入那个城堡就得巧施特洛伊木马计。

我像一个三岁孩子一样把球滚到裙子下面后马上以拾球为借口，在外祖母看穿这种诡计并把皮球还给我之前，就突然钻了进去。有大人在场的话，外祖母就不允许我在裙子底下逗留太久。大人们往往用含沙射影的话嘲笑她使她回想起那年秋天在土豆地里当新娘的往事，天生就不白的外祖母被羞得满脸通红，久久不消。年过六旬的外祖母并没有因红晕配上差不多全白的头发而难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看多少。

我的外祖母安娜独自一人的时候，她会比较自愿地让我在裙子底下多待一会，我不必用皮球耍愚蠢的花招，但这种情况比较罕见。我拿着鼓滑过地板，弯下一条腿，另一条撑着家具，移向外祖母这座大山的方向，到了山脚下，我用鼓棒撩一下四层幕布，钻进去，让四层幕布同时落下，过了一分钟，静静地用全身的小孔呼吸着，沉浸在那股强烈的、易臭的不受季节变化的影响，气味弥漫在那四条裙子之下的黄油的气味之中。然后我才开始击鼓。我知道外祖母喜欢听什么，于是，便敲出了如她当年坐在土豆秧火堆后所听到的十月的雨声，而就在这雨声中，我的外祖父带着被人紧紧追踪的纵火犯的气味，钻到了她的裙子底下。我在鼓上敲出阵斜飘的细雨，直到我头顶上响起了叹息声和圣者名字的呼唤声。现在可以再一次辨认出一八九九年我外祖母在雨中，外祖父在干燥处时曾响起过的叹息声和圣者名字的呼唤声了。

我常于一九三八年八月在波兰居民区对面的街头等扬时想起我的外祖母。她也许在表舅妈黑德维希那儿做客。坐在裙子底下，呼吸臭黄油味的想法很吸引人。但我还是没有登上三层楼，在挂着“扬·布朗斯基”名牌的门上按铃。我无法给外祖母什么。我把鼓敲破了，什么声音也敲不出来了，也忘了十月落在那土豆秧火堆上斜飘的细雨是怎样的声音。由于我外祖母只能用秋雨的瑟瑟声来对付，所以，我仍站在环行路上，瞧着沿陆军草场丁零当啷开来开去的五路电车迎面驶来又远去。我一直等待着扬，还站在原地不动，是否因为我一时想不出一一种可以行得通的方式离去。长久等待会起教育作用。但是，等待时间过长也会诱使等待的人把他所盼望的会面的情景想象得精彩纷呈，因为什么情况都被他想到了。所以，被等待的人不能使他喜出望外，但扬还是使我吃了一惊。我只想先看见他，并对这个一点儿思想准备都没有

的人敲起鼓的残骸来，因而紧张地站在原处，随时准备抽出鼓棒来。我想让铁皮大声喊叫，让他明白我目前的处境有多绝望，而自己就不必费口舌去解释了。我对自己说道：再等五辆，三辆，一辆电车就走了；我焦急万分，开始想象布朗斯基一家是怎样根据扬的主意搬到莫德林或华沙去了，好像还见到他在布罗姆贝格和托恩当邮政局长。我取消了刚才的发誓，又等了一辆，随后转身朝回家的路走去。却被一个大人用手捂住眼睛并在背后抓住。这是一双男人柔软、没汗而非常舒服，散发着优质肥皂的香味的手，我感觉到这是扬·布朗斯基。

他把手松开，把我扳过身去面对他，爽朗地笑着，引起很多人的注意。这时，我已经来不及用鼓来说明我的不幸处境了。因此，我把鼓棒插在那里，由于无人照管，裤子特别脏，口袋边也全磨损了的齐膝裤亚麻布背带后面。两只手空出来后，我这才把用可怜巴巴的绳子挂着的鼓像控诉似的，一如维恩克圣下在望弥撒时高举圣饼那样举过眼睛。如果我也能像他那样说“这是我的肉和血”就好了，我除了高举这剥了漆皮的铁皮鼓外什么都没做，只要求扬修理我的鼓，其他就没什么了。

扬一下子停止了那刚才用力发出的神经质般不合时宜的笑声。他盯着举在他眼前的鼓，又把目光从残破起卷的铁皮上挪到我那双明亮的、始终保持正直坦率的三岁孩子的眼睛上，起先只看到两个同样的、无言的蓝色眼珠里面的闪光、映像以及人们错误地说成是眼睛的表情的一切，他在断定我的目光同街上随便哪个好玩的水坑并无区别之后，才拿出所有的好意，集中了他那尚未淡薄的记忆，强迫自己从我的眼睛里再次找到我妈妈那双是灰色的、但形状相似的眼睛；这双眼睛许多年来一直对他显露善意直至热情。但可能让他惊诧不已的，是他在我的眼睛里看到了他自己的影子，虽然这并不意味着扬一定是我的亲生父亲，因为不管他的、妈妈的还是我的眼睛都有天真玲珑，闪闪发光，含有傻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乎乎的美的特点。布朗斯基家的人差不多都具备这种美，斯特凡如此，玛尔加·布朗斯基少一点，我的外祖母和她的哥哥文岑特又多一点。除去我是黑睫毛、蓝眼睛而外，联想一下我曾用歌声唱碎玻璃就可以肯定我身上流有纵火犯科尔雅切克的血液，但我却与莱茵人马策拉特几乎完全相同。

在往常被人单刀直入地提问时总是含糊其词的扬在我举起鼓并让眼睛发挥作用的一霎那也只能承认：“瞧着我的是你母亲阿格内斯或者是我自己。我和她有太多的相同点。但也可能是我在美国，或者在海底的舅舅科尔雅切克在瞧着我，好在不是马策拉特瞧着我。

扬用他笨得连削铅笔都不会的手把鼓从我手里拿过去，一反常态像了解修鼓的原理似的转了转并敲了敲鼓。这个很少下决心的人显然打定了主意，用使我惊奇的从未有过的迅速一把抓住我的手，搀着我穿过环行路，到了陆军操场的无轨电车站，电车到站后他便拉我上了允许吸烟的五路车的拖车。

我猜我们正乘车进城，去黑维利乌斯广场，到波兰邮局去找既有工具，又有技能，数周来，我的鼓一直盼着的看房人科比埃拉。

我们这一趟若不选在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就会清静而高兴。但从马克斯·哈尔贝广场起，五路电车连同拖车都挤满了从布勒森海滨浴场回来的疲惫不堪但仍吵闹的游客，丁丁当当朝城里驶去。如果韦斯特普拉特对面的港口没有停泊着“石勒苏益格”号和“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号那两艘战列舰，如果它们的钢铁船身、可旋转的炮塔和大炮没现身在红砖墙后面的话，等待着我们的会是一个十分美好的夏末的夜晚。我们把鼓交给科比埃拉以后，就会在魏茨克咖啡馆里，摆上两瓶果汁汽水，插上两根麦管。如果近来几月，邮局内部没有装上钢板而使之成为一个要塞，假如善良的邮局职工、官员和邮递员每个周末没有在格

丁根和奥克斯赫夫特受训而变成一支要塞守军的话，那么，到邮局前，把门房的铃按响，让看房人科比埃拉修理无害的儿童玩的铁皮鼓会是件特别美好的事情。

扬·布朗斯基在快到奥利瓦门时已经满身是汗，直愣愣地盯着兴登堡林荫大道蒙上一层尘土的绿树。他不停地抽金色烟嘴香烟，数量多得超出了他的节约原则所许可的范围。我除了以前有两三次见扬和妈妈在沙发榻上如此大汗淋漓外，这次是再次见到。

但为什么扬在我妈妈去世那么久后还如此地出汗呢？于是我发现，车每快到一站，他就想下车，每回刚要下车，他就想起我在跟前，是我和我的鼓使他又坐了下来。这时我才明白，他是由于波兰邮局的才出汗的，他是必须去保卫它的国家官员。他先是从邮局溜了出来，后来在陆军操场拐角环行路旁撞见我和我的破鼓，于是决定带我回去履行他的职守，所以才出汗和拚命吸烟。可我既不是官员，对于守卫邮局大楼也没有一点儿用处。我肯定是不会拦阻他再次下车的。他当时还不到四十五岁，正是有为之年，蓝色的眼睛，棕色的头发，双手习惯性地颤抖着。他由于出汗变成这样一副可怜相，使得坐在他身边的我闻到了冷汗味而非科隆香水味。

我们在这样一个无风的夏末之夜在木材市场下车后步行下了旧城壕沟。八点钟时，旧城的钟声同往常一样响彻天空，惊起了满天鸽子。动人的钟声催人泪下地唱道：“你要一生忠诚老实，直至进入冰冷的坟墓。”但四处充满着欢笑。女人领着被太阳晒黑了的孩子们，身穿毛巾浴衣，手拿彩色气球和帆船，从电车上下来，一辆辆电车从格莱特考和霍伊布德运来了千百万个刚游完泳的人。微睁睡眼的年轻姑娘，伸出舌头，舔着覆盆子冰淇淋。一个十五岁的女孩，把冰淇淋掉在了地上。这个很快就要加入成年人行列再不能在大街上舔冰淇淋的姑娘放弃了重新去拾起冰淇淋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的想法，仍把它留在路上，让勇敢的路人的鞋底把这溶化了的冷饮踩踏。

我们在施奈德米尔巷口向左拐弯。党卫军属下的民军封锁了巷口的黑维利乌斯广场。他们之中有年轻小伙子，也有已是一家之主的男人，戴着臂章，拿着保安警察的枪一组组地站在那里。很容易躲过这道封锁线，只需多走一点路，从雷姆穿出去就能到达邮局。扬·布朗斯基却意图明确地朝那些民军走去。他的上司一定派了人从邮局大楼观察黑维利乌斯广场的动静。扬想让他们看他被人拦住，挡了回去，这样一来，他至少成了一个半截子英雄，只是被人挡住了去路，因此荣辱各半地搭乘载他来的五路电车回家了。但民军把我们放了过去，他们根本不会料到，那位服饰讲究领着一个三岁孩子的绅士，是去邮局大楼的。他们很客气地劝我们多加小心，直到当我们进了铁栏杆门，站在邮局大门前时，他们才大声叫喊：“站住！”扬动摇了，转过身去时，沉重的门已经开了一道缝，我们被人拽进了营业所内半明不暗、阴凉宜人、到处是柜台窗口的波兰邮局。

扬那些不信任他甚至对他不抱希望的同事并不亲切友好地同扬打招呼，还有人大声而坦率地说，他们早已在怀疑邮局秘书扬·布朗斯基要开小差。人家根本不听扬为自己的辩解。只是把他推到那排成一条长龙把沙袋一个个从地窖里传运到营业厅的窗户底下去的人们中间去。他们之所以把沙袋和其他废物堆在窗下，文件柜等沉重的家具也被推到大门旁边，为的是在紧要关头时迅速地堵上大门。

扬被人问到我是谁，却没等扬回答那人早已走开了。他们都神经兮兮，说起话来，一会儿很大声，一会儿又小心翼翼地压低了嗓门。我的鼓以及我的鼓之所急，看来已经被忘得一干二净了。我本来寄希望于请看房人科比埃拉帮帮忙，把我肚皮前面那堆废铁修理出个模样来，可是却没有看见他。也许他在邮局的二

楼或者三楼，同大厅里的邮递员和职员一样拚命地在码鼓鼓囊囊用来防弹的沙袋。我待在这里，使扬·布朗斯基感到难堪。所以，我乘扬听一个头戴波兰钢盔，被人称作米尚博士，显然就是邮局局长的男人向他发指示之际溜走了。我小心翼翼地绕过这位米尚先生，探头寻找，终于找到了上二楼的楼梯。在二楼走廊尽头我发现了一间中等大小，没有窗户，既没有拖弹药箱的男人也没有码沙袋的人的房间。

地板上放着可以滚动的放洗换衣服盛满了贴有各色邮票的信件篮子。这个房间低矮，糊墙纸呈赭色。一股淡淡的橡皮味在屋里飘荡着。一个没有灯罩的电灯泡亮着。我太疲倦了，没去找电灯开关。远处，圣马利亚教堂、圣卡塔琳娜教堂、圣约翰教堂、圣布里吉特教堂、圣巴巴拉教堂、三一教堂、圣体教堂的钟声在说：九点了，小奥斯卡，你该去睡了！听了这些，我便和同样精疲力竭的鼓一起躺到一个邮件篮里睡了过去。

波兰邮局

我睡在放满寄往罗兹、卢布林、利沃夫、托伦、克拉科夫和琴斯托霍瓦，或者来自罗兹、卢布林、利沃夫、托伦、克拉科夫和琴斯托霍瓦的信件的篮子里。但是我既没有梦见琴斯托霍瓦的圣母和黑圣母。也没有梦见自己在啃那颗保存在克拉科夫的马尔察莱克·毕尔苏德斯基的心，或者啃那种使托恩城扬名的姜饼，更没有梦见那面我一直未修理好的鼓。我躺在篮子里的信件上翻着身，但没有做梦。我没听见任何细微言语。听说，许多信被放在一堆，就能听得到它们说话。这些信件没对我讲一句话。我从未等待过邮件，也没有人把我看做收件人，或是寄件人。我躺在邮件堆的山上，收回了天线。这座山像全世界一样孕育着生命。有一条新闻即将脱胎而出。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不管怎么说，将我惊醒的不是信件，也不是住在华沙的某个名叫莱希·米勒夫茨克先生写给他住在但泽的席德利茨的侄女的信，这是一封足以把千年乌龟惊醒的告急信。唤醒我的不是近处的机枪声，就是远处自由港里那两艘战舰双炮塔的齐射声。机枪，双炮塔炮。能随随便便地落笔写下来吗？也许是一阵暴雨，冰雹，或类似我诞生时那种由远而近的夏末的暴风雨。我睡得太沉了，不可能作此类推测，并且，我是在响声还在耳中未消时，和所有沉睡的人们同时确切地认识到是他们打起来了。

我刚穿上凉鞋，从篮子里爬出来，还没有站稳，就马上担心起我那面经不起磕碰的鼓。我用双手在我睡觉的那个篮子里的虽然很松、但是很厚的信件中挖了一个洞。但我的动作很温柔，没有把信件撕坏、折断甚至毁掉，而是小心翼翼地把乱七八糟地叠在一起的信理齐，小心地拿起每一封多半贴着紫色的、有“波兰邮政”字样的邮票的信，拿起每一张明信片，还意识到通信秘密即使面临这无法改变而且会改变一切的事件也应被保障而没使信封开封。

随着枪声越来越猛烈，那只放满信件的篮子里的洞也越挖越大。最后我认为可以了，便把我那破烂不堪的鼓放进新筑的工事里，上面厚厚地盖上了足有十层至二十层像泥瓦匠砌坚固的墙时那样把砖头一块咬一块的码法的信封。我希望这种防护措施能保护我的鼓不受弹片和子弹的伤害。第一颗反坦克炮弹在邮局大楼临黑维利乌斯广场的正面几乎与营业大厅一般高的地方在我刚干完这些事就爆炸了。

波兰邮局的砖墙大楼特别坚实，挨几十发这样的炮弹是无关痛痒的，不必担心会很快被炸开一个大到完全可以让民军像往常练习的那样从正面冲进来的缺口。

我从那间没有窗户，周围是三间办公室和二楼过道的安全的信件存放室走出去找扬和残废的看房人科比埃拉而且怀着十分急

切的心情。昨天晚上，我没吃晚饭，为了修鼓，乘电车进城到黑维利乌斯广场，进了这个要不是为了修鼓，同我不相干的波兰邮局。所以，如果我不在肯定要发起的进攻之前及时找到这位看房人，我那面不成模样的鼓就永远无法修复了。

所以，我满脑子想着科比埃拉找扬。我双臂在胸前交叉，在地面铺砖的长过道里走了几个来回，但除了自己以外再也找不到一个人。我可以区分出那零星的子弹是从邮局射出去的，而连续射击的则是对方挥霍弹药的民军。这些节约的守卫者一定是在他们的办公室里把邮戳换成了另一种工具，却还像盖邮戳似的一下一下使用这种工具。走廊里除了没有武器和鼓，在凌晨时刻听着带来铅弹而不是口含黄金的创造历史的登坛的我在巡逻外，谁也没坐着、站着或躺着准备可能发起的反冲锋的人。

空无一人的邮局院子旁边的办公室使我认识到他们非常粗心大意。朝施奈德米尔巷这个方向是一定要有人防守的。那儿有一个警察分局，同邮局院子和装卸包裹的平台只隔一道木栅栏。这种有利的进攻阵地只会在连环画上找到。我挨个儿把挂号信件室，送汇票的邮递员的房间，工资科，电报接收室的门推开。他们十分节省弹药，隔很长时间才趴在钢板、沙袋以及横倒的家具后面放一枪。

很多办公室的窗玻璃已经被民军的机枪子弹弄破了。我瞥了一眼破碎的窗户，把它们同我在可以平静地深呼吸的和平时用钻石声音唱碎的玻璃做一下比较。此时我想如果那个矮小壮实的米尚博士来找我，不是以邮局局长而是以守卫邮局的军队指挥官的身份召募我入波兰军队服役要求我为保卫波兰邮局出一份力的话，我的声音便可以发挥它的威力。为了波兰和乱开花后结出硕果的波兰经济，我把对面朝黑维利乌斯广场的房子的，沿雷姆河的房子，施奈德米尔巷上整排的玻璃窗，也包括警察分局的，再同从前一样用远程效果把旧城沟和骑士巷上擦得十分亮的玻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璃，在几分钟之内都变成一个个通风的黑窟窿。这将使民军和旁观的市民特别混乱。这会让大家在战争一开始的时候就相信有许多架重机枪所产生的效果的奇迹武器。但还是无法拯救波兰邮局。

那个脑袋上戴着波兰钢盔的米尚博士并没有征我入伍，当我匆匆下了楼梯闯进营业厅时，不幸绊到了他的腿上，他被他扇了火辣辣的一记耳光，然后大声用波兰话咒骂着，忙他的保卫工作去了。因此我没有为他卖力。所有的人都很激动，害怕，尤其是责任在身的米尚博士，情有可原所以我把他一记耳光忍下了。

我看到营业厅里的时钟显示的是四点二十分。时钟走到四点二十一分时，我才肯定，最初的战斗并没有损坏时钟的机件。时间随着钟的走动而消逝，我不知这预示着什么。

我躲着开米尚博士寻找扬和看房人科比埃拉，但没找到。我注意到营业厅里玻璃的损坏情况以及大门两旁墙上灰泥的裂缝和丑陋的窟窿，还看着他们把最先受伤的两个人抬走了。一个是位年纪较大的先生，灰白头发，细心梳理的分头一点没乱。一颗子弹把他的上臂擦伤了，别人替他包扎伤口时，他不断神情激动地说话。人家刚用白纱布包扎好他的较轻的伤口，他就想跳起来抓他的枪，再次趴到那些显然不能防弹的沙袋后面去。好在因为失血引起的一阵轻微眩晕迫使他又摔倒在地并且安静下来。这时，那个头戴钢盔、便服前胸小口袋露出骑士手绢一角的矮小壮实、五十来岁，昨晚详细盘问过扬·布朗斯基名叫米尚的博士先生的局长，用文官骑士的高雅手势，让这位受伤的老人接受以波兰的名义保持安静的命令。第二个受伤的人呼吸困难地躺在一个干草袋上，他没有提出回到沙袋后面去的要求。他由于腹部中了子弹，便不怕难为情地每隔一段时间大叫一声。

我正要再次从伏在沙袋后面那排人中检查一下扬和科比埃拉的时候，两发炮弹几乎同时在大门上方和旁边炸开了，震响了营

业厅。震开了他们挪到大门口的柜子，一捆捆的单据掉了出来，散了捆，满天飞，随后又飘下来，滑到地上，铺满了方砖地。这不是单据的用途。显然，剩余的窗玻璃都碎了，大块小块的灰泥从墙上、天花板上落下来。他们根据戴钢盔的米尚博士的命令把从石灰烟雾里拖到大厅中央的第三个伤员抬到二楼。

这个受伤的邮局职员每上一级楼梯，就痛苦地呻吟一声。我跟在他和抬他的男人后面。没有人喊我回来，没有人问我为什么跟上去，也没有人像米尚方才那样扇他耳光。因为我十分小心，不去绊这些邮局保卫者的腿。

当我跟在那些缓缓爬上楼梯的男人后面，到了二楼后。发现我的猜测是对的。他们把伤员抬进了我待过的那间没有窗户因而很安全的信件存放室。他们也觉得，在没有床垫的情况下，放信件的篮子虽然很短，但对于伤员来说还算是个比较软和的地方。我后悔把自己的鼓埋在放满没法寄出的信件、可以滚动的篮子里。这些皮开肉绽、穿了窟窿的邮递员和营业员的鲜血可能会透过十至二十层邮件，把我那面至今只用油漆染色的鼓染红，我的鼓同波兰人的血没有一点儿干系。让他们用自己的血去染红他们的单据和活页纸吧！让他们把墨水瓶里的蓝墨水倒出来，随后灌上红的血吧！让他们把自己的手绢和上浆的白衬衫染成红白两色各占一半的波兰国旗吧！现在是事关波兰而与我的鼓无关。假如他们坚持认为，即使波兰沦陷了，也要让她保持红白两种颜色的话，那我的鼓也没有必要非染鲜血使他有波兰味再一道丧失。

我渐渐固定了自己他们所关心的根本不是波兰，而是我的不成形状的鼓的想法。扬把我引诱到邮局里来，是为了给职工们带来报警的烽火，而波兰不足以成为召集他们的信号。夜间，当我没做梦地睡在可以滚动但没滚动的信件篮里时，那些醒着的波兰人窃窃私语传着一面伤痕累累的儿童玩具鼓到我们这里来避难了的口令。我们都是波兰人。英国和法国已经跟我们签订了一项保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证条约。我们必须保护它。

正当我的行动自由被我在信件存放室半掩的门前作的这些无谓的抽象思考而限制了时，机枪声第一次在波兰院子里响起。在我意料之中，民军从施奈德米尔巷的警察分局出动，发起了首次进攻。我们大家立刻乱作一团。停邮政汽车的装卸台上方包裹室的门被民军炸得粉碎。他们紧接着进入包裹室和包裹接收室，通往营业厅的大门被他们打开了。

其余的人跟在把伤员抬上楼、放进我埋藏鼓的信件篮里的男人们后面，全都冲了出去，我根据声响判断出他们在底层的过道里战斗，后打到了包裹接收室。民军只得被迫撤退。

我犹豫着有目的地走进信件存放室。那个伤员脸呈黄绿色，露出了牙齿，眼珠在闭上的眼皮底下转动。嘴里还挂着血丝。他的头垂在信件篮子边上，所以信件应该没有被血浸透的危险。奥斯卡只有踮起脚尖才能够到篮子里面。那个男人的屁股正好压在我埋鼓的地方。奥斯卡先是尽量避免碰到那个男人和撕坏信件，然后连撕带扯地使劲从那个呻吟着的男人身子底下拉出几十封信来。

其实那时我已经摸着鼓的边沿了。但这时，那些男人又冲上楼梯，沿着过道走了过来。他们把民军赶出了包裹室，成了最初的胜利者。我听到他们回来后在笑。

我在门旁边一个信件篮子后隐藏着，直至他们到了那个伤员身边。他们开始大声说话，做着手势，然后又低声咒骂着给那个伤员包扎。

两颗反坦克炮弹相继在营业厅上方爆炸后又沉寂下来。自由港韦斯特普拉特对面的两艘战列舰很有规律地用人们已经习惯了的好脾气的人在嘟哝般地。

我躲开那个伤员身边的男人们，溜出了信件存放室。我没有管我的鼓，去找我的假想的父亲扬和表舅以及看房人科比埃拉。

三层楼是已经及时地把家属送到了布朗堡或华沙的邮局秘书长纳恰尔尼克的宿舍。我到靠邮局院子一边的几间贮存室去找了一通后在纳恰尔尼克宿舍的儿童室里找到了扬和科比埃拉。

这是一间糊着的看了让人高兴的颜色墙纸被流弹毁坏了好几处的明亮而宜人的房间。有两扇和平时期可以满怀乐趣地临窗眺望黑维利乌斯广场的窗户，一具完好的摇木马，各种皮球，一座骑士城堡以及许多翻倒的铅小兵，有骑兵，也有步兵，一只打开的纸箱，内装许多小铁轨和小火车，许多程序不一的破烂玩偶，玩偶的小屋，屋里乱七八糟，总之，从这一大堆玩具可以看出，邮局秘书长纳恰尔尼克有两个娇生惯养的孩子，而且准是一个男孩，一个女孩。走运的是，他们已被疏散到华沙去了，不会再来找我的麻烦，这种遭遇我在布朗斯基兄妹那儿是体会最深刻的。邮局秘书长的男孩子一定很伤心地同他这个布满铅士兵的儿童乐园告别。我想到这里，很有点幸灾乐祸。可能那孩子为了日后在保卫莫德林要塞的战斗中，用它们来增援波兰骑兵。把几个长枪骑兵塞进了裤兜里。

虽然我已经讲了很多有关铅士兵的事，但我还要说。那里的一个架上，放着玩具、图画书和游戏用具。架子的最高一层上放着小型乐器。一支蜂蜜黄的小号，静静地躺在一套小钟边上，这套小钟随着炮弹爆炸投入战斗而丁当作响。右边外侧是一架色彩鲜艳，风箱打开着的手风琴。做父母的一定是操之过急，送给了他们的后代一把尺寸小一点，但同真的差不多，也是四根弦的小提琴。小提琴旁边，有一件白色，完好无损，周围挡着一些积木以防它滚下来的圆的红白漆的铁皮鼓。

我因为如侏儒般的身体从未想过自己从架子上取下鼓，所以要请成年人帮忙。

扬·布朗斯基和科比埃拉趴在左边那扇窗下码到落地长窗三分之一的高度的沙袋后面。右边窗下是科比埃拉。我立刻明白，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这位看房人现在没有工会去把我那面压在伤员身子底下、肯定越压越扁的鼓取出来修理。由于科比埃拉正忙着每过一会儿就从沙袋墙中留出的孔眼里朝黑维利乌斯广场那头施奈德米尔巷拐角处拉道纳桥前面不远，刚架上的一门反坦克炮开枪射击。

我从满是灰膏和沙土的那身时髦的深灰色衣服上认出了缩成一团不见脑袋趴在那儿不停抖动的扬。他的皮鞋也是灰色的，右脚的鞋带松了。我蹲下来，给他系鞋带时，扬抽搐了一下，他那双过分蓝的水汪汪的眼睛从左衣袖上露出来，盯着我，我略略看了一眼，断定他没有受伤，但他却因心里害怕在无声地啜泣。我假装没看见他在哭，用手指着纳恰尔尼克已疏散的儿子的铁皮鼓，用明显的手势要求扬倍加小心地去到架子前，利用儿童室的死角，把鼓给我取下来。他不明白我的意思，不理解我他心里只顾得上害怕，因此，我打手势求他帮助，只能增添他害怕的心理。我如果不是担心被看来只听着自己枪声的科比埃拉发现的话一定向着他大声喊叫。

所以，我把我沉着冷静的心情传给趴在沙袋后面右边紧挨着我的不幸的扬。不一会儿，我觉得他镇静了许多。我的均匀的呼吸使他的脉搏也差不多均匀了。我又一次让扬注意纳恰尔尼克的儿子的铁皮鼓。我缓缓地、温柔地转动他的脑袋，并对准了放玩具的架子。可是，扬由于我的操之过急还是没明白我的意思。恐惧从脚心钻到头顶，又回到脚心，可能被鞋垫和鞋底挡住了。恐惧想要发泄出来，便又反弹回去，经过肝、脾、胃，霸占了他那可怜的脑袋，挤得他那对以前我从未见过的蓝眼珠快要进了出来，眼白上显出了错综的微血管。

我做了一些努力，才把表舅的眼珠缩回去，使他的心跳略为均匀一些。我依美学要求所作的这些努力又泡汤了。民军第一次使用野战榴弹炮，用望远镜瞄准，企图把邮局大楼前的铁栅栏轰平。他们把砖柱挨根轰倒，使铁栅栏连根拔了出来。射击的准确

度，说明他们平日的训练达到极高的水平令人赞叹。砖柱有十五到二十根，每轰倒一根，我可怜的表舅扬的心灵也就受到一次打击，好像炸毁的除了柱基外还有他所熟悉的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柱基上虚构的神像。

只有这种假设，能解释榴弹炮每击中一根墙柱，扬就要有意识、有目的地发出像我那种毁玻璃的叫声一般可能也具有割玻璃的钻石的功效的尖叫声的原因。扬热情地无目的的叫喊着，最后只是让残废的、皮包骨的看房人科比埃拉的身子撂倒在我们身边，抬起了瘦削的、没睫毛的鸟脑袋，水汪汪的灰色的眼珠对着我们这一对难友滴溜溜地转动。他摇晃只顾自己呜咽的扬的身子。他把扬的衬衫撩起，快速地检查他身上有无伤口他找不到任何伤痕，又把扬仰面朝天翻过身来，捏摇得扬的下颚格格直响，硬让扬的蓝眼睛盯着科比埃拉水汪汪的灰眼睛，用波兰话骂他，用唾沫啐他的脸，最后把扬一直放在射击孔里，一枪都没有放过，甚至连保险机都还没有打开的枪扔给他。枪托正好打中他的左膝盖骨上。扬在尝遍了心灵的痛苦之后，第一次尝到了肉体痛苦的滋味，看来他好像因为抓住了枪而感到愉快。但是，即使他因枪的金属部分把冰冷的感觉从手指传到血液里而害怕，他还是得爬向自己那个射击孔，因为有科比埃拉连劝带骂的鼓励。

扬无法鼓起勇气来是因为脑里充满女人气幻想的他对战争的看法实现得没有一点儿想像力。他既不在射击孔瞧一眼归他控制的射击面，也不搜寻一个值得射击的目标去瞄准，只是斜架着枪，枪口则朝着黑维利乌斯广场另一面房子的屋顶上方，自己的身子离枪很远，迅速而盲目地打空了弹仓，于是，空出了两手，马上又爬回到沙袋后面去。扬就像一个没有完成作业的小学生，羞恼地承认自己的错误般地在藏身处向科比埃拉投去请求宽恕的目光。科比埃拉多次把牙齿咬得格格响，随后朗声大笑，就像不想再停止这笑声似的，但又嘎然而止了，把人吓了一跳，并往他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的上司邮局秘书扬的胫骨上一连踢了三四脚，科比埃拉又把他那只穿着烂鞋子的脚抽回去，刚要向扬的肋骨上踢去时，一阵机枪子弹打碎了儿童室上方剩下的玻璃，弄得天花板烟尘滚滚。他赶忙把那只整形鞋踩到地上，马上扑到他的枪后面，气愤地连续快速射击，好像他要把被扬耽误了的时间补救回来。无论如何他射出的子弹在二战弹药消耗量中也能占一个小小的份额。

以往总是一本正经得如那些总要求别人尊重并保持一定距离的伪兵般难以接近的科比埃拉并没有发现我。现在却让我留在这间通风的、充满铅弹味的小房间里。科比埃拉也许认为这是一间儿童室，所以我可以留在这里并在战斗间歇时做些游戏。

我在沙袋后面躺在扬和左墙之间有多长时间，我也不知道。科比埃拉在他的枪后面趴着，一个人替两个人射击。大约十点左右，枪声渐渐平息。静静得能够让我听到苍蝇的嗡嗡声，听到从黑维利乌斯广场那一边传来的人声和口令，港湾里那两艘战列舰也偶尔把低沉的隆隆声传到我耳朵里来。这是一个晴转多云的秋日，太阳把一切都抹上了一层金黄色，空气稀薄、敏感，但传声很差。我再过几天就十五周岁了。我盼着像每年九月那样，得到一面铁皮鼓。我不要任何珍宝，只是一门心思地想要一面最不值钱的白红漆的铁皮鼓。

扬躺着不动。我一听科比埃拉均匀地深呼吸，就知道他睡着了。他利用这个短暂的战斗间歇打一个盹儿，英雄也是人，也总要抓时间打个盹儿恢复体力的。只有我一人醒着，一心想着铁皮鼓，像我那样的年岁，就是那么死心眼儿。越来越静了，只有一只苍蝇在酷暑下累得有气无力的嗡嗡叫。我不是现在才想起小纳恰尔尼克的铁皮鼓的。我在交火时，在周围一片枪炮声中，也一直眼睁睁地盯着它。只是现在才遇到不能错过的大好时机。

我动作很轻地站起来，缓缓绕过玻璃碎片，目标明确地走向放玩具的木架子。我觉得用一把儿童椅子，摆上积木匣，搭一个

台阶，不但稳当而且够高，我马上可以占有这面闪闪发光的崭新的铁皮鼓了。这时，科比埃拉喊住了我，之后无情地一把抓住了我。我努力指着近在眼前的铁皮鼓。我却被科比埃拉拽了回去。我向铁皮鼓伸出两条胳膊。这个残废人犹豫着，刚要把手伸得高高的，而我就要成为幸运儿的关键时刻，一阵机枪射进儿童室，反坦克炮弹在大门前开了花。科比埃拉把我推到扬躺的那个角落里，我的眼睛却还一直盯着那面铁皮鼓，而这时他已伏倒在枪后发射第二次装的子弹了。

当这个畸足、眼睛水汪汪、没有睫毛的鸟脑袋把我从快达到的目标前拽回来，又推到沙袋后那个角落里躺着时，我的有一对可爱的蓝眼睛的表舅扬·布朗斯基却连头都没抬。我并没有哭，只是越来越生气了。肥的、蓝白色的没有眼睛的蛆正在繁殖，并寻找着一具可口的尸体。波兰人和波兰都与我没有一点干系。让他们自己的骑兵上马吧！他们吻贵夫人的手，待他们发现时，已经太晚了，原来他们吻的并非贵夫人憔悴的手指，而是野战榴弹炮未抹口红的炮口。这时，克虏伯生的童贞女开始咂着嘴，拙劣而又真实地模仿枪炮声发泄自己的感情，就像她在每周新闻片上所听到的，又往邮局大门扔内装不能吃的糖果的彩色爆竹，想要打开一个缺口并穿过打破缺口的营业厅，啃掉一块楼梯，这样任何人都不能上去或下来了。随后在机枪的掩护下，来了她的扈从，还有的乘着时髦的装甲侦察车，车身上油漆着漂亮的名字：“厄斯特马克”和“苏台德”。它们永不满足开起来发出嘎嘎的声响，披着装甲，侦察着在邮局前徘徊。这是两位热心于文化的年轻太太，她们要参观一座大门未开的宫殿。这两位什么地方都要进去看看娇宠惯了的美人儿，可不高兴了，便把自己的铅灰色的、咄咄逼人的、同一口径的使宫殿的主人觉得这些房间发热、发冷、变窄的目光，射进宫殿的任何一个可见到的房间里去。

当一辆叫作“厄斯特马克”的装甲侦察车再次从骑士巷向邮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局驶来时，一直像死人一样的我的表舅扬，希望侦察车能够发现他的这条抬到射击孔后的右腿，向它射击；或者被某颗流弹擦伤小腿肚或脚跟，这样一来，他就可以夸张地一瘸一拐地撤下火线去。

扬·布朗斯基必须隔一会儿就把腿放下来。因为这样的姿势要坚持下去是非常费劲的。于是，他翻过身，仰面朝天使他有足够的力量用双手支撑着窝，让腿肚子和脚跟悬在射击孔后面，增大流弹或瞄准着射来的子弹射中它的可能性。

我一直十分了解扬的心理。所以我很理解，当科比埃拉见到他的上司、邮局秘书布朗斯基竟摆出这么一副可鄙而绝望的姿势，而且特别愤怒。这位看房人一跃而起，一纵身就到了我们身边，到了我们头顶上，扑过来，把扬连衣服带人举起来后扔下去，又抓住他，把衣服撕破了，并双手交替地揍开了，两手握成一个大拳，向我的表舅扬·布朗斯基狠命地捶下来。这时，也许是天使礼拜上帝时展动翅膀而发出的一声巨响，唱了一声，就像无线电里的以太声，这时，被击中的不是布朗斯基，而是科比埃拉；这时，炮弹开了一个大玩笑，砖头笑得裂开了，碎片化为尘土，灰膏变成粉末，木头找到了斧子，这间滑稽的儿童室用一条腿在蹦，克特-克鲁泽设计的玩偶破裂了，摇木马特别想驮一个骑士并把它甩下来从一头滑到另一头，积木匣里一片混乱，波兰枪骑兵同时占领了儿童室的四个角落，最后，放玩具的木架子终于倒下来了，那套小钟敲响了复活节的钟声，手风琴放声大叫，小号像是吹出了音乐，总之，所有的东西像是一个正在排练的乐队，发出叫喊声、爆炸声、嘶鸣声、撞碎声、劈啪声、钟声、嘎嘎声、吱吱声、啾啾声，尖声在高空漂浮，低音沉到了地板下面。我就像一个三岁小孩应有的样子，在炮弹击中的时刻紧靠窗户，待在儿童室里安全的地方。此刻，那面新的铁皮鼓只是蹭掉了几块漆，没有窟窿地掉在我面前。

当我把注意力从鼓上移开时，我意识到应帮扬把压在他身上的科比埃拉的沉重的躯体挪开。我本以为扬也被击中了，因为他的呜咽声非常自然。后来，当我们把同样很自然地呻吟着的科比埃拉滚到一边去后，我才明白扬身上的伤微不足道。只是玻璃碎片划破了他的右颊和一只手的手背。我经过迅速的比较认为科比埃拉裤子上大腿那一段染上的暗红的血浆不如扬的血鲜红。

我不明白是谁把扬那件雅致的灰上装撕碎并弄乱的。究竟是科比埃拉，还是炮弹呢？总之是肩头撕破了，衬料露了出来，扣子丢了，针脚裂开，口袋也翻出来了。可怜的扬在我的帮助下把科比埃拉拖出儿童室之前，先忙着拣从他口袋里经过这场暴风雨掉出来的东西。他再次找到了自己的梳子，他的包括我妈妈的半身照的情妇们的照片和还没有打开过的钱包。他一个人在那里拣撒了满屋子的施卡特牌，这对于他来说费劲而且危险，因为掩护用的沙袋有一部分已经被轰掉了。他要把那三十二张牌找齐。但没有找到第三十二张，便露出不幸的样子。我把那张黑桃七在乱七八糟的玩偶小屋间找到后递给他，他微笑了。

我们把科比埃拉拉出儿童室，到了过道上时，才有气无力操心地问了几句扬·布朗斯基能听懂的话：“缺什么东西了吗？”扬把手伸进这老人的裤子里两腿之间满满地捏了一把，后向科比埃拉点了一下头。

科比埃拉的骄傲没丢掉，扬·布朗斯基重新找到了包括黑桃七的三十二张牌，我则得到了一面新的铁皮鼓。每走一步，鼓便撞一下我的膝盖我们都很幸运。扬和一个扬喊作维克托的人，搀扶失血而虚弱的科比埃拉下到二层楼的信件存放室。

空中楼阁

我们在维克托、韦卢恩的帮助下才将失血过多体重却不减少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的科比埃拉架走。高度近视的维克托因为戴着眼镜，在楼梯间里才没有绊在石梯上摔跤。维克托的职业是送汇票的邮递员。真叫人难以置信。一个近视眼竟能干这种差事。今天，我要把维克托叫做可怜的维克托。我的妈妈由于全家去港口防浪堤郊游，变成了我的可怜的妈妈。送汇票的维克托也因为丢了眼镜而成了没有眼镜的可怜的维克托。

每逢探望日，我都会向我的朋友维特拉询问“你后来见到过可怜的维克托吗？”。可是，在我们乘有轨电车从弗林格恩去格雷希海姆之后，我们便失去了维克托·韦卢恩。只是可以寄希望于跟踪他的密探白找了一场，却又找到了自己的眼镜或者一副符合他的度数的眼镜。他可能还在波兰邮局，或联邦德国的邮局里当邮递员，戴着近视眼镜送汇票，把花花绿绿的钞票和硬币送上门，给人们带去幸福。

“那简直吓死人！”在左边扶着科比埃拉的扬喘着粗气说。

“要是没有英国人和法国人，结局肯定不会这样！”在右边扶着看房人的维克托忧郁地说。

“里茨－斯密格莱昨天还在电台上说他们会来的！他保证：要是打起来，整个法国就会团结得像一个人似的挺身而出！”扬努力保持住自己的信心把这句话讲完，他因见到了自己被划破的手背上淌出来的鲜血而发愁，虽然这没有使他怀疑法波保证条约的可靠性，他也许会因失血过多在整个法国如一个人挺身而出信守诺言下的保证，跨过西壁之前就死了。

维克托如他以往充满力量和效果的说：“他们肯定已经踏上征途了。英国舰队已经在横渡波罗的海了！”他在楼梯上站住了，右手因扶着受伤的看房人而动弹不得，左手却在空中像在舞台上似的挥动，仿佛在说：“来吧，骄傲的不列颠人！”

他们在把科比埃拉往临时医院送去的路上反复权衡着波兰、英国及法国间的关系。这时，我却想起了格蕾欣·舍夫勒那本书

里的相关内容。凯泽的《但泽城历史》中说：“在一八七〇年至一八七一年德法战争期间，四艘法国战舰于一八七〇年八月二十一日下午驶入但泽湾，游弋在碇泊场，船上的大炮对准了港口和城市，夜里，停泊在海湾的法国舰队在德国船长魏克曼指挥的螺旋桨推进的克维尔特轻巡航舰‘宁芙’号迫使下撤退。”

我在我们即将到达二楼信件存放室前几经思考得出了日后得到了证实的看法：英国本土舰队在波兰邮局和整个波兰遭到攻击的时候，在北苏格兰某处港湾内隐蔽；在吃午饭的庞大的法国陆军派出几支小部队到马奇诺防线附近搞点侦察活动作为履行了法波保证条约。我们在信件存放室兼临时医院门口，被头戴钢盔，骑士小手帕插在脑袋里露出一个三角的米尚博士截住了。他身边站着—个叫康拉德的从华沙来的特派员。扬·布朗斯基开始作祟的恐惧心理让他装成身负重伤的样子。戴着眼镜的维克托·韦卢恩没有受伤，可以作为一名派得上用场的射手，并被派到楼下营业厅去。我们被命令留在这间没有窗户的房间里，由于但泽市电力厂已拒绝再给波兰邮局供电点亮应急用的蜡烛。米尚博士并不相信扬真正受了重伤，可是又知道保卫邮局并不是非靠不能打仗的他不可，便命令他当护士，照顾伤员和我，我感到他匆忙而又绝望地抚摩了一下我的头，反复嘱托扬照顾好可怜的我不要卷入战争。

击中营业厅大门上方的野战榴弹炮使我们全摇晃起来。戴钢盔的米尚、华沙来的特派员康拉德以及送汇票的韦卢恩飞奔到楼下他们的战斗岗位上去了。扬和我走进那间密室似的、可以减弱枪炮声里面已经躺着七八个伤员的屋子。外面正在大耍威风的榴弹炮，把屋里的烛火震得闪烁不定。尽管伤员在呻吟，屋内也是一片寂静。扬匆忙而又笨拙地用从床单上撕下的布条把科比埃拉的大腿包扎好，接着要给自己护理。但他面颊和手背上已经止住血了。划破的伤口已经硬结，只是有点痛，这更让扬感到害怕，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但在这间低矮而不通风的屋里又无处发泄。他胡乱地摸着自己的口袋，发现了一副完整的纸牌，然后鼓动大家玩施卡特一直到战争结束。

洗，签，分，出那三十二张牌。由于所有盛信件的篮子都被伤员占了，科比埃拉只好背靠一只篮子坐下。因为他经常要把身子倒下，我们只能用另一个伤员的背带把他绑住固定为一个姿势，还不能让他把手里的牌掉下来，因为我们需要他。施卡特必须三个人玩，三缺一我们就进行不下去了。躺在篮子里的那些人，已经很难分清红色与黑色，他们不会再想玩施卡特。本来连要躺下去让一切听其自然的科比埃拉也不想再玩施卡特了。他闭上眼睛，懒得动手，只想看邮局大楼最后被拆毁。但是我们对他的这种宿命论的态度表示反对，便把他紧紧捆住，强迫他加入。没人对小矮个的我也会玩施卡特而感到惊讶。

扬听到我第一次用我的声音讲成年人的语言并说“十八点！”后，把眼睛从牌上抬起，向我投来短暂而奇怪的蓝色目光，随后点头表示“要”。我接着叫：“二十点呢？”扬干脆地说：“还要。”我又说：“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点？”扬摇头惋惜道：“不要。”被背带捆着的科比埃拉仍要倒下身子。但我们又把他拉了起来，等到我们的牌室外面较远处一颗炮弹击中时发出的噪声过去后，扬在接下来的沉寂中静静地问：“科比埃拉，你听到这孩子叫二十四点了吗？”“不要。”科比埃拉说。他的嘴唇已经干得发不出声音来。这是我们根据他的嘴唇的蠕动判断出来的。

我不知道他是突然从哪处深渊里冒出来的。想必他是用螺旋式绞车把眼皮吊了起来。最后，他的湿乎乎的眼睛迷糊地瞧着那十张扬明明没有搞任何偷看之类的鬼把戏周到地塞在他手里的牌。

我打一盘梅花主牌。扬叫了“加倍”。扬向科比埃拉大声招唤要出牌了，微微捅了一下他的肋骨，好使他抖擞精神，跟着出

牌。我牺牲了梅花 K，先把他们手上的王牌引出来，让扬用黑桃 J 吃掉。扬的方块十，因为我方块缺门被我用王牌吃掉。我用红心 J 吊出扬的十，科比埃拉垫掉方块九。我成竹在胸必胜地甩出一手红心顺子。我计算：总共四十八点，合十二芬尼！下一盘，比较紧张。我冒险打缺两张王牌的无主。科比埃拉手里捏着两张 J，但他只叫到三十三点。我的方块 J 被他用梅花 J 吃掉了后，他的精神也就上来了。他出方块 A，我也出了一张方块，扬出了一张十给添分，科比埃拉得手。他又出 K，我没有吃，垫了一张梅花八，被扬吃掉，他打出一张黑桃十，我出了一张比它大的牌，科比埃拉打出了黑桃 J，吃了，我忘了这张以为在扬手上，实际却被科比埃拉捏在手里的牌。他当然还出黑桃，我垫牌，扬又添分。他们后来出红心时我才得手，但已经来不及了。我数来数去只有五十二点。输了一百二十点，合三十芬尼。扬借我两个盾的零钱。赢了牌的科比埃拉在我数钱时又倒下了，他不再让人给他钱，甚至那一刹他一直辛勤清扫的楼梯间头一次被反坦克炮弹击中的爆炸声也没使他有什么反应。

这时扬又因为摇晃的信件存放室的门和乱倒伏的烛火而害怕起来。楼梯间里又较为平静了，接下来的一发反坦克炮弹只是在远处邮局正面的墙上爆炸，可扬还是在洗牌时像发了疯一样发错了两次牌，但我什么话也没说。扬在他们射击时是听不见别人说话的。他紧张得把牌发错了，甚至忘了把最后的两张牌合上，始终用他那两只小巧、灵敏、肥厚的耳朵中的一只关注着外面的动静，我们却不耐烦地等着他叫牌、出牌。科比埃拉聚精会神地玩游卡特，扬却越发心不在焉，虽说随时随地要捅一下科比埃拉的肋骨，防止他的身子倒下。他的情况特别糟，但是牌玩得十分好。每逢他赢了自己打的那一盘，让叫了“加倍”的扬倒霉，或把我们打的无主破坏以后，他总要倒下身子。他仅仅是为打牌而打牌对输赢已经毫无兴趣可言。当我们打完一盘算分数的时候，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他那被我们用借来的背带捆住的身子便歪向一侧，只有从可怕地活动的喉结上能看出他还在喘气。

围攻和保卫邮局的战斗以及由此而起的喧哗和震动，并没有使我的神经过分紧张，我同样费大力气去玩三人施卡特。使我疲乏的倒是由于我突然第一次暂时性地把自已的伪装全部撕下。截止到那一天，我只是在贝布拉师傅和他那位梦游夫人罗丝维塔面前露出过本相，如今，我在我的表舅和假想的父亲扬、一个残废的看房人科比埃拉以及那些今后肯定不会出来当证人的伤员面前恢复本来面貌，让他们见到一个与我的出身证记载相符的十五岁的未成年人在那里有点莽撞，但手法还算熟练地玩施卡特牌。我矮小的身体使我的不再刻意的伪装感到非常吃力，我的四肢和头在玩了将近一个小时牌后均剧烈疼痛起来。

我想不玩了，但不能。我满可以在一发炮弹击中，楼房摇晃，紧接着打来的炮弹还没到时溜走。但一种从未有过的责任感使坚持用惟一有效的手段——玩施卡特牌来对抗扬心中的恐惧。

于是我们不让科比埃拉死掉，继续玩牌。我费尽心机不让牌局停下来，所以他没机会死。当炮弹在楼梯间里爆炸，蜡烛全部倒下，烛火全部熄灭时，立刻想到下一步该怎么办的那一个人就是我。我从扬的口袋里掏出了火柴，和扬的金色过滤嘴香烟。我把光明重新带到这个世界上，给扬点上一支让他镇静的雷加塔牌香烟，在科比埃拉还没来得及利用这一片黑暗的时机离开人世时，我就已经在黑暗中把蜡烛挨个点亮了。

我把两支蜡烛粘在新鼓上，把香烟放在身边，过一段时间就递给扬一支，也让科比埃拉歪了的嘴上叼上一支，但自己并不抽。牌局因情况的好转也活跃起来，香烟起了安慰和镇静作用，可是扬还是一盘接一盘地输掉。扬在出汗，而且像他专心干某件事情时那样，舔着他的上嘴唇。他聚精会神地打牌，玩得很起劲，竟把我叫做阿尔弗雷德或马策拉特，把科比埃拉当成是陪他

打牌的我的可怜的妈妈。当有人在过道里喊“康拉德被打死了！”时，扬责备的目光好像在对我说：“阿尔弗雷德，我求你把收音机关了吧！连自己的说话声音都听不清了！”

可怜的扬在已经死了的康拉德直挺挺地被他们拖进信件存放室时，真的大发雷霆了。

他抗议道。“关门，有风！”带进的风弄得烛火摇摇摆摆，差点儿灭了。直到他们把康拉德砰地扔在角落里，转身出去，带上了身后的门之后，烛火才平静下来。我们三人在由下往上照着的烛光的映衬下一定如模样奇特的万能的魔术师一样滑稽。

科比埃拉要打缺两张王的红心，他用嗽喉咙似的咯咯声叫牌：二十七点，三十点，猛地翻白眼，右肩膀里像有什么东西要钻出来，发疯似地抽搐跳动着，最后平静了下来。可是，科比埃拉却因此而往前扑倒，并使得同他的身子捆在一起的篮子和里面的信件以及那个没了背带的死人也一齐倒下来。刹那间扬用尽全力把科比埃拉和篮子扶住了。想溜之大吉的科比埃拉被抓回来后，他的喉咙里终于挤出一声“红心”，接着从扬的牙缝里挤出一声“加倍”，科比埃拉又硬挤出一声“再加倍”。这时我明白了，波兰邮局的保卫战胜利了，尽管那些进攻者在战争的过程中占领了阿拉斯加和西藏以及复活节岛和耶路撒冷，但他们还是输在了发动战争之初。

扬手里捏着四张王牌，稳打一盘无主一百二十点，若打赢还能加四十八点，但是却没能把这盘牌打完这是惟一的遗憾。扬先把梅花顺子打了出来。这时，他叫我阿格内斯，把科比埃拉看成了他的情敌马策拉特。随后，他虚晃一枪，出了一张方块J接着打出红心J扬不耐烦地等到那个实际上是残废的看房人科比埃拉的马策拉特很久以后，垫了牌；但在扬把红心A啪的一声甩到地板上后，因为他只是有一双蓝眼睛，身上散发着科隆香水味的孩子，永远什么也不理解，也不懂得，为什么突然间科比埃拉把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手里的牌全都扔了下来，翻倒了篮子、篮子里的信和信上躺着的死人。先滚下来的是那个死人，然后是那一篮子信件，最后倾倒的是空空的篮子。信件似潮水般地向我们涌来，仿佛现在我们是应该把施卡特牌挪到一边而去读使徒书或者收集邮票的收信人。但是，从小集邮、收藏过多的扬既不愿读使徒书，也不想收集邮票，现在他只想打牌，打成他的无主。扬想赢牌，获胜。于是他把科比埃拉扶起来，让篮子轮子着地，让那两个人躺在地上不管，也不把信件拣回去加重篮子的力量。他只是惊讶地看着科比埃拉。科比埃拉一副心神不定、坐不住的挂在分量很轻、摇摇晃晃的篮子上，又慢慢地倒下来。终于扬冲着他嚷起来：“阿尔弗雷德，我求求你听我说，别捣乱打下去，就这一盘了，打完我们就回家！”

我因为四肢和脑袋越来越痛而疲惫地站起身来。我咬牙忍着，把那只坚强的、鼓手的小手搭在扬·布朗斯基的肩上，努力使自己说出了下面声音虽小，却能打动人心的话：“爸爸，让他去吧，他死了，不能再玩牌了。你要是愿意，我们来玩六十六点吧！”

扬一听到我叫他爸爸，立刻把那看房人灵魂已经出窍的躯壳松开了，用他蓝蓝的、像洪水泛滥似的眼睛盯着我，大声哭喊着：“不不不不不……”我抚摩他，但无济于事。我意味深长地亲吻他，他却一心念着没有打完的无主。

他把我当成了我可怜的妈妈，诉说着：“阿格内斯，我本来会赢的。我一定会赢了这一盘回家的。”而他的儿子我则干脆扮起了这个角色，对他的话表示同意，指天誓日地说实际上他已经赢了，他只稍听他的阿格内斯的话坚信这一点。但是，扬不信我和我的妈妈。他先是大声哭诉，接着小声地不成调地哼哼起来，把施卡特牌从科比埃拉冰山似的躯体下面掏出来，然后又在自己的两腿间寻找，使一些信件像雪崩似的滚落。他在把三十二张牌

找齐之前一刻也没停。他一张张擦掉牌上从科比埃拉裤子里渗出来的黏糊糊的血浆后，便开始洗牌，还想发牌，他的脑门形状十分好，额头皮肤太滑，不太容易渗透的头脑终于想通，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第三个人陪他玩施卡特了。

外面和信件存放室静了足有一分钟，来为这最后一位施卡特牌友和“第三个人”默哀。我觉察到门轻轻地被打开了。我抬头望去，期待着出现超凡的现象，但却是维克托·韦卢恩，没了眼镜，瞎乎乎地眯缝着眼的脸。“扬。你还在吗？我眼镜丢了，法国人不来了，或者来得太晚了。我们逃吧！跟我一起走，扬。领着我，我把眼镜丢了！”

因为没人回答，没人给眼镜，扬也没有向他伸过手去准备领着他逃跑。可怜的维克托大概以为走错了房间，于是他缩回了没了眼镜的脸，关上门，我听见维克托在眼前的一片迷雾里摸索着逃走了。

扬泪流满面地笑了起来，先是小声，接着变成大声，笑得十分开心，戏弄着他的粉红色的、尖尖的舌头，把施卡特牌抛到空中，然后抓住。谁也不知道他的小脑袋里有什么滑稽的念头。室内只有无声的人和信，所以气氛就像一个无风而寂静的星期天。最后，扬屏住呼吸，小心翼翼的搭一座极易被损坏的纸牌房屋。他用黑桃七和梅花 Q 当墙，上面架一张方块 K，搭成底层。又用红心九和黑桃 A 当墙，上架梅花八，搭成又一间底层。然后用十和 J 当墙，Q 和 A 当顶，在两间底层上架起各个小间互相支撑的第二层。他接着要在第二层上加一个第三层。他的手，与另一种宗教仪式差不多，我可怜的妈妈必定是很熟悉的像画符咒似的。当他把红心 Q 和红心 K 靠在一起时，这座建筑物还立着；因为在那间躺满不再呼吸的死人和坐着两个屏住呼吸的活人的信件存放室里，它是通风的，这座建筑物也在轻微地呼吸，让我们把两手交叉起来坐着观赏，让怀疑着的熟悉搭纸牌房屋的规则的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把从信件存放室的门缝里透进来的呛人的浓烟和焦臭味忘掉，并使人觉得信件存放室和里面的纸牌房屋同地狱只隔着一道墙、一扇门离得特别的近。

他们使用了喷火器，一定要把最后的几个守卫者熏出来而不是正面进攻。他们把米尚博士逼得无路可走，摘下钢盔，抓起一块床单布后又得寸进尺地抽出他的骑士小手绢，两只手各执一块，使劲摇晃，表示波兰邮局投降了。三十个半瞎的、被烧伤的男人，举着手，抱住后颈，从左旁门出来，离开邮局大楼，在院子围墙前站立着，等候慢慢走近的民军。在守卫者站在院子里，而进攻者正在半路上还没有到达的时候的这短短的时间内，有三四个人从邮局的车库穿过相邻的警察分局的车库，溜进雷姆河畔居民已被疏散而又无军队据守的房子里并在那儿找到了衣服和党徽，洗了澡，打扮整齐出了门，一个个地溜掉了。其中有一个人到了旧城沟的一家眼镜店里，因为他原来那副在邮局的战斗中丢失了，买了一副眼镜。这是维克托·韦卢恩。他戴上新配的眼镜，还因被喷火器烧得唇焦口渴而在木材市场喝了两杯啤酒，他的新眼镜虽说比不上旧的那副，但毕竟让他看得清楚了一些。时至今日，他还因对他紧追不放的追踪者而躲藏着。

其余没有下决心逃跑的三十个人站到对着旁门的墙下时，扬正好把红心 Q 和红心 K 靠在一起，高兴地把他的手缩了回来。

他们把我们找到了，因此无话可说。他们拽开了门，喊着：“出来！”气流灌入，风吹进来，把纸牌房屋刮倒了。他们对于这样的建筑术，是一窍不通的。他们只相信用水泥筑造的永久性的建筑物。他们受了冒犯，怒容满面的邮局秘书扬不屑一顾。他们把他拽出去的时候，并没有发现扬再次伸手从牌堆里拿了点什么。他们也没有发现我，把自己刚获得的新鼓上的蜡烛头扫到地上，带走了鼓；因为他们用很多的手电照着我们，蜡烛头已经毫无用处了，但他们没有注意到，手电的光让我们睁不开眼睛，也

找不到房门。他们在手电光的背后端着冲锋枪，喊着：“出来！”当扬和我站在过道里时，他们都没看到他们在叫科比埃拉，叫华沙来的康拉德，叫波贝克，叫生前在电报接收室工作的维施涅夫斯基。这些不听命令的人，使他们害怕了。他们厉声吼着：“出来！”我忍不住放声大笑才让民军明白，他们在我和扬面前出了洋相，于是停止了吼叫，并说道：“原来这样！”民军把我和扬带到邮局院子里，与那三十个举着胳膊，手抱着后脖子，口喝难忍被摄进新闻记录片的人站在一起。

新闻片的拍摄者在民军刚把我们从旁门里押出来时转动了固定在一辆小轿车上的摄影机，我们便被拍入了后来在所有电影院里放过的很短的镜头里。

想着自己是个侏儒的我被他们从站在墙下的那批人里拉出来，我想起三岁孩子对任何事情都无需负责，又感觉到自己的脑袋和四肢疼痛难当，并让自己半真半假，并且始终紧紧抱住了我的鼓。跌倒在地上挣扎。我被他们抬起来，塞进一辆党卫军民军部队的汽车里，准备把我送到市立医院去。汽车开时，我看见可怜的扬痴呆地用左手捏着红心 Q，独自傻笑地向乘车离去的我挥动。

他躺在萨斯佩

我又把最后一段读了一遍，我虽然并不十分满意，但这反而更像是出自我笔下的文字。若不是撒谎，为了写得更精悍，我有时有意把文章作一些夸张。

不过，我还想留住它的真实性，给我的笔来一个出其不意。其一，扬最后一盘牌就是缺两张王牌而使他可能会赢而却十分遗憾未能打完的那一盘牌。其二，我在离开信件存放室时，不仅是拿了那面新鼓，而且拿了那面破裂的旧鼓。它是同那个没了背带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的死人以及信件一起从篮子里倾倒入来的。此外，当时，民军使劲儿地喊：“出来！”用手电照着，拿冲锋枪逼着，我和扬只好从信件存放室走出来。我们一出门，我便站到两名民军中间寻求保护。我觉得这两个倒像扬，心肠很好，便假装悲泣，一边指着扬，打着手势控诉，把这个可怜人比作一个凶残的人，就是他，用波兰那种不人道的行为，把一个孩子拖进波兰的邮局，当做防弹的盾牌。

我扮演犹太保住了我的好鼓和破鼓，他们让我拿着两面鼓却对扬又踢又杵。一个中年民军抚摩我的脸。另一个淡金色头发的小伙子，他把我抱了起来，弄得我既难受又尴尬。他一直眯着眼睛笑，因此我看不清他眼睛的颜色。

今天，我总是被那不体面的形象而害羞，所以我不停在说：扬没有察觉到，他的心仍在牌上，不论民军用什么招数，取笑也罢，残酷对待也罢，都不能把他从施卡特牌上引开。当扬进入纸牌房屋的永恒王国，并幸福地居住在一所空中楼阁中时，我们，民军和属于民军之列的我则站在砖墙间，站在门廊的石板地上，在镶有石膏上楣的天花板下。我们把它们称为建筑的拼凑物，在一定的环境下，就会失去聚合力，所以一想到那些此日子发生的糟透了的事情，就不免让人提心吊胆。

以上这种看法是以后我才明白的，它是不能使我逃脱罪行。这最重要是因为，把纸牌房屋看做是惟一符合人的尊严的住宅这一信念，当时对我来说并不陌生——今天，我一见到脚手架就会联想到拆除房屋。还有一个因素，那就是怕自己是扬的亲戚而受到牵连。那天下午，我坚信扬不只是我的表舅和假想的父亲，却是我真正的父亲。这使扬一跃而居于领先地位，他当然不同于马策拉，马策拉假如不是我的父亲，那他就什么都不是。

在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那一天，那个不幸的下午承认玩儿纸牌的扬是我的父亲，没想到，我犯下了第二桩大错。

尽管我抱憾终身，但我不能不承认，我的鼓，不，我本人，先葬送了我可怜的妈妈，之后又将扬·布朗斯基——我的表舅和父亲送进了坟墓。

那些日子，我不停的自责，怎么也驱赶不走。它逼得我躺在了医院的病床上，于是，我也就像每个人那样原谅了自己蒙昧无知。那时候，蒙昧无知是一种时尚，时至今日，它还像一顶时髦的小帽子似的戴在某些人的头上。做为狡猾的无知者的我，成了波兰人的暴行的无辜牺牲品，发高烧，神经发炎，被送进了市立医院。他们通知了马策拉特。那天晚上，他向警察局报告我不见了，那时是不是他的私产还没个说法。

那三十个人，外加扬·布朗斯基，举着双臂，两手环着后脖子，在拍完新闻片之后，先被带到撤空了的维克托里亚学校，随后他们被关进席斯施坦格监狱，最后，在十月初，把他们交给弃了的萨斯佩旧坟场围墙后面松软的沙土。

我是从舒格尔·莱奥那儿得悉的。官方自然不会公布在哪儿的沙土地上，在哪儿的墙下，把这三十一一个男人枪毙了，又如何把他们埋在怎样的沙土地里。

黑德维希·布朗斯基接到一分通知，要她把环行路的寓所让给一个级别较高的空军军官的家眷居住。斯特凡帮助她收拾箱笼什物，准备搬到拉姆考去，她在那里有几公顷土地和森林，佃户的住房也是她的。就在此时，当局又给这位寡妇寄来一纸公文。她的眼睛充满了痛苦，但却不知是为什么痛苦。她在儿子斯特凡的帮助下才把白纸黑字的含义慢慢搞明白。

通知如下：

军事法庭办公室，埃贝哈特·St·L·小组 41/39 黑德维希·布朗斯基太太：

布朗斯基，扬，因参加游击队活动，被军事法庭判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处死刑，并已被处决，特此通知。

军法总监

策勒夫斯基

一九三九年十月六日于索波特

通知中始终没有提到萨斯佩，可以看出他们体恤家属，免去他们修坟墓的费用。那是一座墓穴极大的合葬坟，需要扔下无数鲜花。安葬费连运输费，都由当局出了。他们把萨斯佩的沙土地填平了，拣走了除了留在地里之外的子弹壳因为遍地子弹壳会破坏一所虽说早已废弃但还算体面的公墓的外观。

但是舒格尔·莱奥找到了那颗留在公墓与我们有很大关系的子弹壳。无论什么葬礼，纵使严加保密，都瞒不过他。此人是在安葬我可怜的妈妈，安葬我那位满身伤疤的朋友赫伯特·特鲁钦斯基时认识我的。他肯定也知道，他们把西吉斯蒙德·马库斯埋在哪里，但我从未向他打听。十一月底，他遇见了刚被人家从医院里放出来的我。他几乎欣喜若狂地把这颗泄露天机的子弹壳交给我。

在我拿着那颗可能是由扬安上铅子儿的子弹壳，跟随着舒格尔·莱奥，去萨斯佩公墓之前，我必须先把但泽市立医院儿科病房的金属床同此地疗养与护理院的金属床做一番比较。这两张都漆上白瓷漆的床，还是有区别的。量一下就会知道，儿科病房的床比较短，床栏杆却比较高。我虽喜欢睡一九三九年那种短而高的笼子，但我在今天这张为成年人用的床上也达到了清静无为的境地。几个月以来，我一直在要求换一张栏杆更高的白瓷漆的金属床，但还没得到疗养院领导的批准。

以前在儿科病房时，每次探望日，那高耸的栅栏便把我与来访者马策拉特，格雷夫和舍夫勒夫妇隔离开来。到我快出院时，我的床栏杆还把那座以外祖母安娜·科尔雅切克命名的、活动的、

四条裙子的大山分割成许多块。她焦虑，叹息，呼吸困难，有时举起她那双多皱纹的大手，把粉红色的皴裂的手掌展开，接着又胆怯地垂下她的手，啪的一声打在自己的大腿上地来到我这里。那声响今天还在我耳边回响，可惜的是我只能在鼓上模仿出一个大概来。但如今情况相反，我与来访者几乎直接接触。

她初次探望时带来了她的哥哥文岑特·布朗斯基。文岑特抓住床栏杆，不知疲倦地声音虽小，却咄咄逼人。或讲或唱或边唱边讲波兰女王，童贞女玛利亚。我特别希望有名护士留在这两位指摘我，用布朗斯基炯炯的目光盯着我，不顾我正苦于在波兰邮局打施卡特而引起的头痛和发烧，盼着我作出表示，宽慰他们几句，告诉他们，扬在最后几个小时里一直在玩施卡特牌并且胆怯害怕的老人身边。他们要我作证扬是无罪的，好像我的证词有绝对的分量，可以洗清扬的罪。

我不知道该如何给埃贝哈特小姐的军事法庭打这样一份报告的话，我，奥斯卡·马策拉特承认，在九月一日前夕曾守候过回家途中的扬·布朗斯基，并用一面亟待修理的鼓把他引诱到那个波兰邮局里去，扬·布朗斯基本来已经由于不想守卫它而离开了那个邮局。

我没有用这样的证词来为扬开脱罪责。当我决心把当时的经过情形告诉这两位老人时，就开始痉挛，弄得护士长只好将探望时间缩短，并禁止外祖母安娜和假想的祖父文岑特再来医院探望我。

从比绍步行到这里，还给我带来了苹果的这两位老人离开了儿科病房。他们走起路来小心翼翼，手足无措真够乡巴老的。外祖母飘荡着的四条裙子和她哥哥散发着牛粪味的星期日服装逐渐远去，我的极大的罪责也与日剧增。

一时间同时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当马策拉特、格雷夫夫妇和舍夫勒夫妇把水果和点心送到我的床前时，当我外祖母和她哥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哥文岑特因为从卡特豪斯到朗富尔的铁路还不通，从比绍经戈尔德克鲁格和布伦陶步行到我这里来时，当护士们穿着使人知觉麻木的白服装，不厌其烦地讲着医院里的各种闲话，在儿科病房里代替了天使时，波兰还没有丢失，但过不久就要丢失了。最后，波兰在举世闻名的十八天之后丢失了，虽然不久又证明，波兰还没有丢失；现在还是如此，忽略了西里西亚和东普鲁士同胞的意愿，波兰还没有丢失。

在马背上摘乌饭树的紫黑浆果，手执饰有红白两色小旗的长枪的疯狂的骑兵。忧郁的具有悠久传统的骑兵中队。漫画书中的进攻。在罗兹和库特诺附近越过战场。把要塞莫德林代替了。策马奔驰，是非常精湛的骑术。一直在等待着晚霞。由于战斗是可以入画的，死神是画家的一个模特儿，当前景和背景都能入画时，骑兵才开始进击在奔驰中保持平衡，随后倒下，偷吃乌饭树的紫黑浆果，野蔷薇果劈啪爆裂，骑兵不是浑身发痒，他们决不会蹦。枪骑兵，他们身上又发痒了，连马带人在干草堆里翻滚他们聚集在一个人在西班牙，叫堂吉诃德，在波兰叫潘基霍特的一个纯血统的形象高贵得可悲的波兰人的后面。他教过枪骑兵怎样在马背上吻女人的手，于是他们这时不停地端庄地吻如贵妇人般的死神的手。但是，在此之前，因为浪漫情调是他们的后盾他们先要集合，背后是晚霞前面是德军的坦克，克虏伯·冯·博伦和哈尔巴赫的养马场里的种马，世间难寻的纯种马。可是，那位误把死神当做贵夫人半是西班牙半是波兰的骑士，天才的潘基霍特，天才得有些过分了。他手里系小旗白红两色的长枪落地。他让自己的部下去吻贵夫人的手。白红两色的鹤立在屋顶上，晚霞，白红两色的樱桃吐出核来，潘基霍特呼唤骑兵：“马背上高贵的波兰人，那不是钢甲坦克，而是风磨，或羊群，你们去吻贵夫人的手背吧！”

晚霞因骑兵中队向土灰色钢甲侧翼冲去而增添了更多淡红的

光辉。可能列举波兰骑兵的伤亡数字的方法更正确，用干巴巴但却有说服力的统计数字来纪念所谓的波兰战役。

我直至九月二十日左右，躺在医院的床上还能听到架设在耶施肯山谷森林和奥利瓦森林高地上的大炮在轰鸣。然后，最后一个抵抗据点海拉半岛投降。这样，汉萨同盟的自由市但泽可以庆祝它的哥特式砖砌建筑被大德意志帝国吞并，并欢呼着看一眼那位不知疲倦地站在黑色梅赛德斯牌轿车里、差不多不停地行举手礼的元首和总理阿道夫·希特勒那双与扬一样在女人身上获得成功的蓝眼睛。

十月中旬，我从市立医院释放出来。我同护士们特别难分难舍。当埃尔尼或贝尔尼护士把我的一面使我犯下罪过的破鼓，一面我在保卫波兰邮局期间占有的完好的鼓时，我才意识到，几个星期以来我始终把铁皮鼓丢在了脑后，原来这个世界对于我来说除了铁皮鼓还有护士。

我带着乐器和新获得的知识开了市立医院。马策拉特因为我那还有点站不稳的三岁孩子的脚，搀着我的手回到拉贝斯路。接下来的是战争头一年无聊的平日以及周末的生活。

我在过了几星期的恢复期后十一月下旬一个星期二，不顾湿冷的天气，第一次上街。我愁眉苦脸地敲着鼓，在马克斯·哈尔贝广场和布勒森路的拐角上碰上了前神学院学生舒格尔·莱奥。

我们尴尬地微笑着面对面站着，过了一段时间，直到莱奥从他的礼服口袋把细软羊皮手套掏出来，并将这黄白色、皮肤似的遮蔽物套住他的手指和掌心时，我这才清楚地意识到自己遇上了谁，心里怕得打着鼓思忖着这次会面将会给我带来什么。

我们在看过了皇帝咖啡食品店的橱窗，又看到若干辆在马克斯·哈尔贝广场上交叉而过的五路和九路有轨电车驶去后，沿着布勒森路式样一致的房屋，绕着街上一根广告柱转了几圈，仔细看了通知把但泽盾换成帝国马克的布告，用指甲把一张贝西尔洗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衣粉广告划破，见到红色从蓝白色下面露出，心里感到十分满足。当我们要返回广场的时候，舒格尔·莱奥用他戴手套的双手把我推进一个门道里，戴手套的左手在身后抓，接着伸到礼服的后摆底下，伸进裤兜里，掏着，在兜里摸着找到断定是他所要找的东西，握在手里，把手掏出口袋，让后摆落下，戴手套的拳头慢慢地，一个劲儿地向前伸，把我顶到门道的墙上，他的胳膊真长，在他把带手套的手摊开之前，我简直以为他的胳膊会从肩关节上跳出来，朝我的胸膛打过来，从我的两根锁骨中间穿出去，钻进霉味很浓的门道的墙里去，而我将永远也看不见莱奥手里捏着什么，只能记得贴在墙上的与拉贝斯路住房守则大同小异的住房守则。

当莱奥的手马上就要碰到我的水手大衣，已触着大衣上一颗锚形钮扣时，把手飞快地摊开。我顿时见到在有霉点的、发亮的、保护着他的咯咯作响的指关节的手套上有一颗子弹壳。

我在莱奥再次捏上拳头时便下决心跟他走了。这一小块金属同我直接说了话。我在莱奥的左边，并肩沿布勒森路走去，不管橱窗、广告柱都不能使我们止步，我们穿过马格德堡街，布勒森街尽头两幢方箱形的高楼落在了我们背后。在这两幢楼上，夜间亮起了警告灯，指示着飞机的起降。我们先在铁丝网围住的机场边沿费力地走着，最后在较干的柏油路上，沿着通往布勒森方向的九路电车轨道前进。

莱奥一直把子弹壳捏在手套里我们互不搭话。由于天气又湿又冷，当我踌躇不前想往回走时，他便再次把手摊开，让那块金属在掌心里跳跃，引诱我一直不停地向前走。快到市有的地产萨斯佩、我当真决定转身往回走时，他甚至用音乐来挽留我。他鞋跟着地，转过身来，把子弹壳空的一头朝上，像长笛的侧口似的贴在凸出的、流涎水的下唇上，在不断下大的雨中吹出一声尖厉的、时而震颤、时而像被浓雾压抑的音响。我因为子弹壳上吹出

来的音乐和这种好像是事先安排好的，并且由于这个特定的场合而显得更糟糕的天气而发抖。所以，我没必要掩盖自己受冻的狼狽相。

是那个吹着子弹壳的捕鼠者莱奥引诱我去布勒森的。但传到我耳中的声响还有别的。从碇泊场，从十一月的浓雾笼罩下的新航道，传来了轮船的汽笛声以及一艘经苏格兰、舍尔米尔和帝国殖民区到我们这里、现在正要进港或出港的鱼雷快艇饿狼似的噪声。因此，莱奥轻而易举地在报雾信号声、汽笛声和子弹壳里吹出来的尖声的帮助下，拖着冻坏了的我和他一起往前走。

飞机场和新练兵场和青格尔沟被一道拐向佩朗肯方向的铁丝网网格开来。就在那儿的高地上，舒格尔·莱奥歪着脑袋，淌着口水，瞧了半天我那颤抖的身子站住了。他吮住子弹壳，抿住下唇，灵机一动般地，猛地一伸胳膊，脱下烤肉色的燕尾服，把这件脱下的散发着湿土味的沉重的烤肉色的燕尾服披在我的脑袋和肩膀上。

在我已经不晓得自己是不是还冻得发抖的时候，我们又上路了。有时，莱奥一跳五步远，随后站住。他穿着满是褶纹但很白的衬衫，活像一个想要冒险从中世纪的城堡主楼或塔楼里跳下逃走的人，他身上那件洁白耀眼的衬衫应规定作为精神病患者的时装。莱奥的目光一看到身穿烤肉色礼服、踉跄地走着的我，就会爆发出一阵狂笑，并像一只呱呱叫的乌鸦似的拍拍翅膀，止住笑声。事实上，我自己肯定也像一只滑稽可笑不像渡鸦也似乌鸦的鸟。另外，上装的下摆有一截拖在我身后，像裙裾扫着柏油路面。我回头看了第二眼我像皇帝陛下似的留下一条宽大的尾迹后，便油然而一种自豪感。这条尾迹象征和暗示着在他身上微睡着的、还没有足月临产的悲剧性命运。

我还在马克斯·哈尔贝广场上，就已经预感到，莱奥并不想带我去布勒森或者新航道。我一开始就非常清楚，我们步行的目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的地只能是旁边是保安警察的一个现代化打靶场的萨斯佩公墓和青格尔沟。

海滨浴场沿线的电车从九月底到四月底，每三十五分钟发一辆。一辆无拖车的电车在我们过了市郊朗富尔最后一排房屋时迎面驶来。接着，另一辆在马格德堡街道岔上等对开来的车到后再出发的有轨电车超过了我们。我们快到附近也有一处道岔的萨斯佩公墓时，一辆电车从后面赶超我们，接着，另一辆电车向我们开来。我们早就看到它，因为看不清道路，亮着一盏湿乎乎的黄灯等在雾气中了。

莱奥在我眼里还留着对面开来的车子里司机那张明显愁眉苦脸的面孔的时候便把我从柏油路上拖到松软使人一踩就猜出是海滩的沙土的沙土地上。方形的公墓周围有一道围墙。朝南有一扇有许多长了锈的花体字，似锁非锁的小门，于是我们推开门走了进去。墓碑是瑞典黑花岗岩或闪长岩凿成，正面磨光，背面和两侧很粗糙，或者挪了位置，或者歪歪斜斜，或者扑倒在地。可惜，莱奥不给我时间去仔细观看。墓地树木非常少，只有五六棵蛀坏了的、长得歪歪扭扭的海滩矮松。如今躺在土地肥沃长满榆树和槭树的布伦陶的妈妈活着的时候曾在电车上说过，其他任何清静的处所都比不上这一小块荒芜的地方好。

我还来不及整理我在这富于情调的荒冢之间的万千思绪。莱奥便领我出了北墙的一扇开着的、没有了栅栏的小门，离开了公墓。我们站在墙外平坦的沙土上看到在蒸腾的水雾中，一片金雀花、矮松和野蔷薇果丛向岸边延伸。我回头望了望那公墓，明显察觉到北墙上有一段是新刷上白灰的。

莱奥在这面如他的皱皱巴巴的衬衫一样新得耀眼刺目的白灰墙前忙碌着。他使劲地迈开大步用脚步计量。他用拉丁文大声数着。他还唱着在神学院课堂上学会的经文。莱奥在距墙十米左右的地方插上了一根木头，又在连灰泥也是新填补过的新刷的墙前

不远处插上了一根木头。他的右手由于仍拿着子弹壳，他只得用左手干活。他测量了好久，终于把子弹壳放在离墙较远的那根木头旁边。这截前头稍窄的空心金属里曾经居住过一颗铅子儿，后来，有人扣动了扳机，让它出了壳，同时一个人的灵魂也出了壳。

口水从站着的舒格尔·莱奥的嘴里流出，一丝丝地挂下来。他那双戴手套的手十指交叉，起先还唱那么几句拉丁文，后来因为这里没有会吟唱应答连祷文的人而沉默下去。莱奥把身子转过来，恼怒地、不耐烦地越过围墙往布勒森公路望去，而每当大都没有乘客的电车进进出出，打着铃在道岔上紧靠着相向驶过时，他又掉头冲那个方向望去。莱奥可能是在等待送葬的人。但电车上没有一个可以让莱奥伸出白手套向他表示哀悼的人下来到这里，走路的也没有。

我们没有抬头仰望在我们头顶上呼啸而过的几架准备着陆的飞机。而是忍受着发动机的噪声，不想让自己确定这三架机翼顶端灯光闪亮、正准备着陆的飞机是容克 52 型。

舒格尔·莱奥在飞机离开不久后便从衬衫里掏出了什么东西，一下子站到我的身旁，把我肩上他那件乌鸦羽衣，朝金雀花、野蔷薇果和矮松丛的方向和海滨跳去。他用故意很显眼的动作扔下了什么东西让人去捡，然后跳着离开。莱奥像幽灵似的在我的视野内游荡，最后被牛奶似的、粘在地面上的雾气所吞噬。当他在消失后孤独地站在雨中时，才捡起了插在沙里的那张是施卡特牌黑桃七的硬纸片。

我离开萨斯佩公墓后不久便在朗富尔的每周集市上看见了外祖母安娜·科尔雅切克。比绍一带关卡已撤销，她又可以到市场上去卖蛋、黄油、青菜和可以贮藏过冬的苹果了。人们因为生活必需品不久就要由国家统一经营了而抢购，大家都想搞点东西储存起来。就在我见到蹲在摊子后面的外祖母那一刹那间，我感觉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到了大衣、套头毛衣和汗衫里面贴身藏着的那张施卡特牌。我在那天乘一个售票员让我免费从萨斯佩返回马克斯·哈尔贝广场乘电车回家的途中，本是想把这张黑桃七撕掉的。

我把这张没撕掉的牌交给了蹲在青菜堆后面一见我来吓了一跳的外祖母。可能她认为我一来就没有好事。但她还是招了招手，叫这个在鱼筐后面若隐若现的三岁孩子靠近她。我磨蹭了半天先看了看潮湿的海草上的一条有一米左右长的活鳕鱼，接着又看看从奥托明湖抓上来的总共有几十只螃蟹，正一个劲儿地小篮子里来回地爬。我也学螃蟹横着身子走，水手大衣的背面对着她，慢慢向她的摊子靠近去，直到货摊上一个木头架子上的苹果被我撞得来回滚动我才让她看到大衣上的金色船锚扣。

施韦特费格尔把送来的裹上报纸的热砖头推到我的外祖母的裙子底下，照旧耙子将冷砖头钩出来，在挂在脖子上的石板上画一横道，然后向隔壁一个货摊走去。我的外祖母递给我一个黄澄澄的苹果。而我却不知给她点什么？我先递给她那张施卡特牌，然后交给她那个我也不愿把留在萨斯佩公墓的子弹壳。安娜·科尔雅切克久久地盯着这两件毫不相干的东西发愣，弄不懂是怎么回事。这时，我把嘴凑到她包着头巾的老妇人的软骨耳朵旁，同时联想到了扬的粉红色、长耳垂、小而肥的耳朵，不再小心伪装，低声向她说：“他躺在萨斯佩。”后拔腿就跑，篓青菜在我脚下翻了个个。

玛丽亚

特别新闻一条接一条地被广播着，用历史上最大的音量，并像运载工具一样被上足了油。驶过欧洲的公路、水道和天空，占领了沿途的一切。而我的是仅限于敲破儿童玩的、上了漆的铁皮鼓的事业却进行的非常不顺利，甚至停滞不前。战争使人们浪费

了大量的金属，而我的鼓又坏了。虽说我从波兰邮局里找回了一面几乎没有刮掉一点漆皮的新鼓，并因此而使波兰邮局的保卫战有了那么一点意义，但是这面新的铁皮鼓对于我来说简直毫无什么大的帮助！因为我在美好的岁月里将一面铁皮鼓变成一堆废铁只需要八个星期。

市立医院把我释放后，我一边为离开了我的护士而难过，一边开始拼命地擂鼓。在萨斯佩公墓度过了一个阴雨霏霏的下午，从那儿回来后，我也没有松劲，相反，我使出了双倍的气力，一心要消灭那个目睹我同民军狼狈为奸的证人——那面鼓。

可是，不论我怎样打击，它都顶住了，好像是在挖苦我。我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抹掉自己这一段历史。奇怪的是，每当我这样拚命敲打的时候，我总会想起送汇款单的维克托·韦卢恩，虽说他是个近视眼，不大可能目睹我所干的丑事。不过，这个近视眼不是逃之夭夭了吗？难道情况不可能是这样的吗？近视眼看到的東西有时候更多，韦卢恩——我多半把他叫做可怜的维克托。也许像看黑白剪影似的看到了我的动作和姿势，判断出了我是在干犹大的勾当。如今他逃跑了，也许把我的丑事四处传翻。

时至十二月中旬，挂在我脖子上的喷射着红色火焰的良心对我的谴责才渐渐显出苍白无力。油漆上出现了头发丝似的细缝，漆皮也剥落下来。铁皮也渐软渐薄了，在变得透明以前开裂了。当一个奄奄一息的人受着临终前的痛苦时，目睹这种痛苦的人总想把它这种痛苦缩短，让他尽快结束生命。我亦如此，在基督降临节的最后一周内，我加快速度，预计要在圣诞夜前让它完成它的使命，直敲得众邻居和马策拉特都捏住了耳朵。因为我希望得到一个圣诞礼物——那就是一面新的，没有任何精神负担的铁皮鼓。

十二月二十四日前一天，我从身上，也从灵魂上解下来那支离破碎的、生锈的、使人联想起相撞后的汽车的一堆玩意，终于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达到了目的。对于我来说，直到此时，我才如愿以偿地彻底击败了波兰邮局的保卫战。

从来不曾有过哪个人有像我那样一个令人失望的圣诞节。圣诞树下有一份礼物是给我的，但不是我想要的铁皮鼓。

那里摆着一盒我从没打开过的。一只可以骑上去摇动的天鹅，它将把我变成洛恩格林，这在大人们的眼里，是一件不异常的礼物。他们居然在礼品桌上放了三本连环画，这明摆着是要惹我生气。在我看来，只有一副手套、一双系带的靴子、一件由格蕾欣·舍夫勒编织的红色套头毛线衫是有用的。我大为震惊的目光从积木溜到了天鹅上，又死盯着一本连环画里的一幅画的是一些被认为是很滑稽的玩具熊，前爪抱着各种乐器的画。这些装出一副乖巧可人的样子，看上去像是会敲鼓的野兽中间，有一头身上挂着一面鼓，仿佛它正拿着一根鼓棒敲下去正在擂鼓。我得到一只天鹅和一千多块积木，但却没有鼓，在这个无比寒冷的圣诞夜，我有了一副手套，但却两手空空，因为我没有可以给严寒带来一些温暖声音的圆滚滚、滑溜溜、有冰冷的漆和铁皮的鼓。

我心里偷偷在想可能是马策拉特把鼓藏着还没有拿出来。或者是同她的丈夫、面包师亚历山大一起来我家共享圣诞节肥鹅的格蕾欣·舍夫勒把鼓坐在屁股底下。他们要我先享受一下玩天鹅、搭积木、看连环画的乐趣，然后才把真正的宝贝拿出来。我做出了让步，先像傻瓜一样翻阅连环画，然后骑在天鹅背上摇了起来，至少有半个小时，我心里则是无比厌恶这一切。接着，我还听任他们在炉火特别旺，温度十分高的屋里，给我试穿了一下套头毛线衫。格蕾欣·舍夫勒又帮我穿上了系带皮靴。格蕾欣夫妇在这段时间里也到了，因为肥鹅本来就是为六个人准备的。马策拉特的烹调手艺高超，那只填满干果的肥鹅喷香可口。大家狼吞虎咽把它消灭之后，正在品尝餐后点心米拉别里李子和梨，我则绝望地捧着格雷夫在已有的四本之外又新添的一本连环画。喝完

汤，吃罢肥鹅、红甘蓝、盐土豆、米拉别里李子和梨，在越烧越旺的瓷砖炉里冒出的热气烘烤下，我们大家唱起了圣诞夜之歌，还唱了一段：“纵情欢乐吧，枞树啊枞树四季常青，你的小铃铛年复一年叮当叮当叮。”屋外，四处响起了钟声。这时，我终于提出要我的鼓了。喝得醉醺醺的吹奏乐小组也开始演奏，吹得冰柱从窗槛上……我要鼓，他们没有。这时，我在很长时间没有叫喊之后叫喊起来。这时，我在较长时间的间歇之后再次把我的声音削成尖利的切割玻璃的工具，我不毁花瓶、啤酒瓶和电灯泡，不切割玻璃柜或眼镜，我的声音对准装饰圣诞树、制造节日气氛的小铃、小球、易碎的银色肥皂泡，把圣诞树的装饰品全都成了碎片。枞针也纷纷摇落，足有几畚箕之多。蜡烛却还在宁静而神圣地燃烧。即使这样，我还是没得到鼓。

我不知道没有见识的马策拉特到底是要我戒掉敲鼓的习惯，还是根本不想及时向我提供足够数量的鼓。灾难临头。我的日子也一天比一天难过，我家的殖民地商品店在经营管理上混乱得已经到了无法掩饰的田地，所以需要及时请一个帮手来照料我和我家的店铺。

我身材矮小没法站在柜台后面出售松脆面包片、人造黄油、人造蜂蜜，而且我也不乐意，于是，你的父亲马策拉特把我那位可怜的朋友赫伯特最小的妹妹玛丽亚·特鲁钦斯基，请来经营我家的店铺。

她是个名副其实的玛丽亚。她在几个星期之内就恢复了我家店铺过去那良好声誉。她待人和善，全力以赴地经营，马策拉特也心甘情愿地服从她。最重要的是她有察颜观色的能力，很理解我。

玛丽亚还没来我家店铺帮忙以前，她只要见到我怨气冲天，肚皮前面挂着那一堆废铁，跺着脚在那一百多级的楼梯上走上走下，就会给过我一个旧洗衣盆代替鼓来敲。但我拒绝把洗衣盆翻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过底来当鼓敲。玛丽亚刚在我家店铺里固定下来，就不顾马策拉特的反对来满足我的要求。但无论如何我也不愿让她挽着手走进玩具店去。店里让人眼花缭乱的陈列品肯定会使我痛苦地联想起西吉斯蒙德·马库斯的被砸烂的店铺。温柔而顺从的玛丽亚让我站在玩具店外面等候，独自去采购，根据需要，每隔一个月便会给我一面新的鼓；到了战争的最后几年，连铁皮鼓也成了稀有物资，由国家统购统销时，玛丽亚只有同商人进行柜台下面的交易，用白糖或十六分之一磅的真咖啡给我换铁皮鼓。她干这种事情的时候从不摇头叹息。也不两眼望天，而是聚精会神，严肃认真，怀着那种理所当然的心理，就像她在给我穿洗干净、缝补好的裤子、袜子、罩衫时那样一点儿也不拘泥。尽管玛丽亚和我的关系在后来不断发生变化，而且至今还没有定论，但是，她递给我鼓时的方式却始终不变，即使今天儿童铁皮鼓的价格要比一九四〇年时高得多。今天，玛丽亚是长期订着一份时装杂志。每逢探望日她来看我时，穿戴越来越时髦从不重复。

那时的玛丽亚很漂亮。她有一张刚洗干净的圆脸，睫毛短而密、太鼓的灰眼睛里射出了冷淡的目光，浓黑的眉毛在鼻根处连在了一起。颧骨轮廓分明在严寒之中，皮肤呈淡蓝色，紧绷着，痛苦地跳动着的轮廓分明的颧骨，构成了她的扁平的别具一种平衡感的脸，她的不是不美、更不是滑稽可笑、而是很端正、很纤巧的小鼻子也保持这种平衡。她的额头低矮且很圆，鼻根上双眉连结处有几道竖的由于年纪轻轻就用心思太多而留下的皱纹。她的微髻的至今保存着湿树干的光泽从两鬓开始绷紧在小圆脑袋上的棕色头发同特鲁钦斯基大娘一样，她几乎没有后脑勺。玛丽亚到我家店铺里来站柜台的时候穿着白罩衫，还梳着吊在她那两只一下子就会变得通红的、硬挺挺的耳朵后面的辫子，可惜耳垂不是悬着的，而是直接长入了下颚上方的肉里，即使没有什么难看的皱纹，但也是明显的退化现象，可以使人由此推断出她的天性

来。后来，马策拉特一直劝说她，叫她用头发把她的耳朵遮住。今天，玛丽亚在她那蓬乱的时髦的短头发下面只露出她的耳垂，并用一副反映了她的品味较低的大耳饰来掩饰她的美中不足。

玛丽亚那个小脑袋有丰满的面颊、高高的颧骨以及不显眼的小鼻子两侧的一对大眼睛那样，她的矮小的躯体却有宽大的肩膀、从腋窝下就开始隆起的胸脯、大骨盆和丰满的臀部，而支撑这臀部的则是两条过细得中间有一道缝隙但劲道很大的腿。

玛丽亚那时候好像有些膝盖内翻。而且她的身体已经发育成熟、比例定型了，相比之下，她那双永远是红红的小手在我的眼里却还像小孩的手似的，手指头则像是香肠。时至今日，她也得承认自己的手像小孩子的。可是，她的先穿着笨重的徒步旅行鞋，稍后穿起了我可怜的妈妈的制作精致但式样已旧，而且不合玛丽亚的脚的高跟鞋的脚还是渐渐地没有了孩子的红肤色和滑稽可笑的样子，而且对西德和意大利出品的时髦皮鞋的款式适应了。

少言寡语的玛丽亚喜欢在洗餐具时在她把白糖分别装到盛一磅和半磅的蓝色纸口袋里时唱歌。在店铺关门打烊后，在马策拉特结账时，即使在星期天，只要她得到半个钟点的休息，就会吹起她哥哥弗里茨被征入伍、派到大博施波尔去时留赠给她的口琴来。

她什么曲子都吹。譬如她在德国少女同盟的晚会上学来的漫游歌曲，又像轻歌剧里的曲调和流行歌曲，那她从收音机里听来的，或者是她哥哥弗里茨在一九四〇年的复活节出差到但泽的那几天内，在家里哼唱时被她记下来学会的。我还记得，玛丽亚曾用舌尖拍打口琴，奏出《雨点》一曲，还吹奏过《狂风教过我一支歌》，但并没有模仿察拉·莱安德尔的唱法。但玛丽亚在店里上班的时候从不掏出她的霍纳牌口琴来。即使没有顾客，她也只是坐在那里用稚气的圆体字写价格牌和商品单，而不是炫耀她的音

乐。

事实上，玛丽亚才是我家店铺真正的主管。玛丽亚把我可怜的妈妈死后，因为竞争不过人家，不再登门的一部分顾客。又争取回来，使他们成为固定的主顾。即便是这样，她还是从不自以为是的马策拉特尴尬，而还是对他恭恭敬敬、低声下气。

马策拉特总在蔬菜商格雷夫和格蕾欣·舍夫勒挖苦他的时候，振振有词地说：“再怎么这个女孩子是我雇来的，是我教会她做生意的。”这个人的思路就是如此简单，他只有在干自己心爱的行当——烹调的时候，才变得敏感机巧，有辨别能力，因而值得人家赞许。因为我必须替他说句公道话，他的卡塞尔排骨加酸菜、芥末调味汁猪腰、维也纳煎肉排以及他最拿手的奶油鲤鱼加白萝卜，确实是色香味俱全。但他在店铺里对玛丽亚的指点实在微不足道，因为第一，这个姑娘有做小本生意的天赋，而且，马策拉特对柜台上做交易的手腕差不多一窍不通，他只适合于在大市场上搞采购，可是，在煨、炖、蒸、煎、炸等烹调方面，他倒是能教给玛丽亚几手。但是曾在席德利茨一个职员家里当过两年女佣人的玛丽亚，刚到我家时，连水都烧不开。

不久，马策拉特就恢复了我妈妈活着的时候的生活日程：厨房是他的天下，星期日烘烤的食物质量一次比一次强，他可以根据自己心情一连数小时地洗餐具，顺便到大市场的公司和经济局去采买和订货以及结账，耍一些狡诈手腕同税务局通信，每半个月布置一次橱窗，证明他在这方面极富想像力，格调不低，心灵手巧。他还认真负责地处理他那些琐细的党务，总之，他显得十分忙碌，因为有玛丽亚坚守柜台。到这里，通过描述一个年轻姑娘的骨盆、眉毛、耳垂、手脚，我相信已经成功地歪曲了玛丽亚的形象。我这样做，是因为她是我的第一个情人。

我意识到这一点是在有一天，我倾听着自己的鼓声时不禁发现，我用新的鼓点，急切然而谨慎地把自己的激情传递给了铁皮

鼓。玛丽亚认真地倾听这鼓声。然而，当她把口琴放到嘴边，额上蹙起许多道讨厌的皱纹，并认为必须给我伴奏时，我并不特别喜欢。可是，当她织补长统袜或者把白糖分装到纸口袋里时，她常常垂下双手，脸上的神色特别镇静，严肃地注视着我和我的鼓棒，在她重新拿起袜子织补以前，不经意地用手轻抚一下我那剪得很短的头发。

本来是受不了这种表示温柔的动作的我，却听任玛丽亚用手抚摩，而且着了迷，竟至于经常一连数小时之久有故意在铁皮鼓上敲出引诱玛丽亚抚摩的节奏来，直到她的手最后听从了并达到我的要求。

不久以后，我每天在玛丽亚的带领下上床。她给我脱衣服，给我洗澡，帮我穿睡衣，要我在睡觉以前再去上一次厕所。虽然她是信新教的，但却同我一起祷告，念一遍“我们的天父”，三遍“祝福你玛利亚”，有时也念“耶稣我为你生，耶稣我为你死”。最后，她友善但又困倦的帮我把被子盖好。

天天晚上这样在关灯前有几分钟美好时光后准备上床安眠使我感到难受，几乎把我的自制能力断送了，并使时刻注意隐藏真面目的我像抱着幻想的少女和受折磨的小伙子那样羞怯得满脸通红，把内心的秘密泄露了出来。我不得不坦率地承认，每当玛丽亚用双手给我脱衣服，抱我进锌制的澡盆，用毛巾、刷子和肥皂擦洗我皮肤上一天的尘土时，我就会因想到一个将近十六岁的小伙子，赤身裸体地站在一个快满十七岁的姑娘面前时而满脸通红，经久不消。

但玛丽亚好像并未察觉我的肤色的变化，可能她以为是我被毛巾和刷子搓热了。或者她以为这是保健术使我周身血液流通的结果。还有可能是玛丽亚既羞怯又非常老练地看透了为我的脸上每天泛起晚霞的原因，却仍然视若无睹。

我现在还动不动就无法掩饰涨红了脸，一般会延续五分钟或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更长的时间。我的纵火犯外祖父，科尔雅切克，一听到火柴这个词儿，脸就涨得像火红的公鸡一般。我同他一样，一听到有哪怕是素不相识的人，在我的身边讲到每天晚上用毛巾和刷子给澡盆里的小孩子洗澡，我的血管里就涨满了血。站在那儿的我，活脱脱一个红种印第安人。周围的人都讥笑我，说我古怪，中了邪，因为对于我周围的人来说，给小孩子抹肥皂、搓洗，用毛巾擦他最最见不得人的地方，根本就算不得什么。

可自然之子玛丽亚，在我眼前做出各种极其放肆的事情而竟能毫无愧色。例如，每当她动手擦洗起居室和卧室的地板以前，就从腿上脱下那双她特别珍惜，马策拉特送给她的长筒袜。有一个星期六晚上，商店关门后，马策拉特去支部办公室办事，只剩下我和玛丽亚两人。她把裙子和短上衣脱下来，靠着起居室的桌子站在我身旁，只穿着单薄而干净的衬裙，用汽油把裙子和人造丝短上衣上的污渍擦干净。

玛丽亚一把短上衣脱下来，把汽油味一弄没，就能从她身上飘出一股宜人并且是质朴诱人的香草味。不知道是她用香草的根擦过自己的身子还是有散发出香草味的廉价出售的香水。要么这种香味是她特有的，就像卡特太太总有一股子氨水味，和我的外祖母科尔雅切克的四条裙子底下总有一股子淡淡的臭黄油味一样。对每件事情都爱穷根究底的我，对这种香草味倒底从哪里来的，也要弄个明明白白。玛丽亚不曾用香草根擦过自己的身子。这种味是她天生的。但她自己根本不知道自己身上天生有这么一股香味，因为有一个星期天，我们吃完奶油菜花、土豆泥和煎小牛肉之后，餐桌上一盘香草布丁由于我用靴子踢了一下桌腿在那里晃荡，可是玛丽亚勉强才吃一点点，她就爱吃果汁麦粥，而我至今还深爱着所有布丁当中最普通和乏味的这一种。

一九四〇年七月，特别新闻广播报道了波罗的海海滨的游泳季节在法国战役势如破竹的胜利进展之后不久开始了。马策拉特

和玛丽亚在玛丽亚的哥哥弗里茨中士从巴黎寄来了第一批风景画明信片的时候，决定让我到空气有益于我的健康的海滨去。马策拉特说，在商店从一点到三点停止营业的午休时间由玛丽亚陪我去布勒森海滩，他同意在她呆到四点钟的这段时间里接待顾客。

他给我买了一条绣有铁锚图案的蓝色游泳裤。玛丽亚已经有了一条是她姐姐古丝特送的坚信礼礼物的红边绿色的游泳衣。我妈妈那时候用的游泳包里面塞了一件白色软毛绒浴衣，此外还有纯属多余的一个小桶、一柄小铲和若干用沙做糕饼的玩具模子。玛丽亚挎着包。我自己带着鼓。

我很害怕电车要经过的萨斯佩公墓。我怕一见到这个如此寂静却又如此意味深长的地方，会破坏我对游泳本来就十分低的兴头。我在想，当害死了扬·布朗斯基的人身穿单薄的夏装，乘着电车从他的坟墓边上驶过的时候，也许他的幽灵会出来报复。

九路电车在售票员的叫喊声中停在了萨斯佩。我的目光从玛丽亚身旁扫过，死盯着布勒森方向，另一辆电车正从那里慢慢地由小而大对开过来。那里没什么可看的東西！可怜巴巴的海滩矮松，雕有花体字的生锈的栅栏门，东歪西倒的墓碑，只有蓟草和柔弱的野燕麦喜欢读碑上的铭文。不能再看了。从打开的车窗里抬头可以看到天空中有只有三个发动机的肥胖的容克 52 型飞机或者肥壮的苍蝇在这万里无云的七月的天空中轰鸣。

我们再次开走时，视线被对面开来的电车挡住了。拖车刚过去，我转过头来，整个颓圯的墓场恰恰尽收眼底，包括那一段仍使我感到十分难堪上面那片显眼的白色的地方还是在阴影里的北墙。

在离开那个地方快到布勒森的时候，我又将注意力重新放到玛丽亚身上。她穿一件薄花布连衣裙。皮肤微亮的圆脖子，高高的锁骨上挂着一串个个一样大小红色木雕樱桃项链，像是熟透了快爆裂似的。我感觉到玛丽亚带着香草味去波罗的海海滨。我微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弯身子，深吸那芳香，暂时把正在腐烂的扬·布朗斯基忘掉了。在扬的肉还没从骨头上烂掉之前，波兰邮局的保卫战已经成为历史。幸存下来的我闻到了一股与一度时髦而现在死去完全不符的气味。

玛丽亚在布勒森买了一磅樱桃，领我从矮松林穿过，向浴场走去。虽然我已经快满十六岁了但还保持着三岁的身材，所以他们还是让我进了女更衣室。黑板上写着——水温：十八度；气温：二十六度；风向：东风；天气形势预报：晴。黑板旁边的救生协会的布告上，写的是急救方法，还笨拙地画着。穿着条纹游泳衣的被淹的人，和留着小胡子，头戴草帽的救生员，在变化莫测的危險的海水里游泳的旧画。

光脚的浴场姑娘像一个忏悔者似的身上系着一根一端是一个可以打开所有的小间的大钥匙的绳子走在前面。步桥。步桥上的扶手。沿着所有的小间是一长条椰子纤维垫子。我们的小间是五十三号。小间的木板是干热的，颜色是自然瞎子眼睛的颜色的白里带蓝。小间窗户旁有一面已经不能照人的镜子。

首先我脸朝着墙无可奈何地让玛丽亚给帮忙脱衣裳。接着，她实际地使劲一把将我的身子转过来，把新的游泳裤递给我，也不忌讳什么，硬让我把这条紧身羊毛裤穿上。我刚系上背带的扣子，她就把我放到小间背墙前的木板凳上，把鼓和鼓棒搁在我的大腿上，自己动作迅速有力地脱掉衣服。

我先是敲了敲鼓，同时数着地板上的节孔，不过立刻就停止了。玛丽亚滑稽地噘起嘴唇吹起口哨来了，把我弄得莫名其妙。她吹两声高音，脱掉鞋子，吹两声低音，脱掉短袜子。她像送啤酒的马车夫似的吹着口哨，脱掉了花布连衣裙，又吹着口哨把衬裙挂在连衣裙上，摘下胸罩。她一直使劲没有曲调的吹着，同时，把本是运动裤的短裤拉到膝上，退到脚上，用左脚把拧成麻花的退出脚的裤腿踢到了角落里。

虽然我从自己可怜的妈妈那儿知道，女人的下身不是光秃秃的，但是，我觉得玛丽亚不是马策拉特或扬·布朗斯基眼里的我的妈妈那种意义上的女人。所以，玛丽亚毛茸茸的三角形使我大吃一惊。

我一下子把她的本来面目认清了。我生气、羞惭、愤怒、失望，我的洒水壶在游泳裤里半是滑稽可笑、半是疼痛地开始变硬，这根在我身上新长出来的棍儿，使我把鼓和那两根棒忘掉了。

我一跃而起，扑向玛丽亚，但却被她的毛发截住了。我把脸凑上去。毛发长到了我的唇间。玛丽亚哈哈大笑，想把它拉开。但是，我越来越多地咬住毛发，追寻着香草味的发源地。玛丽亚还在一直笑，甚至让我停留在她的香草丛中，看来这样使她很开心。我脚下一滑摔倒了，因为我不松开毛发或是毛发不松开我。所以把她弄痛了。香草使我流出了眼泪，我闻到了蘑菇或其他辛辣的味道。香草味没有了，直到玛丽亚用正在把腐烂的扬钉在我额头上并永远用这种腐烂的气味的泥土味来毒害我时我才松开。

我滑倒在小间里白里带蓝的木板地上，不停地哭。玛丽亚却又笑着扶我起来，抱在怀里，抚摩我，让我贴着她身上惟一挂着的木雕樱桃项链。她把她的毛发从我的嘴唇间取下，摇着头惊讶地说：“你这个小淘气！你瞎闹，又什么都不懂，就哭起来。”

汽水粉

你听过这个词儿吗？以前，不管在什么时候都可以买到用一种扁平的小袋装的汽水粉。我家店铺里也出售用催人呕吐的绿色小口袋装的车叶草汽水粉。有的口袋的颜色像未熟透的橙子，据称里面装的是甜橙味汽水粉。还有草莓味的和其他味道的汽水粉。被水一冲，它就冒泡沫，乱翻腾，还发出啾啾的响声，趁它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还没有平静下来喝一口，会觉得有点柠檬的味道，玻璃杯里的颜色也是比柠檬深一些的，可以冒充毒药的一种人造黄。

在小口袋上，除了印着味道以外，还印着：天然产品；防潮；专利所有，仿制必究；还在一道虚线下印着：由此处撕开。

在哪些地方都可以买到汽水粉呢？不仅在我们家的店里，在任何一家殖民地商店里（除去皇帝咖啡食品店和日用品商店之外）都可以买到汽水粉。一袋汽水粉的售价是三芬尼——在那里和所有的饮食店都一个价。

买汽水粉我和玛丽亚是不花钱的。只是当我们等不及回到家里的时候，才不得不到殖民地商店或饮料店去，花上三芬尼，甚至六芬尼买两包喝，因为我们总是喝不够。

是谁用汽水粉开的头？恋人之间总是在争论这个问题。我说，玛丽亚先开的头。玛丽亚却从来不说是我先开头的。她总是不声不响，如果问急了，她说：“汽水粉先开的头。”

当然，也许人人都认为玛丽亚说的有理。惟独我认为这样推诿是毫无道理的。从来我都不会承认，一袋售价三芬尼的汽水粉怎么会引诱的了。我已经十六岁了。必要的时候，我自己能承担责任，或者把责任推到玛丽亚身上，但决不会推到汽水粉的身上。

事情在我过完生日后没有几天就开始了。从日历上看，游泳的季节已经结束。可是从天气看，根本不像是已经进入九月。阴雨霏霏的八月过后，烈日大耍威风，秋老虎的厉害从钉在浴场管理员小屋上的救生协会布告旁的黑板上就可以知道了——气温：二十九度；水温：二十度；风向：东南；天气形势预报：以晴为主。

巴黎、哥本哈根、奥斯陆和布鲁塞尔的明信片是空军中士弗里茨·特鲁钦斯基寄来的。他一直在出差旅行。玛丽亚和我在这段时间里被太阳晒成了棕褐色。我们在七月份一直坐在家庭浴场

的帐篷前面。玛丽亚由于康拉德学校的学生的胡闹和佩特里中学的一个学生没完没了地表白爱情，有点受不了了。我们离开家庭浴场的时候已到了八月中旬，而后在妇女浴场靠海处找到了一个特别清静的小小地盘。肥胖的女人呼吸气喘吁吁短促的如同波罗的海的海浪。她们站在海潮中，海水刚没过她们膝盖。全身赤裸、不懂规矩的小淘气们用沙子堆城堡，堆一回就被海水冲垮一回，好像是在水里同命运搏斗一样。

这里被称为妇女浴场。当然，妇女们就会认为在这样的场所是会有人窥视她们的，可是，一个年轻男人，譬如说我当时就是一个掩盖了本相的年轻男人，我应该闭上眼睛，免得情愿的成为不受拘束的妇女暴露体态的目击者。

玛丽亚穿着红边绿色游泳衣，我穿着蓝色游泳裤。我们躺在沙滩上。沙和海在睡觉，贝壳都被踩碎了，它们没在偷听。永远醒着的琥珀，只是别处才有。根据黑板上所写的来自东南方的风，也慢慢入睡了。广阔的天空，不停地在打呵欠，肯定是疲劳过度了。玛丽亚和我也有些困乏了。我们在游泳之后吃了些樱桃，而后将那些湿的桃核扔到海滩上，与往年那些已变得又轻又白的干的樱桃核混在一起。

看着眼前的景象，我情不自禁地抓起一把掺有刚吐出的以及有一年或千年之久的樱桃核沙子，撒到我的鼓上，于是它化身为沙漏，同时，又玩起骨头来，设想自己扮演着死神的角色。我想象着在玛丽亚温暖的、熟睡的皮肉下面那肯定清醒着的骨骼的某些部分，享受着在她的尺骨与桡骨间进行透视的乐趣，顺着她的脊骨来回做计数游戏，穿过两个髂骨窝进去，拿她的胸骨来作乐。

我玩弄着沙漏消遣，玛丽亚全然不顾我的乐趣。她伸手抓游泳包，然后在里面瞎摸寻找着什么，而我则将手中剩余的沙子和最后几颗樱桃核撒到已经有一半蒙上了沙子的鼓上。玛丽亚可能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要找她的口琴，因为没找到，她把游泳包倒过来，而后掉到浴巾上的竟是一袋车叶草汽水粉，而不是她的口琴。

玛丽亚的样子让人感觉她很吃惊，或许是真的令她意想不到。不过，到是真的令我出乎意料。我过去这样讲，我今天仍旧这样讲：这种只有工人和装船工的孩子由于没钱买真正的柠檬水喝才去买的便宜货，滞销货的汽水粉，是什么时候，又是怎样跑到我们的游泳包里的呢？

当我还在苦思冥想这个问题的时候，玛丽亚说口渴了。我也只好暂停思索，表示我也很渴。可是，我们没带杯子，而且走到有饮用水的地方去的话，玛丽亚至少要三十五步，我至少也需走五十步。如果打算到浴场管理员那里借一只杯子，再去接管理员小屋旁的自来水，那就得忍受沙滩烫脚之苦穿过或仰卧或俯卧、尼韦阿油油光锃亮的肉山。

因为这段路我们两个都不愿走，所以我们谁也不去捡浴巾上那袋汽水粉。不过最后，在玛丽亚想要把它拿起来之前，我把它拿到了手里。可是，我又把它放回到浴巾上，好让玛丽亚能够拿到它。玛丽亚不伸手。于是，我又把它拿了起来，交给玛丽亚。玛丽亚把它还给我。我表示感谢，又给她送还回去。但她不想接受我送的礼品。我只好又把它放回到浴巾上。

我敢肯定，玛丽亚在经过了难以忍受的间歇之后，拿起了这袋汽水粉。并且，她顺着下面印有“由此处撕开”的虚线，撕下了一小条。然后，她把这个撕开的小口袋向我递过来。这一回，我拒绝了她，算是把玛丽亚得罪了。她二话不说，把打开的小口袋放回了浴巾上。我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又把它拿起来，递给玛丽亚，以防海滩上的沙子掺进去。

于是，玛丽亚将一个手指从小缝中伸进去，伸出来的时候指尖上沾了些蓝白色的汽水粉。她把手指头伸向我。虽然汽水粉的味道直冲鼻子，但我的脸上却装出味道很好的样子欣然领受。玛

丽亚摊开了手掌，我没有办法，只好撒一些汽水粉在这粉红色的碗里。她看着这一小堆粉，不知如何是好。她觉得自己手心里的这座小丘很新奇。于是我探过身子去，吐了口唾液在汽水粉上，接着又来一次，随后就因为吐不出来唾液而把腰直了起来。

玛丽亚掌心里的车叶草开始像火山爆发似的发出滋滋声并泛起泡沫。我不知道是哪一国的人民在那儿发怒。玛丽亚遇到了她从未见过、从未感觉过的事情，她的手在抽搐，在颤抖，因为车叶草在咬她，钻进了她的皮肤刺激了她，所以她想溜走。

玛丽亚的脸变红了，车叶草的颜色也逐渐变绿了。她把手放到嘴边，伸出舌头去舔掉她手心里的东西。她舔了好几次，无可奈何，我差一点以为她的舌头平息不了刺激她的车叶草。当车叶草被平息后，玛丽亚呵呵地笑着四下张望，看看有没有人看到刚才的情景。她见到四周麻木不仁地躺着一片穿游泳衣的、气喘吁吁的海牛，涂满尼韦阿油呈棕褐色。于是，她倒下躺到白色的浴巾上，她脸上的红晕在白色浴巾的衬托下，慢慢消失了。

那天中午浴场的天气要不是因为玛丽亚在短短半小时以后又起来拿那半袋汽水粉的话，我早已被催眠了。她左手拿着纸口袋，右手摊开，像一只粉红色的小碗，一动不动地对峙了一会儿，相当于别人擦一擦眼镜所需的时间。我不知道，她在把剩余的汽水粉倒到手里之前，内心是不是在斗争。她的目光既不对着纸口袋，也不对着她的掌心，也不在口袋和空的手心之间徘徊，玛丽亚乌黑的眼睛目光严肃，透过纸口袋和她的手。但是，她那严肃的目光挡不住半空的纸口袋。纸口袋和手掌凑到一起，使玛丽亚的目光失去了严肃，变得好奇，最后变成贪婪。玛丽亚装得若无其事，把剩余的车叶草汽水粉倒在窝成碗状的手心里（尽管炎热，她的手没出汗，是干的），在扔掉了纸口袋的同时，也把镇静的假面具撕下了。用空出的手托着满握的手，灰色的眼睛还瞧了一会儿汽水粉，随后瞧着我，朝我投来灰色的目光中带着祈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求。她要我的唾液，她为什么不用自己的，我可是没有了，她肯定有，她能不能用自己的呢？她的唾液虽不说比我的好，但也是不相上下，不管怎样我不能那么快又弄出唾液来，更何况她岁数比我大，唾液一定比我多。

我的唾液出来了，可玛丽亚明摆着一定要我的唾液。她的目光一刻也不离开我，仍旧在向我提出这一要求。她这样一步不让，我认为是她那长在肉上的耳垂的罪过。于是，我连连地咽着，想象着平日会使他嘴里生津的东西。可是，我的唾液腺不灵了，这只怪那海滨的咸空气。在玛丽亚的目光的要求下，我只好站起身来，朝浴场管理员的小屋走去。我不敢四处张望，在滚烫的沙上走了五十多步，登上更烫的台阶，到了小屋旁，拧开水龙头，歪过头张开嘴，喝着，喷着，咽着，直到唾液腺又恢复了功能。

虽然周围的景象可怕，让人觉得这段路似乎没有尽头，但我还是从浴场管理员的小屋回到了我们的白色浴巾旁，但见玛丽亚环臂抱头，辫子歪斜在圆乎乎的背上俯卧在那里。

我走过去推了她一下，可是她一动也不动。我又推了她一下。因为我现在有唾液了，可是她却不要。我慢慢地小心地掰开她的左手。手被掰开了：空的什么也没有。仿佛它从未见过车叶草似的。我掰开她的右手，是又湿又热，掌心的条条平纹清晰可见，显然也是什么都没有。

是她迫不及待用了自己的唾液，还是她把汽水粉吹走了，并在浴巾上擦干净自己的手，直到她那熟悉的好像月亮山、肥胖的水星和绷紧填实的金星环的小手心又露了出来？

那天，随后我们就回家了，我永远不会知道玛丽亚是不是第二次让汽水粉泛起了泡沫，或者用我的口水搀和汽水粉成为她和我的一种恶习，而在若干天之后故技重演。

从浴场回来的那天晚上，我们喝着乌饭树紫黑浆果汤，吃着

油煎土豆饼，听着马策拉特唠唠叨叨地说他所在的那个地区党部内成立了一个施卡特俱乐部，他也加入了，新牌友都是支部领导人。新任的地区党部领导人塞尔克有时也来，单凭这一点每周两次到施普林格饮食店去聚会，他就一定得去，所以只好让我们两个自己待在家里了。他还说，如果碰到他晚上去打施卡特时，我最好到特鲁钦斯基大娘家去过夜。特鲁钦斯基大娘理所当然同意，她觉得这个办法比马策拉特头天背着玛丽亚向她提出的建议要强得多。换句话说，让玛丽亚每周两次来我们家，睡在沙发上，我就不去特鲁钦斯基大娘家过夜了。

玛丽亚以前睡的宽大且笨重的床放在了较小的后屋，它原先是我的一个背上有许多伤疤的朋友——赫伯特的卧床。特鲁钦斯基大娘的床在卧室里。古丝特·特鲁钦斯基一直都在埃登饭店的冷餐柜台当服务员。她住在饭店里，假日偶尔也回来，但很少在家过夜，万一过夜的话，在沙发上睡。如果弗里茨·特鲁钦斯基从远方回来休假，这位休假或出公差的军人便睡在赫伯特的床上，玛丽亚则睡到特鲁钦斯基大娘拿沙发当床铺的床上。

我的要求打乱了这种固定的格式。开始是要我睡在沙发上的。我干脆拒绝了这一无理要求。于是，特鲁钦斯基大娘让我睡在她那老太婆睡的床上，宁可自己在沙发上睡。这时，玛丽亚提出异议，她不愿意因为不舒适而使自己年迈的母亲夜里睡不踏实，并直截了当地说，她愿意同我一起睡在赫伯特以前睡的床上。她说：“奥斯卡占不了多少地方，我和他睡一张床。”

就这样，接下来的那个星期，玛丽亚开始每周两次把我的睡具从底层我家屋里抱到三层楼上，在她的左侧替我和我的鼓弄了个过夜的地方。在马策拉特去打施卡特牌的头一夜，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我觉得赫伯特的床很大。我躺下后，玛丽亚稍后才来。她在厨房里洗了澡，穿了一件式样旧而发硬、长得可笑的睡衣走进卧室。我本以为她会光着身子进来，因此特别失望，继而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却又很满足，因为这是曾祖母传下来的睡衣，使我联想起护士带褶皱的白衣。

玛丽亚站在五斗橱前一边吹着口哨，一边解她的辫子。每当玛丽亚穿衣或者脱衣，解或编辫子时，她总要吹口哨。即使在梳头时，她也总要不不停地从嘴里吹出两个音来，却不是吹出一个曲调。

口哨声随着梳子的放下而中断。玛丽亚转过身，摇了摇头，便很快把五斗橱上的东西收拾好，井井有条使她感到欢喜，于是向黑檀木框里她的大胡子父亲的照片来了一个飞吻，用很大的力量纵身一跳，躺到了床上，上下弹了好几回，最后一次弹起时，她抓住羽绒被，钻了进去，从而使下巴颏以下的身子全都消失了。然后，把圆圆的胳膊从羽绒被下伸出来，寻找自己头顶上拉灭灯的绳子，根本不碰躺在她身旁盖着自己的羽绒被的我。找到了，卡啪一声关了灯。然后，在一片黑暗之中，她用很大的声音向我说了一声：“晚安！”玛丽亚的呼吸很快就均匀了。她不可能装成这样，的确是睡着了，因为她白天干活很卖劲，所以晚上睡得踏实。

我却迟迟不能入睡，我的眼前浮现了一幅画面，驱走了睡意。尽管窗上的挡亮纸和四壁如此漆黑，我仍然见到金发的护士站在赫伯特满是伤疤的背后，见到舒格尔·莱奥起皱褶的白衬衫——因为它就在近旁变成一只海鸥，它飞啊，飞啊，在一道公墓的墙上撞了个粉碎，使这道墙看上去像是新粉刷过似的。当一股愈来愈浓且使人困乏的香草味使这些画面闪烁不定，时隐时现，最后消失时，我才像玛丽亚呼吸均匀，进入梦乡。

三天以后，玛丽亚同样重复给我表演了一次少女上床的过程。她穿着睡衣进来，吹着口哨解辫子梳头，放下梳子，停顿口哨，整理五斗橱上的东西，向照片掷去一个飞吻，过分使劲地一跃上床，上下弹几回，抓住羽绒被，看见我瞧着她的背脊欣赏着

她那美丽的长发。这时她发现在羽绒被上有样绿色的东西，于是我把眼睛闭上，决心等她慢慢习惯看到眼前这包汽水粉；这时，只听卡啪一声。当我因为这卡啪声睁开眼睛时，我证实了我所料的事情：玛丽亚已关上了灯，从而她还是习惯于见到这包汽水粉，在黑暗中不均匀地呼吸着；可见，在由玛丽亚制造的黑暗中，想要增加汽水粉的分量，使黑夜搀上苏打发酵的气泡，是不太可能的。

黑暗是站在我这边的，我这样认为。因为在短短几分钟之后我觉得床头有动静；玛丽亚在拉那根绳子，紧接着，我又能欣赏坐着的玛丽亚那睡衣上美丽的长发了。带褶的灯罩下电灯泡均匀的黄光照亮了屋子。羽绒被仍然叠得好好的鼓鼓囊囊的放在脚那头，没有动过。床上的小纸袋在方才的黑暗中也不曾被动一下。玛丽亚祖传的睡衣沙沙响，睡衣的一只袖子连同里面的小手一齐抬起来，我的嘴里已准备好了口水。

在此后的几个星期，我们两个弄光了一打以上多半是车叶草味的汽水粉。最后，车叶草味的弄光了，便换成柠檬和草莓味的。方法始终是一个——我用口水，这助长了一种滋味，而玛丽亚也越来越懂得品尝这种滋味了。我做了一些积口水的练习，使用一些妙法，使口水又多又快地流到嘴里来，并能够接连三次，每次间隔很短的时间，使小口袋里的汽水粉增添了玛丽亚所渴求的滋味。玛丽亚对我非常满意，有时把我搂在怀里，并在受用了汽水粉以后亲吻我的脸，甚至两回地亲我。熄灯之后，在她睡着之前我还听到她呵呵地笑了一阵。

可是我却难以入睡。我已经十六岁了，思想活跃，需要驱走睡意，想一种使我对玛丽亚的爱同别的、更令人惊异的方法结合在一起，而不要老是用汽水粉加我的口水。

我不仅在关灯以后思索，而且白天，我也边敲边思索，并且翻阅那本被我读烂了的关于拉斯普庭的书的选段，回想早年在格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蕾欣·舍夫勒那里上课时她同我可怜的妈妈之间的放荡行为。并且也拜访歌德，因为我不仅有拉斯普庭的，而且有歌德的《亲和力》的选段。于是，我接受了那位信仰治疗家的性欲冲动，并用这位诗国王侯的包容全世界的自然感情加以稀释。在我看来，玛丽亚忽而貌似女沙皇，兼有公爵夫人安娜斯塔西亚的特征，忽而又像是从拉斯普庭的贵族追随者中挑选出来的贵夫人，在兽性使我感到厌恶的情况下，我眼里的玛丽亚忽而又如奥蒂莉一般像天空似的透明，或者藏身于夏绿蒂高雅的、控制着的激情背后。在我的眼里，我自己也在变换，先是拉斯普庭本人，谋害他的多是变成上尉，很少变为夏绿蒂的无常的丈夫。有一回——我得坦白交代——竟成为一个具有人人熟悉的歌德的外形并成为沉睡的玛丽亚上方飘浮着的天空。

奇怪的是，我从文学中比从赤裸裸的、真实的生活中得到启发更多。譬如说扬·布朗斯基，过去我经常看到他对我妈妈动手动脚，可他却教不会我什么。虽然我知道妈妈和扬，或者马策拉特和妈妈，轮换着抱成一团，末了无力地低吟，黏黏糊糊地分开，而这就意味着爱，可是我一直不情愿相信这种爱是爱，并想从这种爱里找出另外的爱来，但一再想起的却是这种抱团的爱，而且把它当做爱去实践，并将它视为惟一可能的爱加以维护之前，一直憎恶这种爱。

汽水粉一开始起泡沫，躺着尝汽水粉的玛丽亚的两条腿就习惯性地抽搐和踢蹬开了。所以，她好几次一尝到味道，睡衣已经向上滑到了大腿根。汽水粉再次起泡沫时，它就爬到了肚皮上方，卷起到乳房下面。我有好几个星期之久，一直把汽水粉倒在她的左手上，但这夜，我没有考虑到要事先去读一读歌德或拉斯普庭，便自做主张地把草莓汽水粉小口袋里剩余的部分倒在了她的肚脐眼上。我的口水在她还没来得及抗议时，就已经向那上面流去，而玛丽亚这个火山口开始沸腾之后，因为沸腾的、泛起泡

沫的肚脐眼比空手心更有优点，就失去了提抗议所必需的理由。虽然汽水粉没变，我的口水没变，味道也没变，只是浓得多。越来越浓的味道使玛丽亚再也忍不住了。她向前探过身子去，一如她过去消灭手掌上的车叶草一样，想用舌头去扑灭她的肚脐眼小罐里泛泡沫的草莓，但是她的舌头不够长；她的肚脐眼距离她的舌头比亚洲或者火地岛更遥远。但她的肚脐离我很近，我便伸舌头过去，寻找草莓，并且找到的也越来越多，我就这样在采集的时候迷失了方向，到了一个没有护林人问你要采集执照的地方，我感到有义务采集每一个草莓，我的眼睛、思想、耳朵和心里只有草莓，由于我如此专心致志地采集草莓，我只是顺带对自己说：玛丽亚对你这样努力地采集感到很满意哪！因此，她把灯关上了。她放心地睡着了，并因为她身上有许许多多的草莓允许你继续去寻找。

当我再也找不到草莓的时候，我十分意外地在另一个地方找到了深藏在苔藓下面的蘑菇，我的舌头及不到，于是，因为我那十个指头同样派不了用场，我让自己长出了第十一个手指。于是，我获得了年头已经够派这种用场第三根鼓棒。我不敲鼓，而是敲苔藓。我完全搞不清楚了；是谁在敲？这是谁？苔藓是谁的？苔藓和第十一个手指是属于别人的，而只有蘑菇是我的吗？下面的这个小先生有他自己的头脑和意志吗？这一切都是谁干的？

玛丽亚下半身醒着，上半身睡着，无害的香草和苔藓底下的味道强烈的蘑菇，都要汽水粉，不要这个甚至我也不要，已经宣布独立自主了的小先生，他证明自己是聪明的，他吐出的东西，我从未灌给他，我躺下的时候他站着，他做着与我不同的梦，他既不会念书也不会写字，却替我签了字，他直到现在还自作主张，他从我感觉到他的那一天起，就同我分开了，他是我的敌人，而我只能一再同他结盟，他背叛我，他看不见任何东西，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能嗅到一切，在我危难时舍弃不顾，我想背叛并出卖他，我为他感到惭愧，他厌烦我，我替他洗澡，他却把我弄脏，对我来说，他是个陌生人，我真想用“您”称呼他，他的记忆力与我完全不同。因为今天，当玛丽亚走进我的病房，看护布鲁诺细心周到地退避到走廊上去时，他再也认不出玛丽亚来了，不想，也不能，至多是冷淡地摆着吊儿郎当的姿势。相反，我的心激动万分，结结巴巴地说道：“玛丽亚，认真听听这些多情的建议吧：我可以买一个圆规，在我们周围画一个圆。我能用过同一个圆规，在你缝补、阅读或者像现在这样拧我的手提式收音机的钮时量你的脖子的倾斜角。听听这些温柔的建议吧：我可以让人给我的眼睛打预防针，让它们再次流出眼泪来，别再弄收音机了。我可以到就近的肉铺里把自己的心放在绞肉机里绞，要是你的灵魂也这么被你绞死的话。我们可以买一只剥制的动物，让它安静地待在我们俩之间。当我下决心去掘虫子，而你有耐心的话，我们就一起去钓鱼，使我们更加开心。或者去买当年的汽水粉，你记得吗？你把我叫做车叶草，我起泡沫，你要了又要，我把剩余的都给了你——玛丽亚，汽水粉，多情的建议！你为什么像对特别新闻有一种狂热的渴念一样，现在还只听收音机，不停地指他？”

特别新闻

我的铁皮始终只需要同样的木头。在我那面鼓的白色圆面上是做不好实验的。它愿意被人家敲击着提问，让它回答，或者在急速敲击下漫无边际地闲聊，把问题和回答都闲置一边。所以，我的鼓既不是经人工加热后可以把生肉吓得魂飞魄散的煎锅，也不是可以供未知能否终成眷属的舞伴翩翩起舞的舞池。因此，甚至在最孤独的时候，我也不把汽水粉撒到鼓上，再积聚口水流上去，让那出多少年来再没有看到过的戏重演。但我又是多么惦念

它呀！说实在的，我不能彻底放弃用上面所说的粉末做实验，可是，我宁愿自己直接去做，而不愿让鼓来捣乱；因此，我就会因为没有鼓而一直丢人现眼。

我要是想弄到很难搞到的汽水粉，就要派布鲁诺跑遍伯爵山所有的殖民地商店，让他乘电车去格雷斯海姆。我也请他到城里去转一转，可是，即使在电车终点站可以找到的那种冷饮店里，布鲁诺也买不到汽水粉。年轻的女售货员从来没听说过，年纪较大的冷饮店老板回忆起来话就多了，据布鲁诺讲，他们搓搓额头沉思着说：“伙计，您要什么？汽水粉吗？这是哪个年代的东西啦！在威廉时代，在希特勒时代的头几年，还出售这种玩意儿。现在早已过时了，还是要瓶果汁汽水或可口可乐吧！”

布鲁诺除了我需要的东西没买之外，用我的钱买了好几瓶果汁汽水和可口可乐喝。不过，他还是帮了我的忙。布鲁诺一点也没放弃，昨天他带给我一个没有印字的白色小口袋。一位名叫克莱因的疗养与护理院的女化验员，对此表示了充分的理解，愿意帮忙，并把参考书摊开，打开抽屉和瓶瓶罐罐，每种东西取几克，经过多次试验，终于配制成了会起泡沫，有刺激性，会变绿，并且有车叶草味的汽水粉。

玛丽亚会在探望日的今天来，但第一个来的是克勒普。我们一起就一些不堪一提的事情笑了三刻钟之久。我想方设法不让克勒普以及他的列宁主义者感情冲动起来，便回避现实问题，只字不提我从玛丽亚在几个星期以前送给我的手提式收音机听来的，关于斯大林逝世的报道的特别新闻。不过，看来克勒普一定是知道的，因为他的棕色方格纹大衣袖上缝着很不像样的黑纱。接着，克勒普站了起来，维特拉进屋。看来这两位朋友又要因为维特拉笑着向克勒普打招呼，并把手指弯曲成魔鬼头上的角那样争吵了：“我今天早晨刮胡子的时候，被斯大林去世的消息吓了一跳！”他嘲讽着帮克勒普穿大衣。克勒普香脂抹得发亮的宽脸上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露出虔诚恭敬的表情，抬起手臂，晃了晃大衣袖子上的黑纱。“就因为这个我才戴黑纱。”他叹息着模仿阿姆斯特朗的小号声，哼起了最初几小节具有新奥尔良功能的哀乐：特拉——特拉哒哒——特拉——哒哒——哒哒哒……然后，他滑着舞步出了房门。

维特拉不想坐，只是站在镜子前面蹦跳着留了下来。我们两个会心地相对微笑了约一刻钟，但和斯大林无关。

我不明白自己这样做是想把他赶走还是要向他吐露秘密。我招手叫他到床前凑过耳朵来，对着他的大耳垂的耳朵低声说道：“你知道什么是汽水粉吗，戈特弗里德？”维特拉惊恐地从我的栏杆床旁跳开；他立即做起他的拿手好戏来，用食指指着我，以激动的腔调说：“魔鬼啊，你为什么要用汽水粉引诱我这个天使？”

天使般的维特拉，先照了照洗脸盆上方的镜子，然后翩然离去。疗养院外面古怪的年轻人，都喜欢装腔作势。

玛丽亚让裁缝做了一套时尚的春装，配上一顶时新的带有精致的稻草黄的装饰物的鼠灰色帽子，她即使进了我的病房也不肯摘下这件艺术品。她草草地问候了我一声，我要吻她的脸颊，她拒绝了，然后打开了那只虽说是她送给我的，但看来完全是为了她自己派用场的手提式收音机，因为每逢探望日，这只讨厌的手提式收音机总要取代我们之间的一部分谈话。“你听今天早晨的广播了吗？真叫人激动。”“是这样，玛丽亚，”我耐心地回答说，“他们连斯大林的死讯都不想对我保密，但你还是关了收音机吧！”玛丽亚什么都没说地照办了。她一直戴着那顶帽子不声不响。于是，我们如以往那样谈起小库尔特来了。

“你看怎么办，奥斯卡，现在还只是三月份，广播里说天气还会变冷。那个小淘气已经不愿再穿长统袜子了。”我只当没听见天气预报，并在是否穿长统袜子事情上，帮小库尔特说话。“这孩子现在十二岁了，他穿长统袜子上学会难为情，因为他会被同学取笑的。”

“但我更关心他的健康，他得穿长统袜子到复活节。”她十分肯定地说。我只好作出让步：“那你给他买条滑雪裤，羊毛长统袜子实在不好看。你想想你在他那个年纪的时候。在拉贝斯路我们的院子里的小矮个儿总是穿长统袜子到复活节，当年他们是怎么对待他的？努希·艾克，死在克里特岛，阿克塞尔·米施克，战争快结束时死在荷兰，还有哈里·施拉格尔，他们用柏油涂在羊毛长统袜上，结果袜子同皮肤粘在一起，小矮个儿住院了。”

“这不关长统袜子的事，是苏西·卡特的过错！”玛丽亚生气地大声说道。虽说比玛丽亚大几岁的苏西·卡特在战争刚开始就当女通讯兵，后来在巴伐利亚同人结了婚，可是，玛丽亚对她始终怀着宿怨。只有女人才能把少年时结下的仇恨一直记到当老祖母的时候。然而，我提到小矮个儿那双被人涂了柏油的羊毛袜起了作用。玛丽亚答应给小库尔特买一条滑雪裤。我们的小库尔特还有些好消息。在最近一次家长会上，校长克内曼表扬了他。“他是全班第二名，他还在店里帮了我的大忙。”

我在点头表示赞许后还听她说了些这段时间为美味食品店购置的东西。我鼓励她在上卡塞尔再开一片分店。我听收音机里说，现在时机特别好，市面将继续保持繁荣。接下来，我认为时机已到，便按铃叫布鲁诺进病房，给我拿来一个白纸袋汽水粉。

我经过周密的考虑制定了这个计划。我什么都没解释，就请玛丽亚把左手伸给我。她摇着头笑，把左手背伸到我面前，可能是以为我会吻她的手背。我把她的手翻转过来，把纸袋里的粉末倒在她手心里的月亮山和金星册之间时，她才用惊讶的眼光看着我。但是她还是同意了我的做法，但当我把身子探过去，把满口的唾沫流到这座汽水粉的山头上去时，她开始感到害怕。

她气得一跃而起，退后几步，吃惊不已地盯着这正在发酵的、起绿色泡沫的粉末大叫道：“别胡闹，奥斯卡！”玛丽亚的脸从额头开始慢慢涨得通红。她在我正以为有希望的时候，三大步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迈到洗脸池旁，用先是凉的、随后是温和的讨厌的水，把我们的冲掉了然后用我的肥皂把她的手洗干净了。

“你有时实在叫人无法忍受，奥斯卡。明斯特贝格先生会怎么想我们？”她为了替我请求宽恕，眼睛望着在我做实验的时候一直站在我的床脚旁的布鲁诺，为了使玛丽亚不会再感到害羞，我只得把护理员打发走。刚锁上房门，我就请玛丽亚再次到床前来：“你不记得吗？”你回忆一下吧！汽水粉！一小包三芬尼！有车叶草味的，草莓味的，发酵，起泡沫，多奇妙啊！还有感情，玛丽亚，感情！”

已经忘掉了这一切的玛丽亚傻乎乎地害怕起我来，身子有点发抖，把她的左手藏了起来，害怕地把刚才的话题又重复一遍，我却一直没有离开谈汽水粉。她站起身来，匆匆告别，戴上帽子，却欲走还留便把收音机打开了。我放开嗓门，用压过收音机的嘈杂声的嗓音喊道：“汽水粉，玛丽亚，再回忆一下吧！”

这时，她站在门口，哭泣，摇头，把我一个人和这台嘎吱吱响的手提式收音机留在屋里。她就像离开一个垂死的人似的，谨慎地关上门。

事实上，玛丽亚已经完全忘记了汽水粉。可是，对于我来说，只要我还在呼吸，还在击鼓，汽水粉就不会停止发酵泛沫；因为正是我的唾液在一九四〇年晚夏使车叶草和草莓获得了生命，把感情唤醒后，派我的肉身去寻找，把我训练成香菇、羊肚菌以及其他我不知道名字但仍可享用的蘑菇的收集者。它使我成为十分年轻的父亲，收集和生育；因为到了十一月初已毫无疑问了，玛丽亚有了两个月的身孕，孩子的父亲就是我。

因为玛丽亚同马策拉特的那件事是后来晚得多的时候才发生的，所以至今我还对这一点深信不疑。那是我在玛丽亚那背上布满伤疤的哥哥赫伯特的床上，面对着她的那位上士二哥寄来的军用明信片，然后在熄了灯的房间内，在防空遮光纸和四壁之间，

使熟睡的玛丽亚怀了孕十天之后才发生的。那时，我在我家的沙发榻上撞见了玛丽亚。她只是大口吸着气，并没有睡着；她躺在马策拉特下面。

我从屋顶室思考了一阵之后，脖子上挂着鼓下楼，从门道里走进起居室。他们两个的头都朝着瓷砖面火炉，没有发现我。他们两个没有把衣服完全脱掉。马策拉特的内裤挂在他的膝窝上，长裤则堆在地毯上。玛丽亚的裙子和衬裙一直撩到胸罩以上、胳肢窝以下。内裤缠在她可憎地扭曲着，悬在沙发榻外的右脚上，她左腿弯曲，好像不感兴趣似的，搁在靠背垫上。马策拉特在这两条腿之间。她的头被他的右手扭向一边，另一只手在做手脚。玛丽亚呆滞的目光从马策拉特叉开的手指间投向一侧的地毯，好像跟踪着地毯上的图案一直望到桌子底下。他咬住一只丝绒套垫子，只有当他们两个说话时，才松开牙齿不再咬那丝绒。他们时断时续地说话，却没有中断。他们只是当时钟敲响三刻钟时，才停顿，时钟一敲罢，他又像敲钟前那样继续下去，并说：“现在是三刻。”接着他问她这样行不行。她连声答应，还要他留点神。他应允会小心。她恳求他这次得特别注意。接着他问她，是不是马上到时候了。她点点头。这时，她悬在沙发榻外边的那只脚抽搐了一下。她一脚踢了个空，内裤还留在上面。他再次去咬丝绒套垫子，而她嚷：“滚开！”他也不想滚开，但因为在他滚开之前，我骑到了他们两个上面，把鼓放到他的腰上，抡起鼓棒用比她的声音更响的声音敲铁皮，我无法忍受他滚开，就像扬·布朗斯基以前经常从妈妈身边滚开那样；妈妈过去也总是对扬说“滚”，对马策拉特也说“滚”。然后，他们分开了，他们朝专用的毛巾上甩鼻涕，要是毛巾不在手头，就甩在沙发或地毯上。但我看不下去。不管怎样，我没有滚开过。我是第一个没有滚开过的人，所以，我父亲不是那个直到最后也相信，他是我父亲的马策拉特而是扬·布朗斯基。我得到扬的遗传，我抢在马策拉特之前做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玛丽亚孩子的父亲，出来的是我的儿子，不是他的儿子！他根本就没有儿子！他从来不是真正的父亲！即使他同我可怜的妈妈结婚十次，或者娶了玛丽亚！因为她已经怀孕了。他想，公寓里的和这条街上的邻居一定会这样想，马策拉特把玛丽亚的肚子搞大了，四十五的他娶了十七岁的她。就她这个年龄来说，她可真是能干人。而我会因为有了这么个后娘而开心的，因为玛丽亚对待我，倒像一个真正的母亲并不像后娘似的，虽说我脑筋不十分清楚，原本应被送进银锤陆军医院或者送进塔皮奥疗养院去的。

马策拉特在格蕾欣·舍夫勒的劝告下决定娶我的情人玛丽亚。如果我把我的假想之父称为父亲的话，我就必须承认以下事实：我的父亲娶了我未来的妻子，把我的儿子库尔特叫做他的儿子库尔特，他还要我承认我儿子是我的同父异母的弟弟，还要我把我所爱的、散发出香草味的玛丽亚当作继母，并容忍她躺在他那充满鱼子臭腥味的床上。但如果我证实了，这个马策拉特是一个陌生人，根本不是假想的父亲，不值得你去同情或厌恶，他烧得一手好菜，只因为我那可怜的妈妈把他留给了我，他便勉为其难地顶替了父亲的位子，给我做好吃的，一直照料我到今天，他现在当着众人的面从我手里夺走了最好的女人，而把我变成了一场婚礼以及五个月以后的一次婴儿洗礼的目击者，变成了两次家宴的宾客，而这一切原本都该由我来主持。如果让我来检查这出悲剧的主角，就会发现，这出戏是在主角被别人顶替了的情况下演出的，这出戏会让我感到绝望，因为真正的主角我去扮演了一个本该被删掉的龙套。

在我给我的儿子冠以他外祖父的名字库尔特这个名字之前，我并不想对玛丽亚怀孕期间我如何阻挠按期生育一事保持沉默。

那晚，敲着鼓的我骑在马策拉特汗涔涔的背上，使他无法按玛丽亚所要求的那样小心行事，之后，我又拼命作了夺回我的情人的尝试。

最后，我被马策拉特从他背上摇晃下来，但为时已晚。玛丽亚在他要因此而揍我时袒护我，斥责马策拉特没有成功，未能小心行事。马策拉特像个老年男人似的为自己辩护说，这是她的过错，她本来该满足的但她没有。玛丽亚一听就哭着说，她可不能那么快，三下两下就完事，如果这样，他本该另找一个女人，而不是她，她虽说自己没有经验，但她在埃登饭店工作，对此很在行的姐姐古丝特告诉过她，这么快是不行的，还要她小心，她说，有一种男人只是为了把鼻涕甩出来就完事，马策拉特准是这样的男人，她再也不干了，除非铃铛同时响不可。所以，他本该小心行事，不管怎样也该这样，就那么一点体贴他都不考虑。她说完一直坐在沙发榻上哭。穿着内裤的马策拉特嚷嚷着说他不听再听这种哭哭啼啼的腔调；接着，他又觉得自己不该发火，便对玛丽亚动起手来，把他的手伸到她的裙子下面还光着的地方去抚摸，玛丽亚一下子被惹怒了。

我还从来没有看到过她的脸上出现了红斑，灰眼睛也变得越来越暗了的样子。她骂马策拉特是脓包，马策拉特只好伸手去拿裤子，穿上，把扣子系上。玛丽亚嚷道，他可以拍拍屁股滚蛋了，去找那些同他一样，也是脓包的党支部头头。马策拉特抓起上装，捏住门把说，他现在要去换换胃口了，女人的麻烦事他受够了，如果她真是这样一个骚货，就该去勾引外籍工人或那个送啤酒的法国佬，他肯定要强得多。他心目中的爱情不只是干这种龌龊事情，他现在要去玩他有把握的施卡特牌了。

一下子就只有我和玛丽亚两个人留在起居室里了。她停止了哭泣，沉思着穿衣，吹几声口哨，把内裤穿好。她用很长时间才抚平方才在沙发榻上受了罪的裙子。接着，她打开收音机，专心听着，当报告魏克塞尔河和诺加特河的水位时以及报告完下莫特劳河的水位后，预告播放华尔兹而音乐也开始了时，她又突然把内裤脱掉，走进厨房。我通过听到的她拿盆、放水和烧煤气的声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音断定她要洗澡了。

我为了不去作这种令人感到难堪的想象，集中心思去听华尔兹。我记得我还跟着施特劳斯的音乐敲了几小节的鼓，觉得很好玩。接着，由广播大楼播放的华尔兹音乐突然中断，开始报告特别新闻。关于大西洋战事的消息，我猜对了。多艘潜艇在爱尔兰以西击沉七八艘船，总计若干千吨位。此外，另有潜艇在大西洋击穿了差不多是同样多吨位的船只的船底。海军上尉谢普克或克雷特施马尔中间的一个或者是第三个著名海军上尉指挥的潜艇击沉的吨位数最多，而且还包括或者外加一艘英国的 XY 级驱逐舰，这是最出色的一个。

我差点把在特别新闻后播放的歌曲用鼓变成华尔兹。这时，玛丽亚臂上搭着一条毛巾走进了起居室。她压低声音说：“小奥斯卡，听见了没有！又一是一条特别新闻！要是他们这样干下去的话……”她没有告诉我要是这样干下去的话会怎么样，便坐到了通常马策拉特总把他的上装搭在扶手上的那张椅子。玛丽亚把湿毛巾拧成香肠状，跟着那首英国歌曲相当响地而且正确地吹起了口哨。收音机里的歌声停止以后，她还重新吹了一遍那支歌曲的结尾，那不朽的华尔兹刚响起，她就把碗橱上的收音机关了。她坐下来，把两只小手搁在大腿上，把香肠状的毛巾放在桌上。

此时，除了落地钟的声音越来越大外，起居室的一切都非常寂静。玛丽亚好像在考虑把收音机重新打开也许更好些。但她接着却把额头贴到桌面上的毛巾香肠上，两臂沿膝垂向地毯，开始小声有规律地啜泣。

我心里疑惑着是不是我在这种难堪情况下给她的突然袭击使她害羞。我决定要让她高兴起来，从起居室里溜了出来，走进昏黑的店铺，在小盒布丁和胶水纸旁边找到了一个小口袋，又在半明半暗的过道里看清这是一小包车叶草汽水粉。我对找到了玛丽亚最喜爱的车叶草味汽水粉感到十分高兴。

玛丽亚的右脸在我走进起居室时，还枕在拧成香肠状的毛巾上。她的双臂还如刚才般，不知往哪儿搁才好，在两腿之间摇摆。我从左边走近她时，发现她双眼紧闭，便觉得十分失望。我耐心地等到她的眼皮和有点粘在一起的睫毛一道抬起时，才把小纸袋递给她。但她对这小纸袋和我就像视而不见似的，她没有留意到这车叶草。

我原谅了也许被泪水迷糊了眼睛的玛丽亚。我心里盘算了一下，决心采取更直接的行动。我钻到桌子底下，蹲在玛丽亚略微朝里撇的双脚之间，抓住她的手指尖垂得要蹭到地毯的左手，把它翻转到我能够看见她的手心，接着用牙齿撕开小纸袋，把半包粉末撒在这任我摆布的手心里，把唾沫吐上去。我还在观察粉末刚开始起泡沫的时候，玛丽亚使用力一脚把我踢倒在起居室桌子下面正中央的地毯上。

我忍住疼痛马上从桌子下钻出来站起来。玛丽亚也站起来。我们气喘吁吁地面对面对面站着。玛丽亚一把抓起毛巾，擦干净她的左手，把这一团东西扔到我的脚前。她骂我是该死的脏猪，坏心眼的矮子，神经失常的侏儒，就该送进疯人院去。她说完抓住我，打我的后脑勺，骂我的可怜的妈妈竟然生下了像我这样的一个淘气鬼。我正想向起居室内的和全世界的玻璃叫喊宣战的时候，她把那团比老牛肉还硬的毛巾捅到我嘴里。我的脸一直被她弄到青紫她才放手。这时，我本来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用喊叫声震碎所有的玻璃器皿、窗玻璃以及落地钟指针前面的玻璃罩。但我让一种仇恨代替叫喊占据了我的心。时至今日，我一见玛丽亚踏进我的房间，就会感觉到这仇恨还像是在我的牙齿间咬住的那团毛巾盘踞在那里。

玛丽亚不再整我，一下子变了脸色温和地笑了起来，一伸手又打开收音机，跟着华尔兹音乐吹口哨，一边向我走来，想用我喜欢的抚摩我的头发的方式表示和解。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在她走到跟前后用双拳由下而上打她放马策拉特进去的地方。她在我要打第二下时，抓住了我的拳头，我却一口紧咬住了那个该死的地方，同她一起倒在了沙发榻上。我不想听收音机里的另一条特别新闻，因为一阵哭泣前的剧烈的痉挛使我松开了牙齿。我一动也不动地在玛丽亚身上伏着，她由于疼痛而哭泣，我则由于仇恨和已经变成了昏厥，但没有停止的爱而哭泣。

把昏厥带给格雷夫太太

我和格雷夫互不喜欢。后来，格雷夫给我制造了擂鼓机械，我还是不喜欢他。持久地对某人抱有反感，这要有毅力。虽然他已去世了，但没有毅力的我还是不喜欢他。

蔬菜商格雷夫不信仰土豆和皱叶甘蓝，但对于蔬菜种植却有广博的知识，喜欢摆出一副园艺师、大自然之友和素食者的面孔。不吃肉的格雷夫却非一个真正的蔬菜商。他没有办法像谈农产品那样谈论农产品。“请您看看这种非凡的土豆，”我总能听见他对顾客这样说，“瞧这种丰满的、胖鼓鼓的、反复设计出新形状又是那么清白的果肉。我爱土豆，因为它属于我！”当然一个真正的蔬菜商绝对不会讲这种令顾客难堪的话弄得顾客尴尬不堪的。在土豆地里活到老的我的外祖母安娜·科尔雅切克在土豆收成最好的年头也不会说：“今年的土豆比往年大那么一点。”此外，我外祖母和她的兄弟文岑特·布朗斯基完全靠土豆的收成生活。格雷夫则是用丰收的李子弥补歉收的土豆带来的损失。

他在店铺里的时候定要穿一条绿色围裙。这是可见他事事夸张他脸上堆笑，狂妄而又自以为是地在顾客面前把这条菠菜绿的围嘴儿称为“亲爱的上帝赐予的绿色园丁围裙”。此外，他放弃不了童子军那套玩套儿。虽然他在一九三八年已经被迫把他的团体解散了，也已经让男孩子们穿上了褐衫和合身的黑色冬季制

服，但以前穿制服或穿平民服的童子军还经常定期来看望他们从前的童子军指导。格雷夫则身穿他那条由亲爱的上帝赐予的绿色的园丁围裙，拨弄吉他，同他们一道唱晨歌、晚歌、漫游歌、雇工歌、收获歌、童贞女选歌、本国民歌以及外国民歌。格雷夫终于变成了纳粹摩托队队员，从一九四一年起，他自称是蔬菜商以及空袭民防队员。而且还有两个在年轻人里出了点风头，当上了希特勒青年团的旗队长和分队长的前童子军可以当他的靠山，因此，在格雷夫的土豆窖里举行的歌咏晚会，可以被看做是希特勒青年团地方支部批准的。在延考的训导城堡举办训导班期间，区训导主任勒布扎克也曾请格雷夫组织过歌咏晚会。一九四〇年初，他同一位国民小学教师一起，受委托为但泽-西普鲁士区编一本叫做《大家唱》的青年歌集。这本歌集编得特别好。蔬菜商格雷夫收到一封寄自柏林的、由帝国青年领袖亲笔签名的，邀请他赴柏林参加一次歌咏队长会议的信件。

因此，不仅熟谙所有的歌曲和所有的歌词，还会架帐篷，会点燃和熄灭营火而不致酿成森林火灾的格雷夫是个能干人。他能靠指南针行军到达终点，善于讲趣闻和历险故事，叫得出所有肉眼能看见的星星的名称，通晓魏克塞尔河地区的传说，能做题为《但泽和汉萨同盟》的报告，挨着把骑士团所有的首领以及与他们有关的各种日期列举。但他并不满足，还进而海阔天空地抛弃容易被人听出来的童子军术语讲骑士团的疆域内德意志民族的神授使命。

格雷夫喜欢年轻人，特别是男孩子。他对男孩子的爱远超出他通过唱歌所表达的。他妻子格雷夫太太，很邋遢，总戴着油迹斑斑的胸罩，穿着满是窟窿的长统袜。也许是这个原因逼得格雷夫到强壮的、整洁的男孩子中间去寻找纯洁的爱。格雷夫太太的内衣一年四季都如此肮脏或许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格雷夫太太因为蔬菜商和空袭民防队员格雷夫没有足够赏识她那不加约束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的、呆笨的肥胖身躯而变得邋遢。

格雷夫喜欢经过锻炼肌肉发达强壮的人。他的“自然”是指“禁欲”，而他的“禁欲”是指一种特殊的体育锻炼方法。格雷夫不怕麻烦地锻炼他的身体，让它经受烈日的曝晒和创造性地进行严寒的考验。我可以把玻璃用具有近程和远程效果的歌声震碎，有时也能融化玻璃上的冰花，使冰柱脱落，掉到地上发出清脆的声响，格雷夫则不同，他会用工具攻击坚冰。

每到十二月、一月和二月，格雷夫就用斧头在冰上刨开窟窿。在天还没亮的时候，他就把自行车从地窖里扛出来，用一个盛葱头的口袋裹上斧子，然后骑车经过萨斯佩到布勒森，然后沿白雪覆盖的海滨林荫道朝格莱特考方向蹬去，在布勒森和格莱特考之间停下。此时，天才刚刚有些亮。他推着夹着裹在盛葱头的口袋里的斧子的自行车，越过结冰的沙滩后，在冰封的浓雾迷漫的波罗的海上往前走二三百米远。从岸上望去，无法看清放到自行车，打开盛葱头的口袋取出斧子，可疑地、一动不动地站立了一小会儿，倾听着停泊场上被冰冻住的货轮拉响的雾笛，接着，把短大衣脱掉，做了几下体操的动作。最后，波罗的海上就会因他用斧子均匀而有力的打击而出现一个圆形窟窿。

大约三刻钟后，格雷夫便把他的窟窿弄好了。他出的汗珠从高高拱起的额头上带着咸味蹦进雪里。他动作娴熟地用斧子在冰上凿出一个圆形的深沟，等到这个圆形的两端相连接时，他便把手套一甩，从辽阔的、被确认一直延伸到赫拉半岛甚至延伸到瑞典的冰层中拉出大约二十公分厚的冰块。窟窿里的水因为年代太久远，颜色灰暗，浮满冰碴。窟窿里冒出水汽，吸引着鱼。现在，格雷夫可能钓得到七鳃鳗或者一条重二十磅的鳕鱼。但他却像以往一样，一下子把衣服全部脱掉了。

格雷夫在冬季每周在波罗的海里洗两次澡。每星期三早晨他六点钟出发，六点半到那里，七点一刻把窟窿凿好，动作迅速而

夸张地把身上的衣服脱掉，先用雪搓身体，随后跳进窟窿里叫喊。我有时会听见他在唱“野鹅振翅飞过夜空”，或者“我们爱风暴……”他边唱歌边洗澡，吼叫两分钟至三分钟，后纵身一跃上了冰层，保持着冒着水汽的、熟虾一样红的一团肉，绕着冰窟窿狂奔吼叫不停，容光焕发的鲜明形象。最后，他把衣服穿好，跨上自行车。每次格雷夫都会在八点前赶回他在拉贝斯路的蔬菜店准备营业。

第二次洗澡格雷夫会在星期日由几个男孩子陪着。后来，大家都议论这件事。音乐家迈恩吹响了小号，在整个居民区里把格雷夫的这些事弄得家喻户晓。这些通过小号传播的轶事之一称：冬季里，每逢星期日，格雷夫都由好几个男孩子陪着去洗澡。然后强迫那些男孩子同他一样赤裸着跳进冰窟窿里。见到这些半裸的或者几乎全裸，个个肌肉发达，意志顽强，在冰上嬉闹，互相用雪搓身子的孩子，格雷夫感到十分满意。他禁不住在洗澡前或者洗澡后也常常同他们一起嬉闹，帮某个孩子用雪搓身子，也让这帮孩子帮他搓身子。迈恩说，他曾透过迷漫着的海滨浓雾，从格来特考的海滨林荫道上看到过：格雷夫赤身裸体地唱着歌，吼叫着，把他的两个光着身子的徒弟一把拽到自己身边，举起来，一起驮到身上，像一辆嘶叫着的脱缰的三驾马车狂奔在波罗的海厚实的冰层上。

虽说在布勒森和新航道住着许多姓格雷夫的渔民。但格雷夫是梯根霍夫人，而不是渔民，娘家姓布拉施的莉娜·格雷夫，却是在普劳斯特认识她的丈夫的。那时，格雷夫在那里协助一位有事业心的年轻的副主教管理天主教的学徒协会，而莉娜则因为这位副主教的缘故，每个周末都去教区住宅。根据一张格雷夫太太送给我的至今还贴在我相簿里的照片看。那时，年方二十的莉娜健壮、丰满、快活、舒畅、轻率、愚蠢。她的父亲在圣阿尔布雷希特有一个很大的园圃。她二十二岁时，完全没有经验，只是听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从了副主教的劝告嫁给了格雷夫。她父亲还出钱让他在朗富尔开了一爿蔬菜店，出售由她父亲的园圃按低价提供的蔬菜以及水果，因此不花心思格雷夫也不会拆她的墙角，生意还挺红火。

这爿设在无竞争孩子很多的条件优越的蔬菜水果店，若不是格雷夫有孩子的爱好去发明机械装置的话，本可以变成一个金矿的。但当计量局的官员第三次和第四次去那儿检查蔬菜秤，把砝码没收了，禁止使用这台秤，格雷夫还被迫付了好多罚款，一部分老主顾便不再登门，而到每周一次的集市上去采购。他们认为即使格雷夫店里东西物美价廉，但没有问题检查员是不会去的。

格雷夫没有行骗，这点我肯定。实际情况是，这位蔬菜商把那台大型土豆秤改装了一下，秤出的分量低于实际分量，实际上吃亏的还是自己。所以在战争爆发前不久，他在那台秤里装上了一个能够按照秤出的土豆的分量，分别奏出不同的小曲来，实际上是吃亏的钟琴装置。例如，称二十磅土豆，顾客就能听到一段《阳光灿烂的萨勒河岸》，作为赠品；称五十磅土豆，则放出一段《至死忠诚无欺》；称一公担土豆便能诱使钟琴奏出旋律动人的《塔拉乌的小安娜》。

我很欣赏他这种做法，但并不被计量局接受。莉娜·格雷夫也谅解他的这些怪癖，因为格雷夫夫妇的婚姻美满就在于夫妻两人能够谅解对方的任何怪癖。格雷夫从不动手打他的妻子，也不欺骗她或同别的女人乱搞。他从不酗酒或肆意挥霍，而是一个快活的、衣着整洁的人，在青年人和前来买土豆并听取一段音乐的顾客心目中都是如此。这些顾客因为他的生性好交游且乐于助人而非常喜爱他。

因此，格雷夫若无其事的谅解态度使莉娜变成了体味越发难闻的邋遢女人。当莉娜被那些同他有交情的人叫做邋遢女人时，我看到他总是一笑了之。马策拉特对格雷夫太太十分反感，格雷夫则对着他那双老同土豆打交道后还保养得很好的手呵口气，搓

了搓手对马策拉特说：“阿尔弗雷德，你说的当然没错。这个好莉娜是有点邋遢。不过，我们也有缺点。”当马策拉特依然坚持己见时，格雷夫使用坚决而友好的语气说：“你在某些方面的看法可能是正确的，然而她有一颗善良的心。我了解我的莉娜。”然后，把这场讨论结束。

格雷夫了解莉娜但他并不被她了解。她同邻居和顾客一样，把格雷夫同那些常来找他的男孩子和男青年之间的关系只当做是年轻人对一位虽属业余却倾其全部心血的青年教育家和青年之友的崇拜。

我不是可以被格雷夫激励和教育的那种人。要是我打算长高的话，我也许会长成他那种类型的人，因为就我十三岁的儿子库尔特的瘦高个儿的模样来看，就是格雷夫那种类型，他虽然像我的地方很少，但没有一点与马策拉特相像，和玛丽亚倒是如出一辙。

玛丽亚·特鲁钦斯基同阿尔弗雷德·马策拉特之间那次婚礼的证婚人是格雷夫和回乡休假的弗里茨·特鲁钦斯基。玛丽亚同她的丈夫都信仰新教，所以他们只需到户籍登记处去。马策拉特身穿党的制服念了婚誓。玛丽亚则已经有了三个月的身孕，那时是十二月中旬。

我的仇恨随着玛丽亚肚子的变大而逐渐加深。我并不反对她怀孕。只是因为由我而结的果实今后却要姓马策拉特这个姓，这就夺走了我所指望的继承人将带给我的一切欢乐。所以，当玛丽亚怀孕五个月的时候，我第一次想要给她打胎，自然为时已晚。谢肉节期间，玛丽亚想往挂香肠和肥肉的柜台上方那根黄铜杆上，绑上几条纸蛇和两个大鼻子小丑面具。平时很稳地靠在书架上的梯子，现在靠在柜台上晃动。玛丽亚在梯子顶上，双手在绑纸蛇，我在下面梯子腿旁边，利用鼓棒作杠杆，决定借助我的肩膀把横档撬起来，接着使梯子倾向一侧，使得在纸蛇和小丑面具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中间的玛丽亚声音微弱地大声惊叫，这时，梯子已经在摇晃，我跳到一边。接着，玛丽亚和彩纸、香肠和面具在我身边摔倒。

她只不过扭伤了脚，别处都没受伤，必须卧床休息。她的体形越来越不成样子，不过她没让马策拉特知道她怎样扭了脚。

我在预产期约三个星期也就是第二年的五月才想到第二次给他打胎。她告诉了她的丈夫马策拉特，但没有都说出来。吃饭时，她当着我的面说：“小奥斯卡近来玩耍时挺野，几次捶我的肚子。我妈妈那有空房间，孩子出世前咱们让他去那住吧！”马策拉斯听完这番话后信以为真。其实是跟她所说的情形一点儿也不一样。一个谋杀的念头使我同玛丽亚之间进行了一场遭遇战。

马策拉特把午餐用具洗完，在店铺里装饰橱窗。她在静悄悄的起居室沙发上午休，一只苍蝇在屋里飞，时钟同往常一样，收音机正低声报道伞兵在克里特岛成功降落。我只听到了了不起的拳击师马克斯·施梅林的讲话说，在跳伞着陆并踩上克里特岛坚硬的岩石时，这位世界冠军把脚扭伤了，现在只得同玛丽亚一样卧床休养。施梅林讲起话来平心静气，声调不高不低，随后他讲述那些不太知名的伞兵的事迹我没有听，时钟同往常一样，收音机的声音也很轻，静悄悄的屋子里只可能有一只苍蝇。

我坐在窗前自己那张小板凳上，观察着沙发榻上呼吸很困难，两眼紧闭的玛丽亚的肚子。我郁闷地偶尔敲几下铁皮鼓。她没反应，并且强迫我在同一间屋里随着她的肚子的起伏一起呼吸。这儿还有时钟、夹在窗玻璃和窗帘中间的苍蝇以及以克里特岩石岛为背景的无线电广播。我只看到那个莫名其妙的肚子，只有一个想法：必须弄掉挡住视线的错误的肚子。于是，我站起身来，试着行动。于是，我抄起一个东西朝那肚子走去。我应该给这种恶性膨胀病放点气。于是，我举起刚才顺手操起的物件，在玛丽亚搁在她的肚子上的那双一同呼吸着的小手间寻找一个地方。我现在要作决定了，要不然，玛丽亚会睁开眼睛的。我已经

感觉到自己被注视着，但我仍盯着玛丽亚微颤的左手，虽然我发觉她抽走了有准备的右手，当玛丽亚用右手把我握在手中的剪刀拧走时，我也并没有感到特别吃惊。我还举着空拳站了几秒钟，听着时钟、苍蝇、收音机里报告有关克里特岛的报道到此结束的播音员的声音，随后转过身去，在两点到三点播放的轻音乐开始之前，离开了我们的因为那个填满空间的大肚子而变得狭窄的房间。

两天以后，玛丽亚带着给我买的一面新的鼓，把我带到三层楼上，满屋子散发着代用咖啡和剪土豆味的特鲁钦斯基大娘家。起初，我在沙发上睡，我因担心那床上还一直留有玛丽亚身上的香草味而拒绝睡在赫伯特以前睡过的床上。过了一个星期，我同意把老海兰德扛来的小床放在曾经窝藏过玛丽亚、我和我们共有的汽水粉的床旁边。

我在特鲁钦斯基大娘家，变得冷静了下来也无所谓了。由于玛丽亚怕爬楼梯，我现在看不到那个肚子。因为食品供应状况每况愈下。

我经常坐在那儿看弗里茨·特鲁钦斯基从巴黎寄来的或者带回来的明信片，使我对巴黎这个城市有所了解。特鲁钦斯基大娘递给我一张印有艾菲尔铁塔风景照的明信片。我同意对这个大胆建筑的铁结构进行研究，用擂鼓来表现巴黎，敲出一支我以前从未听过演奏的弥赛特曲。六月十二日，在双子宫这个时辰，我的儿子库尔特出世了。父亲生在木星年，儿子生在金星年。天生多疑，富于想象力的父亲受处在室女宫的水星所主宰；儿子也同样由水星所主宰，但水星却正好位于双子宫，这使他头脑冷静，有进取心。我儿子身上的某些被天秤宫的金星所削弱的我身上的素质被他命宫里的白羊座恶化后，我觉得会有恶果。

特鲁钦斯基大娘心情激动地把这条消息告诉了我：“你想象一下，小奥斯卡，天上的鹤给你带来了一个小弟弟。我已经想过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了，只要不是个以后带来苦恼的姑娘就好！”我几乎没有停止击鼓来再现艾菲尔铁塔和新添加进来的凯旋门的景象。特鲁钦斯基大娘觉得即使摆出一副特鲁钦斯基外婆的面孔，也不会得到我的道贺。不是星期日的今天，她决意要抹上点红颜色，抓起常备的菊苣根包装纸，像抹胭脂似的把面颊搓得色泽鲜艳地出了门，下了楼，去帮助底层那个所谓的父亲。

在骗人的六月。巴尔干半岛的胜利也取得胜利后在东方，有望得到更大的胜利。在那里有一支庞大的军队在挺进。铁路运输繁忙。就连一直轻松愉快地待在巴黎的弗里茨·特鲁钦斯基，也必须踏上方向朝东的征程。这次旅行会持续一段时间，不该把它同前线的休假旅行混为一谈。可我却面对那些光亮的明信片，逗留在温柔的、初夏的巴黎，敲着《三个年轻鼓手》安静地坐着，我同德国占领军没有一点儿关系，所以也用不着担心游击队会把我从塞纳河桥上推下水去。身穿平民服装，带着鼓的我，登上了艾菲尔铁塔，在塔顶，理所当然心旷神怡地享受极目远眺的情趣。尽管身在高处诱我突发死念，但我还是把这种既苦又甜的念头摆脱了。九十四厘米高的我从艾菲尔铁塔上下来时，才意识到自己已经做父亲了。

我想着等我的儿子到了三岁的时候，也给他一面铁皮鼓。我和马策拉特中总有一个人是孩子的父亲。

在广播又一次胜利地结束了一场围歼战的炎热的八月，即斯摩棱斯克那一场战役结束的时候，我的儿子库尔特受洗了。我的外婆安娜·科尔雅切克和她的兄弟文岑特·布朗斯基也被请来参加洗礼，这是因为扬·布朗斯基是我的父亲，不吭声的、脾气越来越古怪的文岑特是我的祖父，所以，他们有非常充分的理由来参加洗礼。所以他们是我的儿子库尔特的曾祖父母了。

邀请他们的马策拉特是不会有这样的推论的。他即使在自己最没有把握的时刻，比方说玩施卡特输得一败涂地以后，也会认

为自己是双重的生身之父和养育之父。我再次见到祖父母也是由于别的原因。这两个可爱的老人已经被德意志化了。他们不再是波兰人，仅仅做着卡舒贝人的梦。他们被人称为第三民族集团的德意志人。此外，扬的遗孀，黑德维希·布朗斯基嫁给了一个波罗的海东岸地区农民同盟拉姆考地方负责人的德意志人。一些法案正在审议中，一旦批准执行后，马尔加·布朗斯基和斯特凡·布朗斯基都得改姓他们的继父埃勒斯的姓。十七岁的斯特凡自愿报名参军，现在在格罗斯博施波尔军训营接受步兵训练，大有希望到欧洲的战争剧院去看戏。我虽然马上就要到可以参军的年龄，却只有待在那面鼓的后边等到陆军或者海军甚至空军需要一名三岁的铁皮鼓鼓手时才会有机会参军。

洗礼前十四天，地区农民负责人埃勒斯坐在双套马车的车座上，身边坐着黑德维希，来到了拉贝斯路开了个头。埃勒斯是罗圈腿，有胃病，根本和扬·布朗斯基没法比。他坐在起居室的桌旁，比他身边的牛眼睛黑德维希矮了一头。他的来访连马策拉特都感到很意外一时不知谈什么好。于是由天气谈到东方发生的种种事情，那里军队紧张地向前挺进，比一九一五年他在那里时顺利，马策拉特回忆着。他们费尽心机地避而不谈扬·布朗斯基。最后我把他们这种回避的打算结束了，做出小孩子的那种滑稽的嘴形，大声呼唤扬的名字。马策拉特硬着头皮替他以前的朋友和情敌说了几句好话和几句发人深思的话。埃勒斯立刻附和，话还挺多，虽说他从来没有见到过他的前任。黑德维希还有些哭泣，泪珠缓缓地从脸上淌下来。最后，她还找到了一番话来结束关于扬的话题：“他可是个好人哪。连苍蝇都不伤一根毫毛的他到了九泉之下一定会害怕的。”

马策拉特听完这些话之后让站在他身后的玛丽亚去取瓶装啤酒，然后问埃勒斯会不会玩施卡特。埃勒斯非常抱歉地表示不会，但马策拉特很有气度，并不计较这位地区农民负责人这样一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个小缺点。他甚至拍了拍埃勒斯的肩膀，表示他愿意和对施卡特牌一窍不通的埃勒斯成为好朋友，此时啤酒已斟到酒杯里了。

就这样，布朗斯基以埃勒斯的身份又来到我们家，带着她那个地区农民负责人和她以前的公公文岑特和他的妹妹安娜一同前来参加洗礼。马策拉特提前站在大街上邻居家的窗户下面亲切地大声招呼这两个老人，进了起居室。当马策拉特看到我的外婆从四条裙子底下掏出洗礼的礼物——一头催肥的鹅来时，又说：“妈妈，没这个必要。即使你空着手来，我也高兴啊。”我的外婆不喜欢听这番话，她要让人家对她养的鹅的评价是怎样的。她把大巴掌摊开，拍了拍这只肥鹅，抗议说：“别大惊小怪的，阿尔弗雷德。这不是卡舒贝肥鹅，是一只吃起来味道同战前一模一样的德意志民族的家禽。”

除了在洗礼前由于我不愿进新教教堂出现的麻烦外，什么民族问题都不存在了。他们把我的鼓拿下出租汽车，用这铁皮鼓来引诱我进新教教堂。而我却坚守我的最忠诚的天主教徒的立场。我宁愿对着维恩克神甫的耳朵作一次简明扼要的忏悔，也不愿去听新教牧师的洗礼布道。马策拉特因害怕我的声音以及由它造成的损失和别人提出的赔偿要求而让步了。于是，在出租车里呆着，观赏司机的后脑勺，打量反光镜里映出的自己的容貌，回想多年以前我自己的洗礼以及维恩克神甫所作的据说能从受洗婴儿身上驱走魔鬼的种种尝试，他们则在教堂里举行洗礼。

聚餐在洗礼之后。他们把两张桌子凑在一起。先上来的是小牛头做的假甲鱼汤以及汤匙和汤盆。乡下来客们咂咂地啜饮起来。格雷夫把小拇指翘起。格蕾欣·舍夫勒边喝边嚼。古斯特端着汤匙咧开大嘴微笑。埃斯勒嘴连喝带说。文岑特手颤着寻找着汤匙没捞到的东西。只有外婆安娜和特鲁钦斯基大娘两位老太太专心致志地喝汤。别人还在喝汤，我便溜到卧室里去寻找我儿子的摇篮，替那些头脑空洞思想干瘪的喝汤人给我儿子思考一些问

题。

浅蓝色的薄绢天宇笼罩在有轮子的摇篮上方。由于摇篮的边沿太高，我起先只看到蓝红色的起皱的东西。我把鼓垫在脚下，以便仔细看看我的儿子了。他在睡梦里神经质地抽搐着。看着孩子，我想不出别的言辞，只想着等他到了三岁的时候，给他买一面铁皮鼓。我的儿子不让我了解他的智力状况。我只好希望他同我一样属于听觉敏锐的婴儿。我因此向他反复许诺，在他三岁生日时给他一面铁皮鼓，然后便从我的铁皮鼓上下来，同起居室内的成人凑热闹。那边，他们刚好喝完假甲鱼汤。玛丽亚端上碧绿的、甜的奶油拌罐头豌豆。负责烤小猪的马策拉特，亲手端上大盘子。他把上衣脱掉，只穿衬衫一片接一片地切着，面对这熟软、多汁的肉做出一副异常温柔使我无法一直看下去的面孔。

格雷夫由于是不吃肉的素食者，所以得到了罐头芦笋、煮得很老的鸡蛋和鲜奶油拌萝卜，可是，他同别人一样，盛了一大匙土豆泥，但不浇肉汁而是浇上盛在一个还在滋滋作响的小钵里，由玛丽亚小心翼翼地从厨房里端来给了他的热黄油。别人喝的都是啤酒，格雷夫杯子里盛的是甜果子汁。他们谈论着基辅围歼战，扳着手指头算俘虏的人数。波罗的海东岸地区的德意志人埃勒斯，在这件事上显得超乎寻常聪明，每数到十万人时他就竖起一个指头，当十个指头都竖起表示有一百万人时，他再一个指头接一个地弯回去，继续计算。俄国战俘由于数目不断增大而变得越发没有价值，越来越没有意思。这个话题他们终于厌烦了，舍夫勒便讲起戈腾港的潜水艇来。马策拉特对着我外婆安娜的耳朵小声说，在席哈乌每周有两艘潜艇从船台下水。格雷夫接着向所有来庆贺洗礼的客人解释，潜艇是横着从船台上下水的而不是船尾先下水的原因。他为了让人一听就明白，一边讲，一边打手势比划。一部分被潜艇制造迷住了的客人全神贯注地却又笨拙地模仿着他的手势。文岑特·布朗斯基正用左手比作一艘冒出水面的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潜艇时，却把他的啤酒杯碰翻了。我的外婆正要骂他一通时，玛丽亚过来打圆场，连声说没关系，反正桌布明天是要洗的；洗礼聚餐时，桌布上弄上油迹污斑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左手端着盛满杏仁屑巧克力布丁的大水晶碗的特鲁钦斯基大娘用拿来了一块大抹布，把一大滩啤酒擦掉了。

要是把巧克力布丁那种特别平常普通而又独特的黄色粘稠的香草调味汁换成别的或不要该多好！在这个世界上，再没有比香草调味汁更加快活和更加悲哀的东西了。柔和的香草味飘散开去，团团把我围住，使我陷在玛丽亚的气味中，而我再也无法忍受看到一切香草发源地的她在马策拉特身边坐着与他握了握手。

我从他那张儿童小椅子上滑下去，一把抓住正在吃布丁的格雷夫太太的裙子，躺倒在她的脚下，头一回领教了莉娜·格雷夫所特有的、立即压倒、吞没、消灭了所有的香草味的难闻气味。

虽然一股酸味迎面袭来，但我还是坚持迎向这股新的气味，直到我觉得一切同香草味有联系的记忆都被麻醉为止。一阵起解脱作用的恶心缓慢地，既不发出声音，也没有使我痉挛地向我袭来。当假甲鱼汤、成块的烤猪肉和差不多没动过的罐头豌豆以及那几小匙香草调味汁巧克力布丁从我的嘴里吐出来时，我才明白我正在昏厥中游泳。我决定今后每天都要让格雷夫太太昏厥。

七十五公斤

在维亚茨马和布良斯克之后，泥泞时期来到了。一九四一年十月中旬，我也开始在烂泥地里使劲挖掘。请谅解我把中央集团军在泥泞地里的战果同我在莉娜·格雷夫太太的那片没有办法通行、同样泥泞不堪的地区内所取得的成果作对比。在离莫斯科不远的地方，坦克和载重汽车陷在泥里，而我也一样；在那里，车轮还能转动，把烂泥翻泥，而我也在格雷夫太太的泥泞地里成功

地搅出了泡沫。可无论是在离莫斯科不远的地方还是格雷夫寓所的卧室里，占领土地都无从谈起了。

我一直想像未来战略家们将从搞糟了的泥泞作战行动中吸取他们的教训那样对比着，从同格雷夫太太这种自然现象的斗争中得出了我自己的结论。我们不应过低估测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本土战线上的种种行动。尽管当时十七岁的我有过少年时的胡闹，却在莉娜·格雷夫那片外形模糊又隐伏着危险的演习区内被训练成了堂堂男子汉。我现在不再同军事行动作类比，转而借助艺术家的概念来衡量自己的进步。所以说：玛丽亚在具有幼稚的诱惑力的香草雾里劝说我运用小巧的形式，使我熟悉了诸如汽水粉和采蘑菇之类抒情诗体，格雷夫太太那种酸性强的、多层次结构的云雾圈则让我学会了作那种宽广的叙事诗式的呼吸，这使我有可能会在今天把前线的战果同床上的战果同日而语。从听玛丽亚稚气的多愁善感却又甜蜜的口琴吹奏开始，我一步登上了指挥台，因为莉娜·格雷夫为我提供了一支编制大而全的管弦乐队，恐怕这样的乐队只有在巴伐利亚或者萨尔茨堡才能找到。我在乐队里学会了吹、弹、奏、拨、拉，无论是通奏低音还是对位法，不管是十二音体系还是传统和声，我都精悉，还有谐谑曲的引子、行板的速度，我的激情表现得既刻板枯燥又流畅柔和；像一位理所当然与我有相同感受的艺术家一样，即使这支乐队尽情发挥使我满足，我还是不满意。

位于小锤路的面包师傅亚历山大·舍夫勒的寓所的地位远远不及斜对面距我们的殖民地商店只有二十小步的格雷夫的蔬菜店。蔬菜店占据着更为有利的地势。我对女性解剖学的学习成绩比我对我的师傅歌德和拉斯普庭的学习成绩稍强一些。这种时至今日仍存在的教养上的截然不同之处，可以用我的两位女教师的不同来解释或辩解。莉娜·格雷夫根本不想教我，只是谦逊和被动地把她的财富提供出来，给我作为观察和实验的材料。但格雷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欣·舍夫勒却过于认真地对待她的教育使命。她要看到成绩，听我高声朗读，注视我的漂亮地书写着的鼓手的手指，还让我同可爱的语法结为朋友，她本人又同时从这种友谊中获利。可是，我没让她看到任何说明我自己已经取得了某种成绩的明显的迹象，这时候，格蕾欣·舍夫勒也就失去了耐心。在我可怜的妈妈死后不久，也就是在她授课七个年头之后，她又转而热衷于她的编织。这一对面包师傅夫妇还是膝下无子，她还是照旧把自己编织的毛衣、长统袜和连指手套给我送来，但她也只是在遇到重大节日的时候偶尔送送了。我同她之间只有歌德和拉斯普庭的著作的那些残篇还一直保存着，常常挪动多半放在这幢公寓的晾衣阁楼上。后来自学成材形成独到见解的我当年多亏这些残篇才没将这部分学业全部荒废。

虚弱多病的莉娜·格雷夫却不能回避或离弃我，只能缠绵床侧，她的慢性病还没有严重到死神会提前把它性命夺走的地步。但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我在学业有成的时候离她而去了。

可能会有人认为我受教育成长的天地太狭小了。我居然是在一家殖民地商品店、一家面包房和一家蔬菜店之间为日后像男子汉一般生活配齐了他的装备。虽然我必须承认当年是在相当陈腐污浊的小市民的环境里收集到了他的头一批这么重要的印象的，但还有第三位教师，他把世界的大门为我打开，使我成为一名世界主义者。

他就是那个欧仁亲王的直系子孙，路易十四王族的后代、侏儒和音乐小丑，我的教师和师傅贝布拉。我讲到贝布拉的时候，自然也想到了他身边的那位伟大的梦游女，超越时间的美女罗丝维塔·拉古娜，在马策拉特夺走了我的玛丽亚的那些个黑暗的日子里，我经常惦念她。我不清楚她倒底是如花盛开的芳龄二十的少女还是颇有风韵、始终体现永恒青春小巧玲珑体态的九十九岁老姬。

我记得曾在我可怜的妈妈去世后不久见过他们。我们一起在四季咖啡馆喝穆哈，随后分道扬镳。我们之间存在着微小的却又不是微不足道的意见不统一；贝布拉跟帝国宣传部关系密切，从他的种种暗示中我可以听出，他出入于戈培尔和戈林先生的私宅，他还想尽办法向我解释并辩解他这种越轨行为。他讲述了中世纪宫廷小丑的地位很有影响。他把西班牙画家画出的复制品拿出来给我看，画中人是某位菲利普或卡洛斯国王及其宫廷侍从。在这些呆板的人群中，可以让人辨认出几个身穿皱皱巴巴、带棱带角、色彩斑斓的服装，身材同贝布拉也同我差不多的小丑。正是因为自称是天才画家迪埃戈·委拉斯开兹的热情欣赏者的我喜爱这些画，所以我不愿让贝布拉轻易地说服我。他于是停止用西班牙腓力四世宫廷里的小丑与他在莱茵区暴发户约瑟夫·戈培尔身边的地位作比较了。他谈到了艰难的时世以及必须不暂时退避的弱者，还有以隐蔽的形式兴起的反抗。他当时说出的“内心流亡”几个字眼使我和他从此分手，各走各的路。

我当时并没有对他发火。在此后的数年间，我一直在广告柱上张贴的杂耍团和马戏团的海报上留意贝布拉的名字，我曾经两次见到他的名字同拉古娜夫人的名字并列在一起，但是我并没有采取任何使我能再次与这两位朋友相见的行动。

我所期待的巧遇并没有发生。假如贝布拉和我在一九四二年秋而不是一九四三年就走到一条路上去，那么，我就永远也成不了莉娜·格雷夫的徒弟，而会成为贝布拉师傅的徒弟。就这样，我每天都要穿过拉贝斯路，在上午的第一个小时跨进蔬菜店，然后礼貌地先在店主格雷夫身边站上半个钟头。他慢慢地变成了一个古怪的制作爱好者，我瞧着他制造他那些发出丁零声、呜呜声和吱吱声的古怪机械。由于格雷夫那时候对周围世界毫无感觉，所以当有顾客进店来的时候，我就捅他一下。曾经开朗爱开玩笑的园圃种植者和青年之友格雷夫是如何变成沉默、孤僻不怎么讲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究形色枯槁的男子呢？

在这里长大的人都不认识他，也没有年轻人登他的门了。童子军时代里他的追随者被这场战争拆散，分送到了各条战线上。他们从寄来战地书信改为只寄战地明信片了。有一天，格雷夫间接得到消息，曾是童子军，后来当上青年团旗队长后来作了上尉的他很宠爱的霍斯特·道纳特已阵亡在顿涅茨河畔。

格雷夫自那日起便不修边幅，一天比一天衰老，只把心思扑在机械的制造上。结果，人家在他的蔬菜店里看到的机械比土豆和甘蓝叶球还要多。普遍的食物匮乏的状况也自然是一个原因；人家很少向蔬菜店供货，即使供应也不准时，而格雷夫又不适合于当个能干的采购者。并不像马策拉特那样有门道，跑大市场，拉各种关系。格雷夫用毫无意义的噪音机械填补了这片看上去可怜巴巴的蔬菜店的空间，虽说离奇古怪，却也起了装饰作用，人家看了本该高兴的。我倒十分喜爱从格雷夫这个业余制作匠日渐混乱的头脑里产生出来的制品的。今天，我一看到我的看护布鲁诺用打包绳子编织的产物，就会回想起格雷夫的那些陈列品。今天，布鲁诺看到我对他手工编织的玩意儿所表现出来的取笑与认真掺半的兴趣，感到欣喜，那时，每当格雷夫发现某架音乐装置唤起了我的乐趣时，他也稀里糊涂地感到高兴。从不把我放在眼里，却在我待了半个钟头以后离开他那变成了作坊的店铺去看望他的妻子莉娜·格雷夫的时候，格雷夫看起来很失望。

即使我在这位缠绵床侧的女人身边一般会待两至三小时，但并没有什么可讲述的。我一进屋，她就在床上向我招手：“小奥斯卡，你来了。再走近点，钻进羽绒被里来吧！格雷夫没把屋子烧暖，房间里可冷啦！”于是，我把我的鼓和那两根正在使用的鼓棒留在床前，钻到羽绒被下她的身边，只让那第三根用旧了的纤维状的鼓棒随同我一起去拜访莉娜。我穿着羊毛的和天鹅绒的衣裤以及皮鞋上了床，过了很久以后，我干完这种很费力地取暖

的活计后，从乱成一团的羽绒被里钻出来时还穿着一身衣服，甚至一点儿都没有弄皱。

我离开莉娜的床，身上带着她的臭味去找格雷夫。这样几次以后，格雷夫就立下一条，我特别愿意遵守的规矩。当我还待在格雷夫太太的床上，做着我的最后几项练习的时候，他便走进卧室，端来满满一盆热水，放在一张小凳子上，还留下了毛巾和肥皂。然后不说话也不看我们就走出去了。我一般都会迅速地从我提供的温暖的窝里挣脱出来，走到洗澡盆前，给自己以及那根在床上大显神通的旧鼓棒彻底的清洗一下。格雷夫无法忍受这种即使是过了一道手才向他迎面扑去的他老婆的臭味，这一点，我是能够理解的。这样一来，刚洗完澡的我便受到了这位业余制作家的欢迎。他给我发动了他的全部机器，并展示它们各种各样的噪音。时至今日我还想不通尽管我和格雷夫之间很晚才产生了这种亲密的关系，却一直没有结下友谊。我还是对从未引起我的关注与同情的格雷夫感到陌生。

一九四二年九月，我度过了我的十八岁生日，没有歌声，也没有音乐。在无线电广播里，第六军攻占了斯大林格勒。不久以后，格雷夫制作了一台擂鼓机。他在一个木架两端挂上了两个盛满重量相等土豆的盘子。然后，他从左边的盘子里取走了一个土豆，使得天平的一头翘了起来，打开了一个制动设备，使安装在木架上的擂鼓机运转起来：它发出急速敲击声、隆隆声、哒哒声、嘎嘎声、钹打响了、锣敲响了，这一切声响合成了一支短暂的、铿锵的、悲怆得不和谐的终曲。我喜爱这台机器，所以一遍又一遍让格雷夫启动它给我做表演。不过，我认为爱好制作的格雷夫是灵机一动并为我发明和制造了这台机器的。不久，我就肯定了我的猜测的错误。格雷夫也许从我那里得到了启发，但他与这台机器有相同的结束曲，因此，他是为自己制造的这台机器。

十月间一个在东北风扫除了屋前的垃圾后的清洁的早晨。我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准时离开特鲁钦斯基大娘的住所，走到街上，恰恰碰上马策拉特在拉店铺门前的卷帘式挡板。我站到他的身边时，他正好嘎嘎地拉起了绿漆挡板，先是昨天夜间贮存在店堂里的一团殖民地商品店气味的云雾扑鼻而来；然后我便迎来了马策拉特的清晨的亲吻。我在玛丽亚露面之前，穿过拉贝斯路，在西边的石头路面映下长长的身影，在我的右边——东方，马克斯·哈尔贝广场上空，太阳像闵希豪森男爵揪住自己的辫子把自己从沼泽地里拔起来时那样自己努力把自己拽得高高的。

任何了解格雷夫的人见了他的店铺锁着门关着窗都会很吃惊的。虽说最近几年格雷夫已变得十分古怪，然而他一向是准时开门营业的。我很快就推翻了自己关于他生病的想法，因为格雷夫去年冬天还在波罗的海凿冰窟窿洗冷水澡，虽说不再像往年似的定期前去，但他这个迷恋大自然的人，虽然显露出了若干衰老之态，也不可能一夜之间就病倒的？莉娜依旧行使着卧床特权；我也知道，格雷夫宁肯睡行军床或者硬板床也瞧不上柔软的床铺，他不会因生病而不起床的。

我在门窗紧锁的蔬菜店前，回头望到马策拉特正在店堂里，然后在我的铁皮鼓上急速地击了几小节，希望莉娜灵敏的耳朵听得到。没几声店门右侧的第二扇窗户就打开了。莉娜穿着睡衣，一脑袋卷头发夹子，胸前抱着个枕头，在结着冰花的窗槛花箱上方露出脸来。“小奥斯卡，快进来呀！你还等什么呀，外面冷着呢！”

我用根鼓棒敲了敲橱窗前的铁皮铺板说明原因。

她大喊着“阿尔布雷希特，你在哪里？怎么回事？”她继续喊她的丈夫，一边离开了窗户打开房门，我听见她在店堂里走路的声音，她马上又叫喊开了。她在地窖里喊叫，可是我看不见，由于地窖的窗洞也封着，不知她为什么喊叫；土豆在进货的日子里，由这个窗洞倒进去，在打仗的年头里，进货的次数越来越少

了。我把一只眼睛贴在窗洞前涂焦油的厚木板缝上，看到地窖里亮着电灯。我看到地窖楼梯上面有个像是莉娜的枕头的白东西在那横着。

她离开了地窖，把枕头丢在楼梯上了。她又在店堂里和卧室里去叫喊。她把电话听筒摘下来，拨着号码，冲着电话叫喊；但是我听不明白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只是偶然之间听到了“事故”二字，还有那地址，拉贝斯路二十四号。她吼着重复了好几遍，然后挂上听筒。然后，没了枕头的她身穿睡衣，满脑袋卷头发夹子，叫喊声灌满了窗框，把她那整个我所熟悉的双料肥躯浇铸到窗槛花箱里的冰花上，两手捂住粉红色的肉瘤，在楼上大声叫嚷，把街道都变狭窄了。我以为她也开始砸碎玻璃地歌唱了，但她一块玻璃也同砸碎。窗户被使劲拉开了，邻居们露面了，妇女们大声问出了什么事，男人们从邻近的门洞里冲出来：钟表匠劳布沙德，两条胳膊只有一半伸进外套的袖筒里，老海兰德，赖斯贝格先生，裁缝李比舍夫斯基，埃施先生，甚至煤店的普罗布斯特，也带着儿子来了。玛丽亚抱着小库尔特站在殖民地商店的门洞里，身穿白色工作服的马策拉特则一阵风似的刮到这里。

我轻而易举地躲过了正在找我的马策拉特，融合在这些分外慌张的大人中。马策拉特和钟表匠劳布沙德想爬窗户进屋，是最先想要采取行动的人。但莉娜挡着谁也不能爬上去，更不用说进屋去了。她一边抓着、打着、咬着，一边总还能找到时间越来越大声地叫喊，有一些话甚至能让人听清楚了。她早就打过电话了，别人不用再去打电话，她知道出了这样的事情该怎么办，先得等事故急救队来了再说。这儿的已经够糟的了。大家应当去照管各自的店铺。不过是好奇罢了，当不幸的事故降临时，一个人的朋友究竟哪儿才有。她在大唱哀歌时，在窗下的人群中发现了她，然后大声喊我，她把那些男人们推下去以后，向我伸来赤裸的胳膊。钟表匠劳布沙德不顾马策拉特的反对，把我举了起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来，送进窗户去，刚到结着冰花的窗槛花箱前，马策拉特也快要把我抓住的时候，莉娜已经把我抱住，紧贴在她那温暖的睡衣前。她用假声呜咽和在这间隙间的大口吸气代替了叫喊。

刚刚，人们在莉娜的喊叫的驱策下做出了激动、无礼的动作。这时，她那细细的假声呜咽以同样的效果使拥挤在冰花下的人们变得无声而窘迫。他们几乎不敢看她一脸的哭相，而是把所有的希望、好奇和关注都转移到了可能到来的急救车上去了。她的呜咽也使我感到不舒服。我设法往下滑一点，以便离她那充满悲痛的声音远一些。我松开了搂住她脖子的手，半个屁股坐在了窗台花箱上。感觉到玛丽亚正怀抱孩子站在店铺门洞里盯着我。就这样，我又放弃了我坐的地方，意识到我的处境的尴尬。同时，我只想着玛丽亚，众邻居对于我来说是无所谓的。我从莉娜这个颤动得太厉害，并且使我想到了床的河岸边撑开去。

莉娜可能没力气把我抱住了，她并没发现我已经溜了。这身体在很长的时间里曾经卖力地向她提供了一个替身。莉娜或许也预感到我将永远从她身边溜走了而且随着她的大声喊叫有一种成为缠绵床侧的女人和鼓手之间的高墙和音障，又推倒了玛丽亚和我之间存在的高墙的嘈杂的声音降到了人世。

我不怎么稳当地挂着我的鼓站在我熟悉的格雷夫夫妇的卧室里。我能背出这淡绿色糊墙纸的长度与宽度。盛着前一日的灰色肥皂水的洗澡盆还放在小板凳上。所有的物件都有它的位置，但我觉得拉坏、坐坏、躺坏和碰坏的家具一点没变，至少是被修整一新了，好像所有这些硬挺挺地用四只脚或者四条腿靠墙站着的家具需要经过莉娜的叫喊以及随后的假声呜咽，才能得到新的、冷得吓人的光泽。

我情不自禁地从开着的通往店堂的门走那间散发着干土和洋葱味的房间。日光透过橱窗挡板的裂缝，用挤满尘粒的光带把这间屋子分割成条条块块。格雷夫的大部分噪音和音乐机械处在半

明半暗中，光线只把某些细部、一口小钟、胶合板斜撑和擂鼓机的下半部照亮，还让我看到了待在天平上的土豆。与我们店里如出一辙、柜台后面盖住地窖口的那扇没有任何东西支撑着的厚吊门敞开着。有可能是莉娜大声喊叫的时候在匆忙之中拉开的，只是没有用门上的钩子扣住柜台边上的环。我只要稍一用力就能把这扇门碰倒把地窖口封住。

我纹丝不动地站在这块散发出尘土味和霉味的厚木板后面，凝视着那个被灯光照亮的框住了楼梯的一部分和地窖里的一块水泥地的四方形。一个构成台阶的小平台的一部分从右上角伸进这个四方框里来。这个小平台想必是格雷夫新近添设的，我以前偶尔到地窖里时从未见到过它。我不会为了看一个小平台如此着魔地、长久地把目光送进地窖里去的，但因为由这幅画面的右上角伸出了奇怪地缩短了的两只填满了的羊毛袜和两只系带黑皮鞋，我这样做了，虽然我看不到鞋底，可我马上认出这是格雷夫的远足鞋。我认为作好远足准备的格雷夫不会这样站在地窖里。因为鞋子底不是朝下的，而是自由飘浮在小平台上方；那笔直朝下的鞋尖将就触到了小平台的木板，接触得特别少。我用很短的时间想象着一个用鞋尖站立的格雷夫，这位体操运动员和爱好大自然的人，极有可能进行这种滑稽可笑却又很费力气的练习的。

我为了证明我假设的正确，顺便嘲笑他一下，我小心翼翼地爬到很陡的楼梯上，一级一级往下走去。而且我还敲着这制造恐惧和驱赶恐惧的工具：“黑厨娘，你在吗？在在在！”

我在稳当地站在水泥地之后，才让目光经由曲折的道路，从一捆空洋葱口袋上方越过，再滑过摞成堆的空水果箱，和以前从未见过的横梁构架，一直到接近格雷夫的远足鞋悬吊着或者用鞋尖站立着的地方。

我看到格雷夫和他的鞋以及编织得很粗糙的深绿色袜子一起悬吊着。长统袜口上方赤裸的男人膝盖，毛茸茸的大腿直到短裤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裤边；这时一阵刺痒的感觉从我的生殖器缓缓地延伸到了臀部，又上升到麻木的背部，沿着脊椎骨往上爬到了后颈，弄得我冷热无常。这感觉从那里又一路扎到了两腿之间，使我那根本就很小的圆木棍干瘪下去，然后他又跳过已经弯曲的背部到了后颈，在那里渐渐收缩使得直至今天，只要有人在我面前说到悬吊甚至说到把洗净的衣服挂起来时，我就会产生这种又刺又痒的感觉。悬挂在那里的不只是格雷夫的远足鞋、羊毛袜、膝盖和短裤，他整个人在绳子上露出一张鬼一样的脸，像在舞台上装腔作势地表演般靠脖子悬吊着。

又刺又痒的感觉以令人惊讶的速度很快消失了。我觉得他的姿势又恢复正常了；因为一个吊着的人的身体姿势基本上同一个用手撑地行走或头足倒立以及想骑马而跃上一匹四条腿的马却采取了不幸的姿势的人的样子是同样正常和自然的。

我这时才明白了格雷夫过去造布景所花费的精力。他吊在其中的框架和布景是精选出来的，甚至是铺张的。他曾经寻找过一种适合于他本人的死的形式，然后找到了一种两头平衡的死法。在他活着的时候，计量局的官员曾多次找他麻烦，他们曾多次把他的天平和砝码来没收，他们之间有过不愉快的信件往来。他曾因为水果和蔬菜的重量称得不准确而付过罚款。这次他用土豆保持了与他身体的平衡。

在滑轮的引导下，一根可能用肥皂抹过，光泽黯淡的绳子，穿过格雷夫为他的末日架在一个支架上的两根横梁上方。他把上好的木料浪费了，在那些建筑材料紧缺的战争年代里，要搞到横梁木和木板是很困难的。在这之前，格雷夫一定干过实物交易，用水果换到了木材。所以，在这个支架上还有纯属多余的、只起装饰用的角撑。构成台阶的三段式小平台——把这整个横梁构架提高到了近于庄严的程度。那台擂鼓机看来是这个业余制家用作模型的。格雷夫和他的衡重物同那台机器的情形一样都在机器

的内部挂着。有一反精巧的绿色小梯子，在他和同样摇晃着的土豆之间，同四根抹白灰的角梁形成鲜明的对比。他用一个童子军才会打的、富有艺术性的套结把几个土豆筐系在那根主绳上。四个涂白漆但光线仍然很强的电灯泡把支架内部照亮。所以我用不着登上并弄脏那个庄严的小平台，便能从土豆筐上方一张用铁丝固定在童子军套结上的小硬纸片上读出：七十五公斤（少一百克）那一行字。

格雷夫在他的末日又穿上了战前年代他作为童子军指导时但如今已变窄的制服吊在那里。他不能把最上面的两个扣子和腰带系上，否则，他这身打扮挺整洁，现在却添上了叫人讨厌的怪味儿。他按照童子军的规矩交叠着左手的两指。这个吊死鬼在上吊之前把童子军帽子系在右手腕上。他无法结上衬衫领口的扣子和齐膝短裤最上面的扣子，因此他的鬈曲的黑色胸毛就从这空档里钻了出来。

几株紫菀和不相时宜地夹杂其中的香菜茎长在小平台的台阶上。可能他已经把花撒完了，因为他把多一半的紫菀还有几朵玫瑰都用来装饰挂在支架的四根主横梁上的那四幅小像了。左前方一根上挂着有玻璃框的童子军创始人巴登-鲍威尔爵士像。左后方是无框的圣徒圣乔治。右后方是没有玻璃的米开朗琪罗画的大卫头像。在右前方的立柱上，一个极富表情的、漂亮的、大约十六岁的男孩——格雷夫的后来当了少尉，在顿涅茨阵亡的宠儿霍斯特·道纳特有框和玻璃的从前的相片。

我还要再说一下小平台台阶上紫菀与香菜间一张被撒成四片的纸。这些碎片扔在那里，但能让人毫不费力地拼在一起。我在拼好它们后发现这是一张曾经多次盖上风纪警察局印章的法院的传票。

我被急救车催人的笛声吵醒了。紧接着，他们跌跌撞撞地下了楼梯，登上小平台，把手伸向吊着的格雷夫。但他们一把这个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商人稍稍托起，用作衡重物的土豆筐就纷纷落下、翻倒。同擂鼓机差不多，被格雷夫机巧地用胶合板遮住的支架上面的机械在止动装置打开后便开始运转。下面，土豆砰砰地落到小平台上后又落到水泥地面上；上面，敲击着铁皮、木头、铜和玻璃的一支摆脱羁绊的鼓乐队为阿尔布雷希特·格雷夫敲响了大型结束曲。

我现在正努力编写格雷夫那如雪崩般土豆坠落的噪声的擂鼓机的有机喧闹声在鼓上的音乐。也许因为我的鼓对格雷夫之死的形象塑造产生过决定性的影响，所以，我有时也成功地在自己卡的铁皮鼓上奏出一首经过修饰的格雷夫之死的改编曲。我在我的朋友们以及护理员布鲁诺的寻问下给这首鼓曲起名为：七十五公斤。

贝布拉的前线剧团

我的儿子库尔特到一九四二年六月中旬，就满一周岁了。作为父亲的我以冷静的态度对待此事，暗自想道：还要再等两年。一九四二年十月，蔬菜商格雷夫在一座形式极其完善的绞刑架上自缢，因此，我，一再把这次自杀列为庄重的死法之一。一九四三年一月，大家对斯大林格勒这座城市谈论得特别多。因为马策拉特像以前强调珍珠港、托布鲁克和敦刻尔克那样地强调这座城市的名称，我再也不去关注这座遥远的城市里所发生的事件，而去注意我从特别新闻广播里所了解到的其他城市；因为对于我来讲，国防军队道和特别新闻广播乃是一种地理课。否则，我不知道库班河、缪斯河和顿河流在什么地方。没有谁能比关于远东各种事件的详尽的无线电报道更好地向我说明阿留申群岛的阿图岛、基斯卡岛和阿达克岛的地理位置。因此，我在一九四三年一月学到了斯大林格勒这座城市位于伏尔加河畔。但我是因为玛丽亚患了轻度流感而不是为了六军。

无线电里的报道继续开它的地理课：勒热夫和杰姆扬斯克。这时玛丽亚也逐渐好转。对于我来说，这两个地点仍然是闭上眼睛立刻能在任何苏维埃俄罗斯的地图上找到的。玛丽亚病刚好，我的儿子库尔特又患上了百日咳。在我努力记住激烈争夺的突尼斯的几块绿洲的极难记的名称时，非洲军团全军覆没，我儿子也全愈了。

玛丽亚、马策拉特和格蕾欣·舍夫勒准备替小库尔特在欢乐的五月过两周岁生日。我也认为即将来临的庆祝日意义比较不一般，因为再过一年，我儿子就三岁了。我会在小库尔特两岁生日那里，在他耳边悄悄地说：“等着吧，不久你也会有鼓敲了。”不过小库尔特三岁生日那天我早已不在但泽的郎富尔了，而到了罗马人建立的古老城市梅斯。我离开的时间太久了，结果为了能同家人共庆小库尔特的三岁生日，历尽艰辛才在一九四四年六月十二日准时赶回我所熟悉的、一直没有遭轰炸破坏的故乡。

我离家出走是因为在已经被改成空军营房的佩斯塔洛齐学校门前，我和我的师傅贝布拉偶遇了。贝布拉他的手臂挽着拉古娜，罗丝维塔夫人，伟大的梦游女一起说服我外出旅行。

我刚才拜访了格蕾欣·舍夫勒，自在地读了一小段《罗马之战》并且从中发现，在贝利萨尔的时代，世事就已更迭无常，人们就已经在非常广阔的地理区域内，在河流的交汇处和城下欢庆胜利或忍受失败了。

我由小锤路走来。穿过最近几年间，已经变成了托特组织的一个临时木板房营地的弗勒贝尔草场。我的思想却停留在公元五五二年，纳赛斯击败托蒂拉的塔吉那。我的思想在这位伟大的亚美尼亚人纳赛斯身上停留并不是因为他打了大胜仗，而是这位统帅的体型。纳赛斯是畸形儿，驼背，矮小，他是矮人、侏儒、小人国的人。纳赛斯可能是个儿童小脑袋瓜，比我稍大一点儿，我这样思考着，为了作比较，来到佩斯塔洛齐学校门口。我瞧着几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一个个子长得飞快的空军军官，看到了他们的勋章带子，暗自说，纳赛斯肯定不需要挂勋章。这时，这位伟大统帅本人却由一位夫人挽着他的臂膀站在学校大门正中央。纳赛斯不该有位夫人挽着他的臂膀。他们正向我迎面走来，在那些空军巨人一旁他们显得渺小，但却是那些新烘烤出来的纯空气英雄的中心，笼罩在历史的氛围之中，年纪太老了；在这个独一无二的名叫纳赛斯的亚美尼亚矮子面前，这个住满了托蒂拉们和泰耶们、住满了树一般高大的东哥特人的整座兵营不算什么。纳赛斯一小步一小步地走近我，向我招手，挽着他的臂膀的那位夫人也在招手。贝布拉和罗斯维塔·拉古娜夫人问候我，空军尊敬地让出道来，我把嘴贴近贝布拉的耳朵小声说：“亲爱的师傅，我对其评价远超过有勇无谋的力士贝萨尔的伟大的亚美尼亚统帅纳赛斯了。”

拉古娜在贝布拉向我谦逊地一挥手表示拒绝时表示了对我的这番类比的喜欢。她说话时小嘴动得特别美！“贝布拉请问你，难道我们的年轻朋友，真的那么没有一点儿道理吗？你的血管里流着欧仁亲王的血，流着路易十四的血，他是你的祖先啊！

由于空军总是直愣愣地令人生厌地观赏我们，贝布拉便拉着我的肩膀拽我到一边。最后，一名少尉，紧跟着上来两名士官，由于贝布拉的制服上佩戴着上尉的军衔标志，袖子上还有一块印有“宣传运动”字样的布条，在贝布拉面前做了个立正姿势。用勋章装饰着的小伙子们请拉古娜签名留念，并如愿以偿。于是，贝布拉一招手，让他的公务汽车开过来。我们在空军热情地鼓掌声中离去。

我们途经佩斯塔洛齐街，马格德堡街，陆军草场，一路驶去。贝布拉坐在司机旁边。刚到马格德堡街，拉古娜便开始拿我的鼓做话题。“好友，您对您的鼓还保持忠实吗？”她用我已经很久没听过的有她特色的地中海嗓音低声说，“在其他方面也一样吗？”我没有回答她，没有用那些同女人之间的冗长乏味的事去

劳她的神，但微笑着允许这位伟大的梦游女先是抚摩他的鼓，继而更加显出南欧人味道地抚摩着有点抽搐地抱着这铁皮鼓的双手。

汽车在陆军草场内沿五路电车轨道行驶。这时我用左手抚摩她的左手，她用右手亲热我的右手。汽车已经驶过马克斯·哈尔贝广场，我没办法下车了。这当儿，我在小卧车的后视镜里看到贝布拉正用浅棕色的、机敏的老人眼睛观察着我们两个的小动作。拉古娜恰恰把我的双手握住了，而我为了不伤害我的朋友和师傅，想挣脱出来。贝布拉在后视镜里微笑，然后避开了我的目光，开始同司机交谈。这时，罗丝维塔一边热乎乎地捏住我的双手，抚摩着，一边启动地中海小嘴开始了一席谈话。这是直接给我讲着听的，甜蜜地灌进了我的耳朵，接着又谈了些实际的事情，然后话又变得更加甜蜜，把我的一切顾虑和逃跑的企图都封住了。我们到了帝国殖民区，向妇科医院方向驶去。她告诉我，这些年来她一直想着我，甚至还保存着当年我在四季咖啡馆里唱碎并奉献给她的玻璃杯。她说，贝布拉虽然是位出色的朋友和优秀的工作伙伴，但不可能和他结婚，贝布拉必须单独生活，拉古娜这样回答我插入的提问，他们互相给予对方自由，虽说他天性相当嫉妒，但这些年来也懂得了拉古娜是无法约束的，更何况善良的贝布拉身为前线剧团团长几乎没有时间去履行结婚后应尽的义务。但是，这前线剧团可是第一流的，它所演的节目若在平时照常照样能搬上“冬季花园”或“斯卡拉”大剧院的舞台。但我不知自己凭着还没有施展的神授的才能，是否有兴致去试一年。况且我的年纪也够了，她可以担保，但是，我觉得自己有其他重任。今天是他们在但泽—西普鲁士军区的最后一场午后演出，接着他们就走了。现在他们去洛特林根，再去法国，现在去东线是不可能的事，现在，感谢上帝，他们刚刚离开东线。我真走运，东方已成过去，现在肯定是去巴黎。我没去过巴黎旅行。我决定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用巴黎代替拉古娜来诱惑我冷酷的心。

汽车在拉古娜刚说完话就停了下来。兴登堡林荫大道的树，绿色，普鲁士风，间距一律。我们下车，贝布拉让司机等着。我的脑子有点乱，需要新鲜空气，所以不愿进四季咖啡馆。于是我们就到斯特芬公园去散步，贝布拉在我右边向我谈宣传运动的意义和目的。罗丝维塔在我左边。向我讲述宣传运动日常生活中的小插曲。贝布拉谈战争画家、战地记者，说他的前线剧团。罗丝维塔让报告特别新闻时，我在无线电里全部听到过的，遥远城市的名称从她的地中海小嘴里溜出来。贝布拉说了个哥本哈根。罗丝维塔噓出了巴勒莫。贝布拉唱着贝尔格莱德。罗丝维塔像个悲剧女演员似的哀叹道：“雅典。但是，两人一起如痴如醉地一遍又一遍谈论可以抵消刚才讲到过的所有城市的巴黎。最后，贝布拉打着官腔，摆出前线剧团团长和上尉的架势，向我提议说：“请您加入到我们中间吧，年轻人，擂鼓，唱碎啤酒杯和电灯泡！占领了美丽的法兰西和青春常在的巴黎的德意志士兵会感激您，向您欢呼的。”

我为了走形式而要求考虑一下。我在五月葱绿的灌木丛中走了二刻钟，一边是拉古娜，一边是我的师傅和朋友贝布拉。我装出反复思考和大伤脑筋的样子，搓搓额头，倾听林中鸟语，好似我在期待某一只红胸鸽给我有生以来从未做过的事答案和忠告。当绿丛中有什么东西啾啾地叫得十分响、十分引人注意的时候，我说：“尊敬的师傅，善良、智慧的大自然劝我接受您的提议。您今后可以把我作为您的前线剧团的一员了！”

我们在四季咖啡馆里喝了一杯淡血色的穆哈，商量了我离家出走的细节。走出咖啡馆，我们又将刚才计划好的行动细节重复了一遍。我于是同拉古娜以及宣传运动上尉贝布拉告别，他坚持让我乘他的公务汽车。他们两个沿着兴登堡林荫大道朝城里溜达着。上尉的一位年纪较大的上士司机，把我送回朗富尔，因为我

不想也不能让车开进拉贝斯路，一直开到马克斯·哈尔贝广场。我乘国防军公务车回来的消息不合时宜，也会造成轰动。

我利用留给我很短的时间到马策拉特和玛丽亚家去辞别。我在库尔特学走路的围栏旁，站了许久，我也曾产生了若干做父亲应有的想法，便伸手去抚摩这个金发小家伙，但被拒绝。玛丽亚却相反，尽管多年以来她已经不习惯这些了，还是有点惊奇地接受了我对她的亲热举动，而且好心地把我抚摩一番。奇怪的是，同马策拉特告别我觉得为难。这个男人站在厨房里，正用芥末调料汁煮腰花，他与烹饪勾愉快地结下了不解之缘，我因此不敢打扰他。当他想从身后拿东西并伸手在厨桌上瞎摸时，我才向他走去，把放着切碎的香菜的小木板递给他。至今我还认为，马策拉特惊讶地、不知所措地拿着放有香菜的小木板，愣了很久。因为我以前从来没递过、拿过、举过什么东西给他，以至于我走了以后他还愣着。

我在特鲁钦斯基大娘那里吃饭，让她给我洗了澡，把我放到床上。我等她躺进她的羽绒被里，睡着了以后，就穿上拖鞋，带上我的衣服，穿过那只日渐衰老、正吱吱地打鼾的灰毛耗子睡的房间，在过道里，最后用钥匙把锁拧开了。我一直没穿鞋，只穿睡衣，挟着我那卷衣服，爬上楼梯，到了晾衣阁楼我的隐藏处，在堆放着的屋面瓦以及人家不顾防空条例的规定还堆在那里的成捆的报纸后面，我跟跑着跨过防空沙堆和防空水桶，找出一面我瞒着玛丽亚节省下来的崭新锃亮的鼓来。我还找出了我的读物：合成一卷的拉斯普庭与歌德。我要把我喜爱的这两位作家也带走。我要把衣服和鞋子都穿上，把鼓挂到脖子上，把鼓棒插在裤子背带后面的同时跟我的两位神——狄俄尼索斯和阿波罗谈判。那位醉得不省人事的神劝我，只带拉斯普庭或什么都不带；那位狡猾至极又过于理智的阿波罗则劝我干脆放弃法国之行，失败后，便坚持要我把歌德在几百年前打过的每一个合乎理性的呵欠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装进一个没有窟窿的旅行袋带走。而我由于固执，还有我深知，《亲合力》一书不能解决一切两性的问题，便把拉斯普庭以及他的一丝不挂的、但穿着黑色长袜的女性世界也随身带走了。阿波罗力求达到和谐，狄俄尼索斯力求达到混乱与沉醉，我则是一个使混乱和谐化，使理性处于沉醉状态的小小的半分神。我必死性以外，有一点优于自古以来便确定了众神们：在众神不停地检查他们自己的时候，我在读让我开心的书。

我对我们那幢出租公寓以及十九家房客厨房里的气味很熟悉。我同每一段楼梯每一层楼，每一扇钉有姓名牌的套间门告别。他们认为不合服役资格而送了回来的音乐家迈恩。你又把小号吹响了，喝上了杜松子酒，期待着他们重新把你接去——后来他们真的把你接走了，只是不准把小号也带走。胖得不成形状的卡特太太，她的女儿自称闪电姑娘。啊，阿克塞尔·米施克，你用鞭子得到了什么？沃伊武特先生和太太，一直吃芜菁甘蓝。海纳特先生身患胃病，所以在席哈乌船坞工作而没在步兵服役。旁边一家是海纳特的父母，他们还姓海莫夫斯基。特鲁钦斯基大娘，这只耗子在套间门后睡得正香甜。我把耳朵贴在门上听她吱吱叫。本姓雷策尔的小矮个儿，已经被提升为少尉，虽然他从小就穿长统羊毛袜。施拉格尔的儿子死了。艾克的儿子死了。科林的儿子死了。钟表匠劳布沙德还活着，修理破烂的钟表。老海兰德活着，还在把弯钉子敲直。身体健康的施韦文斯基先生，却在疾病缠身的施韦尔文斯基太太的前头死去。底层对面的套间里住着马策拉特家的阿尔弗雷德和玛丽亚，还有一个快满两周岁名叫库尔特的小家伙。我在这夜深人静时离开了这幢费劲地呼吸着的大公寓。我带着鼓以及大厚本教科书来到黑暗的街上。在所有这些灯火熄灭、相信空防的房屋之中，因为寡妇格雷夫太太，我在一所灯火熄灭、相信空防的房屋前面停住。虽然不能把我的教育归功于她，却能把某些传递感觉的熟练手法归功于她。我在这

所黑洞洞的房屋前脱下帽子是因为在悼念髻毛，鹰钩鼻，自己称自己的体重，同时上吊的蔬菜商格雷夫。吊死后他仍有髻毛、鹰钩鼻，但是，原先失神地待在眼窝里的棕色眼珠却过度用力地突了出来。然后我便戴上了有飘带的海军帽，头戴帽子，脚登靴子离开那里，准时到达了朗富尔的货车车站。

我在最后时刻到达了布鲁恩斯赫弗尔路的下跨道附近的铁路路堤。我并没有在附近的霍拉茨医生的诊所前驻足。虽说我在思想里边走边同护士英格道了别，向小锤路的面包师傅寓所送去了问候，只有圣心教堂紧锁的大门让我停了一下，我被害得差点儿来晚了。但我能确切地想象出坐在童贞女玛利亚左大腿上的一丝不挂的、粉红色的童子耶稣。可怜的妈妈又跪在忏悔室里，如同她往常把糖灌进蓝色的一磅或半磅装口袋里去那样把殖民地商品店老板娘所有的罪孽灌进维恩克神甫的耳朵里去。我则跪在左侧祭坛上，想把鼓塞给童子耶稣，但他不敲鼓，没有向我显示奇迹。我当时就发了誓，今天，我再次在紧锁的教堂大门前发誓：我一定要教会他敲鼓。可是，我要去作长途旅行，便把誓言改为以后，接着转过身来把鼓手的背对着教堂的大门，坚信我不会失去耶稣，随后爬上下跨道旁边的铁路路堤，把我丢失了若干歌德和拉斯普庭的残篇的教育大全的大部分带上了路堤，带到了铁轨间。我踉跄着越过枕木和碎石，又走了一段，由于天黑慌忙中险些把正等着我的贝布拉撞倒。

“是我们的铁皮演奏家！”上尉兼音乐小丑喊道。我们相互提醒要多加小心，摸索着过了铁道、交轨点，由于那些正在调轨的货车而迷了路，最后找到了那列前线休假人员的列车，车上给贝布拉的前线剧团留了一节专用车厢的。

从前只乘过有轨电车的我现在也该坐坐火车了。贝布拉把我推上车厢时，正在做针线活的拉古娜抬起头来，微微一笑，微笑着吻我的脸颊。始终保持微笑，手指却不离开她的针线活，并介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绍了前线剧团的两位团员：杂技演员菲利克斯和基蒂给我认识。有蜂蜜般金黄头发的、皮肤有点发灰的基蒂不无吸引力，个子同那位夫人相同。她说话略带的萨克森口音，使她更具迷人魅力。身高有一百三十八厘米的杂技演员菲利克斯是剧团里个子最高的。这个可怜虫因为他引人注目的出格的身材而懊恼。九十四厘米的我的出现，更使他的变态心理受到激发。这位杂技演员的长相同一匹用高级饲料喂养的选拔出来的赛马有很多相似之处，所以，拉古娜开玩笑地称他“卡瓦洛”或“菲利克斯·卡瓦洛”。他和贝布拉上尉一样也穿着军灰色工作服，佩着上士军衔标志。女士们也藏身在剪裁成旅行服装的不合身的军灰色衣料里。拉古娜手指下的针线活本是块军灰色布料，后来成了我的制服。布料是贝布拉和菲利克斯捐赠的，由罗丝维塔和基蒂轮流缝制，浪费了很多布料，直到上装、裤子和军帽都合我的尺寸为止。由于在国防军的任何服装局里都找不到合我脚的鞋子。我也非常高兴没有受士兵的低统靴的束缚而继续享受我的平民系带鞋。

杂技演员菲利克斯通过做伪造我的证件这件精细的工作时证实自己是相当熟练的。我仅仅因为出于礼貌而没有提出抗议。伟大的梦游女让我冒充她的哥哥。具体地说是：奥斯卡奈洛·拉古娜，一九四二年十月二十一日生于热那亚。在至今我用过的无数姓名中，这是极其难听的一个。

火车出发了，驶经斯托尔普、什切青、柏林、汉诺威、科隆开往梅斯。虽然我们在柏林停留了五小时，但我们却因空袭警报躲进了托马斯地窖，什么也没看到。前线休假人员像沙丁鱼似的卧倒在拱顶下面。宪后队的人不准我们进去时传来了喧闹声。从东线来的几个士兵，看过剧团的演出，认识贝布拉和他的团员。他们拍着手打着呼哨，拉古娜也回报以飞吻。他们请我们演出，瞬间就在这个从前是拱顶地窖啤酒馆的底部临时搭起了一个舞台似的东西。贝布拉难以拒绝一位空军少校由衷地、以过分夸张的

姿态请他演些拿手好戏给士兵们大开眼界的要求。我将要在真正的剧团演出中首次登场。虽说我并非毫无准备就上台，在火车上，贝布拉同我一起反复排练过我的节目，但此时我的怯场又使拉古娜借机抚摩我的手安慰我。

菲利克斯和基蒂在我们刚把被包搬过来后就开始为热心透顶的士兵们开始了他们的杂技表演。这两个都是橡皮人，他们把自己的身体打成结，反复从自己的身体里钻进去又钻出来，绕住自己的身体，取下身体上的一截，相互交换这一截身子或那一截身子，使拥挤着的、目瞪口呆的士兵们剧烈的感受到四肢疼痛和数日以来的肌肉酸痛。菲利克斯和基蒂还在相互打结和解结的时候，贝布拉扮着音乐小丑出场了。他在从空到满的酒瓶上奏出那些战争年头里最流行的曲子。他演奏了《埃里卡》和《妈妈齐，送我一匹小马》，又让《故乡，你的星》在瓶颈上响起并放出光芒。为了让人们更加激动，他便搬出他的老牌光辉乐曲，让《老虎吉米》在酒瓶丛中狂吼怒叫。这支乐曲不但受前线休假人员欢迎，连我爱挑剔的耳朵也喜欢听。贝布拉演了几套虽然幼稚，但依然受欢迎的魔术以后，他宣布罗丝维塔·拉古娜，伟大的梦游女，以及奥斯卡奈洛·拉古娜，杀玻璃的鼓手出场。罗丝维塔和奥斯卡奈洛在他烧的狂热的观众热情下一定会成功。我用急速轻敲的动作作为我们的表演的引子，用渐强的急速敲击作为高潮来临前的铺垫，在表演结束时用大段艺术性强的敲击引出喝彩色。拉古娜从观众堆里请年老皮厚的上士或腼腆狂妄的候补军官坐下，随便点出一名士兵甚至军官，她便能猜透他们的心。她不但能把军人证上的各种日期说对，她还把上士和候补军官私生活中不可告人的隐私用委婉动听，妙语连珠的词语披露给观众，最后，送给那些如观众所说被剥个精光的家伙每人一瓶啤酒，并让他们把瓶子高高举起，让大家都能看清后给我打了个暗号：越来越强且越来越快地擂鼓，啤酒瓶应声裂成碎片。这对于我的声音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来说如同儿戏，并没有什么难度。在人们看到那些诡计多端的上士或乳臭未干的候补军官溅满啤酒、目瞪口呆的脸后，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和喝彩声，同时还传来了对帝国首都一次大轰炸的噪声。

士兵们因观看了我们非世界水平的表演后受到了娱乐，肆无忌惮的大笑，把前线和休假抛到了脑后。炸弹落到了我们的头上，摇晃并掩埋了地窖和其中的一切，灯和备用灯都灭了，所有的东西都倒在地上乱作一团。这时，还不停有笑声穿过这口被掩埋的、令人窒息的棺材。“贝布拉！”他们喊道，“我们要听贝布拉！”善良而又顽强的贝布拉应声而起，在黑暗中扮演小丑，硬使被掩埋的群众同声大笑。当大家还让拉古娜和奥斯卡奈洛表演时，他大声说道：“亲爱的铅士兵们，他们都非常疲劳了，为了大德意志帝国和最后胜利，让他们睡一会儿吧！”

我和罗丝维塔因为恐惧而躲在一起，我们的手因她的恐惧和我的勇敢而握在一起。我搜索她的惧怕，她搜索我的胆量。最后，她从我这得到了胆量，而我却变得害怕。当我第一次把她的惧怕驱走，使她有了胆量时，我的男子汉的胆量已经再次产生。我的胆量已经历时十八个光辉的年头了，但我不知道她多大年纪，也不知道她是第几次如此躺在她那训练有素的、使我产生胆量的惧怕之中。因为她那尺寸虽小却数目齐全的身体上同她的脸一样，一点儿没留下已被埋葬的时间的痕迹。躲在我身边的是一个胆量与惧怕都没有时间性的罗丝维塔。她在帝国首都遭到一次大轰炸时，在被掩埋的托马斯地窖里，向我的胆量屈服了，丢掉了她的惧怕，直到防空人员把我们救出来为止。可是，人家永远也不会知道，这个小人国的女子究竟是十九岁还是九十九岁。由于我自己也不知道所拥抱的与我身材差不多的到底是个勇敢的老姬还是因恐惧而依顺于我的姑娘，所以，我很容易保持沉默。

参观水泥——或神秘，野蛮，无聊

我们在由罗马人建立的，后来还驻扎了近卫军的城市梅斯的历史悠久的防弹掩蔽部里连续演出了二十多天，后来又在南希演了半个月。马恩河畔的夏龙好客地接待了我们一星期。我已经会说几句法语了。在兰斯，还能观赏到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破坏。举世驰名的大教堂的石雕动物，令人讨厌地无休止地把水喷到铺路石块上。那里无时无刻不在下雨。但在巴黎，我们遇上了一个明媚和煦的九月。我能够挽着罗丝维塔的臂膀在码头上漫步，度过我的十九岁生日。虽说我以前在士官弗里茨·特鲁钦斯基寄来的明信片上见到过这个大都会，巴黎仍然丝毫没有使我失望。九十九厘米的罗丝维塔和九十四厘米的我第一次站在艾菲尔铁塔下，举首仰望，我们两人，手挽手，首次意识到我们的伟大和独一无二。我们在浪漫的巴黎大街上接吻。同艺术与历史交往，是多么美妙啊！我，一直挽着罗丝维塔的臂膀，游览了伤兵教堂，缅怀伟大的、与我们同样是矮个子的皇帝，我用拿破仑的语言讲话。在第二位矮小的弗里德里希的墓前，拿破仑说过：“如果他还活着，我们就不会站在此地了！”我在我的罗丝维塔的耳边轻声说道：“要是这个科西嘉人没有死去，我们怎会站在此地，在桥下、码头上和巴黎的人行道上接吻呢？”

在普莱尔大厅和萨拉·伯恩哈特剧院我们同其他剧团一起联合演出。我很快便适应了大城市的舞台环境，并且为了投合巴黎占领军的吹毛求疵的口味，把我的保留节目改得高雅一些。我不再唱碎普通的、粗俗的德意志啤酒瓶，而是把从法国各个宫殿里精选出来的、呈优美弧形的、吹制成雾气一般薄的花瓶和水果盆唱成碎片。我的节目是按照文化史的观点安排的，从路易十四时代的玻璃杯开始，然后把路易十五时代的玻璃制品变成玻璃尘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埃。我带着激烈的情绪想到了革命时代，让可怜的路易十六和他的丢了脑袋的玛丽·安托万奈特的高脚杯受到了极度摧残。我又毁了一点路易·菲利普的玩艺儿，末了，把第三共和国的青年风格的玻璃幻想产物弄了个粉碎。

虽然我按历史进程编排的表演，并不能被正厅前排和各层楼座的军灰色群众所理解，他们只知道为普通的玻璃碎片鼓掌，但偶尔也有来自帝国的参谋部军官和新闻记者能够赞赏我的历史感。人家在一场由官方为司令官们举办的演出结束后，把我们介绍给一位不穿制服对我的艺术大加赞赏的学者。我尤其感激正待在这座塞纳河上的城市里，并且不愧为法国问题专家的帝国一份主要日报的通讯记者。他暗示我注意我的节目中许多细小但不属于风格上的纰漏的错误。我们在巴黎过冬。人家请我们在一流饭店里下榻，我也不想缄口不提，我身边的罗丝维塔在整个漫长的冬天把法国床的优点反复验证并证实了。我在巴黎非常幸福。但我并没有忘记故乡的情人玛丽亚，还有马策拉特、格蕾欣和亚历山大·舍夫勒，和我的儿子库尔特以及外祖母安娜·科尔雅切克。

但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我也不惦念。因此，我也没有不给他们任何我还活着的暗示，寄军用明信片回家，而是给他们提供在没有我的情况下生活上一年的条件；我离家出走时就决定以后回去，我对我离开家里这伙人的关系作的调整感兴趣。在街上，在表演时，我有时也在士兵的脸上寻找熟悉的特征。我总想着可能弗里茨·特鲁钦斯基或阿克塞尔·米施克从东线调到巴黎来了，还有一两次我被军灰色弄糊涂把一个步兵当成了赫伯特。

只有艾菲尔铁塔让我产生了乡愁。但并不是我登上了这座铁塔，极目远眺，唤起了对家乡的渴望。我在想象中经常登上明信片上印着的这座高塔，如果真的攀登上去，那只能使我感到像是在失望地爬下塔来。我独自一人，在艾菲尔铁塔脚下站或蹲着，没有罗丝维塔的陪伴，在这金属结构的弧形基架下面，这个能让

我看到四处的却又是封闭式的穹隆，变成了我的外祖母安娜能够掩蔽一切的裙子。当我在艾菲尔铁塔下面坐着时，就像坐在了外祖母的四条裙子下面，练兵场变成了卡舒贝的土豆地，一场巴黎的十月雨不知疲倦地斜飘到比绍与拉姆考之间。这使我感到连同地下铁道的整个巴黎，都散发出一股略微有点哈喇的黄油味道。感觉细腻，待我细心周道的罗丝维塔注意到我因苦痛而造成的沉默不语，终日沉思。

一九四四年四月，我们在从各个战场传来了成功地缩短战线的消息之后，奉命收拾演员行囊，离开巴黎，到大西洋壁垒去慰问。贝布拉的前线剧团在勒阿弗尔开始了巡回演出。尽管贝布拉他在表演时从未出过差错，一如既往地使观众感到愉快欢乐，但是，大幕一落，他那张苍老的纳赛斯的面孔马上变得呆滞，显得沉默寡言、精神恍惚。开始，我把他看成一个嫉妒鬼，甚至是败在我的青春力量下的降将。罗丝维塔小声告诉我，虽然她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我的想法是错的，只说有几名军官在演出结束后便来找贝布拉，关上房门密谈。看来这位师傅正在策划什么具体的行动，想要放弃他的内心流亡，看来他的祖先欧仁亲王的血统又在他身上发挥了作用。贝布拉的各种策划使他和我们疏远，把他牵连进涉及方面极广的关系中去。我同从前属于他的罗丝维塔的关系只能在他布满皱纹的脸上诱出一丝疲惫的微笑。当他在特鲁维尔，我们下榻于疗养地饭店里突然闯入我们合用的化妆间里，地毯上的我们扭作一团，居然挥挥手表示不必介意。我们正想相互解脱，他却对着化妆镜说：“抓紧时间享乐亲吻吧，等明天参观完水泥，水泥粉末后天在你们唇间沙沙作响时，你们亲吻的兴致会被破坏的。”

一九四四年六月，我们把从比斯开至荷兰的大西洋壁垒的大部分腹地走遍，那些传奇式的地堡却见得很少，到了特鲁维尔，我们才头一回在海岸演出。贝布拉接受他们让我们去参观大西洋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壁垒的建议。在特鲁维尔作最后一场演出。夜间，我们来到卡昂前方在海岸沙丘后四公里处的小村庄巴文。他们安排我们在许多草地、灌木丛、苹果树间的农民家过宿。这里酿制名叫卡尔伐道的苹果烧酒。我们尝后睡得特别香。凉爽的空气由窗户透入，水塘里的橈鼓的青蛙呱呱地一直叫到天明。我睡着听它们的鼓声并提醒自己该回家了，因为我一定得给我快三岁的儿子一面鼓，因为这是我答应过他的。我这个受痛苦折磨的父亲，一直不停地这样告诫自己。醒来时，我摸摸自己的身边，证实拉古娜躺在那里，并闻到了拉古娜身上那股清淡的桂皮，捣碎的丁香和肉豆蔻味，到圣诞夜前又变成烤香料且一至延续到夏天的气味。

清晨时分一辆装甲车开到农舍前。在院门口，我们大家都觉得有点冷飕飕的。清晨，凉爽，迎着从海上刮来的风，我们聊了几句。贝布拉，拉古娜，菲利克斯和基蒂，和那个来接我们到卡堡以西他的炮兵连去的中尉海尔佐格一起上了车。

绿色的诺曼底上有许多棕的相间的牛群。它们在笔直的公路的左右两侧被露水沾湿的、薄雾迷漫的草地上反刍，对我们的装甲车视若无睹，若不是这些甲板已经涂上了一层保护色的话，肯定会因为羞愧而变成红色。白杨、树篱、爬行的灌木丛，第一批外形大而蠢的海滨旅馆空无一人，百叶窗在风中摇响。装甲车拐入林荫道，我们下车，急急忙忙地跟在对贝布拉上尉夸张地毕恭毕敬的中尉后面，迎着一阵裹挟着沙土和涛声的海风穿过沙丘。

这绝非温柔的、酒瓶般绿的、少女般抽泣着的、正等待着我的波罗的海。大西洋正在耍它的老花招：涨潮冲锋，退潮后撤。

然后，我们看到了可以观赏，抚摩，还保持巍然不动的。“注意！”水泥内部有人叫了一声，随即从地堡里跳出一个树一般高的人来。这座形状像平背乌龟的座落在两座沙丘之间，叫做“道拉七号”，用射击孔、观察缝以及暴露在外的小口径的枪炮管当眼睛，观察落潮和涨潮。上士兰克斯从那里面钻出来，向中尉

海尔佐格和我们的上尉贝布拉报告。

在水泥上吃早餐时沉默寡言的我记下了在进犯前夜于大西洋壁垒的这席谈话。我们也将到专写战后时期和今天处于兴旺时期的毕德迈耶尔的时候，与那位上士兼水泥艺术画家兰克斯重逢。

那辆装甲车一直在海滨林荫道上等着我们。海尔佐格中尉大步赶来，找到了他受命保护的我们。他还没得上喘口气就为刚刚那件小小事件向贝布拉道歉。“封锁区就是封锁区嘛！”他说着搀扶女士们上车，又对驾驶员下了一串命令。装甲车驶回马文特。由于两点钟我们要在位于村口白杨树林后面雅致的诺曼宫的骑士厅进行演出，我们连午饭的时间都没有了，只有加快赶路。

在我击鼓拉幕前，我们有半小时的时间调试灯光。我们尽量夸张的为士官和士兵演出。引得他们多次爆发出粗野的笑声。一只里面装着几根维也纳小香肠和芥末的夜壶被我唱碎了。贝布拉扮演妆化得很浓的小丑，为打碎的小夜壶痛哭流涕，从碎片堆里拣出香肠，抹上芥末，吃下肚去，把那些军灰色大兵逗得捧腹大笑。基蒂和菲利克斯一段时间以来总穿皮短裤、戴蒂罗尔小帽出场，这让他们的杂技表演尤其与众不同。罗丝维塔身穿银色紧身连衣裙，手戴浅绿色卷边手套，小巧的脚穿一双金线交织的凉鞋，下垂的淡蓝色眼睑，用她那梦游女的地中海声音显示她的神奇魔力。我如往常戴着我那顶绣有“皇家海轮赛德利茨号”字样的旧水手帽，身穿海军蓝衬衫，外面是金色锚形钮扣外套，下面露出齐膝短裤，卷口齐膝长统袜套在穿旧了的系带靴里。还有六面红白相间的铁皮鼓，五面作为后备品装在我的演员行囊里。

晚上，我们又为军官和卡堡通讯处的闪电姑娘们演出。罗丝维塔有些反常，虽然没有出错，但演出过半时却戴上了蓝框太阳眼镜，在预言时用另一个声调把话说得更直了。例如她对一名身边坐着上司的没有血色的、由于窘迫而傲慢无礼的闪光姑娘说他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与身边的上司私通，这使我非常不愉快，但惹得大厅里一片笑声。

住在诺曼宫里的团参谋部军官在演出结束后还举行了宴会。贝布拉、基蒂和菲利克斯留下了，我和拉古娜悄悄地离开了。在经过这一天的变故后，我们两个上床倒下便睡着了，直到第二天清晨五点左右，刚开始的进犯才把我们吵醒。

由于当时在我们这个地段，在奥恩河口，加拿大部队登陆了使得我们必须撤离巴文特。我们早已收拾好行李准备同团部一起撤退。在诺曼宫院里停着一辆热气腾腾的摩托化军厨车。罗丝维塔还没吃早饭，便让我替她取一杯咖啡来，我有点烦了，担心会赶不上我们乘的那辆卡车，她自己便跳下卡车，便态度有些粗暴地拿着小锅，登着高跟鞋，跑向军厨车。但有一发从军舰上射来的炮弹同时落在了热气腾腾的早餐咖啡前。

只知道罗丝维塔身高九十九公分，我不知道你有多大年纪，你散发着桂皮和肉豆蔻的气味，用地中海的声音说话，你能够看透所有的人的心；却不去洞察你自己的心，否则，你就会在我的身边留下，不会去取那太烫的咖啡了！

贝布拉在利西厄克斯给我们搞到一份去柏林的命令。当他在司令部门口见到我们时，他说出了自罗丝维塔去世后第一句话：“巨人们夯实的水泥面上不该是我们这些矮人和丑角跳舞的地方！如果我们在台下不被人理睬该多好！”

在柏林我和贝布拉分手了。他勉强笑着吻了我一下，说：“罗丝维塔不在了你没必要再留在防空洞了。”然后派持有公务旅行证明的菲利克斯和基蒂一直把我送到但泽车站，还把演员行囊里剩下的五面鼓全部送给了我。在这样的关照下，我一如既往地带着我的书，于一九四四年六月十一日，我儿子三岁生日前一天返回了我的故乡。这座城市依旧像中世纪那样毫无变化，各种不同的教堂高耸的塔楼上大大小小的钟每小时依旧发出不同的喧

闹声。

接替基督

我终于要回家了！前线休假人员列车在二十点零四分抵达但泽车站。菲利克斯和基蒂送我到马克斯·哈尔贝广场，基蒂流下了眼泪，同我告别，然后他们便去霍赫施特里斯的调度处，我则背着行李在二十一点前匆匆穿过拉贝斯路。

在今天，回乡已经成为了一种陋习。它使那些持假支票去了外国人的地区、过了几年岁数稍大后便回乡来大谈山海经的年轻人变成了现代奥德修斯。有些人，因粗心而乘错了火车，不去法兰克福却到了奥伯豪森，旅途中稍有见闻，刚一返乡，就滔滔不绝地搬出诸如基尔刻、珀涅罗珀和泰莱马霍斯等一大堆姓名来。回乡时发现一切如故的我不是奥德修斯。而我所爱的玛丽亚也不是珀涅罗珀，并没有好色的求婚者蜂拥在她周围大献殷勤，在我出走前很久，她已经决心跟从马策拉特了。而且她确实这样做了。有教养的人会想到：由于我可怜的罗丝维塔从前从事梦游女的职业活动，便被人看成欺骗男人的基尔刻。即使我那什么都没为我做过的库尔特早已不认识我了，他也无法成为泰莱马霍斯。

同别的回乡者相比，我更像《圣经》里回头的浪子。因为马策拉特像一个真正的父亲而不是一个假想的父亲那样把门打开迎接我。而且他还为了我的回乡而欣喜，并且流下了真诚的、无言的泪水，使得我从那一天起，承认自己既是奥斯卡·布朗斯基，也是奥斯卡·马策拉特。

玛丽亚在桌旁坐着，为经济局贴食品印花，对我的回乡一点也不亲切，态度特别冷静。在小烟几上已经码了几件还没有打开包装的给小库尔特的生日礼物。一向注重实际的她，首先想到的是要让我舒服一些，帮我脱去衣服，对我的羞赧之态置之不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像以往那样给我洗澡，替我穿上睡衣，把我报到桌边，桌上放着马策拉特在我洗澡时为我做的荷包蛋和煎土豆，饮料是牛奶。她在我吃东西时开始不停地对我说：你干嘛了？我们和警察局像发了疯似的到处找你。我们被迫到法庭上去宣誓，说我们并没有杀害你。现在好了，你回来了。不过，至今为止已经惹了很多麻烦，我们必须去报告，你已经回来了，今后还会有麻烦。你什么招呼都没打就走了，希望他们不会把你送到你该被送的地方去。

玛丽亚有远见的话果然应验了。卫生部的一名官员上我家，找马策拉特单独谈话，但马策拉特大声嚷嚷到：“这个根本不要考虑。我是父亲，不是卫生警察！我妻子临终前我答应过她。”我没有被送进专门机构去。但是，自那时起，每半个月便会收到一封一封要求马策拉特签字的公函，马策拉特就是不签，但是愁出了一脸皱纹。

我要抢先一步把在我回家那天晚上喜气洋洋的马策拉特脸上的皱纹抹平，他那晚不像玛丽亚似的想得那么多，问得也少，他的表现像一个真正的父亲，只要我平安回家就一切都好。当他们领我到吃惊不已的特鲁钦斯基大娘那里去睡觉时，他说：“明天我们就要庆祝小库尔特的三岁生日了。他会因为又有了一个小哥哥而高兴的。”

我的儿子库尔特一点儿也不喜欢在他的生日桌子上的插着三支蜡烛的蛋糕，还有格蕾欣·舍夫勒亲手编织的一件葡萄红的毛衣。他坐到一只讨厌的黄皮球上去，骑在上面，最后用厨房里的一把刀子把它捅破了。然后，他从橡皮裂口里吮吸那在所有充气的球里都会沉淀下来的令人作呕的甜水，当皮球不再鼓起供他折腾时，小库尔特便转身去把小帆船拆成了一具残骸。他碰都没碰放在他手边的陀螺和鞭子。

我从当代最狂乱的事件中脱身出来，匆匆赶到东部，为的就是不错过很久以前就想到我的儿子的三岁生日。这时，在一边站

着，观看库尔特的破坏业绩，对他的果敢非常赞赏，把自己的身高同小库尔特比了一下，若有所思地暗自承认：在我离家的这段时间里，小库尔特已经长得比我都高了。在十七年前自己的三岁生日那天，有意让自己的身高停留在九十四公分，现在，我为了让儿子成为一个鼓手，必须对已经高出我两三分公的小库尔特的身高进行限制。

我从和教科书一起藏在晾衣间里屋顶瓦后面的行囊里取出一面锃亮的、新出厂的铁皮鼓。我现在也要像当年我可怜的妈妈信守诺言给我提供机会一样给我的儿子提供同样的机会，而那些大人们是不会这样做的。我充分相信马策拉特在看到我无望继承商店后把库尔特作为了商店的继承者。说什么也不能把马策拉特这个愿望变成事实。我并不反对零售买卖。要是有人承诺给我或者我的儿子一个工业康采恩，或者继承一个王国外加殖民地，我也会有相同的想法的。我不想从别人手里接受任何东西，所以想让小库尔特也采取类似的行动，变成永远保持三岁孩子身材的铁皮鼓手。

现在我才明白，对于一个大有希望的年轻人来说，接受一面铁皮鼓不像接管一片殖民地商店那样是件可憎的事情，但当时我的思想逻辑上却犯了这样一个错误。可是，当时我只有一个心愿：由于我的事业必须一代一代地敲着红白两色的铁皮鼓继承下去。必须在击鼓的父亲身边摆上一个击鼓的儿子，必须有两个矮小的鼓手由下而上地观察大人们的一切行动，必须建立一个有生殖力的鼓手王朝。

即使在不同的房间里，如果我们可以一边一个地并排敲鼓，即使他在拉贝斯路，我在路易森街，他在地窖里，我在阁楼上，儿子在厨房内，父亲在厕所里，如果父亲和儿子彼此能够间或一起敲铁皮鼓，如果我们两个遇上好机会，钻到我的外祖母、他的外曾祖母安娜·科尔雅切克的几条裙子下面去，住在那里闻有点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哈喇的黄油气味敲鼓，那样的生活该多美好啊！在她的大门口蹲着，我对小库尔特说：“我的儿子往里瞧。我们是从那里来的。要是你敢的话，我们可以回到那里去待上一个钟头或者更长的时间，看望一下待在那里等着的那些人。”小库尔特便会在几条裙子底下探过身子去，窥视一眼，很有礼貌地问我，让我说明白。

我会低声说，“在那里正中央坐着的那位美丽的女士，玩弄着她美丽的手，有一张那么温柔能催人泪下的鹅蛋脸，就是我可怜的妈妈，你善良的祖母。她因为喝了鳗鱼汤，或因为她的过于甜蜜的心而去世了。”

“继续，爸爸，讲下去！”小库尔特催促我说：“这个留着小胡子的男人是谁？”

我会神秘地压低嗓子：“这是你的外曾祖父，约瑟夫·科尔雅切克。留心看他那双闪烁着的纵火犯的眼睛和他的鼻根上方显露出来的非凡的波兰人的异想天开和务实的卡舒贝人的老谋深算的表情。一九一三年，‘哥伦布’号下水那天，他钻到一排木筏底下，靠他脚趾间的蹼膜游了很长时间，终于到了美国，在那里成了百万富翁。有时候，他又游回来，藏匿在这里。当年，他成了纵火犯后便藏在这里，把他的那一份献给了我的妈妈。”

“那么，始终藏在我的祖母背后，现在又坐到她身旁，用手抚摩她的手的那位英俊的先生又是谁呢？他的眼睛和你的一样蓝！”

面对我这个勇敢的儿子库尔特，我这个恶劣得当了叛徒的儿子，只得鼓起勇气回答说：“这是布朗斯基的奇妙的蓝眼睛，它们正瞧着你呢，小库尔特。你的眼睛是你从你母亲那儿遗传得来的灰色。但是，同那个正吻我可怜的妈妈的手的扬，和他的父亲文岑特一样，你也是一个彻底的奇妙的却又有着卡舒贝人血统的真实的布朗斯基。早晚有那么一天，我们也会为回到那散发着有点哈喇的黄油气味的本源之地而高兴吧！”

当时我认为只有在我的外祖母科尔雅切克的体内即我所谥称的外祖母的黄油罐里，才称得上是过名符其实的家庭生活。即使现在在我一眨眼便能达到甚至超过天父、圣子和更为重要的圣灵三位一体的境地的时候，在我还像以前从事其他职业时那样不情愿地背负起接替基督的义务之日，即使我再无法达到通往我的外祖母的大门，我却还在栩栩如生地描绘我的前人圈子里最美好的家庭生活场景。

我经常在雨天在头脑里描述这样一幅场景：我的外祖母分发请柬，邀请我们在她的体内相会。扬·布朗斯基这位波兰邮局保卫者胸口上的几个子弹窟窿里插着鲜丁香来了。玛丽亚在我的介绍下也收到了请柬，她腼腆地走近我的妈妈，为了得到宠爱，给她看那些先由妈妈记的、由玛丽亚没有一点儿破绽地继续往下记的商店账本。妈妈发出了卡舒贝人的笑声，把玛丽亚拉到自己身边，吻她的脸颊，眨着眼睛说：“小玛丽亚，我们不会感到亏心的。我们两个都嫁给了一个姓马策拉特的男人，却生了一个姓布朗斯基的男人！”

我必须严格禁止自己继续往下想，比如进一步假设一个由扬授孕、由我的妈妈在我的外祖母科尔雅切克体内怀胎、最后在那个黄油罐里生出的儿子之类的事。这种事情一定会像一环一环地套下去的连环套似的无法停止。可能还有毕竟也属于这个圈子的我的同父异母的兄弟斯特凡·布朗斯基，他就会先瞟玛丽亚一眼，然后便一发不可收拾。因此，我宁可把我的想象力局限于一次和睦的家庭聚会。所以，我也不再去想象出第三个以及第四个鼓手，有我和小库尔特足矣。我在铁皮上向在场的人讲述了有关那座艾菲尔铁塔的事情，说我在国外时曾拿它来替代外祖母。我因外祖母和来宾们在我敲鼓之后都高兴得合着节奏彼此拍打膝盖而感到快乐。

虽然说用在有限的平面上看到众多的层次的方法展现我外祖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母体内的世界及其关系是很具诱惑的，但现在同马策拉特一样只是个假想的父亲的我必须以一九四四年六月十二日的事情，以小库尔特的三岁生日作为叙述的根据。

库尔特这孩子在他的三岁生日上得到了一件毛衣、一只皮球、一条帆船、鞭子和陀螺，他还会从我那里得到一面红白相间的油漆铁皮鼓。他刚把帆船拆坏，我把铁皮的礼物藏在背后走过去，让自己那面用旧了的铁皮在肚子下面摇晃。我们相对而立，中间只隔一小步；我，侏儒，库尔特，比我高出两公分。他绷紧着脸，怒气冲冲还在破坏那艘帆船。我在他把“帕米尔”号帆船最后一根桅杆拆断的时候将鼓从背后拿到前面，高高举起。

库尔特把帆船残骸扔掉，接过鼓，抱并转动它，脸上的表情稍稍缓和些，但还一直紧绷着。在我准备将鼓棒递给他时，发生了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他误解了我的第二个动作，以为是在威胁他，他便用鼓缘打掉了我手里的鼓棒。他在我弯下身子去拣鼓棒时，把手伸到我背后，当我再次把鼓棒递给他时，他就抓起生日礼物抽我，而不是专为挨鞭子抽打而刻有螺纹的陀螺。他想把我教成像陀螺似的，旋转的同时呜呜叫。他用鞭子抽我，心里想着：等着，小哥哥，该隐就这样鞭打得亚伯打起转来，先是跌跌撞撞，后来越转越快越稳，先是低沉，后来由难听的呜呜声变为高声歌唱，唱起了转陀螺小曲。该隐用鞭子诱出我声音苍白越来越高的歌声，像一名男高音歌手流畅地唱着他的晨祷。也许白银打成的天使，维也纳的歌童，训练有素的阉人歌手都是这样歌唱的我和唱到仰面倒地死去的亚伯一样在我儿子的鞭打下跌倒在地。

在他看到我可怜地躺在地上呜呜着之后，好像胳膊还没过瘾似的又抽了许多下房间里的空气。他在仔细地检验鼓的时候，还在怀疑地留神着我。先是红白两色的漆被椅子角磕掉，然后这件礼物被扔在地板上。小库尔特寻找并且找到了刚才那条帆船的坚

固的船身。他不是敲击，而是在用这块木头把鼓砸碎。他的手打出的节奏简单至极。他绷紧着脸，用单调而均匀的节拍揍着一块不曾指望会遇上这样一位鼓手的铁皮，它可以承受很轻的鼓棒的急速敲击，但无法承受用粗笨的残骸冲撞。鼓裂开了，铁皮从边框里脱身出来想溜之大吉，它把红白两色的油漆剥掉以便施展隐身术，最后用它固有的蓝灰色博得怜悯。但，儿子对我送的生日礼物一点也不领情。我还想再度调解，不顾身上多处同时发作的疼痛，挣扎着爬过地毯，向站在地板上的儿子爬去，还没爬到，鞭子又响了，这只疲惫的认识这位女士的陀螺不想再旋转，再呜呜叫，最终那面鼓也放弃了能得到一位敏感的、急敲咚咚的、虽说有力却并不残暴地挥舞鼓棒的鼓手的希望。玛丽亚进屋时，鼓已经成了废铁。她抱我起来，吻我的肿起的眼睛、裂口的耳朵，舔我的血和我的留下道道鞭痕的双手。

要是玛丽亚不仅仅亲吻这个受凌辱、发育不全、令人遗憾地不正常的孩子该多好！如果她认出在我的每道伤痕里认出了挨揍的是库尔特的父亲，她的情人那该多好！那么，在接踵而来的不见天日的几个月里，我对于她，会成为一种莫大的安慰，还是一个既是秘密的又是真正的丈夫。

最初我的同父异母兄弟，那时随其继父姓埃勒斯，刚被提升为少尉的斯特凡·布朗斯基，在北极海前线中弹身亡，这样使他的军官生涯突然出了问题。斯特凡的父亲，波兰邮局的保卫者扬，当年在萨斯佩公墓被枪毙时，藏了一张施卡特牌在衬衫后面。现在，这位少尉上装的被二级铁十字章、步兵冲锋章以及所谓的冷冻肉章所装饰。但这件事跟玛丽亚绝对无缘。

六月底，特鲁钦斯基大娘，因为邮局给她送来了坏消息得了轻度中风。士官弗里茨·特鲁钦斯基同时为三件东西元首、人民和祖国而阵亡。事情发生在中间地段，弗里茨的信袋被中间地段的一位姓卡瑙尔的上尉直接寄到了朗富尔区的拉贝斯路。海德尔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堡、布列斯特、巴黎、克劳伊茨纳赫浴场以及萨洛尼卡的多半是笑哈哈的漂亮姑娘的照片。我已经记不得的一级和二级铁十字章，各种挂彩章，一枚铜质近战章以及两块从军服上拆下来的反坦克布肩章，以及几封信都装在这个信袋里。

特鲁钦斯基大娘虽在马策拉特的努力帮助下有了好转，但永远都没有完全康复。她死死地坐在窗边的椅子上，反复地问我和一天上楼两三趟送东西来的马策拉特，那个“中间地段”究竟在哪里，离这里远不远，星期天是不是可以坐火车过去。

空有一片心意的马策拉特答不出这些问题，这个责任自然就交给了从特别新闻和国防军报道里学会地理的我。在那些漫长的下午，我给除了脑袋在摇晃之外呆坐着不动的特鲁钦斯基大娘用鼓敲出了几首越来越频繁地移动的中间地段的变奏曲。

漂亮的弗里茨非常崇拜的玛丽亚却比以前虔诚了。开始，玛丽亚在整个七月间，仍参加她学到过的宗教仪式，星期天到基督教堂的黑希特牧师那里去。即使她喜欢独自行动，马策拉特也经常陪着她。

玛丽亚无法对新教礼拜感到满意。一周中的星期四或星期五，在停止营业之前，玛丽亚把商店交给马策拉特守着，拉着我这个天主教徒的手，向新市场方向走去，接着拐进埃尔森街，入马利亚街，走过屠夫沃尔格穆特的门口，到了小锤公园，在我思考着这是到朗富尔车站去，作一次短途旅行，或者去卡舒贝的比绍的时候，我们又向左拐去，出于迷信，在铁路路堤下跨道前等一列货车驶过，接着才穿过令人恶心地滴着水的下跨道，但没有直接去电影院，而是沿着铁路路堤走去。我心里思量着，她是要拉我到布鲁恩斯赫弗尔的霍拉茨医生的诊所去还是圣心教堂改宗。

我们两个在铁路路堤和洞开的正对着铁路路堤的圣心教堂大门之间停下了。八月午后的早些时间里，空气里夹杂着某种嘈杂

的声音。我们背后铁轨之间的铺路碎石上，系白头巾的东方女工在抡镐使铲。我们站在那里向阴暗的、凉气阵阵的教堂肚里望去：最里面，巧妙诱人，长明灯像一只眼睛熊熊燃烧着。我们背后的铁路路堤上，乌克兰妇女停止抡镐使铲。一支号角嘟嘟响，一列火车驶近，到了眼前，随后开走了，号角嘟嘟响，乌克兰妇女又抡镐使铲。玛丽亚对于该先迈出哪一只脚而犹豫不决，便让从诞生和受洗起就同这座惟一能救世的教堂关系密切的我，担起责任；自那充满爱与汽水粉的半个月以来，玛丽亚第一次任凭我来领引她。

我们离开了在嗡嗡的八月户外有嘈杂的铁路路堤。我有些悲哀，手指尖轻搓外套遮掩着的鼓，面无表情，神色漠然，心中却怀念起在我可怜的妈妈身边做的弥撒、主教主持的弥撒、晚祷以及星期六忏悔。我可怜的妈妈去世前不久，由于同扬·布朗斯基过往太密而变得虔诚，每个星期六都要轻松地忏悔，星期日领圣餐以恢复精力，为了在接下来的那个星期四更轻松、更振奋地在木匠胡同同扬幽会。当年的那位圣下姓维恩克，直到现在还是圣心教堂的神甫，用轻得让人舒服而又难以接受的声音布道，唱信经时声音那么细又拖着哭腔，要不是那个左侧祭台和祭台上的童贞女、童子耶稣和施洗童子的话，我的心可能真的会被诸如信仰之类的东西填满了。

但是，还是那个祭坛怂恿我领着玛丽亚由阳光下进入大门，走过铺砖地来到中堂。我从容不迫，默默地坐在玛丽亚身边的橡木椅子上，越来越冷漠。我多年以来始终认为，还是当年的那些人，胸有成竹地翻阅着告解书，等待着维恩克圣下的耳朵。我们坐在中堂略偏一侧的地方。我想让玛丽亚轻松一点儿，自己去作出抉择。其一，她同忏悔室之间有一定距离，不会使她心烦意乱，她也可以默默地以非正式的方式改宗，其二，她可以观察一下别人在忏悔前做些什么，边观察边做决定，也进入忏悔室走到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圣下的耳朵边，同他商量改宗加入惟一能救世的教会的细节。玛丽亚在气味、灰尘、石膏之下，在曲曲弯弯的天使和折射的光线之下，在痉挛的圣徒之间，显得如此渺小、双手笨拙地跪在甜蜜地痛苦不堪的天主教宗之前、之下、之间，头一回画十字却又把方向弄反了，这一切都让我感到遗憾。我用手指轻触玛丽亚，给她示范了一遍画十字的正确动作，指给这个求知心切的女人看，圣子、圣父、圣灵分别在她的额头后面，她的胸部深处，她的肩关节里面的什么地方。我又指点她，如果想得到诚心所愿之事，十指该怎样交叉。玛丽亚听从了，诚心地让双手安稳下来祈祷。起初，我也试着一边祈祷一边追思几位死者，但是，当我为罗丝维塔恳求天主，为使她得到永恒的安宁并进入天国的欢乐而同天主商量的时候，我出神地想的都是些尘世的细节，致使永恒的安宁和天国的欢乐最后都被搬到巴黎的一家饭店里去了。因为做祈祷时多少不受义务的约束，我只有靠做弥撒祈祷来使自己解脱，我念了许多个永恒，一心向上，以祈求应得的和正当的此为满足并从旁注意着玛丽亚。

她正适合于天主教祈祷。她祈祷时漂亮得值得画下来。祈祷使睫毛变长，眉毛变粗，面颊变红，额头变重，脖子弯曲，鼻翼翕动。我差点玛丽亚那张痛苦之花盛开的脸引诱而去贴近她。即使祈祷者愿意成为对某个观察者来说具有观察价值的人，即使这对于祈祷大有裨益，那也不可以。无论谁都不该打扰祈祷者，既不该引诱祈祷者，也不该让祈祷者引诱自己。

于是，我双手依旧规矩地放在使外套隆起的鼓上，从被人磨得光滑的教堂木椅上滑下来，我从玛丽亚身边逃走，带着鼓，到了铺了砖地，蹑手蹑脚地从一站又一站的十字架旁溜过，因为我们既没有丢失钱袋，也没有丢失钥匙，所以没有在圣安东尼那里停留，我们也让那个被古普鲁策人打死的布拉格的圣阿达尔贝特，安稳地躺在左边，我们不停步，从可以当棋盘用的一块方砖

跳到另一块方砖上，一直到宣告左侧祭坛的台阶的地毯上。

这座新哥特式的砖砌圣心教堂内部以及左侧祭坛所有一切都没变。一丝不挂的、粉红色的童子耶稣一直还坐在童贞女的左大腿上，向童贞女的右膝挤去的，依旧还是那个用巧克力色的蓬乱的毛皮勉强遮身的童子约翰。童贞女本人仍然用右手的食指指着耶稣，一边眼望着约翰。可是，我在离乡多年之后对童贞女那种做母亲的骄傲感不大感兴趣，更感兴趣的是那两个男孩的体态。耶稣的身材可能同我的儿子库尔特过三岁生日时的身体差不多，比我高出两公分。根据证明文件，身高同我一样的约翰要比那个拿撒勒人年纪大。但是，这两个孩子的脸部表情却都和永恒的三龄童通常的脸部表情一样的少年老成。一点也没有变化。他们还保持着多年前我和我可怜的妈妈一起进圣心教堂时那种自以为聪明地看着的样子。

我踏上地毯，没有口念“登上”上了台阶。我仔细察看每一道褶纹，用我的感觉比所有的手指加在一起还多的鼓棒，细心地一件不漏地检查这两个一丝不挂的孩子的涂色石膏像：大腿，肚子，胳膊，数着有多少肥肉间的肉纹和肉窝。他们都有强健的肌肉，有力的、有点见肥的膝盖，短而有肌肉的鼓手的胳膊和我的体格几乎一样。这个小调皮鬼，坐在童贞女的大腿上，把胳膊和拳头举起，好像想敲铁皮鼓，好像我不是鼓手，而耶稣这个鼓手正等待在我的铁皮上给我，童贞女和约翰敲出一些有魅力的节奏。

我就如几年前，摘下肚子前的鼓，去给耶稣试试。我考虑到这涂色的石膏，小心翼翼地把我的红白相间的鼓放到耶稣粉红色的大腿上。我这样做的目的是了却我的宿愿，而非祈望会出现奇迹，倒是想生动具体地欣赏耶稣的无能，尽管他举起了拳头那样坐着，尽管他具有我的身材和结实的体格，尽管他是石膏做的，轻易地扮作一个三龄童，而我却倍尝困苦费尽心机才保持住了这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样的形象。他只会摆出一副似乎会敲鼓的架势，他也许想着：只要我有了鼓我就会敲。于是我说，即使有了你也不会敲，并把两根鼓棒插到他的十根香肠状手指间去，我笑得弯了腰：甜蜜的五彩石膏耶稣镐铁皮吧！我向后退，下了三级台阶，由地毯退到铺砖地。当我继续向后退到一定位置笑得前仰后合时，耶稣还坐着不敲，我感到像啃猪皮本古籍一般无聊时，他敲了。

他像是先是左手，后是右手，随后用两根鼓棒，交叉成十字敲着，急速擂鼓倒还像样，十分认真的，喜爱变奏，简单的节奏同复杂的节奏敲得一样好，不搞花招，只在铁皮上施展本领。但一切都还是静止不动，我没觉出有宗教味，也没有粗俗的大兵腔，倒是纯音乐的。他还欣赏流行曲，在当时被大家传唱的曲子中选敲了《一切皆成往事》，还有《莉莉·马伦》。他慢慢地，或者是猛地一下把髻发脑袋转过来，用布朗斯基的蓝眼睛对着我，非常傲慢地微笑着，把我心爱的曲子编成了一首合成曲：用《玻璃，玻璃，小玻璃》开始，然后是《课程表》，他像我一样演奏了拉斯普庭对抗歌德，我们一起登上塔楼，爬到演讲台底下，在港口防波堤上抓鳗鱼，跟在我可怜的妈妈一头小的棺材后面，而他一再同我一起待在我的外祖国安娜·科尔雅切克的四条裙子底下最使我迷惑。

这时，我又从地毯上被吸引到铺砖地上。我跨上了一级又一级祭坛的台阶。走了上去，可我宁愿是在往下走。“耶稣，”我把剩余的声音全都集中起来才挤出这么一句话，“可不能这样。赶快把鼓还给我吧。你有你的十字架，就够了！”他没停下并敲完了这首合成曲，把鼓棒交叉在铁皮上，认真得夸张。他二话不说，便把我轻率地借给他的东西还给了我。我也不道谢，正要像十个魔鬼似的匆忙下台阶，从天主教的信仰中跳出去，这时，一个悦耳的、命令式的声音接触到了我肩膀：“你爱我吗？奥斯卡？”我头也不回地回答说：“不知道。”他没有加重语气，接着

用同样的声音问：“你爱我吗，奥斯卡？”我没好气儿地回答说：“真遗憾，一点儿也不！”这时，他第三次纠缠我：“奥斯卡，你爱我吗？”我把脸转向他怒赤道：“小子，我恨你和你所有无用的东西！”

他因我的呵斥而越发得意地说话。他活像一个国民小学的女教师，伸出食指，给我一个任务：“我要在你这块岩石上建起我的教堂。继承我吧！”

怒不可遏的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我把他的一根石膏脚趾折断了，他再也动弹不了。我低声说：“你再说一遍，我就把你的颜色刮掉！”

他沉默下去。这时，像以往一样，那个永远拖着脚步走过世上所有的教堂的老头来了。他根本没有发现我，向左侧祭坛行礼，拖着脚步继续走去，已经到了布拉格的阿达尔贝特前面，我也匆匆下了台阶，从地毯踏上铺砖地，头也不回地走过这棋盘回到正按照我的指点以正确的方式画天主教的十字的玛丽亚身边。

我把她的手抓住，把她领到教堂中间的圣水池边。在快到大门的地方，我自己没有跟她一起再次朝主祭坛画十字。我在她正要下跪时，把她拽到了太阳底下。

铁路路堤上的东方女工们已经走了，已是傍晚了。蚊子像葡萄挂在空气里。朗富尔郊区车站前不远处一列货车在调轨。从上面传来的钟声被调轨的嘈杂声淹没了。蚊子仍像一串串的葡萄。玛丽亚哭肿了脸。我真想大叫大喊，该用什么办法来对付耶稣呢？我的声音要能装上弹药就好了。我同他的十字架一点关系也没有？不过我心里明白，我的声音对付不了他的教堂的窗户。他还会靠名叫彼特鲁斯或彼特里或东普鲁士的彼特里凯特这号人修建他的殿堂的。“听着，奥斯卡，别破坏教堂的窗户！”魔鬼在我心中小声说，“你的声音会被他毁掉的。”就这样，我只是抬头量度了一下这样一扇新哥特式玻璃窗的尺寸，就拔腿走了，跟在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玛丽亚身边心不在焉地朝车站街下跨道走去，穿过滴水的隧道，上面是小锤公园，再向右拐入马利亚街，经过屠夫沃尔格穆特的门口，向左拐入埃尔森街，过了施特里斯溪来到新市场，那里正在修一个防空水池。经过长长的拉贝斯路，我们回到了家。我离开玛丽亚，爬上九十级楼梯到了挂着后面堆着防空沙的床单，在沙堆和桶以及几捆报纸和几摞屋面瓦后面是我的书和前线剧团时期的备用鼓的晾衣间。我逐个把一只鞋盒里的两只坏的梨形电灯泡唱碎，整齐地切下第三只肥大的那一半，在第四只上面用歌声刻上花体字母 JESUS（耶稣），然后又把这玻璃和铭文都变成粉末。没有了电灯泡，我也无法继续了。我全身疲惫，躺倒在防空沙堆上：我的声音还在。耶稣可能会有一个继承人。撒灰者将成为我的第一批门徒。

撒灰者

就只我在召集门徒时会遇上无法克服困难这一条，我就不合适做耶稣的继承人。可是，当时的天命却循着很多条曲折的道路寻访到我的耳朵，让我接替了我并不信仰的前任。不过，教规中说：怀疑者信，不信者信得最长久。我无法用怀疑将耶稣在圣心教堂里向我个人显示小小的奇迹埋葬，相反，我企图让耶稣再表演一次击鼓。

我没带玛丽亚从死死坐在椅子上无法阻挡我的特鲁钦斯基大娘那溜走去了好几次那座砖砌教堂。耶稣向我显示了什么呢？我为何深更半夜还待在教堂的左耳堂，让教堂司事把我锁在里面呢？为什么我让自己在左侧祭坛前冻得四肢僵直、耳朵僵硬？我牙齿格格响地奉承也罢，咒骂也罢，我听到我的鼓声和耶稣的声音。

午夜时分，我在圣心教堂的铺砖地上，我活到现在还从来没有听到过像那时那样牙齿格格响的声音呢！没有第二个傻瓜能找到比我更妙的拨浪鼓。我模仿着一段到处布置着不惜弹药的机关枪的阵地，在上颚和下颚之间设了一家内有办事女郎和打字机的保险公司的经理处。我的牙齿的格格声向四方传出，引来了回声与掌声。立柱打寒噤，拱顶起鸡皮疙瘩，我的咳嗽声一条腿跳过铺砖地棋盘，到十字路口往回走，登上中堂，飞上唱诗班席，咳嗽六十次，像一个不在唱歌，却在排练咳嗽的巴赫协会。我正希望着自己的咳嗽声能钻进管风琴的管子里去藏起来，保持沉默，直到星期天弹奏众赞曲时才发作，这时，圣器室里传来了咳嗽声，马上又由布道坛传来，最后在主祭坛后消失，在十字架上那个体操运动员背后。它很快就把它灵魂咳了出来。我的咳嗽咳着说：所有的事已经成了，其实，什么事也没有成。童子耶稣没有受冻，却僵硬地拿着我的鼓棒，抱着粉红色石膏大腿上的我的铁皮，没有敲鼓，也没有确认我的继承权。我特别希望会有一份吩咐我接替耶稣的书面证明交到我手上。

在参观教堂，甚至在参观最著名的大教堂时，我只要一踏上铺砖地，即使处在最佳健康状况之下，便会因至今仍留在我身上的不良习惯而放声持续地按哥特式、罗马式或巴洛克式的风格、高度和宽度扩展开去地咳嗽。再过若干年，我还将让自己的鼓回响起我在乌匀姆以及施佩耶尔大教堂的咳嗽声。不过那时候，当我于八月中旬让坟墓般冰冷的天主教精神对我施加影响时，我是想不到去遥远的地方旅游并参观教堂的。假如我是个穿军装的人，参加了有计划撤退，倒有可能在随身携带的小日记本里记上：“今天撤出奥尔维耶托，教堂的正面构造妙不可言，等战后再同莫妮卡一起重游，细细品味。”

因为家里没什么心情，因此常去教堂对于我来说并不是一件难事，家里有玛丽亚。但她有马策拉特。我的儿子库尔特这个小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淘气已经更加让人受不了了。他把沙子扔进我的眼睛，抓我，还居然把他的手指甲折断在我的肉里。我的儿子还对我用他那只要一看到这对敏捷的双胞胎，鲜血就会从鼻子里迸涌出来的白手指节骨挥拳头。

令我吃惊的是，笨手笨脚的马策拉特真心关怀我。我在惊讶之余，便听凭这个我一向觉得可有可无的人把自己抱在怀里，紧紧搂住，细细瞅着，有一次甚至流着泪吻了我，与其说是对着玛丽亚不如说是对着自己说道：“可不能这样办。我可不能把自己的儿子送走，即使那个医生说上十次，而所有的医生也都这么讲。他们一定是因为自己没有孩子才写那种信的，让他们去写好了。”

玛丽亚像每天晚上那样坐在桌子前，把食品印花贴到裁开的报纸上。她抬起头来说：“阿尔弗雷德，你放心好了。你这样讲，好像这件事与我无关似的。但他们要说，今天就得采取这种办法的话，我真不知道到底如何是好。”马策拉特用食指指着那架自从我可怜的妈妈死后再也没有人弹奏过的钢琴，说：“阿格内丝决不会，也不允许这样做！”玛丽亚瞧了一眼钢琴，直到说话前一直耸着肩膀：“当然了，她是他的母亲，始终希望他会好转。可你已经看到了，他好不了，到处受人欺侮，不知怎么活下去，也不知怎么死掉！”

似乎马策拉特从一直悬在钢琴上方用阴沉的目光打量着阴沉的希特勒的贝多芬的肖像吸收了力量。“不！”他吼道，“决不！”他一拳捶在放在桌子上，湿的、黏手的贴有印花的纸上，让玛丽亚把疗养院管理处的信递给他，读着读着，就把信撕碎，把碎片扔到面包印花、肥肉印花、食品印花、旅行印花、重劳工印花、特重劳工印花之间以及怀孕的母亲和喂奶的母亲的印花之间。虽然幸亏有马策拉特才没有落到那些医生的手心里去，但他自那以后直到现在都看出这么一件事：只要玛丽亚一出现在我的眼皮底

下，我就会看到一座漂亮的坐落在最佳的山区空气中，院里有明亮的、亲切的、现代化的手术室的治疗院。在手术室加软垫的门前，羞涩却充分信任地微笑着的玛丽亚把我交给了最好的医生。他们同样唤起别人信任地微笑着，但他们放在白色的、消过毒的工作服后面的手里却拿着最好的、唤起信任的、即刻生效的针管。这么一讲，我被大家抛弃了，只有我可怜的妈妈的阴影使他的手指动弹不得，无法在帝国卫生部的来函上签字，多次阻止了我这个被离弃的人离开这个世界。

我的鼓和声音还都在，我并非一个不知感恩的人。大家了解我同玻璃对阵时的全部战果，但我的声音不能显示什么新玩艺儿，使得某些喜欢变变花样的人定会觉得无聊。但，对我来说，声音是我的存在的永远新鲜的证明，这一点是我的鼓所不能比拟的。只要我还能用歌声把玻璃唱个粉碎，我就还活在这个世界上。

那段时间，由于绝望，我唱得很多。每当我很晚很晚离开圣心教堂的时候，总要唱碎点什么。我朝家里走去，从来不去找寻特殊的目标，而是挑选了一间灯光没有被全部挡住的复斜式屋顶阁楼的窗户，或是一盏为防空涂成蓝色的闪烁不已的路灯。每次上教堂以后，我总要另选一条回家的路。这次，我穿过安东·默勒路去马利亚街。那次，我便沿乌法根路而上，绕过康拉德学校，让学校的玻璃大门当啷响，接着便走过帝国殖民区去马克斯·哈尔贝广场。八月底的一天，我去教堂是太晚了。大门已经上锁了，我决定绕一大段路，以消除我的怒气。我走车站街，每逢第三盏路灯我就把它唱到地上，在电影院后面向右拐进阿道夫·希特勒街，让左边步兵兵营的沿街窗户躺倒，让一辆从奥利瓦方向迎面开来的车里几乎空无一人的有轨电车清凉我心，我把电车左侧涂暗的玻璃全部唱成了粉末。

有几个人在电车刹住后下车骂了几句又回去了。这点战果我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并不注重，为了消释怒火，我寻找着一份餐后小吃，在那如此缺乏美味甜食的岁月里寻找美味甜食，当我在朗富尔区最外缘、贝伦特家具作坊旁边、飞机场的大片木板房营地前面见到横卧在月光下的波罗的海巧克力厂的主楼时，我一下子把脚步停住了。

我由于火已经渐渐消了，便没有采取传统方式，立刻向克力场作自我介绍。我特别从容地把月亮已经数过的玻璃再数一遍，得出的总数同月亮得出的相等，我应该现在开始作自我介绍。可是，我首先得弄清楚那几个从霍赫施特里斯区起，或者在车站街的栗树下就开始尾随我了的半成年人是怎么回事。有六七个小伙子藏在霍恩弗里德贝格路电车站旁的候车亭前面或里面，还有另外五个躲在通往索波特的公路的头几棵树后面。

我给那些小伙子们让路，决定顺延对巧克力厂的拜访，绕一段路，沿着飞机场旁边的铁路桥溜走，从劳本殖民区走过，直到小锤路旁的股份啤酒厂。这地，我听到从铁路桥那边传来的他们的此起彼落的、信号般的口哨声。毫无疑问，他们追我来了。

我在尾随者业已露面但还没有开始追捕的时间内，在这样的处境下，慢吞吞地、细细品尝地列举出最后的解救办法：我可以大声喊叫妈妈和爸爸。我可以用鼓引来某个人，或一个警察。成年人肯定会支持我，但我有自己的原则，因此拒绝成年过路人的帮助以及警察的调解，却受到好奇心和自信心的纠缠，想看一下事态的发展，便干了件愚蠢透顶的事：我想在巧克力厂区前的沥青栅栏上寻找一个缺口，没找到，却见到那些半成年人离开了电车站的候车亭和索波特公路的树木的阴影。我沿着栅栏往前走，铁路桥那边的几个也来了，木板栅栏还是没有洞。他们没有凶猛的来势，反倒是分散着溜达。他们给我的时间恰恰是在栅栏上再找一会儿直至找到一个缺口所需要的，终于有一处缺一根木条，我便从缝里钻了过去，衣服不知哪儿被钩破了一个角。钻过去之后，我看到四个穿防套，手全插在滑雪裤裤兜里的男孩站

在我面前。我立刻意识到我那无法逆转的处境，便先在衣服上寻找过栅栏缺口时被钩破的那个角。在右裤管上找到了。我劈开两指量了量，真气人，口子还真大，但我装出无所谓的样子，反正也这样了，举头望天，等着从电车站、从公路、从铁路桥几方面过来因为栅栏上那个缺口对他们不合适的小伙子翻过栅栏。

在月亮时而被云遮蔽的八月底的某一天。我数了数这些小伙子，总共二十人。最小的十四岁，最大的十六七岁。樱桃丰收的一九四四年我们遇上一个酷热的夏季。四个年纪较大的捣蛋鬼身穿空军辅助人员制服。他们三两成群地围在我身边，小声聊着，使用一种切口，但我一点也不费力就能听懂。我只记住了一小部分，他们相互间用古怪名字的称呼。有一个十五岁有一双模糊的豹子眼的小子，叫他力支兔，有时也叫德力支兔。他旁边那个，他们把它叫做赤膊天使。那个个子最小但年纪与之不符的调皮鬼，上唇突出，是个咬舌儿，人家喊他煤爪。别人称呼一个空军辅助人员密斯特先生，又相当贴切地称另一个家伙为汤母鸡，还有历史人物的名字：狮心。蓝胡子是个白嫩脸蛋的小子。有我熟悉的名字——托蒂拉和泰耶，另外两个叫贝利萨尔和纳赛斯，真是狂妄至极。我比较认真地看了看他们的头，一个只有十六岁头戴像养鸭池的凹形毡帽，身穿长雨衣的施丢特贝克。

我看他们只得等着我屈服而并不看我，便坐到了鼓上。两条腿特别累，我一半开心，一半对自己恼火，我怎么参加进了这显然是孩子们的浪漫戏？我看着稍有些缺的月亮，想着圣心教堂。

我坐在波罗的海巧克力厂的院子里，参与了骑士和强盗的游戏。耶稣可能等着我，打算敲一通鼓以后再启口讲话，明确地让我接替基督，可是我没有去，他失望了，肯定又傲慢地扬起了眉毛。耶稣会对这些小伙子怎样？与他状貌相同的我，他的接班人和代表，又该怎样同这帮孩子打交道？我能用耶稣的话“让小孩子到我这儿来！”招呼这些自称为赤膊天使、德力支兔、蓝胡子、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煤爪和施丢特贝克的半成年人吗？施丢特贝克在他的得力助手煤爪的跟随下走上前来说：“站起来！”

我还瞅着月亮，心里还想着圣心教堂左侧祭坛前面。我没有站起来，施丢特贝克使了个眼色，煤爪一脚把我屁股底下的鼓踢开了。我站起身来，拣起铁皮鼓，放在外套下面，保护它，不让它继续受到摧残。我觉得施丢特贝克很漂亮。一双眼睛陷得太深，彼此离得太近，嘴的部分显出他有活力和富于想象。盘问开始了。

“哪来的你？”

我讨厌这样跟我打招呼，便又举头望从不挑剔的明月，我便把月亮想象成鼓，又笑自己的狂妄自大，不觉微微一笑。

“他在狞笑，施丢特贝克！”

煤爪注视着我，并建议他的头头，采取一种他称之为“撒灰”的行动。围在后面的其余的人，脸上长脓疱的狮心、密斯特、德力支兔和赤膊天使，也都表示赞成。

我照旧眼望明月，心里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拼读“撒灰”这个漂亮的词儿。心里想着这肯定不是什么好受的名堂。

“什么时候撒灰由我决定！”施丢特贝克把他那一帮人的嘀咕结束后，又冲着我说，“我们常在车站街见到你。你是从哪儿来？你在那儿干什么？”

同时提出两个问题。我认为如果想控制住局面，那至少得给一个回答。于是，我把脸从月亮那儿转过来，用我那双有影响力的蓝眼睛望着施丢特贝克，镇静地说：“我从教堂来。”

他们在施丢特贝克的雨衣后面又起了嘀咕声，给我的回答作补充。煤爪查明，我说的教堂即指圣心教堂。

“你叫什么名字？”

这一提问在人与人的会话中占有重要地位。人与人相遇就会这么问。这个问题一定得来。许多剧本就靠回答这个问题而存

在，有长有短，也有歌剧，譬如说，《洛恩格林》。

我在月光从两片云之间透出，照亮我的蓝眼睛后光辉反射到施丢特贝克脸上有喝三匙汤的工夫，之后回答了他们的提问。由于他们一听奥斯卡这个名字准要哈哈大笑一通，所以我怀着妒忌心等待着即将说出的那句话的效果，于是，我说：“我叫耶稣。”在这番自白引来的长久的沉默。之后，煤爪清清嗓子说：“一定得给他撒灰不可，头儿。”

施丢特贝克一捻手指，啪的一声批准煤爪撒灰。煤爪一把抓住我，用他的手节骨顶住我的右上臂，快钻，干凿，火辣辣的，让我感到特别痛，直到施丢特贝克又啪地捻响手指，下令住手他才罢休。原来这就叫撒灰！

“说吧，你叫什么？”这个头戴毡帽的首领很不耐烦地向右方击一空拳，让过长的雨衣袖子往后滑去，在月光下露出他的手表，又朝左边的我低声说：“考虑一分钟。然后我施丢特贝克可就要撒手不管了。”

我可以在一分钟内不受惩罚地举目望月，在月亮的火山口里寻找借口，对已经作出的接替基督的决定再产生怀疑。我讨厌撒手不管这种话，也决心不让这帮小子用时间来约束我。于是，约莫过了三十五秒种以后，奥斯卡说：“我是耶稣。”

下面发生了非我导演，但效果不同凡响的事。我再度表白接替耶稣之后，施丢特贝克捻响了手指，但空袭报警器在煤爪动手前响了。

警报声始终不停地证明我是耶稣。他们包括附近飞机场的警报器，霍赫施特里斯步兵兵营主楼的警报器，朗富尔森林前面霍斯特—韦塞尔中学屋顶上的警报器，施特恩菲尔德百货大楼上面的警报器，还有很远之外的从兴登堡大街传来的技术高等学校的警报器。过了很久，郊区所有的警报器才接受了我所宣告的福音，像大天使冗长而恳切的合唱，使黑夜膨胀、塌陷，使睡梦颤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动、破裂，又钻进沉睡者的耳朵，使不受影响的，不能用防空黑帘挡住的一个天体——月亮恐怖得吓人。

我知道，使施丢特贝克变得神经质的空袭警报和我是一伙的。警报直接召唤他手下的一部分人去值勤。他不得不让那四名空军辅助人员翻过栅栏返回连队，去电车停车场和飞机场之间的八十八毫米高炮阵地。他的另外三个人，其中有贝利萨尔，在康拉德学校值防空哨，也必须立刻离去。他把剩下的十五个小伙子集合在一起，因为天空未出现任何情况，便又开始审讯：“那么，如果我们没有听错的话，你是耶稣。请直接回答你怎样把那些路灯和玻璃弄碎的？”

他们顶多领略过我声音的威力，但一定不清楚。我告诫自己要对这些未成年的孩子持宽容态度，要在今天的话，人家会干脆地把他们叫做小流氓。他们有目标，但方法太直接，有些愚蠢。我打算采取温和的客观态度原谅他们。他们就是几个星期以来全城都在谈论的、引人注意的一个青年团伙撒灰者，刑事警察局和希特勒青年团的许多巡逻队正在追踪他们。后来查明他们是康拉德学校、圣彼得中学和霍斯特—韦塞尔中学的学生。在新航道还有由中学生领导，三分之二成员是席哈乌船坞和火车车辆制造厂学徒的第二个撒灰者团伙。这两派除了在下述场合才联合行动外合作很少。即夜间由席哈乌巷出发，在斯特芬公园和兴登堡大街兜捕，这时正受完晚间训练从主教山的青年招待所回家去的德意志少女同盟的队长们。这两派相互间为了不发生冲突，把行动区域划分精确了。施丢特贝克把新航道那一派的首领视为朋友而非竞争对手。撒灰者团伙反对一切。他们把希特勒青年团的值勤处洗劫一空，抢走在公园里同姑娘们作爱的前线休假人员的奖章和军阶标志，从高炮连靠入伙的空军辅助人员的帮助窃走武器、弹药和汽油，从一开始就计划大举进攻经济。

我那时对撒灰者组织和他们的计划一点也不了解，只感到自

己相当孤独与不幸，想在这些半成年人的圈子里得到一种安全感。我已经暗暗地把自己加入到这些小伙子当中。近二十岁的我已经把什么我同他们年龄差别太大之类的话当成耳边风了。我怪为什么不给这些小伙子们表演一下我的艺术。年轻人的求知欲总是特别强的。给他们看个实例，表演点什么让他们开开眼会让他们崇拜我，可能进而会听从你的。现在，服从天意，召集门徒，接替基督吧！我要用充实我的丰富经验和智慧对他们施加影响。

我非常感谢给我时间的施丢特贝克，他也觉得我的沉思很有道理。八月底，突袭警报在云稀的月夜响起了。可能是一架侦察机，在海岸两三道探照灯光。那时，巴黎已经放弃。中央集团军在长距离赛跑以后在魏克塞尔河停住了。有许多窗户有主楼，波罗的海厂再也不会为零售商而是在为空军生产巧克力。我也要对这个想象熟悉一下：巴顿将军的士兵穿着他们的美军制服在艾菲尔铁塔下散步。我举起了一根鼓棒痛苦地回忆起与罗丝维塔共同度过的那些岁月。施丢特贝克觉察到我的表情，目光随我鼓棒指向巧克力厂。在极明亮的月光之下，太平洋上一小岛的日军被肃清。这里，月亮却同时躺在巧克力厂所有的窗户上。我对想听我说话的人宣布我要唱碎玻璃的决定。

我在把头三块玻璃粉碎之前，突然注意到有一只苍蝇在我头顶上很远的地方在嗡嗡叫。我在另外两块玻璃放弃了月光的时候心想：嗡嗡声这么响，这准是一只垂死的苍蝇。我接着把工厂最高一层剩下的窗户画成黑色。那么苍白得可怕的探照灯。接着，我从工厂中间和最下一层的许多窗户里拆除了可能由纳维克兵营旁边的高炮连射来的灯光的反光。先是海岸高炮连开炮，接着，中间一层的玻璃被我全部解决了。紧接着，旧苏格兰、佩朗肯和舍尔米尔的高炮连都得到了开火命令。这是底层的三扇窗户——黑夜歼击机，从飞机场起飞，贴着工厂房顶一掠而过。高射炮在我把底层解决掉之前停止了射击，让奥利瓦上空同时用三个探照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灯隆重欢迎的一架远程轰炸机被黑夜歼击机击落。起先我还担心，自己的表演跟富有效果的空防工作同时进行会分散小伙子的注意力，甚至会把他们的注意力从工厂引诱到夜空中去。

我的工作完毕后整个团伙还注视着没了玻璃窗的巧克力厂表示惊讶。从近处的霍恩弗里德路传来了像在剧院里那样的喝彩声，多半是坠落而不是降落在耶施肯山谷的森林里的被击中的燃烧的轰炸机。即使这时，也只有少数几个团伙成员，其中有赤膊天使的眼神，被拽离了这座无玻璃的工厂。但与我关系重大的施丢特贝克和煤爪对飞机则不屑一顾。

然后，黑夜歼击机降落。天上只剩下月亮以及星星的琐碎事儿。很远的地方响起了救火车的声音。这时，施丢特贝克转过身来，让我看到了他那一直蔑视地噘起的嘴，作了一下拳击动作，摘下了露出了过长的雨衣袖下的手表，无言地递给了我，喘着粗气，想说什么，又必须等解除警报过去，最后，在他的孩儿们的掌声中对我说：“行，耶稣。但愿你会觉得成为一名撒灰者很有意思！”

我掂了掂那块夜光指针指的零点二十分的精制的手表后把他送给了煤爪。他向他的头头投去了询问的目光。施丢特贝克点头表示同意。我把鼓放到舒适的位置让他们跟随着我准备上路回家。

耶稣诞生戏

我们作为撒灰者有真正的奇迹武器，因此不必同人们一样对它们谈论不已。

我接手领导这个有三四十人的团伙之后，先让施丢特贝克介绍我认识诺伊法瓦塞尔派头目。摩尔凯纳，十七岁，瘸子，新航道领港局一名负责官员的儿子，由于右腿比左腿短两公分的残疾

既不能当空军辅助人员，也无法应征入伍。又很腼腆，说话声音很轻的。摩尔凯纳故意明显地显示他的瘸腿。这个一直狡猾地微笑着的年轻人是康拉德学校高年级的优秀生，想上大学攻读哲学。如果俄国军队不提出异议的话，他非常有希望以优异的成绩通过毕业考试。

腿瘸的摩尔凯纳也把我当成耶稣般敬重我，无条件地让我带领他们。一开始，我就让这两派领我去看仓库和金库。他们把外出行劫所获集中在同一个地窖里。朗富尔区耶施肯山谷路一所幽静、高雅的别墅里有一个宽敞而干燥的地窖。别墅布满各种爬藤植物，由一片坡度平缓的草地同街道隔开，房东是赤膊天使的，用“封·普特卡默”这个姓氏的父母。封·普特卡默先生待在美丽的法兰西，系波莫瑞—波兰—普鲁士血统的骑士十字勋章佩戴者指挥一个师。伊丽莎白·封·普特卡默太太体弱多病，几个月前已去上巴燕疗养。而撒灰者唤作赤膊天使的那个沃尔夫冈·封·普特卡默，成了别墅的主人。因为我们是经由洗衣间去地窖的，因此从未见到耳朵几乎全聋了的留在别墅里照料少爷的老使女。

仓库里码着罐头、烟草和许多包降落伞。有一个架子上挂有两打军用表，赤膊天使按照施丢特贝克的命令让表按完全相同的时间走着。他还得擦洗两挺机关枪、一支冲锋枪和若干支手枪。然后让我看了一个反坦克火箭筒、机关枪弹药和二十五颗手榴弹。这包括一大排汽油桶的一切都是为进攻经济局而备下的。于是，我以耶稣的名义下达了第一道命令：“我们用另一种武器！把武器和汽油埋在花园里。枪械撞针交给我。”

他们还给我看一个里面装满了抢来的奖章和荣誉章的香烟盒。我微笑着同意他们把这些装饰品据为己有。我真应该从这些小伙子手里取走伞兵用的刀。他们日后真的用上了漂亮的跃跃欲试的刀把上的刀刃。

然后他们把我带到了金库，我让他们当面点清，复核，记下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金库存款计两千四百二十帝国马克。时当一九四四年九月初。到了一九四五年一月中旬，科涅夫和朱可夫突破魏克塞尔河防线时，我们被迫放弃了地窖里的金库。赤膊天使还告诉我在州最高法院的桌子上堆放着我们交出的总计三万六千帝国马克的成捆钞票。

我有遇到行动时留在幕后的天性。白天，我多半独自一人，间或也让施丢特贝克陪同，为夜间行动寻找值得一搞的目标，随后我则不离开特鲁钦斯基大娘的寓所，让施丢特贝克或摩尔凯纳去组织实施，到了深更半夜，站在卧室窗口，用比先前更具有远程效果的被我称作奇迹武器的声音唱碎许多个党的办事处的底层窗户，一家印生活必需品票证的印刷厂的后院窗户，还有一次，在他们强烈要求报复的要求下，唱碎了一位参议教师私宅的厨房窗户。

十一月，V—1 和 V—2 飞弹正飞向英国，而我的歌声则飞过朗富尔，沿着兴登堡大街的树林，跃过火车站、旧城和古城，让小伙子们闯进去，造访屠夫巷和博物馆，寻找木雕船艏像尼俄柏。他们没有找到她。隔壁屋里那位特鲁钦斯基大娘摇晃着脑袋、死死地坐在椅子上。却跟我有某些相似点。我在远程歌唱，她则在远程思念，在天上寻找她的儿子赫伯特，在前线的中间地段寻找她的儿子弗里茨。一九四四年，她的大女儿古丝特，初嫁到了莱茵兰，特鲁钦斯基大娘便在遥远的杜塞尔多夫寻找她。她的丈夫、餐馆领班克斯特有套房子在那里，但他本人却在库耳兰，古丝特跟他一起相处并认识他总共只有短短的他从前线回来休假的十四天。

我在这些和平的夜晚坐在特鲁钦斯基大娘的脚边，在鼓上敲了几段幻想曲，从瓷砖壁炉的烘烤箱里取出一只烤苹果，带着老太婆和小孩子吃的皱巴巴的果子消失在黑暗的卧室里。我把防空遮光纸拉起，把窗子打开一道缝，开始唱歌。我不去歌颂闪烁着

的星星，银河也没有要寻找的东西，我的目标是冬野广场，那幢里面一个门挨一个门，全都是希特勒青年团区总部的办公室的盒状楼。

我的工作清爽的天气里可以很快完成。打开的窗户旁的烤苹果已经凉了。我啃着它回到特鲁钦斯基大娘和我的鼓身边，很快就上床，心里十分有把握，在我睡觉的时候，撒灰者肯定正以耶稣的名义抢劫党的钱柜，生活资料票证，以及更重要的公章、印好的表格或希特勒青年团巡逻队名单。

我宽容地允许施丢特贝克和摩尔凯纳利用伪造的证件去恣意胡闹，值勤巡罗处是团伙的主要敌人。我赞成他们按着自己的兴致去绑架对手，对被绑架者撒灰，以及按负责此事的煤爪所说捆他们的蛋。

这些并不是按我真正的计划的前奏行动，我都没有直接参与，因此也无法证实下面这件事是不是撒灰者干的：一九四四年九月，巡逻处其中一个是人人惧怕的赫尔穆特·奈特贝格的两名高级官员，被捆绑结实，从母牛桥上扔进莫特劳河里淹死了。

有人声称，撒灰者团伙跟莱茵河畔科隆的薄雪草海盗有联系，又说图赫尔荒原地区的波兰游击队对我们的行动影响甚至操纵。作为团伙首领耶稣的我以双重身份否认了这件事。

在后来审理我们的案子时，也有人猜测因为赤膊天使的父亲，奥古斯特·封·普特卡默，跟隆美尔元帅特别接近，因而自杀，所以我们同七月二十日的行刺者和密谋者有关系。赤膊天使在整个战争期间，只匆匆见过他父亲四五次，只注意到他的军阶标志不停地更换。直到审判我们时，这小子才听说了那起对于我们无关痛痒的军官事件，于是不知廉耻地号啕痛哭，使得坐在他旁边的煤爪，不得不在法官面前对他撒灰。

我们在活动期间只和成年人接触过一次。几个共产党方面的船坞工人企图影响我们团伙中那些席哈乌船坞的学徒，把我们变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成红色地下运动。学徒工并不反对。中学生却反对有任何政治倾向。那个撒灰者团伙的犬儒学派分子和理论家，空军辅助人员密斯特，在一次全体大会上发表他的见解说：“我们进行斗争反对我们的父母以及其他成年人，不论他们赞成什么或者反对什么，我们同各政党没有一点儿关系。”

所有的中学生依旧对讲的极其夸张过火的密斯特的话表示同意。这导致撒灰者团伙的分裂。于是，这些很能干，失去他们我感到非常可惜的席哈乌的学徒成立了自己的协会，但又不顾施丢特贝克和摩尔凯纳的反对，依然自称是撒灰者。在他们的组织跟我们的组织同时被破获审判时，他们被指控火烧船坞区人的一般训练用潜艇。一百多名正在受训的潜艇驾驶员和海军中士惨丧性命。从甲板上燃起的大火，使甲板下睡觉的潜艇人员无法逃出水手舱。不满十八岁的海军中士们想钻出舷窗跳进港湾的海水里去逃命，却被他们的髌骨卡住，吞噬一切的烈火迅速从后面烧上来，他们的喊声太响也太久，别人只好从小汽艇上开枪打死他们。

这也许是席哈乌船坞的学徒干的，也许是韦斯特兰德协会的人干的。我们反正没有放火，撒灰者不是纵火犯，虽然作为他们精神向导的我，有可能从外祖父科尔雅切克身上获得了纵火犯的气质。

我如今还记得在撒灰者团伙分裂前不久拜访过我们的从基尔的德国工厂调到席哈乌船坞来的那个装配。富克斯瓦尔一个码头工人的两个儿子，埃里希·皮茨格和霍斯特·皮茨格，带他到普特卡默别墅的地窖里来见我们。他细心地检查了我们的仓库，发现实用的武器太匮乏，但还是勉强说了几句称赞话。施丢特贝克应声回答他关于谁是团伙首领的问题，摩尔凯纳犹豫地指指我，他便狂笑不止，狂妄至极，我差点儿让撒灰者，给他撒撒灰。“他是哪一类的侏儒啊？”他用大拇指在肩膀上方指着我，问摩尔凯

纳。

摩尔凯纳笑得有些难堪，还没说话，施丢特贝克就镇静得惊人地回答说：“这是我们的耶稣。”这个自称是瓦尔特的装配工，对这个名词无法容忍，居然在我们的窝里发起火来：“请告诉我，你们在政治上对头吗？你们都是辅弥撒者，正在为圣诞夜排练耶稣诞生吗？”

施丢特贝克打开了地窖门，给煤爪丢了个眼色，由上装袖管里抖出伞兵刀的刀刃，冲着这个团伙说：“我们是辅弥撒者，正在为圣诞夜排练耶稣诞生戏。”

大家把那个装配工的眼睛蒙住了，领他出了别墅并没有吃什么苦头。不久，席哈乌船坞的学徒分离出去，在那个装配工的领导下搞起了自己的协会，只剩下我们了。现在我能肯定是他们烧了训练用的潜艇。

那天，根据我的意思施丢特贝克作了正确的回答。我们对政治不感兴趣，在希特勒青年团巡逻队吓得离不开他们的值勤室，或者只干在火车站检查放荡的小姑娘的证件之后，我们也依照那位激进的左派装配工的话把工作地点挪到了教堂里面，排练耶稣诞生戏。

我们必须先补充被夺取走了的特别能干的席哈乌学徒的力量。十月底，施丢特贝克让圣心教堂的两个辅弥撒者菲利克斯·伦万德和保罗·伦万德宣誓。施丢特贝克是通过他们的妹妹卢齐与这两兄弟接近的。这个不足十七岁的姑娘在我的抗议下参加了宣誓仪式。伦万德兄弟必须把左手放在小伙子们过分夸张地看成某种象征的我的鼓上照着念撒灰者的套语。

我在举行宣誓仪式时，观察着耸起肩膀，左手拿着一块稍稍有些抖动的夹香肠面包，咬住下嘴唇，三角形的狐狸脸上没有丝毫表情，用目光把施丢特贝克的后背烧得火辣辣的卢齐。我开始为撒灰者的前途担忧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在特鲁钦斯基大娘的寓所引导，撒灰者通力合作，来添置财物。使地窖各室有了非常大改观。我们从圣卡塔琳娜教堂搬来一个半人高的约瑟像，后来证明是十六世纪的原作，几十教堂烛台，一些弥撒器皿以及一面基督圣体旗。还有一天夜里造访特里尼塔提斯教堂，带回一个木制毫无艺术性的吹号天使，一幅可以当墙饰用的五彩画毯。这幅古物复制品上有一个扭捏作态的女士，还有一头顺从她的独角兽。施丢特贝克的见解很有道理，他认为，这条毯子上编织出来的少女的微笑类似卢齐那张狐狸脸上的微笑，显出玩弄成性的残酷。我还是不希望我的副手像神话里的独角兽那样准备百依百顺。地窖的正面墙上以前画着各种乌七八糟的东西，什么“黑手”啦，“骷髅”啦，现在挂上了这幅壁毯，而独角兽最终变成了我们议论的主题。我自问为什么让要把我的副手变成独角兽而目标是真正寓言式的有着夸张的旋涡形角的稀世怪兽——我的惟妙惟肖的编织的第二个卢齐搬过来，有第一个在这里进进出出在我背后怪笑就已经足够了。

我们在基督降临节到来时从周围教堂搬来了许多真人大小，天真可爱的圣婴像。我用它们把那条壁毯一层层地挡住了，使这个寓言剧从前台后撤，变成了压轴戏。十二月中旬，我们的盛大活动的准备工作结束了。龙德施太特发动了阿登攻势。

马策拉特因为玛丽亚完全沉浸在天主教精神里，而苦恼不已。连续几个星期日，我搀着玛丽亚的手去望十点钟弥撒。随后，在我的指示下，全体撒灰者熟门熟路，我都用不着唱碎玻璃，在菲利克和保罗兄弟的帮助下，于十二月十八日夜到十九日凌晨，闯入圣心教堂。

天上飘下来的雪一到地上就化了。我们把三辆手推车停在圣器室后面。保罗·伦万德有大门钥匙。我引导小伙子们陆续来到圣水池前，让他们在中堂下跪，朝主祭坛膝行而去。然后，我指示他们用一条义务劳动局的毯子蒙住圣心耶稣像，不让他的蓝色

目光过分影响我们的工作。德力支兔和密斯特把工具运到左耳堂的左侧祭坛前。首先要把有许多马槽圣婴像和冷杉的马厩移到中堂。我们早就备有所需的牧人、天使、羊、驴和母牛。我们的团伙，跑龙套的特别多，但独缺主角。贝利萨尔搬走祭坛桌上的花。托蒂拉和泰耶卷起地毯。煤爪取出工具。在小凳后面跪着，监督他们的拆卸工作。

首先，我们用带来的金属锯把身披巧克力色粗毛皮的施洗童子锯了下来。在石膏里面，有手指粗的金属棒把施洗者和彩云联在一起。煤爪干锯东西的活时真像个笨拙的中学生。要有席哈乌船坞的学徒在场就好了。代替煤爪的施丢特贝克稍强一些，我们在半小时后才放倒了施洗童子并用毛毯裹上，没了这些噪音，午夜教堂才恢复了寂静。

德力支兔、菲利克斯·伦万德和狮心三人用了整整四十分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整个屁股都贴在童贞女左大腿上的耶稣锯下来。摩尔凯纳要带着他的人直接从新航道来，在教堂同我们相遇，使行进的队伍不致太显眼，但还没到。神经过敏的施丢特贝克情绪特别差。他多次向伦万德兄弟打听摩尔凯纳。最后，不出所料，他们说出了卢齐这个名字。施丢特贝克沉默了，从狮心笨拙的手中夺过钢锯，咬牙蛮干，把耶稣锯了下来。

灵光圈在放倒耶稣像时被折断。施丢特贝克向我道歉。我努力把满腔怒火压下，让人把这个镀金石膏盘的碎片拣到两顶帽子里去。煤爪认为能够用胶水粘合。锯下的耶稣用枕头保护，再裹上两条毛毯。

我们打算把童贞女分锯骨盆以上一截，和脚跟和云之间以下两段锯下，云就留在教堂里了，我们只把童贞女的两截、耶稣，如果可能的话，还要有施洗童子，运到普特卡默地窖去。出乎我们意料的是这组塑像中间是空的，重量很轻，外壁仅两指厚，只有铁架子有点费事。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该让煤爪和狮心几个会用锯的人休息一下了，其他人无法替代他们，包括伦万德兄弟。团伙的人分散坐在教堂的长凳上受冻。施丢特贝克站着，把他进教堂后就搞下的毡帽压凹。我不喜欢这种要出什么事了的情绪。小伙子们忍受不住夜间空荡荡的教堂建筑的气氛。摩尔凯纳的缺席也使大家有些紧张。看来害怕施丢特贝克的伦万德兄弟，站在一旁耳语，直到施丢特贝克命令他们安静。

我慢慢地叹着气从祈祷跪垫上站起来，径直向还留存着目光由对着约翰改为对着满是石膏末的祭坛台阶的童贞女走去。她的右手食指，本来指着耶稣，现在无所指或者说指向黑暗的左耳堂。我逐级登上祭坛，随后向后望去，寻找施丢特贝克深陷的无神的眼睛。煤爪捅了他一下，他这才注意到我在招呼他。他用我从未见到过的六神无主的目光呆视着我。他不懂我的意思，然后慢慢理解了。他慢慢地、缓缓地走过来，却又一步跨上了祭坛，把我抱起来，把我放在那白色的、有些倾斜的、可以看出拉锯人功夫蹩脚的大致描出了童子耶稣屁股的印痕和童贞女左大腿的横截面上。

施丢特贝克马上转过身来，一个箭步到了铺砖地上，正要沉浸于他的幻想，猛然回头，眯起两只离得很近的眼睛，投来闪烁的挑剔的目光。当他看到我那样自然，那样值得礼拜地坐在耶稣的位置上，他和坐在教堂长凳上的小伙子们一样显露出深受感动的表情。

在很短的时间内，他把我的计划领会并扩大了。他让纳赛斯和蓝胡子把拆卸时用的两个手电筒直接对准我和童贞女，他便下令把刺我的眼睛的灯光调成打红光，又示意伦万德兄弟到他身边去，低声交待了几句。他们反对干他所要求的事，煤爪不等施丢特贝克打手势就走过来，对这兄弟两人伸出节骨，准备撒灰。这兄弟两人屈服了，在煤爪和空军辅助人员密斯特的监视下，去到

圣器室。我把鼓放端正，泰然地等着。当高个子密斯特身穿神甫长袍，伦万德兄弟穿上辅弥撒者服，有白有红地回来时，我毫不惊奇。煤爪穿着半身副神甫服，捧来了弥撒所需的一切。他把东西放在那片云上，悄然退下。菲利克斯·伦万德手捧小香炉，他的弟弟保罗拿着铃铛。维恩克圣下的长袍穿在密斯特身上过于肥大，但密斯特摹仿得很好。开始时，他还带着文科中学生玩世不恭的劲头，接着他便被经文和圣事礼仪所吸引。他给我和大家表演了一次真正的而非幼稚可笑的出劣摹仿的，后来在法庭上被称之为弥撒的人们所谓的黑弥撒。

整个团伙在长凳或铺砖地上跪下，画十字。三个小伙子开始分段祈祷。密斯特在某种程度上掌握了经文，还得到两位辅弥撒者的熟练配合开始唱弥撒。唱“登上主的祭坛”时，我便小心地击鼓。唱“求主怜悯”时，我用较强音伴奏。唱“荣耀归于在天之主”时，我也用鼓称颂主，召唤会众祈祷，用一段较长的鼓独奏代替白日弥撒的诵《使徒书》。我敲的“哈利路亚”特别成功。唱圣经时，我发现小伙子们非常信仰我。我奉献仪式时，我的鼓声轻下来，让密斯特摆上面包，用香来熏圣杯和我，在酒中掺水，我看着密斯特怎样行洗手礼。祈祷吧，兄弟姐妹们，在手电筒的红光下我敲着鼓，转入我的肉身化体。我们会祈祷的，密斯特用两种不同文本的主祷文唱道，受神圣谕旨的告诫，他懂得让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在领圣餐时统一起来。还在他们领圣餐的时候，我在鼓上敲起“明认信仰”的引子。童贞女用手指着上任接替基督的我。弥撒进展顺利。密斯特的声音增强和减弱。他祝福时声调很美：减罪，赦罪，宽恕。当他向教堂说出结束语“走吧，现在遣散！”时，所有的小伙子也确实在精神上已获得释放。所以，被世俗的拘捕所捕获的只能是一个信仰坚定，加强了对我和耶稣之名的信念的撒灰者团伙。

我和施丢特贝克都在望弥撒时听到了汽车声响。所以，当人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声从大门、从圣器室、从右旁门响起时，只有我们两个没有突然惊骇。皮靴后跟在教堂铺砖地上咣咣响。我拒绝了施丢特贝克要把我从童贞女的大腿上抱下来的要求。他明白了我的意思，点点头，让团伙依然跪着等待刑事警察。小伙子们便都跪着，虽然在颤抖，有个别人跪着移动，但大家都默默地期待着，直到刑事警察穿过左耳堂，穿过中堂，从圣器室里朝我们走来，把左侧祭坛团团围住。施丢特贝克站起身来，画十字，显现在很多未调成红色的刺眼的手电筒灯光之中，把他的毡帽交给一直还跪着的煤爪，穿着雨衣朝一个没拿手电筒的肿胀的黑影走去，朝维恩克圣下走去，从他的背后拉出一个单薄的、拚命挣扎着的黑影，拉到手电光下，是卢齐·伦万德。他打巴斯克帽下那张板起的三角脸，直到一名警察把他一拳打倒在长凳中间。在童贞女怀里的我听到一名刑事警察大叫“我的主！这真的是局长的儿子！”

我因为有个警察局长的儿子当他的能干的副手而特别得意，接着就扮演起被半成年人诱拐的、咧嘴冷笑的三岁孩子的角色，一点也没抗拒地接受了维恩克圣下把我抱在怀里的庇护。

小伙子们被带走。只有刑事警察在咆哮。维恩克圣下只好把我放到铺砖地上。他突然晕了，一屁股坐在长凳上。我站在我们那些工具旁边，在榫凿和锤子后面发现了那个盛满了德力支兔在我们投入行动前备下的香肠面包的食物篮。

我向瘦瘦的在薄大衣里颤抖的卢齐走去，并把手里篮子中的夹香肠的面包片递给她。她右手抱着我，左手拿着香肠面包，马上把手指间的一块塞到嘴里。我观察着她那张挨了揍的、灼痛的、嘴里塞满东西的脸：眼珠在两道黑缝后面滴溜转，皮肤像被锤子敲打过，一个咀嚼着的三角形，玩偶，黑厨娘，吞食着带皮的香肠，吞食时变得愈加瘦削、饥饿、像三角形和玩偶。这副相貌印在我的额头上和脑子里。没人能从我的额头上和脑子里取走这个三角形。它还会在我心里呆特别久，在那里咀嚼香肠、香肠

皮和人，像三角形那样微笑，像壁毯上训练独角兽的女士那样微笑，也会持续很久。

两名警察把施丢特贝克带走时，向我和卢齐转过他那张满是血污的脸。我却朝他的旁边看去从今以后我再也不认识他了。我由吞食着香肠面包的卢齐抱着，跟在我先前的撒灰者团伙的后面，夹在五六名刑事警察中间，被带走了。

留下的有维恩克圣下，我们的两个始终打着红光的手电筒，和扔下的辅弥撒者服和神甫长袍。圣杯和化为圣体的面包和酒留在祭坛台阶上。锯下的约翰和锯下的耶稣留在那位童贞女身边；而我们本来打算把她搬到普特卡默地窖去，让她同女士驯兽壁毯相抗衡。

但我还是被拉去受审。在对耶稣的第二次审判中，以我和耶稣的无罪释放而宣告结束。

蚂蚁大道

一些被太阳晒黑、并对运动有敏感性的人们在一座天蓝色瓷砖砌成的游泳池里游泳。从池边到沐浴室前，坐着和游泳人们一样晒黑、有敏感性的男男女女还伴随着扩音器里传来的、音量调小的健康但乏味无趣，绷紧游泳衣的轻度的干巴巴的情欲的音乐。谁也没有在很滑的瓷砖地上滑倒。稀疏地立着几个禁令牌，即使如此也纯属多余，因为游泳的人只上这里来待上两个小时，而被禁止的都是游泳池外面才会发生的事情。经常有人从三米跳板上跳下来，却无法赢得游泳的人的注目，更不能引诱躺着的游泳客的眼睛离开有图画报纸。突然间，一个让人感觉到风的年轻人，慢慢地、目标明确地、一档接一档地爬上十米跳台的梯子。眼睛都不再注视杂志连同来自欧洲和海外的报道而跟着他一起往上爬。躺着的躯体变长了，一个年轻女人用手给眼睛遮光，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某人忘了他正想的事，一句话都没说完，一次调情刚开始。现在体格好，精力足的他站在跳台上，上下弹跳，靠在微弯的钢管扶手上，臀部漂亮地一扭离开了扶手，每走一步都会弹上弹下的高悬的跳板，向下望去，注视着天蓝色的、小得令人惊慌的游泳池。池子里，红、黄、绿、白，等各种颜色的女人的游泳帽像多变的万花筒。有熟人道丽丝·许勒和埃丽卡·许勒，尤塔·达尼埃尔和她的男朋友，坐在下面这个男的和她没法相配。她们挥手，尤塔也挥手。他保持着身体的平衡，向下招手。她们叫喊道：试一试，跳呀，尤塔喊道。他根本就没有这个打算，只想看看上面是怎么回事，于是又慢慢地一档一档抓着爬下来。她们又用大家都能听到的声音大声喊道：跳呀！跳呀！跳！

一九四五年一月，我和撒灰者团伙的成员也如待在离天这么近的跳台上一样身陷绝境。我们爬到高处，挤在了跳台上，下面坐着法官、陪审法官、证人和法院办事人员，构成庄严的马掌形，但并不是在有水的游泳池周围。

施丢特贝克走到没有扶手但有弹性的跳板上。

“跳！”法官合唱队喊道。

施丢特贝克没动。

这时，下面证人席上站起一个身材瘦长、身穿贝希特斯加登小茄克和一条百褶裙的少女。一张白色的、再也不模糊不清构成了一个三角形的脸抬起来，像一块闪烁的终点标志牌。卢齐·伦万德低声说：“跳，施丢特贝克，跳！”这时，施丢特贝克跳了。卢齐又回到证人席的木凳上，把编织的贝希特斯加登小茄克的袖子拉拉长，遮住他的拳头。

摩尔凯纳一瘸一拐地上了跳板。他不想跳，困窘地对着他的指甲微笑，一直等到卢齐搂想羊毛茄克衫的袖子，亮出拳头，向他仰起细眼睛黑框三角形。这时，他目标明确地朝三角形跳去，但却没有跳准。

上跳台时就不友好的煤爪和赤膊天使在跳板上打起架来。赤膊天使被撒了灰，在向下跳的时候，煤爪还抓住赤膊天使不放松。长着有丝一样光泽的长睫毛的德力支兔，在跳之前闭上了他的伤心不已的孢子眼。空军辅助人员在跳之前必须脱掉制服。伦万德兄弟也不能以辅弥撒者的身份跳下天国去。他们坐在证人席上的妹妹卢齐，身穿露线头的战时羊毛茄克衫，也忍受不了他们那样做，提倡跳跃运动。贝利萨尔和纳塞斯先跳，托蒂拉和泰耶在后这一点是同历史相反的。狮心跳了，蓝胡子跳了，撒灰者团伙的基本群众——鼻子、布须曼人、油港、吹笛人、芥末瓶、弯刀和箍桶匠都跳了。

高长生施图赫尔长着一对斜得叫人吃不消的眼睛，只能算作撒灰者团伙的半个成员，那天不幸遇上也跳了。跳板上只剩下耶稣一个，法官合唱团把他当成奥斯卡·马策拉特，喝令他跳，耶稣没有跳。在肩胛骨间梳了细细的莫扎特发辫、面孔铁板的卢齐又从证人席上站起来，撙起羊毛茄克衫的袖子，用紧闭的嘴低语道：“跳吧，甜蜜的耶稣，跳吧！”这时，我顿时醒悟了十米跳台的诱惑力。燕子在我的腋窝里展翅，灰色小猫在我的膝窝里打滚，刺猬在我脚底下配对。这时，不独是欧洲，整个世界都在我脚下。美国人和日本人军装上的细眼和圆眼钮扣丢了，在吕宋岛上跳火炬舞。在斯德哥尔摩倒有个裁缝，这时正在给一件大方的条纹晚礼服钉扣子。蒙巴顿正给缅甸大象喂各种口径的炮弹。这时，利马一个寡妇正在教鹦鹉学说“卡拉姆巴”这个词儿。此刻，太平洋中部有两艘巨大的、像哥特式教堂一样装饰着的航空母舰迎面驶去，在上面起飞的飞机不能落地，走投无路，便像天使似的纯譬喻性地悬挂在空中，嗡嗡叫，消耗着它产的燃料，或者相互击沉。这却无法打扰哈帕兰达的某位刚下班的电车售票员。他把两只给自己，两只给他的未婚妻的鸡蛋打到平底锅里。他事先把一切都考虑周到，微笑着等待她的到来。可以想象，在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伊朗下雨的时候，科涅夫和朱可夫的军队将再次出动；突破魏克塞尔防线，过迟地占领华沙，过早地占领柯尼斯贝格，但他们不会阻止巴拿马的一个有五个孩子和一个丈夫的女人在煤气灶上煮糊牛奶。很显然，时事的线索，前端缠成各种套结，未知分晓，演成历史，后端已被编织成历史学了。我也注意到，游手好闲、垂下脑袋、皱眉头、握手、关灯、生孩子、铸造伪币、刷牙、枪毙以及换尿布这些活动比比皆是，虽然灵巧与熟练的程度不一。这许多有目的的行动使昏了头的我不得不把注意力转回到在跳台脚下举行的为向我表示敬意的审判上去。“跳吧，甜蜜的耶稣，跳吧！”早熟的证人卢齐·伦万德在低语。她坐在魔鬼的怀里，更显出她还是个处女。魔鬼为了让她愉快给她一个香肠面包。她咬了一口，依然保护贞洁。“跳吧，甜蜜的耶稣！”她吃着面包，向我显示她的完好无损的三角形。

这并不是最后一次，我决不会跳下去的。在被我称作第三次审判的戴戒指的手指案审理过程中像在审判撒灰者时那样空空如野的天蓝色瓷砖游泳池边上也有足够的观众坐在证人席上，想在我审判之后继续活下去。

但我鄙弃了往下跳的欣快感，转身回去，掐死腋窝里的燕子，压死鞋底下举行婚礼的刺猬，饿死膝窝里的小灰猫，直挺挺地走上平台，晃悠悠地踩住扶梯，往下爬。我要让扶梯的每一档证明，我不仅可以登上跳台，也可以不跳而再离开跳台。

玛丽亚和马策拉特在下面等着我。维恩克圣下不请自来祝福我。格蕾欣·舍夫勒给我带来一件冬大衣和蛋糕。既不认识我这个父亲，也不认识我这个同父异母的兄长的小库尔特长大了。我的外祖母科尔雅切克搀着她的阅历甚深，但说话颠三倒四的哥哥文岑特。

一名文官在我们离开法院大楼时走到马策拉特面前，递给他一份信件并说：“马策拉特先生，您真应该再考虑一下。您瞧瞧，

这样一个不能自理的孩子被什么样的家伙滥用了！他必须离开街道。”

玛丽亚哭着，给我挂上维恩克圣下在审判期间替我保存的我的铁皮鼓。我们走到火车站旁的电车站。由马策拉特抱着我走。最后一段路我从他肩上向后看去，在人群中寻找一张三角形脸，想知道，她需不需要上跳台，她会不会跟在施丢特贝克和摩尔凯纳后面往下跳，她知不知道扶梯还有让人爬下来的第二种用途。

现在我还保留着在街上和广场上四处张望，寻找一个瘦瘦的、相貌平庸却不停地蓄意谋杀男人的“油煎鱼”的习惯。甚至躺在疗养护理院的床上，当布鲁诺通报有陌生人来访时，我也会想到会不会是卢齐·伦万德这个吓唬孩子的坏蛋和黑厨娘，最后一次来喝令你往下跳而害怕。

马策拉特在第十一天把他前十天的思考结果付诸行动：在信件上签字并寄出。但这时这座城市正遭炮兵轰击，邮局大概无法营业。罗科索夫斯基元帅的坦克先锋部队进抵埃尔平。魏斯指挥的德国第二军进入但泽周围高地上的阵地，我们开始在地窖里生活。

大家都知道，在店堂下面，从过道里厕所对面的地窖口下去十八级台阶就是我们的地窖。它的前面是卡特和海兰德的地窖，后面是施拉格的地窖。卡特太太、钟表匠劳布沙德、艾克夫妇和施拉格夫妇带着若干行李走了。老海兰德还在。他后来说，他们这几个和格蕾欣·舍夫勒以及亚历山大·舍夫勒，在最后时刻登上一艘以前属于“力量来自欢乐”组织的轮船，朝什切青或吕贝克方向驶去但碰上了一枚水雷，被炸飞到了空中。总之，一半以上的住房和地窖已无人居住了。

大家都知道，我家的地窖在店堂柜台后面的吊门下面有第二个入口。这样也就没人能看见，马策拉特把什么东西在地窖和外界之间搬来搬去。任何人看了都会妒忌马策拉特在战争年头堆积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在那里的贮存物资。干燥、暖和的地窖里放满了各种豆类、面食、糖、人造蜂蜜、面粉和人造黄油等生活必需品。几箱松脆面包片摞在几箱食用椰子油上。什锦蔬菜罐头同米拉别里李子罐头、嫩豌豆罐头和李子罐头一起码在几个木架上，这是讲求实干的马策拉特自己做的，固定在墙头的栓销上。根据格雷夫的倡议，几乎到了战争中期，在地窖天花板和水泥地之间加了几根横梁，使这个生活必需品仓库也符合了规定的安全。马策拉特由于但泽除了骚扰性袭击外还没有遭受过较大的轰炸，多次曾想卸下这些横梁。防空员格雷夫死了，无法再劝告他。这时，玛丽亚求他为了小库尔特，有时也说是为了我别拆掉这几根支撑的横梁。

老海兰德和马策拉特在一月底头几次空袭时一起把特鲁钦斯基大娘连椅子一起抬进我家地窖去。后来，可能是她自己的意思，也可能是抬上抬下太费劲，他们就不管她了，把她留在卧室的窗户前。一次对内城的大轰炸过后，玛丽亚和马策拉特发现她的下巴吊着，如同她的眼睛飞进了一只粘糊糊的苍蝇。

于是老海兰德从他的仓库里取来了工具和几块箱子板，抽着马策拉特给他的德比牌香烟，动手量尺寸卧室的门从铰链上卸下来了。我帮他干活。其余的人都因再次开始的高地炮轰躲进了地窖。老海兰德想快点干完，钉一个简陋的、两头一般大的箱子了事。我提议做成传统的棺材形状，一点也不让步。我帮他扶住木板，让他按我规定的尺寸去锯，最后，他还是下决心做成了任何一个人的尸体所要求的一头小的形状。

棺材做好后看起来很精致。格雷夫太太替特鲁钦斯基大娘擦身，替她剪指甲，梳好发髻，用三根毛线针固定住从柜子里取出一件刚洗过的睡衣。总而言之，她费了很多心，使活着时，喜欢喝麦芽咖啡，吃土豆煎饼的特鲁钦斯基大娘死后还像一只灰耗子，而她，特鲁钦斯基大娘由于在大轰炸时抽了风，躺在棺材里，双膝仍是高高地抬起的。海兰德趁玛丽亚抱着小库尔特离开

房间时的短短的几分钟，敲断了她的腿，这才把棺材盖钉上了。

特鲁钦斯基大娘由于我家没有黑漆只有黄漆，只得躺在没上漆但一头小的木板箱里被抬出寓所，下了楼梯。我在后面跟着，注意读棺材盖上面的字上下三行，间距相等：维特洛人造黄油——维特洛人造黄油——维特洛人造黄油。这使我们知道了特鲁钦斯基大娘的口味是什么。她活着的时候因为人造黄油使人健康，有生气，有营养，吃了后精神愉快宁愿吃从纯植物油脂提炼成的维特洛人造黄油，也不愿吃最好的真黄油。

老海兰德拉着放着棺材的格雷夫蔬菜店的平板车穿过路易森街，马利亚街，过了有两幢房子在着火的安东·默勒路朝妇科医院方向走去。小库尔特留在我家地窖里由寡妇格雷夫太太看管。玛丽亚和卫策拉特推车子，我坐在车上，如果可能我想坐到棺材上去，但是不准坐。体育馆前的铁路下跨道几乎难以通行。街道堵满了从东普鲁士和韦尔德尔来的难民。马策拉特建议在康位德学校花园里挖个坑。遭到了玛丽亚反对。跟特鲁钦斯基大娘一样年纪的老海兰德也挥手拒绝。我也同样。不管怎样，因为从体育馆到兴登堡大街只准军用车辆通行，我们也得放弃去市立公墓的打算。如此，我们就不能把他埋葬在她的儿子赫伯特旁边了。我们替她在市立公墓对面、五月草场后面的斯特芬花园里挑选了一块地方。马策拉特和老海兰德因为土地封冻而轮流抡尖头十字镐，玛丽亚在石凳旁挖常春藤，我趁机溜走，没过多久来到兴登堡大街的树干之间。交通极其混乱！从高地撤下的和从韦尔德尔撤下的坦克对开过来。菩提树上吊着人民冲锋队队员和士兵。他们制服钮扣上的厚纸牌还能读出写着的字：这些树或菩提树上吊死的是叛徒。我将许多吊死鬼龇牙咧嘴的脸观察后一般地作了对比，又专门跟吊死的蔬菜商格雷夫作了对比。我也观察了吊着的几束身穿过于肥大的制服的年轻人，吊死的小伙子相貌差不多都一样，好几个我都以为是施丢特贝克我暗自说道，现在他们把他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吊死了，有没有吊死卢齐·伦万德呢？

我就像被这个念头插上了翅膀在树中间穿来穿去寻找一个吊死了的单薄的姑娘，甚至敢于在坦克中间穿过去到达林荫道的另外一侧，但在那儿找到的也只是士兵、年岁大的人民冲锋队队员和同施丢特贝克相像的小伙子。我失望地沿着林荫道走到被毁掉的四季咖啡馆，勉强地回去。当我站在特鲁钦斯基大娘的坟墓旁，同玛丽亚一道朝坟丘上撒常春藤和簇叶时，我连卢齐正在被吊死的细节都想得清清楚楚。

马策拉特和海兰德把寡妇格雷夫的平板车拆开，将构件全都放在柜台前而没有送回蔬菜店。马策拉特递给那老头三盒德比牌香烟，对他说：“这里比较安全些。可能我们还用得着这车子。”

老海兰德没有说话，但从差不多是空荡荡的架子上抓起好几包针和两纸袋糖。接着，他趿拉着那双在来回路上和埋葬时始终穿着的毡拖鞋出了店堂，吩咐马策拉特把架子上所剩无几的剩余商品搬进地窖里去。

俄国人已经到了齐甘肯山、皮茨根村，临近席德利茨了。我们一般都留在洞里他们只有占领高地，才能朝城里直线炮击。右城、旧城、胡椒城、前城、新新城、新城以及下城，是在七百年以上的时间内建造起来的，却在三天内被烧毁了。但绝不是但泽城的第一次大火。波莫瑞人、条顿骑士团、瑞典人（前后两次）、波兰人、法兰西人、勃兰登堡人、普鲁士人以及俄罗斯人，还有萨克森人，在这之前每隔几十年就烧一次这座城市。现在是俄罗斯人、波兰人、德意志人和英格兰人一起，第一百次烧哥特式砖砌艺术的砖头，但并没有由此烤熟面包片。黑克尔巷、宽巷、长巷、大和小羊毛织工巷在燃烧，托比亚斯巷、旧城沟、狗巷、前城沟在燃烧，壁垒和长桥也在燃烧。克兰门是木结构，火焰特别美。在小裤子裁缝巷，烈火给无数条光焰刺目的裤子量尺寸。圣

马利亚教堂从里面烧到外面，从尖拱窗里喷出节日灯火。圣卡塔琳娜、圣约翰、圣巴尔巴拉、圣布里吉特、伊丽莎白、特里尼提、彼得和保罗还有基督圣体各教堂没有搬走而剩下的钟在钟楼框架里熔化、铁水默默滴落，红色的小麦在大磨坊里研磨着。在市剧院，初演《纵火者之梦》，一出含意双关的独幕剧。在屠夫巷里，散发着星期日烤肉的烧焦的气味。在右城的市政厅里，决心在大火烧完以后增加消防队员的薪水并追溯既往，圣灵巷以圣灵的名义在燃烧。圣方济各修道院以喜爱并歌颂火的圣方自己的名义在欢乐地燃烧。妇女巷为父与子毁于一旦。不言而喻木材市场、煤市、稻草市场烧成灰烬。在面包师巷，小面包不再从炉里出来。牛奶在奶罐巷，煮得流了出来。惟独西普鲁士火灾保险公司的楼房出于纯象征的原因，未被焚毁。

我对火烧一直没太大兴趣。要不是我把自己那点为数不多的但易燃的家当轻率地放在晾衣间里的话，那么，当马策拉特爬到梯楼上，到晾衣间去观看燃烧中的但泽时，我也不会离地窖里的。把我最后几个前线剧团备用鼓、我的歌德以及拉斯普庭。我还得保护拉古娜在世时善于优雅地轻摇的那柄夹在书里的极薄的绘图小扇子。玛利亚留在地窖里。小库尔特却非要跟我和马策拉特上屋顶看大火不可。我一方面对他不加控制的热情感到生气，另一方面心中暗想：这是他的外曾祖父，我的外祖父，纵火犯科尔雅切克遗传给他的。玛利亚把小库尔特留在下面，同意我跟马策拉特一起上楼。我拿到了我的那些家当，对从晾衣间窗户向外望到的古老城市振作而迸发出的火焰四射的活动而感到十分惊奇。

我们因为有几发炮弹在附近爆炸而离开了晾衣间。后来，马策拉特还要上去，玛利亚把他制止了。他服从了。他哭着向也呆在地窖里的寡妇格雷夫一五一十地叙说这场大火。他再次回到寓所去，打开收音机，但连电台的燃烧声都听不到，其他声音更没

有了。

马策拉特在地窖中央站着，拽着裤子吊带像一个不知道自己该不该继续相信圣诞老人的孩子那样犹豫不决，第一次表示怀疑最终胜利，并且接受寡妇格雷夫的劝告，摘下了上装翻领上的党徽，因为地窖是水泥地，格雷夫太太也不愿把徽章从他手里接过来，不知藏到哪里去好。马策拉特觉得玛丽亚说的可以把它埋在过冬土豆里的主意还不够保险。他又不肯上楼去，因为他们马上就要来了。他们即使没到也已经在半路上。刚刚他在晾衣间的时候，已经在布伦陶和奥利瓦附近战斗了。他反复多次对没把这块水果糖留在楼上防空沙里而表示非常后悔，要是他们在这里见到他手里还捏着这块水果糖的话，后果不堪设想。想到这，他把它扔到水泥地上，正想要一阵狂踩，小库尔特和我两个同时扑过去。我先抓到了它。小库尔特挥拳打来时，我还捏着它。小库尔特想要什么东西时，总要动手打人，我不想让他遇上危险，所以，我没有把党徽交给我的儿子，同俄国人开玩笑可不是闹着玩的。这一点，我当年读拉斯普庭课本时就已经知道了。在小库尔特揍我，玛丽亚正要把我们两个拉开的时候，我却在考虑，如果我在他儿子拳打脚踢之下让了步，在小库尔特手里的马策拉特的党徽会被谁发现呢？到底是白俄罗斯人还是俄罗斯人，是卡尔梅克人还是克里米亚鞑靼人，是哥萨克人还是格鲁吉亚人，是鲁提尼人还是乌克兰人或者是吉尔吉斯人呢？

在寡妇格雷夫的帮助下玛丽亚才分开我们两个。马策拉特高兴了，他的徽章没了。我旗开得胜左手握拳捏着这块水果糖。打开的徽章别针扎了我的手心。玛丽亚在哄号啕大哭的小库尔特。我还是对这东西没有兴趣。马策拉特的党不关我事，我正要在背后把马策拉特的水果糖重新粘到他的上装衣去时，可以从女人们的尖叫声中听出，他们在我们头顶上的店堂里或已经进了邻居们的地窖。

徽章的针直到他们拉开吊门时，还在刺我。我没有别的选择，只得蹲在玛丽亚打战的双膝前，观察水泥地上的蚂蚁，蚂蚁的军用大道从过冬土豆堆斜穿过地窖通往一个盛满白糖的口袋。六个兵挤在地窖的楼梯上，瞪大了眼睛端着机关枪。我推测是完全正常的、血统轻度混杂的俄国人，使人感到安慰的是蚂蚁在各种各样的叫喊声并没有由于俄国兵的露面而受一点儿的影响。蚂蚁不像那些手执机关枪的人那样另有所图，他闪只打算夺取土豆和糖。成年人非常正常地举起双手。每周新闻片里和波兰邮局保卫战后也发生过差不多的举手投降的情形。可是，我不明白小库尔特为什么要和成年人学。他应该以他的父亲我为榜样，或者也应该以蚂蚁为榜样才对。四个四方形制服中的三个对寡妇格雷夫产生了兴趣，这僵硬的一伙人中立即出现了一些活动。守寡已久、刚过了四旬斋期的格雷夫太太起先还惊呼一通，怎么也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客人光顾。但立刻便陷入了那种她几乎遗忘了的境地。

拉斯普庭的书早就告诉过我，俄国人喜爱孩子。在我家的地窖里我亲身体会到了。玛丽亚在莫名其妙地发抖，她根本不能理解，为什么那四个不跟格雷夫太太打交道的人让小库尔特坐在她的怀里，而不抱着他。他们抚摩小库尔特，还轻轻拍拍他以及玛丽亚的面颊，对他们说“好好好”。

有人把我对蚂蚁继续作比较观察并以蚂蚁的勤奋来衡量当前发生的事情。然后我被打断连鼓带人从水泥地上抱起来。我肚子前依旧挂着铁皮鼓。这个矮小结实、毛孔粗大的男人用粗手指在鼓上敲了几小节，就一个成年人而言已经非常灵巧了，可以合着这节拍跳舞。我真想在铁皮上来几首艺术小品，酬谢一番可惜马策拉特的党徽还在刺他左手的手心，所以不可能。

我家地窖里的气氛已经变得亲密而和平。格雷夫太太越来越平静地躺着，那三个男人依次轮换着一个满足之后便换上另一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个。我被那个相当有才能的鼓手交给了一个浑身出汗、眼睛眯成细缝的卡尔梅克人。他右手还在系裤子钮扣，左手已经把我抱住，眼看相当有天赋地敲我的鼓刚刚抱我的那一位解裤子钮扣，他一点儿也不介意。马策拉特却无法换姿势。他始终站在放着莱比锡什锦小菜白铁皮罐头的架子前面，高举双手，展现出全部手纹，但没人想去细看他的手纹。玛丽亚学会了几句俄语，双膝不再打战，甚至哈哈笑了。要是她的口琴就在身边，她准会奏起这吹弹式口琴来的。这完全可以证明，女人的理解力是惊人的。

正在寻找可以替代蚂蚁的东西因为我不能非常快适应变化了的情况，这时转而观察起出现在我的卡尔梅克人衣领边缘的许多扁平的、灰棕色的小虫子来了。我特别想逮住这么一只虱子来研究一下。在我的教产书里也谈到了虱子，歌德谈得少，拉斯普庭可是经常谈到的。我非常难靠一只手逮到虱子，便想办法摆脱那枚党徽。由于这个卡尔梅克人胸前已经挂着许多枚奖章，所以我就把一直握着的手连同那块刺我手心、妨碍我抓虱子的水果糖伸向站在我旁边的马策拉特。他接过去了。我总算摆脱了那块水果糖。马策拉特的感觉出手指间捏着的是他的党的徽章而害怕了。我现在两手空空，不想当什么证人，不再去管马策拉特如何处理他的水果糖。我思想太分散，抓不到虱子，便想又全神贯注地去观察蚂蚁，却看到马策拉特的手迅速而又镇静地把这个彩色的圆东西捏在手里，这不失为一个再明智不过的办法。

但是，马策拉特想把它摆脱，他作为厨师和殖民地商品店橱窗的装饰师，想象力经常证明是切实可行的，但这时，除了将它吃掉以外别无他法。

这样一个短促的手的动作太重要了！从手里进入嘴里，就足以把一左一右和平地坐在玛丽亚身边的两个伊凡吓一跳，把他们从防空床上赶跑。他们把机关枪对准马策拉特的肚皮。这时，大家都知道，马策拉特正使劲吞下什么东西。

他最少也该用三只手指事先把党徽的别针别上。现在，他被这块难咽的水果糖哽住了，两眼圆睁，脸涨红了，咳嗽，又哭又笑，因为所有这些同时发生的情感活动，他也不能再高举双手了。伊凡们最不能忍受这一点。他们吼着，要看看他的手心。但是马策拉特只顾他的呼吸器官，甚至连咳嗽都不像个样子了。他开始手舞足蹈，莱比锡什锦小菜白铁皮罐头也被他从架子上扫下来，这可对我的那个卡尔梅克人产生了作用。他一直镇静地眯缝着眼睛在旁观，这时把我谨慎地放到一旁，伸手到背后去，把什么东西调整到水平位置，从齐腰处射击，打光了一梭子弹。马策拉特被哽死前他就开了枪。

一个人在死亡命运露面的时候什么事情干不出来呀！在我的假想的父亲吞下他的党徽而死去的时候，我不知不觉地把一只虱子掐死了，那是我刚才从卡尔梅克人身上逮到的。马策拉特倒在蚂蚁大道上。伊凡们上楼梯到了店堂，随手拿走了几小盒人造蜂蜜。卡尔梅克人最后一个走，因为他得给机关枪换子弹，所以他没有把人造蜂蜜带走。寡妇格雷夫一团糟地躺在人造黄油箱中间。玛丽亚抱着小库尔特，几乎要把他压死。我曾经在歌德的书上读到过的一种句子结构出现在我的头脑里。蚂蚁发现环境变化了，它们不怕绕路，便又建筑了一条军用大道，绕过蜷缩着的马策拉特，因为漏出来的白糖并没有由于但泽市被占领而失去甜味。

我该不该呢

鲁基人是来得最早的，然后来的是格皮德人和哥特人，紧接着来的是卡舒贝人，我乃是他们的直系后裔。很快，波兰人派来了布拉格的阿达尔贝特。他带着十字架来了，被普鲁策或卡舒贝人用斧子砍死。此事在一个名叫吉丹尼茨克的渔村发生。吉丹尼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茨克演化为丹切克，又演化成丹切希，后来成文时减少了一个字母“t”，今天称但泽·格但斯克。

但是，在采用这个写法之前，波莫瑞人的公爵们继卡舒贝人之后来到吉丹尼茨克。他们的姓氏分别是：苏比斯劳、沙姆博尔、梅斯特温以及斯万托波尔卡等。这个村庄变成了小城镇。随后来了野蛮的普鲁策人，把这个城市毁坏。后来勃兰登堡人也破坏了一点。波兰的包列斯拉夫也破坏了一点，骑士团同样用骑士的剑使尚未修复的损坏处又变得明显了。

数百年之内，波莫瑞人的公爵们，骑士团的首领们，波兰的国王们和另立的国王们，勃兰登堡的伯爵们和弗沃克拉韦克的主教们轮班交换，玩弄着重建与破坏的游戏。建筑师和拆卸工程经营者有：瓦尔德马尔·博古萨和奥托·博古萨，海因里希·封·普洛茨克和迪特里希·封·阿尔滕贝格。后者建造的骑士城堡的所在地，也就是里维利乌斯广场那儿波兰邮局的所在地。

胡斯派教徒来了，放完火，又撤走了。接着，教团教士被赶出城，城堡被拆除，城内没有必要有城堡。波兰人接管了，情形并不坏。做成此事的是被称为“伟大者”的国王弗拉迪斯拉夫一世之子。接着来的是路德维希，然后是黑德维希。她嫁给立陶宛的耶吉埃洛，开始了耶吉埃洛时代。弗拉迪斯拉夫二世，之后又来了一个卡齐米尔茨。虽然他没有胃口却仍同骑士团打仗，前后十三年，挥霍了但泽商人的金钱。约翰·阿尔布雷希特相反去同土耳其人周旋。亚历山大的继承者是“长者”西吉斯蒙德，又叫齐格蒙特·斯塔里。在历史书上，西吉斯蒙德·奥古斯特的一章后面是关于那个斯特凡·巴托里的一章，波兰人喜欢用他的姓名来给他们的远洋轮命名。从书上可以知道，他围攻这座城市有相当长时间，但未能把它攻下。之后来了瑞典人，围困这座城市成了他们的一种乐趣，他们多次卷土重来。那时候，丹麦人、荷兰人、英格兰人都喜爱但泽湾，这些国家的许多船长驾船游戈在但

泽停泊场，因此而成了海上英雄。

奥利瓦和约——听起来多漂亮，多有和平味儿！列强在那里第一次发现波兰人的土地是那么容易瓜分。瑞典人，瑞典人，又是瑞典人——瑞典人的堑壕，瑞典人的饮料，瑞典人的跳跃。随后俄国人和萨克森人也来了，因为可怜的波兰国王斯坦尼斯拉夫·莱什琴斯基在这座城市里藏身。由于这一个国王，有一千八百幢房屋被毁。因为女婿路易在那里莱什琴斯基逃到了法国。但泽市民为了这此必须被迫支付整整一百万。

接着，波兰被瓜分了三次。普鲁士人不请自来，在所有的城门上抹去了波兰的国王之鹰，画上了他们的鸟。教师约翰内斯·法尔克刚创作了圣诞曲《啊，你快活的……》，法国人就来了。这座城市被一位叫拉普的拿破仑的将军一点也不客气地包围了，但泽人不得不给他孝敬两千万法郎。法国人时期是个可怕的时期，这一点不用怀疑。但这一时期只延续了七年。这时俄国人和普鲁士人来了，把仓库岛炮轰成一片火海。拿破仑想出来的自由国家就此结束。普鲁士人又找到机会，用油漆在所有的城门上漆上他们的鸟，很麻利地把事情办完，还首次按普鲁士方式在城里布下第四步兵团、第一工兵营、第一炮兵旅以及第一轻骑兵团。曾经一度驻扎在但泽的有第三十步兵团、第三近卫步兵团、第十八步兵团、第四十四步兵团和第三十三轻步兵团。那个著名的第一二八步兵团到一九二一年才撤走。以免遗漏，还需报道如次：第一炮兵旅在普鲁士时期扩大成东普鲁士第一炮兵团，下设第一要塞炮兵营和第二步炮营。此外还添加了波莫瑞第二步炮团，后又调换为西普鲁士第十六步炮团。第八重骑兵团在但泽城墙内驻扎的时间不久。西普鲁士第十七训练营一直驻扎在城墙外的朗客尔区。

在这个自由国家里在布克哈特、劳施宁和格赖泽尔时期，只有穿绿制服的保安警察。在福斯特尔治下，到了一九三九年，情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况发生了非常大变化。所有的砖砌兵营又住满了笑声朗朗的穿制服的男子，他们耍弄着各种武器。现在，可以一一罗列从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五年在但泽及其周围地区驻扎过的、或在但泽上船运往北极海前线的所有部队单位的名称了。可是，我没有这样做，而是简单地说，在这之后，来了个罗科索夫斯基元帅。如我们所预测的一样，他一看到这座完好的城市，就回想起他的各国的前辈，为了让后继而来的人们在重建中宣泄情感，他把它轰炸得烈火熊熊。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回继俄国人之后来的是波兰人，而不是别的国家的人。

波兰人从维尔纳、比亚韦斯托克和伦贝格提着行李铺盖来寻找住房。一位自称法因戈德的先生来到我家。他一个人站在那里，却一直装成一家许多口人都站在他周围而他也正在吩咐他们做这做那似的。殖民地商品店当即被法国戈德先生接管下来，他带领着他的妻子卢芭去看十进天平、黄铜香肠杆、煤油罐和空钱柜，他高兴地看着地窖里的存货后，只不过他的妻子既没露面也不会答理他。他一到就雇用了玛丽亚当售货员，话不绝口地把她介绍给他那位想象中的太太卢芭。这时，玛丽亚领法因戈德先生去见在地窖里的一块帐篷布上已经躺了三天的马策拉特先生，因为街上到处都是试用自行车、缝纫机的俄国人和女人，我们无法给他下葬。

一见到我们把尸体扔下了不管，法因戈德先生就伸出双手在头顶上猛击一掌，这和多年前我见到过的玩具商西吉斯蒙德·马库斯所做的动作一样极富表现力。他在地窖里不仅呼唤他的妻子卢芭，还呼唤他的全家的名字，他肯定看见他们都来了，卢芭、列夫、雅库布、贝雷克、莱昂、门德尔以及宗尼亚，告诉被他叫到名字的那些人，躺在这里、死在这里的是谁。紧接着他又告诉我们，他刚才呼唤的那些人，也都这样躺着，直到进特雷布林卡

的焚尸之前，还有他的弟媳和他的弟媳的妹夫以及后者的五个孩子，这些人全都这样躺着。只有法因戈德先生例外，因为他得对他们进行氯处理。

他帮助我们抬着马策拉特上了楼梯，进了店堂。这时，他的一家人又围到了他的身边。他请他的太太卢芭帮玛丽亚擦洗尸体。法因戈德先生正忙着把地窖里的存货搬到店堂里去，所以根本没有注意到卢芭并没去帮忙。这一回曾经给特鲁钦斯基大娘擦洗的格雷夫太太也不来帮我们了，因为俄国人挤满了他的寓所，人家甚至还听到她在歌唱哩！

刚开始占领没几天，老海兰德就干起鞋匠师傅的活来了。他正在为俄国人在挺进途中跑穿了的靴子换鞋底，开始他不想再干钉棺材的活计。法因戈德先生用我家店里的德比牌香烟换走老海兰德仓库中的一台电动机。于是，老海兰德拿起别的工具以及最后的几块箱子板把靴子撂在了一旁。

当时我们住在特鲁钦斯基大娘的那套住房里，原来的邻居和外来的波兰人已经把东西都搬走了。后来才把我们赶了出来，法因戈德先生就留我们在地窖里住。老海兰德把厨房和起居室之间的门从铰链外拆卸下来，因为起居室通往卧室的门已经卸下做了特鲁钦斯基大娘的棺材。老海兰德在下面院子里一边做箱子，一边抽着德比牌香烟。我们在楼下待着，我把人家留在房间里的惟一把椅子顶在破碎的窗户前，我特别生气地看到那老头心不在焉地钉着箱子，并且胡乱做成一头小的形状。

我再也不能看不到马策拉特了，因为人家把这口箱子抬到寡妇格雷夫的平板车上去时，箱子上面已经钉上了维特洛牌人造黄油箱的盖子，虽说马策拉特生前不吃人造黄油，而且讨厌用它来烹调。

玛丽亚害怕大街上的俄国兵，所以她请法因戈德先生陪我们一起走。法因戈德在柜台上盘腿坐着，用勺舀着纸杯里的人造蜂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蜜，起先他害怕他的太太卢芭猜疑，表示有所顾虑，但后来大概又得到了他太太的允许，就从柜台上递下来，把人造蜂蜜递了我。我把它给了小库尔特，小库尔特吃了个精光。这时，法因戈德先生也让玛丽亚帮他套上了一件灰兔皮的黑大衣。他戴上那顶从前马策拉特去参加婚礼或葬礼时戴的大礼帽，对他而言实在太小，随后锁上店门，嘱咐他的老婆谁来也不许开门。

老海兰德说他还要给靴子换底，没有时间所以不肯把平板车拉到公墓去。他只肯去近一点儿的地方。到了马克斯·哈尔贝广场，那里的废墟还在冒烟，他就向左拐进布勒森路，我预感到这是在朝萨斯佩方向走。坐在房屋前单薄的二月天的阳光下，俄国人对手表和怀表进行分类，用胸罩作护耳，用沙擦银匙，骑自行车做花样表演，用落地钟、油画、浴缸、收音机和衣帽架布成一条障碍地带，在其中绕来绕去，让车子走出“8”字形、蜗牛形和螺旋形来，他们果断地躲开别人自窗户里扔出来的儿童车、吊灯之类东西，灵巧的姿势博得了喝彩声。我们走过时，这游戏停了几秒钟。几个军装外面套女装的士兵帮忙推车，也想对玛丽亚做出下流的举动，但受到了会俄语又有证件的法因戈德先生的斥责。我们收到了一个头戴女士帽的士兵送一只鸟笼，一只活的虎皮鹦鹉站在笼内的横杆上。在平板车边上跑跑跳跳的小库尔特马上伸手，想把那彩色的羽毛拔掉。玛丽亚不敢拒收这礼物，她举起鸟笼，不让小库尔特够着，递给了坐在平板车上的我。我嫌虎皮鹦鹉太花哨，就连笼带鸟一起放到了马策拉特那加大了的人造黄油箱上。我坐在车子的后缘，荡着两条腿，瞧着法因戈德的脸，他像是在复核一道除不尽的复杂算题，一脸皱纹、一愁不展。

我敲了几段轻松愉快的曲子，想驱散法因戈德头脑里阴郁的想法。但他的目光投向我不知道的地方，大概是投向遥远的加利曾。我不再敲，因为鼓声对他没有一点儿影响，人们只听到了平

板车的车轮声和玛丽亚的哭泣声。

我想着这个冬天是多么柔和呀。此时，朗富尔区的最后几幢房屋已经落在了我们的背后。我瞟了几下面对飞机场上空下午的太阳竖起了羽毛的虎马鹦鹉。

飞机场通往布勒森的路被封锁了警卫森严。一名军官同法因戈德先生交谈时，他把礼帽夹在了叉开的手指间，露出了稀薄的红金色头发，随风飘拂。那名军官用手指逗弄几下虎皮鹦鹉敲了敲马策拉特的箱子像是在作检查，就放我们过去，但派了两个顶多十七岁、头戴太小的船形帽、手执大他们很多的小伙子监视或是陪同我们。

老海兰德头也不回地拉着车，他能不停车使用一只手点燃香烟。在二月底、三月初，天空中悬挂着的引擎声清晰可闻的飞机。只有太阳附近的几片小云逗留留着，渐渐地变得苍白。由于在赫拉半岛还有第二军的残部在作战，轰炸机不停地在天空中徘徊。

使我感到悲哀的是天气和飞机的隆隆声。还有什么比布满忽而隆隆作响忽而响声消失的飞机的三月天空令人无聊、令人厌烦的还有什么比布满忽而隆隆作响忽而响声消失的飞机的三月天空呢？此外，白费力气的是那两个俄国小伙子一路上还使劲齐步走着。

行车途中颠簸之下，先过石子路，后过有弹坑的柏油路，我们又是逆风而行，匆忙仓促之间钉成的箱子上有几块板条松了，可以闻到马策拉特的死人味。奥斯卡高兴了，因为我们抵达萨斯佩公墓时，离公墓不远处一辆横卧着的烧毁了了的 T-34 坦克把去路挡住了，所以我们不能把车一直拉到铁栅栏围住的高地。

剩下的坦克在向新航道方向驶去时必须绕道而行，在道路左侧的沙土上留下了痕迹，一段公墓围墙也被碾倒了。法因戈德先生请老海兰德抬起中间的棺材，让他在后头吃力地走过被碾倒的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公墓围墙的碎石，把最后的力气使出后在倾斜和倒下的墓碑中间走完最后一段路。老海兰德猛吸一口香烟，把烟喷向棺材的尾部。玛丽亚拖着两把铁锹。我托着虎皮鹦鹉笼子。小库尔特摆弄着十字镐，撞在灰色花岗岩石上，弄得自己十分危险，直到玛丽亚拿着镐同那两个男人去挖坟坑。

我心想，幸运得很，这里是沙质土，也没冻住，一边到北墙后面去寻找扬·布朗斯基站过的位置。但已经无法确定了，季节的变换使那时新刷的石灰风化，同萨斯佩所有的围墙几乎差不多。我由后栅栏门回来，抬头望了望破坏的松树，为了打消无关紧要的念头，我想，他们正在埋葬马策拉特吧。我寻找并找出了这个环境的意义，在一样的沙土地下躺着那一对施卡特牌友，马策拉特和布朗斯基，虽然没有我可怜的妈妈跟他们做伴。

葬礼总让人联想起许多！

把沙土征服，需要熟练的掘墓人。玛丽亚喘着粗气，停下休息，靠十字镐支撑着。当她又看到小库尔特正在扔鹦鹉，她放声哭了。小库尔特扔不中，他扔得太远。玛丽亚因为失去了马策拉特努力哭，因为我感觉，她在马策拉特身上看到了某些他没有的东西，这些东西她是知道的，而且将永远值得她爱的。法因戈德先生讲着安慰话，借这个机会也休息一下，挖土使他精疲力竭。老海兰德像在寻找金子一样，他把铲起的沙土扔到身后，隔相等的间距喷出一口烟来。稍远处，两个年轻俄国人坐在公墓围墙上，闲聊。此外还有飞机和一个炙热的太阳。

他们想挖一米深。奥斯卡懒散地站在老化的花岗岩和伤残的松树之间，马策拉特的寡妻和向虎皮鹦鹉扔石头的小库尔特之间。

我该不该呢？奥斯卡，你现在二十一周岁。你现在是个孤儿。你该不该呢？你终于该这样了。自从你可怜的妈妈死去时，你就是一个半孤儿。当时你本应该下定决心的。后来，他们让你

的假想父亲进去地下。你那时成了个假想的全孤儿，手拿一个氧化的弹壳站在这片叫做萨斯佩的沙土地上。天在下雨，一架容克52正在降落。当时，如果不在雨中，就是在运输机降落的轰鸣声中，这个问题不是已经弄清楚了吗？你却说，这是雨声，这是引擎的噪声；这种单调声你能在念任何一篇文章时把它加进去。你应该把事情弄得再清楚一点，而不是假定如何。

我应该还是不应该呢？现在他们在替你的第二个假想的父亲马策拉特挖洞。你知道，再没有第三个假想的父亲了。但是，你为什么还在耍弄这两只绿玻璃瓶呢：我应该，我不应该？你还要问谁呢？问伤残的松树吗？它们自身难保呢。

我找到了一个铸铁的十字架，上面有表层剥落的字母和风化的花饰：马蒂尔德·孔克尔。我在沙土里在飞帘草和喜沙草之间。找到三或四个铁锈正在剥落、碟子大小的金属花冠，从前也许呈现为月桂或橡树叶竖立着的十字架末端它的直径也许有四厘米，不——我站到离它两米以外，开始扔——不——扔在一边了——我应该再一次——铁十字架太倾斜了——我应该——她叫马蒂尔德·孔克尔我不知该叫他什么才好这是第六次，允许扔七次，六次不中，我把它挂在上面，给马蒂尔德戴上花冠，月桂献给孔克尔小姐？我问年轻的隆克尔小姐，马蒂尔德说；她死得特别早，生于一八六八年，终年二十七岁。在我二十一岁时第七次扔中了。我把那个“我应该不应该？”简化为一个扔中目标、已经赢获的“我应该！”了。

当我说了“我应该！”心中有了“我应该！”并向那几个掩埋死者的人走去时，小库尔特扔中嘎嘎叫的虎皮鹦鹉，黄绿色羽毛纷纷落下。我暗自问道，又是什么样的问题促使我的儿子用小石子去扔一只虎皮鹦鹉，直到最后扔中了他方才罢休呢？”

他们已经把箱子推到了深约二十一分米的坑边。老海兰德想赶快干，却又因为玛丽亚在做天主教祈祷，而必须得等着。法因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戈德先生把大礼帽举在胸前，眼睛去远望加利曾。小库尔特现在也走近前来。他可能在扔中目标之后作出了一个选择，由于一些原因，但是跟我一样坚定地向坟坑走近。

一件未知的事折磨着我。刚才作出决定赞成或反对某事的，真的是我的儿子吗？他能确定我的惟一的父亲爱我吗？他现在打定主意敲铁皮鼓吗？难道他的决定是这样的：处死我的假想的父亲，他用一枚党徽杀死了我的假想的父亲马策拉特，只是因为奥斯卡讨厌父亲？父亲们跟儿子们之间的好感是值得追求的，不过，他可不可能在表达好感时也把它变成致命的一击呢？

当老海兰德把箱子连同马策拉特、和他气管里的党徽、马策拉特肚子里的俄国机关枪的子弹一起推进而并非慢慢放进坟坑里去的时候，我承认蓄意杀死了马策拉特，因为那个不是他假想的父亲，而且是他的现实的父亲，因为我讨厌一辈子得拖着一个父亲四处奔波。

当我从水泥地上抓起那块水果糖时党徽的别针开了，这一点也不是事实。别针是捏在我手里的时候打开的。我倒霉的水果糖交给了马策拉特。如此一来，他们就能够在他手里发现这枚徽章，并把它放到了舌头上，他也就被它卡住而窒息，因为这种情况一定得结束了！

老海兰德又开始铲土。小库尔特热心但笨拙地帮他铲。我一直都不爱马策拉特。有时我喜欢他。他总是像厨师而不是像父亲那样关照我。他是个好厨师。如果我今天有时还惦记马策拉特的话，那么，我痛失的是他烧的柯尼斯贝格肉丸子、鲤鱼加萝卜、酸味猪腰和鲜奶油，还有卡塞尔排骨加酸菜、青菜鳗鱼汤和各种美味的星期日煎肉，时至今日这犹在我舌上齿间哩！他把感情化作鲜汤，而我们却忘了把一把勺子和一幅施卡特牌放在他的棺材里。他的烹调手艺比玩牌手艺高明。他玩牌毕竟比扬·布朗斯基强，同我可怜的妈妈几乎不分高下。这是他的长处，也是他的悲

剧。

玛丽亚的事我决不原谅他，虽说他对她很好，当她忍不住吵起架来时，他也多半让步。他也没有把我交给帝国卫生部，并且在那封公函上签了字。我在电灯泡下出生时，他决定要我做买卖。为了不站在柜台后面，我有十七年之久在大约一百只红白漆铁皮鼓后面站着。现在，马策拉特死了。老海兰德正在铲土掩埋他，一边抽着马策拉特的德比牌香烟。奥斯卡现在如果接管店铺就好了。但半路杀出个法因戈德先生，同他那许多口人的无形家庭一起接管了商店。留给我的是小库尔特、玛丽亚和对这两个人应负的责任。玛丽亚还在一直做着祷告痛哭着。法因戈德先生待在他的加利曾，也许在解他那道棘手的算题。小库尔特累了，但仍旧地铲着土。公墓围墙上坐着年轻的俄国人。老海兰德闷闷不乐地均匀地把萨斯佩公墓的沙土铲到人造黄油箱子板条上。我还能读出维特洛一字的三个字母。这时，他把铁皮从脖子上取下，说“必须如此！”并把鼓扔过去，因为棺材上已有足够的沙土，所以没有发出响声。我把鼓棒也插在沙里。这是撒灰者时期的鼓，是前线剧团的库存。贝布拉把这些铁皮送给了我。这位师傅将如何评价我呢？耶稣敲过铁皮，一个长得像箱子粗毛孔的俄国人也敲过它。它没有多大用处了。但是，当一铲沙土扔在它的表面上时，它又响了。第二铲沙土扔过去时，它仍在响。第三铲沙土扔过去时，它没有响，只露出一一点白漆。最后，沙土把它变成同别的沙土没有差别。沙土在我的鼓上增多，堆成了堆，增长——我也开始长个儿了，大量出鼻血。

小库尔特首先发现了血。“他在流血！”他叫着，把法因戈德先生从加利曾叫回来，把玛丽亚从祈祷中拽出来，迫使冲着布勒森方向闲聊天、一直坐在围墙上的年轻俄国人把头抬起来看了一眼这恐怖的情景。

老海兰德把铁锹插在沙土里，拿起十字镐，让我把后颈枕在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蓝黑色的铁上。冰凉果真有效。鼻血少了。老海兰德又去铲土，这时鼻血也彻底止住了。但我还在长个儿，征兆是我体内的沙沙声、嚓嚓声和劈啪声。

老海兰德把坟墓修好了，从别人的坟上拨出一个无铭文、长苔藓的木十字架，插在新坟丘上，可能在马策拉特的头和我的被埋的鼓之间。“完事啦！”这老头儿说着把不能走路的我抱起，背着我，领着其余的人和背机关枪的年轻俄国人离开公墓，沿着坦克车辙，走过碾倒的围墙，来到横卧着一辆坦克的电车轨道上，把那辆手推车找到了。我回头看萨斯佩公墓。玛丽亚拎着虎皮鹦鹉笼子，法因戈德先生扛着工具，小库尔特空着两手，两个俄国人肩背太大的机关枪，头戴太小的船形帽，海滩松树佝偻着。

从沙土地上了柏油路。坦克残骸上坐着舒格尔·莱奥。飞机在赫拉来回地飞。舒格尔·莱奥注意不让烧毁的 T-34 弄黑他的手套。太阳和蓬松的小云朵落在索波特旁的塔山上。舒格尔·莱奥从坦克上滑下来，站好。

见到舒格尔·莱奥，老海兰德乐了。他说：“没有像你这样的人！人世在沉沦，只有舒格尔·莱奥平安无事。”他腾出一只手，兴致勃勃，在黑上装上拍了拍，对法因戈德解释说：“这是我们的舒格尔·莱奥。他要同我们握手。”

接着，莱奥摘下手套让它在风中飘动。他还是流着口水，向在场的人表示了他的哀悼，然后问：“你们看见主了吗？”没有人看到。不知什么原因玛丽亚把虎皮鹦鹉和笼子送给了莱奥。

舒格尔·莱奥向我走来，老海兰德让他在平板车上躺下。莱奥的脸似乎碎了。风吹起他的衣服，两腿摆动着跳起舞来。“主啊，主啊！”他摇晃着笼里的虎皮鹦鹉喊道。“快来看天主呀，看哪，他在长个儿！”

最后他连鸟笼一起被抛到空中。他奔跑，舞蹈，飞翔，踉跄，跌倒，自己也变成吱吱叫的鸟，展翅，穿越田野，向里泽尔

菲尔德方向飞去。他的喊声仿佛是穿过两挺机关枪的响声：“他在长个儿！他在长个儿！”两个年轻的俄国人必须重新装上了子弹，他还在喊叫：“他在长个儿！”甚至当机关枪再度响起，而我从没有梯级的梯子上落进生长着、吸收着一切的昏厥状态之中时，我还听到莱奥向乌鸦一样宣告：“他在长个儿，在长个儿，在长个儿……”

消毒剂

昨天夜里，我一遍又一遍地梦到了探视日朋友们匆匆来访的情景。一个梦把房门交给了另一个，它们向我讲述了梦认为有价值讲的事情之后，便走了。尽是些无聊的故事，特别多的重复，独白，还一定得让人听见不可，由于朗读的声调恳切有力，外加蹩脚演员的表情手势。我因为没记住，所以没办法把梦讲给布鲁诺听。

布鲁诺在收拾早餐，我顺便问道：“好布鲁诺，我现在身高究竟多少？”布鲁诺把果酱小碟放到咖啡盘上，操心地说，“奥斯卡，您又没吃果酱。”他每天早上都要这样责备我几句，我已经习以为常了。每天早晨布鲁诺给我端来这么一点点草莓酱，我马上就会用纸或报纸折叠成的屋顶把它盖住。我见不得也吃不得果酱，所以我也镇定而果断地反驳布鲁诺的责备：“布鲁诺，你知道我对果酱的想法，你还不不如告诉我，我现在有多高。”

每缝有一双已绝种的八条腿动物的眼睛的布鲁诺必须思考的时候，就会用这种史前时期的目光望着天花板，今天早晨他也这样冲着天花板说：“但是，可是草莓酱啊！”我用沉默表示我一定要得到他的回答。良久之后，他才把目光从天花板上收回来，盯住我的床栏杆说我身高一米二十一。

“布鲁诺，为了保险起见，你再帮我量一次好吗？”布鲁诺还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盯着原处，伸手在裤子的屁股口袋里掏出一把折尺，几乎是用野蛮的力气把我的被子掀开，把我滑上去的衬衣拉下来遮住裸露的身体，打开黄得厉害的、总长一共才一米七八的尺子，贴在我身上，检验，移动，用两只手仔细地量着，眼神却还像古代巨型爬行动物。最后，折尺在我身上静止不动了，他装着读出结果：“还是一米二十一！”

他为何总要在折叠尺子和收拾早餐时弄出噪声呢？我讨厌我的身高吗？布鲁诺端着早餐盘，深黄的折尺旁放着天然颜色会激怒人的草莓酱，离开房间，在过道里站着，再一次把眼睛贴在门上的窥视孔上用他的目光把我变得古老。

对于永远不想长大的我来说，这个高度太高了！拉古娜夫人，我的罗丝维塔，量到头顶也没多高。欧根亲王的后裔贝布拉师傅能有多高？今天，我甚至可以俯视基蒂和菲利克斯了。我提到的这些人都曾经嫉妒而又友好地低头瞧着直至二十一岁都只有九十四公分的我。

直到在萨斯佩公墓埋葬马策拉特时，一块石头击中了我的后脑勺，我才开始长个儿。

我在玩了一个小游戏后，终于明白了，对我来说，根本从来没有“我该不该？”的问题，而只存在“我应该，我必须，我就要！”的结论。于是我把鼓摘下，把它和鼓棒一起丢进马策拉特的坟坑里。我下决心长个儿，顿时双耳嗡嗡作响，响声逐渐变大。在这之后，我的后脑勺被一块核桃大的硬石击中，是我的四岁半的儿子库尔特扔来的。我早已想到我的儿子对我有所企图，我对儿子的这一击没有吃惊，但我应声倒在马策拉特坟坑里我的鼓旁。老海兰德用老人的干枯的手拉我出坑，但留下了鼓与鼓棒，发现我在流鼻血，就让我躺下，后颈枕着十字镐的铁镐头。鼻血减少，个子却在长，由于长势微小，所以只有舒格尔·莱奥一人发现，大声嚷着，像鸟儿一般轻盈飘飞着到处去宣告这件

事。

目前这些事还算是多余的，因为长个儿在我被石头击中、倒入马策拉特的坟坑之前就开始了。这件事在玛丽亚和法因戈德先生看来，我长个儿的原因始终只是一点，后脑勺挨了一石子儿，摔进坟坑里。还在公墓时，小库尔特就挨了玛丽亚一顿打。我真替库尔特难过，无论如何，他用石头扔我，可能是为了帮助我，使我快快长个儿。他的目的是想要有一个真正的、长大了的父亲，或者仅仅想要个马策拉特的替身，因为他从没把我当成他的父亲。

对于我持续的长个，男女医生都证明原因在于扔来的石头和不幸摔倒，他们这么说，还在我的病例中写道：奥斯卡·马策拉特，成为畸形儿奥斯卡，被一块石头击中后脑勺，等等，等等。

我的三岁生日在这里有必要提一下。大人们对于我的特殊历史的开端是这样说的：三岁那年，奥斯卡·马策拉特从地窖楼梯上摔到水泥地上。由于这个原因他停止生长，等等，等等。

以上种种迹象表明，人有着一种可以理解的癖好，总要给任何奇迹提供证据。奥斯卡必须承认，他也曾对每个神迹做过非常周密的调研，在他把神迹看做不值得相信的幻想撂在一边之前。

从萨斯佩公墓回来。一个波兰人的八口之家住进了厨房和两个房间。他们是特鲁钦斯基大婶寓所的新房客。他们人特别善良，同意我们在没安顿之前暂住这里。可是，法因戈德先生不太赞成我们这么多人在一起挤着。他又想把我家的卧室还给我们，自己暂时住起居室。但是玛丽亚认为自己刚守寡，同一位单身先生这样亲近地住在一起不合适。所以不赞成。法因戈德有时并不意识到他周围还存在他的妻子卢芭和他的家人，他常常感觉到他的太太在他的脊背里，所以他也许能够理解玛丽亚所说的道理。因为卢芭太太礼貌规矩，这样安排不行，但他仍为我们腾出了地窖。他甚至帮助我们布置储藏室，因为我病得很可怜所以他们不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赞成我搬进地窖里去，便为我在起居室里我可怜的妈妈的钢琴旁边搭了一个临时铺位。

找一个医生太不容易了！因为西普鲁士医疗保险机械已经迁去西边，大多数医生都及时地随着部队的转移而离开了城市，在那些医生眼里，病人这个概念已变成不现实的了。法因戈德先生找了很长时间才在海伦·朗格学校里找到了一位女医生，她来自埃尔平，她在那里给并排躺着的国防军和红军士兵做截肢手术。她答应有空就来，四天后果然来了，坐在我的病床旁，给我检查时，不断的抽了三四支香烟，抽第四支时睡着了。

玛丽亚就犹豫地抠抠她，因为法因戈德先生不敢把她叫醒。直到香烟慢慢燃尽，大概烧到了她的左手指，女医生才醒过来。她马上站起来，踏灭了地毯上的烟蒂，激动但是简单地说：“请原谅，我已经三个星期没合眼了。我在凯泽马尔克运送东普鲁士儿童。上不了渡船，过不来。只运部队。四千名儿童。全给炸死了。”然后，她拍了一下我这个正在长个儿的孩子的面颊，像讲述归天的儿童那样干脆，又把一支烟插到嘴里，挽起左手袖子，从皮包中拿出一支安瓿剂。在给自己打这种兴奋剂的时候，她对玛丽亚说：“我根本说不出来这孩子是怎么了。必须进疗养院。但不是在这里。您考虑一下，走吧，朝西去。他的膝、手和肩关节都肿了。头肯定也开始肿了。您给他作冷敷，我留给您几片药片，他疼痛和睡不着觉时服用。”

她不知道我是怎么回事，也承认她不知道，我很喜欢这位做事干练的女医生。在以后的几星期里玛丽亚和法因戈德先生给我做了数百次冷敷，使我好受些，但不能止住膝、肩和手关节以及头继续肿胀和疼痛。玛丽亚和法因戈德见到往横里长的脑袋后惊骇万状。他们给我服的那种药片效力很快就过去了。他开始用铅笔和直尺画寒热曲线图，但又埋头开始了他的实验，把我的体温填到大胆设计的结构图里去。他用人造蜂蜜在黑市上换回一个体

温计，每天给我量五次，记录下的结果使法因戈德先生的表格看上去像一道到处开裂的可怖地山脉——我想象着安第斯山脉、阿尔卑斯山脉的雪链。我的体温情况还是正常：早晨我多半是三十八度一；晚上升到三十九度；最高体温是三十九度四。发着烧的我，看到和听到各种事情。我想从旋转木马上下来，但他们不允许。我同许多孩子坐在救火车上，掏空的天鹅骑在狗、猫、猪、鹿背上，转呀，转呀，转呀，我想下来，却不让下来。所有的小孩子都一样要从救火车上下来，他们都在哭。掏空的天鹅从猫、狗、猪、鹿背上下来了，不愿再乘旋转木马，但不让下来。在天之父站在旋转木马老板身边，转完一轮又替我们付钱再转一轮。于是我们一起祈祷着：“啊，天父，我们知道你零钱特别多，你愿意让我们乘旋转木马，向我们证明世界是圆的会使你高兴。请收起你的钱袋，说一声停，休息，下来，打烊，结束。我们这些可怜的孩子头晕。人家把我们四千人送到魏克塞尔河口的凯泽马尔克，但我们由于你的旋转木马无法过来，你的旋转木马……”

但是，亲爱的旋转木马老板，上帝，天父，如书上所载的那样微笑了，又从钱袋里掏出一个铜板，让四千儿童，还有我，乘上救火车，让掏空的天鹅骑上猫、狗、猪、鹿，又旋转起来。我骑的鹿每次驮我经过天父和旋转木马老板面前时，他都会换一副脸孔。这一回变成哈哈大笑的拉斯普庭，用他那祈祷治病者的牙齿咬着付给下一轮的铜板。一下子又变成诗人君主歌德，他从绣花小钱袋里诱出几个正面都铸有天父侧面像的铜板。又是酒气熏天的拉斯普庭，随后是很有节制的封·歌德先生。同拉斯普庭癫狂一阵，又同歌德理智一会儿。歌德周围的秩序的力量。拉斯普庭周围的极端分子。群众，拉斯普庭周围的骚乱，日历上歌德的格言……最后，旋转木马——不是因为烧退了，却因为总有人探身过来解热而停了下来。法因戈德先生弯下腰来，停下了旋转木马。他把歌德送到母亲们那里去，让四千名晕头转向的儿童随风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飘去，飘到凯泽马尔克，越过魏克塞尔河，飘向天国，让救火车、天鹅和鹿停下，使拉斯普庭的铜板贬值。我被他放在来苏儿水里消毒。

起初他先在小库尔特身上，之后在我身上，在玛丽亚身上，在他自己身上发现了虱子。也许是那个使玛丽亚失去马策拉特的卡尔梅克人把虱子留给了我们。法因戈德发现虱子时大声地呼唤他的妻子、他的子女，怀疑他的全家都长了虱子，人造蜂蜜和麦片被用来换成了各种消毒剂，他开始每天给自己、全家、小库尔特、玛丽亚和我，还有我的病床消毒。他给我们撒药、喷药、抹药。我的热度升高，在他又抹又喷又撒的时候，他的话语滔滔不绝，于是我知道了，他在特雷布林卡营当消毒员期间，曾经喷过撒过洒过几车皮的石炭酸、氯和来苏儿。每天中午两点集中营内的道路、营房、淋浴室、焚尸炉、成捆的衣服都是由他来喷洒。还没有淋浴而在等待的人们、已经淋浴而躺倒的人们、从炉子里出来的一切。消毒员马里乌什·法因戈德喷洒来苏儿水。他向我列举他知道的所有的姓名。他提到了比劳尔。在八月最热的一天，比劳尔建议这位消毒员，用煤油代替来苏儿水喷洒在特雷布林卡集中营的道路上。法因戈德先生同意了。比劳尔有火柴。工程师加列夫斯基撬开武器室，犹太人战斗组织的年迈的策夫·库兰德让大家宣誓。什图尔巴赫和瓦伦斯基打倒了齐塞尼斯。比劳尔一枪打死冲锋队大队长库特纳。剩下的人对付从特拉夫尼基营来的守卫。栅栏也被人推倒。但是，平日带领人们去淋浴时总要开玩笑的小队长舍普克，这时守住营门射击。但这对他并没有帮助，因为阿德克·卡韦、莫特儿·莱维特、海诺克·莱勒尔、梅尔什·罗特布拉特、莱泰克·扎贾尔、托西阿斯·巴兰以及他的德博拉已经把他打倒。洛莱克·贝格尔曼喊道：“法因戈德怎么了？飞机来以前，他也得一起走！”但，法因戈德先生还是等他的妻子卢芭。尽管他在喊她，可是她当时已不会来了。他们从左右两边

把他抓住。左边是雅库布·格莱恩特，右边是莫德哈伊·什瓦茨巴德。跑在他前面的是在特雷布林卡集中营时已经推荐勤洒来苏儿水的小个子医生阿特拉斯，后来到了维尔纳附近的森林里还继续推荐。他断言，来苏儿重于生命！法因戈德先生只好证实他所说有理，因为他曾经用来苏儿喷洒弄过许多人，他知道他们的多得会让人厌烦的姓名，也会使在来苏儿水里游泳的我觉得，几十万有名有姓的人的生死问题并不重要，重要的问题却是用法因戈德先生的消毒剂，能否及时给生命或者死亡消毒。

四月，我的寒热减退。之后，又开始发烧，旋转木马又转动了。法因戈德先生又给死人和活人喷洒来苏儿。然后，四月过完了，我的寒热又减退。五月初，我的脖子变短，胸腔变宽，渐渐地向上隆起。最后，我不用低头便能用下巴颏儿擦自己的锁骨了。有一次，又因为发烧被喷了点来苏儿。我听到了玛丽亚低声说出的、在来苏儿水里游泳的话：“他可别变成个驼背，他可别落个脑积水呀！他可别长成畸形儿。”

法因戈德先生安慰玛丽亚说，他知道有一些人，虽然驼背与脑水肿，照样干出些名堂来。他说有一个叫罗曼·弗里德里希的人，驼着背在阿根廷开了一爿缝纫机店，后来买卖做大，变得特别有名。

玛丽亚无法被驼背弗里德里希功成名就的故事安慰，倒是法因戈德先生听了自己的故事后兴奋不已。他定要让我家的殖民地商品店面目焕然一新。五月中旬，战争刚结束，店堂里摆出了新货物。第一批缝纫机和缝纫机零部件出现了，但生活用品还存了一段时间，使这种过渡变得简单些。天堂般的日子！几乎不用支付现金了。交换，再交换，人造蜂蜜、麦片、最后几口袋厄特克尔博士发明的发酵粉、面粉、糖和人造黄油变成了自行车，自行车和自行车零部件变成了电动机，电动机变成了工具，工具变成了皮货，法因戈德先生又将皮货变成了缝纫机。在变这种换换换的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戏法的时候，小库尔特帮了很大的忙。他引来顾客，介绍生意，比玛丽亚更快地熟悉了新行业。差不多跟在马策拉特时期一样，玛丽亚站在柜台后面接待还留在本地的老主顾用不太流利的波兰话问新迁来的主顾需要些什么。小库尔特有语言天才。小库尔特无处不在。法因戈德先生特别信赖小库尔特。小库尔特还不足五岁却有了专长，在车站街黑市上陈列的数百牛蹩脚和中档样品中，他能一下子挑出一等的辛格尔牌和普法大牌的缝纫机来。法因戈德先生很欣赏小库尔特的学识。五月底，我的外祖母安娜·科尔雅切克从比绍步行经布伦陶到朗富尔来探望我们。她气喘吁吁地躺到沙发榻上。此时，法因戈德先生大大把小库尔特夸奖了一番，也说了几句赞扬玛丽亚的话。他从头到尾地给我的外祖母讲了我的病史，一再指出他的消毒剂怎样有效。因为我老实听话，生病期间没有喊过一声，他也认为我值得夸奖。

我的外祖母说比绍没电了，开口要煤油。法因戈德先生便向她讲述自己在特雷布林卡集中营使用煤油的一些经验，以及他身为营地消毒员的各种任务，他让玛丽亚灌了两瓶煤油，每瓶一公升，外加一袋人造蜂蜜和各种消毒剂。他精神不集中却又连连点头地听我的外祖母讲打仗时比绍和比绍采石场怎样被烧了个精光。她还讲了菲尔埃克怎样被破坏，这个地方现在易名为菲罗加了。比绍也像战前一样又叫作比塞沃。埃勒斯，那个曾当过拉姆考农民协会负责人的，他真有一套，娶了她哥哥的儿子的妻子，也就是待在邮局没有离开的那个扬的妻子黑德维希，农业工人将他吊死在他的办事处前。黑德维希本是一位波兰英雄的妻子，却嫁给了一个农民协会地方负责人，斯特凡当上了少尉，玛尔加又是德国少女同盟的人，所以她差点也被吊死。

我的外祖母说：“可是，他们再也抓不到斯特凡了。他已经丧命于北极海，在天上。但他们要带玛尔加走，关进什么营里去。这时，文岑特开口讲了许多，他这辈子都没讲过这么多。就

这样，现在黑德维希和玛尔加到了我们家，帮着种地。可是文岑特这回讲得太多了，恐怕活不太长时间了。至于我这个老太婆，也是浑身痛得像有个傻瓜在敲打，而且还觉得必须如此。”

安娜·科尔雅切克昂起头，抚摩着我正在长大的头诉着苦，过了一会儿，说出了下面一席颇有见地的话来：“卡舒贝人的情况就是如此，小奥斯卡。他们的脑袋一直被人敲打。不过，你们快上那边去了，那边好一些，只有你的外祖母留在这里。卡舒贝人是不会迁居的，他们只能一直待下去，把脑袋伸出来，让别人来敲打。我们不是真正的波兰人，也不是真正的德国人。一个卡舒贝人，既够不上是个波兰人，也够不上是个德国人。但他们总要求是个真正纯正的人。

说完，外祖母哈哈大笑。她把煤油、人造蜂蜜和消毒剂藏到那四条裙子底下，这些裙子并没有因为发生了特别急剧的军事、政治和世界历史事件而失去土豆的颜色。

法因戈德先生请外祖母待会儿再走，说是要向她介绍他的妻子卢芭和其他家庭成员。安娜·科尔雅切克不见卢芭太太露面，于是说：“没关系。我也一直在呼唤：阿格内丝，我的女儿，来呀，来帮你的老祖母将衣服拧干。她没来，和您的卢芭一样。还有文岑特，我的哥哥，半夜三更，不顾自己在生病，也到门口去，把邻居从睡梦中吵醒。他是在大声叫他的儿子扬，扬留在邮局里，最后丧了命。”

她走到门口，系上头巾，这时我从床上喊道：“姥姥，姥姥！”她回转身来，把裙子撩起了一点，似乎她想让我钻进去，带走我。这时候，也许她想起了煤油、人造蜂蜜和消毒剂已经把地盘都占去了。于是，她走了，没有带我独自走了。

第一批运输列车在六月初向西方开去。玛丽亚不声不响，但我发现，她也在和家具、店铺、公寓、兴登堡大街两侧的坟墓还有萨斯佩公墓的山丘道别。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有些夜晚，她带着小库尔特回地窖以前，会坐在我床头我那可怜的妈妈的钢琴前，左手拿口琴，用一根右手指为她的小曲伴奏。法因戈德先生无法忍受这音乐，请玛丽亚停下来。他却在玛丽亚刚放下口琴，正要合上钢琴盖时，请她再来一段。

然后，他向她求婚，这种事奥斯卡早已看出来了。法因戈德先生呼唤他妻子卢芭的次数逐渐减少。夏天的一个晚上，到处是苍蝇和嗡嗡声，他确定他的妻子已经过世了，于是向玛丽亚求婚。他提出，寓所归她，商店合伙。她和两个孩子，包括有病的奥斯卡在内，他都接纳。

当时玛丽亚二十二岁。如果不说它变冷酷了的话。她少年时的、像是偶然搭配而成的美看来已经固定。战争的最后数月 and 战后开头的那几个月，她的头发已经不烫了，而过去这是由马策拉特付钱的。虽说她不像在跟我的那段时间里那样拖着两条辫子，可她留起了披肩长发，让人看起来她是一个有点严肃的、可能是精神苦恼的姑娘。这时，这位姑娘说“不”，拒绝了法因戈德先生的求婚。玛丽亚在我家的地毯上站着，左手牵着小库尔特，右手拇指指向瓷砖壁炉。法因戈德和我听见她说：“这不行。这儿的一切都过去了。我们去莱茵兰我姐姐古丝特那儿。我姐夫愿意暂时收留我们三个。她嫁给了一家饭店的领班。”

第二天，她就递交了申请。我们三天后拿到了证件。法因戈德先生不再说话，关上店门，玛丽亚在收拾行李，他则坐在阴暗的店堂里柜台上面对天平旁边，也不再吃人造蜂蜜。直到玛丽亚要跟他辞别时，他才从柜台上滑下来，陪我们去火车站，推着他那辆带拖斗的自行车。

因为每人只许带五十磅东西，我和行李被装上两个胶皮轮子的拖斗。法因戈德先生推着自行车。玛丽亚手拉着小库尔特，当我们经左拐进埃尔森街时，她在街角再次回转身来。转身使我疼痛，我无法朝拉贝斯路方向转过身去。我的脑袋也就老实地待在

两肩之间。我只能用尚能转动的眼睛招呼马利亚街、小锤公园、施特里溪小溪，滴着水的越来越让人恶心的车站街下跨道、我的未遭破坏的圣心教堂和很难发音的、现在叫做弗热什奇的朗富尔区火车站。

火车来了，是货运列车。有人，有好多好多的孩子。行李经过检查，过磅。士兵们往每节货运车皮里扔一捆干草。没有播放音乐。晴转多云，刮着东风，没有下雨。

我们上了倒数第四节车箱。法因戈德先生站在车下铁轨上，稀少的浅红头发随风飘拂。火车头猛地一撞宣告它的到来，法因戈德先生靠近了车箱，递给玛丽亚三小袋人造黄油和两小袋人造蜂蜜。他又在旅行食品之外添加了一袋消毒剂，这时用波兰话讲的命令、叫声、哭声宣布列车开动了。我们走了，留下了法因戈德先生。他笔直地站着，符合列车出发时的规定，浅红头发飘动着，变得越来越小，只剩下挥动的手，最后终于不复存在。

在货运车皮里长个儿

现在，疼痛仍在折磨着我，方才就痛得我一头倒在枕头上。疼痛使我清晰地感觉到了足和膝关节，使我变成了“格格响”，这意思是我不得不格格地咬住牙，让自己听不到各个关节窝里骨头的格格响。我看了看十指，它们全肿了。我最近一次试着敲鼓，结果证明，我的手指不只是有点肿，而且连鼓棒都捏不住了。

我连自来水笔都握不住。我不得不请布鲁诺替我冷敷。手、足、膝都敷上了，额头也敷上了毛巾，于是我用铅笔及纸来装备我的护理员布鲁诺，我不愿把自来水笔借给他。布鲁诺愿不愿、能不能好好听着呢？对于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二日开始的那次旅行的复述会合乎他的要求吗？布鲁诺坐在小桌前那幅银莲花画下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方。现在他把头转了过来，我看到了他的半边脸，他的怪兽眼向我的左右两侧望去。他把铅笔横放在撅起的薄嘴唇间，装出等待的样子。就假设他的确在等我发话，等待开始记录的信号吧！他的思想正围着他的编结物转圈。他要用包装线绳来编结，而我的任务刚好相反，他要靠丰富的言词把我混乱的故事理出个头绪来。现在布鲁诺动笔写了：

我，布鲁诺·明斯特贝格，未婚，无子女，绍尔兰的阿尔特纳人，本地疗养与护理院私人部护理员。马策拉特先生是我护理的病人，在此安置一年多了。我还护理着其它病人，这里就不谈别人了。马策拉特先生是我的最安全的病人。他从未失去自制能力，以致我只能把其他的护理员都叫来帮忙。他写得太多了，鼓也敲得太多了。为能体谅他过度操劳的手指，今天他请我代笔，别再做我的编结物。但我仍把线绳藏在口袋中，在他讲述的同时，开始用下肢编结一个形象，而且根据马策拉特先生所讲的故事，我将给它取名为“东方难民”。这并非我取自我的病人的故事的第一个形象。时至今日，我已经编结了他的外祖母，取名为“四条睡裙中的苹果”；他的外祖父，那个筏运工，我大胆地取名为“哥伦布”是用线绳编结的；经过我的编结，他的可怜的妈妈变成了“食鱼女人”；我根据他的两个父亲马策拉特和扬·布朗斯基，编结了一对形象，取名“两个施卡特牌迷”；我把他的朋友赫伯特·特鲁钦斯基疤痕累累的后背也编结出来，称他为“不平坦地段”；我一个结一个结地把波兰邮局、塔楼、市剧院、军火库巷、航海博物馆、格雷夫的蔬菜窖、佩斯塔洛齐学校、波罗的海巧克力厂、布勒森游泳场、圣心教堂、四季咖啡馆、大西洋

壁垒的许多地堡、兰斯大教堂、巴黎的艾菲尔铁塔、柏林什切青火车站以及马策拉特先生初见世界之光的公寓等建筑物复制了出来。萨斯佩和布伦陶的公墓的栏杆和墓碑，为我的线绳提供了可以摹仿的图案。我认真地编结，让魏克塞尔河和塞纳河流淌，让大西洋的浪涛撞击我的线绳海岸，让线绳变成卡舒贝的土豆地和诺曼底的牧场。像这样产生的田野，我称为“欧罗巴”，还让几组群像定居在那里。例如：邮局保卫者。讲坛上的人们，讲坛前的人们，殖民地商品商。拿纸袋的国民小学学生。晚霞前的波兰骑兵。垂死的博物馆看守。准备过圣诞节的青年刑事犯。蚂蚁创造历史。前线剧团为士官与士兵演出。特雷布林卡集中营里站着的人给躺下的人消毒。我现在开始编结的东方难民形象，非常有可能变为一组东方难民群像。

于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二日上午十一时左右出生的马策拉特先生由但泽，那时已叫做格但斯克启程。陪同他的有我的病人称他以前情人的寡妇玛丽亚·马策拉特和小库尔特（我病人的假想儿子）。此外，据说在这节货运车厢里还有三十二个人，其中有四个穿教团服的圣方济各派修女，奥斯卡·马策拉特先生想把一个年轻的系头巾的姑娘一位名叫卢齐·伦万德的小姐。经我多次质问，我的病人才承认，那位姑娘叫雷吉娜·拉埃克，但他继续谈着一张无名的三角形狐狸脸，后来又直呼她卢齐，这并不妨碍我仍叫这位姑娘雷吉娜小姐并记录下来。与雷吉娜·拉埃克同行的有她的父母、祖父母和一个有病的伯父。此人带着家眷和胃癌去西方，话不绝口，车一开就冒充自己是前社会民主党的党员。就我的病人记忆所及，直到格丁尼亚（此地有四年半之久被叫

做哥滕港)，一路太平。从奥利瓦来的两个妇女、很多孩子和从朗富尔来的一位年纪较大的先生，刚过索波特就哭开了，修女们则喃喃祈祷。在格丁尼亚，火车停了五个小时。人家又让那两个妇女和六个孩子上了这节车箱。社会民主党人对此提出抗议，说他有病，说他身为社会民主党人从战前起就要求特殊待遇。他不肯让出地方，负责运输的一名波兰军官给了他一记耳光，用十分流利的德语说，什么社会民主党人，他不懂这是什么意思。战时，他去过德国的许多地方，可从来没有听到过社会民主党人这个词儿。说完他就走出车箱，并把门反锁上。那个得胃癌的社会民主党人甚至没有来得及向他解释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含义、本质及历史。

下午，火车开了，几个妇女嚷道：“我们又开回但泽去了。”但这是个错觉。火车只是调轨，接着又朝西向斯托尔普驶去。我忘了写，所有的人都坐在或躺在干草上。走了四天才到斯托尔普，因为列车在车站外的路段上常常被以前的游击队和波兰青年团伙截住。这些年轻人打开车箱的门，换换空气，把污浊空气和一些旅行行李带出车箱。每当年轻人占领马策拉特先生所在的那节车箱时，那四个修女总会把双手举起，紧握住挂在修女服前的十字架。他们先画十字，随后将乘客的背包和箱子扔到铁路路堤上。这四个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给年轻人印象很深。

那个社会民主党人拿出他在但泽或格但斯克时，波兰当局证明他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七年是社会民主党缴纳党费的党员的文件给小伙子们看。小伙子们没有画十字，一巴掌打落他手里的证书，抄走了他的两口箱子和他妻子的背包。甚至连他垫在身下的上好的大方格冬

大衣也被扔进了新鲜的波莫瑞空气中去了。

可是，这些小伙子给奥斯卡·马策拉特先生的印象是既能干又有纪律。他说这是因为受了他们的首领的影响，他们的首领虽然年轻，刚满十六岁，却已经是个人物的样儿。这又使马策拉特先生回想起撒灰者团伙的头领，回想起那个施丢特贝克真是既痛心又高兴。

马策拉特先生在那个与施丢特贝克长得十分相象的年轻人从玛丽亚·马策拉特太太手里夺走背包的最后一刹那，从背包里一把抓起幸好放在最上面的那本家庭照相簿。团伙首领勃然大怒。但我的病人打开照相簿，给那小伙子看他的外祖母科尔雅切克的照片。也许小伙子想起了自己的外祖母，就放下了玛丽亚太太的背包，两手搭在他那波兰多角帽上致意，对着马策拉特一家说了声：“再见！”又抓起代替马策拉特家背包的其他乘客的箱子，带着他的人离开了车箱。

在那个幸免遇难的背包里，除装有几件替换的衣服外，还有殖民地商品店的账册和营业税单据、储蓄存折、一串原本属于马策拉特先生母亲的红宝石项饰，由我的病人藏在一袋消毒剂里，还有就是那本一半由拉斯普庭的篇章、一半由歌德的著作合成的教科书，它也一同西行了。我的病人说，全部旅途中的大部分时间，他的膝上都放着家庭照相簿，有时也翻看那本教科书，尽管四肢剧烈疼痛，这两本书却赐予他许多愉快的、沉思的时光。

我应病人的要求接着写道：摇晃与震动，驶过道岔和交轨外，伸开四肢躺在一节车皮不停地震颤着的前轴上方，这都促进他长个儿。他不再像过去那样横向发展，而是纵向长高了。虽肿但不发炎的关节松开了。甚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至他的耳朵、鼻子和生殖器官，也在货运车箱撞击轨缝时变长了。只要运输列车在野外行驶，马策拉特先生就不觉得痛苦。只要列车一停，又有游击队和青年团伙来访，他就会受到刺痛和拉痛的折磨，这时他就用照相簿来对付。

据他说，除了那位波兰施丢特贝克以外，还有一个年纪较大的游击队员和许多其他青年强盗对照相簿产生过兴趣。这位老战士甚至坐下来，点上一支香烟，不慌不忙地翻看照相簿，一张都不漏，从外祖父科尔雅切克的肖像直到玛丽亚·马策拉特和她的一岁、两岁、三岁和四岁的儿子小库尔特一起拍的快照。我的病人看到，他是微笑着观看那几张家庭田园生活照片的。但有几张照片，已故马策拉特先生上装上的党徽和拉姆考农民协会负责人、娶了邮局保卫者扬·布朗斯基之寡妻黑德维希的埃勒斯先生衣领上的党徽太过明显，触怒了这位游击队员。我的病人用一把早餐刀的刀尖刮掉了照片上的党徽，才让他感到满意。

马策拉特先生正想改变我的看法。他说，这个游击队员和其他许多假游击队员正好相反，曾经是个真游击队员。他声称：游击队员从来都是一贯的、长久的、并非临时的，他们把被推翻的各届政府扶上台，又推翻借助游击队之力才被扶上台的各届政府。根据马策拉特先生的观点——这本该使我明白，在所有从事政治的人中间，本性难移、自我分化的游击队员把自己刚创造出来的东西随手就扔掉了，因而他们最具有艺术家的天赋。

我自己也是这样。我的编结物刚在石膏里定型，我就一拳把它砸碎，这种事不是经常发生吗？尤其我想到我的病人几个月前给我的委托，他要我用简单的线绳把

俄国的信仰治疗者拉斯普庭和德国的诗人君主歌德编结为一个人，并且还要和他十二分相似。为了让这两个极端有效地产生出一个结合体来，我不知用掉了多少千米的线绳。可是，要让它像我的病人，像马策拉特先生所推荐的那个模特儿，我可没有办法。我右手编结成了了的，就用左手把它拆掉，我左手做成形了的，就用右手一拳将它砸碎。

可是，马策拉特先生也无法使他所叙述的事保持直线运动。那四个修女，他一会儿说她们是圣方济各派的，一会儿又说是仁爱会派的。除此以外，特别是那个年轻姑娘，她有两个姓名，但合有一张据说是三角形的狐狸脸，她一再地使他关于那次由东方到西方的旅行报道变得杂乱无序。作为复述人，我不得不记下两种甚至多种不同的讲法。但这并不是我的职责所在，所以我就抓住了那个社会民主党人之一。在整个旅途中，他没有改变嘴脸，据我的病人讲，直至快到斯托尔普以前，他一路上反复对同行的乘客讲，他是为数甚少的冒雨贴标语的社会民主党人人，牺牲了业余时间，拿健康当儿戏，到处贴标语，一直贴到一九三七年。

斯托尔普就快到了，货运列车却又停下，也不晓得是第几次停车了。此时他还在讲贴标语的事。原来停车是因为来了一个人数较多的青年团伙。几乎没什么行李了，他们就动手剥旅客的衣服。他们还算有理性，只限于剥男人的上装。这位社会民主党人认为，宽大的修女服若是到了灵巧的裁缝手里，能裁剪出许多件像样的上装来，因此他无法理解。他还说自己，是个无神论者。虽然那些年轻强盗没有宣布自己的信仰，却是属于那惟一赐福的教会的，他们不要可以派许多用场的修女们的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毛料服，偏要这位无神论者含有木浆的单排扣上衣。他不愿脱下上装、背心和裤子，却讲起他那段社会民主党标语张贴者的生涯来，时间虽短，但极富成效。他一味讲着，人家剥他的衣服，他就反抗，最后被一只穿着前国防军短统靴的脚踢到了胃上。

这个社会民主党不停地大口地呕吐，最后大口吐血。这时，他可以放心穿着他的上装了，小伙子们对这件弄脏了的衣服，已失去了兴趣。他们放弃了男人上装，却剥下了和那个不叫卢齐·伦万德而叫雷吉娜·拉埃克的年轻姑娘的贝希特斯加登毛线茄克衫和玛丽亚·马策拉特的浅蓝色人造丝上装。接着，他们拉上了车箱门，但没有关严。火车开了，那个社会民主党人开始咽气。货运列车被拉到离期托尔普两三公里的一条停放线上，停在那里过夜，星星亮晶晶，但六月的夜却很凉。

那天夜里，那个舍不得他的单排扣子上装的社会民主党人，大声而下流地亵渎上帝，号召工人阶级斗争，像在电影里听到的那样，他说完“自由万岁”后呕吐了一阵，就死了。使全车箱充满了恐惧。

我的病人说，接下来车箱里一片寂静，而且始终保持着寂静。只有玛丽亚太太的牙齿在打架，她没有上衣正在挨冻，仅剩的几件内衣都盖在儿子库尔特和奥斯卡先生身上了。天快亮时，两个胆大的修女发现车箱门没关严是个机会，便清扫车箱，把小孩和大人的粪便、湿透的干草，以及那个社会民主党人吐的血都扫到了路堤上去。

到了斯托尔普，由小兰军官检查列车。同时，分发热汤和类似麦芽咖啡的饮料。由于马策拉特所在车箱里的尸体有传染瘟疫的危险，所以被没收，由卫生兵用木

板抬走。一名级别较高的军官允许死者家属做一次短时间的祈祷，在修女们出面说情之后。另外也允许脱下死者的鞋、袜与上装。后来又用空水泥袋盖住了木板上的尸体。在剥衣服的时候，我的病人打量着被剥去衣服者的侄女。由这个姓拉埃克的年轻姑娘他既厌恶又着迷地联想到了那个卢齐·伦万德，我已用线绳复制了她，并给这个编结物取名为“吞食香肠面包的女郎”。车箱里的那个姑娘，虽说没有当着她的伯父的面抓起一个夹香肠面包，连香肠皮一起吃个精光，却参与了抢劫，从她伯父那儿抢来一件背心，穿到身上，代替被抢走的茄克衫，掏出小镜子，打量她这还算合身的新打扮。通过镜子她看到了我的病人及他的铺位，这样在镜子里反映出来，然后公然用三角脸上的眯缝眼冷漠地观察他。直到今天，每想起此事，我的病人就会陷入莫名的恐慌。

火车从斯托尔普出发，走了两天才到什切青。被迫停车的次数还相当多，他们已经慢慢习惯，那些手执伞兵刀和机关枪的半成年人的来访，因为从旅客身上已经榨不出任何油水了，所以来访时间越来越短。

我的病人声称，在从但泽—格但斯克到什切青这一周内，他的身体长高了九公分到十公分。首先，大腿和小腿长了一截，胸腔和头却几乎没有延伸。虽说我的病人在旅途中是背着地躺着，但这并没有阻止一块偏向左上方的隆肉的生长。他还说，过了什切青——其间列车已由德国铁路人员接管——疼痛加剧，光靠翻看家庭照相簿已经不能使他忘掉痛苦。他必须多次持续地叫喊，虽然这叫喊声没有破坏任何车站的玻璃，却把四名修女召集到了他的铺位前，让她们无尽期地祷告。马策拉特先生说：我的声音已经丧失任何唱碎玻璃的潜能。

包括已死的社会民主党人的亲属和雷吉娜小姐在内的半数乘客，在什未林下了车。马策拉特先生深感遗憾，因为这位年轻姑娘的面孔他已经看熟，而且看到这张面孔已变得十分必要，所以她走后，他突然惊厥过去，全身痉挛，并且发高烧。据玛丽亚·马策拉特太太讲，他自称怪兽和独角兽拼命呼唤卢齐，表示他害怕从十米跳台上跳下来，却又觉得跳下来有乐趣。

在吕内堡，奥斯卡·马策拉特先生被送进一家医院。他在高烧中认识了几位护士，但紧跟着就被转送到汉诺威大学附属医院。在那里，他的体温总算下降了。玛丽亚太太和她的儿子库尔特很少看到马策拉特先生。后来，她在医院里找到了清洁工的职务这才每天见面。但是，在医院里或者医院附近都找不到可供玛丽亚太太和小库尔特落脚的住房，难民营里的生活又日益无法忍受。玛丽亚太太得每天乘坐三小时的火车，车上挤满了人，常常踩在车门踏板上。医院就是跟难民营离得这么远。尽管医生们十分不放心，但还是同意把病人转到杜塞尔多夫市立医院去。玛丽亚太太还出示了一份移居批准书：她的姐姐古丝特战时嫁给居住在杜塞多尔夫的一个领班，因为领班现在在俄国人的战俘营里，不需要住处，所以将她那两间半套房里的一个房间提供给马策拉特太太使用。

寓所的地理位置很好。只需搭乘由比尔克火车站开往韦斯滕和本拉特方向的所有的有轨电车，不必转车，就能方便地到达医院。从一九四五年八月到一九四六年五月马策拉特先生一直待在那里。在刚才的一个多小时里，他还向我讲述了那家医院里许多位护士的事情。她们是：黑尔姆特鲁德姆姆，莫尼卡姆姆，瓦尔布加姆

姆，格特露德姆姆，伊尔泽姆姆。他回忆着医院里广为流传的蜚语，赋予护士日常生活中诸如此类的事情以及她们的职业服装一种夸大了的意义。在我的记忆里，他从未讲到过那时候医院里糟糕的伙食与暖气设备蹩脚的病房。他只讲护士、护士的轶事、护士极其乏味无聊的环境。他秘密地小声说，那里有过这种传闻：伊尔泽姆姆跟护士长打小报告，护士长在午休过后不久便去检查见习护士的宿舍，因为有什么东西丢了。一个从多特蒙德来的护士——我想他指的是格特露德——被怀疑，但她是冤枉的。他琐碎地讲了护士跟年轻医生的故事，可他们只想从护士那里得到香烟商标。一个药剂师女助理，自己给自己打胎，或是得到了一个助理医生的帮助，然后就进行了调查，这种事情他也觉得有叙述的价值。他竟把自己的才智浪费在这些平庸陈腐的事情上，我实在难以理解。

现在他请我描绘他。我快活地满足了他的愿望，但跳过了和护士有关的部分，反正他自己已经形象而生动地描写过了，又增添了一些有分量的话语。

马策拉特先生身高一米二十一。几乎萎缩的脖子上顶着一颗大脑袋，即使把它安到发育正常的成年人身上也显得太大。胸腔突出，后背隆起，学名驼背。他的微髻的深褐色头发长得很密，他的一双蓝眼睛，目光炯炯，机灵地滴溜转动，时而睁得大大的，狂热痴情。他喜欢露出他显得相对健壮的臂膀以及——如他自己所说——漂亮的手。尤其在他击鼓时——疗养院管理处准许他每天击三小时，至多四小时，他的手指灵活自如，仿佛是长在另一个肢体比例正常的人身上。靠灌唱片马策拉特先生变得非常富有，今天他还靠灌唱片挣钱。想要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谋利的人都在探望日来拜访他。还在他被送到我们这里来之前，他的那场官司开始之前，我已经久闻其名，因为奥斯卡·马策拉特先生是一位鼎鼎大名的艺术家。我个人相信他是无罪的，因此，我说不准他是否会在我们这儿待下去，抑或有朝一日会出院，重操旧业，蜚声艺坛。虽说两天前才量过但现在我又要替他量身高了……

我不想再去复审我的护理员布鲁诺的复述。我奥斯卡，又拿起了笔。

布鲁诺刚给我用折尺量过身高。他把尺留在了我的身上，离开了我的房间，一面大声宣告测量的结果。甚至连他在讲述时偷偷做的编结物也掉到了地上。我想，我应该去叫霍恩施泰特博士小姐了。

我想应该在女医生霍恩施泰特来到病房并向我证实布鲁诺测量的结果之前，读者诸君讲了吧：在我对我的护理员讲述我的长个儿历史的三天内，我整整长高了两公分——难道这是一种盈利吗？

就这样，从今天起我的身高为一米二十三。现在他将报道，战后，别人让他离开杜塞尔多夫市立医院而他也能开始——过成年人的新生活之后，他，一个会说话、勤奋地读着、犹豫地写着、尽管畸形但此外相当健全的年轻人到底境况如何。

第三篇

打火石与墓碑

古丝特·特鲁钦斯基成了古丝特·克斯特后，自身不需要有什么改变。肥肥胖胖，整天睡眼 眈眈，菩萨心肠。加之，她跟克斯特相处的时间非常有限：克斯特上船去北极海前线以前休假十四天，他们订婚；他从前线回来后休两个星期的假，他们结婚，多半时间躲在防空洞中。库尔的军队投降后，克斯特还活着的消息虽然没有传来，但每当有人问起她的丈夫时，古丝特就用大拇指指着厨房门，有把握地说：“他在那边伊凡的战俘营里。他一回来这里就会大变样。”

玛丽亚和库尔特来后的生活是比尔克区的这个寓所里留待克斯特去改变的事情。人们让我出院了，我告别了护士们，答应有时间会去看她们，就乘上有轨电车到比尔克去找这姊妹俩和我的儿子库尔特。那幢公寓，从四层到屋顶全烧光了。我到了三层，发现这里已变成玛丽亚和我的儿子经营的一个黑市商品中心。仅六岁大的小库尔特也在扳着手指计算。

即使玛丽亚做黑市交易也忠于她的马策拉特，她做的是人造蜂蜜生意。她正把蜂蜜从没有商标的桶里舀出来，倒在磅秤上。我刚进门，还没有熟悉这狭窄的天地，她就要我按每袋四分之一磅把蜂蜜装进口袋。

小库尔特坐在一只贝西尔洗衣粉木箱后，像是坐在柜台后面，他那双冬天似的灰眼睛虽说也看了一眼他的病愈回家的父亲，却一直看着什么值得看的东西，好像要把目光穿透我才能看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清。他面前放着一张纸，正在纸上编排想象的数字纵队。在人头攒动、暖气设备不良的教室里才上了六星期课的他，已经摆出一副冥思苦想者和一心出人头地者的模样。

我忙着包装人造蜂蜜的时候，古丝特·克斯特好奇地注视着我的驼背，露出同情她的妹妹玛丽亚的神情。她在喝咖啡，把一杯咖啡推到我的面前，我发现这是真咖啡。坐着不动，不让她摸摸我的驼背，她觉得很困难。对所有的女人而言，摸摸驼背便会走运。对于古丝特而言，走运就是克斯特回乡，把一切改变。她努力克制自己，摸摸手里的咖啡杯算是代替，但这却不会使她走运，于是大声叹了一口气。在今后的几个月里，我将每天都能听到她叹气。她说：“只要克斯特回来，这里就会大变样，虽说你们还没有见到他，你们可以相信此话。”

古丝特爱喝靠人造蜂蜜换来的真咖啡，却又谴责黑市交易。顾客一来，她就离开起居室，趿拉着拖鞋进厨房，弄出格格的声音表示抗议。

顾客特别多。早饭刚吃完，九点刚过，门铃就开始响：短——长——短。入夜，快到十点时，古丝特关上电铃，常常不顾小库尔特的抗议，因为他要上学，只能利用一半的交易时间。

上门的人问：“有人造蜂蜜吗？”

“四分之一磅还是半磅？”玛丽亚温柔地点点头并问。也有不要人造蜂蜜的。他们会问：“有打火石吗？”一天上午，一天下午交替着去学校的小库尔特，伸手去摸毛衣里面的衣服口袋，用小孩挑战的清脆声音将数字送到起居室的空气中去：“想要三块还是四块？最好是要五块。马上要涨价，至少二十四。上个星期还是十八，今天早晨我已经不得不开价二十。如果您早两个小时，我刚放学时就来，我还可以只收您二十一。”

小库尔特在长四条街、宽六条街的地盘内是独一无二的火石商。他有个来源，但从不泄露，却又一再说：“我有个来源！”甚

至他上床前也说，来代替做晚祷。

身为父亲，我有要求知道我儿子的来源的权利。他从不神秘反而自信地宣布：“我有个来源！”他一说，我便紧接着问：“快些告诉我，你的火石是从哪儿搞来的？”

玛丽亚在我调查这个来源的那几个月里总是说：“别管你弟弟，奥斯卡。一来这与你无关，二来假如该问我早就问了，三来你别装得像他的父亲似的。几个月以前，你连个‘呸’都不会说呢！”

遇上我硬要追问小库尔特的来源时，玛丽亚会用巴掌猛拍人造蜂蜜桶，怒火一直烧到胳膊肘，同时攻击我及有时支持我调查来源的古丝特：“你们全是饭桶！你们赖以生活的，正是他辛辛苦苦挣来的。还想破坏我儿子的买卖。一想到奥斯卡两天之内就把他得到的那几卡路里的病人补贴吃光时，我就会生气，但实际上我只觉得可笑。”

必须承认，在住院时，我的胃口特别的好，医院的伙食却少得可怜，我能恢复体力，全靠小库尔特的这个来源——这比人造蜂蜜的收入要多。

小库尔特天真而慈悲地给了我很多零花钱，我只能惭愧不语地带着它，尽量不待在比尔克区的寓所里，免得看到自己丢人现眼。

今天，地位优越、形形色色的经济奇迹评论家们越是少去回忆当时的环境，就越欢欣鼓舞地说：“人们肚里空空，却还去排队等戏票。各种临时安排的土豆烧酒聚会就像神话一样，比今天通常举行的香槟酒和鱼子酱宴会不知有趣多少倍。币制改变之前的时期已经是难以置信的。现在已经活跃起来了！”

你可以把这些人叫做错失良机的浪漫派。我原本也可以像他们一样地悲叹自己错失了良机，因为在小库尔特的打火石来源像泉水喷涌的几年中，我差不多不费分文地在成千努力补习和学习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的人的圈子中受教育，报名听业余大学的课程，成了名叫“桥”的不列颠中心的常客，与天主教徒和新教徒讨论集体罪责。我跟所有这些人一起感到有罪过，当时他们想的是：现在我们承担罪责，事情不久就会过去，将来情况好转时，我们也就不用感到内疚了。

通过夜大的学习，我才具备过得去的文化水平，当然学得不系统，有缺漏。当时，我学了非常多的书。读书之多，连我自己都记不清了。我长个儿以前的那本读物，只教给我可以把世界分成两半，一半属于拉斯普庭，一半属于歌德，另外就是从一九〇四年至一九一六年我在克勒的《船队年鉴》上得到的知识，这些我都感到不够了。上厕所我也读书。夹在捧书阅读的、拖着莫扎特辫子的年轻姑娘中间排几个小时队买戏票时，我也读书。在包装人造蜂蜜的时候，我也读书。小库尔特出售打火石的时候，我也读书。停电的时候，我借着蜡烛光读书，蜡烛也是小库尔特用他的来源弄到的。

那些年里的书我并没有读进去，真是汗颜，前读后忘，只留下只言片语，若干格言。话剧呢？只记住了几个演员的姓名：彼得·埃塞尔，霍佩，弗丽肯席尔德和在实验剧场演出还有待弗丽肯席尔德纠正“r”发音的戏剧学校女学生，还有格林德根斯。他扮演塔索，一身黑服，歌德在剧本中规定要戴的桂冠把他的鬚发烫住了，他把它从假发上拿下来。一个和格林德根斯穿同样的黑服扮演哈姆莱特。弗丽肯席尔德说，哈姆莱特太肥。给我留下印象的倒是约里克的颅骨，因为格林德根斯就这头颅讲了一番十分有分量的话。后来他们在没有暖气的剧场里演出《在大门外》，观众无不震惊。我则把戴破眼镜的贝克曼想象成回乡的克斯特，古丝特的丈夫。如古丝特所说他改变了一切，也填平了我儿子库尔特的打火石来源。

今天，这些对我来说都已成往事；我也明白了战后醉酒状态

只是一种醉酒状态罢了，它肯定会带来宿醉的痛苦，像一只雄猫，喵呜喵呜不停地叫。昨天，这一切对于我们来说，还是亲手制造的行为或者罪行，还是新鲜的和血淋淋的。今天，它已经宣布这一切已成为历史。正因为如此，今天，我还是喜欢格蕾欣·舍夫勒一面回顾“力量来自欢乐”组织的旅游，一面编织毛衣时讲的课；较少的拉斯普庭，适度的歌德，早已沉没的班轮的设设备，提纲挈领地谈凯译的《但泽城历史》，投入对马海战的所有日本鱼雷艇的速度是多少节，此外还有托蒂拉和泰耶，贝利萨尔和纳赛斯，菲利克斯·达恩的《罗马之战》。

一九四七年春，我告别了三楼楼厅和一直还在扮演哈姆莱特的古斯塔夫·格林德根斯，放弃了夜大学、不列颠中心和尼默勒牧师。

在马策拉特的坟墓旁我决定长个儿以来还不足两年，已经烦透了成年人千篇一律的生活。我怀念着已经无法复得的三岁孩子的身材。我执着地想要恢复九十四公分的身高，比我的朋友贝布拉，比已故的罗丝维塔更矮。我惦记我的鼓。几次远道散步把我带到了市立医院附近。反正我每月要去看一次称为有趣的病例的伊德尔教授，便一再去拜访他认识的护士们，但待在这种白色的、预示康复或者死亡的匆匆而过的衣料旁边，他感觉愉快、几乎感觉到幸福，尽管护士们没有时间陪我。

护士们喜欢我，给我一些好东西吃，拿我的驼背开玩笑，天真稚气，没有恶意，向我透露她们的医院秘闻，错综复杂，无穷无尽，让人听得既高兴又疲倦。我洗耳恭听，出些点子，因为我具备护士长的同情心，甚至能调解一些小小的不和。在二十到三十个藏身于护士服中的姑娘当中，我是惟一被她们以特别的方式追求的男人。

布鲁诺已经讲过，我有一对相当蓝的、始终还讨人喜欢的布朗斯基的眼睛，一双漂亮的、会说话的手，一头波浪形柔发。我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的驼背和我的下巴底下开始同样狭窄、同样隆起的胸腔极有可能反衬出我的眼睛和手的美，我的头发讨人喜欢，不管怎么样，这样的情况是经常发生的：当我坐在她们的科室里，护士们一边往外走一边对人说：“看着他的眼睛，会把他身上其他部分全部忘掉的；或是抓住我的手，抚弄我的头发。”

所以，我战胜了我的驼背，如果当时有鼓在我的身旁，对过去多次证实的鼓手的潜力有十足的把握，我肯定会决定征服医院内部。然而，我毫无把握地、羞愧地不相信我的肉体可能会有任何冲动，在这温情脉脉的序幕之后，我离开了医院，出去透透气，逃避决战，在花园里或者绕着医院外面的铁丝网篱笆散步。篱笆的铁丝网眼又密又有规则，使我情不自禁吹起了口哨，冷静下来。呆望着驶往韦斯滕和本拉特方向去的有轨电车，我在林阴人行道上的自行车道旁边无聊而自在地溜达着，讥笑大自然的铺张。它按照节目单让蓓蕾如同爆竹一般劈啪绽开，只为扮演春天。

我们的永恒的星期日画家在马路对面日复一日地给韦斯特公墓的树木涂上越来越多的绿油油的颜料。公墓全都整洁，意义单一，合乎逻辑，有男性气概，富有活力。过去我已经被它引诱过好多次了。在公墓，一个人能够鼓起勇气，下定决心。在公墓，人生才得到它的轮廓，换一种说法：人生才得到某种意义。

有七家墓碑店在沿公墓北墙的一条比特路竞争。大铺子是尤利乌斯·韦贝尔和C·施诺格。小铺子的店号是：克劳特、J·博伊斯、R·海登赖希、缪勒、P·科涅夫与屈恩。店铺是工作室和木板房的混合物，宽敞，屋顶前的招牌或是新漆的或是勉强可以辨认字迹的，店号下面写着：墓碑店——墓碑与墓界制作——天然与人工石刻铺——墓碑艺术。我在科涅夫的店铺上方读到：P·科涅夫——石匠——墓碑雕刻师。

从单穴墓到四穴墓一家庭合葬墓的墓碑排列在作坊与围着铁

丝网篱笆的空场之间的单基座和双基座上。壳灰岩墓碑放在紧靠篱笆后面、阳光投射下的菱形阴影里，枕头那么小，供穷人用；儿童墓碑，西里西亚淡云花纹大理石制成，围以弧饰，一概八十公分高，上部三分之一为镂刻，多半是断枝玫瑰。磨光辉绿石板，刻着没有磨光的棕榈枝；接着是一排普通的一米石碑，原为被炸毁的银行和百货公司楼房的正面用的美因河红砂岩，如今在这里欢庆复活，假如也可以这样来谈论一块墓碑的话。豪华制品放在这个展览场地的中央：一座纪念碑，由一块刻满花饰的石壁、两个侧部对称件及三个基座组成，材料是白色与淡蓝相间的蒂罗尔大理石。庄重地突出在主壁上的，是石匠们称之为主体的浮雕。主体者，一人体也，脑袋和膝盖都向左歪斜，没有胡子，掌心摊开，前胸伤口滴着血，荆棘冠，三颗钉子，传统的线条风格，我相信，一共五滴血。

比特路上有足够供应的刻着向左歪斜的主体的墓碑足够供应还有剩余，经常有十余个主体伸开双臂，在春天的销售季节开始前欢迎买主光临。但最使我受吸引的是科涅夫的耶稣基督，因为他最像圣心教堂主祭坛上我那位体操运动员，扩胸展肌，身手不俗。我在篱笆前打发了几个小时。用一根棍在密网铁丝篱笆上刮出母猫的呼噜声，这样那样地祝福自己，想着一切机遇，又什么也不想。工作室一扇窗户里伸出的烟囱，弯弯曲曲，像是几次屈膝才超出房顶。劣质煤的黄油有节制地冒出来，降落到屋顶的硬纸板上，沿着窗户，和檐沟渗下去，消失在龟裂的大理石板和没有加工的石块之间。在作坊的拉门前，停着一辆三轮摩托，盖有几块帐篷布，像是为了防备低空飞机袭击而伪装的一样。作坊里由木头敲在铁上、铁劈开石头组成的噪声表明了石匠正在干活。科涅夫却始终没有露面。

三轮摩托上的帐篷布到了五月就被掀掉了，拉门也被拉开了。我看到作坊里一层又一层灰色，一台绞刑架模样磨石机，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放着石膏模型的架子，堆着的石头最后是科涅夫。他走路时膝盖格格响，弯着腰，梗着脖子，脑袋伸向前方。脖子后面贴着膏药，有粉红色的，有黑色的，相互交错、渗透。科涅夫手执钉耙走来，在陈列的墓碑间耙着，因为春天来了。他精心工作着，把去年掉到几块墓碑上去的枯死的枝叶耙在一起。在砾石上留下多变的痕迹，耙子在篱笆前面壳灰石碑的辉绿石板间移动时，他的声音把我吓了一跳：“小伙子，你被家里的人赶出来了吗？”

“我非常喜欢您的墓碑。”我讨好说。

“可别说这种话，要倒霉的，别人会在你的头顶上也立上这么一块的。”

他这时才费力地转了转他那僵直的脖子，斜眼看到了我，或者说，看到了我的驼背。“他们怎么把你搞成了这个样子？不妨碍睡觉吗？”

我任凭他哈哈大笑，随即告诉他，一个驼背不一定非有妨碍，在某种程度上我已经超越了驼背，甚至有的妇女和姑娘表示喜欢驼背呢，坦率地说，她们在驼背身上找到了多种乐趣。她们甚至会去适应一个驼背丈夫的特殊环境和条件。

科涅夫把下巴靠在耙子柄上沉思：“有这种可能，我也听说过的。”

接着石匠作了冗长烦琐的回顾，他说他在埃弗尔的玄武岩采石场干活时和一个女人有过那么一段，那女人的一条木头腿，我想是左腿，是可以卸下来的。他把它和我的驼背作比较，虽说我的“箱子”——他这样称我的驼背——是不能卸下来的。等我耐心地听他讲完那个女人重新装上她那条木头腿之后，我请求他同意我参观作坊。

科涅夫将铁丝网篱笆中央的铁皮门打开，用钉耙指向敞开的拉门请我入内。从沙沙作响的砾石上走过，直到硫磺、石膏和潮湿味将我团团围住。

沉重的、上端砍平的梨状木锤放在用四根撬杆调整成水平的毛糙石板上，面上的凹陷处表明总是在同一个地方敲打。与粗凿锤子配合使用的尖凿子，圆头把尖凿子，新铸成的、因淬火还呈蓝色的齿状凿子，一块蓝岩石上放着的宽矮的开槽沟铁锤，加工大理石用的富有弹性的长形铁锤，竖放在圆木上准备运走的双穴墓钙华墓碑，磨光，无光泽，黄色，油腻，乳酪色，多细孔干结在木架上的润滑剂。

科涅夫举起一根一掌宽、三步长的木条，“这是凿石锤，这是匙形凿，这是开槽凿。”移至眼前审视其棱角：“这是直尺。我也用它来揍不听话的徒工。”

“您也雇徒工？”我这样问除了礼貌外还别有用意。

“每件活我可以雇五个，但一个也雇不到。现在这些笨蛋都去学黑市买卖了！”科涅夫发起牢骚来了，石匠和我一样反对那些见不得人的交易，因为这些勾当阻碍了一些很有希望的年轻人去学习正当的职业。科涅夫领我看由粗到细各种各样的金刚砂石和它们对一块索尔恩霍夫石板的磨光效果，这时候一个小小的念头从我的脑海里转起。他把浮石指给我看，用巧克力色的紫胶石和硅藻土可以把黯淡的石板磨出光泽来，而我也一直在转着我那小小的念头，它已经逐渐明了。科涅夫给我看文字模型，给我讲阴文和阳文，讲字体的镀金。他说，这用去很多金子，用一枚真正的古塔勒就可以给马和骑士都镀上金。我当即就想到但泽干草市场上面对沙沟方向的骑马的威廉皇帝像，也许波兰的文物保护者会决定为它镀金。我一直没有放弃我的小小的念头，尽管想到了贴金箔的马和骑士它变得越来越有价值了。我琢磨着，终于使它成型，而此时，科涅夫正在向我讲解雕刻用的三条腿的点刻机，各种各样左右歪斜的基督石膏模型钉在石字架上被科涅夫敲打着。我的念头转出来了：“您想雇一名徒工吗？”实际上我说出口的是：“您正在为自己找一名徒工吗？或者我弄错了？”科涅夫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擦了擦贴在后颈疖子上的医用胶布。“我是说，您有可能招收我当徒工吗？”这个问题问得太糟，我又立即更正说，“虽然我的两条腿差点儿劲，干起活来可不含糊的！您不要低估我的体力，尊敬的科涅夫先生！”我被自己的决断力所鼓舞，如今可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了。我撩起左胳膊的袖子，让科涅夫摸摸我尽管小但像牛肉一般坚韧的肌肉。他不愿摸，我就从壳灰岩上拿起一把粗凿锤，让这六角形的金属在网球一般大的小丘上跳跃。后来他把我的显示力量的表演打断了。他开动了砂磨机，让一块金刚砂片在两穴墓碑的钙华基座上沙沙作响地旋转。末了，他目不转睛地看着机器，声音压过磨研噪声吼道：“小伙子睡一夜再考虑考虑！在这里干活可不是舔蜂蜜。可以收你当个实习生，你下定决心后再来。”

听从了石匠的劝告，我对这个小小念头考虑了一周之久。白天，我拿小库尔特的打火石与比特路的墓碑相比较，听玛丽亚责备我：“你呀，奥斯卡，现在全靠我们养活。做点事吧，茶叶，可可，奶粉，都可以嘛！”我没有着手去干，任凭古丝特由于我反对黑市而夸奖我，听她把不在家的克斯特当成模范向我夸奖。但是我的儿子库尔特。一边虚构着数字纵队，写到纸上，一边假装不理睬我，就像我过去多少年里故意不理睬马策拉特一样这让我忍受不了。

我们坐着吃午饭有炒鸡蛋和熏板肉。玛丽亚说：“你瞧，奥斯卡，就因为我们没有把两手揣在怀里才能吃到这些好东西。”小库尔特叹起气来，打火石已经降到每块十八了。古丝特闷头吃，吃了不少。我也学她的样，品尝着味道，也许是由于鸡蛋粉的原因，我感觉到不愉快，又因为在咬到了板肉里的软骨，我突然地、连耳朵根都感觉到需要幸福。尽管我持有许多怀疑，尽管我有许多更充分的相反的理由，我仍旧要求得到幸福，无忧无虑的幸福。当其余几个还坐着，吃着，满足于这鸡蛋粉的时候，我

站起身来，走向柜子，好像幸福唾手可得。我在自己的格层里寻找着，教科书底下在照相簿后面，我找到了法因戈德先生给的两小袋消毒剂，从一个袋子里掏出我可怜的妈妈的经过彻底消毒的红宝石项饰。这是扬·布朗斯基多年以前在一个散发着雪味的冬夜里自一个橱窗里取出来的，橱窗上的圆窟窿是奥斯卡事先唱破的。当时奥斯卡还非常幸福，他有唱碎玻璃的能力。拿着这件首饰我离开了寓所，从首饰中看到了我迈步的起点。于是我上路了，乘车到火车站。我暗自想道，如果事情办成了，就会如何如何，随后，长久地讨价还价，我却始终没有忘记，如果……不过那个独臂人和那个别人叫他作陪审推事的萨克森人，他们只知道这件首饰的价值，却没有预感到他们会使我更加迫切地需要幸福。他们收下了妈妈的项饰，给了我一个真皮的公事包以及十五条吉祥牌的美军香烟。

下午，我又回到比尔克的家里后把包打开：每包二十支装的吉祥牌，十五条一份财产，使其他几个惊讶不已。我把带包装的金黄色烟草山推到她们面前，说，这是给你们的，但是今后得让我得到安宁，这些香烟足以换来安宁了，除此以外，从今天开始，每天准备满满一盒午饭给我，从今以后，我每天把它放在公事包里带到我工作的地方去。愿你们的人造蜂蜜和打火石生意也能做得生意兴隆，我既不发火也不抱怨地说，我将干的是另一行，今后，我的幸福将凿在墓碑上这是行话。

我被科涅夫雇佣为实习生，月薪一百帝国马克。这钱和不给差不多，而我干的活也只能给这点钱。一个星期以后，事实表明，石匠的粗活我无法胜任。一块刚劈开的比利时花岗岩壁，将用作四穴墓墓碑，科涅夫把粗凿交给我。我刚干了一个小时，手已经握不住凿子，握锤子的手就失去了感觉。我只能把粗凿的活儿留给科涅夫去干，来干证明我的灵巧的活儿来：细凿，凿成锯齿形，用四根撬杆调整水平，用两把直尺目测平面，在白云右边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框上连续开凿沟槽。我坐在一个构成“T”字形的木架上，不管要改变我这个左撇子习惯的科涅夫的指责，仍然左手挥动梨状木锤、铁锤、凿石锤，右手握凿，劈劈啪啪、叮叮当当地不停地敲，用六十四只凿石锤的牙齿同时咬石头，一块块地把石头啃掉：幸福，它不是我的鼓，幸福，只是一种替代物，或许只有通过替代得到的幸福，幸福总是幸福的替代物，幸福成堆——大理石幸福，砂石幸福，美因河砂石，易北河砂石，你的砂石，我们的砂石，基尔希海姆幸福，格伦茨海姆幸福。云状易碎的幸福：雪花石膏。硬的幸福：蓝岸石。铬钢幸福地凿进辉绿石。五彩的幸福来自拉恩河。柔和的幸福：凝灰岩。多孔的幸福：玄武岩。白云石：绿色的幸福。冷的幸福出自埃弗尔山。好像火山爆发的幸福，石粉飞扬，滚落成堆，在我的齿间沙沙作响。

刻字时更显现出我的才干。我甚至超过了科涅夫，承担起雕刻中花纹装饰的部分：叶板、儿童墓碑的断枝玫瑰、棕榈枝、PX 或 INRI 之类基督的象征、凹弧饰、圆凸线脚、蛋形线脚、削角还有双削角。我给不同价格的墓碑刻上各种凹凸花饰，祝它们吉祥如意。我在一块磨光的但一再被我呼吸时呵出的气弄模糊的辉绿石壁上花了八个小时刻上了如下铭文：我亲爱的丈夫长眠于此——另起一行——我们慈祥的父亲、兄长与叔父——另行——约瑟夫·埃塞——另行——生于一八八五年四月三日，卒于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二日——另行——死乃生之门。最后我通读一篇铭文，此时，我换取到的是快乐与幸福。为此我一再感激终年六十一岁的约瑟夫·埃塞以及我的刻字凿前的绿色云纹辉绿石，埃塞先生墓碑铭文中的五个“O”因此我刻得特别细心；就这样，我特别喜爱的字母“O”总是无穷尽地、有规律地出现，带给我幸福，而我则把它们刻得有点太大了。

从五月末我开始当石匠见习生的。十一月初，科涅夫长了两个疖，而我们又不得不把赫尔曼·韦布克内希特和埃尔泽·韦布克

内希特，娘家姓弗赖塔克的钙华墓碑移到南公墓去。石匠过去都是尤利乌斯·韦贝小商号的一个除耳聋外都挺好的辅助工帮他搬墓碑。作为抵偿，科涅夫在雇八个人的韦贝尔还缺少人手时便去帮忙。我多次表示想帮他去干公墓上的活计，却遭到多次拒绝。幸运的是，十月初韦贝尔那儿的生意兴隆，在霜冻之前他手下一个人也不能少。科涅夫只能指望我了。

我们把钙华碑抬到三轮摩托后面的硬木滑杆上，推上拖斗，又把基座塞在一旁，棱角都用空纸袋裹上，再装上工具、砾石、水泥、沙、卸车用的木箱和木杠。当我把挡板关上，科涅夫已经坐在驾驶座上发动摩托了。他从侧面窗子伸出头和长疔的脖子，嚷道：“来吧，带上你的饭盒上车吧小伙子！”

三轮摩托慢慢地绕着市立医院前行。医院大门口有很多白衣女护士。其中有我认识的一位叫格特露德姆姆的护士。我招手，她也招手。她真像幸福，我想着，我真该邀请她一次，虽然我现在看不见她了，因为我们正朝莱茵河驶去。车子朝卡佩斯哈姆驶去，该邀请她到什么地方去。请她去看电影，或者到剧院去，看格林德根斯演出。它在招手了，不是剧院，黄色砖房，浓烟升起，在火葬场叶落及半的树梢上面，格特露德姆姆，换个环境不好吗？另一些墓碑店，另一个公墓，在大门口迎接格特露德姆姆：博伊茨和克拉尼希店铺，彪姆墓碑美术店，波特基塞天然石铺，戈克尔恩公墓的园艺店。进公墓不是那么简单的，有人在大门口检查，戴公墓帽的管理人员说：双穴墓钙华碑，在八区七十九号，名叫赫尔曼·韦布克内希特，手举到公墓帽前敬礼。我们交出饭盒让他在火葬场加热，舒格尔·莱奥站在停尸间前。

我问科涅夫说：“这是那个叫舒格尔·莱奥的戴白手套的人吗？”

科涅夫伸手摸着脖子后面的疔：“他不是舒格尔·莱奥而是萨贝尔·威廉，他住在本地。”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这样的答复能令我满意吗？我以前在但泽，如今在杜塞尔多夫，可我却一直叫奥斯卡。于是我说：“以前我们那边的公墓上，有过一个人，和此人一模一样，名叫舒格尔·莱奥，是神甫班的学生。最初，他就叫莱奥。”

科涅夫右手驾驶三轮摩托车左手捂着疖子在火葬场前面转弯：“我丝毫不怀疑你说的。这种模样的人有非常多，起初在神甫班上，如今生活在公墓上，换了别的名。住在这里的是萨贝尔·威廉！”

从萨贝尔·威廉身边驶过时他挥动白手套跟我们打招呼，在这座南公墓，我感觉像回到了家乡。

十月，世界正在脱落头发和牙齿，黄叶摇落，上下纷飞。公墓林阴道，寂静，麻雀，散步的人，朝离得特别远的八区方向驶去的三轮摩托声，一路上，瑞典黑花岗岩上的太阳，颇有象征意义的方尖碑、裂开的柱子，大概是战争留下的创伤，紫杉或者类似紫杉的树木背后颜色发绿的天使。老太太带着洒水壶和孙儿孙女，女人用大理石的手遮住眼睛，眼睛却被自身的大理石弄花了。基督穿着石头凉鞋祝福榆树。四区的另一个基督在祝福桦树。行驶在四区和五区之间的林阴道上，我的想象有多美啊！譬如说，大海。大海将各种东西抛到海滩上来，其中有一具尸体。小提琴声从索波特滨海小道传来，还有刚开始放的焰火，扭捏着，这是为战争里双目失明的人举办的。我，奥斯卡和三岁孩子身材，弯腰去看海滩上的那具尸体，希望是玛丽亚，或许是格特露德姆姆，我应该请她一回的。但这是苍白的卢齐，美丽的卢齐，正向高潮推进的焰火并告诉了我。向我证实了并告诉了我。身穿贝希特斯加登毛线茄克的在转坏念头时就穿这件衣服。我给她脱下了湿透的羊毛衫。她里面还穿着一件，同样湿了。又一件贝希特斯加登茄克衫的图案展现在我眼前。最后，焰火已经放完，只余下小提琴声。在一件又一件再一件的羊毛茄克里面，我

找到用德意志少女同盟的运动衫裹着的卢齐的心，一块冰凉的写着奥斯卡在此安息——奥斯卡在此安息——奥斯卡在此安息……的小墓碑。

科涅夫把我的由海水漂来被焰火照明的美的想象打断了。对我说道：“别睡觉，小伙子！”我们向左拐弯，新辟的八区，没有树林，墓碑寥寥无几，饥饿地、扁平地躺在我们面前。尚未修饰的坟墓，千篇一律，却把新近举行的五处葬礼衬托得特别鲜明：棕色的花圈，被雨水淋湿、融化了颜色的饰带，堆成了一座座现代化小山。我们非常快找到了第四排头上的第七十九号，另一边就是七区。七区已种上了一些长势迅速的幼树，比较有规律地覆盖着一米石块，多数是西里西亚大理石。我们把车开到七十九号墓的后头，卸下工具、砾石、沙子、水泥、基座和有点油腻的亮堂堂的钙华碑。当我们用木杠把这块大家伙从拖斗上卸到木箱上时，三轮摩托车猛地一跳。坟头临时插着一个木十字架，横木上写有赫·韦布克内希特和埃·韦布克内希特。科涅夫把它拔出来，让我递挖掘机给他，他就开始动手挖两个用来灌水泥墩的洞，公墓管理处规定洞深要六十一厘米深，我到七区去提水，和水泥。我和好时，他说已挖了五十一厘米。吩咐我可以往两个洞里灌水泥了。科涅夫喘着粗气，在银华碑上坐着，伸手摸脖子后面的疖子，说：“我感觉到它们快穿头出脓了。”我在夯水泥，几乎不想别的。一支新教送葬队伍从七区爬行而来，经八区去九区。他们隔开三排墓从我们前面经过，科涅夫从钙华碑上滑下来，按照公墓规定我们向牧师及死者家属脱帽默哀。一个矮小、黑服、七歪八斜的女人孤孤单单地走在棺材后面。跟在她后面的人，都很高大结实。

“别拖拖拉拉的，傻瓜！”科涅夫在我旁边发起牢骚来。“我感觉到，它们要穿头了在我们把墓碑竖起来以前。”

这时，已经到达九区的送葬队伍聚集在一起，响起了牧师上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下起伏的声音。水泥早已凝结，如果现在我们能将基座架到墩上去，那该多好。但是，科涅夫却肚子朝下趴在钙华碑上，在额头与石头之间塞上帽子，把上装和衬衫衣领往下拽，露出后颈。此时，九区死者的生平也传到了我们的耳朵里。我不仅要爬上墓碑，还得骑上科涅夫的背，弄清这件突然发生的不愉快的事情：两个并排长着的疖子。布道正在缓慢地接近尾声有个人来晚了，带着一个太大的花圈匆匆赶了过去。我把膏药撕去，用一片山毛榉叶擦掉鱼石脂磺酸铵膏，看见两个差不多一样大小，由焦油褐逐渐变黄的疖子。“让我们祈祷吧！”话语从九区随风飘来。我当这是信号，头一歪，用两只大拇指垫上山毛榉叶又压又挤。“天父……”科涅夫小声说：“别压，挤吧！”我挤。“……你的名。”科涅夫也同时祈祷：“……来吧，你的国度。”因为只挤不管用我又压。“将实现，如在……也在……”真是奇迹疖子没破裂。又一遍：“今天赐予我们。”科涅夫也跟着念经文：“罪过，不要受诱惑。”脓比我想象的还多。“王国、力量和荣耀。”我挤出五颜六色的脏东西。“永恒。阿门。”我再挤时，科涅夫念：“阿门。”我又压，他又念：“阿门。”九区那边已开始向家属致哀，科涅夫还在念：“阿门。”平趴在钙华碑上的他得到了解救，嘟哝着：“阿门。”接着问，“还有水泥安基座吗？”“有”。他又说：“阿门。”

我把最后几铲水泥撒在两个水泥墩之间作为连结。这时，科涅夫挣扎着从磨光的刻字墓碑上爬了起来，让我给他看秋天的杂色山毛榉叶和他那两个疖子的杂色内容。我们把帽子扶正，手搭在石上，立起赫尔曼·韦克布内希特和娘家姓弗赖塔克的埃尔泽·韦布克内希特的墓碑。此时，参加九区葬礼的人们也都散去了。

北方幸运女神

那时，买得起墓碑的人几乎没有几个，只有在地球表层留下了有价值物件的人才能办到。也不一定非得是一颗钻石或者一串八十公分长的珍珠项链不可。一块足尺足码的格伦茨海姆壳灰岩一米墓碑用二百五十公斤土豆可以换到。两身西装和背心的衣料能换到一块双穴墓三基座比利时花岗岩墓碑。衣料是一个裁缝的寡妻的，因为她还雇着一名帮工所以她提议给我们加工衣料，来换取一个白云石墓框。

就这样，下班后科涅夫和我就乘坐开往施托库姆方向的十路车，去寡妇伦纳特家，让她们给我们两个量尺寸。我当时穿的是一身经玛丽亚改制的坦克猎兵服，虽说上衣的钮扣都换了，但因为特殊的体形无法将扣子系上。

安东是寡妇纳特的帮工，他按尺寸给我用深灰色细条纹料子做了一身西装：浅灰色衬里单排扣，两肩垫得非常合适，并无虚假感；驼背不加掩饰，反而得当地予以突出；卷边裤子，裤管不太肥。衣装笔挺的贝布拉师傅一直还是我的榜样。因此，裤子上没有系皮带用的襻而只有系吊带的扣子。背心用深玫瑰色的衬里，前面暗淡，后片闪亮。整套服装试穿五次才算做成。

在裁缝帮工缝制科涅夫的双排扣和我的单排扣西装的时候，来了一个皮鞋掮客，要为他一九四三年被炸伤致死的妻子立一块一米碑。他想给我们配给证，但我们要实物。连同安装在内一块西里西亚大理石碑加人造石边框，科涅夫得到了一双深棕色低帮皮鞋及一双皮底拖鞋。我分到的是一双老式的但皮子非常软的黑色系带靴。我这双无力的脚从三十五号后有3个坚固而漂亮的底座。

我让玛丽亚去买衬衫。我把一捆帝国马克往称人造蜂蜜的磅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秤上一放，说：“给我买两件白衬衫，要一件细条纹的，再买一条浅灰色，一条栗色的领带，行吗？剩下的钱给小库尔特或给你买点什么，亲爱的玛丽亚，你总是为别人着想，从不为自己着想。”

有一回，突然想充当施主。我送给古丝特一把真角质柄雨伞和一副九成新的阿尔滕堡施卡特牌。她喜欢用牌来算卦，问问库斯特什么时候回家，却又不愿去向邻居借一副牌来。

玛丽亚马上去买了我要的东西。剩下不少钱，她给自己买了一件雨衣，给小库尔特买了一个难看的仿皮学生书包，但暂时了却了他的心愿。在给我的衬衫和领带上玛丽亚还放了三双灰色短统袜，是我忘了买的。

科涅夫和我去取衣服。我们站在镜子前面，挺难堪的，但都被对方的模样镇住了。科涅夫溜着肩膀，双臂向前下垂，试图伸直他的格格响的膝盖。不敢转动脖子，后颈上疖子结了疤，把皮肤弄破了。穿上新服装，我活像一个魔鬼知识分子，特别是当我把两臂环抱在胸前的时候，因为这样一来，我上身的宽度增加了。我还以瘦弱的右腿为支撑，懒懒地伸出左腿构成一个三角，冲着科涅夫微笑，他的惊讶让我得意。我走近镜子，离被我的左右颠倒的映像所占据的镜面近到可以去吻它一下的地步，但我仅对它呵了口气，随口说道：“哈罗，奥斯卡！万事俱备，你只欠一枚领带夹了。”

一周后的星期日下午，我去市立医院去看望女护士们。我焕然一新，沾沾自喜，哪个角度都是顶呱呱的。现在，我的领带上已经有一枚镶珍珠的银饰针了。

这些好姑娘们看到我坐在她们的科室里，连话也说不出来了。时值一九四七年夏末。我按照证明为有效的方式，把双臂环绕在胸前，玩弄着我的皮手套。我已经当了一年多的石匠见习生和凹弧饰雕刻师傅。我翘起二郎腿，但注意不弄皱裤线。好心的

古丝特替我保管这套标准服，好像这是为回乡并将改变一切的克斯特缝制的。黑尔姆特鲁德姆姆摸了摸衣料。一九四七年春，我们庆祝小库尔特七岁生日，我给小库尔特买了件鼠灰色粗呢大衣。按“请用！”烹调法自己调制鸡蛋利口酒，自制干松蛋糕，我请女护士们吃夹心糖，格特露德姆姆也来了，一块辉绿石碑换来了夹心糖，外加二十磅红糖。据我观察，小库尔特，特别愿意上学。他的女教师，年轻而有魅力，上帝作证，她绝不是施波伦豪威尔小姐那种人。她夸奖小库尔特聪明，只是有点儿一本正经。竟然有人请女护士们吃糖，她们是那样快活。当科室里只剩下我和格特露德两人的短暂时间里，我探听她星期天是不是休息。“譬如我今天五点钟就下班了。因为没什么事情，我不会进城去。”女护士格特露德无可奈何地说。

可以去试试，我说，起先她不想去，只想好好睡一觉。我就直截了当地说我邀请她，但她还是犹豫不决，我便神秘地用这样的话作为结束：“青春只有一回，得有点活力才行，格特露德姆姆！吃点心的马克我肯定不缺。”伴随着这句台词，按传统风格我轻敲胸袋前插着的手绢，又给她一块夹心糖。这个强健的威斯特伐利亚姑娘说：“既然您这么说，那好吧，我们就六点在科奈利乌斯广场见面。”她的这一番话反而把我吓了一跳。

本来我就没打算和她在这儿见面。于是我六点钟在科奈利乌斯广场当时被战争破坏还不能报时的标准钟下等她。她来了，我看了看几周前弄到手的廉价的怀表：准时。如果她没有看见我的话，我会失望地悄悄溜走。我差点儿认不出她了，因为格特露德姆姆并不是以格特露德姆姆的形象出现。她没有穿白衣，没有别红十字胸针，而是以哈姆的或者多特蒙德的或者哈姆与多特蒙德之间随便哪个地方的随便哪一个身穿式样寒酸的服装、名叫格特露德·维尔姆斯的小姐的身份前来赴约。

她告诉我，她差点儿来晚了，因为护士长存心刁难，差五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钟下班时还派她干一件什么事情，我的不快她根本没察觉到。

“好吧，格特露德小姐，我提些建议可以吗？我们可以先去甜食店，在那里坐坐无拘无束，然后，随您喜欢，可以去看电影，可惜搞不到去剧院的戏票了，要么去跳舞，如何？”

“好，我们去跳舞吧！”她欢欣鼓舞，等她察觉到衣装笔挺的我不能当她的舞伴时，已经晚了，连脸上的惊恐神色都没来得及掩饰。

我怀着幸灾乐祸的心情决定按她赞同的计划去办。谁叫她穿那种我如此珍爱的护士服来的呢？缺乏想象力的她很快就不再害怕，和我一起吃着，我吃一块蛋糕，她吃三块，也许她从蛋糕里咬出了水泥碴儿。我交了现钱和点心供应证，听科涅夫说，伯爵山下有一个舞厅。她跟着我登上了开往格雷斯海姆方向的电车。

电车在上坡路前停下了，我们只好缓慢地步行最后这一段路。九月的一个晚上，像有的书里描写的那样。格特露德的免证供应的木头底凉鞋像溪边的水磨格格作响。这使我快活。下山来的人们扭过头来看我们令格特露德小姐十分尴尬。我习以为常，一点也不在意。毕竟我口袋里有点心供应证才使她在居斯滕甜食店里吃到了三块有水泥碴儿的蛋糕。

名叫韦迪希的舞厅还有个别名是狮堡。在售票处就听到吃吃的笑声。我们入场，很多脑袋转了过来。穿普通衣服的格特露德姆姆心慌意乱，差点被一把折叠椅绊了个跟头，幸亏侍者和我把她扶住。侍者请我们在离舞池很近的一张桌子坐下。我要了两份冰镇饮料，又用只有侍者一人能听到的声音说：“请加烧酒。”

狮堡过去可能是一所骑术学校的场地它的主要场地是大厅，厅上方有多处损坏的天花板上，悬挂着最近举行的狂欢节剩下的纸蛇和彩带。周围有一圈半暗的彩灯，把光线反射到姑娘们的塔夫绸上装上，反射到年轻的、部分是时髦的黑市商贩平整向后梳

的头发上，看来他们都早已相识。

侍者把加了烧酒的冰镇饮料端上来后，我又从他手里弄来十支美军香烟，递给格特露德一支，侍者一支，把他香烟夹在耳朵上。我给我的女士点了烟，就掏出奥斯卡的琥珀烟嘴，抽了半支骆驼牌香烟。我们旁边几张桌子的人屏息而坐。格特露德姆姆这才敢把头抬起来。我把足有半支长的骆驼牌烟蒂摁灭扔到烟灰缸里，格特露德姆姆却很实际地拣起烟蒂，装到她防水布小手提包的侧袋里。

“留给我多特蒙德的未婚夫，”她说，“他像发疯似地抽烟。”

我很庆幸她的未婚夫不是我，这时，奏起音乐来了。

一个五人乐队正在演奏《别把我围住》。穿皱胶底鞋的男人们匆匆在舞池上走了个对角线，钓姑娘们上钩他们互不相撞。姑娘们请女友们把她们的手提包保管好。

有几对像上过跳舞学校似的跳得特别熟练。嘴里嚼着口香糖。几个小伙子停了好几小节，想找出可以替代莱茵话“败类”的美国俚语。他们让舞伴把手举起来，那些姑娘像是在原地带球，好不耐烦。真正的黑市商贩不懂得什么叫下班。在这些舞伴们继续跳以前，又交换了一些小物件。

我们没有跳这一场舞，下一场狐步舞也没有跳。我偶或看看男人们的腿。当乐队演奏《罗莎蒙德》时，我便请不知所措的格特露德姆姆一起跳。

格特露德姆姆整整高出我两头，我也知道我们两个搭档一定稀奇古怪，而且还想加强这种古怪特色。回忆着扬·布朗斯基的舞艺，我壮起胆子充当黑市商，搂住像顺从上帝一样任我摆布的格特露德姆姆，左手心朝外搭在她的臀部，触摸着含百分之三十的羊毛的裤料，脸颊贴近她的上装，将这位强健的小姐整个地往后推，滑步到她的双脚之间，摇晃着朝左外侧探出的我们两个僵直的前臂，从舞池的一角跳到另一角要人让道。跳得比我想像的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要好得多。我还跳花步，左手时左时右托住她的臀部令她保持平衡，面颊贴近她的上装，以她为轴心旋转，一点儿不放弃那种黑市商的标准姿势，这种姿势给人的印象是：那位女士眼看要往后摔倒了，那位先生也快从她头顶上摔出去了，但是，他们都并没有摔倒，他们是出色的黑市商舞客。我们随即有了观众。我听到了惊呼声：“他是吉米！我不是对你说过了吗，他是吉米。哈罗，吉米！来吧，吉米！一起来吧，吉米！”

我看不到格特露德姆姆的脸只好自得其乐，希望她把喝彩声当成青年人的捧场，镇定而高傲地把它接受。作为护士，她可以忍受病人们通常都很笨拙的马屁功夫，那么对于这种喝彩，她自然也能泰然处之。

掌声经久不息，一直到我们回到座位上时还在响。五人乐队响亮吹奏致敬，打击乐演奏员更是卖力，乐队第二次、第三次响亮吹奏致敬。“吉米！”人们喊道，“看到他们两个了吗？”这时，格特露德姆姆站起身来，结结巴巴地说要去洗手间，她拿起装着多半支烟的小手提包，涨红了脸，东磕西碰，走向售票处旁边的洗手间的方向。

她走前一口气喝光了冰镇饮料，由此推断出，干杯意味着告别。她一去不返。我被格特露德姆姆给甩了。奥斯卡呢？琥珀烟嘴里插上美军香烟，在领班过来悄悄收走护士喝了个底朝天的杯子时，又向他要了一杯不加冰镇饮料的烧酒。我不惜一切代价地微笑。虽说痛苦，但他在微笑，双臂交叉，翘起二郎腿，晃动着小巧玲珑的三十五号黑色系带靴，独自享受被抛弃者的优越感。

那些常来狮堡的年轻人都非常好，跳着舞经过时，都朝我眨眨眼睛。“哈罗！”小伙子们喊道：“别在乎！”姑娘们喊道。我感激这些真正人道的代表，晃了晃烟嘴宽厚地莞尔一笑。这时，打击乐演奏员一通急擂，敲起小鼓、定音鼓、钹和三角铁，它宣告，又一场舞开始了，邀请女伴吧！这段独奏让我回想起了演讲

台下美好的往昔。

小乐队激动地为我演奏《老虎吉米》。尽管说狮堡舞厅里谁也不知道演讲台下我那段鼓手生涯。不管怎么说，一头散沫花红色鬃发、一个活泼好动的年轻姑娘，选中我当她的舞伴，口嚼口香糖，用吸烟过多而沙哑的声音对我耳语道：“老虎吉米！”我们施魔法显现了热带丛林和林中险情，快速地跳着吉米舞，老虎来了，张牙舞爪，估计差不多持续了十分钟。小乐队响亮吹奏致敬，鼓掌，再次响亮吹奏，鼓掌因为我有服装讲究的驼背，腿脚利索更不用提，扮演老虎吉米形象不凡。我邀请我的刚才邀请我的女伴到我的桌子就座，她的名字叫黑尔玛请我允许她把她的女友汉内洛蕾也带来。汉内洛蕾少言寡语，坐得住，喝得多。黑尔玛则抽烟抽得多，我只好再向领班买美军烟。我跳了《黑巴贝里巴》、《心境》和《擦皮鞋的男孩》，间歇时聊天，款待两位很难满意的小姐。成功的夜晚她们对我说，她们两个在阿道夫伯爵广场的长途电话局工作，长途电话局还有更多的姑娘每星期六和星期日来韦迪希。除非遇上周末值班，要不然她们每个周末都在这儿。因为黑尔玛和汉内洛蕾是那么可爱，因为可以同长途电话局的姑娘们并挨得很近，融洽地相处我也答应以后常来此地。我在这里玩的文字游戏，她们立刻就明白了。

我有很长的时间没去医院。后来，我再去时，格特露德姆姆已经被调到妇科去了。我再也没和她见过面，或者只匆匆地见一面，远远地打个招呼。现在我是狮堡受欢迎的常客。姑娘们都来骗我款待她们，但骗得不很过分。通过她们，我又认识了一些英国占领军人员，学到了上百个英语单词，我们变成了朋友，甚至和狮堡乐队的几个队员结下了以“你”相称的兄弟友情，不过，一涉及到击鼓，我就克制自己，我满足于在科涅夫石匠铺里刻字的小小幸福，从不去摆弄那些打击乐器。

一九四七年府到第二年初的那个冬天，我仍和长途电话局的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姑娘们保持联系，也从沉默寡言又坐得住的汉内洛蕾那里得到了一些不算太贵的温暖。我们紧挨着，但又保持距离，只做些不受义务约束的小动作。

石匠要在冬天进行内部整顿。工具要送去重铸。有的旧石块刻字的一面需要修饰，缺了角的需磨成斜边或刻成凹弧形。在秋天的销售季节里，存放场上的墓碑石越来越少，科涅夫和我又重新放满，还用壳灰岩充填料夯成若干人造石。下雪时，我铲雪；不下雪时，我化开冻住的自来水管给砂磨机供水。在做简易的雕刻工作时，我尝试用点刻机，刻出表现天使脑袋、基督戴荆冠的脑袋和圣灵之鸽的浮雕来。

因为参加一九四八年的嘉年华会我瘦了很多。大概我看上去有点像是过着较高的精神生活的样子，因为有狮堡，一些姑娘叫我“博士”。二月末，刚过圣灰星期三，头一批从莱茵河左岸来的农民，到我们的墓碑存放场看货。科涅夫不在。他去做每年一次的风湿病治疗，在杜伊斯堡一座高炉前工作。十四天后他回来了，人烤干了，疖子也没了，而我已经以好价钱卖出了三块石碑，当中有一块是用于三穴墓的。科涅夫还廉价出售了两块基尔希海姆壳灰岩碑。到了三月中旬，我们开始搬运和立碑。一块西里西亚大理石运到了格雷芬布罗伊希；一块美因河砂石我把它刻上了天使的小脑袋，今天还竖立在施托姆勒公墓可以供人观赏。两块基尔希海姆一米碑立在瑙伊斯附近的一座乡村公墓中；刻有头戴荆棘冠的基督的辉绿石三穴墓碑，我们在三月底装车，因为超载，三轮摩托只能向卡佩斯哈姆方向缓缓驶去，经诺伊斯过了莱茵桥，经格雷芬布罗伊希到罗默尔基尔欣，然后向右拐上去贝格海姆·埃尔夫特的公路，过了赖特和下奥森姆，连碑带基座运到了靠村子那面坡的上丘上的上奥森姆公墓，一点灰都没碰掉。

这景象太美了！我们脚下是埃尔夫特兰的褐煤矿区。新建的、咝咝作响的、总想爆炸的北方幸运女神发电厂。幸福女神工

厂八座烟囱朝天喷烟。矸石山中间的山脉上方有钢丝绳和自动倾卸货车。每隔三分钟就有一辆装满焦煤的电动车或者空车驶过。从发电厂来，到发电厂去，和巨人的玩具差不多。公墓左角凌空而过的是三根为一路的几路高压线，嗡嗡叫着，高度紧张地通往科隆。另外几路，贴着地平线，通向比利时跟荷兰。世界，枢纽——我们为弗利斯一家竖起了辉绿石碑——电产生了，如果……掘墓人和顶替了舒格尔·莱奥的助手，把工具带来了。我们站在我们下方隔三排墓的紧张地区，掘墓人动手迁葬——这里在为战争赔款输送高压电流——风把过早迁葬的典型气味刮了过来。不，没有恶心，这是三月，焦煤山中间的三月的耕地。掘墓人戴着一副线绳吊着的眼镜，与他的舒格尔·莱奥低声争吵，直到幸运女神的气笛吹出气来，一口长达一分钟的气。我们屏住呼吸，被迁葬的女人根本谈不上呼吸，只有高压坚持着。随后，气笛倒了，落到地上，淹死了——村里灰色石板瓦屋顶上中午的炊烟缭绕，教堂的钟声响起了：祈祷，劳动——工业和宗教手挽手。幸运女神那边在换班，我们吃着黄油面包加板肉，可是迁葬容不得休息，连绵不断的高压电流匆匆地向战胜国奔去，照亮荷兰，此地则总是停电——但被迁葬的女人见到了光明！

被迁葬的女人在科涅夫为打地基挖掘一米五深的洞时被抬到新鲜空气里来了。她躺在地下时间还不算长，去年秋天才处身黑暗之中，可她已经取得了进展，就像各处都在进行的改进那样，莱茵和鲁尔的拆卸工作同样取得了进展。冬天，我在狮堡浪费光阴，那个女人却在褐煤矿区封冻的地壳下认真地分解自己。现在，当我们夯水泥、安基座时，有人把她说服了，将她一块一块地迁葬。但是，现在有一个锌制的箱子来盛她，所以不会丢失什么——幸运女神分发煤块时，孩子们跟着装载过满的卡车奔跑，拣掉下来的煤块，因为红衣主教弗林斯从布道坛上对会众讲过：偷煤不是罪孽这是真的。被迁葬的女人不需要生火取暖。我不相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信，她会在谚语中所说的新鲜的三月的空气里受冻，尽管她的皮肤有渗漏和残缺，但还有残存的衣服和头发护着，头发总是电烫的耐久波浪型——这个词大概就是由此而来的吧。那口薄皮棺材也值得搬迁，连小木条也都得搬到另一个公墓去。那里是个大城市，没有农民和幸运女神的矿工，总要发生些事情，而且十九家电影院同时营业。那个女人将要返回家乡，她不是本地人，是当时疏散到此地来的，掘墓人告诉我们：“她是从科隆来的，现在她家里的人要把她迁葬到莱河对岸的米尔海姆去。”要不是汽笛又叫了一分钟，他还会讲更多的情况。利用汽笛响的时间，我走近迁葬的坟，在汽笛声中绕了几个弯，想当迁葬的目击者。我随手带了件东西，到了锌制箱子旁边才知道是把铲子。这把铲子是从前帝国义务劳动局的铲子。带着它目的不是去帮忙，而是因为它就在我手中，却又马上使用它，把落在旁边的东西铲起来。我用前帝国义务劳动局的铲子铲起来的东西，是那个疏散到此地的女人的中指和无名指，时至今日我还深信这两个指头不是自己掉下来的，多半是被没有感情的掘墓人创断的。从前或许始终还是她的手指，我觉得它们从前是美的、灵巧的，如同已经放进锌制箱子的这个女人的头，多亏了众所周知的一九四七年到一九四八年的那个冬天，它才能保持匀称，尽管是失效的但也可以谈得上美。另外，我觉得这个女人的头和手指比北方幸运女神发电厂的美更亲近、更有人性。也许是因为我像以前在剧院里享受古斯塔夫·格林德根斯那样享受工业区洋溢的激情。面对外貌的美，我始终感到失望，尽管这些都富于艺术性，而这个被疏散的女人只是过于自然罢了。我必须承认，高压电流类似歌德，传递给我一种世界感，可是，即使我把这个被疏散的女人想象成男人时也是一样，这女人的手指却把我的心动了，因为这样更合我的意。为了想出一个办法，也为了进行类比，需要把那个半截在墓里，半截在锌制箱子里的女人变成男人哈姆莱特，如果愿意说哈姆莱

特是个男人的话。而要把我变成约里克，约里克，第五幕，小丑，“我认识他，霍雷肖”，第一场，我，在这个世界的所有舞台上出现过——“唉，可怜的约里克！”——我把我的头脑借给了哈姆莱特，这样一来，某个叫格林德根斯或者劳伦斯·奥立佛先生的人在扮演哈姆莱特时就必须要考虑一下：“你那些令人捧腹的笑话，你那时的上窜下跳，又到哪里去了？”——我拿着那两根被刨断的手指，脚踏着下莱茵褐煤矿区坚实的土地，在矿工、农民及其家属的坟墓间站着，俯视上奥森姆村的石板瓦屋顶，将这座乡村公墓看成世界中心，将北方幸运女神发电厂看成同这个中心对立的、半神半人的令人饮佩的中心，埃尔夫特成了我的贝尔特海峡，耕地成了丹麦的耕地，所有腐烂了的一切都是在丹麦人的王国里腐烂了的——我，约里克，高压、电流在我的头顶上方咝响、歌唱，我并没有说是天使，但伸向地平线的高压线路里的强电流天使在歌唱，电路通往科隆、它的火车站和旁边的歌特式怪兽。在萝卜地上方的天空中强电流天使给天主教会顾问处供电，可是尘世却提供煤块以及哈姆莱特的而不是约里克的尸体。其他和该剧无关的人们，必须待在下面——“使他们到了如此地步……余下的便是沉默”——就像我们把辉绿石碑重重地压在弗利斯一家头上那样用墓碑压在他们身上。我，奥斯卡·马策拉特，奥斯卡·布朗斯基，约里克，对我来说，一个新时期开始了。可是在它过去之前我几乎没有意识到它，匆匆地观察着我的铁铲上的哈姆莱特王子的断指——“他太肥，呼吸局促”——我像第三幕第一场里的格林德根斯那样观察，提出生死存亡的问题，又把这种愚蠢的问题屏弃了，而将更具体的事情罗列在一起：我的儿子，我的儿子的打火石，我的外祖母的四条裙子，我的尘世的和天上的假想父亲们，照片上，我的可怜的妈妈的那不朽的美，赫伯特·特鲁钦斯基背上的伤疤迷宫，波兰邮局里面吮血的邮件篮，美国——跟驶向布勒森的九路有轨电车相比，美国算得了什么，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请那位给死亡消毒的法因戈德先生寻找隐蔽在马策拉特气管里的党徽。让时而还明朗的玛丽亚的香草香飘向呈现为疯狂的卢齐·伦万德的三角脸，因为我正在慢慢地拿一个主意，然而又觉得有必要在下定决心之前按照戏剧的需要提出一个问题，怀疑哈姆莱特，颂扬我，约里克，是个真正的市民我冲着科涅夫，更多地冲着高压电线杆说，因为他在叫我，因为我们必须把辉绿石碑与基座接合起来。也许是模仿格林德根斯，我最终被成为一个市民的愿望所打动，我隔着铁铲小声地对科涅夫说：“结婚还是不结婚呢，这是一个问题。”

自从北方幸运女神对面的公墓上那次转变发生以后，我一直没去韦迪希的狮堡舞厅，和长途电话局的姑娘们的一切联系都中断了。她们的优势就在于能迅速地、令人满意地接通电话，建立联系。五月，我买了两张电影票，和玛丽亚一起去看电影，而后我们去餐馆，吃得比较好，我与玛丽亚聊天。小库尔特断了打火石的来源，人造蜂蜜的生意也不行了她也显得心事重重。几个月来，如她所说，我一个弱者，承担着养活全家的责任。我安慰玛丽亚，说我情愿做这些，我喜爱承担重大的责任胜过其他一切，夸奖她的美貌，最后，我壮起胆子，向她求婚。

她希望考虑一段时间。我提出的约里克的问题几个星期没有得到答复，或是她避而不答，末了却由币制改革作出了回答。

玛丽亚叫我“亲爱的奥斯卡”，说话时摸着我的衣袖，跟我摆了一大堆理由，说对于这个世界来说，我确是太善良了，请我谅解，愿我们今后还能够继续保持纯正的友谊，祝愿我成为石匠后万事如意。她拒绝了同我结为夫妻，在我再次追问之下。

于是，约里克没有变成体面的市民，却成了一个哈姆莱特，一个傻瓜。

四九年圣母

来得太早的币制改革，使我变成了一个傻瓜，逼迫我也同样地去改革奥斯卡的货币。我没有什么办法，只能靠我的驼背糊口了。

原本我也会成为一个好市民的。如我们今天所见，币制改革给暂时兴旺发达的毕德迈耶尔带来了各种前提。本来这个时期也会促使我具备毕德迈耶尔的特征。我本该成为一个正派人，好丈夫，参加重新建设，而今也该有一片中等规模的石匠铺，给三十名帮工、小工和学徒工发放工资和面包，用备受欢迎的壳灰岩和钙华替所有新建的办公大楼和保险公司把建筑物的门面装饰得体面大方。玛丽亚拒绝了和我结婚。

现在，我想到要把自己驼背的这份财产转到艺术的名下。是靠墓碑维持生活的，如今因为币制改革而成了问题。我在他解雇我之前先辞了职。假如我不能闲居在古丝特·克斯特的厨房里，我就会流落街头。我定做的那身时髦的西服也变旧了，看上去有点邋遢。我虽说没有同玛丽亚争吵，但我对争吵感到恐惧，因此多半上午就从比尔克的寓所出来，先去阿道夫伯爵广场看天鹅，然后再去看宫廷花园的天鹅。我坐在公园里，渺小，沉思，但不玩世不恭。对面毗邻着劳动局和艺术学院。

一个人坐在公园的一张椅子上，直到自己变成木头，需要交往为止。老年男子，要看天气怎么样决定来不来公园。老年妇女，慢慢地又变成了爱闲聊的姑娘。那个季节，黑天鹅叫嚷着互相追逐，恋人，旁人爱看他们，一直看到像他们所预料的那样不得不分开。有些人把废纸扔到地上。废纸随风飞舞，最后一个由城市付工资的戴帽男子用尖棍将它戳走。

奥斯卡会坐功，用膝盖带动双腿均匀地抖动。我已经注意到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了一个戴眼镜、穿皮大衣系有前国防军腰带的胖姑娘和两个瘦小伙子，在她和我搭话之前。跟我攀谈显然是那两个小伙子出的主意。他们一身黑衣，是无政府主义者的打扮。他们的外表是那么危险，但是却羞于跟我这个从外表即可看出隐藏着伟大意义的驼背，直截了当地交谈。穿皮大衣的胖姑娘被他们说服了。她走过来，双腿像柱子那样粗，结结巴巴，直到我请她坐下。她坐了下来，她的眼镜片由于莱茵河飘来的水气、雾气而模糊不清。她一直在说，直到我请她先把眼镜擦一擦，再把她要讲的事情讲明白。她便挥手叫那两个瘦小伙子过来。没等我问他们就说自己是艺术家，绘画和雕塑艺术家，眼下正在寻找一个模特儿。末了，他们热情地对我说，他们相信我就是他们要找的那种模特儿。我用拇指和食指快速地做了几个动作，他们马上说出给艺术学院当模特儿的报酬：每小时一马克八十芬尼，裸体模特儿甚至两个德意志马克每小时。但那胖姑娘说，不考虑裸体模特儿。

为什么我会答应呢？是艺术引诱了我吗？是报酬引诱了我吗？艺术和报酬同时引诱了我，让我答应下来。于是我站起身来，让公园凳子和公园凳子上的生活永远成为过去，跟随着戴眼镜的昂首阔步的姑娘和那两个走路向前探身、如同背负着他们的天赋的小伙子，经过劳动局，踏上冰窖山街，走进部分遭破坏的艺术学院大楼。

长着黑煤眼睛、黑胡子的库亨教授，头戴一顶独特的黑色宽边软呢帽，他让我联想起少年时见到过的黑餐柜。他的学生甚至他本人都认为我这个坐在公园凳子上的男人，是个天才的模特。

他绕着我走了很长时间，黑煤眼睛滴溜转，鼻息声声，从鼻孔里喷出黑色尘垢，接着一面用黑指甲掐住一个无形的敌人，一面说：“艺术就是把自身消耗白纸上的黑炭笔！艺术就是控诉、表现、激情！”

我就是为这种消耗艺术服务的模特儿。库亨教授领我走进他

学生的画室，亲手将我抱上转盘，转动它，不是想把我转晕，而是为了从各个侧面说明我的身材比例。十六个画架向我的侧面移近。喷煤灰的教授还作了一篇简短的讲演。他要求表现，完全醉心于表现这个字眼儿。他说：表现了绝望的夜的黑色，他断言，我体现了控诉着、挑衅着、无时间性地表现着本世纪被疯狂破坏了的人的形象。教授还对着画架送去雷鸣般的吼声：“你们不要去画这个残废人，你们应当把它钉在十字架上宰割他，用炭笔把他钉在纸上！”

动手的信号已经发出，十六支炭笔开始沙沙响，叫喊着拼搏，消耗着自身，画我的表现——也就是我的驼背，把它画成黑色，黑上加黑。他们不可避免地夸张地高估了我的驼背的体积。他们换上一张更大的纸，却依然画不出我的驼背。

这时，库亨教授给他的学生们出了个好主意，让他们尽可能地先把我的头抹黑，而不要从我的驼背的轮廓下手。因为它的表现力太强，任何尺寸的纸都包容不下。

他们却把我深棕色光泽的秀发画成了一缕缕下垂的吉普塞人。十六个艺徒没一个留意到我的双蓝眼睛。按规定模特儿站立三刻钟之后可休息一刻钟，休息的时候，我看了看画在十六张纸上的我的头。他们忧虑憔悴的面容都在控诉社会。虽然这使我感到意外，可是，更让我吃惊的是，我的蓝眼睛暗淡无神。用极黑的炭笔道把本来闪亮、讨人喜欢的地方变得细小、碎裂而刺人。

想到艺术的自由，我暗自说道，虽说这些缪斯的年轻儿子们和同艺术纠缠的姑娘们看到了你心中的拉斯普庭，但他们是否发现了在你心中那位打瞌睡的歌德，想把他唤醒，宁可少些表现用适度的闪光的一笔把他画到纸上去呢？虽然库亨教授的炭笔画绝妙无比，他的学生们也都才华横溢，但都未能留赠后世一幅可以为人接受的奥斯卡肖像。时而鼻子朝着灰色的、天蓝色的、淡云飘浮的画室窗户，时而脸冲着总是堵塞的洗水池，有时则被转向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一面西班牙墙，用心表现，每小时给我带来一马克八十芬尼的挣钱不少，且很受尊重。

几个星期过去，学生们的抹黑表现稍有节制，不再把我驼背的体积夸张到无限大，他们偶尔把我从头到脚，从胸口外的上装钮扣到判断我那驼背的最远凸出点的上装衣料搬到了纸上。甚至有很多张纸上有背景。尽管经过了币制改革，仍然抹不掉年轻人被战争影响的痕迹。他们在我的背后建造了有控诉性黑色窗洞的废墟，把我表现成炸袭的树桩间绝望的、营养不良的难民，甚至把我关押起来，用黑炭勤快地在我背后铺展开一张夸张的铁丝网，让岗楼在背景上严厉地监视着我，我手里还得拿着个空饭碗，版画的魅力通过监牢的铁窗在我背后和头顶上传送过来。是啊，他们给我套上了囚犯服，而凡此种种全都是为了艺术表现的需要。

不过，人家把我抹成了黑发吉普赛人，让我用黑炭眼睛去看那种惨象，而我也知道，炭笔画不出真铁丝网，所以我也就安心当模特儿。然而，当雕塑家们，当裸体模特儿时，我也还是十分高兴的。大家都知道，雕塑家不用与特定时代有关的背景也可以。

这回是师傅，而不是学生来请我了。马鲁恩教授是库亨师傅的朋友。一天，在库亨昏黑的、挂满镶框黑炭痕迹的私人画室里，我正保持静止不动的姿态，好让大胡子库亨用他独特的线条把我画到纸上去时，马鲁恩教授来拜访他。马鲁恩五十多岁的年纪，矮小结实，他的那件时新的白外套常让人误以为他是位外科医生，幸好他的那顶巴斯克帽标明了他艺术家的身份。

我立刻看出，马鲁恩是个爱好古典形式的人，他怀着敌意凝视着我身体的各种比例。他一面讥讽他的朋友，说。他，库亨，一直在抹黑吉普赛模特儿，所以在艺术家的圈子里已经得了个“吉普赛库亨”的诨名，难道他还没有画腻吗？眼下他是否想画

出些怪胎来？是否想富有成果、销路良好的吉普赛时期之后，再用黑炭抹出一个更有成果、更有销路的侏儒时代来呢？

库亨教授化愤怒为力量，他画出了迄今为止最黑的一幅奥斯卡肖像。确也一团漆黑，只有我的颧骨、鼻子、额头和手上有少许光亮，至于我的手，库亨总让手指叉开得太大，还用风痛结节加强表现力，放在他的放荡无度的炭痕的中景。可是，这幅画上的我却有了一双蓝色的，明亮而非昏黑的眼睛。我认为这是雕塑家马鲁恩影响了他。他是个古典派，而非重表现的黑色愤怒者。我的眼睛以歌德式的明亮照亮了他的道路。本来马鲁恩只喜爱匀称，所以，能够诱使他选择我去当他的雕塑模特儿的，只有我的目光了。

马鲁恩的工作室明亮、多尘，放满了计划好的作品的模型骨架，却没有一件成品。它们的构思是那么完美，因此，铁丝、铁、弯好的铅管，虽未上黏土也已经预示出了将来成型后的和谐。

每天我给这位雕塑家当五小时的裸体模特儿，他每小时付我两马克。他用粉笔在转盘上标一个点，指出我的作为支撑腿的右腿应该放在哪里。从支撑腿的里踝骨朝上画一根直线恰好到达两根锁骨之间的颈窝。左腿可以自由活动。可这个名称是骗人的。虽说我让它略微弯曲，懒洋洋地伸到一侧，却不准移动它，这条游动腿也得扎根在转盘上的粉笔圈里。我给雕塑家马鲁恩当模特儿的几个星期当中，他从没给我的胳膊找到相应的、和腿一样不可移动的姿势。他让我作了各种尝试：左臂下垂，右臂在头上构成角度；两臂在驼背下面交叉着；两臂在胸前交叉；双手叉腰。马鲁恩先在我身上试验各种可能的姿势，随后再用铁骨架和可以弯曲的铅管四肢做试验。

经过一个月地艰辛寻找，他终于下定决心，或者用交叉双手托着后脑勺的姿势，或者把我塑成无臂躯干的黏土像。但这时，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他已因做骨架和改做骨架而疲惫不堪，因此，虽然他从黏土箱里抓起了一把黏土，摆好了甩的架势，却又啪的一声把未成形的、散发霉味的黏土仍回箱子里去，蹲到骨架前，凝视着我和我的骨架，手指不停地颤抖：这个骨架简直完美无瑕！

他佯称头痛，无可奈何地叹息却没有对我发火，就把它放弃了，将驼背骨架连同支撑腿和游动腿，抬起的铅管胳膊，交叉在铁后颈上的铁丝手指，放到堆放着过去完成的所有骨架的角落里。我的空空的驼背骨架当中本应承受粘土的叫做蝴蝶的几块木板，这时，全都轻轻地晃动着。它们不是在嘲讽，而是意识到了自己的无用。

接着，我们闲聊、喝茶，整整一个小时。这也算作当模特儿的时间，雕塑家照旧付钱给我。他谈到了过去，曾把以半公担计的黏土甩到骨架上，完成了很多塑像，大部分在战时被毁了。那时，他和年轻的米开朗基罗同样默默无闻。我向他讲述了我当石匠和刻字匠时的生活。我们扯了一点儿业务，他便带我到他的学生那儿去，让他们按照我制作骨架。

马鲁恩教授有十名学生，其中有六个是女孩。但只有两个是真正的漂亮、饶舌的姑娘。另外四个长得丑却才华横溢。我从不因当裸体模特儿而害羞。不错，我甚至欣赏那两个漂亮而又饶舌的雕塑姑娘的惊讶表情。她们第一次打量站在转盘上的我时，轻易地就被激怒了，并且断定，虽然我是个驼背，身材矮小，却也有个生殖器官，必要时，它还能和任何所谓正常的男性象征一比高低。

跟马鲁恩学生的相处情况与跟他本人的相处稍有不同。真是天才，两天后他们已经把骨架做好了。他们追求天才的快速，向匆匆忙忙、不按操作规程固定的铅管之间甩黏土。显然他们少挂了木蝴蝶在我的驼背里，使我全身满是裂纹。冒潮气的黏土几乎挂不住，十个新制成的奥斯卡全都歪斜着，脑袋搭拉到两脚之

间，铅管上的黏土啪地掉下来，驼背滑到了膝窝里。这时，我才懂得去敬重马鲁恩师傅了。他是一个杰出的骨架构筑者，根本没必要再甩上便宜的粘土，因为他做的骨架是那么完美。

当他们做的骨架解体时，有才华的那几个雕塑姑娘们甚至流下了泪水。那个漂亮又饶舌的雕塑姑娘见到肉象征性地从骨头上快速剥落时却哈哈大笑。可是，几个星期以后，这几个学生还是做好了几个像样的骨架在学期结束时展出，他们先塑成黏土的，后又塑成石膏的和仿大理石的，在这个过程中，我则获得机会一再在丑陋而有天赋的姑娘跟漂亮而饶舌的姑娘之间作新的对比。丑陋却有才华的童贞女们非常细心地仿制我的头、四肢和驼背，但是因为奇怪的羞怯心，忽略了我的阳具，或者按传统线条风格马虎了事。漂亮而饶舌的童贞女们却几乎不注意我的肢体的分段比例，但非常用心地精确仿制我的美观的生殖器官。我想也应该说一说那四个男学生在这方面的情况。他们把我抽象化，用扁平的、表面有条纹的小木条把我敲成四方形，本着干巴巴的男人的理解力，把我的阳具做成了架在两个同样大小的方木块上的一个长方形木块，像积木搭成的国王犯了生育狂的器官，竖在空间。

也许是因为我的蓝眼睛，也许是因为雕塑家们放在我周围的供热器，前来拜访惹人喜爱的雕塑姑娘的年轻画家们发现，我的蓝色眼睛或是被照射成蟹红色的皮肤有着图画的魅力，于是把我从一楼的雕塑和版画工作室诱拐到楼上，请我做他们的模特儿。

我的蓝眼睛给画家们留下了太深的印象。在他们眼里，我似乎全身发蓝，而他们用画笔把我从头到脚都画成蓝色。我健康的肉，波浪式的棕发，鲜嫩的血红色的嘴，全都闪烁着令人毛骨悚然的蓝光；在一片片蓝色的肉之间加上的令人作呕的黄色和垂死的绿加速了我肉体的腐烂。

学校地下室里举行了长达一周的狂欢节庆祝活动。在那里，我发现了乌拉。并当她是缪斯，领她去见画家，到了这时，我才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被他们画成别的颜色。

四旬斋前的星期一，我决定把妆画好挤到人群中去参加庆祝活动。

“待在家里吧，奥斯卡，会把你踩死的。”玛丽亚对站在镜子前的我说。可是，她又帮我化装，剪下布头。她的姐姐古丝特一面饶舌，一面把布头拼成了一件小丑服。开始，我觉得有一种委拉斯开兹风格的东西在眼前晃动。我也希望看到自己扮作统帅纳赛斯，或者扮作欧根亲王。最后我站在大镜子前面，镜子玻璃在战时裂开了一道斜纹，使我的映像看起来有点变形，但是仍旧照得清这件花里胡哨、肥肥大大、挂着铃铛的开襟衣服。我的儿子看了笑得前仰后合，笑得不停地咳嗽。这时，我不高兴地低声对自己说：现在你是小丑约里克了。可是，你到哪里愚弄国王呢？

我坐上了去离学院不远的拉亭门的有轨电车。注意到，打扮成牛仔和西班牙女郎的正要去办公室或商店的老百姓见了我并没有放声大笑，倒是大吃一惊。尽管电车里挤满了人，我却得到了一个座位。因为他们都和我保持一定距离。在学院门前，警察挥舞着他们货真价实的橡皮棍。艺术青年们的庆祝会名叫“缪斯池塘”，会场早已客满，但人群仍想攻占这幢楼房，于是和警察发生了冲突，部分是流血冲突，但不管怎么说，这是一场五彩缤纷的冲突。

我利用挂在左袖上的小铃铛把人群分开。一名警察，敏锐地一眼就看出了我的身材，低头向我敬礼，问我有什么事，随后挥动橡皮棍，把我带到了庆祝场所的地下室。那里正在煮鱼，还没有煮熟。现在没有人会相信，艺术家的庆祝会乃是艺术家自己庆祝节日的聚会。虽然艺术学院的大部分学生脸上涂了油彩，但他们却依然严肃、紧张，他们站在地道的微微晃动的酒吧间柜台后面，出售啤酒、香槟、维也纳小香肠和烧酒，挣点外块。真正在艺术家庆祝会上寻欢作乐的多半是市民。他们在一年一度的节日

里大手大脚地花钱，像艺术家一样狂饮欢庆。

我在楼梯上、角落里、桌子下吓唬正要在这不痛快的气氛中寻找些刺激的恋人。大约过了一小时之后，我同两个中国姑娘交上了朋友，她们的身上一定流着希腊人的血液，因为她们正在进行数百年前在勒斯波斯岛上歌颂过的一种爱。她们彼此偎依着，十指并用，对我的敏感部位不屑一顾，让我看了一些十分有趣的镜头。她们同我一起喝热香槟，还征得我的同意，试试我十分突出驼背的反抗力。试验成功，她们非常走运，这再次证明了我说的：驼背给女人带来好运气。

但是，和女人们的这种交往越持久，就越让我悲哀。各种想法左右着我，政局让我忧心忡忡。我蘸着香槟酒在桌面上画出对柏林地封锁，描出空中走廊，眼看这两个中国姑娘没办法凑在一起，我对德国的重新统一也感到绝望，于是开始做我从未做过的事情：寻求生活的意义。

那两位女士哭了，她们再也想不出有什么东西值得我看了。泪水洗去了伪装成的中国人的脸，露出她们的本来面目。我起身站了起来，开襟服彭囊囊的，铃铛乱响，想让三分之二的身子回家，留下三分之一去寻找狂欢节上一次小小的巧遇。这时，上士兰克斯过来和我打招呼。

各位是否还记得？一九四四年夏，我们曾在大西洋壁垒遇见过他。他在那儿守卫水泥，抽我师傅贝布拉的香烟。

楼梯上挤满了拥抱狂吻的人。我想上楼，正给自己点燃一支烟，有人拍了我一下。“喂，伙计，能给我一支烟吗？”上次世界大战的一名上士说道。

因为他的这番话和他军灰色的化妆服，我立即认出了他。不过我是不会重温旧交的，假如这位上士和水泥画师军灰色的膝盖上不搂着缪斯本人的话。

请允许我先和水泥画家交谈一番，再来描绘缪斯吧！我不仅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给了他香烟，还用打火机帮他点燃。他抽烟时，我问：“您还记得吗，兰克斯上士？贝布拉前线剧团？神秘，野蛮，无聊？”

画师被我的问题吓了一跳，香烟倒是没掉，却让缪斯从膝上摔了下来。我扶起那个喝得烂醉如泥的长腿姑娘，交还给他。兰克斯和我，一起回忆：海尔佐格中尉，兰克斯把他叫做胡思乱想的家伙，破口大骂。他显然想起了我的师傅贝布拉和修女们，当时，她们在隆美尔芦笋间找螃蟹。而我却对缪斯的露面感到十分诧异。尽管喝得烂醉，尽管翅膀已被折断，可怜巴巴，但仍显出天国女居民的某些工艺美术的魅力。她打扮成天使，戴着一顶用出口鸡蛋的可塑形硬纸板包装做的帽子。“这是乌拉。”画师兰克斯告诉我，“原先她做过裁缝，现在却想搞艺术，我不同意。当裁缝能挣钱，搞艺术挣个屁。”

我却靠搞艺术挣了很多钱啊！于是我提议，推荐女裁缝乌拉给艺术学院的画家们当模特儿和缪斯。兰克斯听了我的建议，喜形于色，随手从我的烟盒里抽出三根烟，而他则邀请我去他的画室，可转瞬间他又小气起来，要我付那儿的出租汽车钱。

我们立即离开了狂欢会场，到了他位于西塔德街的工作室，我付了出租汽车钱。兰克斯给我们煮咖啡醒酒，缪斯又活了。我用右手食指帮她抠喉咙，呕吐了一阵之后，她几乎清醒了。

现在我才看到，她淡蓝色的眼睛始终流露出惊讶的目光。我听到了她些尖声尖气，细弱无力的声音，却不乏动人的魅力。画师兰克斯跟她说了我的提议，与其说是建议还不如说是命令她到艺术学院去当模特儿。她开始拒绝，只想属于画师兰克斯。不愿到艺术学院去当缪斯或者模特儿，兰克斯二话不说，把面孔一板，像有才华的画师爱做的那样，举起大巴掌掴了她几个耳光，又问她一遍，随后脾气又变好了，满意地笑了，因为她抽泣着，就像天使在痛哭，说她愿意给艺术学院的画家们当报酬多的模特儿，如果可能，也当缪斯。

我们一起当双裸体，乌拉身高约一米七八，细高挑儿，娇媚可爱，弱不禁风，使人同时联想到波堤切利和克拉纳赫。她的肉细长光滑，布满孩子的细汗毛，龙虾肉大致就是她的肉色。她的头发细长，干草黄。下身的毛髻曲，微红，构成一个小三角。她每周剃一次腋下的毛。

果然不出所料，普通学生都陷入了所有初学者的错误中去，不是把她的胳膊画得太长，就是把我的脑袋画得太大，总是无法把我们全都画进纸里。

符合缪斯和我的形象的画，直到齐格和拉斯尼科夫发现我们后才产生。

我在她熟睡时吓唬她：农牧神和山林水泽仙女。

我蹲着，她朝我弯下腰来，抚摩着我的头发，小酥胸总有点冰凉，美人与怪兽。

她躺着，我头戴长角马头面具，在她的两条长腿间嬉戏：女士与独角兽。

这些都具有齐格或拉斯科尼夫的风格，它们或是彩色的，或是高雅的灰色调的，用细笔描绘细部，或按齐格的一惯手法，用天才的刮刀刮，只暗示出乌拉和我周围的神秘气氛。拉斯科尼科夫在我们的帮助下，找到了通往超越现实主义的道路：我的脸变成腊黄的钟面，好似我家以前的那个落地钟；我的驼背里机械地开放着乌拉种下的缠绕的玫瑰，她上半截在微笑，下半截拖着两条长腿，我蹲在她被切开的肚子里，在肝和脾之间翻看一本图画书。他们也爱把我们塞进戏装里，把乌拉画成哥伦比娜，把我画成悲哀的白脸小丑。大家给他起了拉斯科尼科夫这个绰号，因为他老是讲罪过和赎罪，他画成了一幅杰作：我坐在乌拉汗毛柔软的左大腿上，一丝不挂，一个畸形童子，她充当圣母，我纹丝不动地扮作耶稣，这幅画充分显示出了他的才能。

后来这幅题名为《四九年圣母》的画曾多次展出。它又被当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成广告画，也证明有效果，之后，玛丽亚看到了它，导致了家庭战争。但是，它仍被一个莱茵工业家高价买走，至今还挂在一幢办公大楼的会议厅里，影响着董事们的决策。

人们利用我的驼背和体形所做的那种天才的胡闹事，也使我得到消遣。此外，总有人请我和乌拉去当双裸体模特儿，每人每小时挣两马克五十芬尼。自从她按时带钱回家以来，只有兰克斯的天才抽象作品要求他发怒时，他才动手打她。所以乌拉也觉得当模特挺好。兰克斯从未利用她当纯视觉的模特儿，惟有他扇她的那些耳光才赋予他的画师的手真正的创造潜力。所以，对这位画师来说，马拉在某种意义上是个缪斯。

乌拉生性脆弱，爱哭，从本质上说，有一种天使的坚毅性，但也会刺激我干出暴力行为来。但我一直控制着自己，当我的欲望感觉到受了鞭笞时，便请她去吃甜点，装出一副同艺术家打交道时养成的绅士风度，这是领着她，把她当成我矮小的身体边一棵高大的植物，给她买淡紫色长袜，玫瑰色手套。在热闹的国王林阴道上惊奇万分的行人中间散步。

她和画家拉斯科尼科夫的关系就不一样了。他无需接近乌拉，就能经常和她进行最亲密的交往。他让她在转盘上敞开两腿，摆好姿势，却又不画，只是坐在离她几步远的一张小凳上，口中念念有词：罪过，赎罪，眼睛却死盯着那个方向，直到缪斯的下身湿了，开放了，而拉斯科尼科夫也通过看和念得到了解脱，从凳子上一跃而起，给画板上的《四九年圣母》增添了了不起的几笔。

尽管理由不同，拉斯科尼科夫有时也死盯着我。他觉得我身上缺些什么。他说我的两手之间有个真空，就不停地把各种东西塞到我手里。凭着他超现实主义的幻想，他能够想出好多东西来。他用手枪武装我，让扮演耶稣的我瞄准圣母。他让我递给她一个沙漏，一面镜子，镜子里的圣母变得丑陋无比，因为那是一

面凸镜。我的双手曾拿过剪刀、鱼骨头、电话听筒、骷髅头、小飞机、坦克车、远洋轮，可是，拉斯科尼科夫很快就发现，依然没有把真空填满。

我害怕那一天的到来，画家会拿来那件惟一注定由我来拿的东西。终于他把鼓拿来了。我喊道：“不！”

拉斯科尼科夫说：“我已经认清你了，奥斯卡，拿着鼓！”

我不停地发抖：“再也不啦！这是以前的事啦！”

他阴沉地说：“一切都会重来，什么事情都不会过去。罪过，赎罪，又一次罪过！”

我，用尽最后的力气：“我已经忏悔过了，免去这鼓吧！只是不要这铁皮，拿什么我都愿意！”

我哭泣，泪水把我的眼睛迷住了，乌拉朝我俯下身来。她可以无碍地吻我，缪斯使劲儿地亲吻我。所有被缪斯亲吻过的人，肯定都会理解，我在受了这个盖印章似的吻以后，立即把那个铁皮接过来。几年前，我把它放弃了，将它埋在萨斯佩公墓的沙土里了。

真够糟糕的，虽然我只是摆了摆姿势，却被画成了“四九年圣母”赤裸的左大腿上的击鼓耶稣。

玛丽亚瞒着我去看展览，在预告一次艺术展览会的招贴画上看到了我，大概在这幅画前站了很久，满腔怒火，因为她在和我谈话时，竟然用我儿子库尔特的学生直尺揍我。几个月前，她在一家较大的美食店里找到了工作，先当售货员，由于能干，很快就升作出纳员，待遇优厚。她已不再是做黑市交易的东土难民，而是在西方入籍随俗、安分守己的人了。因此她十分有说服力地把我骂作撞婊子的公山羊、脏猪、堕落的家伙，她再也不想看到我做肮脏事赚来的肮脏钱，连我自己也不愿再看到了。

我决定放弃和玛丽亚及她的姐姐古丝特和我的儿子库尔特一起居住。尽管玛丽亚很快就把她的话收回了，十四天后又把我当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模特挣来的钱拿走了一大部分当作家用。原本我打算远远地离开，去汉堡，如果可能就重返海边。玛丽亚很快地接受了我搬迁的打算，但在她的姐姐古丝特帮腔之下说服了我，在她们和小库尔特附近，不管怎样也得在杜塞尔多夫找个房间。

刺 猬

我成为房客后才学会用鼓召回往事构造，砍伐，剔除，纳入，吹掉，仿作。不仅这房间、刺猬、院子里的棺材仓库以及闵策尔先生在这件事上帮助了我，护士道罗泰娅姆姆对我而言也是一服刺激剂。

帕西伐尔你知道吗？我对他也不很熟。只有雪地上三滴血的故事留在我的记忆里。这则故事确实，因为它正适合我的情况。也许它适合每一个有某种观念的人的情况。但是我写自己；因此，他怀疑那则故事是不是适合他。

我一直在为艺术服务，让别人把我放在各种背景之前画成蓝色、绿色、黄色和土色，让别人把我抹黑，艺术学院的冬季学期因我和乌拉而获得生机。我们还将把我们的缪斯的祝福授予接下来的夏季学期。但是，已经降雪了，雪接受了那三滴血，它们像吸引住傻瓜帕西伐尔的目光那样吸引住了我的目光。关于此人我知之甚少，因此我甚至觉得自己和傻瓜帕西伐尔是同一个人。

尽管我描绘的情景粗陋，但各位读者一定非常清楚：雪，这是一个护士的职业服装；包括道罗泰娅姆姆在内的大多数护士，都佩戴的饰针中央的连结衣领的红十字，便是闪闪发光的三滴血。我坐着，目不转睛地看着它。

但是要找到原先作浴室用的蔡德勒公寓的那个房间坐下来也许并不容易。冬季学期刚结束，一些大学生为了回家过复活节就退掉了房间。节后他们有的又回来，有的不再回来。我的女同事

缪斯乌拉陪我去大学生代表处帮我找房间，那儿的人把我打发走了，只给了我一些地址和一封艺术学院的介绍信。

我先去比特路作坊里拜访了石匠科涅夫，然后才去看房子，这是长久以来的头一回。是亲情使然，也是因为我想在假期里找份工作。没有乌拉，我自己在几位教授家当私人模特儿，时间不长，在六周的假期里难以糊口。此外，我还得把一间带家具的房间的租金挣出来。

科涅夫还是老样子，后颈上有两个快好的和一个尚未熟的疖子，正弯着腰，在一块已经过粗凿的比利时花岗岩碑上一下一下地凿沟槽。我们聊了一会儿。我暗示性地摆弄起几把刻字凿，环视满屋已经磨光、只等刻碑文的石头。有两块壳灰岩一米石和一块双穴墓西里西亚大理石碑，看来科涅夫已经卖出，只缺一个内行的刻字匠来刻字了。币制改革时，我们两人就曾以这样的智慧之言相互安慰：一次币制改革，不论它多么豁达，也不能阻止人们死去，接着来买墓碑。我为科涅夫度过币制改革之后的那段艰难日子感到高兴。

除了死人的家属来买墓碑，还有币制改革之前所没有的委托任务：肉铺房屋正面和铺子里面都要贴上五彩大理石片；某些银行和百货大楼也要修复和装饰被破坏的砂石或凝灰岩把过去的外观恢复。

我称赞科涅夫勤快，问他一个人是否能做完如此多的活计。他先是回避，然后又承认，有时他真希望自己能有四只手。末了，他向我建议，我可以每天在他这儿干半天刻字活儿；石灰岩上刻的凹形字，每个字母四十五芬尼，花岗岩和辉绿石上的，每个五十五芬尼；凸形字，则按每个字母六十到七十五芬尼付。

我马上着手干起来，刻着凹体字：阿洛依斯·居弗尔——一八八七年九月三日生——一九四六年六月十日卒，在四小时内，我赚到了十三马克五十芬尼。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这个数目相当于我每月房租的三分之一。如果房租高于四十马克，我不愿给也付不起，因为我把继续贴补比尔克的家庭开支，贴补库尔特、玛丽亚和古丝特·克斯特看成是自己应尽的义务，尽管钱数不多。

我从学院的大学生代表处那里得到的四个地址中，先挑出一个离学院较近的：蔡德勒，尤利希街七号。

五月初的天气沉闷，典型的下莱茵地区春季的天气，我带着足够的钱出门去。事先玛丽亚替我把衣服弄得十分整洁，我显得非常有教养。那幢房子坐落在剥落的灰泥堆里，屋前有一棵沾满尘土的栗子树。蔡德勒住在四楼的一套三居室里。尤利希街一大半是废墟，很难说有什么相邻的房屋或街对面的房屋。左边有一座山，横七竖八地插着一些生锈的 T 形梁架，野草和野花丛生，由此可以推断，这里曾经有过一幢和蔡德勒房屋邻接的四层楼房。右边，部分遭毁坏的一层到三层楼终于修复使用。可是，建筑材料可能不够。房屋的正面光油油的瑞典黑花岗岩上面有许多窟窿，而且凹凸不平，有待修缮。墙上刻的“朔纳曼殡仪馆”的招牌已残缺不全，现在我已经记不清缺了哪些字母。而这家遭破坏的殡仪馆之所以还能维持一半的崇敬死者的外观多亏了刻在如今还平滑如镜的花岗岩上没被损坏的两根凹形棕榈枝。

这家有七十五年历史的殡仪馆的棺材仓库设在院子里。我觉得它非常值得一看，因为我房间的窗户正对着院子。我注意到工人们遇上好天气就把几口棺材从仓库里推出来，放在木架上，为了让它们恢复光泽，费尽心思。全部的棺材都是一头小的正像我所熟悉的那样。

我按铃，蔡德勒亲自来开门。他站在门口，矮小，敦实，呼吸短促，像只刺猬，戴一副镜片很厚的眼镜，下半张脸被丰富的肥皂泡沫掩住了，右手拿着刷子对着面颊，听口音是威斯特伐利亚人，看样子特别喜欢喝酒。

“如果您不满意那间房，您就说。我正在刮脸，还要洗脚。”蔡德勒不喜欢客套。我看了房间。觉得不满意，因为这是一间洗澡间，看样子已经很长时间没人修过了，一半是土耳其绿瓷砖，一半是令人感觉不安静的糊墙纸。但是，我没有说对这房间不满意。不管蔡德勒脸上的肥皂沫快干了，也不管他还没有洗脚，我敲敲浴缸，想看看是否能把这浴缸弄走，反正它已经没有排水管了。

蔡德勒微笑着摇了摇头，还想用剃须刷抹出泡沫来，但是抹不出。这就是他的回答，于是我说准备以每月四十马克租下这间带浴缸的房间。

我们又回到昏暗的、像软管似的走廊里。好几间房间的门对着走廊，有的是玻璃门，有的漆成各种颜色。我想知道，我未来的邻居们都是谁。

“我的妻子和房客。”

我用手指弹了一下走廊中央和套房伸手可及的一扇乳白玻璃门。

“这儿住的是一位护士，不过您不用理会。反正您见不着她。她只在这儿睡觉，而且也不常在这儿。”

我不想说出来，我一听“护士”这个词儿就抽搐。我点点头，不敢再打听其余的房间的情况，只知道右手边的是他带浴缸的房间，房门就是走廊的尽头。

蔡德勒用手指弹了弹我的上装翻领：“如果您有酒精炉的话，可以在自己的房里煮东西。如果您觉得高度适合的话，有时也可以用厨房。”这是他头一回谈及奥斯卡的身高。

他快速读了一下艺术学院的介绍信，因为有院长劳伊塞教授的签名，信起了作用。他讲了各种注意事项，我只答应着“是”或“阿门”，记住厨房在我房间的左边，答应他衣服都送到外面去洗，因为他担心热气会损坏洗澡间的糊墙纸，因为玛丽亚表示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愿意替我洗衣服。因此我满口答应了。

本来我应该去拿行李，填迁居表格。但是我并没有去。我向蔡德勒问厕所在哪里，他用拇指指向一扇胶合板门，这使人联想到战争年代和紧接着的战后年代。我打算当即使用一下厕所，蔡德勒便替我打开了灯。他脸上的肥皂沫已经硬结、剥落、作痒。

我原本无此需要，但我还是气恼地、固执地在厕所里等着，直到尿出了那么一点儿。由于膀胱压力不够，我必须使劲，又因为离马桶座圈太近，结果弄湿了马桶的座圈和方砖地。我用手绢擦去了旧座圈上的尿，又用鞋底抹掉不幸落到方砖地上的那几滴。

尽管蔡德勒脸上的肥皂沫已经硬结，十分不舒服。他也并没有趁我上厕所时去找剃须镜和热水。他等在走廊里，可能对我特别偏爱。“您真特别，”他说，“还没有签租约，就先上厕所了。”

他靠近我，手里拿着变凉、硬结的剃须刷，肯定在策划开个笨拙的玩笑，却没有给我添什么麻烦，而是把套间的门打开了。我从刺猬身边经过，用眼睛的余光瞄他，向楼梯间退去。这时，我发现，厕所门位于厨房和那个护士有时会来往的屋子之间。

我带着行李和圣母画家拉斯科尼科夫送的铁皮鼓在黄昏时再次按蔡德勒家的门铃，手持迁居申报表。蔡德勒在这段时间里刮了脸，大概还洗了脚，他把我领进了他的套间。

屋里有一股点燃过多次的雪茄的气味。另外，还夹杂着很多一条擦一条的、被卷到房间各个角上的、可能是珍贵的地毯所散发出来的气味。还有看不到的旧挂历的气味。大概这也是地毯的气味吧。奇怪的是，舒适的皮面椅子却没有自己的气味。我对这很失望，因为虽然我从未坐过皮面圈椅，却有着真实的想象：皮面椅子必定是有气味的。因此，我怀疑蔡德勒家的圈手椅和椅子是人造革的，而并非真皮。

蔡德勒太太坐在一把椅面光滑，无气味，事后证明是真皮革

的圈手椅上。她身穿灰色的运动服，勉强合身。裙子缩到膝盖以上，露出三指宽的内裤。她并不把往上缩的裙子拉下，并且我注意到，她的眼睛哭肿了。所以，我不敢作自我介绍并向她问候几句。我沉默地一躬身，在快直起腰时，扭头看了看蔡德勒。他用大拇指一指，短促地咳嗽几声，就算是向我介绍了他的太太。

房间呈正方形，面积较大。屋前的那棵栗子树使房间变得昏暗，也使它变大或变小。蔡德勒正站在两扇窗户之间，我把箱子和鼓放在门口，拿着迁居申报表向他走近。我听不到他走路脚步声——这一点我以后还要补叙，他是踩着四块地毯走过去的，地毯颜色炯异，一块比一块小且边与边相叠，有的有流苏有的没有，形成了五彩的台阶。最低一级棕色里带点淡红，从墙根开始展开。第二级是绿色的，大部分被家具所占，像放满几十只利口酒杯的玻璃柜，沉重的碗橱，还有夫妻的大双人床。第三条是蓝色，带着图案，从一角铺到另一角。第四条是葡萄红的维罗呢地毯，它上面放着一张蒙上蜡布保护桌面的圆形可伸缩餐桌，和四把规则的钉着铆钉的皮面椅子。

还有许多地毯在墙上挂着，或是被卷起来，懒洋洋地躺在墙根下。据我推测，在币制改革以前刺猬做的是地毯交易，币制改革以后，他的地毯就变成装饰品了。

带窗户的墙上，有一幅镶着玻璃镜框的俾斯麦肖像挂在有东方风格的小地毯之间。这是房间里惟一的一幅画。刺猬在这位宰相下方的一把皮面圈手椅里满登登地坐着，看上去有点像俾斯麦的亲属。他接过我手里的迁居申报表，警觉地、翻来覆去地却又不耐烦地细看这份官方印制的表格。他的妻子随口问了一句是不是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不料他却大发雷霆，使他更像那位铁血宰相了。圈手椅一口把他吐了出来。他站在第四条地毯上，把表格举在一侧，用空气把他的身子和背心填满，接着一跃踩到第一条和第二条地毯上，冲着他那正在做活儿的太太嚷道：谁在这里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讲话，我又没有问到他，除了我谁都不许讲话！不许再出声！

蔡德勒太太尽量地控制住自己，埋头做针线活，再没说什么。这样一来，踩在地毯上的刺猬就不知所措了，但他仍要人相信他这一通发作必须有回应，然后渐渐消失。他一步跨到玻璃柜前，打开柜子，把它弄得叮咣直响，小心翼翼地叉开手指夹起八个利口酒杯，又小心翼翼地不碰杯子把夹满玻璃杯的手从柜子里退出来而像一个有七位客人的东道主，要亲自做一番手脚灵巧的表演供来宾消遣。他一小步一小步地朝绿瓷砖连续燃烧炉走去，突然忘掉了自己应该小心点，把手里那些易碎的货色扔向冰冷的铸铁炉门。

这就要求蔡德勒的准确率要相当高。令人惊讶的是，他的眼镜后面的眼睛却在看着他的太太。而她呢？已经站起身来，站到右窗户下往针眼里穿线。他砸碎玻璃杯后一秒钟，他的太太就把线穿进了针眼，这可是件挺难的事呀！需要双手的绝对平稳，蔡德勒太太回到还暖和的圈手椅前，坐下来，裙子又缩上去，露出三指宽的粉红色内裤。刺猬探着身子，急促地喘息着却又聚精会神地观察着他太太的全部动作。她刚坐下，他就把手伸到炉子后面，取出一个铁皮簸箕和一把扫帚，把玻璃碎片扫拢，把它们倒在一张报纸上，报纸有一半已经被利口酒杯碎片所占据，再没有地方来盛放第三次动怒后的碎片了。

如果读者认为，我从扔碎玻璃的刺猬身上看到了我自己，看到了那个曾多年唱碎玻璃的我，我不能说诸君没有一点儿道理。当初我也喜欢把一肚子怒火化作玻璃碎片，只是我从未事后用簸箕和扫帚打扫过。

蔡德勒把他怒火的残余收拾好后，又坐到圈手椅上去。我把落在地上的迁居申报表重新递给他。

在表格上签完名后，蔡德勒对我说，在他的寓所里必须保持秩序，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他还说，十五年来他一直是代销

商，理发推子代销商，他问我知不知道什么是理发推子！

我当然不知道什么是理发推子。他在房间的空气里做了几个动作来说明，让蔡德勒看出我正在操作理发推子。他应该是个很能干的代销商，因为他的大胡子修剪得很棒。他又告诉我他的工作日程：出门一周后待在家两天，如此往复。随后，他便对我没有了兴趣，像刺猬一样坐在浅棕色的皮圈手椅里吱吱响地前后摇着，眼镜镜片一闪一闪，莫名其妙地说着：行行行行行。我该走了。

我先跟蔡德勒太太告辞。她的手冰冷，没有骨头，却又干巴巴的。刺猬在圈手椅里挥手，我向门口走去，那里放着我的行李。当我的行李已经在我的手上时，他的声音又传来了：“您箱子上挂着的是什么玩意儿？”

“我的铁皮鼓。”

“那么您会在这儿敲吗？”

“不一定。我过去经常敲。”

“反正我不在家，我想您可以敲。”

“现在还没有什么事让我觉得需要敲鼓。”

“您的个子怎么这么矮，嗯？”

“不幸摔了一跤，从此不长个儿了。”

“只要您不给我添麻烦就好，像突然发病之类。”

“最近几年，我的身体始终挺好。您瞧瞧，我的身子多么灵便。”我在蔡德勒先生和太太面前蹦了几下，差点儿做起过去我在前线剧团学会的体操动作来，惹得蔡德勒先生又变成一只刺猬，逗得蔡德勒太太窃笑不已，当蔡德勒还在拍大腿的时候，我已经站在走廊里了，经过护士的房间、厕所和厨房，拎着行李进了我的房间。

当时正值五月初。从那一天起，我的头脑中充满了护士的奥秘。女护士使我患病，也许使我得了不治之症，因为甚至在今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天，当这一切均成往事时，我仍在反驳我的护理员布鲁诺。他直言不讳地声称：只有男人才能成为真正的看护，让女护士护理病人的欲望，不如说是一种病兆。男护士含辛如苦地看护病人，有时可以把病人治愈；与此相反，女护士们走的是引诱病人走向康复或者死亡的路子，而且她们能轻易地让死亡具有趣味无穷的性爱味道。我的男看护布鲁诺就是这么说的。可能他是对的，但我不同意。有谁若是像我这样的每隔几年就让女护士来证实一下自己没有死而是活着，谁就必定心存感激。男护士虽然富有同情心，但他们也好发唠叨。病人是绝对不允许出于职业嫉妒心的男护士离间女护士和自己的。

我从三岁自地窖楼梯上摔下来时就开始经历这种事。我记得，她是从普劳斯特来的绿蒂姆姆。霍拉茨医生的护士英格姆姆和我相处过多年。保卫波兰邮局的战斗过后，我同时迷恋着很多个女护士。但我只记住了一个护士的名字：她叫埃妮或贝妮姆姆。还有吕内堡的、汉诺威大学附属医院的众多女护士们。之后是杜塞尔多夫市立医院的女护士们，位居众人之上的是格特露德姆姆。现在，不用我去医院看病，她自己就来了。处在最佳健康状况下，我迷恋着和我一样是蔡德勒寓所的房客的女护士。从那时起，我觉得世界充满了女护士。我清晨去上班，到科涅夫那里去刻字，我等电车的站名叫马利亚医院。在医院的砖砌大门或是放满花盆的门前空场上，总有女护士们在过来过去。她们或是准备开始一天的辛苦工作，或是刚刚做完，正要回家。电车来了。我免不了经常跟这些疲惫不堪的、至少也是疲乏失神的女护士们坐在同一节拖车里，或是站在同一个站台上。开始，我讨厌她们身上的气味，但不久就适应了，走到她们身边去，甚至站到了她们当中。

比特路到了。天气好时，我就在室外陈列的墓碑间凿字，看着她们在休息时间两个一对、四个一伙地闲聊着。迫使我停下了

手中的工作抬头望去，而我每抬一次头，就要付出二十芬尼的代价。

电影广告：德国的电影一直有很多护士出场。玛丽亚·谢尔把我诱感到电影院。她身穿护士服，哭，笑，始终头戴护士帽，微笑着演奏严肃音乐，充满自我牺牲精神地进行护理，后又陷于绝望，几乎把她的睡衣扯碎，自杀未遂后把她的爱情牺牲了——医生由博士扮演——她忠诚于她的职业，保全了她的护士帽和红十字胸饰。我不停地把不正经的邪念编织到影片里去，小脑和大脑哈哈大笑，而我的眼睛却哭出了眼泪。我眼泪模糊地在荒漠中迷了路，荒漠者，穿白衣的无名志愿护士也。我在里面寻找道罗泰娅姆姆，关于她，我只知道她是蔡德勒家的房客。

有时她下夜班回来，我能听到她的脚步声。有时我在晚上九点左右听到她的声音，这是她刚结束白班回家。每当我听到走廊上有护士的动静时，我并不总是稳坐在椅子上。我经常摆弄着房门把手。谁能受得了呢？如果有什么东西从门口走过，也许是为了他而从门口走过的，他能不起来瞧一眼吗？如果邻室的每一个动静看来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安稳地坐着的他一跃而起，他还能在椅子上坐安稳吗？

最糟糕的是四周一片寂静。我们已经知道了那个船艙形象，它是被动的、木制的、寂静无声的。据说，尼俄柏杀死了第一个博物馆看守，他倒在了血泊中。馆长另找一名看门人，因为博物馆不能关门大吉。第二个看守又死了，人们惊呼：他也被尼俄柏杀死了。博物馆馆长好不容易找到了第三个看门人，也许已是他找过的第十一个了。但不管怎样，有一天，这个好不容易找到的看门人也死了。人们嚷道：尼俄柏，漆成绿色的尼俄柏，木制的尼俄柏，琥珀眼睛射出目光的尼俄柏，她赤裸着身体，不抽搐，不挨冻，不呼吸，不出汗，没有蛀虫，因为喷了防虫剂，因为她是历史文物，无价之宝。为了她，必须要烧死一个女巫，人家砍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下了雕刻这个形象的匠人那天才的手。船只沉没，她却顺利脱险，因为尼俄柏是木头的，会杀人，不怕火，始终价值连城。她用她的寂静无声让学生、大学生、一名老年神甫和一个看门人组成的合唱队变成直挺挺不能动弹。我的朋友赫伯特·特鲁钦斯基因为纵身扑向她，而丧命。可是，尼俄柏却始终是干的，且越来越寂静无声。

女护士大约六点钟就离开了寓所，周围变得寂静无声，尽管她在的时候并没有弄出什么声响来。我不得不间或把床弄得嘎嘎作响，移动一张椅子或者让一个苹果朝浴缸滚去来承受这种寂静。大约八点钟，邮递员来了，信和明信片被他塞进门上的邮件缝，纷纷落到走廊的地板上。发出了刷刷的声响，除去我以外，蔡德勒太太也在等待这刷刷声。她是曼内斯曼公司的女秘书，九点才上班，在我后面出门。所以，我是第一个听到刷刷声后去看的人。我蹑手蹑脚，尽管明知她在听着我的动静。我把房门打开，这样就不必开灯，把所有的邮件全拣起来。如果有玛丽亚的信，玛丽亚每星期来一次信，说说她自己、孩子和姐姐古丝特的事情，然后我便随手塞进睡衣兜里，接着迅速溜一眼剩下的闵策尔先生的，我就再把它们放到地板上，却把寄给护士的拿在手里，转动、闻、摸，我要先了解一下寄件人是谁。

很少有道罗泰娅姆姆的信，不过也比我的要多。她的全名是道罗泰娅·肯格特，可我只叫她道罗泰娅姆姆，时间一长便忘了她的姓氏。姓氏对一个护士而言纯属多余。她的母亲从希尔德斯海姆给她来信。西德各家医院也寄来信和明信片。来信的都是和她一起接受专业培训的女护士们。现在她不带劲却又劳神地用明信片来保持与她的同行们的联系，也得到她们的回信。全都是些无关紧要的废话。我看一眼就知道。

那些明信片，多半印着爬满常春藤的医院楼房，使我了解到一些道罗泰娅姆姆过去的生活情况。她曾在科隆的文岑茨医院、

亚琛的一家私立医院、希尔德斯海姆都工作过一段时间。她母亲的信也寄自希尔德斯海姆。也许她是下萨克森人，也许像我那样是个东方难民，战后不久逃到那里落脚的。我还知道了，道罗泰娅姆姆就在附近的马利亚医院工作，和一个叫贝亚特的护士是好朋友，许多明信片都提到了这份友谊，还让她转达对贝亚特的问候。

她使我不安。她的存在使我想入非非。我写了几封给贝亚特，在一封信里请她替我说些好话，在另一封信里又绝口不谈道罗泰娅。我想先去接近贝亚特，再转而接近道罗泰娅。我起草了五六封信，有几封已经装进信封，我去了邮局，却一封信也没寄。

我是那么疯狂也许总有一天会把这封致贝亚特的信寄出去的。但是，我在一个星期一，从走廊里发现了那封信，它使我的不乏爱情的激情变成了嫉妒，情况也就不同了。奇怪的是，我对玛丽亚和她雇主施丹策尔先生刚开始发展的关系倒是泰然处之。

通过信封上的寄件人，我知道了写信给道罗泰娅姆姆的是马利亚医院的一位埃里希·韦尔纳博士。星期二，第二封信到了。星期四又捎来了第三封。在那个星期四，情况到底是怎样的呢？我回到自己的屋里，坐到一张厨房椅子上，这些厨房椅子都包括在租用的家具里。我从睡衣口袋里掏出玛丽亚每周都会寄来的信。尽管玛丽亚有了新的追求者，仍来信准时，字体整洁，内容详细。我拆开信封，却什么也读不进去。我听到蔡德勒太太在走廊里，紧跟着听到了她的声音。她喊闵策尔先生，却没有听到回答声，可他肯定在家，因为蔡德勒太太把他的房门打开，将邮件交给他，并一直劝慰他。

我没有听清蔡德勒太太的声音。糊墙纸错乱的图案使我的精神也错乱了，水平线、垂直线、对角线、曲线，千条线万条线乱成一团。我看到自己变成了马策拉特，却又和他一起吃着面包，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那是所有的受骗者都在吃的伪称有益于健康的面包，轻易地把我的扬·布朗斯基装扮成一个诱拐者做的事，涂抹成撒旦的脸，画得实在差劲，先给他穿上传统的有天鹅绒领子的双排扣大衣，又让他穿上霍拉茨博士的白大褂，然后又把他变成外科医生韦尔纳，来诱拐，来玷辱名声，来使人堕落，来伤害人，来打人，来折磨人。他做够了一个诱拐者，这样一来，他反倒变成一个值得信赖的人了。

现在我可以微笑着回忆起那个一时心血来潮产生的念头。而当时，这个念头却让我变得嫉妒，变得像糊墙纸的图案一样错乱。我要学医，马上去学。我要成为医生，而且就在马利亚医院工作。我要揭露韦尔纳博士工作马虎，甚至指控他在做喉头手术时因疏忽大意造成了病人死亡把他赶走。事实将会证明，那位韦尔纳先生根本没上过大学，更谈不上医学博士。战争期间，他从业于一个野战医院，学到了一点知识。滚蛋骗子！我将成为主任医师，如此年轻，然而身居负责的岗位。一位新任教授绍尔布鲁赫来到那里，手术室的护士道罗泰娅姆姆陪着他，在一群白衣随从的簇拥下，走过回声四起的过道，给病人作了诊断，在最后一刻决定做手术。多妙啊，以前还从未拍过这样一部影片呢！

衣柜里

别以为我只想着和护士们亲近。艺术学院的夏季学期已经开始，我不得不放弃假期里临时的刻字工作，我毕竟自己的职业生活，我该去摆姿势赚取较好的报酬了。他们在我身上运用的旧的风格手段必须经受考验，同时他们又开始在我和缪斯乌拉身上试验新的风格了。他们扬弃了作为对象的我们两个具体性质，放弃、否认我们的实际存在，在画布和画纸上画上各种线条、螺旋形、四方形以及画在糊墙纸上也许还凑合的、绝对是外在的东

西。除了没有和乌拉的形象，没有深奥的紧张度。在这些日用品造型设计上什么画都有。他们还加上了市场上小贩叫卖腔似的标题，例如：《歌唱时间》、《向上编织》和《新空间里的红色》之类。年轻学生是这些画的主力军，他们连正正经经的素描都不会哩。库亨和马鲁恩周围我的老朋友们，还有齐格和拉斯科尼科夫这两位高才生，他们没必要用苍白的小圆圈和贫血的线条来为贫乏唱赞歌。因为他们有丰富的黑色和彩色。

缪斯乌拉热衷于新派的糊墙纸，很快遗忘了已经离开她的画师兰克斯，暴露出她的艺术趣味只不过是工艺美术的趣味而已。她认为一个姓麦特尔的中年画家各式各样的大幅装饰画是漂亮的、欢快的、滑稽的、离奇的、绝妙的，甚至是时髦的。麦特尔非常喜欢像甜过头的复活节鸡蛋这种形式，不久乌拉就和他订了婚，这里就不多说了。后来她还经常和不同的人订婚。前天她来探望我，给我和布鲁诺带了糖果。她向我透露，现在她就快要结婚了，不过，过去她也总是这样说。

学期刚开始时，乌拉只想做新派的缪斯，对这个她根本没察觉是盲目的流派的青眼相加。是她的复活节鸡蛋画家麦特尔把这只跳蚤塞进她的耳朵里的，他还传授给她一套词汇作为订婚礼物，而她就用这套词汇和我进行艺术对话。她大谈什么相互关系、透视、布局、重音、落差结构、溶化过程、侵蚀现象之类。在模特儿休息的时间里，她白天只吃香蕉喝番茄汁，就会跟我谈些什么原细胞、色原子，说在其力场的平直动力轨道上的色原子不仅找到了它们的自然位置，而且，除此以外……有时我们去拉亨街喝咖啡时，她也谈这一套。甚至在她和麦特尔解除婚约之后，在她和一个同性恋女子相处了一段时间后，又跟库亨的一个男学生相好并重归于客观世界之后，她还是保留着那套词汇。这使她的嘴角两侧印下了两道深深的、略显狂热的皱纹。使她的小脸显得疲惫不堪。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应该承认，不只拉斯科尼科夫一个人让缪斯乌拉扮作护士站在我身边供人作画，继《四九年圣母》之后，他又把我们画进《诱拐欧罗巴》中去，白公牛便是我。这幅有争议的诱拐图完成不久，就产生了《傻瓜治愈女护士》这幅画。

拉斯科尼科夫的想象之火被我的一番话点燃。他，红发，诡谲，阴沉，正在挖空心思，洗净画笔，疲惫地凝视着乌拉，口念罪过，赎罪。这时，我给他提建议，把乌拉画成赎罪，把我画作罪过；我的罪过是显而易见的，可以让乌拉身穿护士服来象征赎罪。

全都怪拉斯科尼科夫。那幅杰出的画后来加上了另一个迷惑人的标题，本来我要把这幅油画起名为《试探》，因为画中的我右手握住门把，往下压，正打开房门，房间里站着女护士。这幅画本来也可以叫作《门把》，因为我觉得有必要有一个新名堂来代替“试探”这个词儿，就推荐“门把”这个词儿，因为门上伸出的这个可让人握住的把手总愿意让人家来试一试，因为我每天都在试着道罗泰娅姆姆小间的乳白色玻璃门上的那个门把手。我知道，刺猬蔡德勒这时候出差在外，护士在医院，而蔡德勒太太则在曼内斯曼公司的办公室里。

我走出自己的房间，走到蔡德勒的套间的走廊里，捏住了护士房间的门把。

我几乎每天试探，直到六月中旬左右，房门却依然不让步。开始我以为，因为工作要求这位护士兢兢业业，她一定是一个凡事都有条有理的人，所以，看来我还是别再指望她会疏忽大意，不锁房门就离开。因此，我意外地发现有一天她没锁房门时，我立即愚蠢而机械的把房门又关上了。

我肯定在走廊里站了好几分钟，全身的皮肤绷得紧紧的，很多的想法同时涌上心头。我的心好不容易过了好久才平静下来，有了想法。

我先将自己的想法硬和其他事情凑到一起。我想着，玛丽亚有一位追求者，追求者把一把咖啡壶送给玛丽亚，星期六追求者和玛丽亚去阿波罗，在店里玛丽亚用“您”称呼她的追求者，因为这间店铺是属于他的玛丽亚只在休假日用“你”称呼她的追求者，……我从各个角度考虑了一番玛丽亚和她的追求者之后，我才理出个头绪来——把乳白色的玻璃门打开了。

过去我就想象出这是一间没有窗户的房间，因为透明的上半部房门从未透出过一道日光。我把手伸到左边，摸到了电灯开关。和我的房间一样，这个小间实在太窄，不能叫做房间，所以，一个四十瓦的灯泡足够把全屋照亮。我一抬头就看到我的上半身在镜子里头。这真叫我难堪。他反转的映像无话可说，所以我也不回避它，加之，镜中以同样大小倒映出的梳妆台上的东西对我有极强的吸引力，于是我踮起了脚尖。盥洗盆的白搪瓷上有几个蓝黑色疵斑。盥洗盆一头的上面是大理石梳妆台面，同样也有破损。石板的左角没了，缺角处尽头是镜子，倒映出大理石的纹理。缺损处有撕去的胶布的痕迹，显然曾有人想用笨拙的办法来补合。我的职业病又被这一切触动了。我想起了科涅夫自制的大理石粘合剂，把大理石碎片粘合成耐久的石板，贴到大肉铺房屋的正面。

和自己熟悉的石灰岩待在一起，也就忘掉了讨厌的镜子映出的我的肖像。这时，我想出了我一进门就闻到的那股味道是什么。那是醋味儿。

后来，直到几星期前，我还在用下面的假设来原谅这股冲鼻子的气味。我假设护士前一天洗一次头发，她在冲头发的水里掺了些醋，尽管梳妆台上没有醋瓶。同样，我也没有发现其他盛醋的容器。可我心里还一再说，如果道罗泰娅姆姆在马利亚医院找到现代化的洗澡间的话，就不会有这么多的麻烦：征得蔡德勒同意后，再去蔡德勒的厨房烧热水，然后返回她的屋子来洗头发。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护士长或者医院管理处一概禁止女护士使用医院的某些医疗设备，所以，道罗泰娅姆姆只能对着那面不平的镜子在那个搪瓷盆里洗她的头发，这种情况也不是不可能的。虽然梳妆台上并没有醋瓶，在湿冷的大理石上却有不少小瓶小罐。一包药棉、半包卫生带使得我不敢去查看小罐里装的是什么。可我至今还认为，罐里装的只是化妆品，顶多是无害的药膏。梳子被护士插在头发刷子上。我费了很大劲儿才从鬃毛间拔下梳子，看清楚了。这件事我干得非常棒，因为在同一瞬间我有了极其重要的发现：护士的头发是金黄色的，也许是灰金色的。因此，我们可以断定：道罗泰娅姆姆有金黄色的头发。

梳子上过多的头发说明：护士患有头发脱落症。我立即认为，之所以患这种不愉快的、让妇女心情苦恼的病，罪在护士帽，可是在一家管理有方的医院里，不戴护士帽是不允许的。因此我没有控告护士帽。

尽管醋味使我觉得难受，但道罗泰娅姆姆脱落的头发却使我心中萌生了因为同情而变得高尚的、关怀的爱。说明我的为人和我的处境之特点的是，我立即想起一遇到合适的机会我就会把许多标明有效的生发剂交给护士。我一边在脑子里想着这次会面——我想象，那是在温暖、无风的夏日天空之下，在麦浪起伏的田间——一边从梳子上捋下不受拘束的头发，理成一束，吹掉上面的尘土和头皮屑，打上一个结，掏出我的皮夹子，匆匆清出一层，把它谨慎地放进去。

为了方便地摆弄皮夹子，我便把梳子放到大理石板上，我已经把钱包和战利品放进上装口袋里去了然后我把皮夹拿起了。我举起梳子对准无罩的灯泡，让灯光透过它，观察两组硬度不同的梳齿，确定较软的那一组缺了两根齿，又不禁用左手食指的指甲刮响那组硬齿的圆头。梳子上还留有一些我为了不引起怀疑而故意不捋下来的头发。

我把梳子插到了头发刷子上，离开了梳妆台，总觉得它不平。在向护士的床走去时，我撞到了一把挂着胸罩的厨房椅子上。

我两手空空，只能用双手去填满那个四边已经洗破和褪色的支撑物的两个穴，但是填不满。不，我的拳头太硬，太神经兮兮，不幸地、陌生地在这两只碗里活动，我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却真想每天都能从这两只碗里舀出东西来吃；但奶糕糊有时也会让人呕吐，接着又甜了，太甜了，或者甜到连恶心都得有一定的滋味才能刺激出来，从而检验着真正的爱情。

突然我想起了韦尔纳博士，就把拳头从胸罩里抽了出来。韦尔纳博士立刻消失，而我已经站到了道罗泰娅姆姆的床前。护士的床啊！我常常想象它，可现在看到的却同给我的睡眠和偶尔的失眠界定一个棕漆框框的那张粗卑的床架如出一辙。我曾希望她有一张白漆金属床，最轻的、有黄铜头的床栏杆，而不是这种没有情爱的、粗笨的家具。这是一个睡觉祭坛，连羽绒被都是由花岗岩雕成的。我在它前面站立不动，站立良久，脑袋沉重，毫无激情，甚至连嫉妒都没有。随后我转过身去，避免看到这种不堪入目的景象。我真没想到道罗泰娅姆姆竟然住令我讨厌至极的洞穴里。

我又走回梳妆台，也许是想打开假设盛着某种油膏的小罐。这时，我注意到衣柜的油漆是黑棕色，并跟随它装饰线的凸出部走去，最后将它打开，因为每个衣柜都希望被人打开。

我弯直了封住两扇门的钉子，柜门随即叹息一声，自动打开了。可看的東西还特别多，我只好后退几步，两臂交抱，冷静地看着。我不希望像看梳妆台时那样拘泥于细节，不希望像面对护士的床时那样，因为事先已有想法而评判一通，我要像上帝创世第一天那样怀着十二分的新鲜感迎向衣柜，而衣柜也是张开双臂欢迎我的。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但是要我完全放弃批评是不可能的。因为我是个本性难移的美学家。瞧，一个野蛮人匆匆地锯掉了柜子的腿，留下许多毛茬儿，平放在地板上，变了形。

柜子里面，井井有条，无可挑剔。右边三格，摞着白色、粉红色和浅蓝色相交的内衣和衬衫，这蓝色肯定是耐洗、耐磨的。右柜门里侧放内衣的三个格子旁边挂着两个连在一起的红绿格子防水布口袋，口袋里上面是补过的、下面是因抽丝而破了的长统女袜。我认为这些袜子比玛丽亚的老板和追求者送给她的更厚、更耐用。衣柜内无格的空间里，左边衣架上挂着上过浆的暗白色的护士服。上面放帽子的格子里排列着简朴美观的护士帽，敏感，受不了外行的手的触摸。我仅仅扫了一眼放在内衣格子左边的普通服装。和我心里想的一样，全都是些随便挑来的廉价品，看来道罗泰娅姆姆对这部分服装的兴趣很一般。放帽子的那一格里，在护士帽边上随意重叠地挂着三四顶盆形帽子，滑稽可笑的仿花图案也一个压着一个，看上去像一个没做好的蛋糕还差不多。一打的书放在一个装剩毛线的鞋盒上，书脊五颜六色的。把脑袋歪向一侧，要再走近些才能看清书的标题。我露出宽恕的微笑，又让脑袋回到垂直的位置，原来这位善良的道罗泰娅姆姆喜欢的是侦探小说，可是，我已经看够了衣柜里普通的衣物。这些书诱使我再靠近衣柜些，我所处的位置非常有利。我进而探身到衣柜里，再也抗拒不了想属于这衣柜的愿望。为了让道罗泰娅姆姆把她的不算少的一部分服装保存在那里，我要变成她衣柜的一部分。

衣柜底板上放着仔细刷过的、实用的运动鞋，只等待被穿出去，可我却没必要挪动它们。衣柜里的物件放置的地位，差不多是有意请我入内一样，因为我可以蜷起膝盖，脚跟着地，轻松地待在这所小屋子的中央而不至压到任何一件衣服。我有足够的地盘，也有屋顶。就这样，我抱着许多的期望走了进去。

我感觉到房间里的家具什物和电灯泡都在观看我，使我没办法集中精神。为使我在衣柜里的逗留更加亲切，我试着把柜门拉上。困难很大，因为门框上的簧舌槽坏了，门的上部还漏着缝，灯光射进柜里来，但这些对我并没有太大的妨碍。门一关，气味增多了。不再有醋味，而不是呛人的防蛀剂气味，旧东西的气味，干净东西的气味，一种好气味。

我坐在衣柜里做点什么好呢？把额头贴在道罗泰娅姆姆的职业服上，一件颈前系扣的带袖围裙，我马上发现通往医院各病区科室的门全部打开了。也许我的右手想寻找支撑点，便从普通衣服旁往后伸去，乱摸着，失去重心，一把抓住了一样光滑的、能屈伸的东西，捏着它，最后找到一根立柱，把身体沿着钉在上面的横条滑去，靠在柜子的后壁上。我想瞧一个究竟，就把右手伸到了前面来。

我看到一条黑色漆皮腰带，在灰暗的衣柜里，我从这条光滑、延伸的皮带上看到了很多东西，当我还是坚持三岁孩子身材的鼓手时，在新航道的港口防波堤上，我可怜的妈妈身穿深红色翻领的海军蓝春季大衣，扬·布朗斯基的大衣有天鹅绒翻领，马策拉特穿一件双排扣大衣，奥斯卡的水手帽上绣着金字“皇家海军赛德利茨号”的字迹。双排扣大衣和天鹅绒翻领在我和妈妈前面跳跃，妈妈不能跳，因为她穿着高跟鞋，他们从一块石头跳到另一块石头，一直跳到灯塔。灯塔下坐着一个钓鱼的人，他手拿着一根晾衣服绳子，放一个装满盐的土豆口袋，还做些什么东西在动。我们，我们看着口袋和绳子，想知道这个灯塔下的男人为什么用晾衣服绳子钓鱼，不管他是从哪里来！他朗声大笑，朝水里吐出一团棕色东西，这东西在防波堤旁边的水面上摇曳，不进不退，最后被一只海鸥啄走。海鸥什么都叼，它不是敏感的鸽子，更不是女护士——如果要把一切白色披露的东西都塞进一个柜子里集中保管，那是非常容易的事情。还可以指白为黑，我当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时因为还不害怕黑厨娘，毫无惧色地坐在衣柜里却又不在于衣柜里，而是同样毫无惧色地在晴朗的天气里站在新航道的防波堤上。在衣柜里，我手执漆皮腰带。在防波堤，我寻找着同样是黑色的和滑溜的其他东西。衣柜都会强迫人去作对比，称之为黑厨娘。但那时候，我并没有把它放在心上，而是更多地了解白色事物，却几乎无法分出海鸥和道罗泰娅姆姆。我不去想鸽子和类似的无谓之物，并且我们是在耶稣受难节那天去的防波堤，灯塔上空也无白鸽，灯塔下那个从新航道来的小伙子坐在那，手执晾衣服绳子，坐着，啐着。也许是从布勒森来的那个小子收绳子，绳子拽到了头，随后让别人清楚，为什么从同海水相混的莫特劳河水里拽绳子时会那么费力。这时候，我可怜的妈妈她的脸毫无血色好似乳酪。将双手搭在扬·布朗斯基的天鹅绒衣服和双肩上，因为，她要走开，却又不得不看着那个家伙把马头往石上拍打，较小的海水绿的鳗鱼从马鬃上纷纷落下。他又像起螺丝钉似的海鸥，捉一条小鳗鱼是很难，若要抓较大的就困难了。这时，那个男人掰开黑马的嘴巴，用一根木头撑住它的牙齿，让这匹老马张嘴大笑，把他毛茸茸的胳膊伸进去，抓住、捏牢，和我在衣柜里住、捏牢一样。他也和我拽出漆皮腰带一样地往外拽。他每次拽两条，在空中一甩，啪的一声打在石头上。这时，我可怜的妈妈又把吃下去的早餐吐了出来，牛奶咖啡、蛋白、蛋黄，还有一点果酱和白面包碎渣儿，十分丰盛。海鸥一见，马上倾斜身子，降下一层楼的高度，展翅俯冲，叫声更是不用提了。海鸥的眼睛凶光毕露，这是大家都清楚的，而且决不会让人把它们赶走。扬·布朗斯基赶不走它们，他本就怕海鸥，双手捂住了稚气的蓝色的大眼睛。它们也不理睬我的鼓声，它们当我狂怒而又激动地敲出一些新型节奏的时候长驱直入。但我可怜的妈妈什么都顾不上了，她手忙脚乱，不停地用手抠，可什么也吐不出来了，因为她吃得并不很多。妈妈要保持苗条的身材，但她每周两次的体操练

习并没有什么作用，因为她偷偷地吃，而且总能找到摆脱决心的理由，就像从新航道来的那个家伙，不管什么理论上的推断，即使在场的人都认为再也掏不出什么来时，他也从马耳朵里拉出一条鳗鱼来，作为压轴戏。鳗鱼在马脑子里翻腾全身白糊糊的。它被那人甩了很长时间，直到白糊糊全数脱落，露出了鳗鱼的漆皮，和漆皮腰带同样闪闪发光。我要顺带说一句，道罗泰娅姆姆系的就是这样一根漆皮腰带，在她不别红十字，穿普通衣服外出时。

虽然马策拉特还想留下，我们已转身回家了，因为一艘大约一千八百吨的芬兰船入港，掀起了波浪。马头被那个家伙留在防波堤上。紧接着，马头一片白，并且大喊大叫。但不像众马嘶鸣似的喊叫。倒象一片云在喊叫，嘴馋贪食，笼罩住一个马头。当时，人们看了这景象放松了很多，因为再也看不到马头了，即使可以去想象这疯狂的一群下面隐藏着什么。那艘芬兰船也把我们的注意力分散了，船身像萨斯佩公墓的铁栏杆那样生了锈，船上装载着木材。我可怜的妈妈受够了，她既不回头看芬兰船，也不去看海鸥。尽管过去她在我家的钢琴上不仅弹过而且唱过《小海鸥飞往赫尔戈兰》，但自那以后她再也没有唱过这首歌，也没有唱过其他任何一首歌。开始她不再吃鱼，但从一个美好的日子起，她又开始吃许多肥鱼，直到她无法再吃。不，她有意把自己不弄到腻烦的地步，不只对鳗鱼，也对生活，尤其对男人，或许也包括我，她都腻烦了。不管怎么说，过去她是什么也不能放弃的，却突然知足了，有节制了，让人将她埋葬在布伦陶。而我呢，一方面什么也不想放弃，另一方面，即使什么都没有我也能活下去，这一点可能从她那遗传来的。不过，惟独缺了熏鳗鱼，我不能活下去，即使现在是那么贵。同样缺了道泰娅姆姆也不行，只是我从未见过她，她的漆皮腰带我也觉得非常普通，然而我再也摆脱不了这条腰带。它没完没了，甚至变出许多条来。于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是我用空着的那只手解开裤子扣子，使道罗泰娅姆姆的形象重新清晰，不再被漆皮鳗鱼和芬兰船弄得模糊不清。

在海鸥的帮助下，停止了旧病复发，从港口的防波堤逐渐回到了道罗泰娅姆姆的世界中去，至少回到衣柜的那一半中来，这里有她的空空的却吸引人的职业服装。我终于清楚地看到了她的脸时，簧舌从损坏的糟里滑出，吱呀一声柜门大开。突如其来的光亮想要激怒我。我生怕弄脏了旁边挂着的道罗泰娅姆姆的带袖围裙，因而手忙脚乱。

我做了多年来不再做的游戏，仅仅为了造成一个必要的过渡，也为了缓解在衣柜里逗留时那种始料未及的紧张与疲劳，在衣柜干燥的后壁上多少灵巧地敲出若干松弛的节拍，然后离开柜子，再次检查衣柜有没有被弄脏，一点儿未发现需要自责的地方，甚至连漆皮腰带也还是光洁的，唔不，有些发暗，呵口气将擦得它恢复原状，能让人联想到鳗鱼，就是那些我少年时代别人在新航道的港口防波堤上捉到的鳗鱼。

我随手把那个从头到尾注视我的四十瓦灯泡关掉，离开了道罗泰娅姆姆的房间。

克勒普

我在走廊上站着，有一团浅金色的头发装在皮夹里。我尽力透过皮革、上装衬里、背心、衬衫和汗衫去感触到这一团头发有一秒钟之久，但是我太疲乏、太满足了，而这满足又是以那种特别的快快不快的方式得到的，因此我只把它看做是梳子梳下的脱落的头发，而无力把我从小间里偷来的它想成别的模样。

我这时才承认曾寻找过别的珍宝。我在道罗泰娅姆姆的房间里逗留的时候，曾想证实那个韦尔纳博士在房间的某处存在着，即使通过那些我所熟悉的信封来证实。但没有任何迹象。没有写

过的信纸也没有信封。我承认，曾把道罗泰娅姆姆的侦探小说从放帽子的那一格里一本本地抽出来，翻一遍，检查题赠与书签，注意有没有夹着照片，因为我认得大多数马利亚医院医生的面孔，却没发现有韦尔纳博士的照片。

也许，韦尔纳博士不知道道罗泰娅姆姆的房间。即使他见到过它，也没有留下痕迹。我本该有足够的理由高兴的。难道我不是领先于那位博士很大一段距离了吗？难道小间里没有那位医生的痕迹不是恰好证明，医生和护士之间的关系仅限于在医院里，是公务性质的，即使不是公务性质的，也只是单方面的？

但我要给自己的嫉妒心找一个动机。要是韦尔纳博士留下任何痕迹，那会给我沉重的打击，和同样程度的满足。然而，这种满足是不能与我在衣柜里逗留而产生的微小的、短暂的结果相提并论的。

我现在只记得听到在走廊另一头关住某个叫闵策先生的房间的那扇门后边，传来一阵伪装的只为引起别人注意的咳嗽声，却忘了我是如何回的房间。那位闵策尔先生跟我毫无关系。刺猬的女房客已经够使我费神了。我不要给自己增加一个负担。何况，谁知道闵策尔这个姓名背后藏着的是什么。所以，这阵有求于人的咳嗽声我听而不闻，明确地说，我不懂得人家究竟要我干什么。我回到自己的房间里之后才明白，跟我一点儿不相干也不认识的那位闵策尔先生连连咳嗽，是要诱使我，到他的房间里去。

因为我觉得自己的房间太狭窄了，但同时却又十分宽敞，因此，跟不停咳嗽的闵策尔先生聊一会儿，即便是累赘，是不得已而为之，也会令我感到欣慰，所以我由于对那阵咳嗽声没有作出反应而久久感到遗憾。可是，我没有勇气当场或者事后在走廊里故意咳嗽几声，同走廊另一头房门后面的那位先生建立联系，而是情不自禁地把自己交给屋里那把厨房椅子坚硬的直角，正如我一坐到椅子上就会处于这种状态那样，立刻变得激动不安，并从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床上抓起一本医学参考书，接着又扔下这本用我当模特儿挣来的血汗钱买来的、价钱昂贵的厚书，弄得它满是褶印。我抱住又从桌上取下拉斯科尼科夫送的铁皮鼓。既没有办法用鼓棒去敲铁皮，也没有淌下落到白漆圆面上，发出无节奏的宽慰声的眼泪。

现在可以对比一下击鼓的、总是三岁的奥斯卡和驼背、失去声音、无泪无鼓的奥斯卡。论失去的清白。这可是不合实际，我还是鼓手时就已经多次失去清白，但因为清白好比杂草，不断滋生蔓延，事后又再次得到它，或者让它重新长出来，所有清白的祖母全都曾经是堕落的、充满仇恨的婴儿就行啦。算啦，我不想让罪过与清白的游戏产生在厨房椅子上。虽说库亨教授跟我约定的时间是下午晚些时候。倒不如说是对道罗泰娅姆姆的爱吩咐我离开房间、走廊、蔡德勒的套间，到艺术学院去。

我情不自禁地出了房间，踏进走廊，尽力把套间的门打开，弄出很大声响，又等了一会儿，没听到闵策尔先生的门后有动静。他没有咳嗽，我则羞愧，愤怒，满足，饥饿，即厌烦生活又饥渴地需要生活，忽而微笑，转而近乎哭泣，于是离开了寓所和尤利希街的房屋。

几天以后，我着手实行一项盘算已久要不是连细节都准备就绪，我肯定不会认为它是个好办法的计划。那天整个上午直到下午三点我没有工作，然后同乌拉一起给极富想象力的画家拉斯科尼科夫当模特儿。我扮演回到家乡，送给珀涅罗珀一个驼背的奥德修斯。我曾努力劝说这位艺术家放弃这个想法，但是没起作用。因为当时，他画希腊的神和半神获得成功。乌拉也觉得待在神话世界里非常自由。我只好放弃。他先把我画成火神伏尔甘，又画成冥王普路托同普洛塞庇娜，最后，在那一天下午，他把我画成驼背奥德修斯。可是，对于我来说，重要的是描写那天的上午。因此，我就不告诉各位缪斯乌拉扮作珀涅罗珀后相貌怎样，而要讲一下我的事。刺猬带着他的理发器正在推销旅行途中。蔡

德勒寓所里非常寂静。道罗泰娅姆姆上白班，六点钟即已离家。八点刚过，邮件送到时，蔡德勒太太没起床。我立刻去看邮件，两天前刚收到过玛丽亚的信，没我的，可是我第一眼就发现一个在本市投寄，由韦尔纳博士写的信封。

我先把这封信跟给闵策尔先生和蔡德勒夫妇的信一起放下，回到自己的房间里，等到蔡德勒太太到在走廊里，给房客闵策尔送去的他的信，然后进厨房，最后回卧室。十分钟后因为她在曼内斯曼公司办公室的工作九点开始，她离开套间和楼房。

我为保险起见，再等一等，装着镇静，故意慢吞吞地穿衣服，洗净手指甲，随后才决定行动。我走进厨房，在三焰煤气灶最大的一个燃烧器上放上半铝锅的水，先用大火烧，水刚煮沸，把开关拧到最小位置。我仔细看管住我的思想，让它尽可能在正要做的事情上集中，迈出两步到了道罗泰娅姆姆的小间前，从乳白色玻璃门下面的门缝里，拿起蔡德勒太太只塞进一半的信，又回到厨房，把信封背面放在水蒸汽上熏，到我可以把它拆开而不造成损坏为止。我壮着胆子把信举到已经关掉煤气的锅上。

我在自己的床上躺着，而非厨房里读医生的信息，我由于信上的称呼和结尾的套语都没有泄露医生与护士间究竟是何种关系感到失望。

“亲爱的道罗泰娅小姐！”这是称呼，落款是：“您的恭顺的埃里希·韦尔纳。”

信的正文中也没有一句明显的温情脉脉的话语。韦尔纳惋惜前一天，虽然他在男子私人病房区的双扇门前见到过她但没能跟道罗泰娅护士说话。她看见医生在同道罗泰娅的女友贝亚特姆姆说话，就转身走了，韦尔纳博士却不知为什么。韦尔纳博士仅仅因为他本人同贝亚特姆姆的谈话是纯公务性质的请求澄清此事。如道罗泰娅姆姆所知，他始终努力同不太能控制自己感情的贝来特姆姆把距离拉开。道罗泰娅必须理解这是不大容易做到的，幸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好她是了解贝亚特的，贝亚特总是无所顾忌地表露自己的情感。他，韦尔纳博士，自己从未对此有过任何表示。这封信的最后一句话说：“请您相信我不管什么时候都会向您提供同我交谈的可能。”虽然那几行字是冷冰冰的客套话，甚至狂妄自大，我还是畅通无阻地一眼看透了埃·韦尔纳博士这封热情的情书的文风。

我不再小心翼翼，只是机械地把信纸装进信封。韦尔纳也许用舌头舔湿过的涂胶层，我现在用自己的舌头再把它舔湿，随后开始大笑。紧接着我用巴掌轮换着拍自己的前额和后脑勺，拍着拍着终于右手离开前额转到门把手上去，打开门。我走进走廊，把韦尔纳博士的信半插到用木板和乳白玻璃锁住我所熟悉的道罗泰娅姆姆的小间的那扇门底下。

我一个或两个手指搭在信上还蹲着时，听到了从走廊另一头的房间里传来了闵策尔先生那慢吞吞的、像是为让人记录下来而强调着的呼唤声的每一个字的声音清清楚楚地问：“啊，亲爱的先生，请您给我取些水来好吗？”

我心想，这个人大概病了，站起身来又想，门后的这个人没有病，是我说服自己相信他病了。因为单凭一声无缘无故的呼唤声是不可能诱使我走进一个素不相识的人的房间里去的，这是我送水给他的好理由。

我首先想到把帮我拆开医生信的铝锅里的仍然温和的水给他送去。但马上我又把这用过的水倒进洗涤盆，把新水放进锅里，端着锅和水走到那扇门前。门后响起了闵策尔先生的声音，表示要我只带水去。

克勒普特特有的气味在敲开门进屋后迎面扑来，假如我说这气味是酸的，我也就没有讲出它还有极甜的成分。除了护士小间的醋味空气外，再没有别的可以同克勒普周围的空气作类比了。它也不是酸甜的。那位闵策尔先生或者克勒普，一个胖而懒的、却又不是不能动弹的、迷信的、爱出汗的、不洗澡的、却又

不是腐臭的、一直快死而又死不了，过去和现在身上都有一股死尸味道的长笛手和爵士乐单簧管手。他一直在抽烟，口含胡椒薄荷来排除大蒜的臭味。他始终都散发着、呼出这种气味，在疗养院的探视日用这股气味袭击我，随之带来人生的乐趣和稍纵即逝的一切。他离开时总有一套烦琐的动作，预告下次再来。布鲁诺在他走后，总是不得不把窗户打开，让空气对流一下。

今天，我卧床不起。当时，在蔡德勒的套间里，克勒普总在满床的残剩物品中。他心情特好，散发着臭味。床上在他够得着的地方，放着一个老式的、很像是巴洛克式样的酒精炉，几瓶橄榄油，软管西红柿酱，十二包面条，倒在报纸上的受潮的盐，一箱温热的瓶装啤酒。一小时以后他可以跟我亲密交谈时告诉我他躺着往空啤酒瓶里小便，随后盖上多半是满满的、容积正合他的要求的绿瓶子，放到一边，同的确盛啤酒的瓶子严加区分，当他想喝啤酒时，就不会有拿错瓶子的危险。要是他还有一点进取精神的话，他本来是可以在水池子里小便的，但他太懒，自己妨碍自己站起来，否则，他是可以从费了这么大气力布置的床上起来，用他煮面条的锅去打新鲜水的。

他始终用同一锅水煮面条，像保护眼珠一样地保护多次滗掉水、越来越稠的汤，他还靠着储存的空啤酒瓶保持水平姿势，经常连续卧床四天以上。但当面条汤煮成咸浆糊时，他就处在紧急情况之下。虽然他能让自己挨饿，但当时他还没有这样做的思想准备；看来他的苦行从一开始就规定一个周期为四到五天，否则，给他送信的蔡德勒太太会给他一个更大的面条锅以及跟他储存的面条等量的储存水，使他更加不依赖于他的环境。

克勒普在我偷看信的那天已经不依赖周围环境卧床五天了。残剩的面条汤稠得已经可以用来贴广告了。这时他听到走廊上我的不坚定的、为道罗泰娅姆姆和她的信而迈出的脚步声。在我读到韦尔纳博士冷漠之中饱含激情的情书的那一天，在他了解到我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对于为招呼人而故意装出来的咳嗽声不予理睬之后，他只能大声对我说：“啊，亲爱的先生，请您给我取些水来好吗？”

我于是把锅里的温水倒掉，拧开水龙头，让哗哗流水盛满半锅，加了一些后，把新鲜水给他送去。我当真是他所推测的亲爱的先生。我自我介绍自称石匠和刻字匠马策拉特。

他也礼貌地把上半身抬起一些，自称爵士乐演奏家埃贡·闵策尔，但因为他的父亲已经使用了闵策尔这个姓，请我叫他克勒普。我宁愿自称科尔雅切克或干脆叫奥斯卡，我用马策拉特这个姓是由于谦卑，而且只在极少情况下才决定用奥斯卡·布朗斯基这个姓名，所以很理解他的这种愿望。因此，对我来说，简单地叫这个肥胖的年轻人克勒普，是没有什么困难的。他可能有三十岁，或者更小。因为科尔雅切克这个姓对他来说实在太费劲了，他叫我奥斯卡。

我们一开始稍有拘束地聊起那些极轻松的话题。我想知道他是不是认为我们的命运是不可改变的。他同意我想知道他是不是认为所有的人都得死，他也肯定，但不敢肯定所有的人是不是都必须被生出来。他谈到自己时就像谈一个错误地出生的本不该出生的人，我感到自己同他差不多。我们两人也都相信天。可是，他谈到天时，却让人听到一种幸灾乐祸的笑声，并在被子下搔痒。别人可以想像，克勒普先生在活着的时候已经把他将来到天上去实行的不正经的事情设计好了。我们进而谈政治时，他似乎很激昂，像是要马上授予他们尊严、王位和权势，向我列举了三百多个德意志王室的姓氏，并把汉诺威地区授予不列颠帝国。当我问及前自由市但泽的命运时，他很遗憾不知道在哪儿。但这不要紧，他当场建议派一名比利时伯爵去当这个他不知道的小城的君主。据他说，这位伯爵是扬·韦伦的直系后裔。最后，当我们给真理这个概念下定义并且取得许多进展的时候，我机灵地见缝插针，提了几个问题并获悉克勒普先生在蔡德勒家当房客、付租

金已有三年之久。我们相见恨晚。我责怪刺猬没有把这位卧床者的情况详详细细告诉我，他同样也没有想到，而只告诉我：乳白玻璃门后面住着一位护士。

我不想马上让闵策尔先生或克勒普来替自己分忧。我不向他打听那位护士，却先关心起他的情况来了。“顺便问一声”，我插进这样一个问题，“您身体好吗？”

克勒普再把上半身向上抬高一点。他看到自己不能构成一个直角时，又让身子躺下去，然后告诉我，他卧床是为了弄清楚他的身体到底有没有问题。他希望在数周内将会看到，他的健康状况正常。

然后谈到了我以为能够借助于长时间的、东拉西扯的谈话来阻止的事情。“啊，亲爱的先生，请您同我一起吃一份面条吧！”就这样，我们一起吃用我拿来的新鲜水煮的面条。我不愿让他把那个黏糊糊的锅给我，由我在水池子里彻底洗一遍。克勒普一声不吭翻身侧躺着，用梦游者似的有把握的动作煮面条。他细心地把水滗到一只较大罐头筒里，上身的姿势几乎不改变，伸手到床底下，取出一只油腻的、满是干结的剩西红柿酱的盘子，犹豫片刻，又伸手到床下，取出揉皱的报纸，擦了一遍盘子，再把报纸塞到床下，朝脏盘子上仿佛要吹掉最后的一点尘土似的吹口气，随后以慷慨大方的手势让我接住全世界最脏的盘子。

我请他先给自己盛，再给我盛。他把脏得粘手指的餐具给了我，使用汤匙和叉子把近一半的面条撩到我的盘子里，姿势优雅地用手向面条上挤出长长一条西红柿酱，画成图案，又浇上很多油，接着在煮面条的锅里也加上同样的佐料，在两份面条上洒胡椒，在他自己那份上又多洒了一些，用目光示意，要我跟他那样把我的一份调拌一下。“请您原谅，亲爱的先生，我这里没有巴马干酪粉。进餐愉快！”

我至今仍不清楚自己是怎样硬着头皮动起匙和叉来的。但非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常奇怪，我觉得这顿饭味道极好。从那天起，克勒普煮的面条几乎成为我衡量我面前的每一份饭的美味价值的标准。

我一边吃面，一边不引起他注意却又仔细地观察着这位卧床者的房间。房间里最引人注目的是天花板下面墙上一个开着口的烟囱的圆孔，洞里冒着黑烟。窗外在刮风，风经常把煤灰云团由烟囱孔刮进克勒普的房间里来。煤灰落在家具上，像举行隆重的葬礼。放在房间中央的那张床以及蔡德勒家的用包装纸盖上的、卷起来的地毯就是所谓的家具。由此可见，在那间房间里被弄黑的只有原是白色的床单、克勒普脑袋下的枕头和一条毛巾，他在阵风把煤灰云团刮进屋里来时，就用它把自己的脸挡住。

同蔡德勒家的起居室和卧室的窗户相同，房间的两扇窗都朝着尤利希街，正对着公寓正面前那棵栗子树蒙上灰的绿叶。用以装饰的只有用图钉钉在两扇窗户之间的一幅画。这很明显是从画报上撕下来的是英国伊丽莎白的彩色肖像。画下方的衣钩上挂着一支蒙着一层煤灰，凑合还能看出它那苏格兰大方格图案的风笛。我看着那张彩色图片，想着的不是伊丽莎白和她的菲利普，而是站在我与韦尔纳博士之间的、有些不知所措的道罗泰娅姆姆。克勒普这时告诉我，他是英格兰王室的忠诚而热情的追随者，所以他以前跟英国占领军的一个苏格兰团的风笛手上过课，特别因为这个团的指挥官就是伊丽莎白本人。克勒普在一部每周新闻片里见到过伊丽莎白视察那个团。他身穿从头到脚都是方格图案的苏格兰短裙，让人疑惑的是，我心中的天主教精神却自己表现出来了。我对伊丽莎白是否懂得风笛音乐表示怀疑，也谈了几句信奉天主教的玛丽亚·斯图丽特的屈辱的结局。总之，我让克勒普明白，伊丽莎白不懂音乐。

这位被我期待着会暴跳如雷的保皇党人却像一个自以为无所不知的人那样微笑着，我要说一下以便让他估测出被胖子称作小男子的我，在音乐方面是否有判断力。

我一直凝视着同我交谈，无意中激发了我心中的火花的克勒普。这火花闪过大脑直到驼背。这让我感到我从前所有的、敲坏的、处理掉的铁皮鼓在欢庆它们的末日审判。被我扔进废铁堆的千百只以及被埋葬在萨斯佩公墓的那一只铁皮鼓，全都新生了，毫无破损地欢庆复活，隆隆的回荡在我的胸中，赶着我从床沿上站起身来。我请克勒普原谅并等一小会儿后，便被复活的鼓拉出房间，拽我经过道罗泰娅姆姆小间的乳白玻璃门，门下还插着那封露出了半截的信。复活的鼓鞭策我走进自己的房间，向画家拉斯科尼科夫在画《四九年圣母》时送给我的那只鼓走去。我挂好鼓，拿起两根鼓棒，转过身去，走出我的房间，在那该诅咒的小间旁一跃而起，像一个长久迷航后返回的幸存者似的跨进克勒普的煮面条厨房，一点儿也不客气地坐在床沿上，挪正红白漆铁皮，先在空中耍弄鼓棒，的确还有点不好意思，不正眼看吃惊的克勒普，然后敲了一下。啊，铁皮给了我一个答复，我紧接着敲第二下。我开始正规地敲鼓，最开始是始初之日，电灯泡之间的飞蛾把我诞生时辰的鼓声擂响；我把十九级地窖楼梯和人家庆祝我的传说般的三岁生日时我从楼梯上摔下来敲了出来；我敲出了佩斯塔洛齐学校的课程表，带着鼓爬上塔楼，待在政治演讲台下，敲出鳗鱼与海鸥，耶稣受难日拍地毯；我敲着鼓坐在我可怜的妈妈一头小的棺材旁，又在鼓上敲出赫伯特·特鲁钦斯基布满伤疤的后背；当我在铁皮上擂起黑维利乌斯广场上波兰邮局保卫战时，我觉察到我所坐的床的床头纹丝不动，瞥到克勒普坐直了身子，从枕头下面取出一支可笑的长笛，放在嘴边，吹出很甜却又十分不自然的音响，同我的鼓艺特别合适；我于是领他到萨斯佩公墓去见舒格尔·莱奥并和他跳完一支舞；我又在克勒普面前，为了同他一起，让我第一个恋人的汽水粉泛起泡沫；我甚至带他进入莉娜·格雷夫太太的热带丛林，还把蔬菜商格雷夫的能吊起七十五公斤的大型擂鼓机敲得隆隆作响；我吸收克勒普入贝布拉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的前线剧团，让我的铁皮发出耶稣的声音，施丢特贝克和全体撒灰者在鼓声中冲着下面坐着的卢齐从跳水塔上跳下；我让蚂蚁和俄国兵占领我的鼓，但没有再次领克勒普去萨斯佩公墓，让他看我把鼓向马策拉特扔去，而是敲出了我的伟大的，永无休止的主题：卡舒贝土豆地，天降十月雨，地上坐着我身穿四条裙子的外祖母；这时，我由于听到了在雨中从克勒普的长笛里传出不连贯的十月雨声，在我外祖母的四条裙子下，发现了纵火犯约瑟夫·科尔雅切克，并且证实和庆祝我可怜的妈妈的产生；差点把心变成了石头。

我们把我的外祖父在木筏上的逃跑充分地变奏了一番，用颂歌暗示这名纵火犯有希望奇迹般地被救，从而把我们的合奏结束，稍觉疲惫，但却幸福，这一共持续了几个小时。

克普勒在最后一个音还没完结时，从他躺够了的床上一跃而起。尸臭味随之飘来。他把窗户打开，把烟囱孔用报纸塞住，扯下并撕碎英国的伊丽莎白的彩色画片，宣布保皇党人的时代结束，让水从水龙头里哗哗流进水池。克勒普开始从头到脚洗身。或者说是洗礼。他洗完后，放掉池子里的水。他赤条条，肥胖，满墩墩的抱起我来，那个可恶的家伙斜挂着，站在我的面前，伸直双臂把一直都年轻的我举起来。这时，他胸中爆发的笑声的声浪撞击天花板。我和克勒普因为他和我的鼓的复合而亲吻面颊互相祝贺。

那晚，我们一起出去吃血肠洋葱，喝啤酒。克勒普建议我同他一起成立一个爵士乐队。虽说我请他让我利用一段时间考虑，但我已经决定不仅要放弃在石匠科涅夫那里刻字的职业，并且不再同缪斯乌拉一起去当模特儿，我要加入克勒普的爵士乐队做一名打击乐手。

在椰子纤维地毯上

当时，克勒普因为我为他提供了从床上起身的理由而高兴至极，从霉臭的被褥中一跃而起，洗礼后焕然一新，并且说：“太好了！”又说，“我可以从人世间得到好处！”今天，成了卧床者的我可以确定地说，普勒普要因为当初我传他离开了他那面条厨房里的床而报复我了。

我必须洗耳恭听他有关爵士音乐的乐观主义宏论，和音乐共产主义宣言，对他每周一次来探望我感到满足，因为他卧床不起时，是个忠诚拥护英格兰王室的保皇党人，但在我夺走了他的床以及他的风笛和伊丽莎白后，他马上成了德国共产党缴纳党纲的党员。喝着啤酒，吃着血肠，同时向站在酒柜前细看酒瓶商标的没有危险的小人物们讲述，全日工作的爵士乐队和苏联农庄都是使人幸福的团体。这些活动仍是他的一项不合规矩的业余爱好。

现在，一个从睡梦中惊醒的人很难在社会中找到机会。克勒普一旦离开了他藏身的床，他就会成为在被宣布为非法后更具有吸引力的同志。爵士乐狂是为他提供的第二种信仰。第三，他这个受洗的新教徒可以改宗到天主教。

克勒普还保留着通往各种信仰的道路。他的黝黑油亮的肉身以及他的靠掌声维持的幽默感给他开了一张药方，他竟按照它的灵活的原则把马克思的学说同爵士乐的神话融汇在一起。如果有那么一天有一个还是新奥尔良爵士乐唱片的收藏者的工人神甫之类的左翼神甫拦住了他的去路的话，那么，这个马克思主义爵士乐狂从那一天起便会去领圣体，把他身上的臭气同新哥特式教堂的合成一种。

克勒普这小子正用生活是何等温暖之类的诺言诱使我下床。他反复向法院递交申请书，还同我的律师携手合作，要求法院再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一次开庭审理我的案子。他因为嫉妒我躲在床上而想让我从疗养院里放出来。

但，我对于在蔡德勒家当房客的时候使一位卧床朋友变成直立的、踏着沉重的脚步到处奔跑的朋友并不后悔。我的私人生活除了我心情沉重地奉献给道罗泰娅姆姆的那些钟点以外倒是毫无忧虑的。“嗨！克勒普！”我拍拍他的肩膀说，“让我们成立一个爵士乐队吧！”他拍着我的驼背说。他爱它几乎如同爱他的肚皮。“我和你，我们要成立一个爵士乐队！”克勒普向世界宣告。“只是我们还缺一个像样的会弹班卓琴的吉他手。”的确如此。在长笛和鼓之间还需要奏第二旋律的乐器。即使纯粹从乐队的外观上讲要有一种低音弹拨乐器的话也很好，但低音乐器手当时已经很难找，于是我们便努力去寻找那个没到的吉他手。我们常去电影院，每周拍两次照，一边喝啤酒，吃血肠加洋葱，一边用护照相片搭配出各种无聊游戏来。当时，克勒普轻率地送了一张自己的照片给刚认识的红头发的伊尔丝。而且还一定要和她结婚，但做了这些，我们还是缺少吉他手。

在艺术学院当模特儿的工作使我领略了杜塞尔多夫旧城的牛眼形玻璃窗以及它的乳酪加芥末，啤酒气味和下莱茵河的颠簸。但真正了解这些是我在克勒普身边到处寻找吉他手的时候，在兰贝图斯教堂周围地区，在全部的小酒馆里，尤其在博比奏乐伴舞的拉亭街“独角兽”。右手少了一个手指的出色的打击乐手博比有时让我们上台演奏铁皮鼓和长笛，并为我喝彩。

虽然没有找到吉他手，我却得到了一些熟悉在“独角兽”演出的机会，还有我过去在前线剧团的经验，本来可以在短期内成为一个勉强过得去的打击乐手的，罗泰娅却把我阻挡住了。

幸好我的一半思想没有全倾注在我的铁皮鼓上，而另一半思想一直在她身上，否则一定非常痛苦。我的思想总是从铁皮鼓开始，在道罗泰娅姆姆项饰上结束。克勒普了解这一点，他经常非

常有经验地用长笛填补我无心击鼓时留下的空白。每当他看到我一半思想走神时，就关心地说：“你是不是饿了，我给你要一份血肠吧！”

克勒普相信，用一份血肠就能医治任何在背后总有一种饿狼般饥饿的苦恼。在那段日子里，我吃了特别多新鲜血肠加洋葱圈，还喝了不少啤酒，这一切都为了让克勒普相信，我不是因道罗泰娅姆姆而是因饥饿苦恼。

我们经常在清晨离开尤利希街蔡德勒的寓所到旧城用早餐。我只有在我们没钱买电影票时才去艺术学院做模特。其间，缪斯乌拉已经第三次或者第四次同画师兰克斯订了婚，她因为得到了工业界委托给他的第一批大任务而不得脱身。没了缪斯的我没有兴致独自一人去当模特儿。人家又画被抹黑的我一人。就这样，我便一心一意的跟我的朋友克勒普相好，因为在玛丽亚和小库尔特那里，由于她的上司兼已婚的追求者施丹策尔每天都在那而整晚不得安宁。

一九四九年初秋某日，克勒普和我走出各自的房间，大约在走廊上乳白玻璃门前碰头，当我们正要带着乐器离开寓所时，蔡德勒把他的起居室兼卧室的门打开了一条缝，向我们打招呼。

他请我们把一条他推到我们面前的卷起的窄而厚的地毯铺上钉牢。这是一条长八米二十的椰子纤维地毯。但蔡德勒寓所的走廊长七米四十五。所以克勒普和我必须把地毯剪掉七十五厘米。我们坐着费力地剪椰子纤维地毯。结果，我们多剪掉了两厘米。地毯的宽度同走廊的宽度恰好一样。弯不下腰的蔡德勒请我们一起把地毯钉在地板上。我建议在钉的时候把地毯抻一下。于是，那缺的两厘米差不多也给补上了。因为椰子纤维地毯编织得不密，我们用的是宽平头钉子，窄头钉子是钉不牢的。我和克勒普都没有伤到自己的大拇指。可我们却敲弯了一些钉子。这只怪蔡德勒备有的钉子质量不行，那是币制改革以前的货色。我们在椰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子纤维地毯已经有一半钉牢在地板上时，放下锤子，交叉成十字，抬头望着目光虽然不是咄咄逼人，却也满怀期待的监督我们干活的刺猬。他也钻进他的起居室兼卧室去并从他贮存的利口酒杯里取出三个回来和一瓶双料谷类酒，我们为椰子纤维地毯的经久耐用干杯，随后又不是咄咄逼人而是满怀期待地望着他，想告诉他椰子纤维地毯使人口渴。双料谷类酒不停地斟到刺猬的三个利口酒杯里去。这些酒杯大概也非常高兴，直到它们因为刺猬又为他的太太而突然大发雷霆被摔成碎片为止。先是克勒普故意把利口酒杯摔到椰子纤维地毯上，玻璃杯没有碎，也没有声音。我们大家都说椰子纤维地毯真柔软。从起居室兼卧室里观看我们干活的蔡德勒太太同我们一样，因为这地毯能保护落下的利口酒杯免受破坏，也称赞起椰子纤维地毯来，刺猬一听便火冒三丈。他在还没有钉牢的那部分地毯上跺脚，带着那三个酒杯走进起居室兼卧室。我们听到玻璃柜的声音，三个利口酒杯他嫌不够，又多摔了好几个。紧接着我听到了熟悉的音乐，在我睿智的眼睛前浮现出蔡德勒家炉脚前是八只利口酒杯的碎片的连续燃烧炉，蔡德勒弯腰去拿铁皮畚箕和扫帚，以他的身份把他以刺猬的身份摔成的碎片扫成一堆。可是，尽管蔡德勒太太背后发出各种丁当的声响，她还一直待在门口。她对我们的工作尤其在刺猬发怒而我们又拿起锤子的时候特别感兴趣。刺猬没再出现，却把那瓶双料谷类酒留在了我们身边。我们拿起酒瓶，不停地往喉咙里灌。开始，我们当着蔡德勒太太的面还有些不好意思呢。但她亲切地向我们点头并不能打动我们，把酒瓶递给她，也让她喝一口。但我们很利索地把钉子一个接一个敲到椰子纤维地毯里去。当我在护士的小间前钉地毯时，每敲一锤，乳白玻璃门就丁当响一阵。这使我内心非常痛苦，只能在这充满痛苦的时刻放下锤子。刚过道罗泰娅姆姆的小间的乳白玻璃门，我的心情又好转了，锤子也听使唤了。任何事都有结束的时候，椰子纤维地毯也钉到了头。宽

头钉从一个角落排列到另一个角落，深深地钉到地板里面，钉子的扁平宽头恰恰露出在涨潮的、狂澜起伏的、构成旋涡的椰子纤维上面。我们不无得意地在走廊里来回踱步，享用着地毯的长度，对我们的工作夸奖了一番，并且指出，不吃早饭，空着肚子把椰子纤维地毯铺好固定住是非常难的。最后，蔡德勒太太终于踏上新的、童贞女般的椰子纤维地毯，跨过它走进厨房，给我们倒咖啡，在锅里煎荷包蛋。我们在我的房间里用餐，蔡德勒太太得去曼内斯曼公司上班了，急急忙忙走了。我们有些累了，打开房门，边吃边看，我们那一条如激流般涌来的椰子纤维地毯。

就在这条便宜的椰子纤维地毯上，我于当天夜里，第一次遇见了道罗泰娅姆姆。

将近午夜时，我把寻找吉他手的克勒普留在了旧城，灌满啤酒和血肠回到家里。我摸到了蔡德勒寓所的钥匙孔，踏上走廊里的椰子纤维地毯，走到黑洞洞的乳白玻璃门，走进我的房间，摸到我的床，脱去衣服，却找不到我的交给玛丽亚去洗的睡衣。我找到了那块铺地毯时剪下来的那一段七十五厘米长的椰子纤维地毯，我铺在床前作为床前地毯用。我躺在床上无法入眠。今天，我觉得自己找到了当时失眠的原因。我上床之前曾光着双脚站在我新铺的一段椰子纤维床前地毯上。椰子纤维粘到我的光脚上，扎进皮肤，进入血液，我躺下好长时间以后，还感到站在椰子纤维上，因为再没有别的事情比光脚站在椰子纤维地毯上更能令人不安、驱赶睡眠、促进思想活动了，所以我说什么都睡不着。

午夜过后，将近凌晨三点时，一直睡不着的我躺在床上却又似站在地毯上。这时，我听见走廊上两扇门打开了，克勒普没有找到吉他手，却灌了一肚子血肠回家来了，我知道，这不是克勒普。我继而想，反正躺在床上睡不着，却又感觉到脚底上椰子纤维在扎，还不如干脆下床，脚踏踏实实地站到床前的椰子纤维地毯上去。我这样做了，便产生了后果。我刚站到地毯上，这块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七十五厘米长的剪下的部分马上通过我的脚底心使我联想到走廊里那条长七米四十三的椰子纤维地毯。不论是因为我对这块剪下来的椰子纤维很同情，还是我以为听到走廊上两扇门的声响，是克勒普回来了，又不是，反正我弯下腰，由于没有找到睡衣，便抓住床前椰子纤维地毯的两个角，叉开两腿，直至双脚不再踩在地毯上而是踩在地板上，再把地毯由两腿间抽出来，举起这块七十五厘米的毯子到我赤裸的一米二一的身体前，巧妙地遮住光身子。于是，从锁骨到膝盖这一段都被椰子纤维的势力范围围住了。我向上提了提地毯走出漆黑的房间，走进漆黑的走廊，踩上那条椰子纤维地毯。

我在地毯的纤维刺激下，急忙迈开小步，想摆脱来自脚下的影响，救我自己，努力向没有椰子纤维铺垫的地方走去，走进了盥洗间，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同我房间一样黑洞的盥洗间被一名女士占用了。我的椰子纤维外皮也碰到了一个站着的人的膝盖。我没有打算离开盥洗间，因为我背后正受着椰子纤维地毯的威胁，可我前面坐着的那个人却要我退出盥洗间：“您是谁？想干什么？出去！”我前面的声音说，这肯定不是蔡德勒太太的声音。带着哭腔问：“您是谁？”

“好吧，道罗泰娅姆姆，您猜猜看！”我开了个这本该缓和我们相逢时淡淡的哀愁的玩笑。她却不合作，站起身来，在黑暗里伸手抓我，想把我从盥洗间推到走廊的地毯上去，但却在我的头上掠过，抓了个空，便往下抓到了我的椰子纤维围裙。她再次同其他女人一样好像一定得惊呼不可似的失声大叫起来。她把我错当成什么人了，由于道罗泰娅姆姆一阵哆嗦，低声说：“上帝啊，是个魔鬼！”逗得我不禁吃吃地笑。这本来毫无恶意，但她却以为是魔鬼的笑声，而我也并不爱听魔鬼这个词儿。当她怯生生地再次问“你是谁？”时，我便回答说：“我是魔鬼，前来拜访道罗泰娅姆姆！”她接着说：“上帝啊，为什么？”

我慢慢地深入角色，魔鬼也在我心中充当起提台词的人来了。“因为魔鬼爱道罗泰娅姆姆。”我说。“不，不，不，我反对！”她还在试图突围往前冲，却又撞在我的椰子服的纤维上，她穿着薄薄的睡衣，十个小手指也陷进了诱拐者的热带丛林里去，她因轻度虚脱全身软瘫往前倒下了。我赶紧把挡住身子的外皮高高举起兜住倒下的她，坚持到我作出一个跟我的魔鬼角色相符的决定。我后退几步，让她跪下膝行，但是注意不让她的膝盖接触盥洗间的铺砖地，而是碰到走廊里的椰子纤维地毯，然后把她身子朝后，头朝西，也就是冲着克勒普的房门，顺着地毯的方向倒下。她的一米六十多长的后背接触了椰子纤维地毯，我又把手里那块只有七十五厘米的纤维盖在她身上，从她的下巴开始，一直盖住了大腿的大部分。我又把地毯向上拉了十厘米，把她的嘴盖住，露出鼻子，使她可以不受妨碍地打鼾呼吸。这时，我自己也躺下来，倒在以前的床前地毯上，使千千万万纤维震动起来。我不愿同道罗泰娅姆姆直接接触，而是让椰子纤维起作用，同时又开始跟道罗泰娅姆姆说话。她稍微有点儿有些虚脱，低声说道：“上帝啊，上帝啊！”一再问我的姓名和来历。我自称魔鬼，操起魔鬼腔调吐出魔鬼这个词儿，依靠魔鬼的提示，把地狱形容成为栖身之处。这时，她在两条地毯中间打战。我在自己的床前地毯上做体操，震动着地毯，椰子纤维传递给道罗泰娅姆姆的感觉，和早年汽水粉传递给我所爱的玛丽亚的感觉相似，只是汽水粉能让我充分而有效地行事，在椰子地毯上我却丑态百出。我没有把锚抛出去。我这位小朋友在汽水粉年头里坚挺，目标明确，现在，在椰子纤维上，它却低垂着，小家子气毫无兴头，眼前无目标，要求它也不应，我的纯理智的游说术以及道罗泰娅姆姆的叹息都起不了作用。她在耳语、呻吟、哀求：“来吧，魔鬼，来吧！”我只有安慰她说：“他马上就来，马上就来。”我用夸张的魔鬼腔小声嘀咕。同时，我跟自从我受洗礼之日就寓居我心中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的魔鬼交谈。我呵斥他：魔鬼，别当游戏破坏者！我恳求他：求你别让我出丑！我奉迎他说你以前可不是这样的，想想既往和玛丽亚，要不就想想寡妇格雷夫，回忆一下在晴朗的巴黎我们两个同小巧玲珑的罗丝维塔开的那些玩笑吧！但他闷闷不乐又不怕重复地回答我说：我没有乐趣，奥斯卡。魔鬼一旦没有乐趣，德行就是获胜者。

我折磨着可怜的道罗泰娅姆姆的皮肤，渐渐乏力地运动着椰子纤维地毯，在她的“来吧，魔鬼，啊，来吧！”的请求声下，我在椰子纤维下面发起了一次无意义的、绝望的、无以说明动机的冲锋，我想用没有上膛的手枪击中黑靶。她也想给我帮忙，双臂从椰子地毯下挣脱出来，抱住了我，摸到我的驼背和根本不是椰子纤维的、温暖的人的皮肤，丢了她所想要的魔鬼，也不再吞吞吐吐地说：“魔鬼，来吧！”却清了清嗓子，用另一种腔调提出了开始时提出的问题：“老天爷，您是谁？到底想干什么？”此刻，我只得认输，承认我身份证上所写的名字，名叫奥斯卡·马策拉特，是她的邻居，深深地爱着她，道罗泰娅姆姆。

幸灾乐祸的人肯定会说，道罗泰娅姆姆一声臭骂，一拳将我从椰子纤维地毯上打翻。但是，奥斯卡虽说忧伤却又感到淡淡的满足，不是这样。道罗泰娅姆姆缓慢地、或者说是沉思地、犹豫地将两手和双臂从我的驼背上拿下，那动作就像无限悲哀的抚摩。她马上失声痛哭，但不是大哭大闹。我似乎没有任何感觉，她便从我和椰子地毯下面脱身了，也让我滑下来，走廊里的地毯淹没了她的脚步声。我听见门开了，钥匙被转动了，道罗泰娅姆姆房间门上六块乳白玻璃被屋里的灯光照亮。

奥斯卡显示了它们的真实性，盖着地毯躺着，地毯还留着魔鬼游戏时的温暖。我看着被灯光照亮的四方形。时而在乳白玻璃上掠过一身影。她现在向着衣柜去了，向梳妆台走去，我暗自说道，摇尾乞怜的尝试了一次。我身披地毯向房门爬去，指甲抠

住门板，抬起身子，举起一只乞讨的手，在最下方的两块玻璃前摇晃着。但是，道罗泰娅姆姆没有开门。她乐此不疲地在衣柜和带镜子的梳妆台之间徘徊。我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却不敢承认：道罗泰娅姆姆在收拾东西，逃避我。我甚至必须打消这个念头：她在离开小间时会让我看到她被灯光照亮的脸庞。起初是乳白玻璃后面黑下来，接着我听到钥匙在转动，门开了，鞋踩在椰子纤维地毯上。我伸手去抓，碰到了一只箱子，碰到了她的穿丝袜的大腿。顷刻，在她的衣柜中看见过的那双粗野的运动鞋中的一只此刻踢在我的胸口上，我被踢翻。奥斯卡又一次挣扎起来，恳求似地喊了声：“道罗泰娅姆姆！”此刻，套间的大门已上了锁，一个女人离我而去。

所有理解我的人都会这样说：上床去，奥斯卡。这件丑事发生以后，你还在走廊里干什么！凌晨四点。你赤条条地躺在椰子纤维地毯上，用一块纤维地毯勉强蔽体。手和膝盖都擦破了。你的心碎了，你把人丢尽了。你吵醒了蔡德勒先生。他叫醒了他太太。他们快来了，他们的房间的门已经打开，正看着你。上床去吧，奥斯卡，马上就到五点了！

当时，我躺在椰子纤维地毯上，我也这样劝自己。我非常冷，却还是躺着不动。我试图唤回道罗泰娅姆姆。我只能感觉到椰子纤维，连牙齿间也是这东西。一道亮光照在奥斯卡身上；蔡德勒家的门开了一道缝。蔡德勒的刺猬似脑袋上还有一个脑袋，夹满金属卷发夹，那是蔡德勒太太。他们看呆了，他咳嗽，她在笑，他喊我，我没理会，她又笑，他让她安静，她想知道我怎么了，他不同意，她说这里是体面的人家，她威胁说要解除租约，我还是沉默，因为还没有到无法忍受的地步。蔡德勒夫妇把门打开，打开了走廊里的电灯。他们瞪着凶狠的小眼睛向我走过来。他决定不再借利口酒杯来发泄，他居高临下的站在我身边，奥斯卡等待着刺猬发火，蔡德勒只好憋着一肚子气，因为楼梯间里有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声音，一把看不见的钥匙最终也找到了自己的归宿。进来的是克勒普，还带来了一个人，和他一样喝得醉醺醺的。这是那个终于被找到的吉他手——朔勒。

蔡德勒和他的太太，向奥斯卡俯身下去，抱起我，什么也不问，把我和那块撒旦的椰子纤维一同抬进了我的房间里。

克勒普将我的身子搓暖了。吉他手拿来我的衣服。两人帮我把衣服穿上，把我的眼泪擦干。窗外初现晨曦。克勒普替我把鼓挂上，将他的小木笛取出，抽泣。吉他手背上吉他。两位朋友一边一个，把我放在中间，领着哭泣的、缺乏自卫能力的奥斯卡，走出套间，走出尤利希街的房间，走向麻雀，使他摆脱椰子纤维的影响，领我在清晨的街道上行走，横穿过宫廷花园，走过天文馆，直到莱茵河岸边。灰色的莱茵河向荷兰流去，它驮着飘荡着洗换衣服的轮船。

在那个水气浓重的九月的早晨，长笛手克勒普，吉他手朔勒和打击乐器手奥斯卡从六点到上午九点，坐在莱茵河右岸，演奏音乐，配合熟练，共饮一瓶酒，向对岸的白杨眨眼睛，用快速欢乐、慢速哀怨的密西西比音乐伴随着从杜伊斯堡驶来、吃力地逆流而上的运煤船，为刚成立的爵士乐队找一个名字。

太阳将早晨的水气染成金色，音乐表露了对已过时间的早餐的要求，这时，奥斯卡站起来。他已经用鼓把自己同昨夜隔开，他从上装口袋中掏出钞票，这说明早餐有了着落，接着向他的朋友宣布新诞生的乐队的名称，“莱茵河三人团”。有了名称，我们便去共进早餐。

在洋葱地窖里

我们爱莱茵草地，酒馆老板费迪南·施穆也爱杜塞尔凯泽斯韦尔特和多夫之间的莱茵河右岸。我们常在施托库姆上面排练乐

曲。施穆带着他的小口径步枪在河岸斜坡的灌木和树篱丛中打猎。这是他的爱好和休闲。施穆在生意上一遇到不顺，就让他的妻子坐在梅赛德斯牌轿车的方向盘前。他们沿着河边行驶，把车停在施托库姆上面，稍作休息后他拿着枪走下来，拉着他的妻子走过草地，由于她原本宁愿待在汽车里。他让她留在河岸上一块可以让人舒服地待着的巨石上，自己隐藏在树中间。我们演奏我们的雷格泰姆音乐，施穆在灌木丛中打麻雀。

朔勒和克勒普一样认识旧城所有的酒馆老板，听到绿荫丛中有枪声，他就知道是施穆在打麻雀。

施穆已经死了，因此我的悼词用在这里再合适不过了：施穆是个好射手，也是个好心人，因为施穆打麻雀时，虽然他的上装的左口袋里装着小口径子弹，但是他的上装的右口袋里却满满地装着喂鸟的饲料，在射击以后。慷慨地把饲料大把大把地撒给麻雀吃，因为施穆一个下午最多只打十二只麻雀。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施穆还活着时，我们在莱茵河岸边排练已有数星期之后的一个清爽惬意的早晨，他故意大声地对我们说：“诸位在这里演奏音乐，吓跑了小鸟，让我如何打猎呢？”

“噢，”克勒普表示歉意，像举枪致敬一样举起他的长笛，“先生，您很有乐感，您在树篱间打猎时，那枪声正合上我们的曲调的节奏，十分精确。我向您致敬，施穆先生！”

施穆特别高兴，克勒普知道他的名字，可是他依然问克勒普是怎么知道他的名字的。克勒普显得非常不高兴：怎么会不知道呢？人人都知道施穆。在大街上常会听见有人讲：施穆走了，施穆来了，施穆今天在哪里？您刚才见到施穆了吗？施穆在打麻雀。

克勒普把他形容成路人皆知的施穆了。施穆递给我一支烟，问我们的姓名，表示想听我们演奏一首保留节目中的曲子，一首《老虎雷格》。他向他的太太示意，让她过来，那时她正身穿皮大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衣坐在一块石头上，望着莱茵河的波涛出神。她穿着皮大衣来了，于是我们又出色地奏了一曲《上等社会》。我们奏罢，她说：“费迪，这不正是你要为地窖找的吗？”原来他也是这么想的，也相信他找的是我们并且找到了，但先要算计算计，考虑考虑，一边非常轻巧地扔出几块石块，掠着莱茵河水面跳去。随后他提议说：在洋葱地窖演奏，每人每晚十马克，晚九时至凌晨二时，好吧，也就是十二马克吧！克勒普说要十七马克，让施穆出十五马克。但是施穆只给十四马克五十芬尼。我们就这样敲定了。

从街上看，洋葱地窖同那些新开的小饮食店一样，与老饮食店的惟一区别就是价钱贵。价钱贵的原因可以认为是由于这些大多数被称为艺术家酒馆的地方内部设备和布置特别，也由于这些酒馆的名称新颖，不起眼的如“水饺馆”，具有神秘的存在主义味道的如“禁忌”，火辣辣的如“辣椒”，还有“洋葱地窖”。

搪瓷招牌上“洋葱地窖”这几个字和十分幼稚可笑的一只洋葱，故意写得和画得特别笨拙。招牌按古德意志习惯，挂在正门前一个雕花铸铁架上。惟一一个镶有牛眼形玻璃，呈啤酒杯的绿色的窗户。一扇在糟糕的岁月里也许曾用来关闭某个防空洞的朱红漆铁门。门前站着一个守门人，身穿乡下式样的羊皮大衣。不是谁都可以进洋葱地窖的。特别是在星期五，一周的工资将化作啤酒的时候，旧城的兄弟们就被拒之于门外。对他们来说，洋葱地窖的价钱太贵了。允许进入的人，沿着朱红门后面的五级台阶走下去，便到了一个一米见方的平台，一张毕加索画展的海报把平台装点得独特而体面，再下一个四级台阶，对面就是衣帽间。一块硬纸板小牌子上这样写道，“请取时付款！”，衣帽间里的小伙子大多数是艺术学院蓄胡子的学员，在接待时决不事先收钱。洋葱地窖虽然价钱贵，可却是非常可靠、货真价实的。

老板眉飞色舞、手舞足蹈地亲自迎接每一位来客，仿佛每来一位客人他就得来一套宗教接客礼节。大家都知道，老板名叫费

迪南·施穆，有时去打麻雀，可是慧眼独具，摸透了币制改革后在杜塞尔多夫迅速发展起来的那个社交界。而在其他地方，则发展得比较缓慢。

洋葱地窖本来是一个有点潮湿的地窖，这也正好表明这家生意兴隆的夜总会的可靠性。我们可以把它想像成一个让人冻脚的面积大约四乘十八，由两个小圆铁炉供暖长条房间，当然这个地窖从根本上讲已不再是个地窖了。已被拆掉的天花板向上扩展到了底层住房。因此，洋葱地窖惟一的窗户是底层住房原先的窗户。不是地窖窗户。这稍微有损于这个生意兴隆的夜总会的信实可靠的面貌，使它有点名不副实了。如果能够让人由窗户向外望去，那也就不必镶牛眼形玻璃了。地窖向上扩展的部分还修了回廊，可以由一道鸡棚梯子上去，这梯子确是真正的原件，或许能够称洋葱地窖为信实可靠的夜总会，虽然地窖已不再是真正的地窖了。不过，为什么一定得是真正的地窖呢？

奥斯卡忘了说，通往回廊的鸡棚梯子并不是真正的鸡棚梯子，而是一种舷梯，因为可以用晾衣绳系住这个十分陡的梯子的两头。摇晃不定的梯子，使人联想到乘船旅行，这也把洋葱地窖的价钱提高了。

地窖的照明设备是矿工用的电石灯，放出碳化物气味。这又提高了价钱，并使洋葱地窖来客好像置身于某个钾盐矿在地下九百五十米处的一个坑道里：采掘工赤裸上身在岩石前干活，钻着一条矿脉，卷扬机吼叫，电耙铲盐，填满了排沟。在坑道拐向弗里德里希哈尔二号升降机的地方，一盏灯在摇晃。工头来了，摇晃着一只电石灯，说：“平安上井！”这盏灯同洋葱地窖墙壁上挂着的那些电石灯完全一样。这些灯用于照明，提高价钱，散发臭味，制造了一种独特的气氛。

座位是用普通的木箱，蒙上装洋葱的口袋，非常不舒服，木桌桌面擦洗得干干净净，好像引诱矿山来客入内的平和的农家，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这种情景有时也可以在影片里看到。

难道就是这些！酒柜呢？没有酒柜。领班先生，给一份菜单！既没有领班，也没有菜单，惟一提到的，就只有我们这个“莱茵河三人团”了。克勒普、奥斯卡和朔勒坐在鸡棚梯子下方，这原本是一个舷梯。他们九点到，取出乐器，十点左右，开始奏乐。不过，现在是九点刚过十五分，待一会儿再谈到我们也不晚。现在，施穆还得看看那些有时借以握住小口径步枪的手指。洋葱地窖客人一满，施穆老板便围上钴蓝色绸的印染着特别图案的方巾。谈到这一点，是因为围上方巾自有含义。印染的图案可称之为金黄色洋葱。只有施穆围上这块方巾时，洋葱地窖才可开始营业。

客人有：医生、商人、艺术家、律师、记者、舞台艺术家、电影界人士、知名运动员、州政府和市政府的高级官员，总之，全都是知识分子，携带夫人、女秘书、女友、女工艺美术师和男性女友。在施穆还没有把金黄色洋葱图案的方巾围上，他们就坐在蒙粗麻布的木箱上，把嗓子压低，吃力地近乎压抑地聊着。他们想交谈，但是谈不起来，想得好好的，一讲就离题；他们全都喜欢把憋在肝里的、填在肺里的、悬在心上的话全都讲出来。不通过大脑，让人看看赤裸裸的真人，看看事实真相，可是办不到。这里那里有人大概地暗示被破坏的婚姻、失败的生涯。这位长着一颗聪明的大脑袋和一双柔软的、纤细的手的先生，看来同他的儿子有隔膜，儿子讨厌父亲的过去。两位身穿貂皮大衣的女士，电石灯下犹显丰姿，谈到她们失去了信仰，却不谈她们对什么失去了信仰。我们对那位大头先生的过去也什么都不知道。儿子和父亲之间过去的种种困难，他们也没有谈到。这好像是在下蛋之前，挤啊，挤啊……

他们在洋葱地窖里下蛋，可是挤不出来，直到老板施穆围上特制方巾露面，迎来一阵发自四座的欢呼声。他道了谢，然后又

隐没在洋葱地窖尽头的帷幔后面，那里是贮藏室和盥洗间。几分钟后，他才回来。

老板再次站在客人面前时，为什么又迎来了一阵更加欢乐的、获得半解救的欢呼声呢？一家生意兴隆的夜总会的老板隐藏在帷幔后面，从贮藏室里取出什么东西，小声骂了几句坐在那里看画报的管盥洗室的女工，又来到帷幔前，像救世主一样，像创造奇迹的叔叔那样受到欢迎。

施穆臂上挎着一个盖着一块黄蓝方格布的小篮子来到他的客人中间。布上放着许多鱼形或猪形小木板。老板施穆将这些擦洗干净的小木板分发给来客。因为施穆年轻时曾在维也纳和布达佩斯待过，因此他点头哈腰，恭维话一套套。施穆的微笑，仿佛蒙娜丽莎的复制品画上的微笑。

客人们严肃地接过小木板。有的还要求换一块。有的先生喜欢猪形的，有的女士则喜欢更加神秘的鱼形，而不要普通家猪形的。他们闻了闻小木板，把它推来推去。老板施穆给回廊上的客人送完小木板之后，就静静地等着，直到每一块小木板都静止不动为止。

此时，众心期待着他，而他便像魔术师那样掀开盖布，下面的第二块布上放着一样东西，乍一看，看不清是什么，细细一看才知是厨房用刀。

像方才分发小木板那样，施穆现在转圈分发刀子。这一回他提高了紧张度，加快了速度，这也使他方便提高价格。他不再讲恭维话，也不让人换刀子，他的动作像配药一样匆忙。“好了，当心，走！”他喊着，把篮子上的布掀掉，伸手到篮子里，分发，分光，在民众之间布施。慈悲的施主，款待来客，分给他们，同从他的方巾上看到的略显程式化的金黄色的洋葱一样，普通的洋葱，是家庭主妇买进的洋葱，球根植物，不是鳞茎洋葱。蔬菜女贩出售的洋葱，农民们种植和收获的洋葱。荷兰小画师的静物画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上可以看到的几乎不同的洋葱。老板施穆把这些洋葱分发给他的客人，直到每人都有了洋葱，直到只听见小圆火炉隆隆响，电石灯的歌唱声。洋葱分完后，一片寂静。接着，费迪南·施穆喊道：“诸位，请吧！”说罢，就像滑雪者起滑前把围巾往后一甩那样把方巾的一端甩到左肩上，他以此发出一个信号。

客人们开始动手剥洋葱皮。据说洋葱有七层皮。女士们先生们用厨房刀子剥洋葱皮。他们陆续剥去金色、金黄色、锈棕色，或者说是洋葱色的洋葱皮。直到洋葱变成葱绿、透明、洁白、潮湿、黏而多汁，洋葱味也出来了。然后，就像通常切洋葱那样，他们在猪形和鱼形小木板上切洋葱，有的手笨，有的手巧，向不同的方向切，洋葱汁四溅，散布在空气中，年长的先生们，不知怎样摆弄厨房刀子，必须小心，稍有疏忽就会切到自己的手指；有的已经划破了手指，却没有察觉。女士们虽说手巧些，但并不是人人如此。在家里当主妇的那些女士，知道该如何切洋葱。譬如给煎土豆或肝配上洋葱圈和苹果片。可是，在施穆的洋葱地窖里，什么吃的都没有，谁想吃点什么，就得到别处去，去“鱼馆”或别的地方，而别上洋葱地窖来，这里只有可以切的洋葱。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洋葱地窖，特色就在于此。因为洋葱，假如仔细看一说的话……不，施穆的客人什么都看不见了。或者说，有一些客人什么也看不见了，他们热泪盈眶，但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心是充满的。心充满时，必定热泪盈眶，话可不能那么说。有些人永远不会这样，特别是在最后的或者说已流逝的几十年间。所以，尽管我们这个世纪有如此多的苦痛，但日后总会被人称作无泪的世纪。正是没有眼泪的缘故。能够消费得起的人就花八十芬尼加十二马克，让老板给一块猪形或鱼形的小木板和一把厨房用刀，买一个普通地里或菜园里长的洋葱，把它切成小块，小小块，直到汁创造出了它……创造什么？创造这个世界和这个世界的苦痛不创造的东西：滚圆的人的泪珠。哭泣。这里终于又在哭

泣了。无碍地哭泣，体面地哭泣，自由地把一切都哭出来。这里在下雨。这里波滔汹涌，泛滥开去。这里在降露水。奥斯卡把打开的闸门关上。春潮汹涌，决堤了。每年都要泛滥、政府不加防范的那条河叫什么？在花了十二马克八十芬尼后，哭够的人们开始说话了。他们还犹豫不决，对自己所说的话一点也不加掩饰而大为惊讶。但是，洋葱地窖的客人人们在享用了洋葱以后终于对坐在蒙粗麻布的木箱上的、不舒适的他们的邻座推心置腹了。像翻新衣把新大衣里外翻个身似的让人家追根究底。可同，同朔勒和克勒普无泪地坐在鸡棚梯子下面的奥斯卡却要保守秘密，从所有的自责、自白、揭发、忏悔、承认中，他只想讲一讲由于失去了她的福尔默先生而变得铁石心肠，无泪之眼，不得不一再到施穆的高价洋葱地窖中来的皮奥赫小姐的事。

皮奥赫小姐哭够以后说，我们在有轨电车上相遇。我从我的书店来，电车上挤满了人，维利，也就是福尔默先生，狠狠地把我的右脚踩了一下，但我们两人却一见钟情。我站不住了，他便伸出手来搀扶我，陪我，抱我回到我家，从那天起，他体贴地护理被他踩成蓝黑色的那只脚趾甲。除此之外，在我面前，他也不乏爱的表示，直到右脚大趾的趾甲脱落，再没有什么东西阻碍新趾甲生长的时候。他的爱也冷却了。我们两人都为他的爱的萎缩而痛苦。他始终还依恋着我，而我们两人又有那么多的共同之处。接着维利提出了那个惊人的建议：让我踩你的左脚的大脚趾，踩到趾甲变成红蓝色，随后变成蓝黑色吧！我让步了，他也就踩了。我立即又享受到他的爱，直到左脚大趾的趾甲也像一片枯叶一样脱落为止。我们的爱情又一次经历它的秋天。在此期间，我的右脚大趾的趾甲已经长好。维利为了再一次在爱情中服侍我，他又要踩我的右脚。但是我没有同意。我说，如果你的爱是真正伟大而真诚的，它的生命肯定会比脚趾的趾甲长久。他不理解我，离我而去。几个月后，我们又在音乐厅相遇。休息时，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旁边的座位正好空着，他就坐了过来。当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奏响，合唱队开始唱时，我把右脚向他伸去，而且事先已经把鞋子脱掉了。他踩上去，我没有失声叫喊干扰音乐会。七个星期以后，维利又一次离我而去。我们还相处了一两次，我又把脚伸给他两次，每次几周，一次是左脚，一次是右脚。现在，我的两只大脚趾都残了。趾甲再也不长了。有时维利来看我，在我面前的地毯上坐下，充满着对我和对他自己的同情，但没有爱也没有泪，激动地看着我们的爱的牺牲品，两只没有趾甲的脚趾。有时我对他说：维利，来吧，我们一起去施穆的洋葱地窖，让我们哭个痛快。可是，他一直不愿一起来。这个可怜的男人不明白眼泪是伟大的安慰者。

后来为了满足好奇者，奥斯卡又透露了一点——福尔默先生，一个无线电商人，他也到我们的地窖里来了。他们两人一起抱头痛哭。听克勒普说，不久前，他们结了婚。

自星期二到星期六，客人们在享用了洋葱之后，便把憋在心里的人的存在的真正悲剧发泄出来了。给星期一的客人留的，尽管不再是充当最可悲的哭泣者，却也能充当最剧烈的哭泣者。星期一价钱便宜。施穆以半价为青年供应洋葱。来的大多数是医科男大学生和各种女大学生。艺术学院的主要是日后当绘画教师的男大学生也来，他们把一部分奖学金花在买洋葱上。我心存疑问：那些中学最高班的男女学生买洋葱的钱从何而来呢？

年轻人的哭法和年长者的不一样。年轻人的问题当然也完全不同。并非总是为考试或中学毕业考试操心等等。在洋葱地窖里，自然也有人谈到母女悲剧、父子矛盾等等。虽然年轻人感觉到别人不理解自己，但是，他们觉得不被人理解并不值得哭泣。奥斯卡高兴的是，年轻人一如既往地为了爱而哭泣，不仅仅是为了两性之爱。古德龙和格哈德，起初他们总是坐在下面，后来才一起到回廊上面去哭泣。

她，高大，壮实，女手球运动员，学化学。头发结成一条辫子拖在脑后。苍白如同战争结束前的数年间在妇女同盟的宣传画上所能看到的那样但即像慈母一般。她目光清澈，直视前方。她的乳白色光滑健全的前额隆起，但是，她的不幸却明显地挂在脸上。从喉结到结实的圆下巴直到面颊，都留下了男人胡子的糟糕痕迹，虽说这位不幸女子不断地刮脸。她的细嫩的皮肤经受不住那刮脸刀片。她的脸发红，长小脓疱，有裂口，她的女人胡子不断长出来，古德龙为此哭泣。格哈德后来才来洋葱地窖。他们两人是在火车上认识的。他坐在她的对面，两人都刚过完学校的假期回来。他马上爱上了她，尽管她长着胡子。她由于自己长胡子而不敢爱他，但欣赏格哈德的孩子屁股般光滑的下巴，而这正是他的不幸。这个年轻男子不长胡子，这使他在年轻姑娘面前显得腼腆。但是，格哈德却同古德龙搭话，当他们在杜塞尔多夫火车站下车时，他们已经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从那天起，他们天天见面，他们天南海北地聊，交换了一部分想法，只是从来不提及令人懊恼的胡子的事。格哈德也体贴古德龙，由于她的受折磨的皮肤而从不吻她。所以，虽然她们两人都不注重纯洁，但他们的爱是纯洁的。因为他们志趣相投。他们两人的一个朋友告诉他们说，有这么一个洋葱地窖。但他们只是不屑一顾地报以一笑，因为怀疑乃是化学家和医学家共有的特点。他们最后还是去了，但互相保证说，只是去考察。我很少见到年轻人这样哭过。他们一再来，从嘴里省下六马克四十芬尼，为恼人的胡子而哭泣。有几次，他们企图回避洋葱地窖。某个星期一不见他们来，但到了下个星期一他们又来了，一边用手指捻碎洋葱丁，一边哭泣着透露，他们想省下那六马克四十芬尼。他们也试着在宿舍里用便宜的洋葱做试验，但效果与在洋葱地窖中差不多。谁都需要听众。在团体中哭泣要容易得多。当人们都在流泪时，大家便能产生一种真正的情感共鸣。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古德龙和格哈德光顾洋葱地窖的结果，除了流泪外，还慢慢地得到了治疗。也许把他们的精神压抑冲走了。他们相互接近了，他吻她的受折磨的皮肤，她亲他的光滑的皮肤，从某一天起，他们不再来洋葱地窖了，没有这个必要了。几个月以后，我在国王林阴道碰见他们，起先都认不出他们来了。他，光下巴的格哈德，留了一副密密的红金色大胡子。她，皮肤多刺的古德龙，古德龙的面颊和下巴却泛出黯淡的光泽，再也不是杂草丛生了。仅仅上唇上方还有淡淡的黑汗毛，这对于她的脸倒是百利而无一弊。这两人已结成了一对大学生夫妻。奥斯卡听着，就像孙子辈在听五十岁的人讲述往事。古德龙说：“从前，你们的爷爷还没有胡子的时候——”格哈德说：“以前，你们的奶奶还为长胡子而痛苦的时候，我们两个每逢星期一都要去洋葱地窖。”

读者会问，你们三位乐师为什么还坐在舷梯或者鸡棚梯子下面呢？既然是洋葱地窖里一片嚎声、哭声、咬牙切齿声，又何苦请来这么一个一本正经的乐队呢？

是啊，我们三个，等客人们倾吐衷肠、把眼泪哭干之后，便操起乐器，用音乐让客人们过渡到日常的谈话里去，使他们轻松地离开洋葱地窖，以便给新到的客人腾出座位。朔勒、克勒普和奥斯卡是反对洋葱的。我们和施穆签订的合同里也有一条，禁止我们以类似于客人的方式来享用洋葱。吉他和朔勒，没有理由诉苦，人家总看见他是满意而幸福的，就算在雷格泰姆音乐演奏到一半而他的班卓琴上的两根弦一下子都断了的时候。在我的朋友克勒普的脑子里，哭和笑的概念至今混淆不清。他觉得哭是开心的，在安葬他的姑娘时他放声大笑，我过去从来没有见他这么笑过。那么，奥斯卡又怎么样呢？他有足够的缘由放声大哭。难道不该用泪水冲刷掉道罗泰娅姆姆以及在椰子纤维地毯上的那个漫长的黑夜吗？我的玛丽亚，难道她不是使我诉苦的根由吗？她的老板，施丹策尔，经常在比尔克公寓进出，小库尔特，我的儿

子，见到他，不是先叫他“施丹策尔叔叔”，尔后又叫他“施丹策尔爸爸”了吗？我可怜的妈妈、扬·布朗斯基、只会用汤来表达自己感情的厨师马策拉特，不是都躺在遥远的萨斯佩公墓松散的沙土下面或者布伦陶公墓的黏土下面吗？当然要为他们痛哭一番的。可是，奥斯卡属于少数不需要洋葱便能流泪的幸福者。我的鼓帮助我。只需要特定的几小节，奥斯卡就流下了眼泪，恰同洋葱地窖中昂贵的眼泪一样。

老板施穆也从不摆弄洋葱。他休息时在灌木丛和树篱中打到的麻雀，可以顶替洋葱，而且价值相当。施穆把麻雀打完，把打下的十二只麻雀排列在一张报纸上，他的眼泪就落到它们身上。当他把鸟饲料撒向卵石和莱茵草地河岸时，他还在哭泣，这种情形不是经常可以看到吗？在洋葱地窖中，他每周一次粗野地咒骂管盥洗室的女工，已成了他的习惯，为他提供了发泄心中痛苦的另一种途径。他经常用相当陈旧的名堂称呼她，如：野鸡、娼妓，淫妇，荡妇，扫帚星。“滚蛋！”施穆又在尖叫了，“滚开，妖婆！”他马上解雇了管盥洗间的女工，换了一个新的。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他就遇上麻烦了。他找不到盥洗间的女工了，只好再次雇佣被他解雇过的女人。她们也高兴回到洋葱地窖来，因为这里会挣很多钱。由于哭泣，洋葱地窖的客人去盥洗间的次数比别的饮食店的客人多；哭泣着的人也比眼睛干的人慷慨大方。特别是男宾们，当他们哭红哭肿了脸，满面泪痕“到后面”去时，都愿意多给小费。管盥洗间的女工还卖给洋葱地窖的客人们有名的印有“在洋葱地窖里”字样的洋葱图案手帕。这些手帕样子可笑，不仅可以把眼泪擦干，而且可以当头巾用。男宾们，让人把这些彩色手帕缝成三角旗，悬在他们的汽车的后窗里面，在休假期间带着施穆的洋葱地窖旗驶向蓝色海岸、巴黎、罗马、拉文纳、里米尼，甚至远至西班牙。

我们三个乐师和我们的音乐还肩负另一个任务。有时，特别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在一些客人连续切了两个洋葱之后，洋葱地窖里就会突然大发作，不难成放荡行为。施穆很讨厌这种放肆的行为。见到几位先生解领带，几位女子解衬衫扣子时，便吩咐我们奏乐，去对付刚露苗头的不知羞耻的举动。可是，另一方面，施穆一看到一些特别缺乏抵抗力的客人切完第一个洋葱后便递去第二个，于是为他们由发作转向放荡开放绿灯，只不过他规定了一个限度罢了。

对于我来说，洋葱地窖里最厉害的一次发作假如不是他一生中的一个转折点，那也是一次意义深远的经历。施穆的妻子比莉，喜欢寻欢作乐。她一般不来地窖，即使来的话，她总带着施穆不愿见到的那些男朋友。有天晚上，她带着音乐评论家伍德和抽烟斗的建筑师瓦克莱来了。这两位先生是洋葱地窖的常客，特别的无聊苦闷。伍德常由于宗教方面的原因而哭泣。他想改宗或者已经改宗或者已经第二次改宗。抽烟斗的瓦克莱哭泣的原因，是因为他在二十年代为了一个放肆的丹麦女子而放弃了大学教授职位，但是最终，这个丹麦女子却嫁给了一个南美人，替他生了六个孩子。瓦克莱对此耿耿于怀，以致于他不能安稳地抽烟。有点阴险的伍德劝施穆的妻子切洋葱。她切了，眼泪来了，开始揭发老板施穆。她讲的事情，奥斯卡不再向诸君转述。施穆一听，向他的妻子猛扑过去。桌上到处放着厨房用的刀子，必须得有几个强壮的男子阻拦才行。他们拦住这个狂怒的家伙，直到轻率的比莉跟她的男朋友伍德和瓦克莱溜走为止。

施穆激动而慌张。他颤抖着双手，不停地去整理他的洋葱方巾。他几次走到帷帘后面，咒骂管盥洗室的女工，最后，拿了满满一篮子洋葱回来，强颜欢笑，以不自然的高兴劲头向客人们宣布，他，施穆，今天要当施主，免费赠送每位客人一个洋葱，说罢就给大家分了。

当时，连一直喜欢凑热闹的克勒普也看傻了，如果他不是若有所思的话，那也是特别紧张的。他拿起长笛准备吹奏。我们都

知道，紧接着给这些敏感而有教养的女士们先生们提供第二次失去控制而哭泣的机会，是多么危险。

看到我们准备奏乐，施穆偏偏禁止我们演奏。厨房用刀在一张张桌子上，开始它们的切碎工作。几层很美的、花梨木色的表皮已经被推到一旁，受到人冷落。透明的带淡绿纹道的洋葱肉陷于乱刀之下。奇怪的是，哭泣并没有从女士们开始。那些正值妙龄的先生们，一位大碾磨厂老板，一位携带淡施脂粉的男友的饭店经理，一位贵族总代表，满满一桌到城里来开董事会会议的、身穿绅士服的工厂主，一位秃头演员——我们统称他们为“格格响”，因为他在哭泣时总把牙齿咬得格格直响，先生们大都在女士们帮忙之前流下了眼泪。可是，女士们和先生们并非沉溺于第一个洋葱所引起的那种使人得到解脱的哭泣之中，他们发出了一阵阵痉挛式的抽泣。“格格响”咬牙切齿，确实吓人，活像一个要引诱剧场里每一个观众都跟着他一起格格地咬牙的演员。大碾磨厂老板将他的修饰整洁的灰发脑袋一下接一下地朝桌面上撞去。饭店经理把他的啼泣痉挛同他那位妩媚男友的痉挛混在一起。施穆站在梯子旁边，冷漠地审视着已经半失去控制的女士们先生们。这时，一位上了年纪的女士当着她丈夫的面扯破了自己的衬衫。那位饭店经理的男友，色相早已引人注目，这时光了膀子，露出天然的棕色皮肤，从一张桌子蹦到另一张，跳起舞来。也许是东方舞蹈吧，他宣告一种神秘的宗教仪式已经开始了。这开端虽然激烈，但由于想象力贫乏，因此不值得详尽地加以描摹。

不仅施穆失望了，连我也厌烦地皱起了眉头。低级的脱衣场面，几位绅士把女人的内衣穿上，男子气概的女士们抓起背带和领带，有几个双双钻到桌子底下。值得一提的倒是那位“格格响”，他用牙齿扯碎了一个胸罩，咀嚼着，或许已经吞下了一部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这种恐怖的毫无内容的“呜哇”、“哟喔”的叫声，使施穆失望了。他害怕警察当局，再也站不住了。他向坐在鸡棚梯子下面的我们探过头来，捅了捅克勒普和我，细声说：“音乐！你们听着，奏乐！奏乐，把这胡闹的场面结束！”

事实说明，知足常乐的克勒普十分开心。他笑得前仰后合，无法吹笛了。把克勒普当师傅看待的朔勒，是他的跟屁虫，也跟着他一起哈哈大笑。这样一来，只剩下我一个人了，而施穆是信赖我的。我镇定地点上一支烟，从凳子底下拽出铁皮鼓，开始击鼓。

我无计划便击起鼓来，只想让人家明白我的鼓声的含义。我把通常的音乐曲目全抛在了脑后。我不喜欢人家把我看成一个疯狂的打击乐手。虽说我是个老练的鼓手，但我不是纯血统的爵士乐师。我喜爱爵士音乐就像我喜爱维也纳华尔兹。而且我都会演奏，可我不想演奏。施穆请我击鼓时，我不演奏我会的，而是演奏发自内心的。捏住鼓棒，我回头沿着老路敲去，明朗地显现出三岁孩子视角中的世界，首先控制住这个没有能力进入真正的宗教仪式中去的战后社交界。我带领他们走到波萨道夫斯基路，走进考尔阿姨的幼儿园，他们垂下下巴，手牵着手，脚尖朝里，等待着我，他们的捕鼠人。于是我离开鸡棚梯子，站到女士们先生们的排首。作为开始，我先给他们来了一段《烘烘烘，烘蛋糕》，他们像孩子一样兴高采烈，而我的成绩也已记录在案。我随后引起他们的极大的恐惧，敲响了《黑厨娘，你在吗？》。我从前害怕黑厨娘，现在我更加怕她。我让身影巨大，黑如煤炭，可憎可怕的她出场，暴跳如雷。于是我达到了老板施穆用洋葱达到的效果：女士们先生们，像孩子一样哭出了圆滚滚的泪水，害怕极了，颤抖着求我怜悯。我于是又敲鼓，来安慰他们，帮他们穿上内衣、外衣，丝绸的、天鹅绒的：《绿绿绿，我的衣裳全都绿》，《红红红，我的衣裳全都红》，《蓝蓝蓝……》，我敲出了中间色调

和五颜六色，直至我面前的社交人士又文雅地穿戴整齐，接着领他们穿过洋葱地窖让幼儿园搬迁，就像这里是耶施肯山谷路，就像正在登上埃尔布斯山，绕着古滕贝格纪念碑走去，好像这里盛开着真正的雏菊，女士们先生们，像孩子一样高兴地去采摘。我允许所有在场的人留下一件纪念品。当我们快到黑暗的魔鬼峡谷，打算去采山毛榉果实时，我在鼓上说：孩子们，现在你们可以去小便了。于是，他们满足了孩子般的小小需要，尿了，所有的人，女士们和先生们，老板施穆，我的朋友克勒普和朔勒。甚至连坐在远处的管盥洗间的女工，全都嘘嘘地尿了，尿湿了裤子，一边蹲下来一边听着。好一支儿童管弦乐队！他们演奏时，我只是稀里糊涂地敲敲边鼓。他们的乐声一止，我一阵急擂，过渡到愉悦的气氛中去，奏出一段淘气的曲子：

玻璃，玻璃，小酒杯，
有白糖，没啤酒，
霍勒太太打开窗，
弹钢琴，叮咚当……

我带领那些欢呼着的，孩子般的女士们、先生们首先到了衣帽间。目瞪口呆的大胡子大学生帮施穆的客人们穿上大衣。接着，我为他们敲了一支他们喜爱的小曲《谁愿见到勤快的洗衣妇》，送他们走上水泥台阶，从穿羊皮大衣的门房身边走过，来到街上。一九五〇年春之夜像童话一般清新、没有星星，好像是预先定做的。我让女士们先生们解散，可他们还在旧城像小孩子一样胡闹了好一阵子，忘了回家的路。最后，警察帮他们恢复了本来面目和对自己家电话号码的记忆。

我，则留在洋葱地窖里，抚弄铁皮，傻傻地窃笑。施穆叉开两腿，湿了裤裆，站在鸡棚梯子旁始终在那里鼓掌。看样子，在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考尔阿姨的幼儿园里他感到非常高兴，同成年的他在莱茵草地上打麻雀时一样高兴。

在大西洋壁垒或地堡不能同水泥分家

我这样做，本想帮施穆的忙。我的表演把他的肯出高价的客人变成了牙牙学语、兴高采烈、无忧无虑、尿湿裤子因而也是哭哭啼啼——不用洋葱便痛哭流泣的孩子，因此他没办法原谅我的铁皮鼓独奏表演。

奥斯卡想办法理解他。难道他害怕我的竞争了吗？因为越来越多的客人把传统的催泪洋葱推到一边，呼唤奥斯卡，呼唤他的铁皮，呼唤我。因为我能够在铁皮鼓上用咒语显现不论有多大年纪的任何一位客人的童年。

到那时为止，施穆仅限于无限期解雇管盥洗间的女工。现在，他把他们也解雇了，请来一位站立小提琴手，如果不苛求的话，可以凑合把他看作吉普赛人。

可是，我们被赶走之后，许多客人威胁说要同洋葱地窖一刀两断。没过几个星期，施穆只好让步。那个站立提琴手和我们一样每周来演奏三次，但报酬提高，每晚二十马克。此外，我们到手的小费越来越多，就在银行开了一个帐户，因为有利息吃，所以非常高兴。

好景不长，这本储蓄存折不久就成了我的帮手，由于死神驾到，夺走了我们的老板费迪南·施穆，夺走了我们的工作和报酬。

前面已经讲过，施穆打麻雀。有时候，他带我们，乘他的梅赛德斯牌轿车一起去，让我们观看他打麻雀。为了我的鼓有时会争吵，站在我旁边的朔勒和克勒普也因此会受罪，但是，施穆同他的音乐师之间的关系还是友好的，直到死神降临。

我们上车，施穆的妻子像以前那样坐在驾驶座上。克勒普坐

在她身边。施穆坐在塑勒和我中间。他把小口径步枪放在腿上，偶尔还抚弄几下。我们驶车一直到离凯泽斯韦尔特不远处。莱茵河两岸树木林立。施穆的妻子打开一张报纸留在汽车里。克勒普事先买了葡萄干，隔一会儿吃一口。朔勒当吉他手之前，在大学里念过某一系科，会背几首描写莱茵河的诗。莱茵河也显示出诗情画意的一面，除去载着普通的驳船外，虽然按照日历时值夏季，却载着摇曳的秋叶往杜伊斯堡流去。如果施穆的小口径步枪也沉默的话，那么，在凯泽斯韦尔特附近的午后真可以称之为宁静的午后了。

施穆打完了猎，克勒普也吃完了葡萄干，用青草擦着手指头。给报纸上排列着的十一个冷却了的羽毛团添上第十二只抽搐着的麻雀标本。这位射手已经包好了他的猎获物——施穆每次都把他射到的东西带回家去。这时，一只麻雀落到我们近处被河水冲来的树根上，特别显眼，它的颜色又是那么灰，施穆很难抗拒这么标准的麻雀，一个下午本来最多只打十二只麻雀的他射中了第十三只。他真不该干这件事！

他把那些麻雀放在一起，我们便往回走，找到了正在黑色梅赛德斯里睡觉的施穆太太。施穆先上车，坐在前座，克勒普和朔勒坐在后座。自己乘电车回去，不必再管我。于是，他们便乘车朝杜塞尔多夫而去。奥斯卡，出于谨慎，没有上去。

我慢慢地跟在后面。不需要走多远。由于在修公路，开了一条。绕行道经过一个采砂砾场。在一面路镜下方约七米深处的采砂砾场里，一辆黑色梅赛德斯轮子仰面朝天。采麦砾场的工人已经把三个受伤者和施穆的尸体从水里拖了出来。急救车已在途中。我跳下坑去，慰问了一下受伤者。不一会儿，鞋里满是砂砾。他们虽然疼痛，仍问这问那，但我并没有告诉他们，施穆早已死了。他表情惊讶地呆望着被乌云遮蔽了四分之三的天空。包有午后猎获物的报纸被抛出车外。我数了数，只有十二只麻雀，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第十三只不见了，当我还在寻找时，事故急救车开进了采砂砾场。

施穆的妻子、塑勒和克勒普只受了轻伤：几处青肿，折断几根肋骨。后来我到医院去探望克勒普，询问出事故的原因，得知了一件令人吃惊的事情：他们的车子在绕行道上徐缓地驶过采砂砾场时，突然来了数以百计的麻雀，从树篱、果树、灌木丛间黑压压地飞来，遮住了梅赛德斯，撞在挡风玻璃上，吓坏了施穆的妻子，是麻雀造成了这次事故和施穆的死亡。对克勒普的说法，奥斯卡表示怀疑。在城南公墓安葬施穆那天，他甚至不再像数年前他还在当石匠和刻字匠时那样去数墓碑间的麻雀了。我头戴借来的大礼帽，跟在棺材后面。夹杂在送葬队伍中。在九区我看见了正在同一个我不认识的助手为一座双穴墓立辉绿石碑的石匠科涅夫。施穆的棺材在科涅夫旁边经过并向新辟的十区抬去时，也许是由于我头戴礼帽的缘故，我没被他认出来。他搓搓后颈，让人推断，他的疖子是不是熟了。

又是葬礼！我已经领读者去过那么多的公墓了，这有什么办法呢？以前我曾讲过：葬礼总使人回忆起另一些葬礼，所以，关于施穆的葬礼以及奥斯卡在葬礼进行时的回忆，我就不再报道了。好在施穆是正常地去到地底下，并没有发生任何意外的事情。但我想告诉各位，由于死者的寡妇住院，所以大家在葬礼结束后可以不受拘束。有一位自称丢施博士的先生跟我搭话。

丢施博士负责一家音乐会经办处。可音乐会经办处非他所设。此外，他自我介绍说，他是洋葱地窖以前的客人。我从未注意到他。而当我把施穆的客人变成无牵无挂、口齿不清的小孩子时，他却在场。他真诚地对我讲，由于我的铁皮鼓的影响，丢施本人也回到了幸福的童年。现在，他要让我和我的“绝招”大出风头。他握有全权同我签订一项高薪合同，而我能当场签字。在火葬场前，舒格尔·莱奥，在他叫做萨贝尔·威廉，戴着白手套，

正等待着送葬的人。丢施博士掏出一张纸来，上面规定用巨额报酬换取我，以“鼓手奥斯卡”的名义在大剧院承担全部独奏节目，在面对两千到三千座位的舞台上唱独脚戏。我以施穆的死为由不愿当场签字，丢施十分难过。我说施穆在世时同我关系十分密切，我哪能在公墓上就另找一位新老板呢，但这件事我可以考虑，也许还要去旅行一次，回来后再去拜访他。也许会在他的工作合同上签字。

我在公墓上没有签字，但是，奥斯卡由于经济状况无保障不得已要求预支。出了公墓，在丢施博士停车的广场上，我将他暗暗递来的装在一个信封中的钱和他的名片塞进了口袋。

于是我去旅行，并且还找到了一个旅伴。我本来想同克勒普一起去旅行，但他还躺在医院里，不准笑，因为他折断了四根肋骨。我也愿意玛丽亚当我的旅伴，在暑假还未结束时带小库尔特一起去。但玛丽亚还在同她的老板、同那个让小库尔特叫他“施丹策尔爸爸”的人相好。

就这样，我跟画师兰克斯结伴去旅行。读者知道，兰克斯就是那个同缪斯乌拉临时订婚的上士兰克斯。我口袋里揣着预支的钱和我的存折，到西塔德街画师兰克斯的工作室去看望他，希望能在他那儿见到我原先的同行乌拉和她一起去旅行。

我在画家那里找到了乌拉。在门口，她对我说，他们已在十四天前订婚。同小汉斯·克拉格斯已经待不下去了，她只好又解除婚约。她问我，认不认识小汉斯·克拉格斯。

不认识马拉的这位未婚夫我很遗憾，接着提出了他的慷慨大方的旅行建议，乌拉还没有来得及答应，画师兰克斯却插进来，表示要当奥斯卡的旅伴，并且因为他不愿待在家里，打了长腿缪斯几个耳光，还因此而流了眼泪。

为什么我不反对？我既然要同缪斯一起去旅行，为什么他不袒护缪斯？我把在浅色汗毛的长腿乌拉身边的旅行想象得越美，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就越怕同缪斯太亲近。必须跟缪斯保持距离，我想，不然的话，缪斯的亲吻岂不成了家常便饭吗？因此，我宁可跟画师兰克斯一块儿去旅行，因为再次缪斯想吻他时，他就打她。

关于我们的旅行目的地，我们只考虑诺曼底一处，想去看一看战时我们在那里相识的卡堡与卡昂之间的地堡。办签证是惟一让人头疼的问题。可是，有关办签证的事，奥斯卡只字不提。

兰克斯这个小气鬼，他的颜料是廉价货或是向别人要的，画布的底色也上得很差，可是用起颜料来没有节制，一到同纸币或硬币打交道，他又锱铢必较。他一直在抽烟，从来不买香烟。他的吝啬是系统性的。例如：若有人送他一支香烟，他就从自己左边的裤子口袋里掏出一个十芬尼的铜板，让它透透空气，然后又放进他右边的裤兜里去。随着钟点的变化，这样“滑动”的铜板或多或少，但总数是不少的。他抽烟抽得非常厉害，有一次他心情好的时候向我透露：“我每天抽的烟大约合两个马克。”

兰克斯大约一年前买下的在韦尔斯滕的那块带废墟的地皮，就是用他的远近熟人的香烟买来的，也就是说，是白抽人家的香烟买来的。

我同兰克斯去诺曼底。我们乘上一列快车。兰克斯本来想搭人家的汽车，我买火车票，请他旅行，他不得不让步。我们乘公共汽车从卡昂到卡堡，一路白杨，树林后面是以树篱为界的草场。棕白两色相间的母牛使这片土地看上去像是一张牛奶巧克力广告画。战争破坏的痕迹还在，如果是广告画，就不该画上去了。但是，每个村庄，包括我失去罗丝维塔的小村庄巴文特，都还画着惨不忍睹的战争破坏的痕迹。

从卡堡出发，我们沿海滩步行，朝奥恩河入海口走去。到了勒霍姆，兰克斯说：“我们到家了，小子！给我一支烟！”还在他让铜板从一个口袋搬迁到另一个口袋里去的时候，他那个总是往前探着的狼一样的脑袋已对准了沙丘间无数未受损坏的地堡之

一。他伸出两条长臂，左手提着背囊、一打画布框架和野外用画架，右手搀着我，拉我向那水泥走去。奥斯卡的行李便是一口小箱子和鼓。

我们清除了道拉七号地堡里的流沙和寻找栖身处的情侣们留下的污秽，把我们的睡袋挂起，放上一只板条箱，使之变成可居住的空间。我们在大西洋岸边的第三天，兰克斯从海滩上带回来一条渔民们给他的大鳕鱼。他画了他们的船，他们塞给他这条鳕鱼。

因为我们还用道拉七号来称呼这座地堡，因此一点也不奇怪，奥斯卡在给鱼开膛的时候，又想起了道罗泰娅姆姆。鱼肝和鱼白涌出，落在他的双手上。我在太阳底下刮鱼鳞，兰克斯趁机会彩笔一挥画了一幅水彩画。八月的太阳倒立在地堡的水泥穹顶上。我将原来填满鱼肝鱼白和内脏的地方塞满蒜瓣、洋葱、乳酪和百里香。我没有扔掉鱼肝和鱼白，而是把这两种美味塞在鱼的咽喉里，再用柠檬堵上。兰克斯在周围窥探。他钻进道拉四号、道拉三号 and 更远处的地堡，随手捞东西。他带回来用来生火的木板条和较大的他要用来作画的硬纸板。

这样的火我们可以没费丝毫力气维持整个白天，因为海滩上每隔两步就插有被海水冲来的、轻如羽毛的干木头，投下的阴影在随着日光移动。我把兰克斯在一座被遗弃的海滨别墅里拆下的阳台铁栏杆的一部分，架在火红的木炭上。给鱼抹上橄榄油，架在炽热的、同样抹了油的锈铁上。我把柠檬汁挤到滋滋响的鳕鱼上，让它慢慢地变成佳肴。

我们在好几只空桶上，铺上一张折叠成几层的柏油纸，架成了我们的餐桌。摆上我们随身带来的叉和铁皮盘子。兰克斯，像一只见到鳗鱼的饿慌了的海鸥，围着正慢慢地熟透着的鳕鱼团团转。为了引开他，我把我的鼓从地堡里取出来，放在海沙上，迎风敲起来，不断变奏，诱发出涨潮和涛声的喧嚣：从卡舒贝来到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诺曼底。贝布拉前线剧团参观地堡。基蒂和菲利克斯，两位杂技演员，在地堡上用身体缠成结，再解开结，像奥斯卡迎风擂鼓一样，迎风朗诵一首诗，诗的叠句在战争中宣告一个舒适温暖的时期的到来：“……星期五吃鱼，外加荷包蛋……我们正在接近毕德迈耶尔风尚！”带萨克森口音的基蒂朗诵着。我的智慧的贝布拉和宣传运动上尉点点头；我的地中海的拉古娜，在水泥上提起食物篮，在道拉七号顶上，摆好食物；上士兰克斯也吃白面包，喝巧克力，抽贝布拉上尉的香烟……

“好小子，奥斯卡，”画师兰克斯将我从无限遐思中喊回来。“如果我能够像你敲鼓似的那样画就好了！给我一支烟！”

我停止击鼓，给了我的旅伴一支烟，尝了尝鱼，味道不错：鱼眼睛鼓出，软、白、松动。我慢慢地把最后一片柠檬的汁挤到半焦半裂的鳕鱼皮上，不让任何一处遗漏。

“我饿了！”兰克斯露出了长长的蜡黄的尖齿说。不断用双拳捶打方格衬衫下的胸口，简直是一只猴子。

“要鱼头还是鱼尾？”我问他，一边把鱼挪到一张铺在柏油纸上当桌布用的羊皮纸上。“你说我该要哪一头呢？”兰克斯掐灭香烟，留下烟蒂。

“作为朋友，我会说：请用鱼尾。作为厨师，我将推荐你吃鱼头。我的妈妈，是个吃鱼能手，她会说：兰克斯先生，请用鱼尾，保您满意。医生总是建议我父亲……”

“我对医生的话不感兴趣。”兰克斯怀疑地打断我的话。

“霍拉斯博士总劝我父亲，吃鳕鱼只吃头。”

“那我就吃鱼尾吧！我感觉到了，你想把不好吃的塞给我！”兰克斯仍在猜疑。

“这样最好。奥斯卡知道如何品尝鱼头。”

“我看你就想着吃鱼头，好吧，鱼头归我吧！”

“你真难伺候，兰克斯！”我想把这场对话结束。“好吧，鱼

头归你，鱼尾归我。”

“什么，小子，难道是我作弄你了吗？”

奥斯卡承认，他被兰克斯作弄了。我知道，只有当他把鱼吃进嘴里，又肯定我已经被他作弄了时，他才会觉得有滋味。我称他为诡计多端的老狗，福星高照的家伙，星期日出生的幸运儿。我们开始吃鳕鱼。

他把鱼头拿起，我拣起剩下的柠檬，把汁挤在尾段剖开的白色鱼肉上。几瓣黄油般软的大蒜从鱼膛里掉了出来。

兰克斯吸着牙缝中的鱼骨，一边看着我和鱼的尾段。“让我尝尝你的鱼尾。”我点头同意了。他尝了一口，仍在犹豫，直到奥斯卡也尝了一口鱼头，安慰他说：他的那份更美味。

我们吃鱼时喝的是波尔多红葡萄酒。我觉得美中不足，如果是白葡萄酒就好了。兰克斯打消我的疑虑，说，他在道拉七号当上士的时候，一直喝红葡萄酒，直到进犯开始：“小子，当时我们都喝足了，就干起来了。科瓦尔斯基·谢尔巴赫和矮个子荣伊特霍尔德压根儿没注意这儿已经干起来。他们已都不在人世了，都躺在卡堡那边同一座公墓里。在阿罗曼彻斯，是英国兵，在我们这个地段，是大批加拿大兵。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把裤子背带挂上，他们就已经到了，说：How are you？”

然后，他吐出鱼刺，叉子朝天说：“我今天在卡堡见到那个胡思乱想的家伙海尔佐格了。你也认识他，当年你们来参观这里的时候。他是中尉。”

奥斯卡当然记得海尔佐格中尉。兰克斯撇下鱼告诉我说，海尔佐格每年都带着地图和测量仪器来卡堡，因为在地堡他睡不着觉。他也会到我们这儿，到道拉七号来测量。

我们还在吃鱼时，海尔佐格中尉来了。他身穿黄卡其齐膝裤，小腿肚圆墩墩的，脚登网球鞋，灰褐色胸毛长到解开的麻布衬衫外面。我们坐着没动。兰克斯作介绍，称我为我的朋友和战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友奥斯卡，称海尔佐格为前中尉。

退役中尉立即开始调查道拉七号。他先是经兰克斯允许在水泥外侧经兰克斯允许的。他填写表格，并用随身带的一个潜望镜来向野景和上涨的海潮调情。当他准备视察道拉七号，我们的休假小屋内部时，兰克斯不让他入内：“小子，海尔佐格，您在这儿围着水泥转，真不知道想干什么！当年是现实的，但它们都已过去。”

兰克斯爱讲“过去”这个词儿。我总把世界分成现实的和过去的。但是，退役中尉认为，一切都还没有过去，计算题还没有被除尽，日后大家还必须在历史面前说明自己是不是尽责了。因此，他现在要去观察道拉七号的内部：“您明白我的意思了吗。兰克斯？”

海尔佐格的影子投在了我们的鱼和桌子上。他企图从我们头上跨过去进入那个地堡，地堡入口处上方的水泥图案仍旧可以看出是上士兰克斯的手艺。

海尔佐格没能过得了我们的桌子。兰克斯由下往上用叉子，不，不是叉子，而是挥拳便击，将退役中尉海尔佐格打倒在沙丘上。兰克斯为我们的烤鱼宴席被打断深感遗憾。他站起来一把揪住中尉把他拖到一边从沙丘上扔了下去，留下一道工整的轨迹。我们看不见他，但还能听到他的声音。海尔佐格把兰克斯随后扔去的测量工具拣到一起，咒骂着远去。他用咒语召来了所有的幽灵，而这些都是兰克斯认为已经属于过去的。

“当年别人说他是胡思乱想的家伙时，他还没有糊涂到这种地步。想当初，假如我们没有醉到那种程度，开火的时候，谁知道那些加拿大兵会落得怎样的下场。”

我不得不点头表示同意，因为前一天落潮时，我在贝壳和空螃蟹壳中间拣到一颗证明事实真相的加拿大军服的钮扣。奥斯卡把这颗钮扣放在他的钱包里，并感到特别幸运，仿佛他拣到的是

一枚稀有的伊特拉斯坎人的钱币。

虽然海尔佐格的来访时间不长，却唤起了许多回忆：“还记得吗，兰克斯，从前我们前线剧团来参观你们的水泥，像今天一样刮着一阵小风我们在地堡顶上进早餐，突然来了六七个修女，在隆美尔芦笋中间拣螃蟹。你，兰克斯，按照命令，肃清海滩，你用一挺杀人的机关枪干了这件事。”

兰克斯追忆着，一边吸着鱼骨。他甚至还记得那些姓名：朔拉斯蒂卡姆姆，阿格奈塔姆姆。他一一列举出来。他给我描绘了那个玫瑰色的脸的见习修女。他描绘得那么生动，竟使我的护士道罗泰娅姆姆常在我心中的画像被遮盖了一半，在他作了这一番描绘之后几分钟，还升起了一幅景象——这景象已经不再使我感到太惊讶，因此我也未能把它当成一种奇迹——一个年轻修女，从卡堡方向飘来，飘到沙丘上空，她的玫瑰色以及周围的许多黑色历历在目。

她手执一柄像年老绅士随身携带的那种黑色雨伞，挡着太阳的紫外线。她眼前架一副类似好莱坞制片主任戴的那种深绿色赛璐珞墨镜。沙丘间有人喊她。看来周围还有许多修女。“阿格奈塔姆姆”的喊声一声接一声。

阿格奈塔姆姆，在我们那条鳕鱼越来越清楚地暴露出来的骨架上方回答说：“在这里，朔拉斯蒂卡姆姆。这里一点风也没有！”

兰克斯得意地点点他的狼一样的脑袋，眦牙冷笑，仿佛这次天主教游行是他约请来的，根本不存在任何会使他感到意外的事情。

年轻修女站在地堡左侧望着我们。玫瑰色的脸，两个圆鼻孔，除了牙齿稍微突出外，无以伦比。她吐出一声：“哦！”

兰克斯上身不动，只把脑袋和脖子转过去：“姆姆，到这儿散步来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回答很快：“我们每年到海边来一次。我头一次见到海洋。海洋真大呀！”

没有人会对此有不同看法。直到今天，我仍然认为她对海洋的描写是最贴切的。

兰克斯摆出好客的姿态，从我的那份鱼里挑了一块，递过去：“尝点鱼吗，姆姆，还热着呢。”他的法语异常惊人的流利。奥斯卡也讲起外语来了：“别客气，姆姆。今天是星期五。”

虽然我暗示今天吃鱼并不违反她们严格的教规，却还是未能说服藏身于修道服中的少女和我们一起进餐。

“二位一直住在此地吗？”她好奇地问。她认为我们的地堡挺漂亮，但有点滑稽可笑。遗憾的是，院长和另外五名修女撑着黑伞，戴着绿墨镜，越过沙丘，来到眼前。阿格奈塔吓得匆忙走开，我听得出来，她被狠狠地训斥了一顿，随后被夹在中间带走了。兰克斯在做梦。他把叉子倒插在嘴里，看着在沙丘上方随风飘去的这一群：“这不是修女，是帆船。”

“帆船是白的。”我提醒他。

“这是些黑帆船。”同兰克斯辩不出理的。“左外侧的是旗舰。阿格奈塔，是科尔维特式轻型巡航舰。风向有利于扬帆，摆开楔形阵势，从艏三角帆到尾帆，前桅、主桅和第三桅，所有的帆都挂上了，向英格兰方向的地平线驶去。你想象一下：明天早上，英国兵醒来，向窗外望去，两万五千名修女直到旗帜挂满桅顶。

“一场新的宗教战争！”我帮他说下去。要我看，旗舰应叫“玛丽亚·斯图亚特”号或“德·瓦莱拉”号，或者叫“堂璜”号更恰当。一支新的更灵活的“阿尔马达”来为特拉法尔加之役雪耻了。战斗口号是：“杀死全部清教徒！”英国人的军营里这次可没有纳尔逊了。入侵开始了：英国不再是一个海岛了！

兰克斯觉得这样说政治性太强。“现在那些修女们开走了。”他报告说。

“不，应该说扬帆而去！”我更正说。

好吧，不管她们是扬帆而去还是由蒸汽推动而去，反正舰队是朝卡堡方向飘去了。她们手执雨伞，挡住太阳。只有一个人，落在后面。舰队的其余船只，为了留在画面上，缓慢地逆风游弋，向原先的海滨饭店这一焚毁的布景驶去。

“那艘船或许没能起锚，也许桨被打坏了。”兰克斯继续操着水手的语言。“那不是快速科尔维特式船吗？不是阿格奈塔吗？”

不管这是三桅快速舰还是科尔维特式船，反正这是见习修女阿格奈塔。她正在走近我们。

“您在拣什么呢，姆姆？”她在拣什么，兰克斯事实上看得一清二楚。

“贝壳！”她的发音非常特别，说着又蹲下来。

“您能拣这个吗？这可是人间的财物啊。”

我支持见习修女阿格奈塔：“你糊涂了，兰克斯，贝壳可不是什么人间财物。”

“那也是海滨财物，总而言之是财物，修女不得占有。修女应当贫困、贫困再贫困！难道不是吗，姆姆？”

阿格奈塔姆姆露出突出的牙齿微笑着：“我只拣很少几个贝壳。是替幼儿园拣的。孩子们真喜欢玩贝壳，他们还没有来过海边呢。”

阿格奈塔站在地堡入口处，将修女的目光投入地堡内部。

“您喜欢我们的小房子吗？”我讨好她。兰克斯更加直截了当：“参观一下这幢别墅吧！姆姆。”

在耐穿的裙子下面，她的系带尖头鞋在蹭地，踢起一些沙子，被风卷走，撒到我们的鱼上。浅褐色的眼睛审视着我们和我们中间的桌子有点没把握。“这绝对不行。”她想要引我们讲出不同意她这种说法的话来。

“别这么说，姆姆！”画师站起身来，替她清除一切障碍。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从地堡里往外看，景色怡人！站在射击孔后面看去，整个海滩一览无余。”

她还在犹豫，鞋子里肯定灌满了沙子。兰克斯把手伸向地堡入口，这个动作可能是邀请修女进地堡吧。他的水泥图案投下了黑影。“里面也非常干净！”“只待一会儿！”他确切地说。她身子一闪，进入地堡。兰克斯两手在裤子上擦了擦，这是画师的典型动作。他进去之前，威胁说：“你可不准动我的鱼！”

鱼？！奥斯卡已经吃得不想再吃了。他离开桌旁，听任带沙的风和海潮这个千古力士的夸张的喧嚣声的摆布。我用脚把我的鼓移过来，开始击鼓，在这地堡世界、水泥原野和名叫隆美尔芦笋的蔬菜里寻找一条出路。

我先借助爱情，但没有多少结果。我也曾喜欢过一位姆姆。说是修女，倒不如说是护士。她住在蔡德勒寓所里一扇乳白玻璃门后面。她非常美，但是我一直没有见过她。我们之间隔着一条椰子纤维地毯和漆黑的走廊。所以，我更明显地感觉到的是椰子纤维而不是道罗泰娅姆姆的身体。

这个主题很快在椰子纤维地毯上倒毙。我试着把我早年对玛丽亚的爱分解为节奏，让像水泥一样快速生长的攀缘植物生长出来。但罗泰娅姆姆又来挡住了我对玛丽亚爱的去路。从海上吹来石炭酸味，身穿护士服的海鸥在招手，红十字颈饰般的太阳照射着我。

奥斯卡非常高兴，他的鼓声被人打断了。院长朔拉斯蒂卡带着她的五名修女又回来了，倦容满面，斜举着雨伞，绝望地问：“您见到过一个年轻修女吗？她是我们的年轻见习修女？这孩子那么年轻。头一回见到海洋。她一定迷路了。您在哪儿，阿格奈塔姆姆？”

我不知可以做些什么？只好目送这只被背后吹来的风刮走的舰队向奥恩河入海口、阿罗芒什和温斯顿港方向驶去。当年，英

国人就在那里把人工港硬加给了大海。如果她们全都来，我们的地堡可容纳不下。我曾经想过让画师兰克斯接待她们，但紧接着，友谊、邪念和厌烦同时吩咐我把大拇指朝奥恩河入海口指去。修女们相信了我的大拇指，在沙丘上渐渐地变成了飘忽而去的六个越来越小的黑洞眼，那伤心的“阿格奈塔姆姆，阿格奈塔姆姆！”的喊声，也使她们神速如风地远去，最后化为沙粒。

兰克斯先走出地堡。又是典型的画师动作：用手贴在裤子上擦了擦，懒洋洋地来到太阳底下，向我讨了一支烟，把烟塞进衬衫口袋里，向冷了的鱼扑过去。“这种事情使人饥饿。”他解释说，抢走了我的鱼尾。

“她现在一定非常不幸。”我埋怨兰克斯，对自己用了“不幸”这个字眼特别得意。

“为什么？她怎么会感到不幸。”

兰克斯不会知道，他同别人打交道的方式会使人不幸。

“她现在在干什么？”我问道，我本来是想问些别的事情。

“她在缝补。”兰克斯用叉子比划着。“她正在缝补被撕破的修女服。”

缝补女郎走出地堡。她随即把雨伞打开，顺口哼着什么，但是我相信自己听出她有些紧张：“从地堡往外看，那野景真美啊！整个海滩尽收眼底，还有大海。”

她在我们的鱼的废墟前面站住了。

“我可以吗？”

我们两个同时点点头。

“海风使人饥饿。”我替她帮腔。她点点头，用她又红又裂口的手抓我们的鱼，她那双手使人联想起修道院里的笨重劳动，她把鱼送进嘴里，严肃而紧张地吃着，思索着，仿佛她咀嚼的除了鱼之外，还有她在吃鱼前的享受。

我看着修女帽下的她。她把她的绿色墨镜忘在地堡里了。汗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珠排列在她的白色上浆帽檐下光滑的前额上，倒颇似圣母的前额。兰克斯又想向我要烟，尽管方才他要的那一支还没有抽呢。我扔给他一整包烟。他把三支插在衬衫口袋里，第四支叼在唇间。这时，阿格奈塔姆姆转过身去，扔掉雨伞，赤着脚跑上沙丘，消失在海涛的方向上。

“让她跑吧！”兰克斯好像是在预言，“她也可能回来，也可能不回来。”

我只安稳地待了片刻，看着画师的香烟，随后登上地堡，远眺海潮和被吞没了大半的海滩。

“怎么样？”兰克斯想从我这儿知道什么。

“她脱掉了衣服。”除此之外，他从我这再也得不到什么了。

“她也许想去游泳，清凉一下。”

我认为涨潮时游泳是危险的，特别是刚吃完东西。海水已经没及她的膝盖，她渐渐被淹没，最后只剩下滚圆的后背。八月底的海水一定很凉，看来这并没把她吓住。她灵巧地游着，练习着各种姿势，潜水破浪而去。

“让她游吧！你给我从地堡上下来！”我回头看，只见兰克斯伸开四肢在抽烟。太阳下，餐桌上鳕鱼的骨架泛着白光。

我从水泥上跳下来时，兰克斯把眼睛睁开了，说：“这真是幅绝妙的画：下潜的修女。或者：涨潮时的修女。”

“你这个残忍的家伙！”我嚷道，“她如果被淹死了呢？”

兰克斯闭上眼睛：“那么，这幅画就取名为：淹死的修女。”

“如果她回来了，倒在你的脚下呢？”

画师睁开眼睛：“那么，就可以把她和这幅画叫做：倒下的修女。”

他只懂得非此即彼，不是淹死即是倒毙。他把中尉扔下沙丘，他把我的香烟夺走，他把我的那份鱼吃了，让一个本来是被奉献给天国的女孩去看地堡内部，当她还在向公海游去的时候，

他用块茎状、粗糙的脚在空中作画，然后把尺寸标好，加上标题：下潜的修女。淹死的修女。涨潮时的修女。倒下的修女。两万五千个修女。横幅画：修女在特拉法尔加。条幅画：修女战胜纳尔逊爵士。顺风时的修女。逆风时的修女。修女逆风游弋。抹上许多黑色，溶化的白色和冷蓝色：进犯，或者：神秘，野蛮，无聊——战时他的水泥上的旧标题。在我们回到莱茵河后，兰克斯才把所有这些真正画下来，有横幅的，有条幅的。他完成了全部修女组画，找到了一个非常渴望得到修女画的艺术商。展出了四十三幅修女画，卖了十七幅，买主有收藏家、企业家、艺术博物馆以及一个美国人，以致于评论家们把他这个兰克斯同毕加索相比较。兰克斯用他的成就把我说服了，奥斯卡，把那个音乐会经纪人丢施博士的名片找出来，因为，我的艺术也在叫喊着要吃面包：是时候，该把三岁鼓手奥斯卡在战前和战争时期的经历，通过铁皮鼓变成战后时期丁当响的纯金了。

无名指

“好啊，”蔡德勒说，“看来二位是不想再工作了。”他非常生气，因为奥斯卡和克勒普总是待在房间里，游手好闲。安葬施穆那天，丢施博士在城南公墓预支给我的那笔钱的余款，用来支付了我们两个十月份的房租，但是，十一月从经济方面看，大有变成灰暗的十一月的危险。

不过，确实有许多地方来请我们。我们可以在这家或那家舞厅以及夜总会里演奏爵士音乐。可是，奥斯卡不想再演奏爵士乐。克勒普和我，总在吵架。他说，我处理铁皮鼓的新方式同爵士乐不是一回事。我并不反驳。因此他说我是爵士音乐思想的叛徒。

十一月初，克勒普找到了一名能干的打击乐手，“独角兽”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的博比，并同这位打击乐手一起在旧城应聘。这样一来，我们两个又能像朋友似的交谈了，虽然此时克勒普已开始与德国共产党在言谈上一致了。

现在，只有丢施博士的音乐会经纪处的那扇小门向我敞开了。我不可能也不愿意回到玛丽亚那里去，特别因为她的追求者施丹策尔打算离婚，并和玛丽亚结婚。有时我到比特路科涅夫那里去刻碑文，也去艺术学院，让那些勤奋的艺术学徒们把我抹成黑色或者抽象化，还经常无来由地去拜访缪斯乌拉。我们去大西洋壁垒旅行后不久，她同兰克斯解除了婚约，由于兰克斯只想画珍贵的修女画，所以不想再揍缪斯乌拉了。

丢施博士的名片静悄悄却又咄咄逼人的放在洗澡盆旁边的桌上。我不想再同丢施博士有丝毫牵挂，所以把名片撕碎扔掉。可是使我惊讶的是，我已经能够像背诗似的背出音乐会经纪处的电话号码和详细地址。有三天之久，因为一直不忘这电话号码而不能入睡，因此，到了第四天，我便走进一个电话亭，拨了号码，听到了丢施的声音，他那口气好像一直都在等候我的电话。他请我当天下午就去经纪处，他要把我介绍给他的老板。

“西方”音乐会经纪处在一幢新建的办公大楼的九楼。在上电梯前，我暗自思忖，经纪处这个名义背后会不会隐藏着什么讨厌的有政治内容的勾当。有“西方”音乐会经纪处，在某一幢类似的办公大楼里肯定也会有一个“东方”经纪处。我马上选择了“西方”经纪处。我到了九楼下电梯时，我的确感觉到自己踏上了通向右边经纪处的路。壁毯，许多黄铜，全部隔音，间接照明，门挨着门互不干扰，女秘书们带着她们上司的香烟味匆忙从我身边走过，我险些从“西方”经纪处办公室门口回头逃跑。

丢施博士张开双臂迎接我。令人高兴的是，他没有拥抱我。我进去时，一位穿绿毛衣的姑娘停下了手中的打字机，随后又把由于我的光临而被耽误的工作补上。丢施到老板那里去报告我已

经到了。奥斯卡在一张英国软垫圈手椅的左前侧六分之一处就坐。接着，双扇门洞开，打字机停止，一股吸力把我从软垫上吸起。门在我身后关上，一条地毯流经一个宽敞的大厅，地毯携我流向前流去，直到一件钢管家具说明：现在奥斯卡站在了老板的写字台前面。我抬起我的蓝眼睛，在空荡荡的橡木桌面后方寻找老板，并且在一把像牙医用的椅子那样可以转动和升高的轮椅里找到了我的朋友和师傅贝布拉。他瘫痪了，眼睛和手指尖的轻微活动，表明他还活着。没错，他还有声音！贝布拉说：“又见面了，马策拉特先生。几年前，当您宁愿要当个三岁孩子来对付这个世界的时候，我已经说过像我们这样的人是不会彼此失散的？！只有一点，我很遗憾地指出，您的身材起了太大的变化，而且一点也没有好处。想当年，您刚九十四公分吧？”

我点点头，快要哭出来了。我师傅的轮椅由电动机带动，均匀地嗡嗡作响。轮椅后面的墙上，悬挂着惟一幅画，巴罗克画框，那是我的罗丝维塔，伟大的拉古娜。真人一般大的半身像，贝布拉没有随着我的目光看去，但为了知道我在看什么，他的嘴几乎一动也不动地说：“啊，善良的罗丝维塔！她是不是喜欢这位新奥斯卡呢？肯定不会。迷住她的是三岁的奥斯卡，面颊丰满红润，相当惹人喜爱。她崇拜他，她向我宣告这一点，可是，有一天，他不愿替她去取咖啡，于是她自己去取，结果就此丧命。据我所知，这不是那个面颊丰满红润的奥斯卡所干的惟一的谋杀案。他还敲鼓把他可怜的妈妈送进了坟墓，事情是这样吗？”

我点点头，感谢上帝，终于能哭了，我看着罗丝维塔。这时，贝布拉又给了一次打击：“三岁的奥斯卡爱称之为他的假想父亲的邮局职员扬·布朗斯基，他的下场又怎样呢？奥斯卡把他交给了刽子手。子弹射进了他的胸膛。奥斯卡·马策拉特先生，您既然敢改头换面出现，那么，您也许可以告诉我，三岁铁皮鼓手的第二个假想父亲、殖民地商品店老板马策拉特又是怎么回事

呢？”

我承认了，这是我为了摆脱马策拉特的第二次谋杀，叙述了我如何造成了他窒息而死，不再拿俄国兵的机枪来给自己做掩护：“是我，贝布拉师傅。这是我干的，那也是我干的，这些死亡都是我造成的。饶恕我吧！”

贝布拉笑了。我不知道他是怎样发出笑声来的。他的轮椅在震颤，在他的脸上千千万万的小皱纹上方的白发间，风在扇动。

我再次苦苦哀求他宽恕我，给我的声音带上一种甜蜜的腔调，我知道这腔调会起作用的。我用双手捂住脸，我知道，这双手很美，会产生效果：“宽恕我吧，贝布拉师傅！宽恕吧！”

他扮作我的审判官，演得还特别出色，他按了他双膝和双手间的一块象牙色按钮板上的一个小钮。

我背后走来了穿绿毛衣的姑娘。她拿着一个夹子，把它摊平在橡木桌面上。桌面安在高度大概及于我的锁骨的钢管架上，使我看不清楚毛衣女郎摊开的究竟是什么。她递给我一支钢笔：签个字才能买来贝布拉的宽恕。

但是，我不敢向轮椅的方向提问。在涂指甲油的手指指点处，我为难且盲目地把我的大名签上了。

“这是一份工作合同。”贝布拉发话了。“请您签上您的全名奥斯卡·马策拉特。这样一来，我们也就知道我们是同谁在打交道了。”

我刚签完字，电动机的嗡嗡声增强了五倍，我看到，疾驶的轮椅在行进中如何缩小，如何折叠到一起，又如何滚过镶木地板，穿过一扇旁门，消失得没有踪影。

有人 would 认为，那份合同是一式两份，我得签两次字才买回我的灵魂或者让奥斯卡承担义务去干可怕的罪恶勾当。远不是那么回事！当我回到会客室，在丢施博士的帮助下研读合同时，我很快就知道了：奥斯卡的任务在于独自一人携带他的铁皮鼓在观众

前露面，而我必须像奥斯卡当年那样敲鼓，或者像后来在施穆的洋葱地窖里那样的敲鼓。音乐会经纪处负责我的旅行演出，在我以“鼓手奥斯卡”的名义携带铁皮鼓登场之前，先要做广告宣传。

在做广告宣传时，我就靠“西方”音乐会经纪处第二次预支给我的一大笔钱过日子。我有时走访那幢办公大楼，接见记者，让人给我照相。有一次，我在这幢到处外观一样、气味相同的楼里迷失了方向。丢施博士和毛衣女郎对我彬彬有礼，只是我再也沒有见过贝布拉师傅露面。

在首次旅行演出之前，我原本可以租一套比较像样的公寓。但是，由于克勒普的缘故，我仍旧留在蔡德勒家。克勒普抱怨我同经理们往来，我设法跟他和解，但在具体问题上不让步，也不再同他一起去旧城，不再喝啤酒，不再吃新鲜血肠加洋葱。为准备火车旅行，我到火车站高级餐厅去用餐。

奥斯卡没有大量篇幅详述他的种种成就。第一批广告宣传画在出发旅行演出前一周出现了，为我取得成功鸣锣开道，宣告一位魔法师、祈祷治疗师、一位救世主即将登场，如此宣传，手段卑劣，但是效果极佳。我先走访鲁尔区诸城市。我演出的大厅，能容纳一千五百到两千人。我独自一人蹲在舞台上一道黑天鹅绒幕布前。一盏聚光灯照射着我。我身穿一件吸烟服。虽说我也敲鼓，但是没有有一个年轻爵士迷成为我的追随者。四十五岁以上的成年人来听我演奏，给我捧场。准确一点，我的听众的四分之一是四十五岁到五十五岁的人。他们是我的追随者中较年轻的一个层次。五十五岁到六十岁的人组成另一个四分之一。六十岁以上的老头老太太最有欣赏能力，他们占我听众的一半。我跟这些高龄听众攀谈，他们都回答我。我让三岁孩子的鼓讲话时，他们也不沉默。每当我在鼓上奏出神奇的拉斯普庭的神奇的生活片断时，他们不是用老人的语言，而是像三岁小孩那样口齿不清，唧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咿呀呀地乱叫：“拉舒，拉舒，拉舒！”演奏拉斯普庭，对于大多数听众的要求实在太高了，因此，演奏另外一些主题时所取得的成功就更轰动，譬如：头几个乳齿——糟糕的百日咳——长统羊毛袜刺痒——梦见大火就尿床。这些主题，老小孩儿们都喜欢。他们全都身临其境。出乳牙时，他们感到疼痛。患百日咳时，两千位上了年岁的听众咳个死去活来。我给他们穿上长统羊毛袜时，他们赶忙挠痒。有些老年女士们和先生们由于梦见一场大火而尿湿了椅垫和内裤。我记不清究竟是在乌珀塔尔还是在波鸿，噢，是在雷克林豪森，我为老年矿工演奏，工会支持这场表演。我想，这些老年矿工一辈子同黑色煤块打交道，一次小小的黑色惊吓对他们来说应该不算什么吧。于是奥斯卡敲出了《黑厨娘》没料到一千五百名矿工，经历过水淹坑道、矿井瓦斯、罢工失业，一听黑厨娘，都惊恐万状，乱喊乱嚷，礼堂里厚窗帘后面许多块玻璃成了牺牲品。这正是我要提及这段插曲的原因。就这样，我又间接地恢复了我的毁玻璃嗓子。不过，我一般不用它，因为我不想毁了我的生意。我的旅行演出就是做生意。我回到杜塞尔多夫，跟丢施博士一算账，我的铁皮鼓简直就是个金矿。

我已经放弃了同贝布拉师傅再见一面的可能，也不再问起他，丢施博士却通知我，贝布拉正等着要见我。

我第二次拜访贝布拉师傅的情形跟第一次不同。不必再站在钢管桌子前面，而是在他师傅的轮椅对面找到了一把按他的身材设计的电动可转轮椅。我们久久坐着，沉默无语，听着丢施博士录在磁带上有关奥斯卡的鼓艺的报道和消息。贝布拉看来十分满意。听了新闻界的胡说八道，我反倒觉得尴尬。他们宣称我和我的鼓有治疗效果，说我的鼓可以治疗记忆力衰退。“奥斯卡主义”这个字眼也冒出来了，不久就变成了流行字眼。

听完录音，毛衣女郎递给我一杯茶。她又把两片药放到贝布拉的嘴里。我们闲聊。他不再数我的罪状。就像多年前我们坐在

四季咖啡馆里那样，惟一缺的是罗丝维塔夫人。我发现，在我颤颤惊惊地讲述奥斯卡的往事时，贝尔拉师傅睡着了。于是我先玩了一会儿我的电动轮椅，让它嗡嗡叫，在镶木地板上呼啸，让它左右旋转，让它收缩、上升。我真舍不得离开这件万能家具，它简直像一种给人提供无穷尽机会的无害的恶习。

我的第二次旅行演出恰逢基督降临节。我也制定了相应的节目，天主教和新教的报纸同声为我唱赞歌。说我怎么样成功地把那些被熬煎成坚硬如石的年迈罪人变成了幼儿，使他们用单薄但感人的声音唱起了基督降临节圣歌。两千五百人齐唱“耶稣，我为你而生，耶稣，我为你而死。”开始，谁也不会相信这些年纪这么大的人会具备儿童的信仰热情。

第三次旅行演出又遇上狂欢节，我同样有所准备。我的几场演出，使所有颤巍巍的老奶奶和老爷爷都变成了幼稚可笑的强盗婆和砰砰放枪的强盗王，任何儿童狂欢节都没有这样自由自在，欢天喜地。

狂欢节过后，我同唱片公司签了几份合同。我在隔音工作室里录音，开始困难重重，因为那种气氛扼杀任何创造力。后来，我让他们在工作室墙上挂起养老院或公园长凳上那些老年人的巨幅照片，我就能富有效果地敲鼓了。

奥斯卡发财了。唱片像热乎乎的小圆面包那样畅销。但我并没有搬离原先是个洗澡间的那个可怜的住房？是为了我的朋友克勒普的缘故，也为了乳白玻璃门背后道罗泰娅姆姆曾经呼吸过但是现在则空着的小间，我没有离开我的房间。这么多的钱奥斯卡怎么花呢？他向他的玛丽亚，提出了一个建议。

我对玛丽亚说：如果你将施丹策尔撵走，不嫁给他，我就给你在最好营业地段买下一斗现代设备的美食店，亲爱的玛丽亚，因为你生下来就是为了做生意的，而不是为了某个叫施丹策尔先生的野男人的。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没有看错玛丽亚。她和施丹策尔一刀两断，用我的资金在弗里德里希街盖起了一家一流的美食店。昨天，玛丽亚非常高兴但不带任何感激之意地告诉我，三年前建的那家店于一个星期之前已在上卡塞尔开设了一处分店。我又一次旅行演出回来。已经不知是第几次了？反正是在最炎热的七月间。在火车站，我招手叫来一辆出租汽车，直奔办公大楼。和在火车站一样，大楼前面也等着一群讨厌的要我签名的人。有退休老人，也有老祖母，他们干嘛不回家去照顾孙儿孙女？我立即让人向老板通报，还是那洞开的双扇门和通往钢管家具的地毯。可是，桌子后面坐着的不是贝布拉师傅，等候我的不是轮椅，而是丢施博士的微笑。

贝布拉几个星期前死去了。遵照贝布拉的愿望，他们没有告诉我，他已经病危。他不让任何事情把我的旅行演出打断，即使是他的死讯。紧接着宣读遗嘱，我继承了一大笔财产和罗丝维塔的半身画像，却遭受了可观的经济损失，因为我本来要去南德和瑞士作两次旅行演出，合同已经签了，这时突然毁约，人家要求赔偿。

除了这几千马克的损失外，贝布拉之死给了我沉重的打击。我锁起我的铁皮鼓，差不多足不出户。加之，我的朋友克勒普娶了一个抽烟的红发女郎为妻，因为他曾经把自己的一张相片送给了她。他没有邀请我去参加婚礼。婚礼前不久，他搬到施托库姆去了。奥斯卡成了蔡德勒的惟一房客。

我同刺猬的关系有了一点改善。自从几乎每家报纸都把我的姓名印在大字标题中以来，他对我充满敬意。他把道罗泰娅姆姆住过的小间钥匙也给了我，相应地得到了一小笔钱。后来，我租下了这个小间。

我的悲哀也就开始了。我打开两扇房门，从我的房间里的浴缸出发，踏过走廊里的椰子纤维地毯，走进道罗泰娅的小间，呆望着空衣柜，五斗橱上的镜子在讥讽我，在笨重的没有被褥的床

前陷入绝境，又救出自己来到走廊里，为逃避椰子纤维而躲进我的房间，仍旧得不到安宁。

有一个东普鲁士人，在马祖里破产了，但他擅长做买卖，在于利希街附近开了一爿店，并且起了个简单而贴切的名字——“租狗店”，也许是他考虑到了孤独的人的需要吧。

我去那里租了卢克斯，一条黑色罗特魏尔牧羊犬，健壮，由于太肥了，浑身亮油油的。我带着它散步。于是，我就不必再在蔡德勒寓所里我的浴缸和道罗泰娅姆姆的空衣柜之间来回奔波了。

卢克斯带我去莱茵河边。对着船舶吠叫。卢克斯带我去拉特，去伯爵山森林。它对着情侣吠叫。一九五一年七月底，卢克斯领我去杜塞尔多夫的郊区之一的格雷斯海姆，靠着几家工厂，包括一座较大的玻璃厂，可是并没有完全改变这个地方原本的农村风貌。刚过格雷斯海姆就有许多小菜果园，小菜果园周围便是牧场，谷浪起伏的地方，也许就是黑麦田。

卢克斯领我去格雷斯海姆，又从格雷斯海姆来到小菜果园和田地之间的那一天，是酷热的一天。郊区最后一排房屋留在我们身后的时候，我才替卢克斯解掉了皮带。它仍旧走在我的身边，它是条特别忠实的狗。作为一家租狗店的狗，它必须易主而从，对众多的主人都得忠实。

也就是说，罗特魏尔牧羊犬卢克斯，跟猎獾犬大不相同。我认为一条狗这样顺从是夸张的，我宁愿看到它活蹦乱跳的，踢它，让它跳。但它到处乱跑时仍心怀内疚，一再掉转它的光滑的黑脖子，绝对忠实的狗眼睛一直望着我。

“走开，卢克斯！”我命令它，“走开！”

卢克斯每次都服从，可是走开的时间都特别短。因此，我注意到，它这一回走开的时间比较长，隐没在庄稼地里了。这里长的是黑麦，随风起伏。不对！一点风也没有，雷雨前的闷热。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卢克斯追小兔子去了，我想，它也许需要独处，当一条狗，就像奥斯卡也想摆脱狗一样。

我没有注意周围的环境。小菜果园、格雷斯海姆和这个效区后面水汽笼罩的低平城市都不能引起我的注意。我坐到一个生锈的空缆盘上，刚坐下来我就用手节骨敲着这个生锈的缆盘，像在敲缆盘鼓。天热。我的衣服压在身上，不是适宜夏天穿的那种薄衣服。卢克斯没回来。缆盘鼓虽说不能代替我的铁皮鼓，但我毕竟逐渐地回到往事中去。当回忆不愿继续的时候，当前几年医院环境的图像重现的时候，我抓到了两根干瘪的小圆棍儿，暗自说：等等，奥斯卡。现在我们要看看，你从哪里来，你是谁。他们已经点亮了我出生时的两只六十瓦电灯泡。飞蛾在灯泡之间飞舞，远处，一道闪电照亮了笨重的家具。我听到马策拉特在说话，紧接着是我的妈妈。他说要给我店铺，妈妈说要给我玩具，到我三岁时，我将拥有一面铁皮鼓。奥斯卡想法子尽快度过这三个年头。我吃，喝，排泄，增加休息，让他们给我称体重，用襁褓包裹，洗澡，扑粉，梳刷，种牛痘，让他们观赏，叫我的名字。照他们的意思办，讨他们欢心。我多次腹泻，经常感冒。我取来百日咳，让它在我身边留了一段日子，在我明白了它的复杂节奏、永远留在我的手腕里之后，我才让它离开。大家知道，《百日咳》这首小曲属于我的保留节目。当奥斯卡向两千听众敲响百日咳时，两千名老头，老太太一齐咳嗽。

卢克斯在我跟前哀号，用身体蹭我的膝盖。唉，我可怜的狗啊！他摇着尾巴，四条腿站着。真是一条狗，有狗的目光，流口涎的嘴里叼着狗认为有价值的东西：一根棍儿，或是一块石头。

我的意义如此重大的童年慢慢地溜走了。乳齿引起的颞间的疼痛渐渐消失。我困倦地往后仰去：一个长大了的、细心地穿得太暖了些的驼背，皮夹里有身份证和一把钞票，戴着手表。我已经叼上了一支点燃的香烟，让烟草味来顶替我嘴巴里那种单一的

童年的口味。

卢克斯呢？卢克斯还在用身子蹭我。我推开它，用烟喷它。它不爱闻烟味，可是它仍旧不走，还在用身子蹭我。它盯着我看。我在附近的电线杆之间的电话线上寻找燕子，想用燕子作为对付这条烦人的狗的工具。可是没有燕子，卢克斯又赶不走。它的嘴伸到我的两腿中间来，好像是事先训练好的，正巧碰到那个地方。

我用鞋跟踢它两下。它向后退，颤抖地站着，叼着小棍儿或石头的嘴目标明确地对准我。它叼着的仿佛不是小棍儿或石头，而是我的钱包，可我感觉出钱包仍在我的上装口袋里。或许是我的手表，但手表在我的手腕上滴滴答答地走着。

它叼着的究竟是什么呢？有那么重要、那么值得给人看的东西吗？

我已经把手伸到了它的冒热气的牙齿中间，然后又把那件东西捏在手里。我认请了我捏着的东西，却装着在寻找一个词汇，来给卢克斯在黑麦田里找到的那件东西起个名称。

人体的一些部分，当它们同人体分开，反倒让人可以无比确切、无比容易地观察。这是一个女人的手指。一个女人的无名指。一个美观地戴着戒指的女人的手指。这个手指是在掌骨和第一指节之间，在戒指下方大约两厘米处被砍断的。截面干净，清晰可辨，还留有手指伸展肌的腱。

这是一个美的、可活动的手指。戒指上的海蓝宝石由六个金爪固定，戒指本身有一处很薄，是因为戴久磨损，已经到了快断裂的地步。由此推断，这是一件祖传的遗物。指甲里有泥土，看来这手指曾经抓过或抠过泥土，但从指甲盖和指甲修剪的切口看，是一个爱干净的人。我从冒热气的狗嘴里拿到这个手指时，它是凉冰冰的，从它所特有的白里泛黄的颜色看，也证明它是冰凉的。几个月来，奥斯卡在他的左前胸小袋里总插着一块绅士小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手绢。他取出这块丝手绢，把无名指放在上面，看到，手指里侧直到第三指节有许多纹路，证明，这个手指是勤劳的、有上进心的、意志坚定的。

我用手绢把手指包好，从电缆盘上站起身来，拍拍卢克斯的脖子，右手捏着手绢和手绢里的手指，正要动身回家去，心想怎么处理这件拾来之物，而且也走到了就近一个小菜果园的篱笆前。这时，维特拉把我叫住，方才他躺在一棵苹果树的树杈上，看到了所发生的一切。

末班有轨电车或朝拜密封大口玻璃瓶

单凭他的声音让人讨厌：这傲慢的、装腔作势的带鼻音的调门。并且他还躺在苹果树的树杈上说：“您有一条能干的狗，先生！”

我有点心慌意乱地说：“您在苹果树上干嘛？”他在树杈上忸怩作态，欠了欠他的长长的上半身。“只不过是些酸苹果，您不必害怕。”

我不得不给他点颜色看看：“您的酸苹果同我有什么关系？我有什么可害怕的？”

“好吧，”他吐了吐舌头。“您可以把我当成乐园里的蛇，因为那时候也已经有酸苹果了。”

我发火了：“胡说八道！”

他狡猾透顶：“或许您以为，只有宴席上的水果才值得犯下罪孽去吃吧？”

我打算离开了。在那种时刻，再没有什么能比讨论乐园里的果实究竟是何品种更让我无法忍受了。这时，他却要同我面对面了。他敏捷地从树杈上一跃而下，轻浮地站在篱笆旁，高个儿：“您的狗从黑麦田里叼来的是什么呢？”

我只回答说：“一块石头。”

这就酿成一场讯问了：“您怎么把石头塞进口袋去了？”

“我喜欢把石头放在口袋里。”

“我觉得，狗叼来的东西好像是一根小棍儿。”

“我说它就是石头，即使它的确是或者可能是一根小棍儿。”

“这么说，是一根小棍儿了？”

“依我看，宴席水果和石头，酸苹果和小棍儿……”

“这小棍能动是吗？”

“该回家了！我走了！”

“是一根肉色小棍儿吗？”

“您还是别多管闲事了吧！——来，卢克斯！”

“是一根肉色的、戴戒指的、能动的小棍儿吗？”

“您到底想怎么样？我是来散步的。”

“您瞧，我正想借点什么呢。能让我把那枚漂亮的戒指在我的小拇指上戴那么一秒钟吗？就是在那根小棍儿上闪闪发光的那枚戒指。——我叫维特拉，戈特弗里德·封·维特拉。我是我们家族的最后一个。”

就这样，我认识了维特拉，而且当天我就同他结成了友谊，今天我还称他为我的朋友。所以，几天前，当他来疗养院探望我时，我对他讲：“我很愉快，亲爱的戈特弗里德，是你，我的朋友，当时去警察局告发的是你，而不是别人。”

假如真的有天使，那他的模样一定像维特拉：高个儿，轻浮样，活泼，能曲能伸，宁愿去拥抱街灯柱也不去拥抱一个少女。

维特拉不是很容易被人发现的。他只显示出某个特定的侧面，根据不同的环境，他会变成线，变成稻草人、横树杈、衣架等等。所以，当我坐在缆盘鼓上时，我也没有在意他。甚至狗也没有叫，因为狗既嗅不到也看不到天使，更不会对他吠叫了。

“麻烦你，亲爱的戈特弗里德，”大前天我请求他说，“给我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寄两年前你在法庭上宣读而引起我这场官司的那份指控书的副本来吧。”

副本在这里。现在就让在法庭上指控我的维特拉来宣读吧！

我，戈特弗里德·封·维特拉，那天，我在母亲的小菜园里一棵苹果树的树杈上躺着。我在树杈上，侧卧着，左髋骨枕在树杈长青苔的最低点上。双脚正对着格雷斯海姆的玻璃厂。我直直地看着前方。我看着，等待着我的视野之内将会发生的事。

被告，现在是我的朋友，走进了我的视野。他领着一只狗，在他周围打转，如被告后来对我说的那样，它叫卢克斯，是一条罗特魏尔牧羊犬，在罗胡斯教堂附近一片租狗店里可以租到它。

被告坐到那个空电缆盘上，战争结束后，他就一直在我母亲阿丽丝·封·维特拉的菜果园前面。如法庭所知，被告身材矮小而又畸形。这使我注意上了他。这位衣着讲究的矮个子先生的举动格外使我感到奇特。他用两根干树枝在生锈的缆盘上敲起鼓来。有几种可能：一、被告的职业是鼓手；二、如事实所表明的，他无论到哪都进行职业练习；三、缆盘，它能引诱任何一个门外汉把它当鼓敲；那么，就可以说，被告奥斯卡·马策拉特在一个雷雨将临前闷热的夏日，在阿丽丝·封·维特拉太太的小菜园前的一个缆盘鼓上坐定，用两根长短不一的干白杨树枝制造了有节奏的噪音。

我接着证实，那条狗卢克斯钻进成熟待割的黑麦田里待了好长一段时间。时间到底有多长，我没计算，因为我只要一躺到我家苹果树的树杈上，便没有了时间概念。如果我说狗消失了较长时间，那意思就是我特别注

意那条狗，因为它的黑色狗皮和宽边耳朵很讨我喜欢。

可是，被告并不很在意那条狗。

卢克斯从成熟待割的黑麦田里回来时，嘴里叼着什么东西。我看不清楚那是什么。我想那是一根棍儿，一块石头，一个铁皮罐头或是一把铁皮匙。当被告从狗嘴里取出犯罪事实时，我才清楚地看到那是什么。从狗用叼着东西的嘴去蹭被告的——也许是——左裤腿的那一刻起，直到被告为占有而伸手去取的那一刻——无法确定时间，大概有几分钟了。

虽然狗拼命引起它的租借主人的注意，后者却不为所动地敲他的鼓，方式很难理解却又单调易记，像儿童敲鼓一般。当狗借助于一种淘气的动作，用湿嘴朝被告的两腿间撞去时，被告才放下两根白杨树枝，可能是用右脚去踢它。狗绕了半个弧形，又谦卑地颤抖着又一次走近，抬起叼着东西的嘴。被告没有站起来，又用左手伸向狗的牙齿间。卢克斯在它拣到之物被取走后，便后退了几米之远。可是，被告仍然坐着，手里拿着拣到之物，把手捏拢、摊开数次，拣到之物上的东西在闪烁。被告习惯于看这拣到之物后，使用食指和拇指将其垂直地捏住，举到眼窝上下。

这时，我才看清楚那是一个手指，又由于那闪烁之物的缘故，我把这个概念扩大了，称之为无名指，但没想到，我竟然以此替战后最有趣的刑事诉讼案之一起了个名字：无名指诉讼案。最后，我，戈特弗里德·封·维特拉，又被称为此案最重要的见证人。

被告镇静，我也镇静。不错，被告的镇静使我受了感染。当被告用他装饰胸袋的那条小手绢细心地包起那个戴戒指的手指时，我对这个人产生了好感。一位正派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绅士，我想，我要与此人成为朋友。

于是我招呼他，而他带着那条狗正要离开，向格雷
斯海姆走去。但他的反应开始恼火，甚至可以说是傲
慢。直到今天我还是不能理解，他为什么仅仅因为我躺
在苹果树上便要把我看成是蛇的象征。他也怀疑我母亲的
酸苹果，说这无疑是乐园里的那一种。

喜欢躺在树杈上，我的确是恶魔的一种习惯。但是，我是因为无聊才这么做的。它像一种流行病，我不
费力就染上了。那么，驱使被告到杜塞尔多夫城外来的
又是什么呢？后来他告诉我是孤独，无聊和孤独不就是
两姐妹吗？我这样想，是为了替被告澄清，而不是指控
他。使我对他产生好感，同他聊天，最后结成友谊的，
恰恰是他的击鼓。他把恶魔化作节奏，他的击鼓本身就
是恶魔的变种。把我作为证人、把他作为被告传唤到法
庭上来的那份指控书，也是我们两人发明的一种游戏，
是为了维持和消除彼此的无聊和孤独的一种小手段。我
再三请求，被告迟疑了一下就从无名指上摘下了戒指戴
在我的小拇指上。正合适，我非常高兴。在我试戴戒指
之前，我已经从我躺着的树杈上溜下来了，这是不言而
喻的。我们站在篱笆的两边，相互认识，交谈，涉及到
一些政治话题，随后他把戒指给了我。手指由他小心地
保留着。我们都认为，这是一个女人的手指。当我戴着
戒指，让日光照射它时，被告用空着的左手在木篱笆上
敲出一种明快的、舞曲般的节奏。我母亲的菜园子的木
篱笆没有支撑物，它根据鼓手的要求发出了啪嗒声和颤
音。我记不清我们这样站着并且以目传神到底有多长时
间。我们都很喜欢这最无恶意的游戏。这时，在中等高
度，有一架飞机传来了它的引擎声。这架飞机也许要在

洛豪森降落。虽说我们都想知道这架双引擎或四引擎的飞机是否开始降落，但我们仍旧没有让目光离开对方。后来，我们不时地找到机会去做这种游戏，并称之为舒格尔·莱奥的苦行；舒格尔·莱奥是被告多年前的一个朋友，当时他们两人总在公墓上玩这种游戏。

飞机——我不知它到底是双引擎还是四引擎——找到了它的着陆场后，我把戒指还给了他。被告又重新把戒指戴到那个无名指上用他的小手绢包着，接着，他要我陪他一起走。

这是一九五一年七月七日。到了格雷斯海姆，我们在有轨电车终点站乘上出租汽车，被告日后还常有机会在我面前显示他的慷慨大方。我们乘车进城，到租狗店归还了卢克斯，又上了出租汽车，横穿过城市，经比尔克、上比尔克到韦尔斯滕公墓。马策拉特先生付了十二马克以上的车钱，随后我们去石匠科涅夫的墓碑店。

那里非常脏，我十分高兴，石匠仅用了一个小时就完成了我的朋友嘱托。我的朋友亲切而详细地向我讲解工具和石头的种类，与此同时，科涅夫先生给手指（不戴戒指）做了一个石膏复制件。我只是捎带着看他干活。手指必须先抹上油脂，绕上合股线，再抹上石膏，在石膏变硬之前，把模子连同合股线割成两半。我的职业是装饰师，做石膏模子对我来说其实算不上陌生。可是，那个手指在石匠的手里，就让人感觉有些恶心。直到完成复制品，被告又把手指拿过去，擦去油脂，包在他的小手绢里时，这些令人恶心的成分才去掉。我的朋友付钱给石匠。他开始并不收，因为他把马策拉特先生当做同行看待。他还说，奥斯卡先生以前帮他挤过疖子，同样分文不取。模子里的石膏变硬了，石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匠打开模子，取出复制品，并答应，几天之内还可以用这个模子做出更多的复制品来，并陪同我们穿过他的墓碑陈列场，直到比特路。

我们第二次乘上出租汽车去火车站。被告请我在整洁的车站饭馆用晚餐，我们吃了很久。他同侍者说话随便，因此可以断定马策拉特先生常来这家饭店。我们吃公牛胸脯肉加新鲜萝卜还有乳酪、莱茵鲑鱼，然后喝了一小瓶香槟酒。我们的话题又回到手指上来时，我劝被告把这个手指交给失物招领处，尤其是因为他已经有了石膏复制品。被告则坚决而肯定地说，他认为自己是这个手指的合法占有者，因为在他诞生之时，人家就许诺给他一个手指，尽管手指被译成密码，用鼓棒来代替。他还以他的朋友赫伯特·特鲁钦斯基背上的伤疤为证，那些手指般长的伤疤也预言了无名指。此外，还有他在萨斯佩公墓拣到的那个空弹壳，它也具有无名指的尺寸和意义。

对于我新交的朋友所列举的这些证明，我开始只好报以微笑。可我必须承认，一个思想开放的人一定不难理解这互相关联的一组词：伤疤，鼓棒，无名指，子弹壳。

晚餐后，第三辆出租车把我送回家。我们告别。三天后，我如约去拜访被告，他已经为我准备下一件惊人的东西。

他先领我看他的寓所，因为马策拉特先生是三房客。他最初只租了一间十分简陋的房间，原先是个浴室；后来，他的鼓艺给他带来了财富和名望，他又租下了一间他称之为道罗泰娅姆姆的小间；他还慷慨地为第三个房间付大笔房租，这个房间原先是一个姓闵策尔的

音乐家居住，他是被告的同行。二房东蔡德勒先生知道马策拉特先生有钱，就无耻地把房租抬高。

在所谓的道罗泰娅姆姆的小间里，被告为我准备下一件令人吃惊的东西。在一个有镜子的梳妆台的大理石板上放着一个密封大口玻璃瓶，同我母亲阿丽丝·封·维特拉用来贮存我家酸苹果做的苹果酱的大口瓶一样。但是，这个大口瓶里盛着的是在酒精里游泳的无名指。被告自豪地告诉我他从许多科学著作中学来的保存手指的知识。这些书我只是匆匆翻了翻，连插图都差不多没看，但我承认，被告成功地保存了手指的外观。此外，玻璃瓶和里面的东西在镜前显得十分漂亮，是有趣的装饰，这一点，我作为职业装饰师可以一再予以证实。

被告发现我喜欢这玻璃瓶的外观，便向我透露，他有时朝拜那玻璃瓶。我感到莫名其妙，冒失地请他马上示范一次。他请我帮忙，给我纸和笔，要求我把他的祈祷记录下来，也可以提出有关手指的问题，他会诚实地边祈祷边答复。

这里，我将被告的话、我的问题和他的回答作为证词供述如下：朝拜密封大口玻璃瓶。我朝拜。我指谁？奥斯卡还是我？我虔诚，奥斯卡心不在焉。一心一意，不间断，不怕重复。我，头脑清醒，因为心中没有回忆。奥斯卡，头脑清醒，因为心中充满回忆。我，冷，热，暖。不询问便无罪。询问时有罪。有罪的原因，摔倒的原因，变成有罪尽管，宣布我无罪，转嫁给，咬紧牙关，使我防止，嘲笑，笑对，笑是因为，哭泣为了，哭对，哭而没有，言谈中亵渎，亵渎中沉默，不说话，不沉默，只是祈祷。我朝拜。什么？玻璃。什么玻璃？密封大口玻璃瓶。玻璃瓶密封着手指。什么手指？无名

指。谁的手指？金黄头发的。谁的金黄头发？中等身材。一米六〇？一米六三。有何特征？肝痣。长在哪里？上臂里侧。右臂左臂？右臂。这只无名指是哪只手的？左手。订婚了？是的，却仍单身。信仰？新教。童贞女？童贞女。何时出生的？不知道。何时？在汉诺威附近。何时？十二月。人马星座还是摩羯星座？人马座。性格？胆小。好脾气？话多，勤快。谨慎？务实，节约，也开朗。腼腆？喜欢吃甜食，正直，太虔诚。面无血色，总是梦见旅行。经期不规则，迟钝，常常忍受却又想讲出来，本人缺乏想象力，被动，耐心等待，静心听人讲话，点头表示同意，交抱双臂，说话时眼睑下垂，别人招呼我时，眼睛睁大，浅灰色，瞳孔附近是棕色，得到已婚上司所赠的戒指，先不想接受，后又接受，可怕的经历，纤维，撒旦，许多白色，出走，搬迁，又回来，不能摆脱，无来由的嫉妒，疾病但不是自己得的病，死亡但不是自己寻的死，不，不知道，也不愿意，正在摘矢车菊，那一个来了，不，事先就陪伴着，再也不能……阿门？阿门。

我，戈特弗里德·封·维特拉，把这份祈祷记录补充到我对法庭的证词中去的原因很简单，是因为这份陈述虽然有些含混不清，却同法庭关于被谋杀的女人的报告大部分相同。怀疑被告的证词，即他既没有谋杀这位护士，也没有面对面见过她，这可不是本人的任务。

不过，我的朋友们的祈祷是真诚的，今天我还认为这一点是值得注意的，并且是有利于被告的一个证明。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因为被告请我当他的旅伴，所以我经常会看到被告祈祷与击鼓，并给我慷慨的报酬，带我去作他已中断较长时间、但在拣到无名指后不

久便又恢复了旅行演出。我们周游了整个西德，接下来准备去东德甚至到外国去。可是，马策拉特先生宁可留在国境之内，而不愿去凑流行的旅行演出的热闹。在演出之前，他从不对大口玻璃瓶击鼓祈祷。在他登台演出和晚餐之后，我们回到旅馆房间里时，他才击鼓祈祷，我则提问记录。之后，我们把这一次的祈祷同前几次的祈祷对比。祈祷时间长短不一。求得的话有时非常矛盾，但改日却又变得一目了然而且冗长详细。但是我收集呈交法庭的全部祈祷记录比我附在证词后的第一次记录要少许多。

在这一年的旅行演出的间歇泛泛地认识了马策拉特的一些亲戚和熟人。他向我介绍了他的继母玛丽亚·马策拉特太太。被告十分爱慕她，却得克制自己的感情。那天下午，我见到了被告的同父异母的弟弟，十一岁的库尔特·马策拉特，受到良好教育的文科中学学生。玛丽亚·马策拉特太太的姐姐，古丝特·克斯特太太，同样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被告告诉我，战后头几年，他的家庭关系遭破坏。直到马策拉特先生替他的继母开设了一家规模很大的美食店，当该店遇到困难他又一再资助的时候，他与继母之间才结成友谊的同盟。

马策拉特先生也让我结识了几位爵士乐师。虽然我觉得闵策尔先生——被告亲切地叫他克勒普——是那样随和与开朗，但我时至今日仍不想继续保持这种关系。

由于被告的慷慨大度，我没有必要继续从事我的装饰师的职业。但是，当我们由旅行演出回到本地后，我便接受委托装饰一些橱窗。被告对我的手艺十分兴趣，多次深更半夜站在街上，不知疲倦地充当我的平庸手艺的观赏者。有时，工作做完后，我们还在夜深人静的杜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塞尔多夫溜达一圈，但是从不去旧城。因为被告讨厌古德意志的商店招牌和牛眼形玻璃。就这样一次子夜过后的散步引我们穿过下拉特来到有轨电车停车场前面。

我们不约而同地停下，注视着驶入停车场的末班有轨电车。这场面特别好看。城市一片漆黑，远处，一个喝醉的建筑工人在怪声唱歌，因为今天是星期五。在此之外，一片寂静，虽然进场的末班电车铃声丁当并让弯曲的铁轨发出声响，但是并不让人烦躁。大多数电车驶入车站，可是也有几辆空车，毫无秩序地停在铁轨上，像过节似的亮着灯。是谁出的主意？是我先开的口：“亲爱的朋友，怎么样？”马策拉特先生点点头，我们不慌不忙地上了车。我站到驾驶台上，像个优秀的有轨电车司机那样稳稳起动，慢慢加速。当我们已经把明亮的停车场扔在背后的时候，马策拉特先生夸奖我说：“你肯定是个受过洗礼的天主教徒，戈特弗里德，否则的话，你开有轨电车就不会开得这么好。”

说实话，这件小小的临时工作带给我无穷欢乐。看来，停车场上的人没有发现我们把车开走了。没有人追我们。再说，人家可以把电源切断，很容易就让我们停下来。我们朝弗林格恩方向驶去，穿过弗林格恩，正思考是否在汉尼尔附近拐弯，朝拉亭根、拉特驶去，这时，马策拉特先生请我开进去格雷斯海姆、伯爵山的轨道。虽然我害怕狮堡舞厅下面的那段上坡路，但还是满足了他的要求，闯过了那段上坡路，过了舞厅。这时，我被迫刹车，因为有三个人站在铁轨上，让我停车。

刚过哈尼尔，马策拉特先生就已经到车厢里面去抽香烟了。我作为司机只好大声说：“请上车！”我看见那个不戴帽子的人被他的同伴夹在中间，上车时不知为什

么好几次没有踩到踏板。他的两个陪同或看守十分粗暴地帮他登上司机台，紧接着走进车厢去。

我又把车开走时，听到后面车厢里一阵凄惨的呜咽声，接着是有人连打几个耳光。然后，是马策拉特先生坚定的声音，这我才放心。他谴责刚上来的那两个，警告他们，不该动手打一个受伤的、半瞎的又苦于丢失了眼镜的人。

“您少管闲事！”我听到那两个人其中的一个厉声吼道，“他今天还要经历他所想象不到的事呢！已经拖得够久了。”

我把电车向格雷斯海姆缓缓地驶去时，我的朋友，马策拉特先生想要知道，这个可怜的半瞎的人到底犯了什么罪。他们的谈话立即转到了奇怪的话题上去。刚讲了两句话，话题就转到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的战争时期了。战争爆发，那个半瞎子据他们说是个义勇军战士，非法地保卫过一座波兰邮局大楼。让人想不到的是，马策拉先生当时只有十五岁，却认识这个半瞎子，他称他为维克托·韦卢恩。这个可怜的、近视的、送汇款单的邮递员，在战斗过程中丢掉了眼镜，逃脱了那些刽子手的掌心。可是，他们不放弃，一直追捕他直到战争结束，甚至在战后还在追捕他。他们拿出一张纸来，是一九三九年签发的一道枪决命令。两个戴绿帽子的人说他们终于抓到他了，历史的旧帐终于要了结了。为了执行这道一九三九年的枪决命令，把自己的业余时间都赔上了，甚至假期他是一位商务代表。他的战友也有困难，他是来自东方的难民，失去了在那边开设的生意兴隆的裁缝店，现在必须从头开始现在事情算有了个头了。今天夜里将执行命令，了结过去的事。还算幸运，乘上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末班车。

把一个被判处死刑的人和两个持有枪决命令的刽子手送到格雷斯海姆去，本来我并不愿意这样做。在郊区空无一人的、有点倾斜的集市广场上，我把车向右拐，向玻璃厂附近的终点站开去，到了那里，让那三个人下来，再同我的朋友踏上归途。距离终点站还有三站路，马策拉特先生从车厢里出来，把他的公事皮包放到职业司机放他们的盛黄油面包的饭盒的地方。我了解，他的皮包里竖放着那个密封大口玻璃瓶。

“我们必须救他，他是维克托，可怜的维克托！”马策拉特先生激动地说。

“他是高度近视眼，他一直还没有找到一副合适的眼睛。他们要枪毙他，而他会看错方向的。”我认为刽子手没带武器。但是马策拉特先生看到他们的大衣鼓鼓的。“他是但泽波兰邮局送汇款单的邮递员。现在他在联邦邮局从事同样的职业。可是，因为那份枪决命令还在，下班以后，他们就追捕他。”

虽然我并不全部理解马策拉特先生的想法，但我仍然答应他，在枪决的时候在他身边待着，有可能的话，同他一起去阻止枪决。

过了玻璃厂，在第一排小菜果园前不远处——月光下，我看到了我的母亲的园子和那棵苹果树——我停下车，让他们下车！”头戴黑带绿帽的两个人马上下车。那个半瞎子又费劲地找踏脚板。马策拉特先生随后下车，从外套下取出他的鼓。下车时，他请我带上他的公事皮包和里面的大口玻璃瓶。

我们扔下还始终亮着灯的有轨电车，紧盯着那两个刽子手和那个可怜的人。

我们沿着菜果园篱笆走去。我走累了。前面的三个人停下时，我发现，他们选中了我母亲的菜果当园枪决地点。我和马策拉特先生共同抗议。他们并不在意，推倒腐朽的木板篱笆，把那个马策拉特先生叫做可怜的维克托的半瞎子绑在苹果树上我的树杈下面。因为我们继续抗议，他们把一个姓策勒夫斯基的陆军司法总监签署的枪决命令给我看。我记得，日期一栏写着：一九三九年十月五日于索波特，印章也没错，看来希望渺茫。但是，我们谈到了联合国，谈到集体罪责、民主制、阿登纳等等。可是，绿帽子中间的一个用一句话就把我们的全部反对意见都挡了回去。他说，现在还没有起草和签订和约，因此，我们不该插手此事。他说，他同我们一样选举阿登纳，但这道枪决命令嘛，却仍然有效。他们带着这道命令去找过最高当局，请当局拿主意，结果，他们还得执行这该死的职责。因此，他说我们还是走开为妙。

我们没有走。两个绿帽子解开大衣扣子，让机枪探出头来时，马策拉特先生也把他的鼓放正了。一瞬间，月亮从云里钻出来，只缺一点就全圆了。它使云的边缘像一个罐头的齿状边缘那样泛出金属的光泽。马策拉特先生拿起两根鼓棒，绝望地开始擂着鼓。鼓声听起来陌生，又熟悉。字母“O”一再形成，反复出现：亡，没有亡，还没有亡，波兰还没有亡！可是，这已经是可怜的维克托的声音了。他知道马策拉特先生的鼓乐的歌词：只要我们还活着，波兰就不会亡。看来两个绿帽子也熟悉这节奏。他们端着由月光描绘出来的机枪，浑身抽搐。马策拉特先生和可怜的维克托在我母亲的菜果园里奏起的那首进行曲，促使波兰骑兵马上行动。也许是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月光帮的忙，也可能是月光、鼓和近视的维克托沙哑的声音一起，施展魔法使许多骑兵从地底下冒了出来，鼻息呼呼，蹄声隆隆，马刺铿锵，牡马嘶鸣，呼杀嗨杀……不，什么也没有，没有任何东西发出任何声音只是马策拉特先生的鼓。因此，一中队波兰长枪骑兵，无声地滑过格雷海姆郊外已经收割的田野，长枪上的小旗游动着，一如整个骑兵中队也在月下游动，游动，左转弯朝我家菜园的方向游动，不是血亦不是肉，但是在游动，像玩具一样制成，像幽灵似的游动过来，也许可以同马策拉特先生的护理员用线绳编结的形象对比。一队编组成的波兰骑兵，没有声响，没有肉，没有血，而是波兰的，无拘无束地朝我们扑来。我们在地下趴倒，忍受住月光和波兰骑兵。他们冲向我母亲和其他各家的菜园，然而却一个也没有践踏。他们只带走了可怜的维克托和那两名刽子手，朝月下开阔的田野奔驰而去，没有亡，他们策马朝东方，朝波兰，朝月亮背后奔驰而去。

我们喘息地等候着，直到黑夜又成为没有事件的黑夜，月光消失，说明那早已腐烂的骑兵发动最后一次攻击的月光。我站起来，祝贺马策拉特先生取得伟大的成功。他疲倦而十分消沉地一挥手表表示拒绝：“成功，亲爱的戈特弗里德！我一生中所取得的成功实在数不胜数。我真想失败一次，但却很困难。”

我不爱听他的这番话，因为我属于勤奋的人们之列，但是没有取得成功。马策拉特先生看来不想领我的情，于是我责备他说“你太夸张了，奥斯卡！”我敢这样单刀直入，因为我们当时已经以“你”相称了。“所有的报纸都在报道你。你已经小有名气。钱就更不用说

了。但你以为我这样一个无名小卒在你这样的人身边待下去是件容易的事吗？我多么愿意独自一人干一件事，一件独一无二的事，就像你刚才完成的那种事情一样，如此一来，我也可以上报纸了，将会用大号铅字印出：这是戈特弗里德·封·维特拉干的！”

马策拉特先生的微笑使我的心凉到了心底。他仰面躺着，驼背钻在松软的土里，将一把把的草高高抛起，像一个全能的非人的神那样哈哈大笑：“我的朋友，这种事很简单！这儿，公事皮包！它没有落到波兰骑马的马蹄下去，真是奇迹。我把它送给你，全都拿去吧！去格雷海姆，那辆亮着灯的有轨电车还停在那儿呢。带着我的礼物开车到君主壁垒，去警察总局，告发，明天你就可以声名远扬了。”

我起先还拒绝这一建议，没有玻璃瓶里的手指，他肯定不能活下去。但他安慰我说，对于这段手指他已经完全厌烦了。此外，他有许多石膏复制品，还让人制作了一个纯金复制品。我现在可以拿着皮包，开上电车到警察局控告。

就这样，我走了，马策拉特先生在身后哈哈大笑。当我踩着铃铛向市内驶去时，他依然躺着要让黑夜来摆布他，拔草，大笑。我第二天早晨才去告发。感谢马策拉特先生的一番好意，我终于如愿以偿。

而我呢，好心的马策拉特先生，奥斯卡，笑着躺在格雷海姆附近夜间黑色的草丛中，在无数个可见的、死神般严肃的星星下面笑着翻滚，把我的驼背钻进温暖的泥土中去，想道：睡吧，奥斯卡，再最后自由的躺在月光下睡上一小时。

当我醒来时，天还是黑漆漆的，我感觉有什么东西，有什么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人在舔我的脸，生硬、温暖、潮湿、均匀地舔着。

这会不会是被维特拉带到此地来的警察正在用舌头把你舔醒呢？但是，我并没有立刻睁开眼睛，而是再让我被这样温暖、生硬、均匀、潮湿地舔上一会儿，享受着。奥斯卡猜着，不是警察，便是母牛。随后，我才睁开我的蓝眼睛。

它，黑白相间，伏在我身边，舔着我，直到我把眼睛睁开。天亮了，多云转晴。我暗自说，奥斯卡，可别待在这头母牛身边，虽然它像天仙般地瞧着你，虽然它这么勤快地用粗糙的舌头平息和减弱你的记忆。天亮了，你得逃走。维特拉去告发你，接下来你必须逃走。你若不真正逃跑，那控告也不会是真的。别管那母牛，你只管跑吧！他们会在这里或那里逮捕你，但这对于你来说都无所谓。

就这样，一头母牛舔了我，给我洗了脸，梳了头，我就拔腿逃跑了。没跑几步，就爆发出早晨清脆的笑声。母牛伏着哞哞叫，我把鼓留在哞哞叫的母牛身边，笑看逃之夭夭。

三十岁

是啊，逃跑！我逃跑是为了把维特的控告价值提高。逃跑总得有预定的目的地，你往哪里逃，奥斯卡？我问自己。所谓的铁幕，禁止我逃往东方。我的外祖母安娜·科尔雅切克的四条裙子，今天鼓起在卡舒贝的土豆地上，提供保护。可我呢，却不能把它作为逃跑的目的地，虽然那是惟一有希望的目的地。

附带提一笔：今天，是我的三十岁生日。一个三十岁的人应该像个堂堂男子汉，而不是像个学徒似的去谈论逃跑这个主题。玛丽亚，她给我带来了蛋糕和三十支蜡烛，并说：“奥斯卡。现在，你变得理智的时间慢慢地到了！”

我的朋友克勒普，像以往那样送我爵士乐唱片，用带来的五

根火柴，点燃了我的生日蛋糕上的三十支蜡烛。“三十而立！”克勒普说，他自己二十九岁。

维特拉，我的朋友戈特弗里德，最了解我送我甜食，在我的床栏杆上探身过来，带着鼻音说：“耶稣年满三十时，出门上路，集合门徒于自己周围。”

维特拉把我弄得不知所措。他认为我应该离开这张床，去集合门徒。接着来的是我的律师，挥舞着一张纸，大声祝贺，把他的尼龙帽挂在我的床上，向我和全体祝寿来宾宣布：“这真是幸运的巧合。今天，就在我的当事人三十岁生日时，我得到消息，将重新开庭审理无名指案件，有了新的线索，贝亚特姆姆，诸位都知道的……”

自从我逃跑这几年以来我所担心的事，今天，在我三十岁生日时，宣告即将来临：真正的罪犯找到了，再一次开庭审理，宣判我无罪，把我从疗养和护理院的甜蜜的床上赶走，放到冷冰冰的、暴露在各种天气之下的街道上，强迫三十岁的奥斯卡在他和他的鼓周围集合门徒。

她，贝亚特姆姆，出于嫉妒，谋害了我的道罗泰娅姆姆。

读者大概还记得。有一位韦尔纳博士，他，如同在电影里或生活中常有的那种情形，夹在两个护士之间。一段卑劣下流的故事：贝亚特爱着韦尔纳。韦尔纳却爱着道罗泰娅。道罗泰娅暗暗地爱着小奥斯卡。韦尔纳病倒。道罗泰娅看护他，因为他碰巧在她的病区。贝亚特容忍不了。据说，她将道罗泰娅哄出去散步，在格雷海姆附近的黑麦田里把她杀死，于是，贝亚特可以不受打扰地看护韦尔纳了。据说，她护理他，不是使他恢复健康而是相反。这个傻傻地爱着他的女护士也许这样对自己说道：只要他生病，他就是我的。是她给他服用了过量的药呢，还是给他吃错了药呢？反正韦尔纳博士死了，死于错服了药物或服用过量药物。但是，贝亚特在法庭上什么也不承认，更不承认那次黑麦田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里的散步，而那次散步成了道罗泰娅姆姆的最后一次散步。奥斯卡也什么都不承认，可是他有密封大口玻璃瓶里那只可以作为罪证的手指。他们因为他去过黑麦田而对他作了判决，却又并不认真对待他，而是把我送进了疗养和护理院进行观察。在此之前，我以逃跑来大大提高我的朋友戈特弗里德的控告的价值。

我逃跑时，是二十八岁。几小时前，我的生日蛋糕上的三十支蜡烛燃烧着，我逃跑时，是在九月。

上面已经讲过了，逃往我外祖母处的道路不通。我被迫逃向西方。由于政治原因，我不能去外祖母那里，那么，奥斯卡，你就逃到外祖父那里去吧。他住在布法罗，住在美国。逃到美国去！

当母牛在格雷海姆附近的草地上舔我而我还闭着眼睛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了在美国的外祖父科尔雅切克。也许是在清晨七点，我暗自说道：商店八点开门。我笑着跑开，把鼓留在母牛身边，心中想：戈特弗里德太疲倦，他可能八点或八点半才去告发，我要利用这段领先的距离。我用了十分钟的时间，在郊区格雷海姆打电话叫来了出租汽车。去到火车站。途中，我点钞票，经常点错，因为我必须一再像早晨那样清脆地大笑。接着，我翻看我的护照，由于“西方”音乐会经纪处的安排，上面有去法国和美国的有效签证。这本来是丢施博士的宿愿，让那些国家领略一下鼓手奥斯卡的旅行音乐会。

哦，我对自己说，我们逃到巴黎去吧，这非常好可以上电影，还有那个加宾，他抽着烟斗，追捕我，心地善良。那么，谁来扮演我呢？卓别林？毕加索？——出租汽车司机向我要钱时，我被这个逃跑的念头激动，还在笑着，连连拍打自己微皱的裤管。我付了钱，到车站饭馆用早餐。我在列车时刻表上找到了一趟最佳的车次，早餐后还有时间，便去兑换外币，买了一口细皮小箱。我不敢回于利希街去，便又买了一些日用品，把他们装进

箱子里。我也不必节约，便买了一张头等车票，不久，已安享着靠窗座位软垫的舒适惬意了。我逃跑了，但不必靠两条腿跑。火车开动，逃跑开始，奥斯卡便考虑起到底有什么值得害怕的事来了。我对自己说：没有害怕的事就不会逃跑的！奥斯卡呀，如果警察局只能让你发出早晨一般清脆的笑声的话，那么，有什么事情值得你害怕并且因此而逃跑呢？

今天，我三十岁，逃跑和审判已经过去。可是，在逃跑的路上我劝自己相信的那种恐惧却依旧存在。

这是轨缝撞击声，是火车的一首小曲吗？快到亚琛时我才注意到。这歌词，就像我陷在上等车厢软垫里似的，在我心中盘踞着，大约十点半过了，亚琛，它显然还在，越来越使人害怕。所以，当海关官员使我分心时，我十分高兴，他们似乎对我的驼背更感兴趣。我因此暗自说道：维特拉，这个贪睡鬼！现在快到十一点了，他还没有去警察局，可我一大清早就已经在逃跑的路上了，还劝说我自己接受一种恐惧，以便使我的逃跑有一种动力。到了比利时境内，列车唱着：黑厨娘，你在吗？在呀在呀！黑厨娘，你在吗？在呀在呀……此刻，我真是害怕极了。

今天，我三十岁，案件将再次审理，不日即将无罪释放。我又将四处奔波，这歌词也将在我耳边回旋：黑厨娘，你在吗？在呀在呀！

但是，除了我害怕黑厨娘以外，那次逃跑旅行还是非常美的，我独自一人坐在车厢里随时恭候她露面。我先后认识了比利时和法国的海关官员，有时小睡五分钟，又惊叫一声醒来。为了不让自己不加防卫地听任黑厨娘的摆布，我翻阅别人给我的《明镜》周刊。我一再为记者们学识渊博感到惊奇。我翻到一篇关于我的经纪人、“西方”音乐会经纪处的丢施博士的短评，文中证实了我早已知道的事情：丢施的经纪处只有一根台柱，鼓手奥斯卡。评论右侧是我的一张非常好的照片，就这样，直到快抵达巴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黎之前，我一直想象着由于我的被捕所造成的“西方”音乐会经纪处的破产情景。

我在过去的岁月里从不害怕黑厨娘。只是在逃跑途中，当我需要有什么使我害怕的时候，她才爬进了我的躯壳里，一直待到今天我庆祝自己的三十岁生日的时候，并且显现出各种不同的形象。譬如说，她可能呈现为“歌德”这个名字，我一听到就会失声惊呼，害怕地躲进被窝里去。从少年时起，我就努力研读这位诗圣的作品，但是，他那种奥林匹斯山众神般的超然冷静，一直给我以不祥之感。今天，他不再是光明的和古典的，换了装，一身黑，扮作厨娘，超过了拉斯普庭的阴森黑暗，站在我的栏杆床前，借我三十岁生日之机，问我道：“黑厨娘，她在吗？”这时，我真是害怕极了。

在呀在呀！列车答道，它正载着逃跑的奥斯卡去巴黎。我本来认为能在巴黎北站见到国际警察局的官员们。可是只有一名一身红葡萄酒气的行李搬运工向我打招呼。无论如何我也不会把他当成黑厨娘的。我信任地把我的箱子交给他，让他运到检票处前。可是，我心里想，警官们和厨娘也许不想浪费买站台票的钱，他们会在检票处外面叫在你并逮捕你的。因此，在检票处前就把箱子拿过来自己提着，这样做是较为明智的。就这样，我被迫一个人拖着箱子一直走到地铁，因为我没有遇上警官，我的箱子也没有被他们拎走。

我不想向读者叙述世界闻名的地铁的气味。我最近读到，这种香水可以买到。引起我注意的是：首先，火车和地铁一样打听黑厨娘在不在，虽然节奏稍有不同；其次，所有的乘客都同我一样知道并害怕黑厨娘，因为我周围所有的人呼出的都是恐惧与害怕。我计划是从意大利门，乘出租汽车去奥利机场。我想象着被捕的场面，它既然没有在北站出现，那就在著名的奥利机场好了，黑厨娘装扮作空中小姐，这场面，那么别出心裁。我必须转

一次车，幸好我的小箱子很轻。我让地铁劫持我向南驶去时，我想着：奥斯卡，你在哪儿下车呢？一天之内能够发生多少事情啊，现在你到了巴黎，你在哪下车呢，她会在哪儿迎接你呢，在意大利广场还是在意大利门呢？

我在意大利门的前一站白屋下车，因为我心里这样盘算着：他们自然在思考，我也在考虑，他们会等在意大利门旁。黑厨娘也知道，我想些什么，他们又想些什么。再说，我也受够了。逃跑，努力维持心中的恐惧，把我累坏了。奥斯卡不想去奥利机场，他认为白屋比奥利机场更地道，而且这样做也是对的，因为那个地铁车站有自动楼梯。它能使听到自动楼梯的格格响声：黑厨娘，你在吗？在呀在呀！

奥斯卡反而有点进退维谷了。他的逃跑正接近尾声，他的报道也即将结束。但是，地铁车站白屋的楼梯足以成为这一系列记述的压卷画面吗？

这时，我突然想到了我的三十岁生日。我愿意把我的三十岁生日作为结尾奉献给所有那些人们，他们认为自动楼梯只是有太大的噪音，黑厨娘则并不使他们害怕。因为，在所有生日中间，三十岁生日难道不是意义最单一而明确的吗？它让人预感到六十，又使六十成为多余。今天早晨，我的生日蛋糕上的三十支蜡烛燃烧时，我非常高兴，真想痛哭一场，可是当着玛丽亚的面，有点不好意思。

自动楼梯的第一级刚把我带走，我就大笑不已。虽然害怕，也许是因为害怕，我才放声大笑。徐缓地、陡直地升向高处——他们站在上面。还有抽半支香烟的时间。一对不受拘束的情侣在我上面两极胡闹。我下面一级是个老年妇女，开始，我毫无根据地疑心她是黑厨娘。她戴着一顶帽子，帽子的花饰意味着果实。我抽烟的时候，费尽心思去想同自动楼梯连带着可能发生的事情。于是，奥斯卡先扮演成诗人但丁，他刚从地狱回来，在自动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楼梯的末端，恭候他的是机灵的《明镜》周刊记者。他们问道：“哈罗，但丁，下面如何？”——我又扮作诗圣歌德，演同样的短剧，让《明镜》记者问我，在下面，在母亲们那里，日子过得怎么样。最后，我厌倦了诗人们，对自己说，上面既没有《明镜》记者，也没有大衣口袋里揣着金属徽章的先生们，站在上面的是厨娘。

自动楼梯旁边还有一道普通楼梯。这是街上的行人下地铁站的通道。外面下着雨。行人都被淋湿了。这使我非常不安，因为我在杜塞尔多夫抽不出时间去买一把雨伞。向上看了一眼，奥斯卡看到那些先生的面孔，他们都带着民用雨伞，但是，这并不让人怀疑黑厨娘的存在。我怎么招呼他们呢？我开始担心站在自动楼梯上慢吞吞地抽着烟。它正慢慢地提高着我的兴奋的情绪，丰富着我的见识。在自动楼梯上站着。留给我的选择是：变成三岁孩子或者变成六十岁的老人，然后离开自动楼梯，迎向国际警察局的官员，对黑厨娘产生某个年龄阶段的恐惧心理。

时间一定晚了。我的金属床疲倦不堪。我的护理员布鲁诺也已经两次在窥视孔里显露他的担忧的褐色眼睛了。那只生日蛋糕放在银莲花水彩下方。玛丽亚现在可能已经入睡了。大概是玛丽亚的姐姐古丝特，祝愿我后三十年幸福。玛丽亚令人羡慕得熟睡着。我的儿子库尔特，文科中学学生，优秀生和模范生，他对我的生日祝愿是什么？现在我想起来了，小库尔特在我三十岁生日时祝愿我恢复健康。但是，我祝愿自己能学玛丽亚的样，睡得香甜，因为我疲惫，几乎无话可说了。克勒普的年轻妻子以我的驼背为题做了一首幼稚可笑但出于好心的生日小诗。欧根亲王也是驼背，即使这样，他攻占了城市和要塞贝尔格莱德。玛丽亚最后会理解，驼背带来好运。欧根亲王和我一样也有两个父亲。现在我三十岁，但我的驼背比我年轻。以前，为了交好运，经常有美貌妇女在大街上摸我的驼背，欧根亲王是驼背，所以他是自然死

亡。假如耶稣也有个驼背的话，人家就很难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仅仅因为我三十岁了，所以，我现在当真必须走向世界，在我周围集合门徒吗？

这只不过是自动楼梯上突然产生的想法。我的前上方是一对无所顾及的情侣。我的后下方是老妇与帽子。外面在下雨，楼梯尽头，站着国际警察局的先生们。当你在自动楼梯上站着时，你会再次把所有的事情考虑一遍：你从哪里来？你到哪里去？你叫什么名字？你是谁？你想干什么？各种气味扑鼻而来：油浸沙丁鱼的油味，少女玛丽亚的香草味。我可怜的妈妈把油煮热，趁热喝下去，自己却冷却了，到了泥土下面。扬·布朗斯基，他一再浪费科隆香水，但是，死神仍过早地透过他的全部钮扣眼呼吸着。蔬菜商格雷夫的地窖里散发着过冬土豆味。还有一年级学生的石板旁的干海绵味。我的罗丝维塔，她身上有肉豆和肉桂寇的香味。当法因戈德先生向发着寒热的我洒消毒剂时，我乘着石炭酸云飘游。啊，圣心教堂的天这么多散发着霉味的衣服，冷的灰尘，我把鼓给谁了？

但是，这仅仅是在自动楼梯上突然产生的念头。今天，人家要把我钉在十字架上，说：你三十岁了。所以，你必须集合门徒。回想一下，人家把你逮捕时，你说过的话吧。数一数你的生日蛋糕上的蜡烛，离开你的床，集合门徒。一个三十岁的人有非常多机会。譬如说，如果人家当真把我逐出疗养院，我可以第二次向玛丽亚求婚。我今天肯定会有更多的机会。奥斯卡为她开设了商店，他有了名气，靠他的唱片可以继续挣很多钱。其间他也成熟了，年纪大点了。三十岁的人，是该结婚了！不然的话，我仍旧单身一人，买下一处优质开采场把石头加工成建筑材料。三十岁的人，是该创业了！如果预制房屋正面用石板的工作久而久之使我感到厌烦，我可以去看望缪斯乌拉，同她一起，充当给人启迪的模特儿，为美的艺术服务。有可能的话，有朝一日，我甚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至会跟她，跟频繁地同别人短期订婚的缪斯结为伉俪。三十岁的人，是该结婚了！如果我厌倦了欧罗巴，我可以，去美国，到布法罗，这是我的旧梦，去找我的外祖父，百万富翁和前纵火犯乔·科尔奇克，三十岁的人，是该定居了！要不然就是让我让步，让他们把我钉在十字架上，向世界走去。仅仅由于我三十岁了，他们把我看作弥赛亚，我就在他们面前扮成弥赛亚，违心地让我的善于描述的鼓超出它之所能，变为象征，建立一个党派，一个教派，或者是一个分会。

虽然我前有情侣后有戴帽老妇，这种自动楼梯上突然产生的念头仍旧向我袭来。那对情侣在我上面两级而不是一级，在他们和我之间，我放着我的小箱子。法国的青年很特别。当自动楼梯载着我们大家上升的时候，她解开了他的钮扣，抚摸他的十八岁的皮肤。但她干得很麻利，她的动作完全不是性爱的而是那种生意经的，我因此起了疑心。这些年轻人有可能是拿了官方的钱，在大街上显示爱的疯狂，而使法国的大都会下致丧失它的声誉。可是，当这对年轻人接吻时，我的疑虑也随之消失，她的舌头差不多使他窒息，咳个不停，而我已经掐灭了我的香烟，以一个不吸烟者的身份迎向刑事警察。在我以及那顶帽子下面的老妇没有做什么惊人的事情，虽说她像巴黎的许多老年人一样嘟哝，骂咧着。自动楼梯的橡皮面扶手随同我们一起上升。行人可以把手放在上面，让手一起上升。假如我把手套也一起带来旅行的话，我也会这样做的。楼梯间的瓷砖每一块都映出一点电灯光。奶油色的管道和肥大的电缆束陪伴我们上升。自动楼梯并没有发出地狱的噪声。虽然它是一种机械，却让人感到舒服。尽管有那格格作响的有关可怕的黑厨娘的诗句，我认为，白屋地铁车站得舒适，差不多适于居住。我感到在自动楼梯上仿佛在家里一样，尽管有害怕和儿童的恐惧。如果它载着跟我一起上升的不是陌生人，而是我的活着和死去的亲戚和朋友的话，我原本会感到幸福：我可

怜的妈妈夹在马策拉特和扬·布朗斯基之间，灰毛耗子特鲁钦斯基大娘同她的孩子古丝特、赫伯特、玛丽亚和弗里茨，蔬菜商格雷夫和他的邋遢老婆莉娜，自然也有贝布拉师傅和风雅的罗丝维塔——所有的人都因我的存在而遭难。可是，上面，在自动楼梯通向户外的地方，我希望取代刑事警察的是可怕的黑厨娘的对立面：我的外祖母安娜·科尔雅切克。像一座大山似的巍然屹立，在我和我的随从幸福地上升之后，把我们接纳到裙子里去，接纳到大山里去。

可是，在那里站着的是两位先生，穿的不是肥大的裙子，而是美式的雨衣。在上升即将结束时，我必须承认那对情侣和那个戴帽老妇，都是警方密探。

我还要说些什么呢？在电灯泡下诞生，三岁时故意中断成长，得到鼓，闻香草味，唱碎玻璃，患百日咳，给卢齐喂食，观察蚂蚁，决定成长，埋鼓，乘车去西方，失去东方，当模特儿，学石匠手艺重操铁皮鼓，参观水泥，挣钱，保护手指，送掉手指，笑着逃跑，上升，被捕，被判决，送进疗养院，不久将被宣告无罪开释，今天庆祝我的三十岁生日，始终对黑厨娘充满恐惧。

我把掐灭的香烟扔掉，扔在自动楼梯梯级的板条格垫间。奥斯卡在沿着四十五度角的斜边朝着天空上升较长时间之后，又垂直地上了三小步，前有警察情侣，后有警察奶奶，从自动楼梯的板条格垫上被移到固定的铁条格垫上。这时，刑事警察作了自我介绍，称呼他马策拉特。奥斯卡却顺着他在自动楼梯上突然产生一个奇怪的念头，脱口用德语说：“我是耶稣！”因为他看到对面站着的是国际刑事警官，使用法语重复了一遍，最后，又用英语说：“我是耶稣！”

但是，我还是被捕了。我没有反抗，信赖地置身于刑事警察的雨伞的保护之下，因为外面，正下着雨，但我仍旧害怕地、不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安地搜寻着扫视着四周，并且在林阴大道上的人群中，在挤在警察局运货棚车周围的人堆里，看到了黑厨娘令人恐怖的镇静的面孔——这正是她的可怕之处。

现在，我没有什么话可讲了。但是，我还得考虑一下，奥斯卡被他们从护理院和疗养里放出来是避免不了的，在这之后，他到底竟想干什么呢？独身生活？结婚？当模特儿？出国？买个采石场？集合门徒？成立教派？

今天，向一个三十岁的人提供的一切机会，都将经过检验，如果不用我的鼓，那又用什么去检验呢？所以，我将在我的铁皮上敲响那首小曲。我认为它更加生动，也越来越令人惧怕了。我要呼唤黑厨娘，询问她。这样，明天早晨我就可以告诉我的护理员布鲁诺，三十岁的奥斯卡将处在恐惧的阴影之下将过什么生活。它用手指讲话，在钥匙孔里咳嗽，在火炉里叹气，通过门叫喊。当船只在雾中拉响汽笛时，它从烟囱里冒出来。当一只垂死的苍蝇在双层窗之间嗡嗡叫的时候，当我可怜的妈妈要吃鳗鱼的时候，当太阳隐没在塔山背后像琥珀似的独善其身的时候，它一直在场。赫伯特扑向那个木雕时，他背后是什么？主祭台背后不也是它吗？如果没有黑厨娘，天主教教义又会是怎样的呢？当西吉斯蒙德·马库斯的玩具一齐跌落时，又是她投下了阴影。公寓院子里的孩子们，努希·艾克阿克塞尔·米施，苏西·卡特和小汉斯·科林，他们讲了出来，当他们煮砖头粉汤时，他们唱了出来：“黑厨娘，你在吗？在呀在呀！你有罪，你的罪孽最大。黑厨娘，你在吗……”她无处不在，甚至在香叶草汽水粉里，虽然它泛起的泡沫绿到了如此清白。在我曾经蹲过的大部分衣柜里，她也蹲过。她后来把三角形狐狸脸借给了卢齐·伦万德连皮吞下了夹香肠面包，把撒灰者引上跳台——只有奥斯卡幸免。他观看蚂蚁，明白了：这也成了她的阴影，再经过复制，跟随着香甜的东西，还有所有祝福，痛苦的言词，所有的石头：玄武岩，凝灰岩，辉

绿石，壳灰岩里的矿巢，如此柔软的雪花石膏……所有唱碎的玻璃：透明的玻璃，吹成极薄的玻璃……还有殖民地商品：一磅或半磅装蓝色口袋里的白糖和面粉。后来有四只猫，其中一只叫俾斯麦，被迫重新粉刷的围墙，昂首阔步去死的波兰人，还有谁击沉了什么时的特别新闻，从天平上扑腾落地的土豆，一头小的东西，我站立过的公墓，我躺过的椰子纤维，我跪过的方砖地……请别问奥斯卡，她是谁！奥斯卡已经语尽词穷。因为她吻过我的驼背，现在和今后则迎面向我走来：

始终在我背后的厨娘真黑。

现在她迎面朝我走来，真黑。

言词，大衣里子翻向外，真黑。

用黑市通货付款，真黑。

如果孩子们唱歌，他们就不唱：

黑厨娘，你在吗？在呀在呀！